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8

民国卷

王余光 吴永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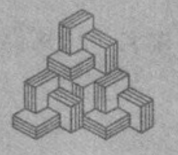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8 民国卷

王余光　吴永贵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王余光，吴永贵著．—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90-5

Ⅰ.中…　Ⅱ.①王…②吴…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民国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911号

责任编辑／刘伟见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正文印张／37.25　彩页印张　0.25
字　　数／538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5.00元

下　编

导论

中华民国史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大约38个年头。本卷叙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变化的历程。

民国出版史年代跨度虽然不长，但在出版史上却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承接晚清时期萌蘖而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一路发展下来，并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民营出版业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手段更加成熟，规模化经营的产业特征更加明显。这既与古代传统刻印时期手工作坊式的经营特点有较大差异，也与紧接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出版经济形态存在相当不同，表现出自身阶段的历史特殊性。但历史毕竟是前接后续，无法完全割裂的。且不说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的源头；民国出版业积累下来的出版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出版活动开展的重要人力物力基础；就是民国时期市场主导的经营运作方式，亦可成为现代出版企业可资取法的重要历史资源。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使民国出版史的研究多了一层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由于出版工作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属性，我们在研究民国出版史时，一方面取行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民国出版业如何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下，发展成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当时的出版产业如何布局，出版管理如何进行，出版法律如何制订与实施等；另一方面取出版文化史的视域，考察民

国时期出版活动与当时的政治变革、学术思潮、社会文化之间如何互动，时代如何影响着出版文化走向，出版又如何适应和推动时代文化的发展等。另外，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如何借助书刊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和扩大影响，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利用出版进行政治宣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地利用出版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亦是那一时期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本书所展开的民国出版史叙述，在撰写原则上，强调行业经济史和出版文化史并重，宏观描述和个案分析结合，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在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点，给予了特别关注。

本书在章节安排上，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基于历史性的概述，以时间为主轴，梳理民国出版发展的历史脉络，叙说中国出版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这个历程接踵晚清以降出版的近代化步伐，又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是国家现代化大过程中的小过程。民国38年的历史，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文化思潮变动不居，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统治政权的嬗变，其间发生了诸如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事件。民国出版活动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时代潮流共起伏，反映其变化，接受其影响，参与其进程，并在时代潮流的变革中，显示其本身的阶段性特点。大致说来，民国时期有三次大的历史事件对出版业影响最为显著。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带来的突变——出版物数量激增、出版物内容革新、出版物形式变化、出版机构崛起与调整，都是新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下的结果。二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国家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都为随后十年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时应势下的出版业，在这一历史机遇下，迎来了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出版高峰，同时也是民国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

代——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至抗战前夕达到历史的最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遏制了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本书上编，即以这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为分水岭，将民国出版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各列一章，构成本书上编一至四章的内容。下编是专题性的叙述，以内容为主轴，分别探讨了民国出版史的各重要专题：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出版经营活动；重要的编辑出版家的贡献与特点；出版与社会文化；教科书出版；丛书、工具书、学术著作与古籍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七个专题各为一章，构成下编第五到十一章的内容。第十二章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探讨绍往历史，亦昭示前行先机，特作为本书最后一章。

在本书的章节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还需要作以下三点说明：第一，本书上编各章的内容中，因为分别阑入了一些重要出版机构的介绍，而这些书局书店的存世时间，又多数在十年以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更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晚清，为了保持这些出版机构历史面貌完整不割裂，叙述时的贯通始末就显得必要，如此下来，就无法按照各章节划定的时间顺序对号入座。大致上，根据各出版机构的诞生时间，将它们分别划拨到各历史时段的章节中，民国以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放在了第一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则放入了第十二章。第二，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在称呼上不尽统一，名之为书局、书店、出版社、印书馆、图书馆等各种情况的都有，本书行文中往往以“书局”或“书店”笼统地概称这些机构，这是需要向读者诸君特别交待的。第三，本卷历史所言指的出版，概念较为宽泛，同时包括了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出版，但主要侧重于图书出版，兼及期刊出版，报纸出版涉及不多，只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对《申报》、《大公报》等少数几个影响大的报纸作了基本介绍，这也是为了与民国新闻史区别开来。

民国时期长期实行的出版登记制度决定了出版业进入的低门槛，也形成了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和出版机构的复杂化，有人在统计基础上作过毛估，民国时期书刊出版者数量多达万家[1]，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加上时局、思潮等因素施与出版业的种种影响，构筑了民国出版活动的繁冗复杂，这使我们今天勾勒那一时期的出版面貌很不容易。民国历史虽然距今未远，但由于政权的易代鼎革和体制的新老交替，使得许多出版史料未有保存，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少数几个出版机构延续到新历史时期外，多数书局书店不复续命，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研究民国出版史的难度。好在这些年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渐成热点，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省组织纂修地方出版志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起征集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料，开启了包括民国时期在内的近现代出版史研究之端绪后，世纪之交以来的民国出版史研究渐入佳境。一些个案研究相当深入，如对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史料的汇纂、文章的刊发、专著的出版，多管齐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形成了“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2]。研究者也不再满足于史料的整理与罗列，而自觉地将研究立足于文化层面，从“大文化的视野来考察出版的新路径”[3]。世纪之交以来出版的许多出版史著作题带“文化”二字，如王余光、吴永贵、阮阳著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建辉著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常紫钟、林理明主编的《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家熔著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范军著的《出版文化散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李家驹著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4年）等，很能反映出这样一种可喜的学术倾向。另外，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出版史研究，是近几年民国出版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取向。一些与出版关联密切的学科如现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34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梁元生：《序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范军：《出版文化散论》，40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陈思和、陈平原、杨扬、邹振环、柳珊、孙晶、刘纳、路英勇等人，因关注文学活动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而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出版史领域，从而使出版史的研究获致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本卷民国出版史的写作，充分吸收了时贤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得以撰写完成，同样得益于前人和今人所做的重要史料积累工作。早在民国时期，一些出版人就比较注意对当时出版情况的总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编辑所所长舒新城都曾刊发过相关的文章，他们提供的出版统计数字，本书中多次引用。当时一些书店编的图书销售目录，虽然目的是为了营业推广，但对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出版概况，同样有所助益。《申报》上的书刊广告连天接日，在见证了当时书业界浓厚的图书宣传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同样视之为研究当时书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历史线索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民国出版的各种图书十万种以上，虽然搜罗范围局限于少数几个大图书馆，称不上品种完全，但基本上反映了那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大略，是本书撰写者认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情况的重要资料基础。《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23—1949)》、《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等工具书，亦具有与《民国时期总书目》类似的资料功能，值得重视。20世纪50年代张静庐独立辑录的7编8册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本世纪以来出版的由宋原放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以及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诸人合编的10卷本《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这些煌煌大册，都很好地发挥了民国出版史史料集成功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叶再生著述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以史料丰富见长，本书时有征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的30余期《出版史料》，刊发了许多曾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刊、出版单位、著名人物等史料，素为海内外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本世纪初北京

版《出版史料》赓续刊印，已出版了20余期。这两份出版史专业刊物，是本书撰写者案头上的常备读物，时作研究上的参考。

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不仅吸纳了海内外学者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在较多历史问题上运用了新的史料，提出了我们的一些研究心得。但由于专门对民国出版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本卷尚属首例，在无前例可援的情况下，体例结构和方法路径定然存在许多可供商榷和改进的地方。虽然我们作了认真努力，但格于学识水平的有限，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时可能存在理解上的错误，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也不见得经受住仔细推敲，史料开掘不深入，数据统计不全面，理论分析不充分，都是本书撰写者需要加强的地方，这里特别指出来，提请读者和方家指正。

上　编



第一章　民国出版业的形成
(1912—1919)

第一节　晚清出版业的影响

民国时期出版业是建筑在晚清出版业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民国出版业源头活水的晚清出版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中，经历了从传统出版向新式出版的嬗变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官府、改良派、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外国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从各个不同方面推动了晚清出版业的发展，并将这一影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随后的民国时期。

一、传统出版业的延续和衰落

以木版刻印为出版技术特征，以线装竖排为装订排版形式，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出版内容的中国传统出版业，自唐代以降，千余年连绵不绝，对繁荣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促进世界文明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就传统出版业自身的历史进程而言，我国出版业虽然出现较早，但发展却相当缓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一贯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学统观念，未能给传统出版业提供变革的需求和动力。若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冲击之下，被迫开始近代化之旅，传统的雕版印刷也许还会像往朝往代一样，波澜不惊地缓步前行。然而，历

史是不能假设的。1842年8月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的城下之盟，决定了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继续发展。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给予中国出版业的，不仅是先进的现代出版技术，同时还有全新的出版传播观念。正是在这双重因素的夹击之下，中国古老的传统出版逐渐告别了它昔日曾有的辉煌，走向了它黄昏的末路。

正如雕版印刷取代手工抄写，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时间一样，从西方引进的以铅活字排版为主要技术特征的现代出版业，替换中国古老的以雕版刻印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传统出版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整个晚清时代，乃至民国时期，我们都不难在出版业的产业构成中，找到传统出版的因子。我国古代刻书传统中早已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在近代刻书活动中依然一息尚存，不绝如缕。

官刻方面，以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刻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甚至一度兴盛，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自1864年前后曾国藩首创金陵书局后，扬州的淮南官书局、苏州的江苏官书局、杭州的浙江官书局、武昌的崇文官书局、长沙的思贤官书局、福州的福州官书局、广州的广雅官书局、成都的存古官书局、昆明的云南官书局、北京的直隶官书局、济南的山东皇华官书局、太原的山西官书局、西安的陕西官书局等接踵而起，他们利用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力量，大量刊刻反映传统学术文化内容的典籍，数量之多，人称“群籍之要未刻者甚少”[1]，同时这些“局刻本”，因多为学者名家从事校勘而质量精良，因“平其值而售”价格低廉而流布广远。清末这种官方发动并出资的全国范围的官书局刻书，至于其目的如何且存而不论，但就其保存典籍、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来说，则无疑具有不可小视的出版意义。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七三,《经籍考》十七。

晚清一时兴起的官书局刻书，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冲击的清政府重振儒家道统、恢复清廷威信的政治需要，也体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中体西用”言论主张在出版上所

作的一种文化努力。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戊戌变法的兴起，以“中学”为主要刻书内容的官书局刻书日渐凋零，繁荣不再，多数官书局先后停办，只有浙江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零星可数的少数几个官书局延续到了下一个政权时期。自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历朝历代官刻唱主角的情形，到民国时期已不复存在。各地纷纷倒闭的官书局，后来大多附属于各省图书馆，就连在民国初年还在刻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初稿）和其他一些有关西北地理研究方面著作的浙江官书局[1]，也在后来同样归并到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民国时期，一些继承了官书局版片的图书馆，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等，曾利用馆藏的版片资源稍事刷印，间或刻一些新书。这些或重印或新刻的古籍，构成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一个部分，然而相比于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上海民营出版业在古籍出版上的大动作而言，那只能是十分细小的部分。

【1】胡道静：《关于官书局的按语》，《出版史料》1989年三四合期。

与晚清官方刻书的大起大落情形不同，作为传统出版业另外两大支柱的私刻和坊刻，则显示出一种平缓式的衰落。日益衰败的晚清经济国力，日渐应用的西方出版技术，都在不同方面一点点地销蚀着民间刻书的活力。虽说民间刻书式微的趋势已无可避免，但作为一种存在有千年之久的出版形态，一时还不会走向生命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刻和坊刻因为依托于民间，比官刻的维系于官府更具有强劲的生命韧性。从晚清到民国的政权嬗递，几乎彻底摧毁了前朝的官刻系统，而私刻和坊刻却能在日益窘迫的困境中继续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坊刻方面，清代时期一些著名的书坊，如苏州的扫叶山房、南京的李光明庄、广州的五桂堂，以及北京琉璃厂的一些书肆等，一直延续到民国的大部分年头。北京的来薰阁、邃雅斋、富晋书社、通学斋、松筠阁，上海的古书流通处、忠厚书庄、博古斋、修文堂书局、中国书店，苏州的来青阁、文学山房，杭州的古欢堂、抱经堂，西安的阎氏古董店，长沙的文善书店、李集古书店，福州的聚成堂，广州的登云阁等各大城市的古旧书店，它们或创办于晚清以后，或成名于

民国时期，主要从事古籍旧书的贩卖，之余也兼事传统方式的图书刻印，在民国书业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在私刻方面，抱着崇尚学问、推广文化和传播知识之目的的私家刻书，因所刻书籍质量精良，历朝历代都被读书人和藏书家奉为上品。相对于官刻和坊刻，私刻既不仰仗官府又少依赖市场，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从晚清到民国，那些家资殷实且热心文化建设的学者文人、藏书家而兼作刻书家的，不乏其人。举其荦荦大者，有潘仕成、伍崇曜、丁丙、赵之谦、叶德辉、王先谦、缪荃孙、罗振玉、张钧衡、刘承干、陶湘、董康、傅增湘、徐乃昌、丁祖荫、卢靖、卢弼兄弟、刘世珩、李盛铎、张寿镛等。他们或汇刻经史著述，或经心于金石、目录、词曲之书，尤其是在郡邑乡邦文献的刻印方面，最有建树，是中国近代以来地方文献出版中最为核心的中坚力量。

如上所述，从晚清到民国的传统刻印出版，一方面在无可挽回地衰竭着，另一方面又在不屈不挠地延续着。这种延续，除了表现为传统出版技术的继续应用，与一些出版机构的跨朝代留存外，凝聚在传统出版业中的某些遁于无形的出版因素，诸如价值观念、出版作风、审美习惯等，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式出版。清代以张海鹏为代表的刻书家所标举的“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这样一种价值追求[1]，被旧式的刻书家如叶德辉、罗振玉等人所沿袭，也被新式出版家如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等人所继承。叶德辉著有《书林清话》十卷，开宗明义者便为“总论刻书之益”。他援引张之洞《书目答问·劝刻书》中的话说：“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发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叶德辉坐而言起而行，一生刻书多达160余种[2]；而被茅盾誉为新式出版事业开辟草莱者的张元济[3]，在晚年总结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辉煌出版事业时也说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4] 两代出版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言指的具体出版目标容或有异，

【1】《藏书纪事诗》卷六。

【2】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38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4】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张元济诗文》，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但以出版服务于文化传承与进步的价值观则一脉相承。

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尽管变化很大，然而昌盛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依然薪火相传。考据之学，重视版本选择，讲究精雠细校。在此学风影响下的以官书局为代表的官刻和以藏书家为代表的私刻，都自觉地把考据学的学术要求，贯穿到所从事的出版活动中。近代最早成立的官书局——金陵书局，张文虎、刘毓崧、戴望等名宿“分任审阅编校之役”，1886年建立的广雅书局，屠敬山、王仁俊、叶昌炽、缪荃孙等硕儒俱列于校勘者名单之中。而近代的藏书家刻书更是务求精审，或自刻自校，或请名儒代劳。张文虎所声称的“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正是一般学人从事图书校勘的共同心态，也是晚清时期一些出版机构和出版人打造图书精品的思想基础。到了民国时期，一些由学人主持的民营新式出版机构，秉承了这一良好出版作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其版本之善、校勘之精，在学术文化界早有定评。作为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张元济，从选目到印刷，事事亲历亲为，确保了出版的高质量。20世纪20年代初，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古典白话小说，也属于古籍出版的范畴，在出版过程中同样做到了谨严不苟且。标点力求准确，再版时不断修改；版本则精益求精，一旦有更好的本子替代，甚至不惜毁版重排。如《红楼梦》1921年出版时先用的是程甲本，后来胡适又帮助找到了更好的程乙本，亚东不惜成本地坚决予以更换。这种在版本上“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的做法，同样见之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而民国时期以排印方式出版的另一部大型古籍丛书——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在校勘上亦可称颂。1935年该书重印时，中华书局登报公开征求校勘奖赏，若没有先前扎实的校勘做基础，中华书局断然不会有后面大胆的举动。古人说，“良工不示人以朴”，民国时期新式出版机构在古籍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审作风，未尝不可理解为乾嘉考据学风在出版界的遗响。

二、石印出版的潮起潮落和余波再兴

石印技术作为近代西方新式出版技术之一种，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中国并在清末光绪年间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它凭借着出版工序省、出书速度快、存貌不失真等巨大的生产力优势，后来者居上，一度取代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而垄断出版事业达二三十年之久。石印首先出现在上海的一个名叫土山湾印书馆的教会出版机构，但真正光大门庭的则是英国人美查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图1）。点石斋在全盛时期有石印全张机十多部，并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了20多个分店。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1]，确有其史实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248页。



图 1
点石斋印的《点石斋画报》

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的石印技术，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得以传播和应用。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1]。各地石印书局所印书籍的种类包括常用古籍、通俗小说、唱本、地图，乃至于报刊及新著之书等，但印得最多的还是各种科举用书。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给那些以石印兔园册子为营生的众多石印书局以致命性的打击，出版的存书乏人问津，兴盛一时的石印业几乎全军覆没。

[1]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456页。

晚清石印出版业的潮起与潮落，主要归结于图书市场的起伏变化。当初点石斋石印《康熙字典》，因携带便利、价格低廉而为当年的举业之人大批购买，一印4万部，又一印6万部，获取的巨大商业利润和随之展现出来的巨大场屋用书市场，吸引了众多出版者的大力跟进，甚至有些原本从事雕版印刷的老书坊也见机行事，改弦更张。如出版业的百年老店——扫叶山房，据其刊印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先后石印的各种图书便多达419种。而到了20世纪初叶，在八国联军巨大打击下奄奄一息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朝议多时的科举制度在"新政"中正式宣告废除。传统的读书人由此失去了借以飞黄腾达的敲门砖，而新起的石印业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图书市场。石印出版的衰落已不可避免，但衰落并不等于被淘汰，石印作为一种出版技术本身依然有着应用的价值。随着辛亥以后兴学存古、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古籍图书又有了新的市场需求。新形势下的古籍出版方式，除了传统的雕版刻印和新式的铅排铅印外，晚清时期用得惯熟的石印技术再一次因其影印传真的优点，而备受民国出版界的青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续古逸丛书》、《续藏经》、《道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等古籍，都是将千方百计搜访得来的第一流版本，以影印的方式使之化身为千百，满足了追求版本价值的古籍研究者和公私藏书家的需要。在影印这些古

籍的过程中，为了使印出来的书看起来美观，使得那些宋元善本中当年刷印时就有的搭痕、溢墨、双影、墨眼等毛病，不至于出现在影印后的新书上，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继承了晚清时期同文书局首创的在石板上描润修改的办法，另一方面又陆续应用了“仿写”、“再落石”等新的方法予以技术上的处理，使得新印出来的古籍，既不失原有版本的风貌，又在审美效果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民国时期运用石印技术影印古籍的出版社不限于商务印书馆一家，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文明书局、佛学书局、会文堂书局、锦章图书局等多家新老出版机构都有涉足；影印的出版物范围也不局限于古籍一类，各种碑帖、画册、地图、年历画、月份牌等多种类型的出版物亦利用石印技术。旧时我国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翻印外文原版书不受限制，很有一些高校和出版机构利用石印的方法影印外文教材，因影印价格较原版书便宜而备受学生的欢迎。长沙方鸣皋留日归来后，曾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西文原版书不经拍照直接落到石板上印刷的方法。上海龙门书局创办人严幼芝1930年也探索同一方法影印西书，轰动一时[1]。

随着新的先进胶印技术的引进，民国时期原来的一些石印业务逐步被取代，但就全国来说，直至50年代还是胶印与石印并存。石印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被淘汰，是因为胶印机价格既高，橡皮布、锌皮等制版材料又依赖进口，高昂的制版成本导致了昂贵的胶印价格，当时一般要求不高的彩印品仍以石印合算，不同的产品用不同的印刷方法矛盾并不突出。在全国出版和印刷中心的上海，部分石印所改以胶印为主后，石印设备和业务仍保留了若干年。而全国其他中小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前仍以石印支撑局面[2]。

三、新式出版的星星之火和燎原之势

所谓新式出版，是与传统出版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或是指引入的西方先进出版技术，或是指有别于传统的出版物内容，或

【1】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352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

【2】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353~354页。

是指现代企业的组织运作方式和出版制度。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在中国沿海及附近的海外其他地区，开办了一些教会出版机构。为了提高印刷的效率，传教士们最先实验并成功地应用和发展了中文的铅印排版技术；为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好感，传教士除了用新技术印刷宗教宣传品外，还出版了一些反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中文书刊。1860年以前的我国西书出版，几乎全部由教会出版机构所包办。从1843年至1860年，割让于英国的香港，和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的城市，共出版西书434种，除了329种纯属宗教宣传品外，其余的105种为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内容[1]。传教士们的出版活动，虽说最终目的都是为传教服务，但从取得的客观效果来看，却在无意中把新生产技术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优势直观地展现给了国内出版界，把近代西方文化所别有的另一番新天地展现给了封闭的国内知识界。它推动了我国近代出版技术的大力革新和我国出版物内容的结构性调整，促进了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冲动和对出版物巨大传播效果的觉醒性认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对“出版”这一传播利器的自觉利用，从而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我国出版业的向前发展。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近代初期由西方传教士最先开拓的新式出版事业，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数次的出版主体的演变：从当初的教会出版机构独步天下，到洋务运动兴起后官方出版与教会出版的并辔而行，再到20世纪初叶的民营出版主体地位的正式确立与形成。这种演变是渐进式的，同时伴随着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后者的成分一次次地赶超前者。洋务运动后，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为代表的官方出版机构开始壮大。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版的翻译西书就达160种之多[2]。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志士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挺身于书报刊的出版活动，康有为在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00页。

《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更是明确地将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馆列为“最要者四事”。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然并起。仅1896—1898年间，全国各地出版的报刊数量就在60种以上[1]。这些报刊多是由个人或团体所创办，虽然有些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多属于民营性质。20世纪初叶，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出台的制定学制和废除科举等教育改革措施，在促进了学堂在全国大规模兴起的同时，也推动了许多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出版业务的民营出版社的发展和壮大。中国近代出版业，尤其是民营出版业，进入了一个超常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都是民营性质的出版社。它们或是因出版教科书而成立，或是中途以教科书而发家。特别是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通过这几年加速度式的发展，已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一跃成为一个实力十分雄厚的大企业。在民元前的1911年，该馆出版图书141种583册[2]，营业额达1 676 052元[3]。如此大的营业规模，在当时的书业界，已推为第一，即便在当时的整个企业界，亦堪可称雄。这一时期的民营出版企业已真正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主力军，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把这一决定性的出版格局，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贯穿了民国近40年的历史。

其实，在百余年的新式出版业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的出版格局外，出版业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定型于清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比如说宏观方面的如国家的出版制度，中观方面的如出版行业的协会组织，微观方面的如出版企业的组织运作等。清代末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大清著作权律》、《大清报律》、《审定教科用图书凡例》等，都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专律。虽然这些出版法令随着1912年清政府统治的被推翻而失去了法律效力，但它们对于后来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出版法令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著作权律，北洋政府以及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著作权法》，在体系上基本都没有超出《大清

【1】根据陈玉申:《晚清报业史》105~108页列出的表格统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2】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7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著作权律》的范围。在书业行业的组织方面，书业公会作为书业的行业性组织，在我国出现较早，最迟于清代初期在我国刻书业较发达的苏州，就有了一个名为崇德公所的组织[1]。但新式出版的行业协会组织，则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商民书业公会为最早，它们代表着入会的会员单位行使着行业利益保护和行业管理监督的职能。到了1920年，两家行业组织合并为一，合并后的书业公所承担的还是晚清时期一直因袭下来的那些职能，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1] 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43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在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上，晚清末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建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新式出版文化机构，它走出了过去传统出版业作坊式经营的狭小胡同，而进入了按资本主义企业方式运作的宽广坦途。商务的那种股份制的经营管理体制，以及集编辑、印刷、发行一体化的经营运作方式，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并为后来成立的一些大书局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所模仿与效法。另外，民国时期书业界普遍采用的寄销制，发行过程中的书籍折扣及回佣办法等一些行业内的行规，都是初始于晚清并得以长期固定下来。

从晚清到民国，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出版物类型的不断丰富，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同时呼应了出版物内容结构的不断调整。不同历史时期自有不同的出版热点和重点。但就大的出版物类型而言，如出版界通常习惯上划分的教科书出版、古籍出版、工具书出版、翻译出版、文艺著作出版、社科图书出版、自然科学图书出版等几大出版门类，在晚清末年有的已基本定型，有的则有相当的出版基础。前者如教科书出版、翻译出版，后者如工具书出版、文艺著作出版等。民国时期几大出版机构的排名是以教科书的市场份额来计算的，而教科书出版正是晚清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民营出版业赖以发展和壮大的经济基础。翻译出版是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的大头，据有关专家估计，民国时期翻译出版图书有40 000多种，约占民国全部出版图书总数的三

【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与出版文化变迁》,4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270页。

【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21页。

【4】《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分之一[1]，而翻译出版恰是新式出版中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其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在工具书出版方面，人们向来把民国时期出版的《辞源》、《辞海》、《辞通》、《中华大字典》等字辞书的出版，列为大的出版文化工程，其实传教士19世纪初期用新式出版技术排印的第一本大书，就是一部含有中英两种文字的名为《中国语文字典》的工具书。全书10开本6大本，厚达5 000页[2]。中英对照的英汉或汉英词典也一直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出版重点，如1899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901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等，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英华大辞典》，一直到1935年还在印刷发行[3]。在文艺图书出版方面，晚清出版界对文学的社会功用非常重视，希望通过文学的出版来唤醒民众的爱国民主意识，从而导致了晚清文学出版的繁荣。文学出版中以小说出版最为醒目，谴责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这些小说新类名的出现，正是此类出版物众多而进行文学和出版上划分的结果。《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堪称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侦探小说因其与中国的公案小说、历史小说相通以及迎合末世人民铲奸除恶的心理而风靡一时。侦探小说与谴责小说结合起来，导致民初黑幕小说的行世；言情小说的代表刊物《小说时报》，其大部分作者到民初异化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4]。所有这些，都为民国时期文艺书刊出版的兴盛种下了因子。

19世纪上半叶由西方传教士导入中土的新式出版，是在国内传统出版已发展成熟的情况下登陆的。新式出版与传统出版在百余年的相处过程中，彼此之间有挤压，有交叉，也有融合，表现得相当的错综复杂。比如说，雕版刻印，明显属于传统出版技术范畴，可是晚清时期的许多新式出版物又是通过这种古老的技术方式生产出来的。如严复著名的西学译著《天演论》，最早的版本就是1898年的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本。晚清官书局所刻印的主要是传统典籍，但也有部分书籍属于新学范畴。京师同文

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出版西学新书为能事，用的出版技术却有不少是传统的木版雕印；而平版石印，引进于西方，自然归属于新式出版技术之列，可出版得更多的却是传统古籍和科举用书。这种交叉的情况，在近代出版界十分多见。我们说，新出版技术、新书刊内容和新组织制度，是新式出版的三大主要特征，但这些特征在20世纪以前的晚清出版界，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的"或"字关系而不是包举性的"和"字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民国时期，新式出版中"或"的成分已越来越少，"和"的成分则日益增多，表明新式出版已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第二节　民国出版业中心——上海

在中国新式出版业的演进过程中，上海长期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这种角色地位的形成，是与近代上海城市的迅速崛起乃至于称雄全国的局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既依托于所在地的城市建设，同时又是上海这个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开埠以前的上海，不过是江苏省松江府下属的一个普通的县城。开埠以后的上海，则以超常的速度膨胀、发展，人口在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大关，成为中国特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也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重要到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地步。

在经济方面，上海是中国的外贸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外贸方面，到抗日战争前，在外国对华进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上海占全国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50%以上。金融方面，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80%的份额，设有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工业方面，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1948年工厂数、工人数占全国的50%以上[1]。

【1】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48~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各种新式的印刷机械和先进印刷方式被不断地介绍和引进到上海，原先落后的刻印被淘汰出局，石印、铅印、胶印这些崭新的印刷技术代之而起，成为出版技术的主流。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全国印刷条件最好，印刷设备最先进的地区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外地的教育文化界人士参观上海时，都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的印刷厂作为参观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抗战军兴以后，上海的大出版社多迁徙到内地，原先在上海的印刷设备因笨重一时不能并迁，以至于抗战期间的很多印刷品质量大不如战前。这一正一反的例子，说明了上海印刷业在全国的突出地位。而印刷业本身，就是上海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上海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上海出版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上海全国出版技术龙头的地位也就难以确立。

【1】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内部刊物，如《馆内通讯》、《中华书局月报》上，常能见到这方面的记载。

上海外贸中心的地位，使得出版业所需要的国外进口纸张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上海。过去我国造纸技术落后，国内生产的纸张往往不能符合新式印刷技术的要求，印刷领域的纸张原料依赖进口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上海外贸的发达，则填补了这一不应有的缺口，保证了新式印刷对进口纸张的需求。另外，国内知识文化界对一些原版外文书的需求，也依靠外贸的供应。除了过去一些大书局设有相应的部门出售这些原版外文书外，上海愚园路、卡得路（今石门二路）、北四川路颇有几家卖西文旧书的书店，如内山书店、伊文思图书公司等都是其中的著名者。

上海工商业的发达，使得一些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被书业领域所借鉴、吸收和改进。早期的商务印书馆自从其发展壮大起，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以后又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商务印书馆的组织管理模式，为后起的许多出版机构所抄袭和仿效。

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吸纳了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异乡人，他们成为上海这个新兴城市里新的工人、商人、职员、店员、小生产者、个体经营者和小商贩。这些快速增长的不同职业

的新“上海人”，构成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市民阶层，同时也构成了上海出版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读者群。上海不仅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书刊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出版企业，包括外地的一些出版社都不敢稍加轻忽，同时上海城市读者的阅读趋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些出版部门的选题走向，那些专供消闲的出版物应运而生，并随着读者趣味的变化而风云流转。

在政治方面，上海在近代的政治地位可能先不及北京，后不如南京，但却因其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为近代各派政治力量所必争，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上海都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响应者甚至是带头先锋者的作用。政治的变革往往需要舆论为其呐喊助威，舆论的策应又有赖于出版的大力配合。上海的出版业便因缘际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政治运动的催生之下，把一个又一个的报刊、杂志，把一个又一个的出版社、书局从上海的大马路旁、小弄堂里、石库门边、亭子间里孕育出来。

上海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是中国其他23个租界总面积之和的1.5倍。由于一市三治，存在着政治控制和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租界一度成为反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进步人士的活动基地，也是民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部门发展事业的理想场所。一些于政府不利甚至是反对政府的书刊，借助租界的庇护得以出版与传播，一些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紧密关联的版权制度、稿费制度、报刊广告、出版法规等在这里得以孕育与形成。上海出版业确有着国内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较为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上海出版业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得以迅速成长的。

在文化方面，上海自租界辟设以后，帝国主义在利用这个“国中之国”，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奴役、经济掠夺和思想侵蚀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直观地展现给国人。上海

以其特殊的地位，在当时简直成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批发站”和“中转站”，求西学、奔上海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心理[1]。各种中外文字的图书报刊，成为了西学传播的主要工具，各类中西人士开办的出版机构，成为了西学传播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教育改革潮流中适时而起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其迅速的崛起与壮大，标志着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从起步走向了成熟。清末最后十年的上海，涌现的民营出版机构还有：大同译书局、广智书局、广益书局、神州国光社、科学仪器馆、锦章书局、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夏颂莱创办）、国学扶轮社、作新社、小说林社、有正书局、群学社、新世界小说社、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乐群书局等。这些书局的先后兴起，正式确立了上海在近代中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地位不断地得到强化。

1912年民国初建，紧接着上海就有了一个与商务印书馆相抗衡的全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随后被全国出版界公认的第三、第四、第五等可数的大书局几乎无一不落户于上海。上海原有的出版基础和日益雄厚的出版文化资源，是上海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自晚清以降，上海就是中国文化市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城市。这种环境，有利于传统文化人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状态下游离出来，成为依靠自己的知识安身立命的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化事业，通过卖文、卖画、卖知识，他们有较为可靠的经济来源，有成就感，安全感。这使得各地文化人竞相流寓上海。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集结地。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著述活动，构成上海出版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作者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出版活动，向出版业投射了不同庸常的精神特征和理想色彩。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都堪称有文化理想的专职出版家，而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则直接愤激于现实政治的黑暗，试图借助出版的手段达到思想宣传的目的，20世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便由此而在上海发轫。《新青年》后来因陈独秀的北上改在北京大学出

[1] 吴士英：《论租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影响》，《文史哲》1998年第5期。

版，北京也随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上海却通过出版，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出版的书籍有相当一部分由上海代销，如上海亚东图书馆就曾代理销售北大出版的书籍，而《新潮》、《每周评论》等期刊的再版，都是直接拿到上海来印刷和发行的。在全国以传播新文化著称的"四大副刊"中，上海就占了两家，这就是《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但以介绍西方学术流派和探讨社会主义问题著称，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摇篮之一。

当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三"高潮，《新青年》突破不批评时政的诺言变成一份纯政治的刊物后，也于1920年2月，随同陈独秀一道重新返回上海。五四之后，北方的大批知识分子不堪北京政府的拖欠薪水和文化高压政策，陆续离开北京南下；20世纪2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中心，也由北京移至上海。在国内人才纷纷南下上海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留学潮流中学成归来的大批留学生，也大多把上海作为发展事业的基点。随着各地精英人物的汇集，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全国的文化中心。上海二三十年代云蒸霞蔚的出版活动，凸显和加强了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分量，另一方面，上海的人文荟萃也强化和推动了上海出版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原本就在全国称雄的出版地位更加巩固并得以继续提高。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35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登录的出版机构有81家，其中资本在100万以上的有2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资本在50—100万的有1家（世界书局），资本在10—50万的有6家。1936年12月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登录的出版机构有66家，其中：资本200万元以上的2家，10万元以上的9家，3万元以上的11家，3万元以下的44家。职工人数200人以上的5家，20人以上的14家，20人以下的47家。而像良友图书公司那样没有参加书业同业公会的出版机构尚有60多家[1]。上海出版机构如此之繁盛，从业人员如此之众多，

[1]《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第十卷）》，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出版资本如此之雄厚，是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大出版机构，可称得上是民国时期全国出版业中真正的巨无霸。据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调查计算，1934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1%，1935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2%，1936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71%，均出自于他们之手[1]。若是把三家大书局之外上海其他的一些中小书局的出版物数量加进去，上海出版物在全国总数百分比中必然又会有一个大的增幅。

【1】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同其他大多数行业一样，上海的出版机构也随着自身的发展，自发地形成了一块相对集中的商业区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内，东西方向的福州路、广东路，自河南中路起至福建中路一段，汉口路自河南中路至广西路一段；南北方向的河南中路、山东中路（其南段俗称麦家圈，北段俗称望平街），自延安东路至九江路一段和昭通路（旧称交通路）短短一段”这一区域，报馆书店等文化机构林立，是上海过去有名的文化街[2]。（图2）而其中的四马路（即福建路），更是书局书店云集之地，享有书店街的美名。类型丰富的书刊品种，鳞次栉比的书局书店，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书商们来这里发货和添货，上海发达的水陆路交通保证了出版物物流的畅通。善于推销的出版经营者十分重视邮购业务的开展，上海发达的邮政系统把各种书报刊无远弗届地送到每一个需要它的读者手中。为了拓展销售业务，上海凡是有点规模的书局，都设法在全国重要的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和特约经销处。这些分支机构和特约经销点即便在北京、南京、天津、汉口、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依然在当地书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他中小城市更无

【2】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

图2
上海书店街一瞥



论焉。它们像一个庞大的网络，纵横交错地把上海这个中心点和全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辐射全国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外敌的入侵才被迫中断。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沦陷于入侵者之手。上海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大多随着战事的推移，迁徙于后方各地，上海出版业昔日的繁荣戛然而止，其原有的全国中心地位，也在这一特殊的八九年时间里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桂林、重庆等后方城市。然而，即便在上海“孤岛”时期，留在上海的一些出版人依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出版斗争，为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随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原在桂林、重庆的出版人又纷纷把机构迁回到他们梦想已久的上海。上海再次成为出版者展示身手的中心舞台，尽管随后而来的内战，多少粉碎了他们回沪之初的勃勃雄心，但就上海这个城市而言，它无可置疑地又恢复了抗战前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这一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书业公私合营之前，才宣告正式结束。

第三节　中华书局崛起于出版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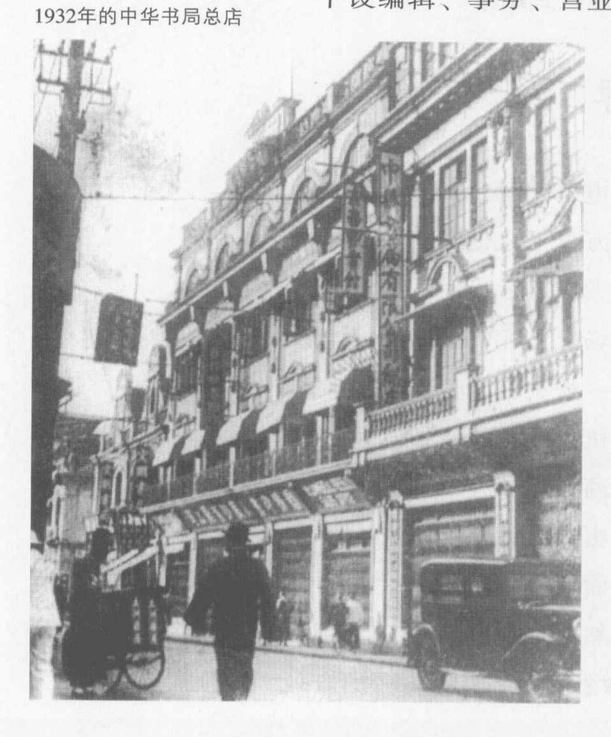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也诞生了民国时期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由两万五千元创基，很快就发展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综合性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出版物市场上，尤其是教科书出版上渐成垄断的势头。出版领域从一家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两家的分庭抗礼，意味着近代出版业激烈竞争机制的正式形成。中国的出版格局为之一变。也正是有了巨大的商业竞争，出版者经营的手段才更加灵活，彼此间应对的措施才更富有策略，由此而形成的近代出版史才更加显得异彩纷呈。进而言之，那个时代之所以有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面世，一方面固然出自一些有责任感的出版家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与这种激烈竞争的出版格局下，

出版者为了获得社会声誉和长期发展不能不有长远打算有关。

中华书局是由陆费逵（伯鸿）、戴克敦（懋哉）、陈寅（协恭）等人在上海创办。虽说书局挂牌之日在民国元年元旦，而筹措却在辛亥革命以前。1911年，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已奄奄待毙，国内革命的势头风声鹤唳。作为日知会会员的陆费逵预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正是自己创业的大好机会，于是秘密组织同志，提前编写适合未来中华民国政体的教科书。当陆费逵的预感不久果真成为现实之时，他事先量身定做的“中华教科书”也就到了成功之日。当时作为全国最大教科书出版供应商的商务印书馆，原先编写的那些教科书，因内容反映帝制而显得大为陈旧过时，情急之下的商务印书馆尽管没有坐以待毙，积极地进行亡羊补牢，但无论是挖改修补，还是另编重排，都不是短时间所能奏功。于是在这段无可奈何的时间差中，商务的大片教科书市场被新起的中华书局所挤占。

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公司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组织机构大致确立了下来。随着中华书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厂房的不断重建，总公司地址也不断变更，1913年从河南路迁至东百老汇路，1916年又从东百老汇路迁至静安寺路，1935年澳门路新厂落成后，又迁至新厂办公。（图3）每一次迁移都可看成中华书局出版实力增强的表现和结果。确实，中华书局自“中华教科书”一举成功后，很快就发展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书局，并把这一地位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这是很不易的。这种不易，大而言之，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同业间的巨大竞争；其二，民

图3
1932年的中华书局总店



国时期非出版者所能为的动荡时局，比如说，八年抗战和随后的内战，对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各出版社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三，一个出版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自身制度和管理上的缺陷，如商务印书馆1910年的橡皮股票亏空问题[1]，世界书局1934年的世界银行储户挤提存款导致的资金周转失灵问题[2]，中华书局则有1917年的“民六危机”。关于“民六危机”的原因，据查账代表吴镜渊、黄毅之两人在《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中分析说：“不外欧战方殷，原料昂贵，国内多故，金融恐慌，局长去年卧病三月，副局长去年亏空累万。凡此诚足致病之由，然皆外感而非致命之原因也。致命之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事变迁，失败亦均不免。”[3] 为了渡过难关，中华书局先是谋求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不果后，又相继组织了维华银团、和济公司、公益公司等银团，垫本造货，帮助中华书局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经历这次危机之后的中华书局励精图治，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并逐步转入良性循环，到了20世纪30年代，得以进入全面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4]。下面是中华书局1912年至1936年历年的营业额和利润一览表[5]。

年份	营业额（单位：万元）				利润（单位：万元）
	总公司	分支局	印刷厂	合计	
1912				22	4.4
1913.1—6				35	9
1913.7—1914.6				70	13
1914.7—1915.12				165	25.8
1916				110	22
1917	63				
1918.7—1919.6				82	2
1919.7—1920.6				110	22
1920.7—1921.6				148	16
1921.7—1922.6	40	97	36	173	17.6
1922.7—1923.6	43	100	40	183	19
1923.7—1924.6	57	97	53	207	20
1924.7—1925.6	52	84	62	198	17

【1】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7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261页。

【3】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33页。

【4】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陆费逵与中华书局》，309~3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此表转自俞筱尧：《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陆费逵与中华书局》，229~230页。

续 表

年份	营业额（单位：万元）				利润
	总公司	分支局	印刷厂	合计	（单位：万元）
1925. 7—1926. 6	57	91	82	230	17. 6
1926. 7—1927. 6	71	98	93	262	10
1927. 7—1928. 6	71	77	75	223	8. 3
1928. 7—1929. 6	92	101	89	282	18
1929. 7—1930. 6	109	138	87	334	19. 6
1930. 7—1931. 6	113	169	115	397	22. 3
1931. 7—1932. 6	96	164	107	367	18. 3
1932. 7—1933. 6	110	168	117	395	17. 6
1933. 7—1934. 6	118	167	126	411	18
1934. 7—1935. 6	147	189	135	471	20. 3
1935. 7—1936. 6					
1936. 7—1936. 12				532	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华书局抗战前二十余年的经营历史，除了“民六危机”一度受到挫折外，整体来说发展是相当稳健的。1937年抗战军兴，中华书局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无可奈何地由强盛走向衰落。随着以后战事的发展，中华书局总部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苦苦支撑，财产损失自不必说，出书数量也跟着锐减，1942年，中华书局才出了2种书，相比昔日的辉煌，想来令人痛心。抗战胜利以后，中华书局和全国大多数书局一起迁回上海，本以为可以东山再起，然而，紧接而起的战事粉碎了他们当初的梦想。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正式公私合营，改变了原来的私营经济性质，由此步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书局是一个股份制企业，赚钱是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甚至说是首要目标。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华书局在赚取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还认真地考虑到出版的文化价值。民国期间，中华书局共出书五千余种。虽不能说中华出的每本书都质量优良，但我们确实不难从中感到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科学的、学术的气息。中华书局通过出版活动对我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大的方面。

第一，在教科书及教育类图书出版方面。教科书是教学双方

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学工具，任何新型的教育模式，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教科书配合，都很难真正立稳根基，取得预期效果。中华书局通过对这一教学工具的编写、出版和供应，直接作用于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涉及学科门类广——凡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所罗列的几乎所有课程，中华书局都编写有相应的教科书；涉及教育层次多——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从师范学校到专科学校，中华书局都有教科书供应，据统计，民国期间中华书局一共编写了10套小学教科书，8套中学教科书，8套师范用书，1套中等农业教科书，1套中等商科教科书和1套大学用书[1]；出版印刷数量大——过去全国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有十分之三是中华书局供应的[2]。这些教科书以其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一以贯之的服务宗旨，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教学对象的不同教学需要。它们在承载着知识传播重任的同时，也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到受教育者的血脉深处，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近现代广为应用的中华书局教科书，其意义就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教育范畴，同时它还肩负了人生教育、社会教育的重任。

【1】以上统计资料根据吴永贵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第50~51页统计得出,武汉大学,2002年。

【2】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中华书局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教科书一门。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目录中，我们统计出来的，与教育有关的出版物还有：(1) 有关教师及教育研究人员参考用的教育理论书籍342种；(2) 有关孩子们课外阅读用的儿童读物近2 000种；(3) 有关成人补习知识用的平民课本、民众课本14套，以及专门为民众策划的民众通俗读物丛书11套；(4) 有关英语学习者学习语言用的英语读物347种；(5) 有关普及国语教育用的国语图书93种[3]。教育理论书籍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拓展人们教育实践活动的视野，激发人们探索中国教育出路的热情，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儿童读物可以有效地弥补学生课堂教学之不足，有助于青少年增长见识，学习技能，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培养情操，体验美感；成人教育书籍以供成人补习知识为目的，是20世纪二三

【3】以上统计资料根据吴永贵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第59~85页统计得出。

十年代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图书涉及到英语教学、语音文字、语法修辞、词汇翻译、字典词典、读本读物等多个不同的门类，在引进国外先进的英语教学法和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方面，厥功甚伟；而国语图书在普及国音国语知识，推动国语教育方面，功劳至大。

第二，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学术图书的出版，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水平的见证，同时又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建设服务。中华书局历年出版的学术性图书，涉及学科门类既广，数量品种亦多，而且在出版方式上，多以丛书的形式刊行，主要有：《新文化丛书》43种；《新中华丛书》72种；《少年中国学会丛书》24种；《中华学艺社学艺文库》4种；《哲学丛书》4种；《佛学丛书》2种；《社会科学丛书》29种；《国际丛书》26种；《国防丛书》10种；《合作丛书》4种；《新中学会经济丛书》2种；《中华学艺社丛书》1种；《音乐丛刊》13种；《中等算学研究会丛书》2种；《算学丛书》5种；《科学丛书》6种；《农业丛书》26种；《中国计政学会丛书》6种；《史地丛书》4种；《史学丛书》6种；《新世纪丛书》5种等[1]。另外，《大学用书》91种，既可看成是教材，也可视作是学术性丛书。

在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中华书局出版梁氏的文集，前后一共有三次，一次比一次完备。1916年出版了《饮冰室全集》，线装48册。1926年出版了梁廷灿编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线装80册。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1932年出版了梁的故友林志钧（宰平）重新编辑的《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合集》分为两大类，全部按年编排。甲类《文集》，共16册，45卷；乙类《专集》，共24册，103卷。全书40册，148卷。以往各种梁集，大都只收政论、散文，很少收专著。《饮冰室合集》则不同，它不仅基本上将已印之政论、散文、专著全部收录，而且还辑入不少未印文稿，刊登了“残稿存目”，比较全面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著述。这样做的结果，“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

【1】以上统计资料根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总目)》统计得出，上海图书馆，1979年。

之迹”[1]。该书出版后，受到当时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并于1936年、1941年重版发行。

[1]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例言》,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第三，在工具书出版方面。工具书一贯被人称为“案头顾问”、“无声老师”，备受读书人重视。过去中华书局出版了数百种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具书，是我国近现代辞书编辑与出版的一支主要生力军。其中尤以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和1936—1937年出版的《辞海》最为有名。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工具书，在便利当时学者的查考与检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工具书甚至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第四，在古籍出版方面。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古籍的出版蔚为大观。中华书局排印的《四部备要》和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堪称为古籍出版的大手笔，对古籍文献的保存和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这两部大书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中国文学精华》、《袖珍古书读本》等其他一些古籍，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五，在杂志出版方面。中华书局素来重视杂志的编印与发行。民国38年中，中华书局或由自己编印，或代他人发行的杂志种数约有40种左右。民初发行了《中华教育界》(图4)、《中华小说界》(图5)、《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图6)、《中华学生







图4（左）
《中华教育界》

图5（中）
《中华小说界》

图6（右）
《中华妇女界》

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等杂志，在当时号称为“八大杂志”。其中以《中华教育界》和《大中华》最为著名。

《大中华》于1915年1月20日创刊，由梁启超担任主任撰述，以“养成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为办刊宗旨。从《大中华》各期刊载的内容来看，这一办刊宗旨得到了切实贯彻。特别是它以独立精神办刊的作风，深得知识界、舆论界好评。1卷8期上发表的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甚嚣尘上的袁世凯帝制复辟阴谋。这种大胆的政论对当时的社会舆论起到了鼓动作用。可惜的是，这样一份有影响、有个性的杂志，因经济原因，只延续了两年时间就被迫停刊了。（图7）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创刊时间最早、存世时间最长的一份教育研究性专业刊物。自1912年创刊以来，《中华教育界》一直注重及时地反映和报道各种教育新学说、新思潮、新方法和新实验；注重组织力量对重要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注重刊发那些在内容上切中时弊，不蹈玄虚的文章，以便教育部门的实际应用；注重向教育界提供有价值的教育参考资料等。在三十多年的办刊实践活动中，《中华教育界》始终站在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教育观点，传播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教学参考资料，对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图7
《大中华》

1917年中华书局发生“民六危机”后，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除《中华教育界》外，都先后停刊。1919年4月《中华英文周报》创刊，相隔三年后《小朋友》创刊。这两份刊物的刊行时间都在二十年以上，前者

是英语学习者的良师益友，后者是十岁左右孩子们的知识乐园。两份刊物都因质量优良而拥有很高的发行量。中华书局的少儿刊物，除了最有影响的《小朋友》外，还有《小弟弟》旬刊（1922年5月创刊）、《小妹妹》旬刊（1922年5月创刊）、《儿童文学》月刊（1924年4月创刊）、《小朋友画报》半月刊（1926年8月创刊）、《少年周报》周刊（1937年4月创刊）等。这些少儿刊物大多刊期不长，长的不过三四年，短的仅有几个月，但在提高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方面，都或大或小地作出了一份贡献。

20世纪20年代，中华书局代为发行的杂志约有十几种，其中著名的有《教育丛刊》、《教育汇刊》、《中等教育》、《心理》、《国语月刊》等教育类杂志；《诗》、《戏剧》等文学类杂志；《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学衡》等综合性杂志。这些杂志在教育、学术、文学等领域都有各自的一席之地。而中华书局在30年代创刊的杂志中，以《新中华》半月刊最为有名。《新中华》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约请薛暮桥、胡乔木、千家驹、于光远、李石岑、耿淡如、钱亦石、何思敬、郁达夫、巴金、丰子恺等名家撰稿，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与《东方杂志》、《申报月刊》齐名的三大综合性杂志之一。

第四节　大东书局的创办与发展

大东书局成立于1916年，当初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骏声等4人合资3万元，在上海福州路昼锦里口租了一间单开铺面作为门市部，并延聘编辑从事图书的编纂出版。大东书局的发展较为顺利，年营业额逐年上升。1921年为10余万元，1924年26万元，1925年36万元，1927年虽受罢工风潮的影响，经营状况仍有所进展，营业额突破50万元大关。1928年沈骏声任总经理，营业额增至63万元，1929年66万元，1930年79万元[1]。1931年正值其创办十五周年之际，又兼位于福州路山东路口的新屋落成，大东书局便在媒体上大肆宣传，邀约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蔡

【1】储品良辑录：《1916-1931年的大东书局》，《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下文史料未注明者，均援引于该文，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1]《申报》，1931年4月27日的《大东书局特刊》。

元培、蒋梦麟等20余位政要和文化名人题字留言[1]。这时的大东书局，俨然以大书局自居。

不过，考之当时的情况，事实也确是如此。1931年的大东书局，设有总厂、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和货栈五大机构，这样一种集编、印、发于一体的方式，走的正是当时大出版社综合经营的路子。当时大东书局有职员150余人，工人300余人，其规模虽不及商务、中华和世界，但也仅在它们之下，位居全国第四位。编译方面，当时大东的编译所下设教科、法制、国学、字典、英文、丛书、艺术、儿童等八个部，辖管《现代学生》、《学生文艺丛刊》、《科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新家庭》、《戏剧》、《现代女学生》等七大杂志社，以及东方舆地学社、法律函授学社等两个附设机构[2]。印刷方面，大东从1919年开始筹建印刷厂，以后厂屋多次迁移扩充，机器设备逐步完备。1931年更是合并上海别美彩色照相制版公司、龙飞印刷公司。这时的印刷厂已扩建成能铅印、胶印、照相制版、凹版印刷、彩色印刷、石印、珂罗版的全能厂，有大小印刷机30余台，每月用纸量达3 000余令。印刷所分工很细，有关事务方面的设有营业、管理、材料、校对等四个科；有关工务方面的设有铸字、排版、铅印、照相制版、雕刻版、电镀版、凹版印刷、凹凸版整理、彩色画石、彩色制版、胶版、石印、珂罗版、木工、装订等15个部。除印刷本版书刊外，还对外承印邮票、印花税票、有价证券、各类纸币等业务。发行方面，大东书局从当初福州路昼锦里口的一间单开铺面，到20世纪30年代初福州路望平街转角99号的总店，中间也是几经搬迁，数次扩充。总店由店长和副店长主持店务，其下设账房、门市、批发、邮售、承印、订书、进货、寄售、文书、存货等10个科，员工40余人，并设有文具部，销售文具、照相器材、无线电用品、电刻丝织礼品等诸多商品。分局方面，大东早在1922年，就在广州、汉口两地设立分局，至1931年，大东的发行网络已包括南京、沈阳、北平、天津、开封、广州、杭州、长沙、重庆、汉口、南昌、哈尔滨、成都、梧州、徐州、汕

[2]东方舆地学社创建于1925年，舆地专家洪懋熙担任社长，李长傅为编辑主任。法律函授学社创设于1931年，聘请法学名家20余人为教授，汪瀚章任社长，董康任教务主干，专门培养法律人才。

头等16个分局或特约分局，此外，非分局性质而订特约者，山东有济南东方书社，浙江有嘉兴嘉华书局，安徽有安庆大德堂，云南有东南书局等，同行往来，多达2 000余家，销货机构，遍布28行省，远至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国均有经售处所。

作为一个综合性出版机构，大东书局出书既多，范围亦广。据统计，大东书局自创立到1930年，共出版图书1 245种。其广告书目所开列的类别名称涉及到党义、哲学、文学、文字学、目录学、音韵、诗词、读本、文选、文法、文范、学生成绩、国学名著、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法令汇编、史地、地图、游览、自然科学、图画、音乐手工、摄影、医学、戏剧、跳舞、军事、劳工、儿童读物、民众读物、字典词典、应用文、尺牍、实业、碑帖、笔记等多个领域[1]。其中以丛书形式出版者，复有不少。举其要者有《社会科学提要丛书》、《社会科学基础丛书》、《社会科学丛书》、《市政丛书》、《地方行政实务丛书》、《党治训育丛书》、《党化小丛书》、《世界经济丛书》、《世界政治经济丛书》、《银行学会丛书》、《现代文化丛书》、《国民教育辅导丛书》、《青年指导丛书》、《青年模范丛书》、《儿童教育丛书》、《童子军丛书》、《法学丛书》、《现行基本法典丛刊》、《现行法典丛刊》、《百科常识问题丛书》、《边疆丛书》、《中国劳动政策丛书》、《国学门径丛书》、《新文学丛书》、《中央国学馆丛书》等。

[1]《申报》，1931年4月27日的《大东书局特刊》。

大东书局素来重视期刊的编印发行，早期有《游戏世界》、《半月》、《星期》、《紫罗兰》（图8）、《紫兰花片》等，20世纪30年代初则有《现代学生》、《学生文艺丛刊》、《科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新家庭》、《现代女学生》等。《游戏世界》、《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均为周瘦鹃主编，《星期》则为包天笑主编。周瘦鹃和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主将，杂志

图8
大东书局发行的《紫罗兰》杂志



销路自然不俗。大东书局后来将杂志上的作品结集成书，分门别类以侦探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武侠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理想小说、短篇名作汇编等名目号召读者，以广招徕。这些鸳鸯蝴蝶派书刊的出版，构成大东早期出版物的一大特色。

在大东出版物中，较为人关注的还有各种儿童读物，如《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儿童谜语》、《新剧本》、《新博物》、《新手工》之类，大东书局还常常登报征集学生文艺作品，请专家评点，并以“评点小学（中学）国文成绩精华”之名结集出版。另外，由于东方舆地学社和法律函授学社的关系，大东书局出版的地图地理和法律法规方面的书，也颇有特色。东方舆地学社编著的《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每年重版十余次，行销达10万册以上，出版的《袖珍中国地图》、《中华大地图》以及南京、杭州、上海各分区图等，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法律书刊中著名者有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法学杂志》、《法令周报》、《司法判例》等。

20世纪30年代初，大东书局开始涉足教科书出版领域，先行编写的是一套初中教材，1931年开始出版高中教材，1932年又出版一套“新生活小学教科书”，到1933年8月学生暑期开学前，大东已在报上公开宣称“小学中学大学各科用书全部出齐”[1]，以表明自己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实力。也正因为如此，大东书局在抗战时期成为国定本教科书“七联处”组织成员之一，享有8%的分配比例。

【1】《申报》，1933年8月21日广告。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由于沈骏声等人预感到战争变化的严重性，逐步将印刷设备、器材和物资分别运往江西、香港等地，因而当战争发生时，损失不仅较他家为小，在抗战大后方还具备了“人无我有”的优势，大东的赣州分厂、重庆分厂在印制钞票和证券业务方面大有发展，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1943年沈骏声积劳成疾在重庆去世，经协理周熙和奔走联系，陶百川和杜月笙最后接办了大东，陶与杜社会关系资源丰富，抗战

后期及抗战胜利复员回上海后，大东的业务居然有比较迅猛的发展，光是上海一地，职工人数已超出千人，发行网点不断扩大，承印邮票、钞票的新合同不断订立，继续参加“十一联”组织，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独家出版发行《司法判例》、《司法院解释要旨分类汇编》等法律书刊。尤为突出的是，以“日出一新书”为号召，大事宣传，并大量出版科技书和儿童读物。印刷厂印钞和印票证所获得的高额利润，支撑着战后几年大东的经济运转。1949年5月上海解放，翌年大东书局奉命停印纸币，大部分人员被裁，1955年初大东书局并入科技出版社，从此，大东书局之名不复在出版界存在[1]。

【1】孔繁柯：《大东书局印刷厂的前前后后》，《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第五节　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继续称雄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由夏瑞芳等7人合资创办，经过10多年的经营，民国建立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已称雄于书业界，并在以后的出版岁月里，把它全国第一大出版机构的身份，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民国建立前后，随着国人对日本等列强的反感，出版业竞争的加剧，商务印书馆自1903年开始的中日合资经营性质，便经常受到同行们的攻击，成为其发展的不利因素。比如1910年清学部所编中学教科书，因为商务印书馆存在日股就不让其承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亦因此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受阻[2]。民国初年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更是有针对性地打出“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鉴于这种情形，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初收回日股。

【2】1914年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关于收回日股给非常股东大会的报告。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27页。

商务印书馆自创业后至1949年，其发展可分为：创业阶段(1897—1902)、中日合资时期（1903—1914)、发展阶段(1914—1931)、复兴阶段（1932—1936)、抗战阶段（1937—1945)、衰退阶段（1946—1949)。本节主要涉及民国期间的后四个阶段。

1914—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阶段。1914年初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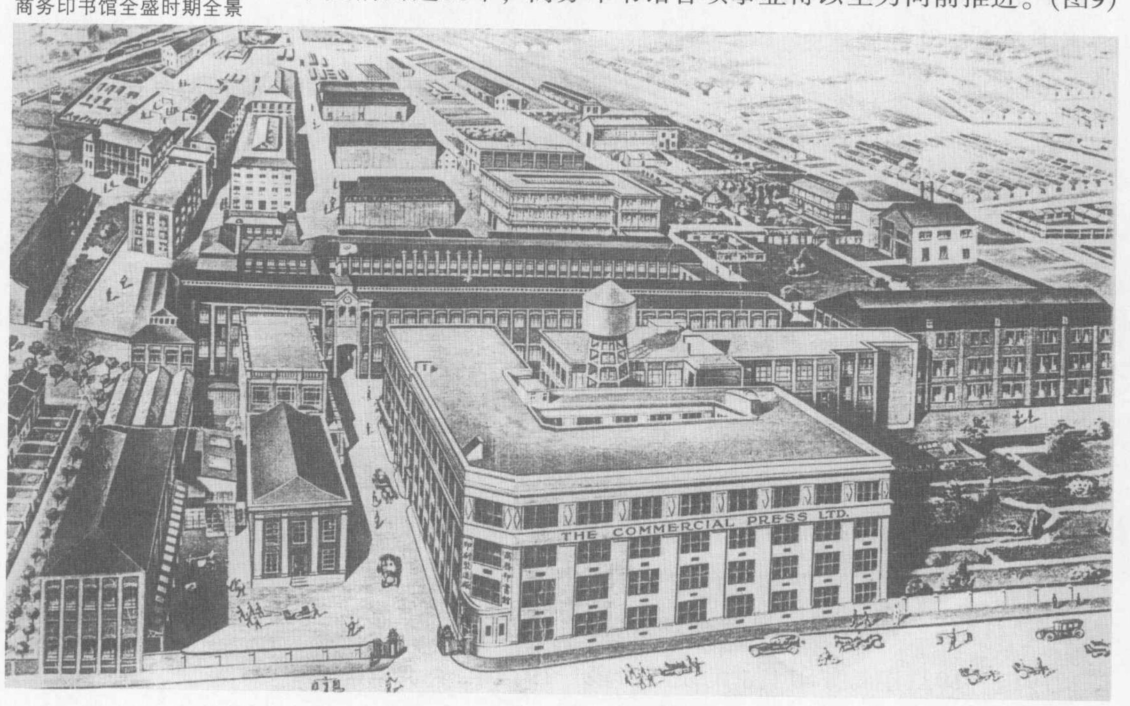
收回日股之后，于第二年成立总务处，作为统辖全公司的最高机构。1930年王云五任总经理后增设研究所，成为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的组织系统。到1931年，商务印书馆已有分厂两处（北京、香港），分支馆（分馆、支馆、支店）36处（含新加坡分馆一处），东方图书馆和尚公小学两个附属机构，上海各处职工约4 000多人（其中工人约3 500余人），各省分支馆局职工约1 000余人；1922年增资为500万元；营业额最大的年份是1930年，达到12 055 473元[1]。1914—1930年共出版图书6 682种，15 111册[2]（见表一）。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据王云五1937年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记载，为787册[3]。在出版等主业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制造文具、玩具、教育影片、幻灯片等，开设函授学社（1915年），设活动影戏部（1918年成立，1926年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独立经营）、办上海国语师范学校（1924年）等。在此一阶段，商务印书馆将属下的私立图书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对外开放。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的这18年，商务印书馆各项事业得以全力向前推进。(图9)

[1] 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原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转引自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325页，32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2] 据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14—1930年历年出版新书数字统计。

[3]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图9
商务印书馆全盛时期全景



1932—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复兴阶段。“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图10）、尚公学校（图11）等均遭巨劫，炸弹引起的大火燃烧了一天。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一时间全部化为灰烬。在这次事件中，商务印书馆一共损失1 600万元，遭受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然而十分难得的是，商务在劫难之后不改其志，从废墟中东山再起，重铸辉煌，用实际行动回敬了敌人，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经过半年紧张而艰苦的善后及筹备工作，商务印书馆在当年8月1日就宣布复业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成为激励全体职工振兴商务、服务民族文化事业的一句响亮口号。由于措施得力，上下合作奋进，商务的经营主干——出版业务迅速恢复并获得长

表一　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统计（1912—1930）[1]

年份	种数	册数	年份	种数	册数
1912	132	407	1922	289	687
1913	219	565	1923	667	2 454
1914	293	634	1924	540	911
1915	293	552	1925	553	1 049
1916	234	1 169	1926	595	1 210
1917	322	641	1927	297	535
1918	422	640	1928	456	544
1919	249	602	1929	451	724
1920	352	1 284	1930	439	703
1921	230	772[2]	总计	8 039	18 708

【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另，李泽彰为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册《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写作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也载有上述数据，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91~392页。李泽彰在文章中提到，上述历年出版物统计包括图书、杂志。

【2】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记载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物册数为772册，李泽彰提供的数据为773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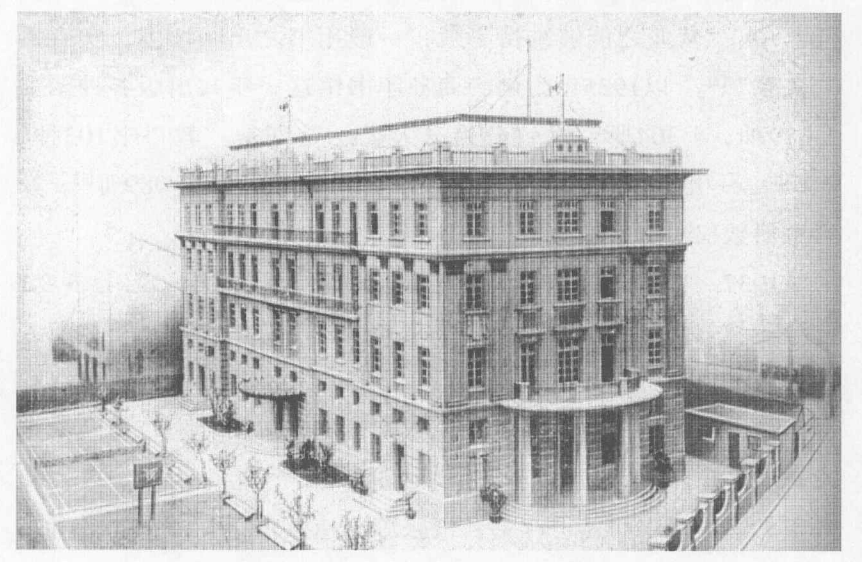


图 10
1924 年建造的东方图书馆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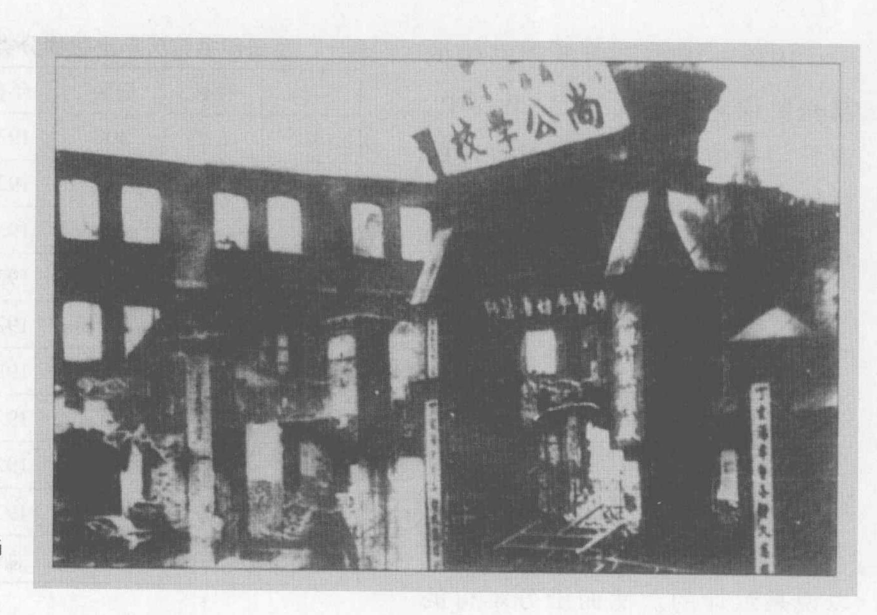


图 11
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

足发展，表现在1933年出书量大增，出书品种增多，超过了“一·二八”前任何一年份，并且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年年都有所增加（见表二）。资本额经过四年多的复兴，在没有加入新资本的情况下，在1936年恢复至500万元，实际资产也接近1932年被毁前，在1 800万至2 400万之间[1]。这一时期商务取得如此令人振奋的复兴业绩，也是其出书结构调整的结果。1936年3月，王云五向商务印书馆股东总会报告时总结说，商务印书馆在劫后的几年中，“营业之能够维持不败，一般用书之出版增多，实有重要关系”[2]。以1935年为例，商务印书馆这一年共出版各种图书1 689种，4 304册，大致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教科书103种，210册；一般用书781种，1 005册；预约书805种，3 089册[3]。教科书册数仅占本年度出版图书总册数的4.9%。

1937—1945年商务印书馆的抗战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导致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军于8月13日在上海登陆。商务印书馆较早地预料到战争的爆发，鉴于“一·二八”的惨痛教训，提早作了战时安排。1936年下半年就开始将总馆存书疏散到分馆及香港分厂，在长沙筹设小规模的印刷厂。“七七事变”后，商务印书馆加紧将机器、存书和纸张等迅速搬至租界中区的临时厂

【1】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前，资本额是500万元，实有资产，包括公积金和以折旧形式隐匿的，共2005万元。据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31~132页。

【2】同上。

【3】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召开上年度（1935年）股东常会，王云五在会上的报告。见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565页。

表二　商务印书馆1932—1936年出版新书数[1]

年　度	种　数	册　数
1932	52	61[2]
1933[3]	847	1 430
1934	1 283[4]	2 793[5]
1935[6]	1 689	4 304[7]
1936	缺	4 938[8]

房和仓库。在“八一三”沪战打响时，大部分财产已经转移。“八一三”之后，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版一度完全停顿，10月1日恢复出书，“日出新书一种”。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1937年底，商务印书馆将总管理处内迁至长沙，在上海、香港分设办事处。香港的工厂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成为商务印书馆重要的生产基地。商务印书馆本想将工作重心移到长沙，但是各方面进行得并不顺利，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更使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工厂损失惨重。为了保证战时出版物的供应，商务印书馆决定将生产基础化整为零，计划在重庆、昆明、桂林、赣县、西安各设一工厂，重庆工厂由长沙工厂迁至而设，其他各处只有赣县工厂成功地开设[9]。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香港全部陷入敌手，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香港两地的货栈及机器设备均遭日军劫持。当时总经理王云五正好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得知日军空袭香港后，王云五决定不按原计划返回香港，而留在重庆设立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渝办事处及编审处。因为总经理在重庆，他所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也就迁至重庆[10]，直到1946年迁回上海。这一段战争时期，因为一般图书的购买力下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又恢复为以教科书出版为主。1937—1941年的九年中，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书6 248种，9 142

【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十年来的的中国出版事业》，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依表,1932—1935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书3 871种,1932—1936年六年中共出版新书13 526册,后一项数据比《商务五十年》提供的该馆1931—1940年十年间共出版新书7 221册还要多,显然这两项统计是有出入的。《商务五十年》的出版物统计不包括大部丛书,也许这是它们有出入的原因。《商务五十年:一个出版家的成长及其发展》,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775页。

【2】王云五:《十年来的的中国出版事业》。

【3】本年数据参见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1933年度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34年4月)。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423页。

【4】参见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1934年度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35年3月31日)。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535页。

【5】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535页把这项数据误作1 793册,在564页作2 793册,又,王云五《十年来的的中国出版事业》中也把这项数据记作2 793册,我们又依据其他材料推断,2 793册应该是正确的。

【6】本年度数据参见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1935年度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36年3月)。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564页。

【7】王云五《十年来的的中国出版事业》把这项数据写作4 293册，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6页。

【8】王云五:《十年来的的中国出版事业》。

【9】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641页。

【10】据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抗战八年中,商务没有挂过“总管理处”的招牌。总经理所在地的办事处实际行使总管理处的职能。又汪家熔通过采访商务老员工黄用明得知：王云五就是总管理处。见该书140,142页。

[1]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57~158页。

[2]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5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84页。

册[1]，平均每年694种，1 016册。与战前20世纪30年代初的黄金时期相比，自然要逊色很多，这也与战时全国新出版物较战前减少的趋势相一致。

1946—1949年商务印书馆的衰退阶段。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回迁上海，开始复员工作。然而它面临的是比抗战时期更恶劣的情况。外因是内战爆发，人心动荡，通货膨胀，内因是商务印书馆在人事上的变动和纠葛。通货膨胀使一本新书印好之后定价便可能低于成本价以致蚀本。担任总经理16年之久的王云五因从政，于1946年5月辞职，之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为物色一位能干的总经理而犯难。年老多病的李宣龚曾代理总经理，朱经农也一度任总经理职，时间从1946年9月到1948年11月。之后，商务印书馆选中的继任者夏鹏，身在美国，无意应聘，于是1949年1月，又聘陈懋解为总经理。人事的频繁变动，使商务印书馆不能有效地实行复兴计划。1946年，商务印书馆仍然继承王云五在重庆时的办法，新书在重庆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没有出版新书。到1947年3月，商务印书馆才在上海出版新书，即《新中学生文库》。朱经农还参与主编出版了《新小学文库》、《国民教育文库》。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由于经营上不得法，加上通货膨胀，1948年2月李拔可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提到：商务印书馆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2]。朱经农的经营管理才能没有得到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足够的信任，他们另组了由张元济等五人组成的董事会议，职权在总经理之上，这导致了朱经农的辞职。朱经农辞职后，商务印书馆陷于内外不利的境地，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对时局的迷茫使之在出版上采取等待观望态度，不再出版新书，《东方杂志》等期刊都宣布停刊[3]。与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的二三十年代相比，商务印书馆在战后的几年日益衰落。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1951年商务印书馆将编审部迁往北京。

在整个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堪称中国规模最大、出书最多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它在出版的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比如先进印刷术的引进与改革，领导出版业潮流的选题等。它通过数量庞大、种类齐备的出版物（见表三），在促进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传播、西学的引进、古籍的流传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文有专门论述)。

表三　商务印书馆 1902—1950 年 6 月出版物分类统计表[1]

类别	种数	册数
总类	1 197	3 437
哲学	728	910
宗教	314	964
社会科学	4 535	8 139
语言学	656	1 168
自然科学	1 299	1 442
应用技术	1 351	1 493
艺术	915	1 467
文学	2 576	5 878
史地	1 545	3 160
总计	15 116	28 058

【1】《商务五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编印，1950年。转引自王余光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二章　民国出版业的发展

（1919—1927）

第一节　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府对言论强力控制。袁世凯倒台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忙于应付内战，无力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给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外部条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适时而起（图12、图13），借助于出版与传播的力量，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战鼓。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就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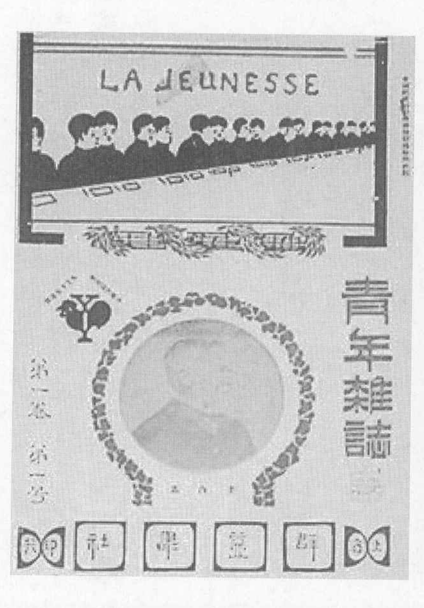




图12(左)
《青年杂志》创刊号

图13(右)
《新青年》

《新青年》也随之迁入北大。杂志从社会进入高等学府，北大又居全国学界执牛耳的地位，使得《新青年》传播的新思想很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出版物在鼓荡新思潮日益澎湃的同时，也反过来哺育了出版业自身的创新式发展。新出版与新文化的互为推动，在五四时期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出版物数量的激增，出版物内容的革新，出版物形式的变化，出版机构的崛起与调整，都是新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下的结果。

在五四前夕的民初出版物市场上，除了大书局竞相出版的大宗教科书和大型工具书外，通俗小说的出版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到了五四以后，新思想新学术的书刊开始大量涌现，其中杂志的风头最健。关于杂志，我们在后文中会专门论述，兹不赘。在图书出版方面，虽未能有精确的数量统计，但出版增长的势态是明显的。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书132种407册，1915年出书239种552册，1919年为249种602册，1920年则达到352种1 284册，册数增长了一倍[1]。1918年到1920年间，从国外进口的纸张数量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2]，而这些洋纸，主要用途是出版部门的书刊生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时期出版物增长的快速度。

五四时期出版上的冲动，也是市场新需求直接拉动的结果。远在杭州的施存统来信透出了若干信息："敝校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的人也有三分之一。"[3] 如此情状，刺激了出版家对反映新思想、新学说、新内容书刊出版的巨大热情。作为出版物大宗的中小学教科书，改成了与新文学运动要求相一致的白话文，这一做法，半是由于教育部的硬性规定，半是出自出版者的出版自觉；因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套白话文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早在教育部通令采用语体文编辑以前即已着手筹备[4]。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的语体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其情况也大致类似。在出

【1】据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历年出版新书的数字统计得出。

【2】李泽彰：《三十五年中国之出版业》，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390页。

【3】《〈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卷1号，1919年。

【4】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65页。

版物结构上，商务和中华两家最大的书局，从原来注重教学图书转向并重一般图书，并着力于学术名著的出版。商务印书馆除了编印学术性强的《共学社丛书》外，还分请专家执笔，编写了各科入门的小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满足了新文化运动中新学生的需要。而1920年前后中华书局编印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新文化丛书》等，考其内容，皆属于新思潮新学术范畴，在当时颇受人们瞩目。杂志的出版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面貌崭新的杂志不断创刊，另一方面，一些老牌杂志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在外界舆论压力和新市场需求形势下，改换了主编，调整了版面，革新了内容。尤其是《小说月报》，自沈雁冰接手进行全面改革后，从原来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一变成为国内新文学作品的大本营，最能显示出时代潮流所发生的转折，以及出版者对之的自觉追随与适应。正是这种适应与追随，在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果，也在有形中给予出版者丰厚的商业回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1921年底即印行了三版，一年多的时间就销售了七千多册[1]。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中，如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击期的化石》等，皆可列入当时的畅销书之列。《小说月报》改版后不久，印数持续地增长。这些事实，均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在时代变革前提下出版革新的必要性。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新思潮带来的出版机遇，首先被一些善于审时度势的中小出版社所率先利用。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群益书社、新潮社、北新书局等都是这个变革时代新式书刊出版的排头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业中的所谓“新书业”之称，就是由上述这些中小出版社开其端绪。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新书业”阵营又

陆续加入了开明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局、新月书店、真美善书店、创造社出版部、卿云图书公司、良友图书公司、太平洋书店、群众图书公司、金屋书店、嘤嘤书屋、新宇宙书店、乐群书店、第一线书店、复旦书店、春潮书店、远东图书公司等新成员[1]，使得五四时期由北新、亚东等所开创的新出版群体，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出版力量。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即便作风稳健持重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不可避免地要被裹挟进去。为了适应出版新书刊的需要，老牌出版社在用人方面进行了调整。商务印书馆的两大元老张元济和高梦旦曾数次北上求贤，有意邀请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来商务职掌编译所。1921年夏秋间，胡适南下商务作了一个半月的考察，对商务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浓厚了商务改革的风气[2]。胡适虽然最终未能留在商务任职，但他引荐的王云五却给后来的商务带来了新的气象。1922年，加盟商务并任所长的王云五大胆地改组编译所，新辟了百科全书委员会等部门，新聘专家主持编译所各部。当时罗致的大学者有：朱经农、竺藕舫、段抚群、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秉农山、任叔永、周鲠生、陶孟和等人。到1924年，章锡琛依据该年《编译所职员录》统计，这时，“除兼职人员外，达240人之多，勤务员还不在内。其中1921年9月（王云五进所）后新进的共196人，许多资格最老的编辑被淘汰”，新旧知识分子完成了交替[3]。商务编译所经过上述改组，可谓是人才济济，奠定了此后学术出版的基础。另一大书局中华书局也大力引进新人，在1920年以后的两三年间，中华书局编辑所新添的人员名单中有陆衣言、黎锦晖、李达、黎明、王人路、吴翰云、金兆梓、朱文叔、田汉等人[4]。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华书局的主要编辑骨干，在新式教科书、儿童读物以及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928年12月5日，新书业在上海成立新书业公会，12月7日的《申报》上披露了成立通告，并公布了会员名单。新书业公会后来没有被官方批准。

【2】王建辉：《五四和新出版》，《王建辉自选集》，326页，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李辉：《激动文化潮流——新文化运动中商务印书馆的改革》，《中国出版》1998年第4期。

【4】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48~62页。

第二节 《新青年》与五四前后的报刊

出版物作为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其荡涤人心、启民于暗昧的功能为清末以来众多见识超卓的知识分子所深谙。著名者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都擅用书报刊来发表主张、鼓吹革新。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集中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版物在承担启蒙与救亡等重要历史使命之际的文化自觉和重要作用。

一、《新青年》

《新青年》是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期刊。它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到1926年7月25日终刊，历时10年，共出版63期。十年中的《新青年》不断有所发展变化，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5年创办到1916年2月停刊。191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面对国内军阀独裁，"中华民国"空有其名的现实，深切地认识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新青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办起来的，杂志起先名为《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印刷发行。创刊号上，主编陈独秀即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地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树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思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思想、"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思想、"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思想、"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思想，并提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刊物创办之初，虽然也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但影响不大，发行量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不过印一千份，销量不多。

第二阶段是从1916年9月复刊到1920年夏。这一阶段，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淆，刊物正式

更名为《新青年》，仍为月刊。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遂迁至北京。同年8月停刊。1918年1月复刊。从1919年出版的第6卷起，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分期轮流担任主编，鲁迅也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此阶段的《新青年》，设有“政治·思想”、“历史”、“文学”、“戏剧”、“小说”、“诗”、“读书笔记”、“社会问题”、“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读者论坛”、“通讯”、“世界说苑”等栏目，特别是第4卷第4号增辟的“随感录”专栏，为《新青年》所首创，后来仿效者甚多。“要目”在封面上刊出，十分醒目。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销量渐增，最多达一万五六千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尊孔与复辟》等文，李大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鲁迅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吴虞发表了《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封建守旧派的责难，陈独秀便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宣称：“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这个来势迅猛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樊笼，起了启蒙作用，唤醒青年与妇女开始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追求新的思想和新的道路。

第二，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对封建主义文学展开批判，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主张，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易卜生主义》、《文学革命论》等文论，鲁迅的《狂人日

[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记》、《孔乙己》等新小说，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新诗，鲁迅、陈独秀、刘半农等人的杂文，和译介的屠格涅夫、莫泊桑、易卜生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迈开了建设现代文学的新步伐。《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掀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一页，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青年》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期起，全部改用白话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在期刊发展史上亦具有革新意义，影响十分深远。此后白话文学开始成为文学的主流，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的期刊日趋增多。

第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对民主、科学的张扬，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唤醒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为西方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出版的第5卷第5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到来。此后，《新青年》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对于促进中国的文化革命并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革命，具有重大意义[1]。

第三阶段是从1920年9月到终刊。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出版，引起了胡适的不满，1919年10月5日在其寓所召开编辑部会议，讨论停止轮流编辑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自第7卷第1号起，由出狱以后的陈独秀一人编辑。在该期杂志上发表有陈独秀执笔的《本志宣言》，主张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920年5月第7卷第6号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更加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同年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之《新青年》编辑部也于9月第8卷第1期起，正式迁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也是从这一期开始，杂志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并为此

【1】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125~127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组织了新青年社办理出版发行事务。新增撰稿人有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震瀛等，而北京的社员除周氏兄弟外，写稿的日益减少。从这一时期的文章内容看，刊物的政治性明显加强。杂志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介绍新兴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还增加了对国内外工人阶级状况的介绍。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主编瞿秋白，陈望道也参加了编辑工作，由广州平民书社出版。季刊出四期以后休刊。1925年4月始《新青年》改为月刊，编号另起。出五期以后，杂志于1926年7月停刊。到停刊前，《新青年》编辑发行了“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和“世界革命号”等专刊，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状况、世界和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明确提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指挥者不可”的观点，并对为什么和怎样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新青年》作为一种出版物，对于中国近代民众思想乃至社会进程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因而是一个划时代的刊物。杂志创办时，正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新青年》的问世，“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1]，并触发了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印证了出版在唤起民众觉醒、促进文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1]《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二、其他重要报刊

五四期间思想、学术极为活跃，当时社团林立、出版繁荣的景象即是证明。以1919年和1920年两年为例，分别有139种和173种期刊创立，平均每两三天即有新刊问世。其中《新青年》之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还有很多。以期刊来说，影响最大的有《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教

育》、《建设》、《湘江评论》、《解放与改造》、《国民》、《星期评论》、《太平洋》等11种。加上《晨报》及其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等，声势非常浩大。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体现在这些出版物中。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每周评论》(周刊)，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是密切结合政治斗争形势的革命刊物。每期出4开4版1张。初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第26期起，因陈独秀被捕，改由李大钊、胡适主编；一个月后，由胡适主编。撰稿人除此3人外，还有周作人、张申府、罗家伦、高一涵等。《新青年》早期曾称“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1]，表明不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立场；而刊期的限制也使它并不适合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出直接、及时的反应。《每周评论》这一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刊的创办，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者专注于启蒙、不谈政治的缺憾。杂志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辟有“国外大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等栏目，还出版“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特别附录。该刊结合国内外现实，大力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和专制政治，注重反映国内劳工问题，广泛报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五四运动中，连续以全部篇幅报道与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由胡适主编后，删削政治时事内容，大量登载杜威讲演录与罗素的著作。第31期上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8月30日出至第37期被北洋政府查禁。

《新潮》(月刊)，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起因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认为《新青年》“鼓舞人心，于是也想学着《新青年》，办一个刊物”[2]。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先后任主任编辑，杂志出至1922年3月第3卷第2期终刊。《新潮》在五四运动前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鼓吹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后受胡

【1】陈独秀:《通信》,载《新青年》1915年第11卷1号。

【2】《五四运动回忆录（续)》,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适的影响，发表有关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文章。

《晨报》及其副刊。《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创刊于北京，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创刊时的编辑主任为李大钊，其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号召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因政见不合，李大钊曾一度离开该报，直到它改良后才重新参加其副刊的编辑工作。《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也介绍了不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少文章被其他报刊转载。1920年至1921年间，《晨报》及其副刊也曾大量刊登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录、著作，以及许多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1921年10月12日，原来的副刊扩版并正式题名《晨报副镌》，大量译载近代世界文学名著，对发展中国的新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6月3日，《晨报》宣告停刊。

《少年中国》(月刊)，1919年 7月15日创刊于北京，是五四运动时期政治学术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原为竖排，自第4卷第1期起改为横排。第5期起改在上海印刷发行。李大钊、王光祈、黄演存先后任编辑主任。1921年编辑部迁上海后，由左舜生主持编辑工作。因会员分散，经常采用按地区分组轮流编辑的方法。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恽代英、张闻天、左舜生、曾琦、李璜等。刊物主张"本科学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以文化教育界和高等学校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着重刊登自然科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文章。期发行量5 000份左右。1921年后，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渐多，会员思想出现分歧，遂于1924年5月出至第4卷第12期停刊。少年中国学会还主办了《少年世界》(月刊) 和《星期日》(周刊) 等刊物。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1919年 9月创刊于北京，北平新学会出版。主编张东荪、俞颂华。从1920年9月第3卷起，改名《改造》，由梁启超任主编。刊物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便社会革新。栏目有"社论"、"评坛"、"思潮"、"世界观"、"社会实况"、"译

述”、“文艺”和“杂载附录”等。1922年9月出至第4卷第10期停刊。

《湘江评论》(周刊)，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刊物。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第1期为8开1张；第2期至第4期均为4开4版。第2期曾出版“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该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倡民众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但也宣传了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第2—4期连续发表，成都、北京、上海等地报刊曾予转载。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评述”、“湘江大事评述”、“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采用白话文。每期发行约5 000份。第5期未及发行即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建设》(月刊)，五四运动时期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主办的大型理论刊物。由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主编。1919年8月1日创刊于上海。杂志初时销量为3 000份，后陆续增加直至13 000份。孙中山撰发刊词，提出办刊宗旨是“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胡汉民、汪兆铭(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传贤(戴季陶)为建设社社员和刊物主笔，设有“论说”、“记事”、“通信”、“杂录”等栏目，以“论说”为主。其中的文章多采用白话文。曾刊载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译)等文。《建设》由亚东图书馆出版，最后一期为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1期。

《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该报原名《时事报》，创刊

于1907年12月5日，1909年与上海《舆论日报》合并，改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5日扩充版面并改名为《时事新报》。其副刊《学灯》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并称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享有盛名。它标榜宣传新文化，但对新旧文化的斗争采取回避态度；它以文化教育为主，标榜不谈政治，但后期也发表了不少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地方性的刊物。如恽代英、黄负生等人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言论刊物《学生周刊》；浙江省的《教育潮》(月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周刊)；江西的《南昌学生联合会周刊》；山东的《泺源新刊》(三日刊)；广东的《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广西的《救国晨报》；四川的《星期日》(周刊)、《半月》；云南的《尚志》(月刊)、《滇潮》(月刊)；陕西的《秦钟》(月刊)；甘肃的《新陇》；安徽的《新安徽》、《安徽教育》等等。

第三节　世界书局的改组与发展

上海世界书局成立于1917年，创办人沈知方。1921年，沈知方得友人之助，筹得股金2.5万元，将世界书局从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局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并在怀远里口租下一门面作为发行所。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特将发行所房屋漆成夸张的红色，对外以"红屋"称名。"红屋"以后的世界书局，果然经营得红红火火，很快跃居为全国第三大书局。

1931年，世界书局迎来了组建公司后的第一个十年，为了庆祝和纪念，特发行《世界杂志增刊（十年)》以志其功，其中《十年来的世界书局》一文，专对书局十年经营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数据详明，线索清晰，可资比较。为了便于参看，我们且把其转成数据表格形式（见下表)。

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年营业情况一览表

年代	出版物种数[1]	资本总额	营业额
1921	200 余种	2.5 万	13 万余元
1922	约 300 种	3 万元	28 万余元
1923		6.3 万	45 万余元
1924	600 余种	12.6 万	74 万余元
1925	800 余种	50 万元	99 万余元
1926	980 余种	64.97 万	71 万余元
1927	1 000 余种	66.64 万	68 万余元
1928—1929.6	1 200 余种		179 万余元
1929.7—1930.6			152 万余元
1930.7—1931.6	2 000 种以上	近 100 万元	200 余万元

【1】表格中列出的各年度出版物数量，应是累加后的数字，并非各分年出书的数量。

前十年的世界书局由沈知方总揽全局，发展极为迅速。而到了1934年前后，沈因投资房地产失利，兼之出版物销路日狭，教科书课程标准变更导致存货积压，局内用人又多，开支大，内虚外露，世界书局办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致使经济周转不灵，最后虽经吴蕴斋、钱新之等斡旋后引入李石曾的世界社资本[2]，帮助世界书局渡过了难关，但沈知方也被迫退居二线，总经理一职改由陆高谊接任[3]。

陆高谊掌管世界书局，从1934年8月到1945年9月，前后共11年时间。这11年中有8年全民族抗战，这期间，陆高谊带领的世界书局，可谓是艰辛备尝。虹口大连路的印刷总厂先是被日军占领，改为军营，后被日伪的华中印书局占用。厂内库存的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入造纸厂回炉化浆，影印的许多经史子集国学名著、文学名著，如《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说文通训定声》、《资治通鉴》、《史记》、《三国志》、《文选》、《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被劫走，锌铜版被毁，损失惨重。由于书局拒不与日伪合作，1938年8月，在福州路的发行所便发生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职员一死一伤。即便如此，世界书局依然表

【2】当时李石曾用世界社预备投资代表团的名义，与世界书局订立了投资50万元的合同，但前期只投入5万元，并提出占有董事、监察半数席位，以及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改由陆高谊担任的要求。剩下的45万元，世界社最终未投入。世界社后来仅派驻一名会计人员监督书局财务收支状况。

【3】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不为敌所诱，坚持出书。据统计，陆高谊期间的世界书局总共出书2 095种[1]。八年战争不寻常，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1] 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世界社李石曾为出版《世界学典》，于1946年到上海，开始接收世界书局，并扩充股额，招收新股，改选董、监事，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李石曾为常务董事代理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杨家骆为常务董事，李清悚为监事，李鸿球为副总经理，实际总管书局经营[2]。李石曾任总经理的四年间，国内战事不已，书局出书不多，总计才292种[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1949年8月6日世界书局因涉及官僚资本，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军管，1950年2月开始办理结束事宜。

[2] 李清悚：《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与世界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3] 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作为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全国第三大出版机构，世界书局在组织结构、经营管理与出书范围等方面，都对前两家有所模仿和继承。比如，股份制的企业组织，一处三所（总管理处及编辑所、印刷厂、上海发行所）的机构模式，集编印发于一身的出版格局，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营思路，以及出版范围广的综合性风格等等，三家均不无相似之处。但世界书局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前两三年，曾设有信托部，专为顾客代购各种物品；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世界书局又设有读书储蓄部，吸收社会游资达一百数十万元，进而于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了专为书局融资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后来世界书局利用这些存款，购买了好几处房屋地皮不动产，成立专门的房地产部，做房地产投机生意[4]。世界书局的上述部门，因业务内容与出版不大关联，而在同业中显得相当特别[5]。

[4] 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5]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3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

就出版物整体内容而言，世界书局也比商务、中华要显得商业化，特别是沈知方主持期间，沈的书业学徒背景和敏锐市场嗅觉，使得世界书局的出版物选题，十分注意走大众化道路。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头，世界书局或是将旧说部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特约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程小青等

名流作家，进行创作和翻译，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世界书局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图14)、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图15)、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和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





图 14(左)
《红杂志》

图 15(右)
《红玫瑰》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学习，一时酿成社会风气，世界书局迎合时代潮流，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受到学生界的极大欢迎。而到了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世界书局揣摩时局走势，特叮嘱它位于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然后以广州世界书局、广州共和书局等名义出版发行。当北伐战争在南方各省风起云涌时，世界书局棋先一着，大胆出版的这些革命小册子，也如影随形，在金钱上饱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科学观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世界书局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在丛书发刊旨趣中，徐渭南这样写道："西文ABC一语的解释，就是各种学术的阶梯和纲领。……我们现在刊行这部ABC丛书有两种目的：第一，正如西洋ABC书籍一样，就是我们要把各种学术通俗起来，普遍起来，使人人都有获得各种学术的机会，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种学术的门径。……第二，我们要使中学生大学生得到一部有系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或参考书。……这部ABC丛书，每册都写得非常浅显而且有味，青年们看时，绝不会感到一点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启发他们的知识欲，并且可以使他们于极经济的时间内收到很大的效果。"[1] 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而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这正是19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书领域的世界书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当所有教科书出版者，为了建立自己的好形象，无不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读者号召时，世界书局自也不能例外。它后来出版的许多学术文化性书刊，均是其有意调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结果。那些通俗性小说之类，世界书局虽还在继续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出版，世界书局只是名义上居于经销地位，以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2]。

据朱联保先生统计，世界书局29年时间里一共出书5 580种。这5 500余种出版物中，固然有追逐商业利益而昙花一现的市场垃圾，但也有许多产生影响而载入史册的文化精品。即便是它早期印制的那些通俗性书刊，也不能好歹不分地一棍子打死，一些艺术性较强如张恨水、程小青等人的作品，至今还有出版社在继续重印，说明它们依然有穿越时空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在世界书

[1] 该丛书发刊旨趣刊载于各子书的首页。

[2]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41 页。

局发展的中后期，更是以商务、中华为竞争对象，力争上游，在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儿童读物、哲学社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主要出版领域，均有不凡的文化建树，值得后人追述。在书业经营上，世界书局以其锐意进取的姿态，大胆有为的作风和极具商业化的运作，把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出版者们，依然有所启发。

第四节　亚东图书馆与泰东图书局

一、亚东图书馆

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除了多数以书局、书店、印书馆等命名外，也有一些取名为“图书馆”的，如交通图书馆、梁溪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等。其中以亚东图书馆的名气最响、影响也最大。亚东图书馆成立于1913年，创办者汪孟邹，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之前，曾在安徽芜湖经营一家以贩卖新书为主的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白话刊物——《安徽俗话报》，便是由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的。辛亥革命以后，汪孟邹在好友陈独秀的鼓动与促成之下，在上海福建路（四马路）惠福里租下房屋，挂起亚东图书馆的招牌[1]，正式开始了他近40年的出版生涯。

亚东的名字被人所广泛知晓，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9年以前的亚东图书馆，6年时间才出了6本书，而且还多是些读者面比较狭窄的地图册之类。为了贴补出版上的亏空，汪孟邹甚至一度做过杂粮生意[2]。亚东草创阶段的艰难，可想而知。1915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改归亚东图书馆发行。由于《甲寅》敢于抨击时政，“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3]，出版后一纸风行，使得代为发行的亚东图书馆，多少在名气上附上了骥尾。1917年，陈独秀北上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得益于他

【1】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出版史料》1988年第3、4合期。

【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3】《甲寅》各期内封启示。

的大力推荐，亚东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由此开始，亚东的经营出现了转机，用汪孟邹自己的话说，“出版才上了路”[1]。一方面，亚东经理销售北大出版部书籍，进而代派代售《新青年》、《科学》等30余种期刊，代印《新潮》、《少年中国》、《建设》等七种期刊，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完成了最基本的出版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亚东在代派代印新书刊的过程中，切身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风云变幻，适时地调整了出书方向，出版了许多与五四运动主旋律同声应和的出版物，成为出版界的一匹“黑马”。1919年，亚东把店堂从原来逼仄的弄堂，搬到了棋盘街西首的大马路上。就在这装饰一新的店堂里，亚东迎来了它书业经营的黄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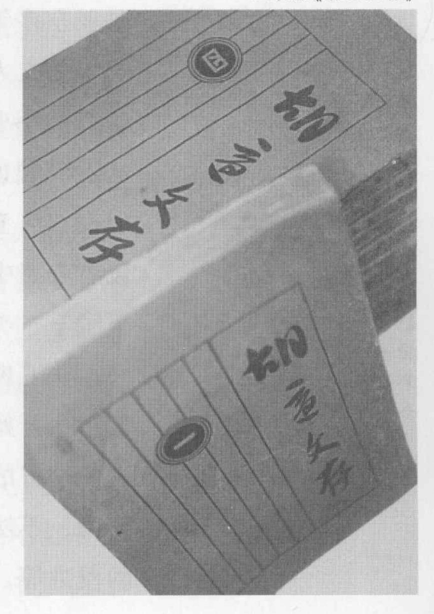
从1919年起，亚东年出书的品种数量逐渐多了起来，1920年4种，1921年7种，1922年8种，1923年7种，年营业额也随之逐年攀升，到1928年达到了亚东历史上的最高值，为79 690余元[2]。这十年，既是亚东经营最为蓬勃兴旺的十年，也是亚东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贡献最大的十年。特别是1919年至1922年间，在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年代，亚东率先出版的新诗集、白话文存（图16）以及标点旧小说等，可视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个出版者对时代潮流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的表现。在新诗出版方面，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俞平伯的《冬夜》等，均是我国新诗史上的早期代表作；在文存文集出版方面，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存》，被青年人奉为“白话文的模范，新知识的渊泉”[3]；在翻印白话小说方面，亚东对《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分段，是我国新式标点用于古籍整理的第一次，对当时标点符号的普及和国语教育的推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三类作品的及时出版，因为顺应时代潮流而被大批读者所捧读，印

[1]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

[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230页。

[3] 《水浒续集》再版附页广告，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

图16
亚东版《胡适文存》



量之大，销路之广，一直是亚东多年的扛鼎之作。亚东凭借这些著作的印行，在竞争激烈的上海书业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亚东在五四时期的崛起，固然得益于它对时代机遇的准确把握和及时调整，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亚东在出版上的成功，也与它大力借用名人资源大有关系。新文化运动中最为著名的风云人物——胡适和陈独秀，都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有着极为密切的个人情谊。陈独秀是汪孟邹多年相知的老朋友，胡适则是汪孟邹正经八百的绩溪小同乡。胡和陈在亚东的书业经营过程中，从提供自家作品，帮助作序考证，联系组织书稿，乃至筹划具体经营等，都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1]。背靠大树好乘凉。亚东有了他们的号召和帮助，自然有了他家同行难以企及的优势，发展起来，当然要顺畅得多。

五四时期的亚东图书馆，虽然在出版选题上，引领时代前进的潮流，而出版作风上，却不见有半点的浮躁与马虎。亚东图书校对谨严，错别字少，是当时出版界公认的事实。胡适在亚东出版的作品或文集的自序中，多次对亚东编辑汪原放、章希吕、汪乃刚、余昌之等人的精细作风表示感激。标点本古典白话小说，是亚东多年的拳头产品，其校勘之仔细，标点之认真，既被鲁迅这样的文人学者所赞赏，写信叮嘱他人指定代购[2]；也被张静庐这样的书业同行所折服，在文章中誉称为“铅粒的亚东版”[3]。汪孟邹曾说过：“我们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4] 正是他这份对出版物品质的较真劲，为当时的亚东，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为后来的亚东，在出版文化史上留下了千古美名。

在五四时期兴盛起来的亚东图书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也开始走向衰落。1928年以后，时代潮流的转向，使亚东失去了往日的出版优势，而种种于亚东不利的因素又接踵而至，比如说，不法书商盗版的损失，国民党禁书的打击，“一折八扣制”的侵蚀等。这些因素都是一个出版者非人力所能为的。虽然从年

【1】参见王余光、吴永贵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第二章第五节。

【2】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103页，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4】汪孟邹：《我与新书业——答萧聪先生》，《出版界》第46期，《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

出书种类上说，亚东在抗战前的30年代并不比20年代少，但销量上已大不如从前，从而注定了衰落的结局。亚东在衰微时期，除减裁人员，缩减房屋，敷衍度日外，几次准备招股改为公司，以图复兴。1934年，由胡适出面，介绍亚东与王云五商谈，想请商务印书馆投资数万元，改组为股份公司，未能实现。40年代中后期，汪孟邹又动议招股，连章程也已经印好，终未果[1]。亚东一直是个独资经营的中小出版企业。1952年，上海书业整顿，亚东因以前出版过托派书籍，牵扯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于1953年2月13日，被上海军管会宣布歇业[2]，从而结束了它40年的书业经营史。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77~181页。

【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213页。

二、泰东图书局

在五四时期的上海中小书局中，与亚东图书馆同样知名的还有泰东图书局。泰东图书局成立于辛亥革命以后的1914年，起初是政学系的出版机关，其股东既与政学系多有关系，出版的计划自然亦注重政治方面的内容。讨袁之役胜利以后，泰东的股东们都到北京做官去了，无形中将这家店铺交给了经理赵南公，任由他一手包办[3]。民国初期，鸳鸯蝴蝶派小说正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赵南公也跟着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消遣作品，如江山渊的《芙蓉泪》、李警众的《胆汁录》、陈伯熙编的《海铁事大观》、向恺然的《拳术见闻录》等。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泰东及时出版了杨尘因写的长达100回、70多万字的“洪宪演义”——《新华春梦记》。该书因选题契合时代，内容实录存真，宣传又大张旗鼓而畅销一时。尽管这本书替泰东赚了一笔钱，但赵南公并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敏锐地感觉到，鸳鸯蝴蝶派小说已到了回光返照的时代，于是“决定放弃过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4]。

【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91~92页。

【4】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92页。

为了这个“理想的新泰东”，赵南公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因为泰东出版上的新起炉灶，使得它原有的发行路线不复发生作用，以前为卖书而给各地书店铺设的“账底”，由于双方不

再有贸易往来而失效，而新书的发行，又必须重新“打桩”。旧的“账底”收不回来，新的“账底”又必须放出去，久在书业的赵南公，对这一抉择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自然心中有数，但正是他当初毅然决然的“舍”，才有了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得”。

1919年新文化运动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泰东也在出版上作好了趟新路的准备。从1920年至1921年初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泰东图书局编辑了两个杂志——《新的小说》和《新人》，承担了《民铎》、《评论之评论》、《家庭研究》、《国民》等期刊的发行，开发了《新人丛书》、《新潮丛书》、《小本小说》三个系列的图书选题，出版了胡怀琛编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陶乐勤译的《政治经济学》，邵飘萍著的《失业者问题》，邹敬芳译的《劳动总同盟研究》，蔡晓舟著的《国语组织法》，覃寿公译述的《近世社会学》以及杜威的三个演讲集《教育哲学》、《哲学史》和《实验论理学》等单本图书。泰东出版的这些书刊，均属于“新潮”范围；而当时出版界，“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艳情小说和黑幕大观”[1]。敢于或者说乐于出版这些“新潮”书的，只有亚东图书馆、群益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家。泰东能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棋先一着，除旧布新，确实体现了经营者赵南公不凡的胆识和勇气。

初趟新潮的泰东，似乎没有它的新锐同伴亚东图书馆那样幸运。亚东图书馆一开始就出版了大名人胡适的译著，一炮打响。相对来说，1920年泰东出版的那些新书刊，学术味较浓，销路并不理想。1921年2月至4月，赵南公准备改组泰东编辑部，并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改革计划[2]：“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同时打算介入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他请来了湖南人李凤亭，并聘请了李凤亭推荐的尚在日本留学的成仿吾。1921年4月，成仿吾抵达上海，与成仿吾同行的还有不请自来的郭沫若。成、郭二人原本是为他们的同人刊物寻找出版单位而来，

【1】萧聪：《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出版界》第44期，《大公报》1947年8月10日。

【2】陈福康：《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1辑，1990年。

恰好急需用人的泰东图书局，给了他们一个接触出版界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被泰东收留的郭沫若，在1921年4月3日至5月27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湖梦》，标点了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这三本书都称得上是出手不凡。仅一年时间里，《女神》便印了3版，《茵湖梦》印了6版，《西厢记》也印了3版[1]。郭沫若富有成效的的出色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首肯，同意为创造社出版同人刊物。这对当时的创造社同人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收获。创造社当初酝酿时，同人们为寻找刊物的出版合作者，可谓是费尽了周折，“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是不肯印的”[2]。就在他们感到山穷水复之际，泰东的慨然应允，给了他们新生的机会。难怪郭沫若称泰东为“创造社的摇篮”，并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不无感激地写道：“当时我也暗暗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像那时还未成型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3] 刊物找到了婆家，社团便有了基础。1921年6月8日，五四新文学时期最为著名的社团之一——创造社宣告成立了。

【1】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97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92页。

从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至《创造周报》1924年5月9日停刊，前期创造社的活动时间近3年。这3年的“创造”历程是与泰东图书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3年时间里，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社书刊主要有：

《创造》季刊 共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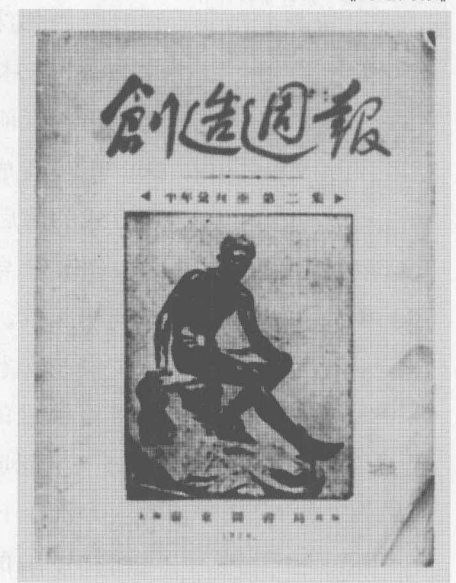
《创造周报》共52期（图17）

《创造社丛书》共9种

《世界名家小说》共6种

《世界少年文学选集》共6种

图17
《创造周报》



《辛夷小丛书》共4种[1]

前期创造社的全部实绩都凝聚在这份书单里。就是凭借这些书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实现了“异军苍头突起”，掀起了中国新文学界旋转翻腾的波涛。也就是凭借这些书刊，泰东图书局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原来的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这几年，正是泰东书业经营史上，最为生机勃勃，最为辉煌耀眼的几年。出版与文学，出版与社团，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因出版而兴盛，出版借文学而繁荣。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提供了一个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的典型范例。

虽说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合作，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两个机构之间在打交道，但实际上，创造社在那时只是一个对外的称呼，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借以谈判的有严密组织的团体。创造社之于泰东图书局，处在一种不明朗的被动位置上。创造社的主要大将郭沫若及其家人曾经寄居于泰东编辑所里，虽给泰东编辑书刊，却不曾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既无合同，又无聘书，工作报酬既少，数目尚不确定，还只能三块两块的到柜台上去取，居住环境又相当不如人意。赵南公这种“江湖式”的做法[2]，导致了声誉日隆的郭沫若等人的不满，并最终走向双方的决裂。如果说，赵南公当初接纳了创造社，是其书业经营的“得”，这种“得”大多来自于他独到的预见眼光，那么，他后来与创造社的分道扬镳，则可看成是他“失”的表现，这种“失”则归咎于他经营管理方式的落后。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决裂后，并没有完全能够从泰东收回书刊的版权。大革命前后，政治形势造就了新书业的黄金时代，泰东继续印行创造社的书刊。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泰东依然保持着锐进的风格，然而，它在创造社时期的风光景象已不复再现。与创造社决裂后的泰东，还出版过梁实秋、闻一多主编的《大江季刊》，潘汉年、叶灵凤主编的《幻洲月刊》，蒯斯曛、马彦祥主编的《白露月刊》，高长虹、高歌主持的《狂飙月刊》

[1]《创造社丛书》包括：郭沫若著《女神》，朱谦之著《革命哲学》，郁达夫著《沉沦》，张资平著《冲积期的化石》，朱谦之著《无元哲学》，郭沫若著《星空》，张资平著《爱之焦点》，周全平著《烦恼的网》，倪贻德著《玄武湖之秋》。《世界名家小说》包括：郭沫若等译《茵湖梦》，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译《鲁森堡之一夜》，邓均吾译《虚无乡消息》，郁达夫译《杜莲格来》，邓均吾译《贫民》。《世界少年文学选集》包括：穆木天译《王尔德童话集》，王独清译《新月集》，郁达夫译《沉钟》，穆木天译《蜜蜂》，何道生译《人鱼》，张资平译《圣诞节歌》。《辛夷小丛书》包括：郭沫若等著《辛夷集》，郭沫若等译《卷耳集》，郁达夫著《茑萝集》，郭沫若译《鲁拜集》。

[2] 郑伯奇：《忆创造社》，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85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和《泰东月刊》等[1]。原先泰东早想涉足的教科书领域，后来只出版了艺术一个单科门类，未能形成气候。从笔者翻阅的《申报》书刊广告栏来看，泰东是图书促销做得比较频繁，也是花样名堂比较多的一家，民国时期出版社办读者俱乐部，借以促进本版书销售，就是从泰东开始。这也反映了泰东始终如一的新进作风。然而，不健全的人事制度，混乱的会计制度，一味"放账"而没有约束的销售方式[2]，都给泰东的正常顺利发展投下了阴影。在泰东工作的许多职员不安于现状，一旦有好的机会就试图走人。后来的书业界中，光华书局创办人沈松泉，上海联合书店和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梁溪图书馆创办人黄济惠，群众图书公司创办人方东亮，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都是从泰东图书局出来后单干的。1926年组建的创造社出版部，也主要是出于对泰东的不满而成立的。如此多的出版人才从泰东的流失，说明了赵南公书业经营确实做得不得法。而他本人又热心于从事社会活动，做过上海四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会长，为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的核心人物，虽不能说他的社会活动没有意义，但从书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精力。赵南公的书业经营既不得法，又不尽心，泰东不能在后来挽回它的颓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终于，这一家在文化街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泰东图书局，竟渐渐地烟消火灭了。抗战前不久，赵南公本人甚至靠将几副创造社丛书的纸型租给别人印，收一分钱一本书的租金过日子。上海沦陷以后，出版业受创最重，纷纷内迁，他的生活自然更加困苦。据说当时伪政府中颇有他的一些熟人在做高官，想"提拔"他，但他不屑去同流合污，宁愿忍饥挨冻，最后寂寞地死在一个亭子间里，身后萧条至极，据说还是由几个热心的同业捐款办理丧事的[3]。随着赵南公1938年的逝世，泰东图书局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从创立到消亡，历时共24年。

[1] 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222页。

[2] 沈松泉：《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3] 萧聪：《赵南公——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出版界》第3期，《大公报》1946年10月27日。

第五节　新潮社与北新书局

一、新潮社

1918年岁末，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北京大学的一些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社团与期刊共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化社团都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的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文化学术、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杂志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启事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的名单。全体社员均为杂志的撰述员。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均为三人编制[1]，任事者由社员选举产生。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杂志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三次。

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第3卷总共只出了2期。第1

【1】编辑部有主任编辑1人，编辑1人，书记1人，分管与编辑有关的稿件取舍及其他编辑事务；干事部设主任干事1人，干事1人，书记1人，负责编辑以外的各种事务，如对外交往，杂志出版发行等。在新潮社的首届职员中，编辑部的三位依次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干事部的三位依次是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1919年11月，傅斯年去英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发生一些变更。在第二届职员中，只设编辑1人，由罗家伦担任。设经理1人，由孟寿椿担任。另外，由顾颉刚负责代派赠阅交换，高尚德负责广告，王星汉、宗锡均、李小峰负责记录与校对。到了1920年罗家伦又出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又作了一次调整，他们恢复旧制，重设编辑和干事两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任编辑，孟寿椿任主任干事，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均、李小峰、郭绍虞等人任干事。

期发行于1921年10月，第2期发行于1922年3月，中间整整相隔了5个月，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了。刊物之所以不能按期正常出版，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稿源方面的，社团成员总共40余人，竟有30多人出国在外，忙碌的留学生活使很多社员无暇写稿；而部分留在国内的一些社员，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人，又分心于文学研究会上的事情，稿源之不济，可想而知；二是经济方面的，虽然《新潮》的销路很好，但回款并不及时，兼之，从1920年开始，新潮社又开始书籍出版，无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资金，经济上不凑巧时，杂志出版就只能向后延期了。《新潮》一共出版了12期，历时两年零五个月，最终无疾而终。

新潮社出版图书，在其成立之初，就有这方面的打算。作为社团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傅斯年，一开始就认为，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他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他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说："发布一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丛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举行全体社员大会，决议将该社从杂志社改变为学会，并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经过短期的筹备，《新潮丛书》的第一本王星拱编著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一卷），于1920年4月出版。第二本陈大齐（百年）著的《迷信与心理》，于同年5月出版。第三本周作人翻译的外国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册），于同年8月出版。第四本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于同年10月出版。罗家伦考虑第一、二本的销售状况尚可，而周作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内容又是大家比较爱看的小说，初版就印了7 000册；蔡元培是北大校长，社会上的红人，罗家伦以为销售当更容易，初版就印了1万册。不料，周、蔡的书因为上、下两册定价稍高，只卖出了一部分，印数过大而积压下来的书，造成了新潮社的资金一时难以周转[1]，原先

【1】倪墨炎：《新潮社和〈新文艺丛书〉》，《倪墨炎书话》，24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一两个月内，出版新书一种的速度，减慢为一两年才出版一本。丛书第五本陶孟和著的《现代心理学》，拖至1922年2月才告出版。第六本李小峰、潘梓年译的《疯狂心理》，到了1923年4月才印行。而原计划作为丛书第七本出版的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和作为第八本的陈达材著的《政治原理》，只好不能兑现了。当然，这其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学会的出版重点，自周作人任主任编辑以后，已转向了《文艺丛书》的编辑与出版。

《文艺丛书》在出版时间上大致与《新潮丛书》相衔接。丛书第一种是冰心的诗集《春水》，1923年5月出版；第二种是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出版；第三种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出版；第四种是川岛的散文集《月夜》；第五种是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六种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七种是李小峰译的丹麦爱华耳特的童话集《两条腿》，第八种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和小品作品集《陀螺》，第九种是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十种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以上作品均出版于1925年。第十一种也是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于1927年5月出版。

新潮社从创办到结束，一共出版了1种期刊2套丛书，从出版物数量上说，自然不能言其多，但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社团来说，像这样的出版成绩，已是相当突出的了。而新潮社作为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在资助无多，经验不足，学生又一茬茬毕业，人员变换频繁的情况下，能把出版做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更是十分的难得。更为重要的是，新潮社的同人们在从事出版活动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熔铸了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使命意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被确定为出版物应采用的三"原素"。在此目标下出版的书刊，自然出手不凡。《新潮》杂志一直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它是《新青年》最坚实的同盟军，

与《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而继《新潮》杂志之后的《新潮丛书》和《文艺丛书》，虽然出版形式上与《新潮》有别，但在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上却是前后统贯，一脉相承。在这两套丛书中，不管是撰述文字，还是翻译作品，不管是名家名篇，还是新人新作，都以原创和革新的面目，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在那一时期的出版物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冰心的《春水》、鲁迅的《呐喊》、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李金发的《微雨》，皆为作者的早期力作，独具艺术风采。这些作者后来都有重大的发展，他们的风格产生了影响，甚至还形成了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奠基和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二、北新书局

说起北新书局，不能不从北京大学新潮社讲起，因为两者之间在历史渊源上，有着前接后续的关系。这种继承关系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书局名称上的继承。北新书局的“北新”二字，是北京大学和新潮社各取首字后的缩写。显然，北新书局有意要打着新潮社的牌子，借用新潮社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号召力，借用新潮社以前所出书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如果说，社名对出版社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的话，那么，北京大学新潮社是把它的无形资产无偿地奉送给了后来的北新书局。

其二，干部队伍上的继承。北新书局的创办人李小峰，其本人就是新潮社的早期成员之一。在罗家伦任主任编辑时，李小峰负责记录与校对的工作，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时，李小峰任干事，分管出版与发行的工作。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发行工作，就是由李小峰一人独自担任的。另外，他还和孙伏园一起，管理丛书的出版工作，而孙伏园，也是创办北新书局的积极推动者[1]。应该说，新潮社为北新书局干部的培养作了前期的准备。

[1] 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其三，作者资源上的继承。北新书局成立以后，新潮社只管书稿的编辑，而将出版与发行的工作，全交给了北新书局。由于这层顺带关系，新潮社的一些作者，后来也自然而然地归到北新的旗下，鲁迅、周作人、冰心、孙伏园、潘梓年等以前在新潮社出过书的作者，继续将书稿交给北新出版。事实上，北新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时间为1925年3月15日，北新书局也把这一天，作为书局对外开张营业的日子。据李小峰说，北新书局成立之初，是不用愁没有书稿的，因为鲁迅先生不仅主动地把他的著译交给书局出版，还为书局主编了两套丛书。语丝社同人也大多把他们的书稿交给北新出版[1]。而语丝社，是在鲁迅热情扶植和孙伏园积极活动下成立的，其本身就与新潮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1】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

其四，出书方向上的继承。虽然从性质上说，《新潮》不是一个文学刊物，但《新潮》确实对作为工具的文学，给予了相当的关心和注视。杂志在小说领域、诗歌园地、外国戏剧翻译等方面都进行了辛勤的垦殖，并取得了一定的建树。新潮社后来所出的两套丛书中，大部分选题也是关于文艺方面的。这一出版方向，为后成立的北新书局所继承，并形成北新早期出版物的主要特色。有人曾对《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卷》作过统计，北新书局所出版的新文艺图书在320种以上[2]，数量如此之大，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社中，很少有可以与之比肩者。

【2】李中法：《关于李小峰》，《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虽然说，新潮社是一个团体组织，北新书局是一家私营机构，从事出版的主体性质不同，但由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多方面继承，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北新书局的创办与发展，在客观上，延长了新潮社的生命。据李小峰说，他开办北新书局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行《语丝》及《新潮丛书》的一些利润，代售别家书刊的些微回扣，以及他在新潮社出版的几种书的版税[3]，而这，还主要是与新潮社有关。基于上述种种，我们完全可以说，若没有当初的新潮社，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北新书局。

【3】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

北新书局自1925年创办，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在旧时书局

成活率不高的情况下，北新算得上一家历史比较悠久的出版社了。北新的历史，若从其出版活动之中心来划分，大致可分为北京时期和上海时期。北京时期的北新书局，初成立时的地点设在靠近北京大学附近的翠花胡同，本是李小峰自己的住宅，室内挂一块牌子，置备几只装书的木箱子和一个陈列出售书籍的书架子，便成为书局办公及对外联络之所在，确乎因陋而就简。工作人员也只有李小峰一家人，他大哥李志云和他妻子蔡漱六[1]。北新在北京从事书刊出版的历史，约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1927年春，张作霖入关进驻北京城。北新书局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查封，李小峰遭通缉，随后南下上海，北新书局也随之南迁，将原来在上海的分店改为北新的总店，而原来在北京的总店则改为分店。有人说，北新书局的南迁，既是出版业适应新形势的一种举措，又可看成是文化中心南迁的一种象征[2]。这话是有道理的。自清末以来，上海就是全国的出版中心，有着全国最大的图书市场。北新书局有鉴于此，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分局，1927年2月，更是将原来偏处宝山路宝山里的分局，迁移至书店集中的四马路上，与世界书局面对面。后来分局改为总店，从书业的角度来说，确也是水到渠成。从文化的角度说，北新书局之迁出京师，与当时许多原在北京的学者文人之南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出版业与学者文人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使得北新书局1927年的南迁事件，便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文化意义。

[1] 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

[2] 王建辉:《李小峰和北新书局》,《老出版人肖像》,20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不过，南迁后的北新书局并没有一时改变它的出书方向，文艺书刊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依然是北新出版物中的重头戏。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林语堂、柳亚子、章衣萍等作家的新作，依然源源不断地从北新书局送往读者手中。原来在北京被张作霖查封的《语丝》杂志，在书局的请求及在沪作家的努力下，也于1927年12月17日上海复刊后重归北新发行。另外，此后由北新发行的、孙福熙主编的《北新》周刊[3]，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等，都是以文学为主的刊物，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与北新发生过或大或小关系的作家队伍。在新文学的山

[3] 1927年11月，该刊改为半月刊，由潘梓年主编。

地水田里，北新书局耕耘得既早，收获也大，一时间，在上海的新书出版业中，北新享有着“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美名。然而，到了1930年前后，北新的掌舵人有意识地把出版航向，从原来声成名就的文艺领域，偏向了儿童读物和教科图书的出版，虽然，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北新还时有文艺书籍面世，但已没有原来的锐气和锋芒。因而，北新的历史，又可以根据前后出版物重点之不同，分为文艺书刊出版时期和儿童读物与教科书出版时期。

北新书局在文艺图书出版领域的淡出，并非文艺图书的出版已山穷水尽，也并非出版文艺书在当时无钱可赚，仅从1928年北新欠下鲁迅八千二百余元的版税这一数字中[1]，我们亦不难推测出，北新当时文艺书籍销量之不差。而北新之所以将业已形成出版特色的文艺领域主动舍弃，当事人李小峰解释说，是“为了避免与现实政治相接触”[2]。确实，自南京国民政府执政以后，文网益密，禁书日多。所禁书刊中，又以文艺和社科方面的图书首当其冲。带有家族式经营色彩的北新书局，不能不于此有所顾忌。1931年3月，令北新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北新因为出版了鲁迅、蒋光慈、冯雪峰等人的著作和代售中共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的“禁书”[3]，终于被国民党政府所查封，封店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直到4月24日才启封[4]。此次封店，除了停业带来的损失外，北新还主动地焚烧了大量禁书，另外，又筹集了3万元现洋到南京走门路，才把事情了结[5]。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北新更加坚定了出书方向上的大转移。好在在此之前，北新也出版了一些儿童读物，如《民间故事》、《小朋友丛书》等，在教科书出版上也曾作了些尝试和准备，转变起来，倒也不很困难。

1930年以后北新出版的教科书，品种上既多，范围上也相当的广，涵盖到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多个层次，内容包括国语、算术（包括代数、几何、三角等）、自然、公民、英语、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乐理、图画、美术等多种

【1】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鲁迅曾为北新书局的有意拖欠稿费，差点与之对簿公堂，后文对此有专门叙述。

【2】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

【3】蒋光慈的著作是《冲出云围的月亮》、《失业以后》、《两种不同的人类》，冯雪峰的著作是《新俄的戏剧与跳舞》。

【4】《申报》，1931 年 4 月 25 日。

【5】李中法：《关于李小峰》。

学科。《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中，收录了62种由北新出版或发行的教科、教辅图书，而这个数字，因为《民国时期总书目》本身的收录不全，实际上肯定要有所超出。北新的教科书，论教育界影响，论发行范围，自然无法与商务、中华等大书局相提并论，但自1929年8月教育部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颁布以来，北新书局同儿童书局、神州国光社、大华书局等其他中小型书局一起，在活跃与繁荣当时的教科书市场，促进教科书编写的改革与创新等方面，自有其历史贡献在。比如说，赵景深1930年为北新书局编写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在编写方法上，率先突破了传统的文选型编辑方法，以系统的文法、作文法和修辞的知识，将文选和语言基础知识有机地“混合”起来，这一编写上的首创，因为适宜于教学，为后来的许多同类教科书所效法[1]。而由中国公学、持志大学教授姜亮夫等人1931年开始编写的《北新活页文选》，是继《开明活页文选》之后的又一套重要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补充教材。北新在广告中称此补充教材有六大特色：“名家编注；注释易检；通盘筹划；谨慎从事；联络教材；选文精当。”[2]《北新活页文选》以后七八年中，篇幅续有增加，至1939年，已增加到三千篇[3]。历时既久，续增不绝，亦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北新的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出版文化界，亦有相当大的声名。1930年，赵景深在李小峰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北新书局的总编辑，同年12月，陈伯吹又加盟北新，出任儿童编辑室主任。有此两位儿童文学创作家和研究者的主持和擘画，北新原本有些基础的儿童读物出版，更进一步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最为明显的一点，北新的儿童读物开始走向规模化和系列化。在1933年8月18日的《申报》图书广告上，我们可以看出，北新的儿童读物已覆盖了小学生读者的各层次年龄段，既有为低年级学生阅读的《连续图画故事》60册，也有为中年级学生翻看的《常识丛书》100册，而为中高年级学生准备的《小朋友丛书》，同样也达到了100册的庞大规模。这三套丛书，在当时十分畅销，为北新书局赚了

[1]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40 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

[2]《申报》,1931 年 8 月 23 日。

[3]《申报》,1939 年 1 月 22 日。

[1] 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2] 北新书局每次出入这些场合的都是李小峰的夫人蔡漱六女士。事实上,参加这套故事集的编辑工作者主要是李小峰,蔡漱六和赵景深也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应该说,“林兰女士”是一个集体编辑者的代名。

[3] 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

[4] 许广平:《鲁迅与青年们》,转引自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

不少钱。[1] 而北新书局从1926年开始，从全国各地来稿中征集到的民间传说故事，到了30年代还在赓续出版，前后出版总数近40种，编入其中的各种民间故事近千篇。像北新这样大规模地搜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的举动，在当时是空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说，在那个时代，大城市中就读的少年儿童，大都读过这些故事集。在这套故事集陆续出版的过程中，许多小读者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北新书局求见该书的编辑者“林兰女士”，北新也主动响应，多次组织“林兰女士”与小读者见面[2]，由此也可看出该套故事集在当时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和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时，无不要提到这些民间故事集[3]。另外，北新出版的成系列的儿童读物还有《儿童文学丛书》多种和《格林童话全集》14册等，在当时均有不俗的销路。

若仅就书业经营的角度来说，北新书局从1930年开始，将出版重点从文艺读物向儿童读物和教科书转向，商业上固然不失为成功；但倘若从文化贡献的角度而论，似乎就不太好言说，比如说，曾经对北新给予极大帮助的鲁迅先生，对北新的这次转变，就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一个大大的失策：“如果他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4] 言下不无惋惜之意。不过，好在北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书局后来锐意经营的教育出版方向上，倒也为我国的中小学生课内和课外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民国时期出版史上，北新书局的名字难以忝列到大书局的行列中，充其量只能算是中型书局中的领头者。北新后来出版教科书，也曾经有过招股融资的活动，有着明显的做大做强的意图，但终究难以如愿。一方面，当时激烈的书业竞争，要想异军突起，挤占别人的地盘，不是一件容易事；另一方面，北新书局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多少也限制了它的发展。再加上1932年10月，正当北新书局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不慎出版了林兰女士所编的《小猪八戒》一书，因书中情节侮辱了伊斯兰教徒，引起了

上海广大伊斯兰教徒的义愤，再一次被查封。书局停业后改名为青光书局，一年后才恢复旧名。北新遭遇这次重创，大大遏制了发展的势头。到了1937年7月，日本大举入侵我领土，全国出版业处于极度萎缩状态，北新自然也不能免之于时局之外。北新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极为困难时期，没有与日伪同流合污，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北新只能印些重版书和教材，设法送到大后方销售，以维持生存。1943年冬，北新书局迁转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编印教科书，在立煌周围各县推销，后又辗转于桂林、重庆等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新同大多数书局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霞飞路四明里恢复出版业务，不久与广益、大中国、人世间和中联书店组成五联，印行教科书。1947年，北新在复兴中路恢复办事处，1954年，又与广益、大中国、新亚、人世间几家书局合并为四联出版社，1955年夏公私合营为上海文化出版社[1]。

【1】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65页。

第三章　民国出版业的兴盛
(1927—1937)

第一节　出版业的兴盛

1927年，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归复统一。1928年12月，东北军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在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里，虽然国民党军队一直进行着对红色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追击，1931年后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领土的侵略和占领，但就整体而言，国家政治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经济上，虽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我国，20世纪30年代初的各种自然灾害也对国内经济造成不小的打击，但总的说来，国家十年中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方面，工业品总产值从1927年的67.01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22.74亿元，增长幅度为83.2%。在教育上，虽然整体上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全国的学生人数规模和教育经费投入，基本上还是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作为出版业书刊购买大户的图书馆，自1928年大学院颁布全国各学校必须广泛设置的通令以后，其数量从1928年的557所增加到1936年的5 196所[1]，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都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时应势下的出

【1】吴永贵、陈幼华:《新图书馆运动对近代出版业的影响》,《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7期。

版业，在这一历史机遇下，迎来了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出版高峰，同时也是民国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代——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至抗战前夕达到历史的最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书局力量扩大

作为出版业三大巨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在这一时期承接过去的发展势头，继续提升出版实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分别作了具体阐述，兹不重复。体现这一时期出版业整体实力大增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则是中小书局的崛起和壮大。

虽说，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东风兴起或成立的一些中小书局，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变革中，固然有因经营不善而逐渐式微的，如曾发行过《新青年》的群益书社，出版过创造社丛书的泰东图书局，都在这一时期渐渐地走向了穷途；但也有不少书局在新的出版形势下，顽强地坚持下来，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还得到了相当快速的发展。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过《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标点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亚东图书馆，在这一时期没有采取守势，出版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革命小说和社科书籍，继续发挥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大东书局、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机构，历史虽然有长有短，但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扬名于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它们或者问鼎教科书领域的出版，或者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或者凝练自己的出版特色。大东、开明、北新是这一时期教科书出版领域中的新秀；开明、北新、光华、良友等是当时上海新书业中的佼佼者，而成立于1901年的神州国光社，在1930年由陈铭枢、王礼锡、黄居素等人接办以后，出版大量左倾社科书籍，发行《读书杂志》，推动"中国社会史论战"，使神州从一个

暮气沉沉的古老书店，一变而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新书店，在当时上海出版界中，也算得上是个创举[1]；北新、开明、光华、良友的文艺读物影响一时，被广大文艺爱好者所捧读；北新的儿童读物，开明的中学生读物，良友的画报等自成特色，在书业界享有很隆的声誉。

在这个十年中，一方面，原有的中小书局继续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中小书局在不断地创办。从1927年到1930年这4年间，先后成立的书局书店，资料可查者有：上海长江书店（1927年4月）、新月书店（1927年5月）、自由书店（1927年5月）、现代书局（1927年7月）、光明书局（1927年10月）、真美善书店（1927年11月）、嘤嘤书屋（1927年11月）、春野书店（1927年12月）、新亚书店（1927年）、中央书店（1927年）、昆仑书店（1928年1月）、大江书铺（1928年9月）、第一线书店（1928年9月）、乐群书店（1928年10月）、春潮书店（1928年11月）、金屋书店（1928年12月）、朝花社（1928年12月）、南强书局（1928年）、秋阳书店（1928年）、新生命书局（1928年）、明日书店（1928年）、红黑出版社（1929年1月）、平凡书局（1929年8月）、西门书店（1929年10月）、华通书局（1929年12月）、华兴书局（1929年）、辛垦书店（1929年）、儿童书局（1930年2月）、龙门书局（1930年7月）、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8月）、黎明书局（1930年）、中学生书店（1930年）、新中国书局（1930年前后）等30余家[2]。它们当中，有的是纯粹商业性质，有的寓含政治背景，有的则带有鲜明的学术团体特征。这些新起炉灶者，或因自身经营的不善，或因遭遇禁书的打击，兼之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波及国内，大多数书局存世的时间并不长，长者六七年，短的甚至只有几个月，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屡仆屡起的中小出版社，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出版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出版活动中，依主持者的政治倾向、文化修养和经营目标，形成了各自的出书方向，有的甚至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现代书局和新月书店的文艺读物，大江书铺和新生命书局的社科

【1】陈铭枢：《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六卷），53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2】以上资料辑录于：(1)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2)宋原放《出版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书籍，儿童书局和中学生书店的少儿读物等，都曾在出版文化史上留下过强劲的足音。

到了1930年以后，虽然新书局诞生的速度不及前期，但问津于书业者依然不乏其人。1931年至1937年抗战前夕，沪上新成立的出版社，先后有湖风书局（1931年9月）、女子书店（1932年3月）、生活书店（1932年7月）、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春明书店（1932年9月）、天马书店（1932年10月）、作者书社（1932年10月）、大华书店（1932年）、大众书局（1932年）、汉文正楷印书局（1932年）、教育书店（1934年2月）、上海杂志公司（1934年5月）、竞文书局（193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5月）、新知书店（1935年9月）、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35年）、中国文化服务社（1935年）、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艺术书店（1936年1月）、上海新文字书店（1936年5月）、引擎出版社（1936年）、海燕书店（1937年）等[1]。女子书店专门出版女性书刊，竞文书局专门着意于英语读物的出版，艺术书店全心于艺术书籍的刊行，均属于特色化书店之列；上海杂志公司、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等书刊代订代办机构，兴起于杂志业勃兴的年代，主要从事书刊的贩卖，行有余力，也进行一些出版活动；作者书社自己不从事出版，专门为著译人自己出书做代销代印的服务性工作，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同时，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始终如一地坚持走进步书刊的出版路线，特别是生活书店，由于经营得法，发展十分迅猛，规模直逼大书店；1935年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吴朗西等人的主持下，唯艺术是举，坚持出版理想，成为我国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文艺书刊出版阵地。

二、书刊数量增加

随着大书局规模的扩充和中小书局力量的壮大，这一时期出版物的数量增长迅猛，而且越是往后，增长的幅度越大。有人将《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语言文字类书籍作过抽样调查统计，得

【1】以上资料辑录于：(1)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2)宋原放《出版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出版史研究》第2辑,17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2】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6页。

出各时期该类书籍的出版数据如下[1]:

1911—1918年　平均每年22种

1919—1927年　平均每年48种

1928—1936年　平均每年179种

1937—1945年　平均每年126种

1946—1949年　平均每年137种

语言文字类属于一个比较中性的类别，以之来抽样，颇具代表性，从中可管窥民国各时期的出版概况。表格中两头低中间高的统计结果，昭示了1928年至1936年这段时间，正是民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

具体到1928—1936年各年度全国出版物的情况，王云五曾有过一个估推式的粗略统计（见表一）。

表一　1928—1936 年各年度全国出版物种数统计表[2]

年代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册数	1 323	1 569	2 064	1 823	1 581	986	2 263	3 786	5 752	6 717

除了1930—1932年全国出版物数量一度下滑外，其余各年度的出版物数字，都是节节向上攀升，特别是1933年以后，出书增长速度更是以千位数计算，情形确实令人振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增长出来的图书数量，多集中于古籍、大型综合性丛书和教科书等出版物类型上，而一般性图书的出版却是不增反减。由于当时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民生凋敝，读者购买力弱，而古籍、综合性丛书和教科书，以图书馆、少数富户和在校学生作为购读群，销路上相对较有保障，于是稍有实力的大书局都争相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战前几年图书出版数量的增多，主要是大书局拉动的结果。而那些以出版一般性新书为主的中小书局，日子却相当不好过。为了把书籍卖出去，书业界掀起一股愈演愈烈的打折之风。自1933年秋季起，小学教科书售价由8折改为6折，中学教科书由全价改为8折。到1934年底，除教科书继续减折外，普通书籍亦由8折而至对折，新标点之旧小说，则更

以一折八扣登报发售[1]。其结果，造成了当时图书定价的虚高，明明只值一角之书而定价二元以便于一折五扣，这种情况最终引起了教育部的直接干涉，于1936年4月7日令书业公会规定所有书籍均须照实价出售，特价不得低于7折[2]。正是当时书业界的艰难，造成了一般新书出版的缩减。

在1927至1937年间，期刊出版增长的情形与图书类似，叶再生先生作过统计（见表二）。

表二　1927—1936 年各年度全国出版期刊数量统计表[3]

年代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册数	656	1 076	1 458	1 274	1 436	1 742	1 690	1 628	1 620	1 914

又据叶先生统计，1917—1922年的五四时期，六年年均出版期刊271种，而1927—1937年这十年间，年均出版期刊则达1 483.3种，为五四时期每年平均数的547.2%[4]，增加幅度之大，由此可见。尤其是1932年起的几年间，全国涌现出一个办期刊的热潮。1934年更有“杂志年”之称。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杂志的勃兴，时人这样分析说：“杂志之所以风行，倒并不是为的读者骤然加多，而是要办杂志的人骤然加多，这又有许多‘原因’，而其中之一是书店老板见得出书难，只好将资本运用到定期刊物方面。为什么‘出书难’呢？当然‘原因’又很多的，其中之一据说是读者的钱袋不像从前那样饱满了；——这一句话，应当加以补充，就是读者的钱袋不饱满，读者的求知欲却比前发达，读者对于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种种方面的疑问也比从前多得多了，因而读者想以少许的代价换取多量的各方面的知识，希望他脑袋中的无量数的问号在一本刊物里就得到若干答案，于是觉得‘杂志’是较合于他们的条件。”[5]

三、一批高质量出版物的出现

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市场，同其他各个时期一样，固然不乏有大量内容平庸、质量低劣、趣味低下的产品充斥坊间，那些毫无

【1】舒新城：《一年来之我国出版事业》，《文化建设月刊》1卷3期，1934年。

【2】舒新城：《两年来之出版界》，《中国新论》3卷4、5合期，1937年。

【3】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103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4】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1033页。

【5】陈望道：《明年又是什么年呢？》，《太白》1934年1卷7期，1934年。

创新、迎合市场的跟风出版层出不穷，那些只求廉价、少有编辑的标点旧书更是大行其道。这种纯粹利益追逐的出版活动，在当时就受到文化界的严厉批判与挞伐。但正如钱币有正反两面一样，这个时期也同样出版了许多饮誉当时及骄矜后世的出版文化精品。说这个时期出版业的兴盛，并不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也同样收获在质的丰收上，重要出版物类型如教科书、工具书、古籍、翻译出版、丛书出版等，都不难找到可圈可点的出版例证。

优质出版物是在作者和出版者双方共同努力下创造完成的。这个时期好书迭出的原因，也可从作者和出版者两个方面来考察。就作者方面而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学人和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而此时以左翼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并存共处的活跃文化思潮，同样是促进知识界著书立说繁荣和写作者著作质量提高的积极因素之一。就出版者方面而论，由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蜂起的书局书店，加剧了书业间的竞争，一些有长远眼光的出版者都试图把出版物的质量，作为提高书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在新成立的书局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有理想的文化人创办的，抱着文化理想从事出版，自然着意于出版物的质量，不同于牟利书商的一味胡编乱造。如章锡琛之于开明书店，李小峰之于北新书局，徐志摩之于新月书店，邹韬奋之于生活书店，吴朗西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均是文化人办出版的典型。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来说，稳健是其一贯的出版风格。稳健，不仅仅意味着避免与现实政治相抵触，同时也意味着注意编辑质量的精审，意味着它们在重视商业利益的同时，关注文化的发展，而它们资金实力雄厚，较一般小出版社更有能力打造出成规模、成系列的文化精品来。

虽然说，这十年我国出版业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着很大距离，人均图书和杂志的出版量仅为日本的1/14和1/21。教育的不发达，文盲的众

多，经济的落后以及国人购读新书习惯的未能养成，都是我国出版业不如别人的原因之所在[1]。

[1] 舒新城：《一年来之我国出版事业》，《文化建设月刊》1卷3期，1934年。

第二节　各地区出版业的成长

出版业地区分布不均衡，作为一种出版现象，几乎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我国近代亦是如此。抗战前的上海，在全国图书出版业中，拥有绝对中心地位，在全国期刊和报纸出版业中，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下面是1936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登记的全国各地区新闻纸及杂志社统计表，虽说官方统计不尽完全，但基本上能反映当时全国报刊出版的现实，从中不难发现各地区间明显的差别。见下表。

内政部核准登记之新闻纸及杂志社统计资料（1936 年 4 月）[2]

省市别	报社	通讯社	杂志社	省市别	报社	通讯社	杂志社
江苏省	312	48	131	河南省	45	30	62
安徽省	56	31	27	河北省	67	34	139
江西省	35	23	12	陕西省	19	3	8
湖北省	74	54	80	甘肃省	9	6	8
湖南省	103	68	73	宁夏省	2	1	
四川省	66	64	28	青海省	4	4	
浙江省	151	126	101	绥远省	6	9	17
福建省	42	8	27	察哈尔省	9	1	9
广东省	49	32	54	南京市	84	69	219
广西省	9	1	5	上海市	125	43	529
云南省	15	1	13	北平市	111	67	174
贵州省	9	1	4	青岛市	20	11	13
山东省	49	32	60	天津市	10	11	14
山西省	18	8	64	威海卫行政区	4	2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149~15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本表所载各省市新闻纸及杂志社，以现存者为限，其因停刊经内政部注销者（共计905处）并未入内计算。总计全国报社1503，通讯社788，杂志社1875。

上表是关于全国报刊的统计资料，而有关全国图书出版的统计，内政部虽然也进行出版物登记，但执行得并不严格，作为书

业行业组织的书业公会也不举行全国出版物的调查，所以不曾有准确的全国统计。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对全国各地区的出版业情况，一一进行介绍，这里主要选择上海以外的其他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如南京、北平、天津等在全国出版业格局中可称为次中心城市的出版情况，作些概略性的叙述。

一、南京

在我国古代出版史上，南京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近代新的出版印刷技术兴起后，南京古旧的刻印出版，日渐凋零。1927年北伐战争后，南京被定为国民政府首都，以此为契机的南京现代出版业，在抗战前的短短十年期间里，从无到有，从有到大，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官办，民营商办以及上海出版业南京分店等三种不同的出版力量，共同擎起了这一时期南京出版业的繁荣。

官办的出版业。依托国民政府首都的地位，南京的官办出版业，有其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它们或者由国民党政府直接投资，或者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形成南京出版业独有的特色。官办出版，资金多有保障，又挟官府之威，往往做得不赖。

民营的出版业。南京本地的民营出版业，在报刊和图书的出版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建树。尤其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家内忧外患，日趋紧迫，言论救国成为一时风尚。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的“报纸杂志，接踵而起，蔚为大观”。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调查统计，1931年南京新出杂志期刊24种，1934年南京的杂志社为106家，当年全国杂志社830家，南京一市即占八分之一强[1]。这些杂志有国民党官方色彩的，有共产党等一些政治党派性质的，但更多的是一些普通团体和民营机构创办的。内容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建设、军事及交通、外交及国际研究、法律、警政、农工商、边疆及边省、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史地、医学、时事评论等各方面。在图书出版方面，据杨家骆《图书年鉴》统计，1933年以前，南京已有十多家民营书局和出版社，包括天一书局、京华书局、花牌楼书店、青白书店、

【1】本节有关南京出版业的材料均取自《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199~2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新亚洲书局、新京书局、群众图书公司、钟山书店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书局，在竞争中发展，活跃了南京的图书出版市场。它们当中影响较大、较具特色的是钟山书局。该书局创办于1931年，以出版学术性著作及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用书闻名。缪凤林著的《中国通史纲要》、柳诒徵著的《中国文化史》、张其昀著的《人地学论丛》、胡焕庸著的《世界地志》等名著，都是由钟山书局出版的。

上海出版业南京分店。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南京的书刊发行业，配合出版的兴盛，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江苏省档案馆藏的《首都市政公报》中的《南京特别市书店调查表》调查统计，在南京市范围内，开设店面从事书刊买卖的各类型书店，共有64家之多。其中有南京本地的书店，也有上海各大书局的南京分店。南京本地的书店单从数量上说虽占优势，但这些书店多属中小型，而且贩卖的也主要是上海版的书刊。而在南京设分店的上海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央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南京书店、神州国光社、共和书局、光天书局、公益书局、新时代书局、南洋书局等，共有13家。它们开店资金雄厚，经营品种众多，在南京书刊发行渠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全国范围而言，南京建都以后出版业的繁荣程度，大概仅次于上海，但依然不能摆脱为影随形者的身份角色。南京是如此，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亦概莫能外。上海出版业的全国主导地位，由此可见。

二、北平

如果说，1927年后南京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首都的政治地位，那么，都城所给予地方出版业的巨大影响，南京之得，恰是北京之失。1927年以前的北京，从清廷到北洋政府，一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北京改名为北平，不再是政治上号令天下之地，但昔日多年的政治中心，给后来北平的出版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五四期间，

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涌现出了诸如新潮社、北新书局、平民书局、文化学社、新社、平社、朴社等一批新型出版机构。此外，北平的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地质调查所，也从事相关学术书刊的出版。所以就现代出版基础而言，北平要远远好于同期的南京。

1927年以后，政治中心改为南京，文化中心南迁于上海，这些原本是推动北平出版业发展的外界因素，或已不复存在，或受到相对削弱。尽管如此，并不等于北平的出版业从此由盛转衰。事实上，从整个民国时期来看，1927—1936年这段时间，恰是北平出版史上最为繁荣的兴盛期，旧有的许多出版机构，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经营，新的出版机构又在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新成立的出版机构中，较为重要的有世界编译馆、震东印书馆、传信印书局、海音书店、立达书局、民友书局、北京书店、人文书店、好望书店、著者书店、人人书店、文殿阁书庄、星云堂书店、三户书社、未名社、中华乐社、民社、中国营造学社、华北科学社、北平科学社、陆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社会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禹贡学会等。

北平出版业在这一时期不衰反盛的原因，倒也不难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北洋军阀混战割据的动荡局面，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北平出版业因安定而得到喘息，而得到发展，进而出现繁荣。就北平特有的情形而言，北平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几个学术力量最为雄厚的城市之一，这就为北平本地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作者资源和坚实的出版基础。学术出版或者说学术机构办出版，是北平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特色。北平在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总数超过100种以上的出版机构，据调查，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5家[1]，除了文化学社发展成为专营的出版社外，其余都是学术性的机构兼营出版。尤其是北京大学，出版物

【1】邱崇丙，子钊：《民国时期北京的出版机构》，《北京出版史料》（第八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本节有关北京出版业的材料多取自该文，未予一一注释。

的数量在400种以上。北京的这种出版特色与上海不同，同南京也不一样。如果说，上海的出版业带有商业色彩，属于经营型的；南京的出版业带有官方意味，属于政治型的话；北平的出版业则带有学术色彩，属于学术型的。

三、天津

天津的古代出版业，除了杨柳青年画外，几乎寂寂无名。随着近代天津的开埠，清政府洋务派把天津作为北方的活动基地，这一时期的天津机器局、北洋武备研究所、北洋陆军编译局、天津丙午社等机构，都从事过西书编译工作，天津的近代出版业由此开始起步。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天津出版了包括《大公报》、《北洋官报》、《中外实报》、《津报》、《天津商报》等在内的五六十种报纸。辛亥革命前后天津出版的期刊也比较多，各以其不同的政治背景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如中国地学会编辑的《地学杂志》、作为共和党——进步党喉舌的《庸言》、北洋大学的《北洋大学季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进步青年们在纷纷建立革命小团体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以传播新思潮、新学说为己任的进步报刊，如《觉悟》、《导言》、《新生》等，特别是1920年马千里主编的《新民意报》及其十几种副刊，对传播革命学说，推动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1927年以前天津现代出版业的基础来说，也许不敌于北京，但要优胜于南京。南京后来居上，主要是政治中心的带动，这点，我们前面已说过。抗战前的十年，天津出版业的发展速度，自然无法与南京比肩，但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北平一样，得益于全国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抗战前的天津出版业也同样进入了民国时期本地区出版业的兴盛年代。表现在报纸、期刊、图书等各个出版领域。

报纸出版。这一时期，除了《大公报》、《益世报》已成为行销全国的著名大报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又有《庸报》、《商报》两家影响较大的报纸出现。另外，不同政治背景的小报也风起云涌，前后多达三十余家。

期刊出版。期刊出版中，突出的是文艺刊物。诸如《星星》、《夜莺》、《野草》、《当代文学》、《天津文化》、《天津漫画》等，先后出现的至少有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艺期刊，不少是在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或影响下办起来的，惜乎多数维持时间不长，旋生旋灭。政治评论综合性期刊，除原有的《国闻周报》外，又新办有《暖流》、《新北风》、《唤起》等刊物十五六种。经济刊物如《经济周刊》等7种，妇女儿童刊物有《家庭周刊》、《新妇女》、《天津儿童》等3种，体育刊物有《体育周刊》等。另外，在此期间，天津的许多机关、团体、高等院校等也都积极创办杂志，形成一种风气。如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华北水利》月刊、《气象月报》，河北省建设厅的《河北建设公报》月刊等[1]，不胜枚举。

【1】具体情况可参见杨大辛、张守谦：《天津出版史概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节有关天津出版业的材料多取自该文，未予一一注释。

图书出版。天津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论种类之多，论数量之大，都堪称前所未有。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图书出版业，大致可分为三大出书系统，即书局书店系统、机关团体与高等院校系统、报馆系统，其中以报馆系统的出版力量最为强大。20世纪30年代天津从事图书出版的书局书店，可知的有百城书局、南洋书店、天津书局、华洋书庄、精华印书馆、沙漠社、海风社等。出书较多的是百城书局，出版物以教材为主，兼及各科专著。天津机关团体从事于图书出版的有社会局、商会、国货售品所、天津博物院、北洋广告公司等机构。高等院校的图书出版，多反映本身的学术成果，因而出版质量较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研究室、北洋大学工学院、工商学院等，都有相应的学术著作刊行。其中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成绩最为显著。天津的报业素称发达，一直位居全国首列。在天津，报社系统兼营书刊出版，自1902年北洋官报局成立以来，便形成传统。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大公报馆为主体的报馆印书，更是成为天津图书出版的主要力量。天津其他的报馆如益世报馆、新天津报馆、大中时报社、午报社、民报馆等，都或多或少的有图书刊行于世。有的报馆出书，甚至还形成自己的出

版特色，如新天津报馆出版的武侠小说，因迎合小市民的心理，销路相当之好。应该说，报馆报社在编印报纸之余，从事书刊的出版，确有其有利条件，比如说，在印刷上，可借用自家的印刷设备，在发行上，也可借用报纸在各地的销售网络。民国期间，在出版业发达的上海，也有不少报馆是既出报又出书，尤其是申报馆，其出版物颇为时人所称道。但由于上海有太多力量强大的民营出版社，它们在图书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申报馆的出版物就不那么显山露水。而天津则不同，天津专营出版机构的弱小，衬托了报馆出书的突出。偏师唱主角，固然可称为天津出版业的主要特色，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出版业与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三节　《申报》与《大公报》

一、《申报》

《申报》1872年由英商美查等人合资在上海创办，是我国近代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一共存世77年，出版25 600期。《申报》初期几易其主，发展不快，直到1912年史量才接任总经理后，才开始大有起色。

史量才（1880—1934），上海青浦县人，曾任《时报》主笔。1912年，史量才与张季直、应季中、赵竹君、陈景韩五人组成合伙企业，以12万元的银价从席子佩手中购进《申报》全部产权，规定购金分三次付清。五人推史量才为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由于史经营有方，短短几年，还清了购报款，也付清了张、应、赵三人的投资款，《申报》遂成为史量才独资经营的企业。史量才对中国新闻事业向有不凡抱负，他认为文化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而新闻是文化进步的先锋。由于他大刀阔斧致力于报馆的现代化、企业化、商业化发展，《申报》事业蒸蒸日上，日发行量从他接办时的不到7 000份，到1916年的1.4万份，到1922年的5

【1】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60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年),5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万份,到1934年的突破15万份大关[1]。报社资金积累成倍上升,1912年12万元购得的《申报》,到1918年,就以70万元建造了《申报》大厦,到1938年,仅有形资产就达150万元[2],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化大报。

《申报》十分重视扩大发行工作。其主要做法是:在稳定基本订户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读者面,确保发行量稳步上升。《申报》创刊后,就以官府政界人士及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比较重视政治性新闻的报道。史量才等接办后,正值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不止的年代,关心政治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越来越多,为适应这一需要,《申报》进一步加强了时事政治性新闻的报道,特别对北京的政治动态更为重视,聘请了当时第一流的特约记者常驻北京。同时,在上海报馆林立、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申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扩大读者面,增加发行量。如创办各种专刊和增刊,加强知识性、趣味性。如副刊除"自由谈"外,1917年又增辟"老申报"一栏,摘取《申报》40多年来所载奇闻逸事及政治、风俗、诗歌、小品等文字。1919年设《星期增刊》,每逢周日出版一大张,随报附送,专译世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和学术等各方面最新动态。1920年增辟"常识"专栏,刊载介绍各类常识的文章,面向中下层市民,以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见长,深受读者欢迎。1921年设《汽车增刊》,每周一大张随报附送,融广告与知识为一体。《申报》的专栏增刊中较重要的是《教育与人生》周刊和《本埠增刊》。后又增辟"商业新闻"、"教育消息"专栏和《图画周刊》,并且在《本埠增刊》内增辟"艺术界"专栏,专门刊载娱乐新闻和艺术评论,使《申报》的读者面逐步向社会各阶层扩展。

视广告为生命线,是史量才的远见卓识。1913年,史量才聘用对广告学素有研究的张竹平任经理。张竹平创设广告推广科,分设外勤组和设计组,在广告的招揽、设计、编排、服务等方面加以改进。这些做法在当时都属创新。经过改进,《申报》上刊

载的广告篇幅大大增加，广告版面逐渐超过新闻版面。随着发行量的扩大，《申报》吸引了大量的广告客户，广告收入成了报纸经济的“命脉”。到1934年，《申报》每年的营业额达200万元，其中广告收入约150万元，占75%；发行收入约50万元，占25%[1]。

[1] 刘家林编著:《中国新闻通史》,11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重新闻，轻言论，是《申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办报方针。史量才接办初期，正是军阀混战、政局迭变的时期，为避免在政治动乱中遭受摧残，《申报》言论比较保守，对于重要的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不评论，而用大量的政治新闻弥补言论的不足。《申报》对于新闻报道十分重视，把它视为激烈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之一，不遗余力地加强新闻报道。大量采用电讯，并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战电等多个栏目，其中“北京通讯”、国外通讯和旅行通讯最具特色。《申报》还网罗了大批优秀的记者，先后聘请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为北京特派员。黄远生发表了许多泼辣活泼的“北京通讯”，开创了“新闻通讯”的文体，被誉为“报界奇才”。邵飘萍每日发回北京专电并《北京特别通讯》，报道时局变化，揭露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黑幕，采访能力高超，写作文笔精妙。《申报》生动的新闻报道，不仅为当时读者所欢迎，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更新设备，是《申报》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1918年，《申报》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费银70万两兴建了一栋高五层的有百余间房间的新馆。1919年，从美国高价购进最新式印报机一台，每小时能印报3万余份（三大张），1922年再购两台。馆内的其他制版设备也全部加以更新。这样，《申报》的印报能力可达到十多万份报纸在2小时内全部印完。《申报》拥有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先进设备，使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扩大《申报》的影响，增加社会知名度，促进发行量，同时也为了多辟财源，史量才还围绕《申报》大量地出版书刊。1922年出版黄炎培主编的《最近之五十年》；1932年创刊《申报

月刊》，阐明国内外时事，介绍学术思想，提倡生产事业，指陈其动向，补日报之不足；嗣后不久又出版《申报周刊》，实际上是《申报》星期日版，除零售外，随《申报》附送；1933年出版《申报年鉴》，每年出1册4卷，结集各种统计，供读者查考；1932年起出版《申报月刊丛书》，共11种，如《淞沪血战回忆录》、《创作小说》初集、二集等；1933年出版《申报丛书》，由上海文库编辑，申报馆发行，陆续编印国际情势和世界知识40种；1934年开始出版《中国分省新图》，成为当时舆地书籍的精品；1934年将《图画周刊》改为《图画特刊》，每周1至2刊；从1923年起又出版儿童读物，如《儿童之友》等。此外还出版各类图书14种之多[1]。

除出版众多书刊外，《申报》还兴办了众多文化事业。从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馆陆续创办了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等一系列文化事业，这些文化事业的开办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2年开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免费为下层店员、工友、学徒服务，为照顾路远的读者，还分区送书上门。图书馆的藏书仅1.2万册，但两年的周转量达到19万册，为藏书的15倍多[2]。此外，图书馆设立了“读书指导部”，并于1931年9月创设“申报读者通讯”，加强与读者的沟通。这一专栏讨论抗日救国、民主政治，实际上变成了进步读者呼吁民主抗日的窗口，成了《申报》时评的补充。1933年1–3月，申报馆还创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吸收一批文化低的在职青年和失业青年进校学习。1933年6月成立申报服务部，开展邮购服务。1941年开始办理“申报读者助学金”，全馆人员分别担任各项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持此事。兴办社会文化事业，体现了《申报》承载社会责任沟通读者的职能，同时集结了进步文化力量，繁荣了文化建设。

史量才经营《申报》的同时，还兼办其他实业，如开工厂、办银行等。1922年，他同南洋侨商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

[1]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61~62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4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同年发起兴办民生纱厂，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营业，帮助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特别是1927年、1929年先后买进《时事新报》和《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企图组织中国报业托拉斯，显示了他在报业经营上的勃勃雄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政治态度有很大变化，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遭到暗杀。《申报》重要同人组织董事会代行总经理职权。1937年7月，《申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1938年1月15日迁汉口复刊，同年3月设香港分版。1938年7月31日汉口版停刊，10月迁往上海复刊，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9年上海解放后终刊。

二、《大公报》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几大报纸之一。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织新记公司接办，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因此近代的《大公报》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02年至1925年，为英敛之创办时期和王郅隆续办时期；后一阶段是1926年至1949年，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时期，史称新记《大公报》时期。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以论说之“敢言”见称。倡导社会改革和文化科学，大力提倡开工厂、修铁路、办学校、译西书、介绍科学知识、讲究卫生等。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表现了较浓厚的保皇色彩，但反对残害革命党人。英敛之信奉天主教，学习法文，创办《大公报》时又得到法租界的保护，所以他的《大公报》又带有较浓厚的天主教和崇洋味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英敛之的上述办报思想受到了猛烈冲击，他无心继续经营报纸，后委托给别人经营，直


大公報
Ta-Kung-Pao
永明漆廠恭賀
服務部公告
營業部公告
製造部公告
研究部公告
仙鶴牌
飛艇牌油漆
大學墨水
新禧
恭賀
新禧
恭賀
新禧
恭賀
中華百貨售品
結婚啓事
訂婚啓事
李

图18
《大公报》

至1916年9月将《大公报》盘卖给王郅隆。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实际上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图18）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成立。新记公司是以吴鼎昌的资本与胡政之、张季鸾的劳力合组的公司。吴鼎昌拿出5万元，用1万元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衍手中盘购了旧大公报馆，以胡政之的班底[1]，加上张季鸾的一支笔，组成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吴的资本，胡的管理，张的文笔，加之三人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事业心，使续刊一举成功。根据《大公报》人王芸生、曹谷冰回忆，自1926年接办续刊至1936年把经营中心迁至上海，报馆很有朝气。从续刊时发行不足2 000份，到1927年5月涨至6 000余份，10年后上升到3.5万余份，资本从当初的5万元发展到总值50万元。《大公报》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很快成为全国著名大报。

【1】这个班底乃为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以及原《大公报》的部分职工。

新记《大公报》有明确的办报方针。在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续刊号上，刊载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它从一开始就把新记《大公报》区别于党报，也区别于一般商业性的报纸，使“文人论政”具体化。新记《大公报》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由一个社评委员会掌握，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议。续刊之初，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三人都写社评，稍后是胡、张二人执笔，张写的较多，并负责修改定稿。“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吸收编辑部同人写社评。张的文章说理透彻，文笔锋利，常带有感情，富有感染力。《大公报》在报业竞争中领先，与张的社评吸引读者密切相关[2]。新记《大公报》初创之际，正是中国局势动荡的北伐战争之时。

【2】由于“《大公报》社评向采不署名制，执笔非一人，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讨后由一人执笔”，所以这些社评，并不都是张写的。

对待北伐战争，《大公报》前期呼吁停战，后期痛斥旧军阀与赞扬孙中山。当时为了表现其中立态度，报纸也骂蒋介石，揭露了一些黑暗事实。突出的例子是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12月，张季鸾曾写了三篇著名的社评——《跌霸》、《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和《蒋介石之人生观》，对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但不久后因《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密切，而表现出了拥蒋的政治倾向。"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定以后编辑方针为"明耻"与"教战"。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发文声援抗战，之后多次发表言论力主抗战。1936年西安事变，《大公报》新闻及言论的基本观点是以恢复蒋介石自由为"第一义"。12月18日发表了张季鸾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严厉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把这篇社评翻印了数万份，用飞机散发到西安，影响很大。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刊出记者范长江的长篇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介绍了中共为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作的努力，并转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2月22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对中共的主张予以支持。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大公报》增出晚刊，每天下午出大半张报道战局，并多次声援抗战。1938年1月，张季鸾在大公报社明确了一条不成文的社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1938年10月《大公报》迁往重庆，重庆版总编辑是王芸生，当时的重要社论多由他执笔。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同时也大力宣传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的"国家中心论"，此外，在为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过程中，也发表过一些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的文章。

新记《大公报》在新闻方面很有特色。它广设国内外特派员，多用自己的专稿专电；在报纸版面上，专电、特写、通讯都较其他报纸为多。1926年续刊之初，《大公报》依靠国闻通讯社

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哈尔滨五个分社发专电和通讯。不久，《大公报》在南京设办事处，金诚夫、曹谷冰先后任驻南京特派员，另外还有特约通讯员。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几百名通讯员分布全国各地，新闻消息、特写通讯每天都有。有个时期，要闻版完全用自己的专电编辑，不用一条外稿，其中常有独家新闻，十分吸引读者。此外，《大公报》派记者到很多省份写旅行通讯，抗日战争时期又派遣了大量记者去各战场写战地通讯。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印度、缅甸、日本等地，也派有驻外特派员，萧乾、杨刚、章丹枫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驻外记者。从1935年7月起，《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历时十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等地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旅行通讯，报道工农红军长征行迹和西北近况。《大公报》出版部还将其报道和通讯汇集成册，取名《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接连再版7次，引起轰动。《大公报》的旅行通讯很有特色，辅有摄影、图片、绘画写生，比文字报道更真切。该报还注重版面设计，版面编排重点突出，活泼新颖。它用两个整版刊登国内外要闻，突出重要新闻，有时还配有图片，长短新闻错落有致，使用的铅字也大小多样，使版面显得十分灵活醒目。

《大公报》开设的许多特刊、副刊、周刊，丰富了报纸的内容，提高了报纸的品位。“星期论文”于1934年1月开办，此专栏延揽各界权威与名流发表论文，不论意见是否与报社相左，绝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参加“星期论文”写作的原是8人，随着这个栏目影响的扩大，到抗战前作者的队伍已扩大到36人，约170篇文章。“经济周刊”邀请南开大学的何廉教授编；“文艺副刊”邀请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编；“世界思潮”邀请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编；“社会问题”邀请北京大学梁漱溟教授编。当然也有少数副刊，由报社自己编辑，如1936年7月复刊的“科学副刊”。正是这些专栏和副刊的创设，使《大公报》的版面由最初的12版扩充为战前的16版，大大增加了信息量。

1936年，为纪念复刊十周年，报馆特举办科学、文艺两种奖学金，定名为“大公报科学奖金”及“大公报文艺奖金”，鼓励发展社会科学和文艺。鉴于《大公报》在中国新闻界的突出成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报纸。

新记《大公报》之所以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全国性的著名大报，除了因为其鲜明的办报特色外，它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新记《大公报》有一个较理想的领导班子，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被称做《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权、张季鸾的笔，再加上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顽强的事业心，是这张报纸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各具特长，吴鼎昌是个政客，有一定的资本，又善于理财，后勤工作很出色；胡政之不但有办报的经验，而且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张季鸾的文笔极佳，把握着言论大权。另外，三人对报纸的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十分勤勉。报纸刚复刊时，他们清早都去闹市了解报纸的零售情况，与读者交流意见，回报社后商量改进意见。胡政之每天上午要处理经理工作，下午参加编辑会议，晚上则商量社务，撰写分给自己的社评，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由上海去香港，筹备复刊《大公报》香港版，终因劳累过度，于4月24日昏倒在香港报馆的工作台上，不久就去世了。张季鸾负责言论和编辑工作，他每天下午要主持编辑会议，事无巨细都要认真安排，此外还要抽出大量时间会客访友，翻阅国内外报刊，以了解报界行情。晚上商量社务，然后才能处理重要新闻，审阅小样大样，为别人写的社评润色定稿或亲自写社评。他每夜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遇有重大问题，也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新记《大公报》重视人才，选贤任能。胡政之治社严格，用人谨慎，在报社中，几乎没有吴、胡、张的亲朋。吴鼎昌没有推荐过一个亲朋，胡政之仅有的一个同乡和张季鸾带来的曹谷冰、

张警吾，都是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还十分注意发现和选用人才，特别是重用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大公报》选用人才一般通过两个手段：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一是从别家报社挖掘。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参加报纸工作。后来成为名记者的范长江、萧乾、杨刚、彭子冈等人都曾参加过新记《大公报》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大公报》先后设立了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等，报社任命的各地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如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王芸生、王文彬等人，都是经过实践考验、能力很强的人。大公报社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人才济济，大大推动了事业的发展。

新记《大公报》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障报社按章办事。这里不但包括有约束报社高层领导的制度，而且还有《大公报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等面对全体职工的制度。另外，大公报还制定了较完善的职工福利制度，包括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费、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等。报社将职工的福利待遇同报馆的赢利联系起来，把报馆的部分盈余分发给职工，以鼓励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1937年8月4日被迫停刊，报馆随战局变化而迁徙上海、汉口、重庆等地，另一路去香港、桂林。因此便有了1936年4月1日创刊的上海版，1937年9月18日创刊的汉口版，1938年8月13日创刊的香港版，1938年12月1日创刊的重庆版，1941年3月15日创刊的桂林版。抗战胜利后，除保留了重庆馆，还陆续恢复上海、天津、香港三馆，总管理处设在上海。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大公报》天津版宣告停刊（后改以《进步日报》名义出版）。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人民所有，继续出版；1956年10月1日迁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大公报》在中国内地总计出版64年。香港《大公报》至今仍在继续出版。

第四节　国民党报刊和正中书局

一、国民党报刊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建立和发展了维护自身统治的新闻宣传机构，这就是以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为主干的“三位一体”的新闻宣传体系。在报纸出版方面，除各省市地方党部办的地方党报外，国民党中宣部直辖的报纸有：南京的《中央日报》，南昌的《扫荡报》，北平的《华北日报》，天津的《民国日报》，汉口的《武汉日报》，西安的《西京日报》等。下面重点介绍《中央日报》和《扫荡报》。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也是国民党报刊的网络中心。该报1926年冬创刊于广州，1927年2月移汉口发行，旋又移设上海。1928年，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遂于同年5月在南京创办《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兼任。由于《中央日报》是执政党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人力物力均较雄厚，业务发展较快。报纸由最初日出一大张发展到日出三大张，销量也由当初的几千份增至1935年的3万余份，跻身全国大报行列。同时《中央日报》还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并在贵州、成都、福建、安徽、广西、沈阳、长春等地设立地方版。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除宣传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报道国内外新闻外，还用相当篇幅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中央日报》仍在大力宣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因为《中央日报》歪曲报道事实，丑化学生，南下请愿的学生愤怒之下曾捣毁该报社。几十年后台湾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也不得不承认：“中报是国民党党报，它为政府发言，即使意见很正确，影响力确很有限。尤其是对抗日政策，得不到一般人的谅解。”[1] 抗战爆发后，

[1]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422页，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

《中央日报》因西迁于1937年12月一度停刊，1938年9月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6年5月1日发行《中央晚报》，同年7月恢复庐山分版。1947年5月30日起，《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国民党军事失利，《中央日报》迁往台湾。

《扫荡报》是国民党军报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发行和影响较广的一份报纸。一般军方报纸皆不对外发行，独《扫荡报》除外。该报于1932年6月在南昌创办，由国民党军委政治训练处处长贺衷寒主持，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而创办的。1935年5月《扫荡报》迁汉口，正式开始对社会发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扫荡报》将有关抗战的宣传放在了首位。1938年10月1日，该报重庆版创刊，同年10月25日，汉口版停刊，迁至桂林出版，直至1944年9月停刊。1943年10月1日又增出昆明版。1944年9月1日，《扫荡报》正式成立有限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和平日报》，于1945年11月12日同时在南京、汉口两地出版。同年，相继发行广州版、沈阳版、台湾版、海口版等。1949年，各地方版相继停刊，总社迁到台湾，并于4月23日复刊《和平日报》。7月1日恢复《扫荡报》原名，终因财力不足，于1950年7月7日停刊。除《扫荡报》外，各地的《党军日报》、《阵中日报》等也属国民党军报系统。

在期刊出版方面，有于1928年由国民党改组派创办的《夹攻》周刊，有汪精卫幕后操纵的《南华评论》，有戴季陶主持的《新亚细亚》等。另外，1930年，王平陵、钟天心、左慕等先后组织成立文艺社、开展社、流露社等文艺社团，出版发行了《中国文艺》、《文艺月刊》、《开展》、《流露》、《橄榄》、《长风》、《呢喃》、《寒松》、《幼稚周刊》、《青春》、《创作与批评》等刊物。这些刊物创刊时间集中、创作主题相似，都是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为宗旨，是货真价实的右翼刊物。

二、正中书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除了加强党办报刊外，也十分重视官书局的创立。这些官办书局，有1931年由陈立夫创办并自兼总经理的正中书局，有成立于1932年由国民党复兴社控制的拔提书店，有成立于1928年地址设在南京国府路大狮子巷的军用图书社，有成立于1932年6月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等。拔提书店主要以出版军事和法西斯主义书籍为主，1935年出版军事书籍达29种之多。而另一家官方出版社——军用图书社，军事书籍更是数量多、种类全，几乎涉及到军事学的所有领域。据统计，1935年该图书社出版军事类书籍289种，占全国同类图书出版总数的45%强。此外，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党政机关的出版物亦复不少，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行政院实业部、行政院内政部、行政院财政部、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铁道部、外交部等机构都出版了相关的期刊和图书，数量众多[1]。这里，我们重点介绍正中书局。

【1】有关情况参见《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199~203页。

正中书局于1931年10月10日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1933年，陈立夫将书局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并指派叶楚伧、陈立夫等为董事，吴敬恒等为监事，公推陈立夫为董事长，叶楚伧为出版委员长，指派吴秉常为总经理，从此正中书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扩大后的正中书局总局设于南京杨公井，设营业、编辑、印务三所，并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杭州等城市设有分局、发行所。1937年机构调整，设经理室、编审处、业务处，撤销出版委员会。由于受到官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扶持，正中书局的出版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在出版界立稳脚跟，并争得一席之地。正中书局在成立初期即自设印刷厂，1936年又接收上海新民印刷厂的机器筹设上海印刷厂；1937年将南京三民印务局并入，改称第一印刷厂；上海印刷厂改为第二印刷厂。抗战开始后，第一、第二印刷厂分别疏散、停工，第二年则将印刷机器迁运到重庆。

西迁重庆的正中书局业务有所发展，除重庆设的三个分局外，桂林、贵阳、宜昌、汉口等地亦先后设有分局，在昆明、广州等地设专员，继续开展华中和西南各省的教科书供应工作。因纸张、原料在香港进货价廉，1938年成立了香港办事处，就地印制再版图书，供应附近华南各地区的需要。因日机轰炸，正中书局的印刷设备曾迁至北碚的山洞里，靠人力手摇，维持了后方的书刊供应。此外，又在桂林、赣州和成都设立了分印所。1941年，为解决纸张短缺问题，收购嘉定兴蜀造纸厂，改名正中造纸厂，以稻草造纸。其后，该厂合并宜宾的中国造纸厂，以原有财物折价投资，以木浆造纸。另外，正中书局还开展多种经营，从1942年起自制文具。

抗战胜利后，正中书局复员南京，另在上海设分处，办理购纸及印销等业务，在全国的其他27家分支机构，也先后恢复了营业。战后，正中书局拥有四家印刷厂，即战后所接收的敌伪上海、北平、青岛印刷厂，以后分别改称为上海印刷厂、北平印刷厂、青岛印刷厂，连同重庆印刷厂共四个厂，一共拥有印刷机96台，每日的生产量达六百纸令，居当时同业中书版印刷的首位[1]，但复兴局面维持时间很短，因内战和经济崩溃，出版业务很快陷入萧条。1949年正中书局迁往台湾。

【1】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41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正中书局建立初期，以编辑出版中学教科书及课外读物为主，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出书范围逐渐扩大，学术专著、民众读物、儿童读物、字典等类图书开始相继出版，不少有关社会科学、教育与新生活运动等方面内容的丛书也先后问世。《当代名人传记丛书》、《国学丛书》、《童子军丛书》、《师范丛书》、《中国文艺社丛书》、《卫生教育丛书》、《正中科学知识丛书》、《外交丛书》、《时代丛书》、《国防教育丛书》等，都是在抗战前的短短三四年间编辑出版的。据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6年）》一文统计，1935年正中书局新出版物为139种，到1936年即剧增为392种[2]。出版物增长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在教科书出版上，正中书局凭借官书局的优势，成绩相当不

【2】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6页。

俗。据1937年《国立编译馆工作计划成绩报告》，当年1至9月正中书局先后送呈国立编译馆审查的教科书计达192种[1]。抗战前正中书局编印的初中、高中、师范、简易师范等各科教科书各两套，在教科书出版市场上，形成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五大书局并立的格局。

【1】转引自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25页。

抗战初期，正中书局适应形势的需要，编印出版了大量战时读物，如《中等学校特种教材防空篇》7种、《战时民众训练小丛书》10册、《抗战丛书》40册、《非常时期民众丛书》第1–4集共40册、《抗战事迹》全7册、《战时国民义务》全7册、《现代战争》、《战时的日本》、《战时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与青年训练》、《抗战与生活》等等。抗战期间，正中书局仍以出版教科书及参考读物、自然科学、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政要人著作为主。主要的出版物有：《大学国文选》、《大学英文选》、《欧美经济学史》、《相对论》、《国际私法纲要》、《书学》、《宋元学案》等。根据《正中书局抗战后出版图书总目》统计，截至1944年9月10日止，正中书局抗战期间出版各类图书636种[2]。战后几年，正中书局出书达千种。出版的图书，除大学用书、中小学教科书外，主要还有《思想与时代丛刊》、《社会科学丛刊》、《儿童科学读物丛书》、《生活修养与心理卫生丛书》、《地理知识丛书》等。出版的期刊有《中山半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

【2】《出版界》第1卷第8、9期，第30~42页。

第五节　开明书店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创立于1926年8月，创办人为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其前身为《新女性》杂志社。开明创建初期，资金缺乏，除章氏兄弟外，吴觉农、郑振铎、周建人等尽力襄助，共筹得资金5 000元；人员亦很少，一共不过四五个人。到了1928年，由夏丏尊、杜海生、丰子恺、吴仲盐、胡仲持等共同发起，将开明书

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5万元。1929年公司正式成立，1930年增资5万元，1931年增资10万元，1933年增资5万元，1936年增资5万元，共计股本30万元[1]。

【1】战前开明书店增资数次，但每次数额都不大，其中的原因，王知伊在《开明书店纪事》中总结了如下三条："一是开明的业务逐渐兴旺，原有资金已与发展中的业务不相适应。二是与开明友好的熟人，多数是知识分子，要集合较多的资金有困难，加之开明安守本业，不搞任何投机活动，金融周转不灵，更使经济困难。三是开明的主持者们都比较小心谨慎，故除抗战前一次增资10万元外，余均每次5万元。"增资中的一部分是作者版税所得，转为股金。这样做，既可节省流动资金，又充实了股本，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业务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壮大，编辑机构迁至虹口梧州路，发行所从宝山路迁至上海书业集中的望平街。1932年1月，又搬到福州路，成立门市部，与中华书局毗邻。1934年，总公司参照商务、中华的组织体系，设有3个处所、1个室、18个部、33个课和4个委员会，员工一百多人，俨然已是一家大书店。在当时的书业界，其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和大东，排行第五[2]，并在业界和读书界，享有良好的口碑。而这些，开明书店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在旧时书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其中有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人们去总结。比如说，凝练自身出版特色，追求出版物质量，注意培养编辑和作者队伍，讲究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追求从管理中求效益等等。

【2】当时的书局排名，主要以教科书的销量大小为参考依据。

开明书店作为一个后起的出版社，在大书局林立的情况下，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凝练自身的出版特色，把书刊出版的重点，集中在青少年读物、古籍图书和教科书等领域。据老开明人王知伊先生统计，开明的青少年读物数量约占开明出版物总数的3/4左右[3]。这是因为开明的主持人和编译著作人，不少是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江苏立达学园及江苏、浙江两省省立中学、师范的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了解青少年的心理[4]，出版青少年读物，正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开明的青少年读物，主要着力于两个方向的选题：其一是配合中小学各学科学习用的辅导性书籍；其二是新文艺小说。由青少年读物而到中小学教科书，既可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小书局进身为大书局必不可少的步骤和条件。开明从当初的活页文选开始，到后来全套的中小学教科书，做得有声有色。又由于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宋云彬等开明编辑，本身即是学者，国学根底深厚，当20世纪30年代古籍出版兴起热潮之时，开明同步出版了一些重要古

【3】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

【4】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76页。

籍和相关工具书，既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又不失行家编辑的本分。

正是开明人的文化人本色，使他们素来注重出版对社会的文化贡献，强调出版物质量，不苟且，不滑头。从开明的出版物目录中，几乎找不出一本不够“格”的书来，相反，一批又一批的好书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夏丏尊的译作《爱的教育》(图19) 和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是最畅销的两本书。开明的中小学课本经久不衰，发行量很大，还有新文学作品，如《子夜》、《家》、《春》、《秋》等，发行量也很大。古籍类图书中，《辞通》、《六十种曲》、《二十五史》及《二十五史补编》、《十三经索引》等十分引人注目。自然科学读物中，科普读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顾均正的《科学趣味》、郑贞文的《化学与我们》、周建人的《花鸟虫鱼》、陶秉珍的《植物的生活》、祝仲芳等的《昆虫的生活》、高士其的《细菌与人》、贾祖璋的《生物素描》、索非的《疾病图书馆》等。还翻译出版了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法布尔的《化学奇谈》、《家畜的故事》等等。尤其以创刊于1930年以中学生为对象的《中学生》杂志，影响很大，发行量最大时达2万册之多。当时很多青少年是在《中学生》(图20) 的陪伴下，度过他们的人生花季的。



图 19
夏丏尊译作《爱的教育》



图 20
《中学生》杂志

开明出版物质量高，是与它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十分宝贵的编辑和作者队伍有很大关系。开明最初聘请的赵景深、王蔼史、索非、夏丏尊、叶圣陶等几位，都是很有才干的人物。章锡琛非常注意从“文化人”朋友中物色人才，一旦发现他们有参加开明的意愿，便立即加以聘请。先后来开明或为开明做事的有胡愈之、钱经宇、周建人、孙伏园、谢六逸、

赵景深、刘权琴、刘薰宇、方光焘、丰子恺、夏衍、王伯祥、周予同、顾均正、徐调孚、宋云彬、傅彬然、贾祖璋、朱光潜、唐锡光、周振甫等。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开明书店能不遗余力提携无名作家和年轻作者，如在20世纪30年代尚无名气的黎锦明、罗黑芷、贺玉波等人的作品，都是开明首先为他们出版的。

开明人出书目的性十分明确，为了方便读者，他们千方百计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进行革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开明首创《开明活页文选》就是典型例子。当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大都由任课教师自己选定，由学校刻写油印成讲义分发给学生。刻写油印费时费力，又多错字脱句。章锡琛在中学当过国文教师，深知油印讲义的缺点，为此设计出版活页文选，广选历代名篇，从古文到白话文，各种文体俱备，校对精细，详加注释，行款清楚，根据选目配售，可代为装订成册。由于活页文选极便于教师们使用，因而在当时比商务、中华的课本，还要受到国文教师的欢迎[1]。正是活页文选的创新，为开明后来的教科书出版，开辟了一条新路。

开明的装帧设计、校对和标点，在当时都很有特色。钱君匋、丰子恺等大家为开明所设计装帧的图书，大胆创新，新颖别致，恰到好处，大开风气之先。而开明沿习已久、功效显著的"编校合一"工作制度[2]，增强了编校人员的责任心，培养和提高了编校人员的工作能力，既有利于消除编辑和校对人员的隔阂，又有利于出好书，快出书。在标点上，当时主持出版部的唐锡光，建议把原来直排书排在文字中间的标点符号，改排在文字的右下角，使读者看起来更舒服，后来开明版一直沿用，同行们称之为"开明标点"[3]。

开明书店精于管理，是有口皆碑的。在开明，有一支业务过硬，办事效率高，事业心强，认同开明目标，为开明发展着想的精干队伍。各部门头头都事必躬亲，认真管理，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开明认真吸取商务、中华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某些失误，竭力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支，尽量把资金用在生产和扩大再

【1】唐锡光：《开明的历程》，《我与开明》，29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2】开明的"编校合一"制度，是指编辑和校对的职责既"分"又"合"。"分"，是指编辑和校对的职责明确，分工清楚；"合"，是指编辑不仅要通读清样，同样也负有一部分校阅校样的责任，但他所看的校样，一般不是他责任编辑的书稿，而校对，有时候也会分一些书稿，请他们审读后提出初审意见，"编校合一"在机构设置上表现为编校人员合室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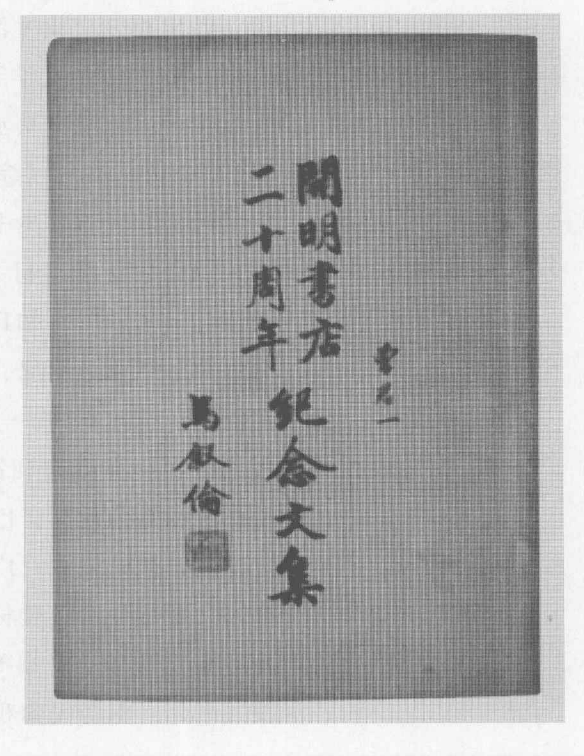
【3】吴世灯：《论"开明精神"》，《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417~424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生产方面。开明资本不雄厚，因此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如不去大规模建房买房，而是租房修缮，因陋就简；货运用手推车，不置汽车，必要时才租用卡车；不在外地广开分店，外地发行也多委托书业同业代销等。正是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使开明书店在竞争激烈的出版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八一三”炮火中，开明惨遭劫难，资产损失80%以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明同人没有气馁，相信“出版之业，实未穷途”[1]。1939年，《中学生》在桂林复刊，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由叶圣陶主编。1941年前后，范洗人、叶圣陶、章锡舟去内地寻求发展，先将开明总管理处设在桂林，然后立足于重庆分店，寻求复兴开明之路。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决定明确范洗人为开明的总经理，并重组董事会。抗战时期，在艰难的条件下，开明仍出版了不少新书，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胡绳的《二千年间》等，维持了《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两种刊物的出版，参加了教科书“七联”，重版了开明的教科书，为开明赚取了不少利润，增加了资金量。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下旬，在叶圣陶的率领下，开明在渝同人迁回上海，重整旗鼓，继续奋斗。2月下旬，召开特别业务会议，议定出版方针，编制营业概算，确定全国营业网。（图21）随后，在台湾、开封、南昌、福州、沈阳设立分店、办事处。开明的分店一度达到16个，比战前还增加了10个。然而，好景不长，接着三年内战，开明同大多数书局一样，陷入半死不活的尴尬局面中。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开明书店向国家提出公私合营，1954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

[1] 语出叶圣陶复夏丏尊、王伯祥函。转引自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

图21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二、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由吴朗西和伍禅发起在上海创办的。出版社创建时，巴金正寓居日本，但吴朗西等人认为，巴金是国内知名作家，拥有大量读者，且有做编辑的经验，便邀他回国主编《文化生活丛刊》。1935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正式问世，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随之对外宣告成立，其时社名为“文化生活社”。同年8月，巴金归国，便在昆明路德安里20号租得一间房屋，正式成立编辑部，业务全由巴金负责[1]。9月，出版社正式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

起初，文生社的书交由开明书店代为销售。1936年秋，随着业务量的增大，文生社在福州路436号大公报馆楼上自设营业部，内部人事也作了明确分工，吴朗西任总经理，负责资金的筹划，巴金任总编辑，主持业务，丽尼、伍禅则协助编务。此时的文生社，已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等三套系列丛书和一个文学刊物——《文丛》月刊[2]。到了1937年，文生社在接编以前三套丛书的基础上，又新增《新时代小说丛刊》、《战时经济丛书》、《综合史地丛书》、《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新艺术丛书》等五套丛书，业务蒸蒸日上，几乎二三天就有新书出版，重版书更是日日不断，月营业额高达万元。然而不久，“八一三”日军侵沪，如日中天的文生社业务几陷停顿，福州路的营业部被迫结束，丽尼、伍禅先后离社他去，只有巴金和陆圣泉苦撑残局，在此期间，一度与文学社、中流社、译文社、文季社联合出版了小型战时刊物——《呐喊》周刊，文生社承担其印刷与发行业务。为此事，巴金常去广州联络印刷事宜，不久即有文生社广州分社的设立。广州沦陷后，巴金等人往西南大后方谋求生路，文生社分别在桂林、重庆、成都三地先后设立办事处。文生社留在上海的陆圣泉等人，一方面于1938年6月在法租界霞飞路设门市部，出售先前积存下来的10万册图书，使资金回转；另一

【1】《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下文中未注明的史料均出自该文。

【2】《文丛》月刊，是由《文季月刊》而来。《文季月刊》创刊于1935年，巴金、靳以主编，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遭禁后，文生社为满足读者需要，毅然另创新刊《文丛》以替代，仍请靳以为主编。

方面则编辑出版《少年读物》半月刊和一套《少年读物小丛书》。因出售抗日书刊，陆圣泉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最后惨死在日本宪兵队狱中[1]。而辗转于西南各地的文生社同人，在艰难的条件下，一边重印旧书，一边出版新书。《呐喊小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剧作家选集丛书》、《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学小丛书》、《翻译小文库》等，都是抗战期间编印出来的。而当抗战终于取得胜利，文生社同大多数书店一样，复员上海，以前编印的丛书，赓续出版，组织上则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学家朱洗被推为董事长[2]，抗战后2集7本的《现代生物学丛书》就是由朱洗主编出版的。195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结束了它近二十年的历史。

【1】吴朗西：《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人和事——怀念陆圣泉》，《出版史料》第3辑，1984年。

【2】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15页。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文生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出版物的数量与大书局相比，自然不能算多，但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很大。作为一家风格独特的文学出版机构，它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生社诞生于文学出版的低落时期，它的创办，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的创作与出版，起到了振衰起敝的作用。抗战前的几年，一般性新书出版相当不景气，文学类图书尤其显得疲软。据王云五统计，1934年全国新出文学类图书不过796册，到了1935年更是少到491册[3]。当时文学书出版难的问题，文坛巨擘鲁迅先生有着切身感受。他在1934年12月两次写给作家孟十还的信中，均谈到出版话题："果戈理虽然古了，他的文才可真不错。……我想，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选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吃饭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4] "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5]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生社的诞生，显示出创办者不畏艰难、逆时而动的勇气，因而也赢得了鲁迅先生的支

【3】王云五：《一九三五年之出版界》，《出版周刊》第240号，1937年。

【4】《鲁迅书信集》(下卷)，6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5】《鲁迅书信集》(下卷)，676页。

持。《文化生活丛刊》刊出的第三本书，就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俄罗斯的童话》。从文生社后来出版的那么多有系统有计划的各类文学丛书、专集来看，它帮助现代文坛所实现的，可能还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一个平常的小梦”。著名作家、评论家荒煤这样评价文生社丛书之一种——《文学丛刊》：“这套‘丛刊’实际展示30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1] 想一想，一部丛书的贡献已是如此，而那么多丛书的合力，事实又当如何呢！

【1】荒煤：《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冬去春来》，14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其二，文生社在大家巴金的主持下，其唯文学艺术是举、包容百家的出书宗旨，使文生社的出版物，别具一种恢弘博大的非凡气度和穿越时空的历史生命力。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成立于1935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掺入流派之争。主持人巴金，虽在思想上接受安拉其主义，但在编辑上却遵循艺术的审美原则，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标准，作品不管东西南北，作家不论有名无名，唯艺术至上，兼收并蓄。文生社创作性质的大型丛书——《文学丛刊》，前后赓续出版10余年，统共印行了10集，每集16种，计160种。这160种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书信、电影文学脚本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涉及作家多达86位。其中既有鲁迅、茅盾、郑振铎、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文坛老将和当红名家，又多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初露头角和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个社团，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创作劲军，其规模之庞大，阵容之整齐，可谓极一时之盛。而译作性质的丛书——《文化生活丛刊》、《译文丛刊》等，则将世界文坛各个国家或古典或现代的名家名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这样一部部世界名著，果戈

里、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这样一批批世界作家，走进了广大中国读者心中。其意义和影响，不仅功在当时，也同样利在后世。

其三，作为一个同人性质的出版社，文生社所追求的出版理想，在多年的出版实践中凝结成一种精神，在近代出版史上尤具有典型性代表意义。文生社的创办者们，是几个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归国的青年留日学生。满腔的爱国热情，平实为社会做事的信念，以及有书不能出版的直接苦衷，促使他们自己办起了这么一家书店。书店的创立，给当时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这不仅因为这家新起的书店尽出些别家多视为畏途的文学新书，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同人书店真正做到了不以赚钱为目的。文生社同人在出版《文学丛刊》时这样宣告道：“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这绝不是一句书业界通常惯用的宣传口号，文生社在十多年的历史上，以图书质量高、定价低、装帧好，在读者中享有盛誉，而把读者和作家看作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更是主持人巴金一贯的风格和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从来就没有马虎过。文生社的君子们，原本是为了理想而事身出版，在文生社十多年的历史上，无论是总经理吴朗西，还是总编辑巴金，都是为文生社在作义务劳动，从来就没有从社中领过分文薪水。职工们所拿的工资，也十分微薄，仅够糊一张口而已[1]。这就是文生社君子们的做派。对此，巴金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2] 正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使文生社的同人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理想，并

[1] 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第3辑，1984年。

[2] 巴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转引自《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5页。

且为了贯彻这样的理想，忘我地工作着，精心地经营着这一方虽不很大却卓尔不群的出版天地。即便在战争这样大的困难面前，也依然不气馁，不失原方向，奋斗前进，坚持到底。所有这些，就像一个标识牌，为中国近代出版业树立了一种类型典范，载入于出版史册。

第六节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杂志公司

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由广东人伍联德集资创办的一家出版机构。公司从1925年7月15日正式开张到1946年五六月间宣告停业，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我国现代众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当中，算得上是历史比较悠久，影响也比较大的一家出版社。良友公司起初开展的业务是印刷，后来才从事书刊的出版。在民国出版史上，有先办出版再办印刷的出版社，有只办出版不办印刷的出版社，也有先办印刷后来才办出版的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则是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良友公司从当初的以印刷为主转向以出版为主，是与创办人伍联德开拓进取的精神分不开的。伍联德在创办良友之前，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三年的美术编辑。1924年，伍联德结识了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彬的夫人谭惠然女士，经她的担保和介绍，伍联德得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和三部价格十分优惠的印刷机，于是盘下了北四川路鸿庆坊的一间一楼一底石库门面，并从广州请来老同学余汉生，共同筹划印刷事业。对印刷原本外行的伍联德，在办印刷厂后，经过个人刻苦的学习与研究，居然很快成为专家。在专家把关之下的良友印刷所，印品质量口碑载道，生意一时间颇为兴隆[1]。但伍联德并不满足于此。受当时《伦敦新闻画报》等杂志的启发，伍联德计划在国内创办一份大型画报，以反映都市休闲生活与社会文化新闻为主要内容取向。这一想法，一方面缘于

【1】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他早年的美编经历，使得他对办画报一直情有独钟；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当时社会文化时尚的分析，觉得出版这样一份画报，将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尽管，公司同伙坚决反对，他本人也意识到其中的巨大风险，毕竟，这是一份国内前所未有的杂志，万一失算，会累及势头正在蒸蒸日上的印刷事业；但伍联德倔强的个性特点和勇于开拓的精神气质，使他敢做敢为。他对伙伴说，画报出版，若幸而成功，赚了钱归公；若果真赔了钱，全部本钱则由他一人承担。就这样，他单枪匹马，集稿编写，监督印刷，事事亲力亲为。1926年2月15日，在印刷所开办了7个月之后，一本连伍联德自己也承认是冒险的新型画报面世了[1]。画报取名为《良友画报》（图22），与公司的名字相一致。画报以它别具匠心的开本，图文并茂的形式，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了广大的阅读者，出版后，风行一时，行销海内外，取得了莫大的成功。正是这份画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当时的广大读者熟悉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名字，也正是这份画报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经营重点完成了从印刷向出版的转移，并由此跻身于当时的名社之林。（图23）

以《良友画报》的良好开端为基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首先在期刊出版领域开疆拓土，形成自己出版物的第一大特色。在

【1】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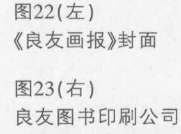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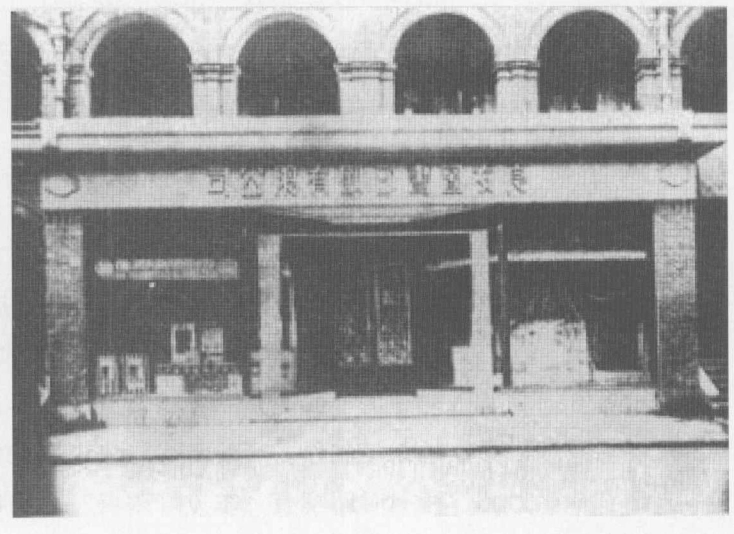


图22(左)
《良友画报》封面

图23(右)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良友画报》出版一年左右，良友公司便推出了《艺术界》、《现代妇女》、《体育世界》和《良友银星》等四种定期刊物。从名义上说，这四种刊物存世的历史都不算长，但实际上，却都以不同的刊名延续下去。例如《良友银星》后来成为《电影画报》；《现代妇女》后来改为《今代妇女》，最后成为《妇人画报》。除了《体育世界》时断时续以外，《艺术界》也演变为各种文艺期刊如《人间世》、《新小说》，以及昙花一现的《美术杂志》和《音乐杂志》等。《中国学生》、《健美月刊》、《小世界》等期刊在良友的期刊出版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良友公司出版的这些杂志，除了《美术杂志》和《音乐杂志》专业性强、读者面相对狭窄以外，绝大多数走的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期刊的路线。其中的不少刊物，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良友画报》，1929年的销量每期3万册[1]，1933年的销量更是达到4万册[2]，为全国少有的几个大销量月刊之一。《良友画报》的成功范式，吸引了众多的模仿者，从而在出版界引发了新一轮的画报出版风潮，《文华画报》、《现代画报》、《中华画报》、《时代画报》、《美术生活》、《大众画报》、《申报画报》和《新闻报画报》等相继而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良友画报》代表了一个画报出版的新时代，在画报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良友画报》总计出版了172期，抗战以后，迫于形势，出版时断时续。先后主持刊物的有伍联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等五位主编。在梁得所、马国亮任主编期间，刊物处于顶峰状态。而将刊物带入鼎盛的这两位得力干将，当时的年龄都不过二十来岁。这又得益于公司创办人伍联德的慧眼识英才。良友公司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老板伍联德知人善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良友画报》作为一种以反映都市休闲生活为主要内容取向的刊物，非常注意对新潮生活方式的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业开始勃兴，有外国影片的规模引进，也有国产影片的大量制作。当时上海豪华电影院的数量，居亚洲第一，使得上海一时间享有“东方好莱坞”的美称[3]。像电影这种新时尚，自

【1】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47页。

【2】《申报》，1933年2月2日。

【3】《上海通史·民国文化》，1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然是《良友画报》跟踪报道的重点，也是画报吸引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良友银星》更是良友公司专门为电影而设的一份电影杂志。出于编辑画报的需要，良友公司收集了许多中外电影明星们的彩色图片，而将这些图片印制出来，并大量出售，则可看成是良友公司在画报出版上的自然延伸。因为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也因为棋先一着的首创优势，这些图片出版后，受到了“追星族”读者的热烈欢迎。图片八开单张，每张售价二角，那时候一本普通刊物的售价也不过二角，获利之厚，可想而知。而良友公司销量更大、利润更高的，还是各种电影歌曲的翻印。二三十年代，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一些好莱坞歌舞片中的歌曲和国产电影中的插曲风靡一时，良友公司紧握时机，预先收罗到这些歌曲，翻印就绪，待电影放映时及时推出，借风而行船，销量之大，往往每天在一二百套以上。良友公司前后印行的图片100多种，各种歌曲600多种[1]。这些歌曲和图片，构成了良友出版物的第二大特色。

【1】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49~51页。

良友出版物的第三大块，则是各种文艺书籍的出版。主持良友文艺书籍出版的灵魂人物，是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编辑赵家璧。同梁得所、马国亮一样，赵家璧作为一名编辑新秀，也是由老板伍联德发现并推到出版前台的。在赵家璧之前，良友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文艺书籍，但大多零星不成系统。赵家璧担任良友文艺书籍出版部主任以后，大胆开拓丛书的配套选题，注重名家名稿的约写，先后为良友公司编辑出版了至今还为人称道的，包括有鲁迅、老舍、巴金、徐志摩等名人作品在内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图24）等。尤其是《中国新文学大系》，500万字选材，20万字导言，布面精装10大部，收集了中国新文学

图 24
《中国新文学大系》



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主要资料。全书由蔡元培作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在文艺各个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担任各集的编选。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这套丛书以它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依然被现今的出版社所重印。良友公司前后出版的文艺书籍，其数量不下120种，因为在1937年良友出版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书后，刊登了120种良友版文艺书籍的内容简介。

良友公司既没有教科图书，也没有儿童读物，出版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前面所说的三大块，是一家靠特色求生存求发展的出版机构。在良友公司史上，有几次招股融资活动。开创初期有两次，第一次为4万元，第二次为6万元[1]。1928年11月，良友又向社会公开招募股款10万元，共计1 000股，每股100元，其中400股向老股东定向募集，另外600股则向社会公开发售，从而将良友的股本扩大到20万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良友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到1931年，在公司创办7周年之际，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达到53.4万元，还在全国和海外设立了10家分公司。这年10月，良友公司又一次扩充资本，与前一次一样，招募股款的金额也是10万元[2]。经过这几次扩张，良友公司的经济实力得到大大加强。依此发展势头，公司原本有机会成为一个大企业，遗憾的是，公司内部拥有主权的几个主要人物，发生了阋墙之争，到1938年六七月份，公司三巨头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相互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并最终导致彼此间的分裂和公司的宣告破产。后来留在上海的职工，以赵家璧为首，找到了一些新的投资者，通过曲折的法律手续，接管了良友公司所有的产业，由陈炳洪任总经理，赵家璧任副经理兼任总编辑，重组良友并改名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39年2月1日，在上海复刊了《良友画报》[3]。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该月的26日，悍然闯进上海公共租界的日军，将良友复兴公司同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兄弟图书公司（即生活书店）和光明书店一起，以犯有抗日或为共产党宣传的罪名悉数查封，直到第二年2月1日才启

【1】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47页。

【2】《上海通史·民国文化》,200页。

【3】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283~287页。

封。1943年，良友复兴公司迁徙到桂林，后来桂林战情不稳，公司又迁移到重庆。在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赵家璧曾用土纸重印了一部分文艺作品。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赵家璧回到上海，他原想重整旗鼓，恢复良友的全部出版事业。不料事与愿违，1938年旧良友内讧的悲剧又在良友复兴公司内部重演。股东意见分歧，彼此难以合作。是年五六月间，良友再度宣告停业，从而结束了它二十余年的出版历史。

二、上海杂志公司

在近代书业活动中，杂志往往由书店兼卖。专门贩卖杂志的书店，在我国出现较晚。1934年5月张静庐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是开先河的第一家。

1933年底，任现代书局经理的张静庐，遭人算计，被排挤出局。老友沈松泉不愿意看到他消沉彷徨，邀他重返光华书局，协助其开展业务[1]。作为振兴光华的第一步，张静庐计划为书局另开一门市，专门销售杂志。就在张静庐落实了门市选址，谈定了租赁合同的时候，沈松泉却中途改变了计划，思之再三后，觉得专卖杂志胜算不大，想让张静庐把房屋退回，可租赁者偏又不肯通融。万般无奈之下，张静庐只好单起炉灶，将这个两头不要的门市自己接了下来[2]。

虽说张静庐"上海杂志公司"的招牌，挂得有点勉强和戏剧性，但他经营杂志的做法，却不失为一个深思熟虑的举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全国各行各业都因经济凋敝而普遍不景气时，书业自然也不能不跟着受到冲击。作为一个在书业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出版人，张静庐对当时书业形势的判断相当清醒。在他看来，"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标点书，杂志三项尚可存在"。学校用书需要大资本，他干不了；而标点书，他又不愿意干；剩下的只有杂志，他以为还可有所作为。因为，杂志以其价格的低廉，受到了购买力贫弱读者的欢迎，而市场需求反过来又拉动着出版生产，"一个月内近千种的杂志，每天平均二三十

【1】光华书局由张静庐、沈松泉、卢芳等三人于1925年合伙创办，后来卢芳、张静庐先后退出。光华书局则归沈松泉一人独有。1934年的光华，因经营不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已露出了衰退的迹象。

【2】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155~158页。下文中的史料，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释。

【1】沈松泉:《怀念张静庐先生》,《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

【2】当时,绝大部分杂志由各杂志出版社送到书店寄售,书款一般到月底结算,正是这样的时间差,使得杂志不需要什么本钱,就可以经营。

种出版”[1]，就在这种产销两旺的张力之间，他敏锐地意识到杂志专业销售的可能与商机；而另一方面，杂志贩卖本钱无多的便利条件[2]，也是当时经济困窘的他力所能及的现实选择。

1934年5月1日，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家专门贩卖杂志的书店开门营业了。狭小的门面，老板伙计一起三个工作人员，20元的创办费，居然大获成功。半年经营下来，竟赚了好几千元钱，“比较任何有历史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书店相差无几；有的更可以超过它。——专靠门市一部分零星贩卖的话”。对此，连张静庐本人也感到出乎意外。他事后总结为三个字的经验——快、齐、廉。所谓“快”，就是尽早让杂志与读者见面，力图做到杂志甫一出版，店里即有现货可卖，对于少量批零时间不同时的畅销杂志，如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良友》[3]，公司甚至不惜原价先零买进来，再九折贩卖出去。成本上固然小有损失，但“快”的信誉却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来。所谓“齐”，就是广事搜罗各种杂志，陈列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品种繁多的“杂志市场”，即便冷僻如天文学类的专业杂志，也以现金预订了好几种进来。商业上虽存在卖不出去的风险，但“齐”的口碑却在读者中传播开来。所谓“廉”，就是尽可能地让利给读者，采用两天生意一天做，多打折多销售的薄利多销方式。工作量上虽成倍增加，但“廉”的印象却在读者心中滋生开来。可以这么说，“快、齐、廉”，正是杂志这种载体不同于图书的一般特征体现在销售上的必然要求。上海杂志公司一开始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至今依然是杂志经营者们取胜的不二法门。

【3】当时良友图书公司有规定,《良友》每一期杂志出版后,先自己零售,三天后才对外批发。

有了这赚进来的几千元钱，加上朋友协助凑加了一些资本，公司在实业部呈请了注册登记，注册名为“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4]。注册后的公司出幽谷而迁乔木，从原来狭小的门面，搬到20世纪20年代初曾经出过风头的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四马路324号的红屋。其间，公司陆续新添了人手，新设了代办部，新增了业务内容——从原来单一的门市贩卖，扩展到“代订代办代理发行”。代订代办的范围，既有零星的邮购读者，也有外埠的

【4】沈松泉在回忆文章中竭力称夸这名字用得高明——高明在“无限”二字上。当时工商业登记法则有“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之分,张静庐有意选择后者而摒弃前者,正是利用一般人习惯上从字面理解,错误地以为“无限公司”即拥有资金无限,这样无形中即增加了对公司的信任。沈松泉:《怀念张静庐先生》。

贩卖同业。虽然代订代办这项业务本身，上海杂志公司算不上全国首创[1]，但公司向读者承诺“退定改定绝对自由”的大胆做法，却绝对是以前经营者们不曾有过的新举。原先的读者大凡订阅杂志，或订一年或订半年，时间上限制得很死，不容有商量的余地，更不谈中途退订或改订其他杂志了。而上海杂志公司却一改他人前规，明文告知读者，凡是上海杂志公司的订户，只要订阅时跟公司招呼一声，就可以成为有“退定改定自由”的“活期定户”。“活期定户”可以得到七个方面的“便利”：（1）随时可以退订——不拘任何理由，委托代订后的第二天起，即可随意退订；（2）随时可以换订——中途对于所订刊物不满意时，可以随时通知换订别种；（3）自由指定寄取——邮寄或自取，悉听读者自便；（4）自由决定订期——或一年半载，或三五八九个月，均无不可；（5）随意缴付定洋——读者手头不便时，不妨作分期付款，有钱时则自由补交；（6）全照原订价目——委托代订时，如适值原出版处举行特价半价，均照办理；（7）绝对负责保障——国内外任何杂志倘遇中途停刊，可凭公司代订单取回订洋[2]。有了这七条承诺，广大订户不仅“血本”无条件得到了保全，出版者所给予的“优惠”，也没有流失，手头短钱时，还可作多种变通处理，刊物质量出现退步或自我阅读兴趣发生转移时，更可以任意调换乃至退款。

公司既有承诺在先，实际中就不能不予以兑现，然而真要做起来，却不是件容易事。头绪纷繁自不用说，一旦读者地址突然发生变更，或者邮局投递出现失误，公司方面不仅承担了经济上的损失，有时还要背负着读者的误解。这样一种“任何大小书店里所不肯干的傻事”，公司却不厌其烦地认真做了下来。不为别的，张静庐说，只因他曾是个“十足的读者出身”，明白读者所尝到的种种痛苦。在公司的一则广告中，对读者订阅杂志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不便，作了这样的归纳：“在目前挣扎于生活鞭策下的人们，谁都不能预料未来的事。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除极少数庇荫于祖宗遗产下的公子哥儿外，像

【1】早在张静庐任现代书局经理期间，就曾在现代书局开展过代办代订业务。有关内容参见1934年3月8日《申报》上，现代书局刊登的《现代书局敬告全国各图书馆、杂志社、学校、书店公鉴》广告。

【2】上海杂志公司广告：《为什么需要活期定户，活期定户有什么利益》，《读书生活》1卷7期，1935年。

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们，在社会服务的薪给者，今天很安稳地过着，明天忽然失学了，失业了；或今天在本地学校，明天辍学了，或换一个地方一个学校了；今天在公司商店里做事，明天被辞退了，迁地就业了，或暂时离开了，旅行异地了。再进一步说，今天有钱预定杂志，明天失业，需要这一笔钱来换米买菜了。还有在预定时只看到一二期感觉满意，再看几期，或是刊物本身的不进步，或是读者思想的转变，不合脾胃而要退定。"[1] 广告中透析出来的悲悯情怀和实际中谋求改观的不懈努力，最终为公司赢得了多达数十万计的杂志订户。自然，公司没有也不会在服务中"白劳"，虽说单个订户利润十分微薄，但积少成多也是相当的可观。

【1】上海杂志公司广告：《为什么需要活期定户，活期定户有什么利益》，《读书生活》1卷7期，1935年。

公司有了钱，便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杂志销售，开始涉足于杂志的代理发行，进而自己出版杂志和图书。《大陆画报》、《大上海画报》、《健美》、《印象》、《东流文艺》、《皇后》、《电影世界》、《先路》、《健康生活》、《现代文艺》、《现象》、《生生月刊》等[2]，均在上海杂志公司的名义下，经销到全国。在代理发行杂志过程中，公司同样积累了许多至为宝贵的经验，张静庐后来把这些经验写成心得文字，附录在他的自传后头。在出版方面，张静庐原本是其中的行家里手，一直有志于做出一番大事业，而今公司规模初具，正是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上海杂志公司最先刊行的杂志是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接着又陆续刊印了《文艺画报》月刊、《青青电影》半月刊、《译文》月刊、《作家》月刊、《中流》半月刊、《自修大学》两周刊等其他刊物。其中的许多刊物，以名家主编，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3]。而在公司出版的图书中，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较受时人关注。该丛书的出版运作，充分演绎了杂志公司所固有的"杂志"元素，以"珍本大众化"——即在价格上一如杂志的低廉，和"丛书杂志化"——即在出版方式上一如杂志的定期连续[4]，作为向读者号召的两大主题，从而把图书出版和杂志业务有机联系和衔接起来。这样一种出版策略，从创意的角度而

【2】1934年11月18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上海杂志公司将迁新屋》的新闻。新闻内容中提到上海杂志公司代为发行的上述杂志名称。

【3】《译文》由黄源主编，《作家》由孟十还主编，《中流》由黎烈文主编，《自修大学》由平心主编。

【4】丛书规定，每周六出版一本，或诗词，或文曲，间隔调剂开来，其情形类似于定期出版而又口味错杂的周刊杂志。

言，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遗憾的是，由于当初计划做得不够严密，兼之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套丛书在编校质量上不尽如人意，只出版了计划中的第1辑，共50种。

从当初的门市销售到后来的代订代办，从代人发行到自己刊印，上海杂志公司做尽了杂志当中的每一项业务，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杂志公司。它对时代因素的准确把握和自觉适应，对读者需求的切身关怀和竭诚服务，对出版精神的正确理解和可贵坚持，是公司获得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上海杂志公司的崛起，开辟了杂志发行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群众杂志公司继其之后而起，形成了书业中过去不曾有过的新型形态，从而在出版史上凸现出了开先启后的历史意义。而与此同时，以上海杂志公司为代表的专业型杂志公司，其存在本身，即成为那个时代杂志畸形繁荣的一个有力见证。1934年上海杂志公司诞生的那一年，也因此被人作为“杂志年”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注释和标志性事件，写进了文化流变生生不已的历史史册。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各种本版和外版的杂志都一齐停刊。既无杂志可卖，杂志公司也就等于名存实亡。好在公司准备在先，提前发放川资打发走了部分工作人员，8月份的杂志也都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审慎地没有发稿，总算减少了部分损失。但总的来看，战争给公司造成的灾难还是十分巨大的。已做出名声的杂志销售和代理业务，因为邮路不通，几乎完全停摆，这种营业上的损失且不去说它，就是那些放给外地同业的客账，因战争阻隔而无法收回的，其数量也在五六万元以上。尽管如此，公司还是尽可能地坚持营业以减少损失。1938年春，公司从上海迁往汉口，后又徙转于长沙、桂林和重庆，并先后在广州、金华等地设立了12处分支机构。战争期间，公司出版的各种书刊数量在百种以上，其中以配合抗战宣传为内容的占大多数，如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抗战文艺》、刘群主编的《当代青年丛书》、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丛书、刘白羽著的《八路军七将领》、《游

击中间》、舒群著的《西线随征记》、姚雪垠著的《战地书简》、碧野著的《北方的原野》等，对鼓动和宣扬民族抗战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宣传作用。抗战胜利后，公司迁回上海，1951年，和几家书店组成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在公私合营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

第四章　民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1937—1949）

第一节　战争的打击与出版业的艰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进犯卢沟桥，打响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第一枪，中国驻军奋起抵抗，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了序幕。8月13日，日本海陆空三军大举攻击我上海守军，淞沪会战爆发。到这年底，抗战不到半年，华北危急，平津早已沦陷，沪战不利，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在这种大动荡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以北平、南京、天津为次中心的我国现代出版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抗战前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被彻底地遏制下来。日本侵华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

战争给予出版业的重创，首当其冲的是资财上的损失。这种损失，有被日军故意炸毁的，有被敌人强行劫掠的，有在转移和疏散中丢失损耗的。"八一三"事变中，"各家厂屋之在租界外者，多有损毁"[1]。那些原本本钱小、基础弱的小出版社和小印刷厂，不少从此陷入绝境，再无复出。对于那些大的出版和印刷机构来说，虽不至于到致命的地步，但房屋建筑、机器设备、书刊文具等有形资产的毁坏，从记录的材料来看，也是异常怵目惊心的。

[1]《十年来之报告》，2页，1948年3月28日中华书局股东常会。

八年抗战，战火随时局的变化而蔓延，出版业也一次次经历着浩劫。1938年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这一把火，使来不及撤走的长沙大小书局，绝大部分化为灰烬[1]。1944年春，湘桂战事爆发，衡阳动摇，桂林市当局下令撤退，被称为战时“出版城”的桂林出版业，苦于书籍笨重价廉，无法出高价租到车皮，把书运走。许多出版业者，只带走了纸型，城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存书，与桂林城一起同归于尽。而有能力抢运的出版业者，在撤退途中又遭遇了两次大劫。第一次是1944年7月间，柳州车站附近专堆托运书籍的仓库发生火灾，第二次是金城江火药库爆炸，祸及堆书的临时仓库。从桂林城中抢运出来的书刊，经过这两次大火，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安全到达重庆的，估计不到百分之一二[2]。

重庆作为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出版业集中地带。既为都城，便成为侵略者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重庆是中国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城市。1939年5月3、4日，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新华日报》印刷厂、编辑部、营业部被炸毁；《大公报》排字车间被掀翻；西南日报馆被荡平；新民报社和国民公报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都邮街的商务分馆被烧；白象街的商务货栈中弹，房屋被毁；冉家巷的生活书店总管理处，陷入火海包围；读书出版社新装修的门面房，成为一片瓦砾；广益书局的所有货物于1938年5月25日被敌机悉数炸毁，这个前后曾印行1 000多种图书的老牌书局，就此歇业[3]。

战争造成出版业的巨大创痛，绝不局限于资财等有形资产的损失，更为严重的创伤还在于营业的缩减和编辑出版生产力的下降。战争年代，物力维艰，许多读书人颠沛流离，购买力不济，单种图书的平均印数和销量，远不及战前。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图书市场也先后被敌人侵蚀。敌占区的图书营业情形，可谓萧条至极。有一组商务印书馆的统计数据，可有力地说明这一点。沦陷后的商务印书馆北平分

【1】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50页。

【2】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

【3】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374~37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馆，1938年1、2月份的营业额计7 950元，仅及战前同期的16%，减少了41 855元；天津分馆，1938年1、2月份的营业额计694元，仅及战前同期的1.47%，减少了42 056元；而保定分馆，则是几无营业可言[1]。中华书局在沦陷区的原有分支馆同样命运悲惨，停歇的停歇，没有停歇的北平、青岛、张家口、邢台、保定、太原等分馆，也只能以文具、仪器、古书、工具书等应市而已[2]，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能有什么作为呢？抗日的书刊断不给卖，一般的图书也往往会触犯日伪的禁忌，原来作为出版业大宗的中小学教科书，因日伪实行奴化政策，而被禁售或没收。另外，战时交通困难，运输力量不足，邮路常有不通，均给出版部门的营业，造成许多不便和无形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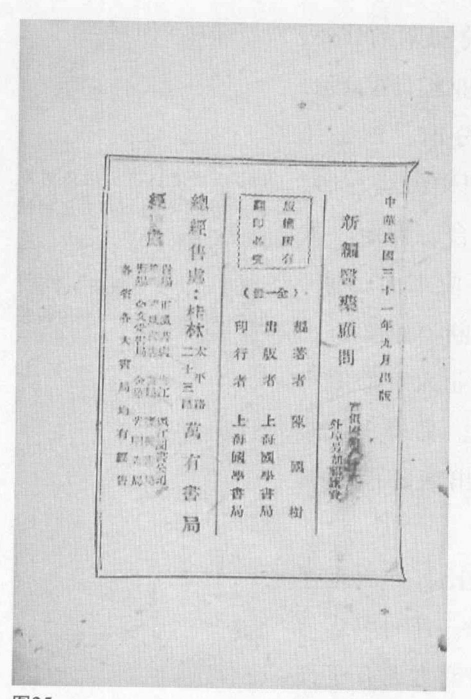
在编辑力量和印刷生产力方面，战时与战前相比，亦出现了相当大的倒退。战祸发生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大书局迫于形势，纷纷裁撤员工，许多训练有素的编辑离开了岗位。战前中华书局编辑所职员总数，有166人之多，“八一三”事变后，仅留少数人员保管文件，维持对外关系，其余均被解聘。193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依赖雄厚的编辑力量，共出版图书杂志约500册（种），总计字数2 800万字[3]。这样一种出版规模和速度，在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而大敌入侵之后编辑人员的不得已离去，其直接结果就是，许多期刊纷纷告停，出书数量随之锐减。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中华书局的《新中华》、《中华教育界》、《小朋友》，开明书店的《中学生》等这样一些在战前非常有影响的期刊，就是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宣告停刊的，而且一停就是好几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日出新书已达3.33册（种），而自“八一三”后，商务则告诉读者“自十月一日起，每日暂出版新书一种”，缩减到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到1942年以后，就连旧书重印加在一起，商务也达不到“日出一种”的地步了[4]。在出书结构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中华、世界在注重出版中小学课本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一般图书和学术著作的

[1] 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53页。

[2]《十年来之报告》，2页，1948年3月28日中华书局股东常会。

[3]《十年来之报告》，2页，1948年3月28日中华书局股东常会。

[4] 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59~167页。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新編醫藥顧問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一冊）

編著者 陳國樹

出版者 上海國學書局

印行者 上海國學書局

總經售處：桂林太平路二十三號 萬有書局

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图25
桂林出版的土纸本

出版，到了抗战这一非常时期，书局经营者从销量考虑，大量缩减了一般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这样一种出书结构的调整，从文化发展的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战争迫使中国出版业向大后方转移。在后方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出版业，面临着后方印刷水平落后、印刷力量不足的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后方的出版造货，主要依赖上海“孤岛”和香港。出版者宁愿舍近求远，不避千里路遥，将书稿或纸型送往上海和香港印刷，然后又将堆头笨重、运费高昂的图书，不无危险地运回内地销售，反映了大后方印刷能力之薄弱和出版人的无奈。原本基础很差的大后方印刷业，抗战开始后虽慢慢得到发展，但跟上海和香港相比，依然显得印刷价格既高，质量又不好。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昔日的造货基地上海和香港先后沦陷，国外进口的纸张来路又随之断绝，大后方的印刷用纸和机器材料顿时紧张起来。在抗战后期，纸张甚至实行配给制，当地的土纸也派上了大用场。为了节约，版面尽可能细密，文字印在又黄又脆的土纸上，往往模糊不清。当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翻看到那个时期印制的粗劣如此的出版物时，确能深刻体味到战争打击之下出版业的艰难。（图25）对那个时期那种条件下，出版人所作的文化努力，亦不难生出由衷的敬意。

第二节 战时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

当“七七”事变发生时，上海的一些出版者，就预感到战争有祸及东南沿海的危险，一方面向政府建议，希望政府协助上海的印刷工厂内迁；另一方面则未雨绸缪，着手进行紧急的财产处置，以应不测。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租界中区，租赁了临时厂房和

仓库，把在华界和租界东区工厂内的机器、材料、纸张和书籍等，迅速地进行了安全转移[1]。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也"告诫员工，及时准备，应付时艰，先将应造之货，限期完成，分运各处，以免日后货源之枯竭"[2]，另又将位于上海租界澳门路的印刷总厂，与美国人沃特生商妥，改为合资之永宁公司，试图打着美国人的牌子，藉资掩护。

面对战争的巨大威胁，出版者在自保财产的同时，有关今后出版生产的调配与安排，也在积极重新布置。1937年11月2日，中华书局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昆明，原上海总办事处改组为"驻沪办事处"。总经理陆费逵本人亲自前往香港，居中策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沪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向商务董事会提请建议，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内迁，打算以长沙为出版重心[3]，并在重庆、昆明、桂林、赣县、西安各设一工厂，分区印刷供应教科参考书籍。他亦于1937年11月离开上海到香港，着手扩充港厂，添置机器，建造仓库，接着，又身往长沙，亲自督促建厂工作[4]。商务、中华这两家全国最大书局上海总管理处的先后撤销，表明了昔日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已不再可能继续是全国出版中枢。离开原来的大本营退守于内地，是出版业适应战时环境所作的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也是出版文化人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之所在。上海其他的大、中、小书局，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美华书局、儿童书局、黎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多家，或者与商务、中华一样，将指挥机关——总管理处移至他处，或者全部撤离了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战前为出版次中心地区的情况，也大致与上海相似，除了歇业和被接管的外，余者大多迁往战争后方。

大敌当前出版业主要力量的集体性大迁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然而究竟迁往何处，一时则难有定所。战争形势变幻莫测，出版人只能是见机行事。从抗战期间出版业迁徙的路线和过

【1】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33页。

【2】《十年来之报告》，2页，1948年3月28日中华书局股东常会。

【3】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后来并没有迁往预先的目的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商务、中华的中枢在香港，香港沦陷后，两家都把总管理处迁往陪都重庆。

【4】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33页。

程来看，确也呈现着出版据点分散不一、出版机构游移频繁的特点。在抗战初期，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出版业，一时间十分繁荣，重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出版业，亦显露出过去未有的新气象。而到了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则成为大后方出版业的集中地带，恩施、邵阳、蓝田、衡阳、耒阳、贵阳、曲江、上饶、泰和、赣州、金华、丽水、永安等若干中小城市，亦相继跃为一省或数省出版发行的新兴据点。与战前出版业主要集中在沪、宁、平、津等大城市，尤其是主要汇聚于上海的这样一种出版格局相比，战时大后方的出版据点，显得要分散了许多，不稳定了许多。抗战伊始，武汉因为是国民党大部分党军政机关的迁移之所，长沙因为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广州因为是沟通海外的主要枢纽，天时与地利的结合，一时间凸显了各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期。尤其是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更是当时全国出版机构最为云集、出版事业最为繁荣的地方，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共有57家出版社在此地出版书刊，计出新书总数550余种，期刊超过100种，鼎盛时更达180种[1]。而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华中、华南战事的告急，三大城市先后沦陷，刚刚兴起的出版繁华，也顿成明日黄花。桂林的情形也大致类似，只不过出版繁荣期较之武汉、广州，相对长一些而已。

【1】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4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战时出版机构的行止，要说有什么流动的规律，大概可以说出版人往往从主观上，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相对而言文化基础较好，交通较为便利，尤其是政府教育机关和文化人汇聚的地方，作为发展基地。重庆和桂林，就因为上述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越，而跃升为大后方出版业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重庆原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出版历史较为悠久，木刻雕版印刷早已有之，兴办近代报刊，亦开全川风气之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重庆，据1935年的统计，已有较大的印刷局17家，大小书店40余家。这固然难以与当时出版业发达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相提并论，但对于落后的西南地区而言，却居于先进者的前列。抗日战

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促进了重庆出版业的雄飞，特别是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更是盛极一时，一举取代了昔日的上海和战初的武汉，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仅从1942年和1943年两个年度全国十三区的出版统计数字中，即可见一斑。见下表[1]。

【1】数据来源：苏朝纲：《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出版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科目 年代	印刷厂数量			书店数量			图书数量			期刊数量		
	重庆	全国	百分比	重庆	全国	百分比	重庆	全国	百分比	重庆	全国	百分比
1942	131	1311	10%	145	1286	11%	1292	3879	33.3%	220	776	28.4%
1943	225	709	31.7%	149	629	23.7%	1642	4408	37.3%	250	786	31.8%

同重庆一样，桂林也称得上是历史文化名城。抗战时期，桂林是广西省的省会，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政治中心。桂系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桂林出版业一时称雄（图26、图27）。赵家璧——当时桂林出版人之一，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2]：

【2】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出版的部分图书

图 26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出版的部分图书



图 27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出版的期刊

在一横一直的两条马路上，像样的店铺不下一千家，大小书店却占去了百分之五。假如把没有铺面的出版社计算在内，出版业的单位在百数以上。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遍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出版物中不免有不少剪剪贴贴的东西，大部都是正当的读物。

发行的网线，也遍及全国，以桂林为出发点，沿湘桂、粤汉铁路可以销到长沙、曲江；从耒阳转交公路，可发至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利用西路公路，桂林的书先运到贵阳，再由贵阳分运昆明、重庆。重庆市场可以消化桂林书刊的半数。再由重庆西发成都，北发西安、兰州。桂林的四张报纸，广告收入有四分之一是出版业的新书广告。桂林的酒菜业，也以出版业视作最大的主顾。当地百业中以出版业为最活跃。广西的地方当局也给予出版业相当的鼓励和帮助。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桂林出版业如此发达，个中原因，赵家璧亦在文中作了分析：第一，广东、湖南、江西生产的大量土纸，质地较好，因铁路、公路的便利，运费不高，售价较低；第二，从汉口、长沙撤退的印刷所，大半没有去重庆而来了桂林，使这里的印刷条件较

好；第三，桂林是西南公路铁路交通的中心，运输交通迅速方便。最后，赵家璧特别予以强调的，也是他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由于从上海、香港内撤的文化人，大都居留于桂林，使这里的出版文化环境优越。确实，桂林出版业的发达，与这个地方文化荟萃，人才济济大有关系。广州、武汉沦陷以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的广东等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辗转内迁。有人统计，抗战期间，先后来到桂林的文化人达千名以上，其中著名者有郭沫若、李四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邵荃麟、陶行知、胡愈之、徐悲鸿、黄新波、杨东莼、张曙、千家驹、邹韬奋等人[1]。

考之抗战期间兴起的出版新据点，哪一个又不是因为文化人的一时汇集，而催发本地书业繁荣的呢？昆明，这个边陲城市，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中法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接踵而至，昔日文化落后的面貌便为之焕然一新，出版业亦因之而勃兴。湖南的蓝田镇，由于长沙多所中学的陆续迁入，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学校区，使得这个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由原来的几家图书纸张印刷店，猛增至书局书店24家，期刊18家。恩施、邵阳、曲江、金华、丽水、永安等地，是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战时省会之所在，各省文化人一时云集，出版业便雨露春风，适时而起。与书为伍的文化人，需要出版业为他们供应精神食粮，需要出版业为他们印行书刊著作；同样，以书为业的出版者，亦仰仗于文化人为他们作文章的著述，依赖于文化人为他们作市场的购买，出版业与文化人的关系，是鱼水相连、兴衰与共的关系，和平年代沪、宁、平、津的出版业是这样，战时大后方的出版业亦复如此。

战时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具有十分深远的出版历史意义。它保存了中国出版业的有生力量，使其在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得以保持文化的一方阵地，保证了战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精神食粮的供应，对鼓吹抗日救亡，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而出版业的内迁，也促使和帮助了原本较

[1] 李名魁：《建国前的广西书业界》，《书店工作史料》（第三辑），365页，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为落后的大后方文化事业，包括书刊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各地区的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第三节　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抗战期间，饱受战争重创而迁徙到内地的中国出版业，在至艰至苦的条件下艰难复兴与重建，屡仆屡起，显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从规模和实力而论，战时的中国出版业，由于日寇的破坏和战争的恶劣环境，确实较战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但就出版精神而言，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仁人志士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含辛茹苦，弦歌不绝，表现了为文化而奋斗的豪迈气概。八年中，大后方出版图书22 552种，出版期刊2 000余种[1]。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出版机构游移无定，出版物市场又局限于内陆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种出版成绩，确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1】图书出版数字，根据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得出。期刊出版数字，根据有关省市期刊出版情况调查统计得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369~3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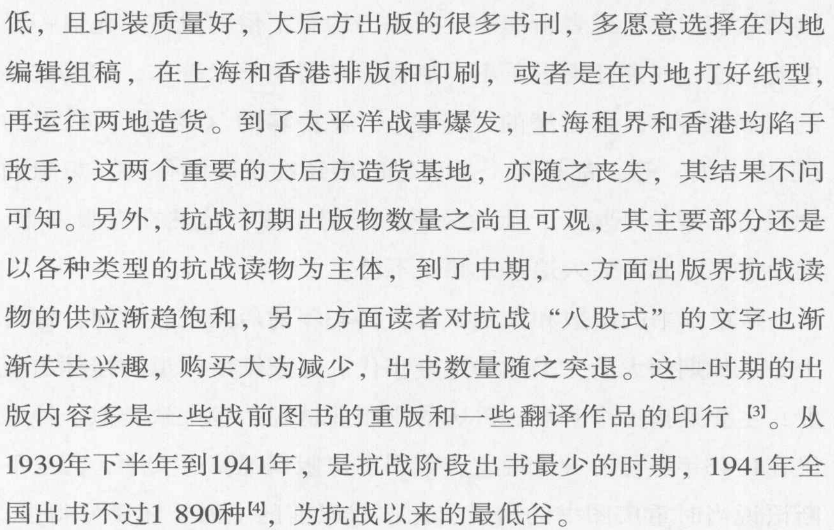
战争风云变幻，大后方出版业深受时局的影响，出版物内容和数量，波动起伏，呈现阶段性特征。战争伊始，抗战的气氛弥漫大地，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在突如其来的战争面前，人们同仇敌忾，情绪高涨，对各种抗战读物有着普遍的需求，不同流派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和音乐家，亦受到时代的感召，创作出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形式多样的通俗文艺作品。(图28) 在此情况下，各种抗战期刊风起云涌，各种抗战丛书应运而生。从这一时期出版的众多带有"抗战"、"抗敌"、"战时"、"战地"、"血路"、"救亡"、"反攻"、"反侵略"等字眼的刊名和丛书名中，不难体会到战争阴云笼罩下，人们开展救亡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昂扬斗志与澎湃激情。各种抗战书刊，或者分析国内外时事发表述评；或者介绍战争知识指导救亡；或者报道各地救亡工作现实，沟通前线后方生活与动态；或者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真面目，拟议对敌工作方案和办法；或者歌颂抗日先进，介绍浴血抗战事迹，



图28
1937年8月26日第三号《抗战三日刊》上刊登的蔡若虹绘的抗战漫画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刊载军政要人抗战言论，宣传团结抗战，提高民族意识。尽管各书刊对救亡的说法和主张有所不同，但坚持抗日、共同对敌的主旨却基本一致。

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底，全国一共出版书刊10 014种[1]，两年多时间，才一万出头的书刊数量，较之战前，当然大为不及，因为仅1936年一年，全国出书种数就达9 438种[2]，但相比于抗战中期，却是远远胜出。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抗战之初，大后方的出版业尚可利用上海“孤岛”和香港，作为出版造货基地，由于两地纸价便宜，印刷成本较低，且印装质量好，大后方出版的很多书刊，多愿意选择在内地编辑组稿，在上海和香港排版和印刷，或者是在内地打好纸型，再运往两地造货。到了太平洋战事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均陷于敌手，这两个重要的大后方造货基地，亦随之丧失，其结果不问可知。另外，抗战初期出版物数量之尚且可观，其主要部分还是以各种类型的抗战读物为主体，到了中期，一方面出版界抗战读物的供应渐趋饱和，另一方面读者对抗战“八股式”的文字也渐渐失去兴趣，购买大为减少，出书数量随之突退。这一时期的出版内容多是一些战前图书的重版和一些翻译作品的印行[3]。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是抗战阶段出书最少的时期，1941年全国出书不过1 890种[4]，为抗战以来的最低谷。



到了1942年，出版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1942年全年出书3 879种，1943年出书4 408种[5]，较之1941年增长了二三倍。这一时期，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从出版物的内容与品种结构上看，基本上恢复了常规性的出版状态。抗战初期，抗战读物盛行一时，占据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而当人们激情

【1】项英杰：《出版业之发展及均衡分布论》，《出版界月刊》1卷4期，1944年。此一万余种出版物，是全国性的数字，不全是大后方出版的。

【2】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26页。

【3】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116页。

【4】《出版界月刊》1卷6、7期中的统计，1944年。

【5】《出版界月刊》1卷6、7期中的统计，1944年。

消退，维系于斯的出版业，便与之一起萧条。可以这么说，1942年前的出版，在突如其来的战争大变局面前，是一种非常态性的出版。然而，当经过短暂的不适应和萧条期之后，1942年以后的大后方出版业，则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定位。有关文艺方面的读物，有关时事与国际形势的图书，有关学术及理论著作，有关教育的书籍及儿童读物，都出现在全国出版中心——重庆的出版物品种结构之中。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那些长篇的文艺作品，那些翻译的世界名著，在抗战前期相当少见，而到了1942年，“都大本大本的出版了”[1]，表明1942年以后全国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尽管印制水平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大不如以前。这一时期，国定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陆续编印，各大书局自编的教材和教辅读物继续发行，以政府力量组织和完成的“部定大学用书”，出版了三十多种，其他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文通书局等编印的“大学丛书”“大学用书”，或者赓续战前旧事，或者新起炉灶开张，均有不俗的成绩。尤值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面世了不少堪称为名著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在重印的作品。想想如此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无论是学术还是出版，依然在克服困难，向前进步，真令后人追慕并感慨不已。

【1】钟宪民:《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出版界月刊》1卷1期,1943年。

从单本书的印数和销量来看，1943年前后两三年时间，称得上是抗战期间大后方书业的黄金年代。赵家璧所称道的桂林出版业，主要是指这个时期。重庆的出版业情况，也大致类似。钟宪民在1943年底写的《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一文中，甚至下断语说当时重庆图书的销量，比抗战以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每一种新书出版，为时不久就难得再买了。这说明了图书需要量的增加，也说明了文化生活的普遍地提高。”当然，这两年的出书结构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文艺读物的比例过大，而科技图书的比例却又过小，文艺图书中还有不少是低水准的读物，翻印的旧小说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都曾受到时人尖

锐的批评[1]。不过，出版物比例过大过小的失调现象，也是战前出版业同样存在的问题。这似乎更能说明这一时期出版的常态性特征。

[1] 有关文字参见《出版界月刊》上的文章。

这一时期的书业界，还有一点需要被特别提到，那就是书业间的联合现象。先是1943年4月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的成立，简称“七联处”，后有1943年12月“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挂牌。“七联处”的成立，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推行国定本教科书而采取的新举措，指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单位，专门承担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的排印运销任务。各家的资历和资金情况不同，所承担供应的份额亦不一样，协商分配的结果是，正中、商务、中华各23%，世界12%，大东8%，开明7%，文通4%。“七联处”在组织上设立监事会，总处设在重庆，后来为了印刷运输的方便，又分别在成都、贵阳、衡阳、永安设立了四个印运站。“七联处”的成立，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官方行为，联合的范围也仅局限于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制与发行；而“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成立，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行动，其联合的范围也宽泛得多。由于参加“七联”的单位，可以得到政府的平价纸张、印刷费限价和银行低息贷款等优惠条件，而“七联”之外的许多中小民营出版社——习惯上称为新出版业，则被排除在照顾之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争取一份公平，中小出版业走向了联合，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最初的发起单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五十年代出版社、华中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群益出版社、国讯书店、峨嵋出版社、教育书店等13家，后来又陆续有书店参加进来，到抗战胜利时，股东单位达33家。“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下各书店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重庆和成都分别设立了第一联营书店和第二联营书店，在西安开设特约分店，联合销售图书，联合刊登广告，编印联合书目，联合争取出版利益，共同开展反压迫运动等[2]。这

[2] 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252~258页。

样一种书业间的联合与协作现象，为战前所没有，体现着书业的进步。

1942年前后的书业黄金时代，维持时间也不长，到了1944年，物价飞涨起来，社会购买力普遍出现低落，书刊作为非物质消费品，最易受到打击。据1944年5月13日重庆《大公报》所载的消息称：重庆市书业以淡月将届，门市冷落，外埠欠款不易归还，多半已停印新书，并停止向外批发。1944年5月29日《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一则桂林市的出版消息云：向称文化城的桂林，近来文化事业已经非常衰落，一年前的情形是每月新书，总是四十多种，如今只剩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了。从前每种出版新书，第一版总要印三千本以上，如今最多只印一千五百本。物价高涨，成本抬高，资金枯竭，购买力低，运输困难，邮资过重，捐税负担，以及出版审查过严等等，使抗战胜利前的出版界气息奄奄，勉强挣扎着。

总体而言，抗战八年中的大后方出版业，其历程是一波三折。出版人在载沉载浮的动荡中，坚持出版文化事业，坚持为抗战和建国服务。这是大后方出版业的主旋律。这里有外地迁入的老出版机构，也有新近兴建的新出版机构。新老力量的汇合，谱写了一曲共同反抗敌人侵略、斗志昂扬的出版战歌。抗战八年，也是国共两党关系时好时坏的八年，在两股政治力量面前，出版人在立场上常有各自的倾斜，表现为出版物政治上的倾向性。战前国民党政府就已实行的出版审查制度，到了抗战时期依然继续着，其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出版物被禁售，一些书店遭到查封，其间所交织的矛盾与斗争，同样贯穿着大后方出版过程的始终。

第四节　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长达14年时间里，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先后被日军占领。

敌占区的出版业，特别是昔日书业发达的沪、宁、平、津地区，在遭日寇劫掠和破坏之后，又被日伪接管和控制，异化为一段扭曲和畸变的区域出版史。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长期占领中国的卑鄙目的，将军事侵略和文化奴役，双管齐下。控制出版是日寇进行思想统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严禁任何稍具民族意识的书报刊的出版与传播，那些明显抗日、排日的出版物更是予以彻底肃清；另一方面则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所谓"建设新东亚"、"日本在中国无野心"、"神圣防共战"、"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以欺骗世界和中国人民。无论是前期的东北，还是后来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寇办的日、中文书报刊，都充当了文化侵略和舆论欺骗的急先锋。这些直接为其法西斯侵略张目的出版物，部分是在日本编印运到中国发售，部分则直接选择在沦陷区出版。有人作过统计，整个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涌入东北的日本报纸15余万份、杂志2.2万册、书籍4.9万多册[1]，日寇在沦陷区出版的报纸有198种、杂志有94种，大部分集中于平、津、京、沪等各大中心城市。在发行组织上，除了普遍设立书店、书摊、推销处外，还对不同区域采取硬派、散发、赠送、奖阅和伪装发行等多种发行形式，赤裸裸地实施其"大量制造"，即所谓"数量战胜质量"的出版发行政策[2]。

日寇除了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外，更多的还是间接利用傀儡政权做"代理人"，推行其丑恶的出版文化政策。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国民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一批傀儡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和控制下，先后在不同的沦陷区粉墨登场。一群寡耻鲜廉的无行文人和政客，自甘堕落，下水充当敌寇的爪牙。这些生于中华国土却为外族主子效劳的汉奸群丑，比日寇更懂得国人心理，更善于应用出版策略。过去"日本人的宣传方法非常拙笨，他们简直连苦药要加糖衣都不晓得，而是扯着耳朵灌你"的这样一种局面[3]，随着汪伪政权的上台，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汪伪国民政府中的汪

【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02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2】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233页。

【3】王达：《沦陷时期上海出版界之回忆》（上），《大公报》1947年10月23日。

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心人物，以前就熟悉出版，深谙出版对政治统治的作用，兼之当时日寇在战争形势渐次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调整了对华文化政策，从原来的“作战第一主义的宣传报导政策”，向“掌握民心”、“民心建设”、“新文化建设”的宣传政策转变，汪逆们顺从主子的旨意，想出种种卑鄙阴险的手段，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宣传和出版控制。在出版思想上，汪伪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先生15年前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口号[1]，把自己乔装成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使其“和平宣传”更具有理论色彩，同时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力；在出版体系上，从伪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一系列出版统制机构，如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国文化总会等，统管印刷机器设备及纸张的采购分配，统管各分区出版宣传业务的指导，统管书报刊的发行；在法律法规上，出台了《出版法》[2]、《中央书报发行所章程》、《中央报业经理处章程》和《著作权法》等一系列反动检查法规，极尽舆论钳制和奴化教育之能事。以上种种措施，表明汪伪政权在出版文化专制上，已实现了从组织到理论的体系化、理论化和法典化[3]。

其他傀儡政权的出版宣传手段，可能不及汪伪那么高明，但进行文化统制的实质，却没有什么两样。伪满的弘报处[4]，伪蒙疆的蒙疆新闻社，伪维新政府的宣传局，承担着各自区域内统制思想、文化、宣传、出版的总机关。严密出版统制之下的各沦陷区出版业，了无生机可言，闻见最多的是那些官宪和半官宪的报刊，受到傀儡政府直接或变相的资助，厚颜无耻地高唱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滥调。在“报销文化”的出版物之外，尚有一些无关现实政治的故纸堆类学术刊物和一些纯粹消遣性的文艺类书刊，这已是没有出版自由的敌占区出版业，仅存的一点可怜生存空间了。那些原本为各民营书局编印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已被敌伪接管而去，作为他们麻醉毒害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各沦陷区先后建立起来的多个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者在

【1】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真意，是希望亚洲各国人民以中日两国为核心，平等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与汪逆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中的霸主地位迥然不同。

【2】汪伪政府起草颁布的《出版法》，将审查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规定不经核准登记的新闻杂志不予刊行，并且在各重要城市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

【3】《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305页。

【4】1932年伪满洲国刚建立时，就在其“国务院”中设资政局，以控制舆论，1933年，又废资政局，设立情报处，1937年再将情报处扩充为弘报处。

妄图鲸吞整个中国的不良居心下，采用“分而治之”手段的产物。在政治手段上既“分而治之”，相应地，在文化上也就互不通声气[1]，因而各傀儡政权统辖下的出版业，呈现出两两之不同，东北与华北有别，华北与华中、华南又互异。相比较而言，日伪在东北的新闻出版管制较为顺手，华北的北平和天津次之，最为棘手的是华中和华南，特别是上海租界的“孤岛”和英属领地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乃为敌占区的罅隙之地，也是抗日出版活动的中心，敌寇一时鞭长莫及，令其最为头痛不已。

【1】芦曝：《北方文化思痛录》，《大公报》，1947年11月12日。

由于淞沪战事的强力破坏，以及大批出版机构的陆续内迁，上海的出版业不再像昔日那样，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尽管如此，由于得靠租界的庇护和上海特殊的经济环境及交通条件，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在沦陷区乃至全国，依然有着十分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上海出版物的数量，远远胜出沦陷区其他城市，出版物内容也相对大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租界“孤岛”里，活跃着一大批爱国出版工作者，他们出版的抗日书刊，传递抗战信息，宣传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抗日信念。像《中美周刊》、《正言周刊》、《华美周刊》、《正言文艺》、《文林》、《文综》、《奔流》、《文艺丛刊》、《上海周报》等这样一些鼓吹抗日的刊物，无异于插入敌伪胸膛的把把锋利匕首。像《鲁迅全集》（图29）、《资本论》(图30)、《西行漫记》这样一些在当时风行一时的译著，可看成是与敌伪反共宣传展开的面对面文化交锋。在“孤岛”上海，没有随众撤离的各书店出版工作人员，在总部总店迁走后，依然在上海的分部分店里，继续着旧书的重印和少量新书的出版，同时还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

图29
《鲁迅全集》20 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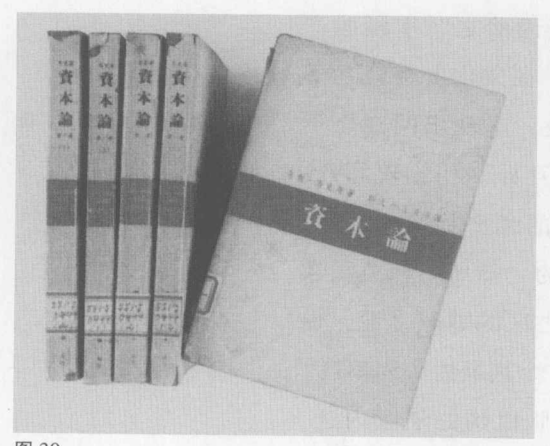


图 30
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

刷造货任务。因为“孤岛”期间的上海，较之于内地，印刷物资供应充足、印刷设备及技术条件优越，且价格又很低廉，兼之当时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尚未交恶，海上交通尚未中断，所以许多内地的抗日书刊，选择在上海印制，再通过海路辗转运送到全国各地。这对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发生在“孤岛”租界里的这些爱国出版活动，敌伪自然不会坐视不顾，一面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对爱国出版者进行威胁利诱与伺机迫害，一面在租界里大办御用报刊，与爱国出版直接唱对台戏，争夺出版文化宣传阵地。正是这些“领了津贴，出几百本，内容八股，译文不通者，比比皆是”[1]，加上“孤岛”中其他文化性的和营业性的报刊，一时间衬托出上海报刊出版的一度繁荣。

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侵入租界，所有抗战意识的报刊均强行叫停。1941年12月26日，日军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光明等8家出版企业，以抗日出版机关为名，悉数封门检查，后经整顿重新开业，各家也仅以存书应市而已。敌寇既已占领了租界，昔日的忌惮不再，便在出版管制上又重施其故伎来，先是发起成立“中国出版配给公司筹备委员会”，作为统制出版的机关[2]，后因商务等5家中国书局的“以拖为拒，筹而不办”[3]，在筹备一年后宣告流产，而另行产生了纯由中国出版商集资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该公司是在人为刀俎的情况下，于1943年6月1日成立起来的一个联合发行机构，主要以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五家大书局为骨干，除了出版《学术界》月刊外，发行了三年半一共七期教科书。

香港是位于华南的又一块政治飞地，就出版战略地位而言，正可与上海租界形成犄角和后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早在战前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在香港买地建厂，以应不

【1】杨素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245页。

【2】中国出版配给公司筹备委员会规定了5项任务：(1)统制中国一切出版物；(2)辅佐关系官厅之统制而与各学术文化团体联络，计划并指导一切出版事业；(3)统制出版物之一元的检查；(4)国定教科书之一元的配给；(4)与出版用纸统制机关联络而组织出版用纸的配给。

【3】曹冰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410页。

测，沪战发生后更是一度将总管理处迁移入港。抗战军兴，东北、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不甘做亡国奴，走马此地，共同促进和推动了香港出版业在战时的繁荣。华南沦陷以后，香港在沦陷区的重要性与上海“孤岛”一样突出，日寇虽然环伺于四周却又一时无可奈何，爱国出版者便见缝插针，把香港建成同上海“孤岛”一样的抗日出版绿洲，和同上海“孤岛”一样的大后方印刷造货基地。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一大批直接来自大后方的文化界、出版界人士，避祸于香港，掀起了香港第一次文化出版高潮[1]，直至1941年12月日军登陆香港，一时繁荣起来的香港出版业，才突然地沉寂下去。

在抗战时期的整个沦陷区出版业中，只有香港的出版，因缘际会地从落后变成了进步，可算是特殊条件下的个别例外，其他沦陷区的出版业，无不出现了极大的倒退，即便是有租界可以庇护的上海“孤岛”，亦难逃厄运。想想战前的上海，各大书局竞相出书，而沦陷以后，却由报社和杂志社充任了图书出版的主角，盛衰之判然，令时人有不胜今昔之感[2]。日寇的横行肆虐，扼杀了沦陷区出版业的勃勃生机。一批民族败类的为虎作伥，加剧了出版业的萧条冷落。然而，即便在这样肃杀的腥风血雨中，我们依然看到许多爱国文化人和出版者，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甚至直接以出版作武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策略性地与敌伪的反动宣传，进行秘密形式的，甚或是直接公开的斗争，上演着一场奴役与反奴役、控制与反控制的悲喜剧。

[1] 王仿子：《1937—1949年的香港出版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449页。

[2] 杨素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238~259页。

第五节　战后出版业的复员与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日夜盼望的抗战胜利终于到来了。经历着抗战播迁之苦长达8年之久的大后方出版业者，无不欢欣鼓舞，以为苦尽甘来，可以回返原地重建自己的事业。大后方出版界或者就地调整，精简改组，或者办理结束，买舟东下，开始了复员布建的工作。虽然复员的征途，因运

力严重不足，受尽辗转颠簸，但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先后到达目的地。沪、宁、平、津——战前的出版中心，战时的沦陷区域，战后因为各出版机构的纷纷回迁，而再度从沉寂中热闹起来。特别是上海，更成为战后出版业重建的首选之地，随迁而来的不光是那些老上海出版机构，还有一些在大后方新成立和新发展的异地书局书店，大后方出版业在战后的复员中，告别了它特殊时期的历史辉煌，渐渐趋于平淡。全国出版中心由西而东，再一次折回到战前的格局上来。

抗战结束了，和平到来了，以中国地域之大，以沦陷时间之久，以一般青年对于新知识渴求之深，出版者没有理由不深信，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天地广阔的出版春天。1945年9月30日，在世界形势的影响和出版文化界的共同努力下，国民政府公布了《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接着于第二年3月又宣布取消收复区新闻检查。这对于把出版审查视同紧箍咒的出版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确有史实表明，抗战胜利初期，全国各地，特别是收复区，乘着抗战胜利的激情，乘着审查放宽的机遇，出现了一个创办、复兴报刊的小小高潮。“根据战后一项全国新闻纸杂志的清查换证工作的统计，截止民国三十六年底，依法完成办理换证或新登记的新闻杂志，共计1 763种”[1]。当然，这个数字较战前1935年的2 735种[2]，还有不小的距离，但较战时1943年的574种[3]，已有很大的进步，表明报刊出版在此历史时期，确露出了点点复苏的迹象。

相对于报刊，此段时期图书的出版，却难说有什么起色。1946年全国出版图书1 461种，1947年出版图书1 569种[4]，这个数字甚至不及战时1942年的3 879种、1943年的4 408种的一半[5]，更难能与战前相提并论了。图书出版业的萎缩，真实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出版业复苏的艰难。报刊出版之所以还相对活跃，乃因它短平快的出版特性——信息快、容量大、周期短，迅速有效地适应了抗战结束初期几乎处于“知识真空”状态的广大沦陷区人们的文化需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抗战结束后活跃一

【1】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中华民国出版事业概况》，121页，台北，1989年，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154~156页。这些报刊各地区分布情形是这样的：465种系于上海出版，206种于南京出版，127种于广东出版，120种于北平出版，91种于重庆出版，78种于天津出版，63种于云南出版，54种于江西出版，51种于台湾出版，51种于湖北出版，46种于福建出版，44种于湖南出版，42种于浙江出版，42种于四川出版，36种于青岛出版，33种于河南出版，33种于贵州出版，33种于陕西出版，26种于江苏出版，22种于甘肃出版，19种于广西出版，17种于山西出版，17种系军方出版，15种于山东出版，10种于西康出版，9种于辽宁出版，8种于吉林出版，5种于绥远出版，4种于察哈尔出版，1种于热河出版，1种于河北出版，大连、宁夏、青海、新疆皆为0种。

上述统计，为官方数字，不包括中共控制区和中共军队的报刊数字。根据叶再生的统计，中共控制区的报刊数为：1945年8-12月为107种，1946年为212种，1947年为205种，1948年为235种，1949年1-9月为283种。

【2】许晚成：《一九三六年全国期刊统计表》中的注释【1】，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乙编》，424页。许晚成的统计数字不包括东三省和西康省。

【3】《三十二年度一至六月各省市刊行杂志分类统计表》，《出版界月刊》创刊号，1943年。此统计表只有期刊统计，不包括报纸。所统计的区域主要是大后方，沦陷区不包括在内。

【4】孔敏中：《民国三十六年度出版界之总检讨》，《图书展望》季刊，复刊第10期，1949年。

【5】《出版界月刊》1卷6、7期中的统计，1944年。

时的各政治力量团体，更多地选择报刊而不是图书，作为舆论宣传、扩大影响的阵地。图书出版只在1946年春有过短时期的好转，但很快就昙花一现了[1]。出版需要安宁的环境，而1946年下半年开始全面爆发的内战，使国内的出版大环境甚至不如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先以为光明一片最终却满目疮痍的出版人，在失望沮丧之余，甚至怀念起战时的桂林和重庆来[2]。

时局的不靖，造成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出版业的危机。出版业最重要的原料白报纸，在抗战胜利后初期，每令价仅1.5万元，但到1947年初，白报纸的价格上涨了100倍[3]，排印工的工资，涨幅更大，两者相加平均后，一共涨了206倍，而同期书价的上涨倍数却不及其1/3 [4]。通货膨胀一天高似一天，物价一日高过一日，在制成品的涨幅跟不上原料涨幅的情况下，重印旧书尚要仔细掂量其销路，倘若没有绝对把握，谁还敢冒险出版新书呢？至于大部头著作，战前各大出版机构凭借资金的雄厚纷纷予以刊印的情形，到了战后，仿佛已成天宝遗事，就连抗战时期都没有向国家贷款的商务印书馆，也过起了向银行借贷的日子。以前书店印书，纸张钱和排印费可以先向对方赊欠，等书销出去了再还款，而在战后一切都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昔日书业常规，统统地都变成了现款交易[5]，这无异于给原本资金苦短的民营出版业雪上加霜。内战蔓延，主要的铁路线时告阻断，书籍无法推销到外地，发行网随之狭窄。读者的购买力，更是在全国高喊的“反饥饿”声中，下降到冰点 [6]。既无钱印书，印出来又难卖出去，出版业的紧缩，便可想而知了。到了1948年，就连一度小有复兴的报刊出版，也开始在内战正酣的危机和国民党网禁又张的双重夹击下，出现大幅度滑坡和倒退。这一年自动告停的期刊中，就有坚持30多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到了1949年1月，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所有的期刊都不出了[7]。

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过四年多一点的时间。然而，这却是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四年，它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强烈突变和新旧政权的此消彼长，伴随着以国共两

【1】蓬子：《我看上海出版界》，《大公报》1947年3月16日。

【2】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

【3】白报纸价格飞涨，一方面是由于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限制白报纸进口的政策，限额输入的白报纸按官价实行计划分配，一般的民营出版机构得到官价白纸的份额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一些得到白报纸的机构，却囤积居奇以黑市高价出售，白报纸的价格因之越来越高。

【4】《中华教育界》(复刊）第2卷，1948年。

【5】蓬子：《我看上海出版界》。

【6】普通的一本书，当时卖价为三四万元，如《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则一本卖到98万元，相当于当时七斗米的市价。因为通货膨胀，书价每隔数天就上涨一次。当时书店为了方便卖书，出售时多采用定价乘以倍数的方式。这个日渐增加的倍数，就是书价上涨的幅度。

【7】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184页。

党为主要阵营的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彼此斗争，有军事上的兵戈相见，也有文化上的激烈交锋。出版作为文化的重要堡垒和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当初，国民党依靠执政党的有利条件，从抗战胜利的复员布建，到接收日伪的出版资财，到白报纸的配额比例，均给本党派系的新闻出版机构以优先和照顾，从而使其实力得以大大增强。直属国民党中央经营的中央日报报系，和分属于国民党地方党部主办的地方报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网络。以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国立编译馆为主力的党营出版机构，都在接收过程中得到了迅速扩充。

当国民党急匆匆在出版领域抢滩布阵的时候，共产党自然也不甘示弱。一贯十分重视宣传同时又善于利用策略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两个不同区域，既双管齐下，又分别对待。在国统区，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出版的层层封锁，中共采用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方式，或是乔装成民主党派的面貌，或是直接与民主党派合作，或是寻找背景大的头面人物合办，或是间接渗透到国民党人办的报刊中等多种办法，使国统区共产党的新闻出版业，在逆境中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解放区出版事业的日趋繁荣与国统区出版业的低迷衰落，恰成鲜明的对照，反映着国共两党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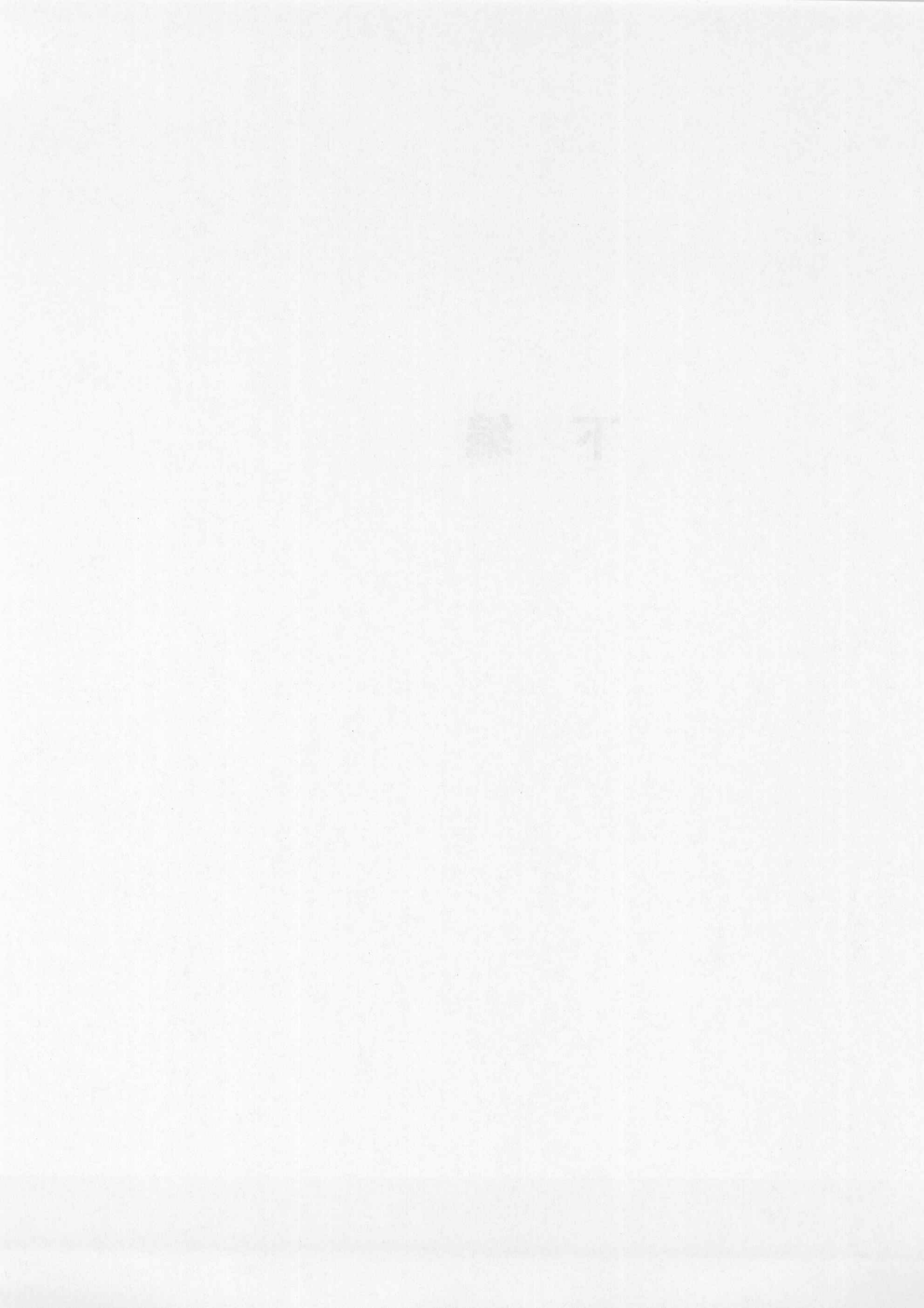
随着1946年下半年内战战火的日趋炽烈，国共之间的文化斗争也日益尖锐。从1946年底开始，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清查换证工作，对不合己意的书刊，在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时，多方推延和阻挠。这可视为一种变相的舆论控制。而战后重新修订的出版法，从表面文字看，确比以前的出版法要有所松动，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其中的许多条文，却成了钳制言论、查禁与取缔异党书刊的借口。1947年12月，国民政府更是发布了《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至1948年7月，中共领导和影响的报刊悉遭封禁。此时的国民党，完成了百姓缄口、舆论一律，但却也丧尽了民心、

孤立了自己。伴随着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最终走向了从大陆政权出局的结局，国统区的出版业也在查封和停刊声中，加剧了衰败的进程。

1947年6月30日，中共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次第展开。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5月25日，扎营上海。这样，沪、宁、平、津——中国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均被中共新政权所接管。对于接管后各城市的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制定有《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办法的指示》和《关于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指示》两个纲领性文件，依据新闻出版机构的政治背景和反共态度之不同，作出区别对待：属于国民党阵营或支持国民党的，予以没收；属于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予以保护，并令其向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属于民营及非官僚资本经营的，仍准继续营业，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与现政权相悖的科目[1]。新时代到来了，新政权带给出版界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规划和要求，中国出版业由此告别了相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出版模式和格局，走向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

【1】《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443~445页。

下　编



第五章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第一节　出版法律与法规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出版专律，制定于晚清时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虽然实施的时间短暂，不久便因清政府的寿终正寝而失去法律效力，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民国时期经历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制定《出版法》与《著作权法》时，都直接继承了它们的法律框架和主要的基本条款。为了简明，我们对民国时期的出版法律介绍，主要着眼于新更改的条款内容。

一、《出版法》

民国初建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不曾制定有出版方面的专门成文法律。清朝的《印刷物件专律》在民国成立后既已宣告无效，而新的出版法又未颁布。为了维持新闻出版事业的基本秩序，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通令报界共同遵守，大意为：一、报纸、杂志的出版业要事先注册登记，否则不准出版；二、用流言煽动群众妨害共和国体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发行人和编辑人要

坐以应得之罪；三、由于调查失实，损害个人名誉者，被害人可以要求其更正，否则可向法院申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处罚[1]。该报律公布后，全国报界俱进会即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表示反对，加上遗老遗少和一部分主张绝对民主和自由的人的反对，孙中山随即通知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

[1] 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5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袁世凯夺取权力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出版法规和书刊审查法令。其中的《出版法》正式公布于1914年12月4日。该《出版法》全文23条。第1–3条规定了“出版”、“出版之关系人”和“出版物应记载之条款”，之后规定，凡文书图书出版前，著作人、发行人以及印刷人，均应向该管警察官署禀报，写明姓名、籍贯、住址与发行、印刷时间以及印刷所名称。以学校、公司、局所、寺院、会所等名义出版的文书图画，由学校等单位禀报。非卖品由著作人或发行人禀报。第10条之后为不得出版之出版物、违反之惩罚处置办法、及实施方面的相关规定条款。其中第11条为关键性的一条，专述出版范围：

> 文书图画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

“二次革命”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继续大量出版反袁图书。袁世凯政府鞭长莫及于海外，便设法禁止它流入国内，于是便有第12条规定：“在外国发行之文书图画，违反前条各款者，不得在国内出售或散布。”第13、第15等条是对违反第11、第12两条的处置办法。第13条规定：“依第十一条禁止出版之文书图画，及依第十二条禁止出售或散布之文书图画，有出版或出售散布者，

该管警察署认为必要时，得没收其印本及其印版。”第15条规定：“凡属‘混淆政体’，‘妨害治安’”的出版物，“除没收其印本或印版外，处著作人、发行人、印刷人以五年有期徒刑或拘役。”[1]

【1】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54~61页。

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出版法》仍继续生效于后来的北洋政府。1919年7月，内务部警政司通令全国，按照《出版法》，禁止出版“妨害政体治安”的文书图画。同时，那些在国外发行的文书图画，如果违反以上各款的，也不准在国内出售或散布传播。该令还规定对违反者进行严厉的处罚，若出版或散发上述查禁书刊，主管警察公署认为必要，就可以没收其印本及其印版。若违反《出版法》第11条的第1、2款，除了没收其印本或印版外，还要判处著作人、发行人和印刷人以五年有期徒刑或拘役，若违反第3–7款的，除没收其印本或印版外，还要判处著作人和发行人150元以下、15元以上的罚金。对于出版物妨害政体、治安和风俗，破坏政治上、军事上和司法上的重要关系的，均要依法制裁，以重法纪。

在1921年的《东方杂志》“五卅特刊”事件中，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提出控诉，控告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长王云五，指控《东方杂志》及“临时增刊”妨碍治安，即以违反《出版法》第11条及特别警律第28条为据。最后，会审公廨判决王云五违反法规，以罚金200元交保，一年之内不再发行同样书籍而了结[2]。

【2】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230~233页。

1915年，上海书业公会曾就《出版法》文字图画的禀报，向国务院、内政部呈请，提出意见，请求修改，未果。事隔六年，1922年，上海书业公会再次分别呈请国务院、内政部，同时还向国会提交请愿书，要求修改，仍然没有结果。直到1926年1月29日，经北京报界要求，临时执政段祺瑞明令废止北洋政府《出版法》。

国民政府制定的《出版法》颁布于1930年12月，共44条。包括总则、新闻纸及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出版品登载思想之限制、行政处分、罚则共六章[3]。总则对出版品、发行人、著作人、编辑人进行了定义，规定：出版品由官署发行者，应以二份

【3】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104~109页。以下该法各条款均见于此版本。

送中央党部宣传部及内政部。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新闻纸及杂志和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的登记进行规定。第四章第十九条规定：出版品不得为下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 四、妨害善良风俗者。第二十条：出版品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第二十一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之登载。第五章是对违背各条所得行政处分的说明。第六章则是对违反各条规定所得惩罚之规定。

该法明确规定了书刊在出版之前必须向国民党当局申请登记以备"改正增删"，禁止登载"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的文字的书刊出版，否则将"处发行人、编辑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罚金……"甚至对传单和标语的印行，也严加控制，"非经警察机关许可"，"不得印刷和发行"。采取了事前干涉、事后追惩，预防和追惩相并的方法。

该《出版法》比北洋政府的《出版法》详细了许多，把出版品分为了新闻纸、杂志和书籍及其他出版品三种，在登记制度方面也区别对待，分别予以详细规定。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出台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共25条，对出版法的原则和办法，作出具体的规定；对出版物的审批更趋严格，一般要经过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登记批准。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对《出版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款增至54条，将查禁书刊的权力下放到市县政府。7月28日，又颁布《出版法实施细则》。

抗战胜利后，围绕《出版法》的争论，涉及到对言论自由、宪政、宪法权威以及民主政治的向往等问题。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46年1月28日，最高国防委员会决议修正《出版法》。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1947年10月24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该法全文共分六章43条。第一

章和第六章是总则和附则，第二章是新闻纸及杂志，第三章是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第四章为出版品登载事项上之限制，第五章为行政处分。《出版法》第五章规定了详细的行政处分条例。如第30条规定：内政部认为出版品载有违反第21条所列事项之一或违背第22至26条所定禁止或限制之事项者，得指明该事项禁止出版品之出版及散布，并得于必要时扣押之；其情节重大者，内政部得定期或永久停止其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第31条）[1]。同战前的出版法规相比，国民党对《出版法》的修正，实质上是加强了对出版系统的控制。同时还制定了《出版法施行细则》19条，对修正后的《出版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重新修订后的《出版法》，就其表面文字而言，似乎对以前的《出版法》有所改动，但与前两部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这次重新修订《出版法》之前，新闻及出版系统一直是由宣传部和内政部两部协同主管的。两部都想取得对出版业的控制权。经过一番争夺，内政部最后取得单独主管出版系统的权力。

【1】转引自张宪文、穆纬铭《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405~406页。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为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的规定，依照该法三十二条违背前项禁止而发行之新闻纸或杂志，地方主管官署应扣押的规定，勒令南京《新民报》永远停刊。

沦陷区的汪伪政府，为推行其"政纲"、"国策"，钳制舆论，巩固统治，粉墨登场不久即着手起草《出版法》。1940年10月17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4次会议原则通过伪立法院审议。12月17日，伪立法院第30次会议修正通过了《出版法》，汪伪《出版法》与以前的《出版法》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其一是把出版品的审查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汪伪《出版法》规定，负责审查出版品的机构，除了伪中央宣传部、伪警察部（后改为内政部）外，还有地方主管官署，即各地的警察机关。其二是未经伪政权核准登记的新闻杂志不得发行，违者依"法"处罚。1942年6月，伪宣传部公布实施《修正战时出版法》共54条，进

一步强化了对出版品、出版机构、出版经营的审查制度。

二、《著作权法》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许多法律来不及重新制定，部分可以沿用的法律就被暂时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大清著作权律》。1912年9月21日，北洋政府内务府发布《著作物呈请注册暂照前清著作权律分别核办通告文》，宣称“查前清著作权律，尚无与民国国体抵触之条，自应暂行援照办理”[1]。《通告》后附有《大清著作权律》全文。直至1915年11月7日，北洋政府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了新的《著作权法》。

北洋政府《著作权法》，在体系上秉承《大清著作权律》，对于后来国民政府的著作权法有延续性的影响。该法包括5章45条，分为总纲、著作人之权利、著作权之侵害、罚则、附则5章，共45条。该法是以《大清著作权律》为模式拟定的，条文基本相同，仅对少量条文进行了增删与合并，有关注册、承继人著作权的起算与著作权侵害的处置等条不完全一样。在章目名称上，比《大清著作权律》更突出了作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性质，结构上也设计得更为合理。

在具体内容上，北洋《著作权法》在“总纲”中明确将享有著作权的著作物列为了五类：文书、讲义、演述；乐谱、戏曲；图画、贴本；照片、雕刻、模型；其他关于学艺美术之著作物，以归纳的方式对著作权的客体作了明确规定[2]。其中乐谱、戏曲和其他关于学艺美术之著作物两类，是《大清著作权律》没有规定的。另外，将著作权的登记主管机关改为了内务部，不再由民政部执行；同时对著作权得转让于他人作了明文规定（第三条），并在第二章中规定“著作权之移转”也须注册。

第二章“著作人之权利”部分，将承继人继承著作权开始的时间改为“自著作人死亡之翌年起”，不同于《大清著作权律》中规定的“呈请立案批准之日起算”。并列专条规定“著作人死亡后，若无承继人，其著作权即行消失”。在本章最后一条第二

【1】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133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

【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以下该法各条款均引自此书。

十四条中增加了“依出版法之规定，不得出版之著作物，不得享有著作权”，体现了北洋政府试图控制著作物的思想。

第三章规定，当著作权受到侵害时，享有著作权之人得提起诉讼，又规定如法院判定以假冒侵害著作权，但并非有意所为，得免处罚，但须将已获之利益归还原告。对于三种合理使用的情况，只规定了前两款需要注明原著作出处。

第四章罚则中，大多数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的处罚金额都相比《大清著作权律》有所提高，表现了对维护著作权的重视。比如第三十六条规定：“翻印、仿制及以其他各种假冒他人之著作者，处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其知情代为出售者亦同。”而《大清著作权律》在此处，只提到了“假冒”而无“翻印、仿制”，罚金是四百元以下、四十元以上。其他还有很多都是如此。第三十九条是《大清著作权律》中没有的：“注册时禀报不实，或不依第十七条之规定禀报者，除将著作权取消外，处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罚金。”

北洋政府还于民国5年（1916年）2月1日公布了《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共16条，对申请著作权注册的具体程序以及交纳规费作了详细规定。

国民政府上台伊始，即着手制订新的《著作权法》。据1928年《申报》载《大学院订定著作权法草案》曰：“再，著作权之注册向由内务部执行，现在钧府内务部尚未设立，职院为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故拟由职院办理，合并呈明。”[1] 经过各方的商讨和修改，新《著作权法》于同年5月14日由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它吸取了《大清著作权律》和北洋政府《著作权法》的立法经验，在它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基本上没有超出前两法的范围，仅在著作权内容、登记注册生效制度、外国人作品保护等方面作了一些补充。共分为总则、著作权之所属及限制、著作权之侵害、罚则、附则等5章共40条，连章节的名称都几乎和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一样。

关于受保护著作物的范围，第一章第一条中列了五种，与北

【1】《申报》，1928年4月6日。

【1】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以下该法各条款均见于此书。

洋政府《著作权法》基本相同；之后增加了“就乐谱、剧本有著作权者，并得专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1]的条款。关于著作物的注册，规定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掌管，并强调对于应受大学院审查的教科书，未经大学院审查前，不予注册。

第二章的“著作权之所属及限制”中，增加了“著作物于著作人亡故后始发行者，其著作权之年限为三十年”的条款（第六条）。在第九条中，对于照片的著作权的规定相比前两法则更为详尽了。关于著作权的年限，在第十一条规定“自最初发行之日起算”，而前两法均规定自注册日算起。新增加的第二十一条对于报纸、杂志转载事做了明确规定：“揭载于报纸、杂志之事项，得注明不许转载，其未经注明不许转载者，转载人须注明其原载之报纸或杂志”。另外第二十二条中增加了“显违党义者”和“其它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得“拒绝作品注册”的内容，使《著作权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民党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工具。这比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中只有合乎《出版法》的著作物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的规定又更进了一步，表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

第三章的“著作权之侵害”与前面的两法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去掉了“著作权之转让及抵押，非经注册，不得与第三者对抗”一条，以及关于合理使用中对于“仿他人图画以为雕刻模型，或仿他人雕刻模型以为图画者”的特别规定。

第四章的“罚则”中对于各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的惩罚，基本与北洋政府《著作权法》相同，只有对于未经注册，却于其末幅假填某年月日业经注册字样的行为的罚金，提高到了四百元以下、四十元以上。

为了保证《著作权法》的实施，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国民政府在公布《著作权法》的同日，也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共15条，主要规定有关注册的各项事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14条中对于外国人著作物注册的规定，是前两法中都没有的：“外国人有专供中国人应用之著作物时，得依本法呈请注册。

前项外国人，以其本国承认中国人民得在该国享有著作权者为限。依本条第一项注册之著作物，自注册之日起，享有著作权十年"[1]。这一条其实与1903年中国与美国、日本所续签的商约中关于著作权的协定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在著作权法规中予以正式规定，这还是第一次。

【1】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162-166页。以下该法各条款均见于此版书。

民国33年（1944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著作权法》，共5章37条。关于著作物的载体，先前的著作权法上没有明确列出许多已有的载体，比如唱片。所以，曾经发生过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洋行请求注册所出版的唱片享有著作权，而最终司法院以著作权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予以拒绝的事情[2]。这一点在1944年的著作权法中作了补充，将发音片、照片和电影片都列入了受保护的著作物，并规定就乐谱、剧本、发音片或电影片有著作权者，并得专有公开演奏或上演之权[3]。在第二章中对照片著作权的享有规定中也增加了对发音片和电影片著作权享有的规定。该法删除了原来对于不得享有著作权的著作物的列举，删除了对于明显违党义者和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拒绝注册的规定，但是在第一章中，在由内政部掌管注册的规定之后，将原来规定教科书必须先经大学院审定改为了"内政部对于依法令应受审查之著作物，在未经法定审查机关审查前，不予注册"，进一步扩大了审查的范围。

【2】《内政公报》，1935年第11期，174页。

【3】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以下该法各条款均见于此书。

第三章"著作权之侵害"中增加了对著作权执照核发前作品受侵害的保护办法："著作物在声请注册尚未核发执照前，受有前项侵害（按：指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利益）时，该著作物所有人得提出注册声请有关证件，提起诉讼"（第十九条）。还增加了对已注册作品的使用必须取得授权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规定使用已经注册之著作物——"一、用原著作物名称继续著作者；二、选辑他人著作，或录原著作加以评注、索引、增补或附录者；三、用文字、图书、摄影、发音或其他方法重制，或演奏他人之著作物者"——应征得原著作人之同意。

第四章"罚则"中再次将对各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处罚金额

都予以提高了。比如第三十条将“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权者”及“知情代为出售者”的罚金提高到了“五千元以下”，并对“以犯前项之罪为常业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增加了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可见当时翻印等活动之猖獗及司法机关之重视。对于其他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的罚金，也都提高到了一千元以上。

同年9月5日，又修正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13条，其中增加了对电影片等新载体注册的规定，以及定价过高的著作物须酌减的规定。

1949年1月13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公布了新修订的《著作权法》。1949年的《著作权法》较1944年的《著作权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再次调整了原来第四章罚则中罚金的数量[1]。1949年的《著作权法》也还是之前著作权法的延续，并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地区沿用了很长时间。

抗战期间，伪维新政府曾于1938年9月3日公布《著作权法》5章42条，汪伪国民政府也曾于1940年11月13日公布《著作权法》共5章40条。还有日伪时期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公布有《著作权法》。但它们的内容变化都非常小，这里就不一一而论了。

三、其他出版法律法规

袁世凯政府颁布的其他出版法规还有：《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1912年9月13日）、《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1914年1月28日）、《报纸条例》（1914年4月2日）、《修正审查教科书规程》（1916年4月28日）等。《报纸条例》于1914年4月发布，由袁世凯制定，国务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副署。这个条例与《出版法》都没有经立法机关讨论，完全按袁世凯的意志制定，所以被称作“命令式之法律”。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出版方面的法规律令依然是萧规曹随。从1916年至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其他一些更为苛细的法律、法规，如《管理印刷营业规则》、《报纸法》、《管理新闻营业条例》等。

【1】辛广伟：《台湾出版史》，42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国民政府期间，颁布的有关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当之多。据《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统计，1927年至1949年颁布的出版法和施行细则的解释共26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共56项，新闻检查和取缔的法规24项。有关的内容，后面章节还将涉及到，此处不再赘述。

民国时期相关出版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是近代出版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实施其管理职能的产物。这些或粗或细的法律条文，反映着各个时期各个执政府对出版业进行管控的意图和执行实际管理时的重要依据。尽管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时期，执行的实际力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有些也许只是一纸空文，有些则得以较为认真地贯彻实施。就对出版业乃至文化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来看，这些出版法律法规的先后出台，有些对出版业起了保护和推动作用，如《著作权法》的日渐完善和实施；有些则可能相反，如受到当时和后人挞伐的《出版法》中的一些条文，以及臭名昭著的书刊审查制度等。

第二节　书刊审查制度

民国时期书刊审查制度的形成与逐步完善，是相关出版法律体系建构与成熟后的产物。民国各时期制定的《出版法》与审查条例等法律，为审查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从历史来看，开始把图书送审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是袁世凯政权于1914年12月颁布的《出版法》。其中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中国近代最早的图书审查制度，由此开始发端[1]。

[1] 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15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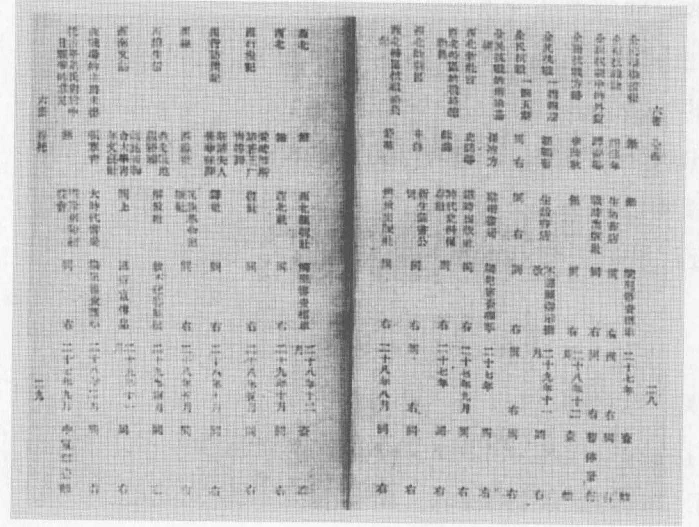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对图书、杂志、报纸的检查趋于严格，除对《出版法》、《著作权法》有关条款的援引外，还专门颁布了许多审查法规，并逐步设立专门机构，实施书刊的审查制度。192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6月

公布了《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及命令。1930年12月颁布的《出版法》规定，报纸、刊物在创刊前必须申请登记，禁止在书刊上发表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并规定了违反这一《出版法》的种种处罚办法。1931年11月又公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对出版物作了严格的限制。这一阶段主要由国民党各级党部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法》进行检查。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了所谓“反动宣传品”的范围及其处理办法。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更好地控制舆论，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了新闻检查所。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置中央检查新闻处（后改隶中央宣传部），订立了检查标准并确立了各级检查机构的组织系统，实行全面的新闻检查制度。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突然发文，一举查禁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牵涉到25家书店、28位作家，震动了上海书业界（图31）。为此，一些书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便联合建议由官方审查原稿，即实行“事先审查”。这个事先审查的办法，既能杜绝“反动”书刊的出版，又能保全书商的“血本”，因而很为国民党各级党部所赏识。于是，一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机构，于1934年4月正式成立。6月，审查委员会开始运作，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甚至翻印古书也不能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在审查过程中，检查官随意删改，而且被删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即所谓“开天

图31
国民党的禁书目录



窗”，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迹。图书杂志审查官员的滥禁滥删，给文化事业造成的破坏是极大的。鲁迅在给刘炜明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哪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存在了一年多时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周刊《闲话皇帝》事件，日本认为这是“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查封了《新生》周刊，撤销了书刊审查委员会。但其不得人心的书刊审查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个《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7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六次会议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决定以“适应战时需要，齐一国民思想”为名，筹备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由中宣部、社会部、内政部、教育部、政治部等各派一人组成，并由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兼该会主任委员，于1938年10月开始工作，就此又恢复了在上海实行过、由于“新生事件”而被取消了的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其后还相应设立了武汉、西安、吉安、福建、江西、重庆、桂林、云南、广东、湖南等地的“图书杂志审查分处”，各地方的最高党政军警机关都参加了当地的图书杂志审查工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将《审查法规》和《审查手册》以密件形式寄发各地，作为审查人员的依据和参考，并要求各县把图书杂志的审查工作作为各县党部中心工作之一。当时负责审查的除了专门的图书审查机构，内政部也有一定的审查职权。

1939年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通过《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草案》及《修正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草案》。3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订《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87条。5月4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修正通过《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41年国民政府公布《杂志送审须知》。1942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制定《统一书刊审检法》、《杂志送审须知》，同年公布《图书送审须知》；5月5日，公布《书店印刷厂管理规则》。1943年公布《新闻记者法》、《图书印刷店管理规则》、《通讯社报社管理暂行办法》。1944年6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同年，颁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严格规定："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和编辑者言中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其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1] 如此之多的法规和办法，如此严格的标准和须知，暴露了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动与残暴。

【1】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272页。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31日，重庆八大杂志主办人举行会议，一致认为战争时期业已过去，审查图书杂志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除致函国民党中宣部、参政会、宪政协进会，请命令废止外，不再送审。9月12日，在国内各界强烈要求拒检送审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重庆、昆明等地杂志界出版界纷纷联合发表声明，成立联谊会，要求出版自由。9月22日，国民党第十次中常会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废除原稿检查制度。

尽管原稿检查制度废除了，但并不等于说国民政府就放弃了对出版的管制。随着1946年下半年内战硝烟又起，以及国共两党之间文化斗争的日益尖锐，从1946年底开始，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清查换证工作，对不合己意的书刊，在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时，予以多方推延和阻挠。这可视为一种变相的舆论控制。继出版法重新修订之后，1947年12月，国民政府更是发布

了《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至1948年7月，中共领导和影响的报刊悉遭封禁。此时的国民党，完成了百姓缄口、舆论一律，但却也丧尽了民心，孤立了自己，伴随着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利，最终走向了从大陆政权出局的结局，国统区的出版业也在查封和停刊声中，加剧了衰败的进程。

第三节　书刊查禁与出版压制

与审查制度相对应的，则是各种禁书活动的层出不穷。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重视舆论的作用，一面提倡尊孔读经，一面压制革命宣传。在袁世凯和国民党的矛盾激化、宋教仁被刺后，1913年6月，袁世凯政府内政部发出布告，禁止报纸刊载“宋案”和“借款”的新闻。同年12月，颁布查禁命令：“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自各省（国民党）解散后，如遇有意存煽惑，登载报纸，或印刷物品，或散布传单，是即以乱党自居，……应即严饬各地方官吏、警察厅署一律严加取缔，并就照该地邮局不准递送。”[1] 翌年7月，袁世凯政府的总统办事处下令查禁孙中山等所撰著的各种进步图书。10月，应日本驻我国公使之请，袁世凯政府颁发了查禁上海会文堂出版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的文告，责令各省巡按使通饬所属严行查办，同时令教育部审查修正。

1914年12月，袁世凯政权颁布《出版法》，这是其实行文化统治的重要举措，也是其禁书活动法律化的重要依据。从《出版法》公布到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的这一年半时间里，其政府先后查禁了《新爱国歌》、《民国春秋》、《中国白话报》、《甲寅杂志》、《时事新报》等图书报刊三十余种，其他由各地方军阀所禁图书报刊还不计算在内[2]。

袁世凯死后，其政权先后落入直系、皖系、奉系军阀之手。

【1】《内务公报》第3期，1913年12月15日。

【2】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155~1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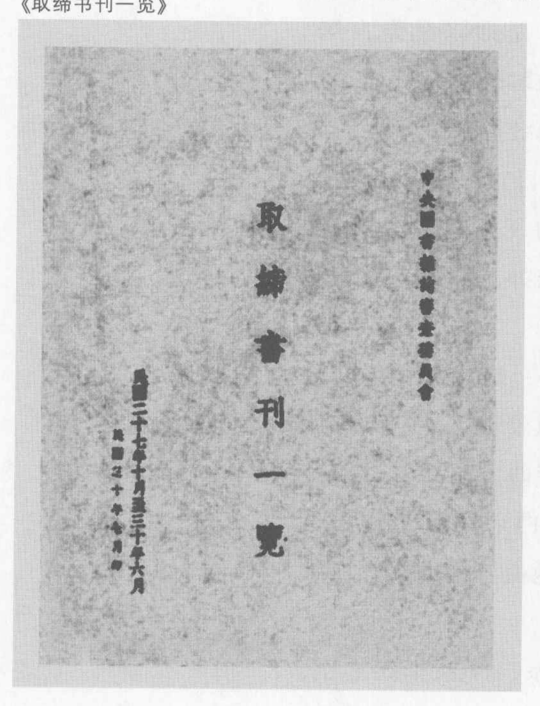
军阀们忙于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在文化统治方面相对有所松动。直到五四运动后，才逐渐加紧了在文化领域的统治，主要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一些著名的书刊，如《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先后遭禁。北洋政府国务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过激主义印刷物”[1]。《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迁到上海，也遭查封，又迁到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如《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查禁之列。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权后，查禁图书更是肆无忌惮，先后查封了《京报》、《语丝》，杀害了邵飘萍和李大钊。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的种种禁书措施，不论规模还是手段，都要远远超过北洋军阀集团。上海版的《出版史料》上，曾连载了张克明所辑录的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查禁书刊数量，计1927年8月—1937年6月间2 000余条，1938年3月—1945年8月间1 000余条[2]。而这些辑录出来的禁书目录，还只是其公开查禁的部分，至于被密令查封、销毁和被各地特务查抄、焚毁的书刊（图32），则无法统计，因而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从目录来看，战前十年间所查禁的书刊，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和宣传马列主义及苏联革命历史的著作，首当其冲；（2）左联等文化团体的书刊及左翼作家的著作，大批被禁，几乎年年都有，在禁书中占相当比例；（3）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4）反蒋或有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书刊，如改组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派别出版的书刊等。抗战期间查禁的书刊，内容方面与战前相比，既有所继承，也有所变化。主要包括以下8类：（1）以“鼓吹阶级斗争”、“违背我国立国

【1】张克明：《民国时期禁书目录述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318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

【2】《出版史料》（上海版）第3、4、5辑。

图 32
《取缔书刊一览》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取締書刊一覽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至三十年六月
民國三十年七月印

最高原则”等“罪名”查禁的马列主义著作；(2) 以“派系为立场”、“曲解本党主义及政策”、“宣传共产主义”为借口查禁的中共领导人著作；(3) 以“触犯审查标准”或“为中共作夸大宣传”为借口查禁的国际人士的著作；(4) 以“诋毁中央”、“以派系私利为立场”为由查禁的国民党左派及其他知名人士的著作；(5) 以“阐扬马克思之辩证唯物论”、“诋毁政府”、“派系私利立场”为由查禁的社科著作；(6) 以“立论派系立场”、“鼓吹阶级斗争”为由查禁的一些抗战文艺作品；(7) 以“触犯审查标准”、“恶意诋毁政府”、“宣传共产意识”的名义查禁的一些革命杂志；(8) 敌伪书刊。

在大后方，国民党不断进行书刊查禁的同时，沦陷区的敌伪政权也在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载有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786种。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 841种。战火之中，出版物本来就少，侵略者一下子就禁了近两千种，显示了敌寇企图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的险恶用心。

抗战胜利后，虽然审查制度废除了，但禁书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辰漾宁 (36) 密电，重申对“未依法呈准登记，擅自出版”的报刊，应立即取缔。特别强调严禁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刊物“擅行发刊”。上海市政府决定，凡未登记的杂志，限即日停刊，禁止代售，违则严办。5月底，北平市政府借口“未经中央批准，于法不合”，一天查禁报刊75家，如《解放报》三日刊、《中国农村月刊》、《世纪月刊》等。内战爆发后，禁书活动更是明目张胆。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群众》周刊、外文版《新华周刊》，民主建国会出版的《民主生活》周刊，反映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学生报》、《复旦人》、《交大生活》等64种刊物，自香港流传到国统区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经济》等30种书刊，斗争性很强的《文萃》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等创办的

《国讯旬刊》等，先后被禁。即使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刊物，如《观察》、《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也难逃遭禁的厄运[1]，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企图。

【1】张克明：《民国时期禁书目录述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325~327页。

民国历史统共不过38年时间，而这38年所禁之书，据张克明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粗略统计，其种数达近五千种之多[2]。禁书量之大，令人心惊。而且执政当局在禁书的同时，往往还和流氓政治、特务政治相结合，查封捣毁出版机构，迫害出版界人士。如1926年查封了上海书店，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励群书店、引擎社等，1930年查封了平凡书店，1931年查封了北新书局、华兴书局、现代书局等，还指使暴徒恫吓、捣毁销售左翼书刊的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等书店的门市部，1933年查封了湖风书店，1940年和1941年查封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多家分支店，1946年捣毁了民盟中央的机关报民主报社和新华日报馆，搜查了北平的解放报社与新华社北平分社，查封了广州的兄弟图书公司、广州杂志社等十余家新闻出版单位，以及汉口的联营书店等。1947年至1948年间发生在书业界的“富通”事件、《大众文化》事件、《文萃》事件、“利群”事件等，均因涉及到暴力、逮捕、乃至杀害，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迫害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2】张克明：《民国时期禁书目录述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317页。

第四节　版权纠纷

自清末《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后，出版者和著作者的版权观念开始得以大范围普及。到了民国时期，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有关版权方面的摩擦纠纷，也随之大为增加，这一方面反映了出版者和著作者维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出版物市场的不够成熟和尚待规范。民国时期的版权纠纷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中外之间的版权纠纷；书业同业之间的版权纠纷；作者与出版业者之间的版权纠纷。

一、中外版权纠纷

自西学东渐西方版权观念引进国门之日起，中外之间的版权争端，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文化刚刚起步，亟需向欧美学习的贫弱落后国家，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自不愿意加入国际间的版权保护双边同盟，而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蓄意扩大在华权益，无视中外之间文化上的巨大逆差，要求清政府在1903年续修的商约中加入版权保护条款。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吕海寰、盛宣怀等官员的据理力争，虽然最终的中美、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都加入了版权保护的内容，但是他们原来要求的一概禁印，改变为禁止翻印专备为中国用书，其余则不受禁止[1]。这一结果，将中方关于版权保护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同时也为民国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中外著作权纠纷，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可供中方援引和辩护的法律依据。如1919年发生的美国商会要求上海总商会函送华商各印刷局立即停止翻印美国课本，以及美国经恩公司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其出版之书，商务印书馆均据约驳拒，取得了胜诉。

[1]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81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民国时期最为轰动的一起中外版权纠纷，是发生在1923年美国米林出版公司状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受理了此案。《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是商务印书馆自1919年开始，聘请了35位知名专家、学者，耗资15万元，历时4年，以美国米林公司1910年出版的《韦氏大学字典》译编而成的一部英汉双解字典。1923年6月，商务请了蔡元培、黄炎培等名人为字典作序，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待要发行之际，原字典的著作权人美国米林公司的代表克雷斯律师提起诉讼，状告商务印书馆侵犯其著作权和商标权。会审公廨立案后，中方律师在公堂辩护时所援引的，同样是1903年订立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的第十一款明确写明，中国的作品可以在美国得到全面的保护，但是美国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保护是有条件的：1）美国人的作品必须是以中文写的，必须是

为中国人写的（而《韦氏大学字典》不是用中文写的，不是专给中国人用的，是给世界所有学英语的人看的）；2）对美国人作品的保护只有10年期限；3）美国人的作品只能禁止翻印而不能禁止翻译（而商务该字典是翻译而不是翻印）。面对中国律师有理有据的辩论，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否定了美国公司对商务侵犯著作权的控告，判决"原告既不能提出充分论据，证明其在中美两国境内获有版权，本公堂自应驳回不理……前次所发之临时禁谕，应予注销"。[1]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使用了原著的两个圆圈，被判定为侵犯了原著的商标权而被罚款1 500两白银[2]。

【1】王光：《二十年代轰动上海滩的著作权诉讼案》，《法制日报》，1992年10月31日。

【2】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164页。

民国初期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及代表出版界利益的上海书业商会，从国家发展大局和出版界实际利益出发，反对加入国际间的版权公约，并以既有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为依据，使得外国列强在版权纠纷中难以获得实际成果。这在当时，是有时代积极意义的。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当时的做法，并不算是国际特例，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在其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时候，也如当时的中国一样，不愿加入版权双边同盟。

民国初期频频发生的中外著作权纠纷，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减少[3]，出版界翻译翻印西书，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如龙门书局那样的一些专门翻印西书的出版机构，直到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西书翻印机构才告消失。

【3】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164页。

二、书业同业之间的版权纠纷

书业同业之间发生版权纠纷，在民国时期十分常见。纠纷涉及到盗版作伪和抄袭剽窃两种情况。

盗版作为一种书业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出版活动中,就已存在。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这种人种我收的寄生虫行为，随着图书市场的日益壮大，更是放肆地搅得三江水浑，既捞鱼又摸虾，扰乱正常的出版秩序，令出版界和文化界头痛不已。

早在民国初期的1914年，上海总商会议董印有模，就向全国商会联合会提议，请求呈转司法部通令各省严办翻版，得到了司法部的批转。从司法部批转的文告中可看出，民国初期的盗印活动，已是全国性质，“几乎无省不有”，其中以“湘、鄂、粤、鲁、川、豫等省发案率最为严重”[1]。尽管司法部下了严办的通令，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在1932年华通书局出版的《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4、5期合刊和7、8期上，便刊载了调查所得的201种翻版书目录[2]。我们在抗战前的《申报》上，常能见到被侵权书店通报追拿翻版的声明，以及书店间对簿公堂的报道，略举其例如下：

1931年3月22日，上海三友书社为其出版的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被盗印，特聘请了五位律师发表声明，一方面警示如若发现翻印，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许诺给提供盗印线索者予以奖励。

1931年7月9日，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发布赏格，查究《现代歌曲集》、《教我如何不想她》、《美的歌曲集》等黎锦晖作品的被盗线索。

1933年8月18日，学友图书美术社因发现市面上出现了一种与自己相同但却故意不标明出版年月日的彩色教育挂图，登报声称要收集证据，诉究盗印者。

1934年5月7日，生活书店刊登告示，声明由其代为发行的顾雄藻编写的《字辨》一书，被上海启智印务局见猎心喜，偷偷地仿照第4版翻印，翻印的纸型，已被生活书店在其店内搜获，人赃俱在[3]。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鲁迅作品一时热销。以龙虎书局为代表的不法书商，打起了鲁迅著作的主意，或更改书名，或采用选集的形式大肆翻印。为此，鲁迅财产继承人和北新书局均委托律师，于1937年4月25日登报声明要追究盗版者的法律责任。

民国时期不法书商的盗版方式多种多样，有直接进行翻印的，有任意出人选本的，有盗印与作伪双管齐下的[4]；盗印图书

[1]《司法部通饬严办翻版案件》，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135页。

[2] 唐弢：《再谈翻版书》，见《晦庵书话》，7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3]《申报》，1934年5月7日。

[4] 唐弢先生在《翻版书》一文中，例举了著名“革命小说”作家蒋光慈及其作品，被人作伪盗印后的种种光怪陆离情形。见《晦庵书话》，63~67页。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一文中，对其作品的被人作伪，也作了十分沉痛的表述。见《写作生涯回忆》，80~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的门类众多，教科书、字典、小说、歌曲等，几乎是无所不包，凡是销路好的，都可能被不法书商盯上而翻印。盗印者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盗印组织，他们为了逃避追究，拉帮结伙，广设耳目，收买眼线。为了做到行事隐蔽，他们往往将存货和销售分开进行。那些销书时间灵活、地点机动、不易被查究的书摊小贩，是盗版书的主要"泻货"渠道。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东安市场、西单游艺场、城南劝业场第一楼、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及宾宴楼等处，便是这些小书摊的集中之地。

为了打击猖獗的盗版活动，1932年7月，北平成立了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查获了双义书店、卿云书店、宝仁堂书局等翻版书大本营[1]。上海书业公会为取缔盗版，制订了十条办法。然而，盗版依然是防不胜防，禁不胜禁。书价的高昂，一般读者购买力的低弱，图书发行渠道的不畅通，以及法律对于盗版的处罚不力等，都是当时翻版书所以公然流行的原因。另外，大多数被侵害的作者和书店始终容忍着，放弃了抗议甚或追究的权利，也是促成翻版书猖獗的原因之一。叶灵凤在1936年写的《谈翻版书》一文中，甚至把最后一点看成是最主要的一条原因[2]。

民国时期书业同业间告他人抄袭而引起争端的，在报刊上也见过几例。1930年8月，中华书局数次登报指责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的《初中本国史》，抄袭了它1923年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并公开悬赏大洋2 000元，征集检举揭发世界书局的证明材料。告发者中华书局气势咄咄逼人，而被告方世界书局也不甘示弱，迅速作出辩驳回应[3]。双方在报上你来我往地打起笔墨官司，彼此的意图其实都心知肚明。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书局由小学教科书而进军中学教科书，中华书局自不愿多出新的竞争对手，正好寻到了这个机会，便拿着对方抄袭的把柄，大作起攻击的文章来。同样在教科书抄袭问题上，令世界书局处于尴尬境地的还有开明书店，时间同样是在1930年8、9月间，正是学校开学前选教科书的日子。开明书店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书局出版的三册本一套的《标准英语课本》，抄袭了林语堂编的《开

【1】唐弢:《再谈翻版书》,《晦庵书话》,77页。

【2】叶灵凤:《谈翻版书》,《读书随笔》(第1集),1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参见1930年8月份《申报》上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所出的告示。

明英文读本》，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道，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双方诉诸公堂，才最终得以了结。这两起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版权纠纷，以挤压对方为主要诉求目标，以教科书为指说对象，反映了当时教科书市场竞争之激烈。至于一般图书的抄袭侵权，也定有不少存在，但出版者从时间、金钱、精力等方面权衡考虑，愿意认真过问的，似乎并不多见。

三、作者出版者之间的版权纠纷

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民国时期一些有影响、注重长远发展的出版机构，大多能清醒地认识到作者的重要性，注意维护作者的权益，尽可能地不拖欠作者的版税，对作者的约稿尽量恪守信用，稿成以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酌情支付稿费。然而，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盘剥著作者的书贾，轻者拖欠克扣作者稿酬，重者则强行盗取掠夺，随便印发作者的文章与论著，既不征得同意，更不用说付酬。不少著作者不甘于遭人宰割，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著作人公会，1932年在北平成立的全国著作人公会，是著作人联合起来的维权组织，在联合出版业共同打击盗版的活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少著作者个人也在侵权发生后，勇敢地站起来，与贪婪的书贾进行斗争。文坛巨匠鲁迅因为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过度克扣其版税，几乎与之对簿公堂[1]，南社领袖柳亚子也多次与李小峰交涉，索要明显不足的稿费[2]，最终都得以妥善解决。20世纪30年代参加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李季，当得知居然有书店把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冠用他的名字发行时，十分愤怒，借《读书杂志》一角，发表郑重声明，既控诉以往书商盗版侵权对他造成的剥削，又明确表示不愿意现在被人“郭冠李戴”，而“掠人之美”，要求北平书店依法办理[3]。这样的声明，已不仅仅是著作财产权的诉求，同时还包含有著作人身权的保护。诸如此类，说明了当时中国著作界版权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昔日那种士大夫羞言

[1] 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243~245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

[2] 孙继林:《柳亚子与北新书局的版权纠纷》,《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3]《读书杂志》2卷5期通讯栏,1932。

钱、耻言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

第五节　书业行业组织

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书业公会作为近代重要的文化商业团体，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建立过组织，并在各地的书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而言，上海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书业公会成立时间早，开展活动多，作用影响大，因而特别值得关注。

上海的书业团体组织，以上海书业崇德堂公所成立最早，时间为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参加者为出版木版、石印线装书的旧书业，几年后停办。1905年10月，由叶九如等人重新组织公所，删去崇德堂三字，改称上海书业公所。同年12月，上海的一些以铅印平装书为主的所谓新派书业商人，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上海书业商民协会的同业组织[1]。进入民国以后，这两个"既不对立，也不合作，会员也大部分相同"的书业同业组织[2]，各自还存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1928年12月，又有以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等为代表的书局，邀约了21家以出版一般新书为主，在书业界往往被称之为新书业的出版机构，新成立了一个名为上海新书业公会的书业同业组织[3]。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一地就有了3个书业同业团体。到了1930年7月，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在市党部的主持下，将各自为谋的三个书业团体合而为一，合组为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

虽说上海书业公会的最后归并，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但书业公会的性质，与其他行业公会一样，属于民办性的同业团体组织。书业公会的日常经费，来源于各会员的月费，公会领导机构也是由各成员民主推选产生。1930年7月，选举执行委员15人，陆费逵为主席。1932年7月，照章改选半数，王云五、沈骏声等7人当选，陆费逵仍为主席，又增选张叔良等5人为监察委员。

【1】上海书业商民协会在1927年改称为上海市商人协会书业分会。见梁洋《上海书业公所与上海书业公会》,《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

【2】陈乃乾:《上海书业公会史》,《出版史料》(北京版),2001年第1辑。

【3】《上海新书业公会成立公告》,《申报》,1928年12月7日。沈松泉在《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怀念张静庐先生》一文中说,上海新书业公会在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备案时未获批准。

1934年7月第二次改选，王云五当选为主席，张叔良等8人为执行委员，陆费逵等5人为监察委员。会员入会，以自愿为原则。会员单位的数量，据陆费逵1932年为《申报》六十周年纪念而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说，当时为40余家，几近上海全部100余家出版者和印刷者数的一半[1]。到1936年12月，我们根据宋原放辑录的书业公会档案资料统计，已有67家[2]。会员入会的自主性和普及性，说明了作为行业组织的书业公会，在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方面，已被广大出版者所认可。

上海书业公会以"联络商情，维持公益"为宗旨，并围绕这一宗旨开展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维护同业版权。书业公会所做的版权维护工作，内容相当丰富。在与外国的版权纷争中，多次代表书业同业具文上书政府有关部门，反对参加版权双边同盟；协助中国出版同业，处理与国外出版商的版权诉讼；汇印《重订翻印外国书籍版权交涉出版案牍》一书，供各同业参考。在与政府有关著作权条款的交涉中，数次代表书业同业表明态度，提供修改建议。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颁布以后，上海书业商会于1916年和1922年两次呈请国务院、内政部修改内容，其中1922年提出：1）删除"要求修改章句、插入图画，必令其重行注册"的第十七条，以及第三十九条中"或不依第十七条之规定禀报"十二字；删除第四十三条中的"自注册之日起"六字；2）认为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表述不清，易引起误解，建议删除或修改[3]。在国内频频发生盗版和版权争端的过程中，书业公会更没有袖手旁观，先后调解了涉及上海市与外地同业之间的版权纠纷，多达53件[4]。制订了对付盗版的十条办法，要求同业及印刷局共同遵守。办法包括：承印、装订的书籍必须标明发行人住址、姓名、发行时间和发行单位，书商不得贩卖盗版，个人要求代售书籍，要问清其真实姓名、住址，是否有委托书等[5]。正因为上海书业公会以维护同业版权为已任，"凡遇翻版事件，靡不调查确实，剖别真伪，劝戒兼施，主张公道"，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上始知版

[1]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1卷1期，1932年。

[2]《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录》（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调制），宋原放：《记上海市书业公会》，《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

[3]《上海书业商会关于修正著作权法之请愿书》，《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162~166页。这两次呈请，均未有结果，但在国民党政府的著作权法中，上海书业商会请愿书中的某些建议得到采纳。如民初《著作权法》第17条要求著作在修改章句、插入图画后也要重新注册的条款，在后订的著作权法中被删除。

[4] 宋原放：《记上海市书业公会》，《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5]《申报》1934年4月16日。

权受法律保护，懔然罔敢侵害，书业因而大进”。

其二，争取出版自由。出版言论自由与否，直接关系到书业行业的发展空间，因而书业公会对此一直密切关注，反应积极。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印刷物附律，上海书业商会、书业公所、日报公会、书报联合会联合发表抗议宣言[1]，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此附律终于未能实施。1932年上海书业公会在国民政府召开会议期间，联合49家出版机构签署请愿书，就政府颁行的《出版法》和《出版法实施细则》，向会议提交请愿提案，认为“条文繁琐，奉行维艰”，表示“同人等拟请对于人权之保障，文化之扶植，加以注意。此项束缚出版自由，阻遏文化事业之法令，应请毅然废除，以慰民众喁喁之望”，并要求“停止党政军各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以尊人权而裨文化”[2]。

其三，谋求经济利益。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事业，近代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较为优惠的经济政策。民国时期我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一点，在税收、邮资等方面，给予出版业一定的经济扶持，但也时有变故，当此之际，书业公会每每出面奔走，吁请政府从国家文化发展大局出发，减免书籍税收和邮资。如1915年向政府申请免征书籍转口税；1922年向北洋政府交通部抗议增加邮资，获得成功；1934年4月再次因国民政府交通部书籍邮资涨价，而召开新闻发布会，陈述反对理由，并向交通部次长陈孚木提出抗议[3]；1946年派代表赴京请愿，申请豁免书籍的营业税等[4]。

其四，协调业内外纠纷。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都曾因劳资纠纷造成罢工停业。在罢工风潮中，书业公会往往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1926年6、7月间，上海一些印刷局的制版、印刷两部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印刷局业主提高印件工资，承认其第六工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从中予以调解，并将调解的有关过程及结果，登报公之于众[5]。而当书业单位与业外的某些组织或团体发生意外冲突时，书业公会也在必要的情况下，出面居中调停，帮助解决。如1932年10月，北新书局因出版《小猪八戒》一书，侮辱了伊斯兰教徒，引起上海

【1】《申报》，1925年4月25日。

【2】《上海出版业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实施出版法请愿书》，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412~413页。

【3】参见《申报》1932年4月19日和4月28日的有关告示和新闻报道。

【4】《书税特辑》，《大公报》1946年12月15日，《出版界》第10期。注：这次书业的免税运动，财政部同意教科书及参考书免征，其他书籍减半征收。

【5】《上海书业公所宣言敬告各团体》，《申报》1926年9月14日。

穆斯林的义愤，不仅捣毁了书店，而且派人进京请愿，反响十分强烈。书业公会特为此事于同年11月9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一方面呈请中央及市府对“小猪八戒案”依法持平办理；另一方面令北新书局再行登报，向全国各族伊斯兰教徒道歉[1]，以息事宁人。

其五，规范同业经营。1936年7月19日，书业公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推出会员19家，组织业规起草委员会；同年10月18日，召集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对起草的业规提出讨论，并修订通过；同年12月，呈请上海市社会局审核，准予备案，于1937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书业公会除将业规印成数百份，直接寄发给各书店（包括会员书店和非会员书店）外，还登报公告，以便同业一体遵照。业规共六章五十五条，包括总则、价目、营业、同业著作权及风纪之维护、罚则、附则等六大方面的内容，因营业部分内容较多，又细分为直接经营、间接经营、寄售经营、同行账款、推广方法之限制等五个小节[2]。业规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书业行业所应遵守的规范，对维护行业秩序，规范书业经营，是有积极作用的。可惜业规执行时间不长，便爆发了抗日战争，业规所应有的长远意义，未能全部显现出来。

其六，查究不良读物。为了抵制不良读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书业行业形象，上海书业公所曾创立书业正心团，“专行调查消毁一切足以危害人心风俗之淫词小说，以为正本清源之计”，至1922年6月，已销毁淫书底版36副，淫书46 396本[3]。1927年10月，上海书业公所再次登报警告同业，云：“查本公所章程内第三条载明不得印售有碍风化等书之规定，且于民九、十等年迭次登报警告在案，同业谅能遵守。兹奉上海公安局训令，内开查有性史等书，实足以鼓荡人心，乱人德性，而引人邪途。前曾分行各该管区所一律从严查禁在案，合亟令仰该公所遵照传知该业各书坊，嗣后不准再行贩卖是性史等书籍，以免鼓荡人心而准风化，倘有故违，定当从严究办。该公所领袖书业，务须恺切传禁等因。为此除申复并通告外，再行登报警告。

[1]《北新书局案》，《申报》1932年11月10日。

[2]《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实行业规公告》，《申报》1937年1月6日。

[3]《书业公所警告同业》，《申报》1922年6月10日。

凡我同业，如有存着此项有碍人心风俗之书籍，速即遵令办理，并加消毁；否则本公所奉令在先，自当指名请究法纪，具在，幸各自勉。”[1]

[1]《上海书业公所警告同业》,《申报》1927年10月10日。

其七，开展书业调查。民国时期没有专门的出版统计机构，有关的出版调查很不充分，书业公会受到经费、人员等的限制，也未能把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调查工作。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书业公会档案里，存留的调查表有：会员经营业务概况调查表、向中央银行贷款数额表、营业所得税报表等。

其八，举办福利事业。书业公会的工作重心自然以维护商利为第一要义，之余也附带为会员做了一些福利事业，如书业公所曾组织书业同义会，专做施医药、施材、埋葬等工作，一些急公好义的书业同人，还集资捐购墓地，预备建筑义冢和公墓。在公所结束之后，于原址开办了福利性的书业崇德小学[2]，为书业同人服务。

[2] 陈乃乾:《上海书业公会史》,《出版史料》(北京版)2001年第1辑。

从上述书业公会做的诸多方面工作来看，上海书业公会称得上是书业同行的重要组织和依靠力量，在维护书业的同业利益、发挥行业的自治与自律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业公会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政府进行出版调控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组织，是书业行业管理的主要承担者。但这并不等于说，书业公会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就其性质而言，书业公会主要是一种民间自治组织，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政府像对其他行业公会一样，一方面竭力把书业公会纳入国家可控制的轨道，另一方面又利用公会发挥其对行业的管理功能。书业公会与政府间的关系，既有依赖，也有冲突。一方面公会尽力与政府融洽相处，保持良好互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执行政令。如1936年教育部因不满于各出版者图书定价多不严肃，往往任意抬高定价，大打折扣，对教育造成不良影响，特颁布划一图书出售办法十条，令各地教育局和书店一同遵守，同时还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整饬各书店改售实价。书业公会十分配合，

议定出细则六十四条，并将之公布于报端[1]。而另一方面，当书业利益受到政府干涉时，书业公会又作为全体书业的代言人，与商会和政府有关机构部门进行外联沟通，据理力争，以尽可能地减少书业损失，维护行业发展。

[1]《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为划一图书售价办法公告》，《申报》，1936年6月2日。

上海的书业公会组织存在有半个多世纪。抗战期内，上海书业公会随着出版业的萧条而极度困窘，抗战胜利以后，各大书局纷纷从大后方重返故地，上海书业公会新添了100多家生力军[2]，较战前的会员数量，大有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书业公会在协助政府完成资本主义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也随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 陈乃乾：《上海书业公会史》，《出版史料》（北京版）2001年第1辑。

民国时期的书业界，不曾建立全国性的书业同业组织。在全国其他地区，建立书业公会组织的还有北平、南京、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其中，重庆出版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3年，其时的重庆，作为战时的全国出版中心，各出版机构为公会的组建，制定章程，推选理事，规划任务[3]，活动内容一如战前的上海书业公会。重庆同业公会的新建，再一次说明了公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3]《出版商业同业公会章程》，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619页。

第六章　出版经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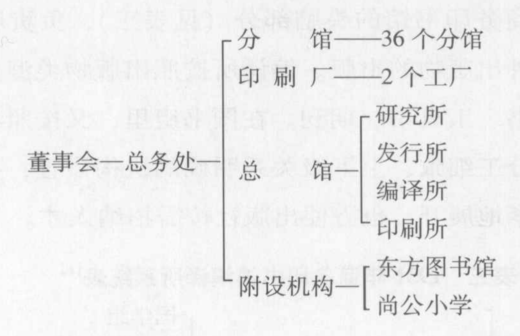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机构组织与人员构成

一、机构组织

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之间的大小差别，如同霄壤，大书局如商务、中华，数百万的资本，数千名的员工，而一些初建不久的小书店，资金和人员都相当不济，少的甚至只有两三个人。当然，集中于上海四马路书业街上的，更多的还是那些资本在万元上下，职工人数数十人不等的中型出版机构。大小不一的资金实力，多寡悬殊的职工规模，决定了各书局机构设置上的巨大差异。大书局不仅编、印、发各部门齐全，而且彼此之间各职所司，分工细密，小书局则因为条件的制约，机构组织自然要比大书局粗略了许多。

就某一个具体出版单位而言，其机构组织也是随着出版业务的发展，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初建之时，出书少，机构简单，后来生意好了，人手多了，部门也便随之增加，编辑部、发行所、门市部，甚至印刷厂、推广部、外地的分支机构等依次建立，于是便具备了一个中型书局的规模，若再发展，部门的设置就开始向商务印书馆看齐了。下面是1931年的商务印书馆组织系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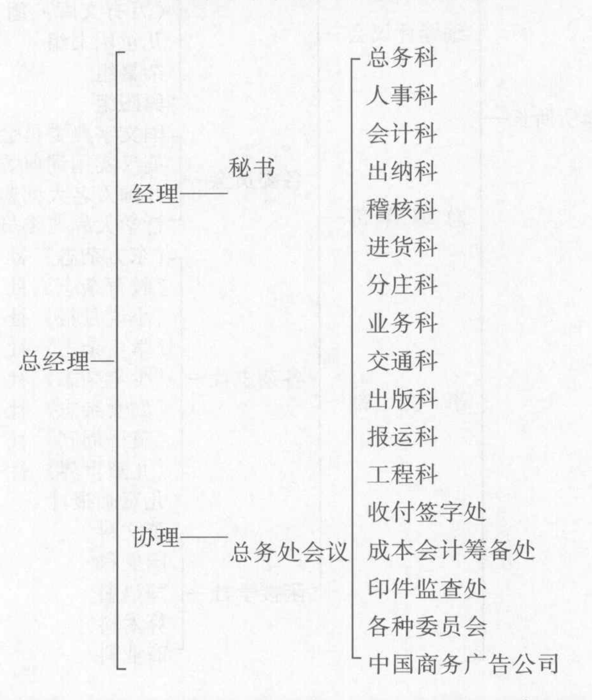
表一　1931 年商务印书馆全面组织系统表[1]



【1】〔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的机构设置呈复杂的树型结构，最高机构是股东大会，之下是董事会，然后是由负责具体业务的总经理分管的各个业务部门。其中总务处是最为核心的管理部门（见表二），将原本各不相关的三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统筹起来，建立起由总经理、经理和三所负责人参加的三所会议协商制度，来筹划行政、人事、财务、物流、稽核、监察等管理层面的事务，决定公司的大政方针乃至相关的具体事项，

表二　1931 年商务印书馆总务处机构系统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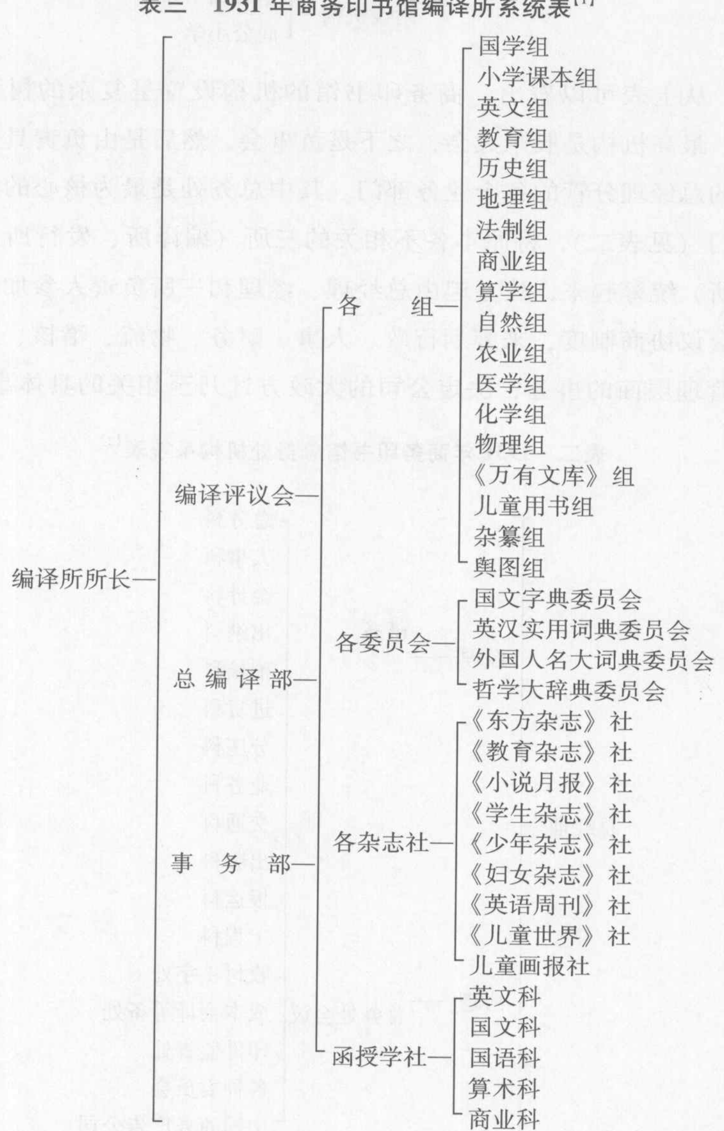


【2】〔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50页。

是整个企业正常规范运转的保证。

编译所是商务印书馆的头脑部分（见表三），负责所有产品的生产，即各种出版物的出版。编译所按照出版物类型分为三大部分：一般图书、工具书、期刊。在图书组里，又按照学科分为不同的小组。分工细致、上下级关系明确的机构设置，有利于编辑事务有条不紊地展开，也方便出版社按需招纳人才。

表三　1931 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系统表[1]



[1]〔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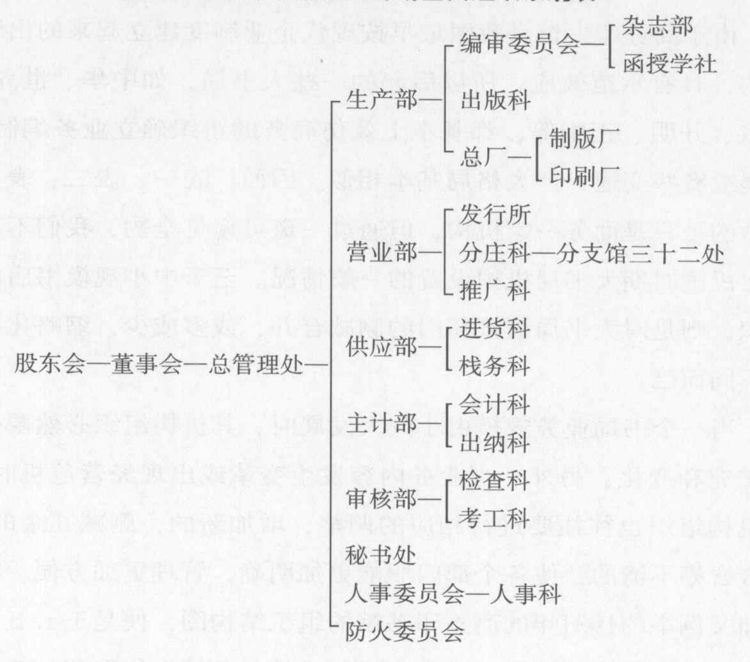
通过以上三表，我们了解到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机构设置情况。由于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出版机构，具有示范效应，所以后起的一些大书局，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都基本上效仿商务的组织确立业务编制，虽偶或有些变通，但大格局基本相似。因而，表一、表二、表三例举的虽只是商务一家机构，但通过一斑可窥见全豹，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大书局机构设置的一般情况。至于中小规模书店的组织，则是对大书局诸多部门的删减合并，或多或少，缩略化程度不同而已。

当一个书局业务规模由小到大发展时，其机构组织必然要随之扩充和变化；另外，当业务内容发生变革或出现经营危机时，其机构组织也往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新的，删减冗余的，整合含糊不清的，使各个部门职能更加明确，管理更加方便。我们前文例举的1931年的商务印书馆的组织结构图，便是王云五任总经理职后改革的结果，此前合议制式的总务处会议取消，改为总经理独断制，总务处降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设有经理若干人，协助总经理领导有关业务；设人事、会计、统计、稽核、研究等组，分别由经理分工领导；编译、印刷、发行三所由各所长负责主持。这样一来，日常业务工作由分工经理和专业组负责，并直接对总经理负责。总经理一方面控制了最关键的几个部门，一方面主要研究和制定经营方针和政策，处理重大问题。而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遭受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在新的形势下，对原来的机构又进行了改革。(见表四)

总管理处负责全馆行政工作，由总经理主持，下设经理二人辅助，计有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五部，以及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其中生产部掌管所有编译、印刷事务及所有有关生产的事务，下置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和各工厂。这次改革的结果是，商务印书馆的每个下级部门都向其上级部门负责，各部门又都对总经理负责，总经理决定编译员和副科长以上的人选，其余人员的聘用由人事委员会负责。这样，王云五掌握了商务的经营

[1]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449页。

表四　商务印书馆复兴时期全面组织系统表[1]



权和主要人事任免权。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对于商务印书馆复兴后的再度辉煌起到了一定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出版机构的组织设置，一方面有其成熟和稳定的一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出版企业的自身特点和发展的基本定型，另一方面又有其变革和发展的一面，体现了出版企业因时而变和适应潮流的基本特征。两者的结合，推动了出版企业组织结构的日趋合理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人员构成

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其机构设置互为对应。机构复杂的大书局，固然人员众多，分工细密，层次亦相当明显，上至总经理、总编辑，中至各部门主任，下至书店一般员工，可谓一应俱全。而机构简省的中小书店，层次界限则要相对模糊，人员一身而二任的情况，亦所在多有。人事管理中的员工来源、职责权

限、薪水福利等，也因各书店规模大小、资本性质等因素的不同，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

从名义上说，总经理的职权和地位，在书店中应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实际上，虽有的书店是如此，但也有和一般小伙计无异者。那些老板自兼总经理的，总经理一职自然位高权重，如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和李志云兄弟、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等。那些先为个人独资而后股份制经营，由创始人摇身一变为总经理的，如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生活书店的邹韬奋、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也大都权重一时。即便完全聘请而来的总经理，有权的也不少，如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世界书局的陆高谊等。而另一方面，那些“来无所为，去无所由”的总经理[1]，在民国时期的书店中，也不乏其人，如新月书店的总经理，差不多隔不了多少天就换一个，华通书局的总经理究竟是谁，也常使人捉摸不定。

【1】《出版界》第31期，《申报》1935年11月14日。

每个书店的工作，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编辑出版，一为营业推广。如何推进营业，自然是总经理的份内之事。不少书店的总经理兼任营业部主任，有些书店甚至不设营业部主任一职，营业之事，完全由总经理总揽。而作为书店营业基础的编辑出版，虽有总经理兼任总编辑者，但大多数书店则延揽专人专任其事——大书局多称之为编译所或编辑所所长，中小书局则称为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一个书店大至出版方针的制定，小至图书选题的确立，均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总编辑的个人知识背景和兴趣喜好，往往孕育为书店的出书路数和个性化风格。开明书店在其发展初期，章锡琛从《妇女杂志》的主编而为《新女性》的主干，他在妇女问题上的浓厚兴趣，使开明当初这方面的出版物颇见付印，而到夏丏尊主持开明编辑部后，夏氏原本中学教师的身份，便把开明带入了中学生读物出版新天地，以《中学生》为代表的书刊，被大批中学生所捧读，开明书店借机而雄起；新生命书店的编辑部由陶希圣、樊仲云等先后主持，因而关于中国问题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书籍出版得最多；黎明书店的孙寒

冰、伍蠡甫负责编辑部多年，于是它政治经济的书籍，尤其是大学教本与英文文学书，便出版了不少。正因为总编辑如此重要，各书店无不十分重视总编辑的人选，除了学识才情需要考虑外，不少总编辑或者原本就是与书店极有关系之人，或是聘用后即成为书店股东与董事的。过去书店总经理常见有易手者，而总编辑的地位则相对稳定[1]。

【1】《出版界》第33期，《申报》1935年11月28日。

总编辑分管的编辑部（所），是出版企业知识含量最高的部门，提供着企业运转最为关键的智力资源，因而也成为书店中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过去成功的出版企业，无不网罗了一大批学有所专、学有所长的编译人才为我所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人才中，举其大者有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杜亚泉、陆尔奎、孟森、章锡琛、颜惠庆、胡愈之、陈叔通、沈雁冰、蒋梦麟、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杨端六、朱经农、竺可桢、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叶圣陶、胡寄尘、陈翰笙、张明养等人；而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图33）内先后任事的，也有范源廉、

图 33
中华书局编辑所



徐元诰、缪文功、姚汉章、潘武、李廷翰、赵秉良、庄泽定、李登辉、王宠惠、杨锦森、沈步洲、沈颐、戴克敦、顾树森、屠元礼、李步青、张士一、黎锦晖、张相、王人路、沈彬、董文、吕伯攸、陆衣言、金兆梓、朱文叔、钟衡臧、郭后觉、蒋镜芙、张鹏飞、杨干青、吴启瑞、乐嗣炳、陈醉云、易作霖、黎明、沈问梅、陈启天、余家菊、左舜生、田汉、舒新城、徐志摩、武堉干、朱稣典、马润卿、钱歌川、周宪文、倪文宙、姚绍华、桂绍盱、卢文迪、章丹枫等文化精英；开明书店的编辑所名单中，曾云集有夏丏尊、邵力子、范寿康、范洗人、叶圣陶、丰子恺、王伯祥、徐调孚、贾祖璋、王鲁彦、周予同、金仲华、顾均正、傅彬然、宋云彬、胡仲持、吕叔湘等专家学者。他们或是由熟人朋友引荐介绍，或是由书店直接物色聘请，或是经招考择优选拔录用，进入到出版机构这一知识核心部门，担任着选题组稿、编辑加工，乃至著述编译等日常工作。编辑们的平均薪水，一般来说，要好于书店其他部门，即便跟社会其他行业相比，也略占上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优秀人才，被吸引到书店里做"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当然，各书店之间由于经济实力、资本性质、规章制度等方面不同，编辑人员的物质待遇颇见差别，如同为大书局，商务编辑的平均薪水就要略高于中华[1]；而吴朗西等文人合伙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巴金完全义务劳动，其他编辑们所拿的工资，也聊以糊口而已[2]；创造社大将郭沫若一度给泰东图书局操觚编书，店家与其既无合同聘约，工作报酬亦少，数目还不确定，且只能零星支取，这种毫无规章可循的"江湖式"做法[3]，最终导致了劳资双方的彻底决裂。另外过去同一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之间，由于资历出身、工作能力、背景来头等因素的差别，店家所给予的待遇，亦大为悬殊。以1921年商务印书馆为例，编译所内有月薪高达350元者，也不乏月薪30元以下者，薪金的差别，在10倍以上[4]。而那些大书局聘用的兼职编辑、店外编辑和名誉编辑们，也许为书局干的实活并不多，可拿的薪酬反而比一般专职编辑要高，这是他们在学术文化界的

【1】钱歌川：《回顾五十年》，《回忆中华书局（上编）》，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上海版）第3辑，1984年。

【3】郑伯奇：《忆创造社》，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85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4】胡适在1921年夏间应邀考察商务时，曾对其编译所169人的月薪做过一统计，具体是：350元以上，1人；300元以上，2人；200元以上，4人；150元以上，8人；120元以上，17人；100元以上，5人；70元以上，14人；50元以上，17人；30元以上，46人；30元以下（含学生），62人。见《胡适的日记》，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显著号召力，或是身处政府要害部门的不寻常身份，被出版者相中而有意加以结交的结果。

编辑之外其他部门的一般职员，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店员。店员的来源，大书局如商务、中华，新型书店如生活等，大多通过招考的方式进人。以中华书局为例，早在1913年5月，董事局就制定了《任用职员规程》，正式规定招纳员工，除却特别延用者之外，一律要经过考试。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6年，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二十多次招聘、招考广告，每次录用的人数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四十人[1]。招考的职位，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各种学员、学生等。招考广告上开列着各级职位报考应需的条件，录用后的待遇，保证金的数量，以及保人的有关情况等。考生笔试通过之后，还要进行面试，以做到公平竞争，择优录用。通过考试招进来的职员，素质一般较好，关系也相对简单，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与保证。

【1】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332页。

然而，与大书局招考为主的用人方式不同，过去中小型书店却盛行着雇用同乡和亲戚的书业陈规。如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是绍兴人，前期的开明便基本上由绍兴人职掌；现代书局总经理洪雪帆是宁波人，在他那个时代的现代书局便几乎由宁波人支撑；北新书局创办人李志云、李小峰兄弟麾下的店员，也大多难脱同乡或亲戚的干系。20世纪30年代的开明、现代、北新三家书店，称得上是新书业佼佼者，规模也相对较大，它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一些小的或旧式的书店了。中小书店用人之所以喜欢沾亲带故，大概他们觉得，熟人悉根知底，不仅易听招呼，经济上也较令人放心——在人手少、分工粗，大小事务店员们几乎全程参与的中小书店，这一点似乎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熟人圈里择人，大大局限了用人范围，从业人员素质亦多不如意。为了使那些既没有太多文化知识，又没有什么书业背景的乡亲雇员们，能在入店后熟悉业务，许多书店采用了师傅带徒弟式的学徒制方法。这种方法带出来的店员，“大多一知半解，甚且连字都识不了多少，

你走进这种书店去，不但那些店员不知道怎样来招待你，而且，有时你问他有没有哪一类的书，他会拿出绝对相反的书来给你，你指名问他要那一本书，即使这本书就放在他面前，他也会瞠目不知所对，甚而竟至于说没有。”[1]

从历史来看，开明、现代、北新的用人制度的高度血缘性和地缘性，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适应着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经营，说明20世纪30年代我国中小书店在组织上，与现代企业的目标要求，还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当商务、中华、世界，包括后来的开明做成大书局后，乡里乡亲的用人方式只能被招考聘用等社会化行为所替代，店员的培养也由传统的学徒制，进化为现代的职业培训。商务印书馆先后创办的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以及“一·二八”之后的“练习员”制度[2]，中华书局1922年9月委托国语专修学校开办的国语商业夜校[3]，和1935年9月自设的职员训练所[4]，均为各自企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员工。生活书店虽不曾有专门的职业化培训，但对员工们所开办的或参加的各种学习班，则多加鼓励，其专门编印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带有鲜明的业务交流性质，书店同人可借此了解书店概况，切磋工作经验，提高业务水平。在对人员的制度性管理上，股份制的大书局比那些中小书店，也要大为规范，不仅人员进出有章可循，日常业务工作也大多有制度约束[5]。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主持下，更是吸收其从国外考察中得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在馆内大力推行科学管理法。他的量化式管理，虽因各方面重重阻力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紧追国外先进，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书业界的从业人员，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雇佣方式下，表现出自由流动的特点。合用则留，不合用则走，是资方用人的基本准则。商务印书馆自王云五掌管编译所后，因其喜用海外留学新人而将一批老编辑打发；中华书局每到年中间的6月份和年底的12月份，也要按公司章程辞退不合格人

【1】《出版界》第31期，《申报》1935年11月14日。

【2】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1909年创办，1923年停办，共7届，毕业学生300多名。生源来自于中学生，主要面向发行所进行相关的发行技能与知识训练。毕业生既可选择留在商务工作，也可以到社会供职。留在商务的毕业生，称为“补习生”，毕业后轮流到各个部门工作，遇到适合其性格才能的岗位就“定格”。多数毕业生还是就业于发行系统。艺徒学校，面向印刷所，具体开办情况不详。1932年“一·二八”之后，商务开始试办“练习员”制度，培养高起点干部，生源来自大学毕业生，对其进行半年的业务训练，接触除印刷技术以外的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然后双向选择，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见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61~63页。

【3】1922年10月开办的国语商业夜校，招收学员60名，修业期限为15个星期，开设的课程包括三类：(1) 国语，(2)商业，(3)书业常识(如编辑、出版、印刷等)。见《申报》，1922年9月24日。

【4】中华书局职员训练所招收学员30人，学习期一年，其中前半年全日上课，后半年白天派往书局各部门实习，晚间上课。供膳宿，免学费，月考视成绩奖励4至12元，或令退学。同年12月下旬又招考一期。一面设夜课，训练在职员工。见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135页。

【5】如商务印书馆，便制定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每个部门的每项工作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如何复核都有着详细的规定。现在所能见到商务成文的规章制度共有75种，一本人事制度，一本规章制度，一本职工需知。见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65页。

员[1]。当然，若非时局紧张或大的人事变动，每年被辞退的仅占很小部分，毕竟，培养一个熟悉业务的编辑出版人才不易，再说，工作的延续性也不宜经营者陡然间做出大动作。而对那些受雇的员工来说，同样有权反方向拣择雇主。人员流动的自主与灵活，既表现于不同行业间的此进彼出，如编辑，在身份角色上，往往是教师、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等职业的频繁互换；也表现在同一行业内的你来我往——职员中朝秦暮楚者固然不乏其人，因见猎心喜或不满于现状、摇身一变而为新开张书店老板者，也所在多有[2]。

人员流动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增加了就业者的压力意识和职业危机感，有利于经营者对员工的管控利用和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出版者重视人才、养成人才的风气，有利于形成人才竞争的良性循环机制。过去成功的出版企业，为了留住优秀出版人才，采用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譬如，某些取得业绩和一定工作年限的职工，适时给予加薪和职位提升；某些处于关键位置的中层干部，除正常工资外，尚发放明给、暗贴、应酬费、预定花红、年终花红、特支花红、年终赠送等各种名目的经费补贴[3]。某些得力的上层职员，公司有意让他们附股，以固其心志。某些业务骨干一时出国深造，公司依然薪水照发[4]，存念其回国后继续效劳。某些劳苦功高的高级职员或干部，公司特建立退休养老制度，以培植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终身服务观念[5]。某些职工同人成立的联谊组织[6]，公司予以多方支持，藉以改善协调劳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人才措施，反映了过去出版企业对人才的激烈争夺，也让后人从中体会出，像商务、中华、开明这样一些出版企业，之所以在竞争如林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立于不败之地，高度重视人才的发展观，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第二节 资本构成与资金管理

民国时期书店的资本，和其他行业一样，就集资方式而言，

【1】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回忆中华书局》(上编),80页。

【2】《出版界》第31期,《申报》1935年11月14日。具体的例子如，梁溪图书馆的黄济惠，群众图书公司的方东亮，光华书局的沈松泉、张静庐，儿童书局的张一渠等，均是先在泰东图书局供职， 尔后自办书店的。

【3】上述情况见之于商务印书馆。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65~66页。

【4】这方面的例子，如1936年中华书局资深编辑钱歌川留学英国，该年8月12日，总经理陆费逵专门为钱歌川出国学习事给编辑部批下一手条："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见王震:《陆费逵年谱》(下),《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5】上述情况见之于中华书局。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回忆中华书局》(上编),81页。

【6】中华书局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有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开明书店抗战时期建立有明社。

都不外乎独资、合伙和股份制公司三种。独资与合伙，资本额有限，采用这两种形式的，多是一些中小书店。中小书店宏图不展的症结，多数是受资本所困，出版业的文化特殊性和高风险性，使得招股集资不易成功，因而独资或合伙，便成为中小书店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独资的书店中，有自当老板自主经营的，如汪孟邹之于亚东图书馆；也有只管出钱经营另请他人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军政党国要人出资开办的书店。而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纷起的合伙书店，多为三两文人集资开办。书店独资也好，合伙也好，若幸而招股成功，就有望于做成大书局了。从民国出版史看，多数大书局都经历了从独资、合伙再到股份制的过程。

股份制既是一种招募资金的方式，又是一种资金管理和企业管理形式。在股份制出版企业中，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股东的意志通过股东大会表达和实现。股东大会最主要的工作是讨论通过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选举董事来监督执行这些制度，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与财务分配都受到股东的监管。董事实际上是股东大会的常设委员，代表股东的意志，对管理人员实施领导和监督，并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大计，对股东大会负责。一般来说，负责经营业务的企业经理，由董事会委任（图34），既对董事会负责，又对职工负责。股东的利益在于获得股息和红利，股息是股东定期按一定的比率从上市公司分取的盈利，红利则是在上市公司分派股息之后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的剩余利润。下面以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生活书店为例，大致说明民国时期书业中股份制运作的有关情况。

图34
中华书局董事会决议

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常会一年一次，主要讨论通过公司的章程、资本额、经营范围、股权利益、有关经营的建议，以及选举董事和监察。董事在下次股东年会上向股东报告本届经营成绩、赢利多少或亏损原因、一般经营情况、本年度分支机构设置和撤销、不动产及重大设备购置等。任何股东都可以随时查阅董事会记录，总、副经理则受聘于董事会，负责企业全面事务，向董事会负责，重大问题，如购置房产、修订或废立章程、设立或变更分厂分馆、重要诉讼事件、借贷款及外业股份的转让或认购等，必须事前提交董事会决议。一般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董事会不加干涉，也就是说在业务方面总、副经理有较大的权限，甚至还有总、副经理根据章程拒绝董事会超越权限干涉行政事务的事情发生。另一方面，由于董事会不直接和业务经营打交道，总、副经理是公司重要智囊的同时，也兼有董事的身份，如此设置，有利于董事会决议。

良友股份公司成立之时，计划到会股东52户，共562股，每股有一议决权及选举权，共562权。股东大会选举了董事9人，监察人1人。到1928年9月，公司的股份已达到2 000股，每股100元。董事会章程规定，拥有4股以上的股东就可有资格被选为董事，董事的职权为：以过半数之议决案执行公司之业务；造具各项预算及决算表册提交股东会承认；召集股东会议；公司财产显有不足清偿债务时，应即呈请宣告破产；当公司解散时，充任公司之清算人；委任公司经理、司库、会计及规定其薪金、交际费及公费；如公司有应向外借款或抵押等事须得其审核通过，并得由主席代表董事会签字方生效力；遇必要时有权请股东或职员到会咨询意见，但不列于议决之数；董事会非有过半人数亲自出席，不得作为正式会议；董事因事缺席，得委托其他到会董事为代表，但须具有亲笔签名之委托书。唯每一董事同时至多只能代表一人（连自己二人）[1]。利益分配方面，公司每年总决算之后，如果有盈余，则作为百分分派：其中35%为公积金，30%为股东红利，15%为发起人红利，20%为董事及职员酬劳。其中的6%为

【1】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351~352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

董事红利，这6%再分为11份，董事会主席占2份，其余8位董事和监察人各占1份。

生活书店开始实行股份制的时候，在职的工作人员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入社的股金，以后新进职工在一定金额内，扣除月薪1/10入股，股金超过2 000元时，超过部分不计股息[1]。

出版企业采用股份制经营，其益处是多方面的。公司化的运作，使企业责权利关系明晰化，有利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公司员工，特别是一些高级职员和管理人员，持有企业部分股份，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其责任感。当然，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股份制形式，能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弥补出版企业资金之不足，为企业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做好必要的资金储备。

通过招股筹措资金，是过去出版企业最为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除此之外，还广泛地利用了其他一些融资手段，比如说，出版企业吸收存款，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后来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儿童书局，都采取过这种办法来筹措资金。20世纪30年代初的银行存款，长年利息不过七厘，书店存款则在八厘和一分之间[2]，高于银行钱庄的存款利率，却低于它们的贷款利率。如此筹资，从理论上说，于出版者和储蓄户双方，均为有利。但也有实际上的弊端，一旦书局发生经营和信用危机，就容易造成挤兑风潮，从而给出版企业雪上加霜，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都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过去民营出版机构融资的对象是多头的，除了面向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吸收存款外，也有借助官方和政府背景资本的。特别是当经营出现危机，出版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渡过难关时，官僚资本最容易介入这一具有文化宣传功能的行业，如此一来，出版社作为民营企业的性质，就大打折扣，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在其后期，都曾陷入官僚资本的掌握之中。

还有一些书店在融资上，打起作者的主意，其方法是，动员作者将其在该书店出书应得的稿酬，拿出一部分作为其向书店入

【1】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2】《出版界》第28期,《申报》1935年10月19日。

股的股份，这样作者就变成了新股东，书店则增加了新资本。这样一种集资方式，在一些文人开办的合伙书店中相当普遍。开明书店就是这方面的老手。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汪静之，曾把小说《耶稣的吩咐》和诗集《寂寞的园》交开明书店出版，两本书都没有支取现金稿酬，而是全部当作股本投资开明[1]。《开明英文读本》的作者林语堂，也曾从版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开明。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作者与书店关系之密切，但另一方面也看出过去出版机构在融资上的无孔不入和筹措资金的艰难与不易。

【1】汪静之：《我怎样从拥护女权当上了股东》，《我与开明》，89页。

在读者身上想点子，借用读者的钱造货，也是过去出版企业融资的高招之一。开展预约出书、期刊预订和为读者分立户头邮购书刊等措施，都能有效地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出版者的预约和预订，是以将来书刊出版后较大购买折扣为优惠条件，吸引读者在书刊未造之前，就已把钱交到出版者手中。在读者，固然得到了价格上的利益；在出版者，既得到了一笔造货的资金，也减少了发行上的风险，可谓一举两得。而书店开展邮购业务，不光有一笔发行利润入账，而且书店还在为每个邮购户建立往来账务卡的同时，有可能得到一笔较大的购书存款余额可资利用。过去生活书店因为信誉好，邮购户多，抗战前的存款余额，零零整整加起来，总额甚至高达10万之多。

资金的来源除融资所得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经营利润。利润的流向分成两块，一块直接分给投资人，另一块则留下来作为企业今后发展的积累资本。是多留，还是多分，颇值得经营者权衡。过去商务印书馆采用的是“多留少分”。其方法是，将期末总资产在盘存账上减少，称为“折低”，商务折低的程度很低，使得隐匿资本增加，剩余价值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为资本，而实际盈利被打低，这样一来，分的部分就大为减少了。一般来说，剪息票者（股东和息票债券持有人）往往只要每年能拿到比社会一般平均利润率略高的股息及红利，就不会有什么意见，而且投资者也很明白，企业的发展和兴旺，是他们获得长远利益的源泉，更何况多留少分还能少付捐税，所以，即使剪息票

者的利益被扣除了一部分，他们仍然乐于接受。下表是商务印书馆1914、1915年两个年份给股东的财产账目中资产折去的情况，从中可以分析出商务之多留少分的经营策略。

商务印书馆1914、1915年资产折去表[1]

项　　目	原值计算方法	1914 年的折去数	1915 年的折去数
地基	照购进价	减去 18%	减去 21%
房屋	照建设价	减去 30%	减去 35%
机器等固定资产	照购进价	减去 51%	减去 55%
纸张等原材料	照购进价	减去 20.68%	减去 21%
书籍（存货）	照成本算	全部不作价	减去 41%
仪器文具（存货）	照购进价	减去 45%	减去 50%
书稿（版权）	照原用价	减去 96.2%	减去 98%
人欠	照实欠数	减去 60%	减去 60%
总计	平　　均	减去 57%	减去 57%

[1]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80页。

就当时来讲，房屋和固定资产的年折旧数在5%已经算是很低了，而地价不仅不会减，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1914年甚至将所有的存书剔除在资产之外，由此可见商务的“折低”非常之低，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都直接转化为了资本。应该说，商务所采取的多留少分的资本经营战略，在当时书业界并不特别，民国时期所有后来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几乎全是沿着这条资本之路走过来的。

资金流的管理和运作，实际上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开源和节流。前面我们所论述的，都属于开源的范畴，其实节流的工作，在过去凡是成功的出版企业中，同样做得相当到位。商务印书馆称得上实力雄厚，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和总经理高凤池内部写信，用的却是废纸[2]。“要节约”的口头禅，总是挂在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口边[3]。开明的精打细算，在当时出版界是有名的，人员少，效率高，大大节约了它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而“以需定产”、“以销定产”、“少印勤印”的原则，为生活书店加快资金周转，节约仓库管理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31页。

[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48页。

第三节　选题与组稿

一、选题

选题是出版流程的起点，也是影响出版物质量的主要环节。决定出版者确立选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时代趋向的预测，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对市场需求的估计，对自我出版风格的塑造等。民国时期图书选题的操作，与现在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既有许多追逐市场的跟风型选题，亦有模仿基础上的改进提高型选题，同时也不乏引领潮流的策划创新型选题。选题的好坏，反映着编辑出版者的学识眼光和市场嗅觉，并最终从出版物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效益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由于各书局编辑人员素质、规模组织的大小、编辑出版方针等因素的不同，其选题的范围、选题的重点与选题的质量，往往有较大差别。一般而言，大书局出书综合，编辑力量雄厚，选题的范围既广，质量也较有保证。商务印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出书以激荡潮流自居，兼之网罗了一大批高精尖的编辑人才做后盾，其选题的创新水平与策划含量，大大高出当时的出版同行。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出版界能冠诸群雄而不倒，与其图书选题总体上的保持领先大有关系。中华书局的编辑力量稍弱于商务，在选题的自主开发能力方面虽不及商务，但它善于借鉴他人成功选题的思路，并注意进行改进和提高，因而也能取得成功。如《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同为古籍丛书，商务的《四部丛刊》出版在前，中华的《四部备要》印行在后。《四部备要》强调的是古籍的实用价值和聚珍仿宋版的精美排印方式，这与《四部丛刊》讲究古籍的版本价值，采用影印传真的出版方式区别开来；再如，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的《辞海》，较之商务1914年出版的《辞源》，也是后出转精：《辞源》用句逗，《辞海》则用新式标点符号；《辞源》引用书证只注书名，而《辞海》引用书证

则注篇名，从而给读者查证提供了更大方便。

过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实力较弱、规模较小的中小书局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往往刻意在选题上独辟蹊径。如开明书店的《开明活页文选》，选题思路着意于选文范围的精广，和装订形式的灵活方便，其“因班因人制宜”的特点，出版后受到广大中学校的欢迎，由此开辟了开明书店教科书出版的新坦途。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白话小说，率先使用标点符号并分段，外加仔细校勘和附录考证，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凸出学术意味，成为亚东图书馆当年的畅销书和多年的常销书。这些，我们在前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兹不赘。当一些中小书店在某一类图书选题上耕耘既久，则往往能形成自家出版特色，如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的文艺类图书选题，儿童书局的少儿类图书选题，勤奋书局的体育类图书选题，竞文书局的英语类图书选题，武昌舆地学社的地图类图书选题，新文化书社、中西书局的标点书图书选题，均构成各自的优势选题领域，所出图书受到当时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当然，也有不少书局，特别是那些没有实体的皮包书店，出书原本没有什么计划，选题往往见机行事，在市场跟风中分取一杯羹，在书海浪尖上载浮载沉，不为人所注意。

二、组稿

任何选题只有通过组稿才能落实。民国时期的稿件来源，主要有作者自投稿、关系推荐稿、出版社征稿、出版社约稿、编译所内部稿等五种形式。其中编译所内部稿，是当时特有的普遍出版现象。过去大书局教科书、工具书等的编写，往往由编译所内编辑人员完成。编辑人员职务工作时间所完成的稿子，当时称为内稿。撰写内稿的编辑，有作者署名权，而其他版权则归属于书店所有。商务印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以编审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编译所，稿件才全部改成外稿。中华、开明等书局的编辑所则一直保留了下来，内稿在著作稿件构成中，一直不

曾中断过。至于民国时期其他四种稿件来源形式，与现在的出版情形类似，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的比例不同而已。

一流的作家才会有一流的出版物，一流的出版物才会造就一流的出版社。民国出版史上彪炳史册的几个著名出版机构，无不注重联络作者，广交人才，在自己周围团结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有真才实学的著译家队伍。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明确提出"作者是衣食父母"的主张，在出版实践操作中，中华书局从不拖欠作者的稿费，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稿成以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酌情支付稿费。中华书局的诚信作风赢得了作者的信任，不少作者多次把书稿交给书局出版，大大稳定和丰富了稿件的来源，保证了书稿的质量。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善于用高稿酬吸引作者。上个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当红作家严独鹤、不肖生（向恺然）、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沈禹钟、程瞻庐、程小青、李涵秋、姚民哀、朱瘦菊、许指严、陆士谔、张恨水、赵苕狂等人，之所以源源不断地给世界书局供稿，"盖世界书局对作者所致报酬极为优厚"，如张恨水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至10元，而当时通俗小说稿费平均水平约为每千字3元左右[1]。

民国时期的组稿活动，是在著作权已形成社会共识的前提下进行的。出版者与作者之间，或签有书面合同，或达成口头协议。根据双方约定，作者可将书稿一次性卖给书店，版权归书店，以后印多印少、重印不印，均与作者无关；作者也可选择抽取版税的方式[2]，版权归己或与书店共有。无论是一次性卖稿还是分批性版税，民国时期除梁启超、胡适、鲁迅和林语堂等少数大家外，真正依赖稿费即可谋生者凤毛麟角[3]。在这种环境下，编辑出版家对作者的温情关怀常常令人难忘。有不少作者靠出版社借支稿费渡过生活难关。得到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帮助的剧作家曹禺有这样的回忆："那时穷呗，有时就跑到出版社去吃饭，'打牙祭'嘛。"[4] 孤傲固执的才子朱湘常常衣食无着，赵景深是在开明书店当编辑的时候，认识了作为作者的朱湘的。此后朱湘生活陷入困难的时候，赵景深多次给予帮助。朱湘投江自尽后，

【1】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2】民国时期的版税数量，通常在10%至20%之间不等。

【3】据R. 洛旺塔尔（R. Loewenthal）在1941年8月《燕京学报》第3卷第2期上所刊载的*The Copyright in China*（中国版权）一文介绍，中国只有梁启超、胡适、鲁迅和林语堂等四人可以靠稿费生活。转引自〔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60~61页。

【4】纪申：《记巴金及其他：感想·印象·回忆》，13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也是赵景深帮助料理后事，整理出版朱湘的遗稿，并将版税转交给了他的遗孀，体现出一位厚道的编辑对作者的爱护和同情[1]。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赵家璧出版丁玲的作品《母亲》时，丁玲正身处狱中，版税不能自取，赵家璧则将全部版税分批汇寄给丁玲的母亲，解决了丁母生活的困难。赵家璧所策划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文学丛书，之所以屡屡得到诸多名家支持，产生较大影响，正是他作者工作细致体贴、卓有成效的结果。他曾经总结说："得不到作家的支持，编辑将束手无策，一事无成!"

[1] 赵景深:《记朱湘》,《我与文坛》,179~1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在战争年代，有些编辑为了保护作者的稿件，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端木蕻良的第一部作品《科尔沁旗草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时，正赶上"八一三"沪战爆发，日寇炮火毁掉了开明的印刷厂，当时开明的出版部主任徐调孚，冒着大火冲进印刷厂排字房，救回了部分原稿，其中就有端木蕻良的这部作品。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巴金，为了能让亡友罗淑的作品传世，1938年他不顾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含泪整理、抄写罗淑的作品 终于使罗淑的著作得以付梓流传，在出版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佳话。

编辑与作者的宝贵情谊，还表现在对作者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扶持上。古人有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民国出版史上也有不少编坛"伯乐"的事例。如宗白华"发现"郭沫若，叶圣陶"发现"巴金、丁玲，巴金"发现"曹禺，《科学》杂志编辑部"发现"华罗庚等。编辑的"发现"和赏识，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以莫大的精神鼓励，为其今后的创作人生增添了重要的勇气和信心。当多年后已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对当初叶圣陶从来稿中慧眼识珠发现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并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予以发表的举动表达了内心的感激："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2] 既出书又出人，体现了出版对文化发展的双重贡献。而作者的茁壮成长，又反过来哺养着出版业自身，在两者的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中，推

[2] 徐登明:《编辑出版家叶圣陶》,32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动着出版文化和出版经济的向前发展。

当然，在民国时期，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能和作者建立起诚信关系，伯乐也并不常有，拖欠克扣作者稿酬的事情，倒是时见发生。民国时期一些文人作家因不满于书商的“薄待”，而自作自印或自办书店的，并不在少数。张静庐说“一般的新书店的老板，十个老板九个穷”，出版者生存之不易，大概是作者受到“薄待”的一条客观上的原因吧[1]。

第四节　装帧与印刷

一、装帧

中国古代的图书装帧，从当初的简策装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演变，最终定格为统一的线装形式。到了光绪末年，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广泛应用，书籍装帧开始发生一些新变化：如在线装书的书衣上舍去书名签条，改排铅字，或用书法题写书名。到20世纪初，有些书的封面上开始出现装饰花边的框线，封面纸变换不同颜色等。到清末民初之际，铅印本书刊的外在形式，受到了日本的多方面影响，弃线装而为平装，封面和封底出现了诸如美女肖像、文房四宝、花卉鸟兽、香炉如意、火车轮船、西洋人物等图画装饰。在鸳鸯蝴蝶派的出版物中，多年来就保持着这种流风余韵[2]。这些虽说幼稚但也相当可喜的变化，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推动出版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巨大变革。鲁迅和他引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装帧设计家们，在书刊装帧实践中，勇于创新，大胆尝试，从技术手法到艺术形式，既借鉴吸收外来影响，又注意继承民族传统，从而使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迈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从五四到“七七”事变以前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上人才辈出的时期。

【1】陆费逵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也承认当时中国作者稿酬低至通常的每千字二元至四元，不利于作者安心从事著作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出版家的难处：“或以为薄待著作者，一定肥了发行者，但是发行者得利之书很少，蚀本者很多。每一书坊开若干年，只剩些不销之书籍和无着落之欠账，便不得不关张了。前清末年的许多书坊至今存在的差不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广益书局几家。其余不是关门，便是出盘。即民元开办的中华书局，艰险备尝，慎重紧缩，股东在近十七年中，或无利，或得利一二，最多一年只四厘。办事人待遇也很薄，苦了二三年，总算勉强站住了。其他与中华书局先后开办的，现在一家都不存在了。试问如此情形，资本家和事业家谁肯来经营这种事业呢？”

【2】姜德明：《书籍装帧的艺术魅力》，《新文学版本》，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陶元庆在鲁迅的鼓励下，以新颖手法为新文艺书籍作装帧设计(图35)。他博采众长，融国画、西画、图案于一炉，其装帧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坟》、《朝花夕拾》等鲁迅的著作，幅幅见功力，亦幅幅具独到之处，深得鲁迅的赞许。丰子恺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而且坚持到底，影响深远。陈之佛从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设计封面起，到为天马书店作装帧，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钱君匋运用过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但始终没有忘记装帧设计中的民族化方向[1]。其他如司徒乔、孙福熙、王青士、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倪贻德、关良、张光宇、叶浅予、黄苗子等人，在书刊装帧设计上，都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化风格。



图35
陶元庆设计的《故乡》

这一时期，除了画家们的努力以外，还有不少作家本人也参与到书刊的设计创作中。作家中常作封面的，除鲁迅外，尚有闻一多、叶灵凤、沈从文、胡风、巴金、艾青、卞之琳、萧红、邵洵美等人，他们主要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封面，也为别人的版本做装饰，如闻一多为新月书店，叶灵凤为创造社出版部，邵洵美为时代图书公司等，就设计过多种封面。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学过美术，有的仅出于爱好，设计水平往往不下于专业水平。胡风为《七月文丛》、《七月诗丛》设计的封面，喜欢选用相关的外国美术作品作装饰，卞之琳则依靠铅字的组合变化来设计封面，并自称是受了法兰西派装帧风格的影响。另外，如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叶圣陶、郭沫若、周作人、魏建功、郑振铎等学者名流，喜用各自的书法和名章装饰书衣[2]，显示出独有的民族化特色。作家学者们的深厚修养，给当时的书籍装帧界带来了一股浓郁的书卷气息。

【1】姜德明:《书衣百影·序》，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2】姜德明:《书衣百影·序》。

随着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正式确立，以及人们对书籍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装帧设计作为出版流程的环节之一，被固定了下来，并受到各大小出版机构的高度重视。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配有专门的书刊设计人员。生活书店的郑川谷、莫志恒，开明书店的钱君匋，北新书局的郑慎斋等，亦成为各自书店相对固定的书刊设计者。中小书局由于受到人手的局限，书刊装帧多假借于外手。丰子恺、叶灵凤、钱君匋、孙玉麟、方雪鸪、郑慎斋、杨超尘、糜文焕等人的装帧设计，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出版界一度享有盛名，成为各书店重要的购稿人选，孙玉麟甚至还与顾其城成立了"黑猫美术社"的组织[1]，为各书店专门作书刊设计。而像文化生活出版社那样，由巴金、丽尼、陆圣泉、吴朗西等自家编辑、自行设计封面的情况，在出版界也有一些，但并不普遍。

[1]《小消息·封面画者一瞥》，《出版消息》第2期，1932年。

在书刊美术工作者和出版者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那个时期的出版物装帧呈现出不拘一格、百花齐放的特点。一般而言，大书局出版作风稳重，不尚冒险，表现在书刊装帧上，则偏向于严肃与规整，偶或请一些外面的美术工作者来设计封面时，才见有明显的变化。中小书局在市场夹缝中生存发展，出版作风相对新锐大胆，表现在书刊装帧上，更趋向于新奇与变化，个性化特色鲜明——有的画风写意，不求具象，有的则手法写实，白描构图；有的以夸张的漫画，为世象写生，有的则以抒情的笔触，描人间百态；有的图案简洁而淡雅，弥漫着宁静之美，有的则色彩绚烂而生动，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有的以作家肖像入封面，意在凸显作家的实力，有的则取明星玉照作装饰，力图追踪时尚的风向；有的画风纤细，含蓄中浸润着书卷的气息，有的则笔墨潇洒，豪放中充满了抗争的力量；有的崇尚传统古典工艺图案，风格质朴，民间意味浓郁，有的则照搬原书插图作封面，省事讨巧，虽欠高明，尚无大害。正是这些手法不一、风格各异的书刊装帧艺术，把出版物百花园装点得争奇斗艳、异彩纷呈。

应该说，大小书局装帧设计风格的差异，与各自的书刊出版

重点亦大有关系。社科文艺类的书刊，较之于教科书、工具书、古籍等出版物，在装帧设计上，自然审美的要求更高，艺术创作的空间也更广阔。这一类书刊，恰是许多商业性中小书局的出版强项。新潮社、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天马书店、新月书店、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亚东图书馆、金屋书店、春潮书店、水沫书店、乐群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良友图书公司等这样一些在当时较为有名的中小书局，均以出版社科文艺类书刊见长。那个时期许多新意迭出、可圈可点的装帧设计佳作，多出自这些中小书局，也就不奇怪了。而大书局热心出版的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学术著作等一类出版物，装帧风格表现出朴素与稳重的特点，亦是其内在设计理路的固有要求。类别不同，各宜其面。我们正是从这样的区别与划分上，看出了那个时期书刊装帧设计逐渐趋向成熟的一面。

这一时期书籍装帧的进步和成熟，还表现在整体书装设计意识的加强上。不光是封面，还有封底、书脊、勒口、环衬、目录、衬页、扉页，甚至广告页等书籍其他部位，都一同纳入到设计者的视线范围之内。不光是图案，还有颜色、字体、版式，乃至材料、印刷与装订工艺等其他设计元素，均在设计者手中组合与变化、布局与安排，不同的只是设计水平存在着上下高低之别罢了。作为书籍装帧重要元素的插图，运用得更加普遍，类型上也日渐丰富。除了传统的版画以外，人们在书籍中还能欣赏到照片、漫画、油画、水墨画、素描、钢笔画、碑文拓印等多种类型的插图，提高了书籍内容的表现能力，带给读者更多样的视觉感受。在丛书的设计上，设计者多能顾及到丛书集束性推出的特点要求，作统一性的装帧，偶或有所局部的变化，那也是为了使整套丛书在保持醒目大气的同时又不失灵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全国形成了大后方、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等三大出版区域。战前出版机构印制封面所普遍采用的铜版和锌版技术，在战时的大西南和延安等地，因印刷设备和纸张供应的大为不济，不用或用得很少。印刷条件

限制了装帧的表现手法。而版画那种一块木板、一柄刻刀即可制版印刷的简单工艺，更能适应战时的恶劣环境，一时间被许多书籍设计者所采用。加上“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等全国性版画团体组织的推波助澜，木刻艺术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书籍装帧的一大特色。从当时来看，版画中运用最多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漫画。漫画简单的笔法，生动的形象，讽刺的意味，为广大民众所喜见。丰子恺、钱君匋、张光宇、丁聪、廖冰兄、余所亚、特伟、黄苗子、郁风、新波、梁永泰、朋弟等人，都设计过不少有特色的漫画封面书刊。版画加漫画的表现手法，在那个战争年代里起到的战斗宣传作用，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印刷条件较战时有明显改善，书籍装帧艺术又获得新的发展。在装帧设计者中，以钱君匋、丁聪、曹辛之等人的成就最为明显。老画家庞薰琹、张光宇、叶浅予、章西、池宁、黄永玉等也有创作。丁聪的装饰画以人物见长，曹辛之则以隽逸典雅的抒情风格吸引了读者[1]。

【1】姜德明:《书衣百影·序》。

二、印刷

从晚清开始发轫的新式印刷技术，到了民国时期，已基本上替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成为时代的主流。抗战前的20余年时间，是我国印刷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国外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很快被引进过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一些有实力的印刷企业，开始尝试印刷技术的民族化改进与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印刷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生产力要素，推动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向前发展。

印刷的用途虽然多种多样，但在民国时期，印刷主要集中在书刊生产领域，用于其他商品的比例不大。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一时期独立的专事印刷的机构反而不多，多数印刷厂则直接隶属于出版机构，或者印刷厂兼营出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正中书局等大出版机构，无不有自己的印刷厂，其生产设备、生产能力、生产水平等，始终保持国内领先

地位。

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原本从印刷厂起步，后来抓住了机遇，才发展成为编、印、发一体化模式的大书局（图36）。印刷作为主要业务之一，一直受到馆方的高度重视，多次派员出国考察，了解其技术最新发展动态，及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聘请国外技师指导，同时还自己制造石印机、铅印机和铸字机等多种印刷机械，在自给之余，售予其他印刷企业(见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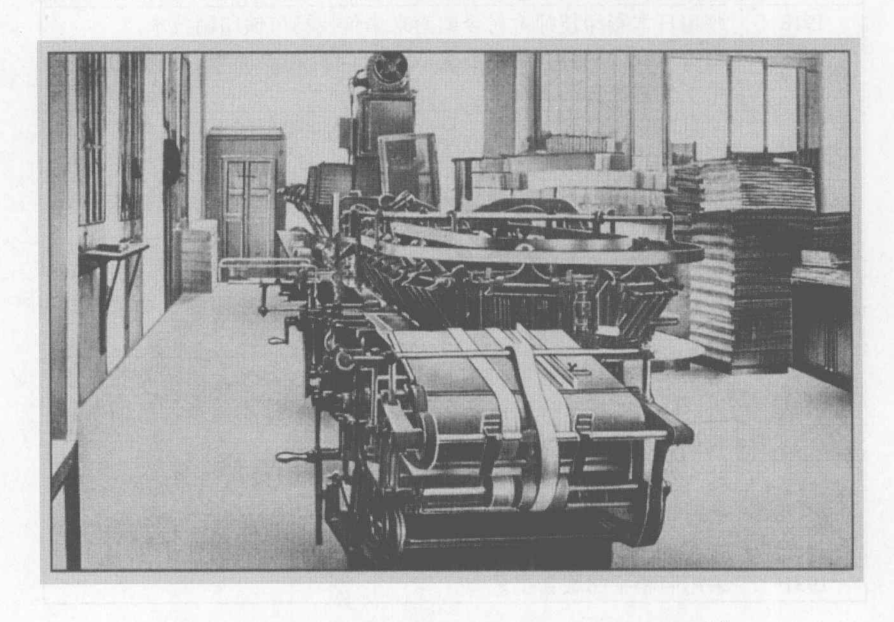


图36
商务印书馆装订部新式自动订书机

表一 商务印书馆引进技术设备和技术改造简表[1]

年代	记 事
1900	收购日商上海修文印刷所，始用纸型铸铅版印刷。
1904	聘请日本技师前田乙吉和大野茂雄来华指导，改进照相铜锌版技术。
1905	始办彩色石印，聘请日本技师传授技术。又聘请日本雕刻版技师和田满太郎、三品福三郎、角田成秋等三人来华传授雕刻铜版技术。
1907	派郁厚培去日本学习照相制版技术。始有珂罗版，后又采用彩色珂罗版印刷新技术。
1908	引进铝版印刷机，聘用日本人木村今朝男为技师，每小时能印一千五百张。
1909	聘请文字学家将姜别利设计的字架，按书报要求进行改革。聘请徐锡祥刻制二号楷书字模，后又刻制方头体和隶书体字模。

【1】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中华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

续 表

年代	记　　事
1910	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去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和印刷。
1909—1911	聘请美国技师施塔福试制三色版成功。
1912	始用发电机发电制作电镀铜版。
1913	印刷所所长鲍咸昌赴英、法、德、奥等国考察印刷；引进汤姆生自动铸字炉，铸字效率可达15 000余枚/日。
1915	引进美国海立司平印机，聘请美国技师魏拔来华指导。聘陶子麟刻古体活字，刻成一号、二号古体活字二副。
1918	聘请日本彩印技师木村今朝南来华传授马口铁印刷技术。
1919	引进米利印刷机，后又引进双色米利机和双面米利机。聘请韩佑子创制仿古活字。
1920	引进照相石印术。经理王显华和印刷所所长郁厚培去英、美考察印刷，聘回技师四名。
1921	率先采用美国人汉林根传入的彩色照相石印术。引进新式制纸型机，用强力高压纸型厚纸制型。
1922	引进德国爱而白脱公司的滚筒轮转印刷机，印速大增。引进英国乔治门双色平印机。成立铁工部，生产多种印刷机械供应市场。
1923	聘请美国技师福劳斯特来华传授雕刻版复制术，引进轮转凹印机。聘请德国人海尼格来华教授照相凹版技术。张元济创制新式排字架。
1925	购入英美烟草公司印刷厂新从荷兰买来的彩色照相凹版设备，此后于20 世纪 30 年代初印制彩色影写版印刷品。
1926	在铁工部基础上扩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厂。
1931	采用照相平凹版新工艺

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成立后不久就筹建起自家的印刷所，对内印刷本版书刊，对外承接社会印件。1916年，中华书局扩大印刷规模，建新厂于上海静安寺路，厂屋宏大，光线充足。设备上，一方面不断引进德美等国最新的印刷机械，另一方面又先后并入右文印刷所、彩文印刷局、聚珍仿宋印刷局等厂的机器生财[1]；人才上，一方面高薪聘请国内外高级技师，另一方面则派人出国考察与培训。因此印刷能力和印刷业务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彩印方面，因设备好、技术精，招揽的印件尤多。20世纪30年代前期承印的大宗印件有：财政部之公债票库券；各银行公司之股票、钞票、支票，各大公司工厂之商标，南洋兄弟

【1】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回忆中华书局》(上编)，194页。

烟草公司之香烟壳纸，以及申报馆发行之中国分省新图等[1]。到了1934年，随着印刷业务的巨大发展，原先的厂屋又不敷应用，1935年别建新厂于澳门路。新厂占地十余亩，建有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大楼五幢，在印刷能力和技术水平上，比以前又有大幅度提高。经过一二十年的锐意经营，到抗战前的全盛时期，中华书局已在上海、香港拥有三个印刷厂，职工两千余人。在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力量上，不仅在全国，就是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也堪称是首屈一指[2]。

大书局办印刷，对于其出版经营意义重大。一方面，印刷业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有利于摊薄出版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印刷对出版活动也是一个极大支持，它保证了季节性强的教科书的及时供应和预约出版的大型丛书的如期完成。正因为办印刷利之存焉，资金雄厚的大书局才竞办印刷厂。中小书局由于资金有限，兼之自身印件不多，一般而言，所出书刊多委托他人代印，好在当时印刷企业竞争激烈，呼应起来倒也未见不便。印刷成本中的纸张和排印费用，按照当时书业常规，甚至还可以找纸行和印刷厂先期赊欠，这对于资金通常短缺的中小书局来说，有利于资金周转。当然，中小书局自办印刷厂的也有一些，如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世界舆地学社等。良友和时代以出版画报有名，其各自编印的《良友画报》和《时代画报》，采用影写版印刷，美轮美奂，备受读者欢迎；世界舆地学社则以编印各种地图著称。报纸出版讲求时效性，所以《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社，无不在印刷上自给自足，印刷力量之雄厚，堪与大书局相提并论。20世纪30年代初期，申报馆印制的四色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不仅以其编纂之精，同样也以印制之美，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民国时期，凸版铅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平版胶印、珂罗版印刷、雕刻铜版、电镀（电铸）铜版、照相锌版、凹凸印、照相凹版等一些国外新兴的印刷方式，都在国内的书刊生产中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其印刷水平之高，时人曾评价说：

【1】《申报》，1934年4月9日广告。

【2】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回忆中华书局》（上编），195页。

"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1] 然而，在印刷技术应运快速发展的同时，当时的印刷界人士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印刷工业与国外的巨大差距。国内印刷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纸张油墨等，绝大多数依赖进口。据海关统计，1928年我国进口各种印刷材料耗银已达31 662 710两[2]，到30年代还继续向上扬升。印刷材料的巨额进口和日益增长，体现了国内出版的强大内需，反映了出版的进步，但同时也给国内出版造成很大影响，如直接进入书价的印刷成本，往往因外贸的牵制而出现上下波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书价较低，和抗战胜利后书价的飞涨，一下一上，都与纸张进口价格和政策控制大有关系。抗战爆发后，外国纸张进口来源大为减少，各种土纸不得不派上用场，以至于国内出版物印刷质量大不及战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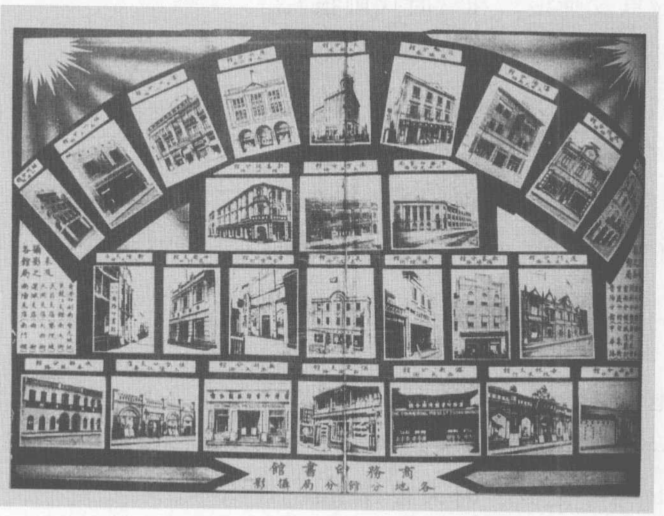
【1】贺圣鼐、赖彦予:《近代中国印刷术》,《装订源流和补遗》,384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

【2】万启盈:《近现代的中国印刷》,《装订源流和补遗》,427页。

第五节　书刊发行

民国时期的书刊发行，基本上沿袭着清末已成形的销售格局，略有些发展变化。当清末最后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时，它在上海总部设发行所和门市，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普设分支机构的发行销售模式（图37），为民国时期次第崛起的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各大书局所效法（见表一）。分支机构等于一个个发行网点，对开拓地方图书市场，推销本版图书，尤其是对本版教科书的征订与发行，起到了应有的龙头作用。有关读者信息的调查，有关与教育界的联络，有关大型图书

图 37
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分局



的预订与发放等，都是分支机构的职责之所在，从不同方面支持着总馆或总局的出版活动。

表一　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各地分店一览表[1]

城市	商务分馆建立时间	世界书局分局建立时间	城市	商务分馆建立时间	世界书局分局建立时间
汉口	1903	1922	长沙	1904	1923
北京	1906		天津	1906	1924
福州	1906	1925	沈阳	1906	1922
开封	1906		潮州	1906	
安庆	1906		重庆	1906	1924
广州	1907		成都	1907	
济南	1907	1925	太原	1907	1923
杭州	1909	1925	芜湖	1909	1925
南昌	1909	1923	黑龙江	1909	
西安	1910		保定	1913	
吉林	1913		兰溪	1914	1925
衡阳	1914		南京	1914	1925
贵阳	1914		香港	1914	
梧州	1915	1925	常德	1915	1925
昆明	1916		张家口	1916	
新加坡	1916		南阳	1918	
厦门	1924	1925	汕头		1924
衢州		1924	运城	1925	
温州		1925	徐州		1925
武昌	1927		大同	1928	

然而，设分局需要房屋和人员，非有雄厚资金不办，因而大书局这一销售模式，对资本短缺的中小书局就不那么适宜，像儿童书局、现代书局之类的中型出版机构，顶多在全国中心城市或销路较好的地区，设立三五个不等的分店而已，许多小书局连在上海的门市都没有，遑论在各地设分店了。再说，设分店也不见

[1] 转引自[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53–54页。

得都能赚到钱，1918年前后的商务印书馆就约有2/5分馆亏本[1]。所以早年曾为商务、中华的发行出力的沈知方，深知其弊端，当他为自己的世界书局铺设发行网时，采取了主要设立特约经销处的办法：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这样一种发行方式也为后来很多中小书局所常用。其方式是，外地书店在预先向出版者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某某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某某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出版者在给予特约经销店上述特权的同时，也对其每年的本版图书销售额，有着数量上的硬性要求与规定[2]。如此协议，双方既互惠互利，又彼此牵制，在资金往来的信用方面，相对来说较为有保证。

各书局发行所的业务，批发与零售兼顾。发行所既然零售，便充有门市的功能。过去商务印书馆、儿童书局等少数书局，在本市发行所之外，另还觅地开设门市售书。从史料看，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书店门市卖书，基本上都不开架。到“一·二八”之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致力于恢复营业，为了吸引读者，改闭架为开架，风气才渐开。以竭诚服务读者为宗旨的战前生活书店门市部，设在上海福州路复兴里，布置方式一如图书馆，各类图书按图书分类法陈列，售书大厅中设有座椅，方便读者随意取阅和坐看。此外，还设有推荐书台，所荐之书，不限于本版，且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3]，确实体现了一个新书店的服务读者的精神。

各书局批发业务的对象，既有本埠同业，更多的还是外埠同行。批发折扣，因书、因店、因时而异。因书而异的，可参见商务印书馆1918年给门市、零售商、分馆发货的折扣表（见表二）。因店而异的，比如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相互推销对方书籍，商务批给生活的货，折扣比较高，要八折或八五折，甚至九折，而生活批给商务的书，折扣则是七五或八折[4]，双方明显的不对等。出版者除了给经销商折扣之外，往往还有回佣，回佣的多少根据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56页。

【2】《申报》，1935年12月26日。

【3】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85页。

【4】邵公文：《三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的批发工作》，《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

经销者销售业绩的多寡而定。销得多，回佣就高，反之亦然。回佣方法，对零售商是一种鼓励，对出版者也有好处。因时而异的，如1936年教育部因不满于各出版者图书定价多不真实，往往任意抬高定价，大打折扣，对教育造成不良影响，特颁布划一图书出售办法十条，令各地教育局和书店一同遵守，同时还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整饬各书店改售实价。书业公会为此议定出细则64条，并将之公布于报端[1]。

[1]《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为划一图书售价办法公告》,《申报》,1936年6月2日。

表二 商务印书馆1918年给门市、零售商、分馆发货的折扣状况[2]

类别	门市折扣	现金批发折扣	赊账批发折扣	发分馆折扣
甲类（小学课本）	50%	45%	50%	30%
乙类（中学课本）	70%	63%	70%	47%
丙类（英文读本和非小说图书）	80%	72%	80%	54%
丁类（期刊）	100%	100%	100%	
小说	60%	54%	60%	40%

[2]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72页。

批销方式有现金批发，多数的还是赊销。民国时期的书业界，“吃倒账”的现象司空见惯。零售店欠账进货，卖后给钱，一年三节是双方结算的日期，信誉好的，尚能按时结算，信誉不好的，则是长期拖欠。昔日的上海，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曾经挂牌的出版社数以千计，而能维持到十年以上的书局，统计起来区区不过几十家。对于那些忽起忽灭的绝大多数，导致它们最终关门大吉的原因，数说起来，自然难于归一，但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因为“账底”作祟，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最终出局者。史料记载说，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马路的那些新书业同业们，每当得知有内地书店的老板或经理，每节或每年一次来上海就近结账或配货，彼此间只要平时有些感情的，即辗转相告，好像是来了个活财神似的。如果那书贾，带了一些现金来付账或办货，则其旅馆中更是门庭若市。请客，拉拢，各尽其能。套交情的方法，甚至有花酒、鸦片、麻雀、看戏等[3]。从这里，可看出发行在出版

[3]《申报》,1935年12月26日。

活动中的重要性，也能明白为什么一些大书局包括世界书局，在明知分支机构同样存在弊端的情况下，依然热心于在全国设分店了——自家的书，自产自卖，不假手于他人，钱款的调度呼应自如，确是省却了诸多欠账还钱之类的烦恼。

而邮购的方式，读者是先款后书，绝无一般发行中的回款之虞，因而此项业务受到出版者的高度重视。在民国时期，大一些的出版机构都设有专门人员，负责读者的联络和邮购工作。其中，以出版界后起之秀——生活书店的成绩最为出色。创建初期的生活书店无力开设分店，便独辟蹊径地在邮购上大做文章，其邮购部人员一度多达20余人，是它抗战前业务最繁忙的部门。生活书店先后建立起的5万邮购用户[1]，覆盖到海内外众多通邮地区，遍及到个人、图书馆、机关和团体读者，很好地发挥了渠道甚至是主渠道的作用。在具体的邮购业务流程上，生活书店建立起分工细密的流水作业线，从拆信登记、信钱分流签收、抄书单配书、开票，到为余款结存的用户开往来清单、复信、打包寄出等，都有专人负责，有条不紊。另外，生活书店还为读者便利通信购书考虑，特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等十大银行签约，由它们所属设在国内外的500多处分支行，一律免费汇款购书[2]。这一做法后来为众多出版商所仿效。与邮购一样，同样是读者先款后书的，还有预约发行。我们在前文谈融资手段时已提及，兹不赘。

【1】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84页。

【2】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93页。

为了提高图书销售额，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些出版机构的发行所或门市店，除了销售本版书外，同时还为学校、学术团体、图书馆等机关单位开展外版书刊的代购代销，为内地书店同业开展上海版书刊的配购批发的业务。且看1934年3月8日现代书局在《申报》上刊登的一个告示——《现代书局敬告全国各图书馆、杂志社、学校、书店公鉴》：

现代书局是各图书馆的选配编目者。贵图书馆在选配图书及定期刊物时，因出版处的不同，要零星分别汇

款向各处购办，有觉得麻烦么？还有规模较小的图书馆，缺乏分别编目的人才，对图书管理有觉得不便么？这就要请让现代书局为贵图书馆服务吧：请把配书单和书款寄给本局一处，我们就可将贵馆所要的各种图书杂志代为搜罗寄来，而且还有优待的办法。我们所编的《全国图书总目》，是用分类法专门编制的，可以帮助贵馆管理图书。零售只收一角五分，图书馆盖章函索，即可免费赠阅一册。

现代书局是各地同业的驻沪庄客。上海不但是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并且也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国内文化界的代表刊物以及新旧图书，都以上海为发源，内地书店同业例须每年派遣专人来沪，采办新出版书报，耗去无数旅费栈费。边远的以及海外各地，事实上也就无法派人。这里就请让现代书局为贵同业服务吧：本局是国内唯一的新书店，与上海各书局均有经营往来，对于各种出版物的销售状况非常灵通，可以代贵同业配办各种新出杂志书报，价格折扣，极为低廉。在我们有了多为文化界服务的机会，在贵同业亦可免派人驻沪的耗费。

现代书局之所以要开展这项业务，主观上的动因，当然是为了获得出版之外的另一份销售上的收入，客观上的条件，也是当时我国书业界一直缺乏专门的书刊批发机构可资利用。现代书局做的正是一种拾遗补阙又符合现实需要的工作。惜乎这样一种本可大有作为的业务，因现代书局自身的危机而寿终正寝。倒是后来上海杂志公司专业化的杂志贩卖与批发，在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专门书刊批发机构的缺位，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书刊发行渠道的不完整和发行机制的不健全。这种状况，对于有众多分支机构的大书局而言，尚无大的妨碍，而对一些中小书局来说，则构

成了出版发展的制约瓶颈。对此，开明书店负责人夏丏尊在《中国书业的新途径》一文中，有切肤的感受和深刻的表述。他说："书店所制成的书籍，原可与别种商品一样，除门售外，批发给贩卖商销行到外埠去，不一定要在外埠自设分店。但书店为了要防止放账上的危险及其他种种原因，皆于总店以外在重要都市另设分店。……总店以外，还要具有许多分店才算骨骼完整，规模初具。书店的机构庞大如是，非有巨大资本不能应付。可是按之实际，书店的资本薄弱得很……于是只好缩短阵线，大家把眼光集中于销路比较可靠，而成本不大的书籍上。第一是中小学的教本，次之是不要稿费或版税的旧书翻印。行有余力，然后轮到别的新书。各家所出版之书籍，既互相重复，发行人竞争自然激烈，或用巨幅广告来号召，或违背同业定章抑低折扣、滥放客账来倾销，结果发行费用非常浩大，利润随而减少。"[1]

继现代书局之后，有志于做专业书刊批发销售的，尚有1935年10月中国书业联合市场的开幕[2]，经营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抗战后期，重庆的十余家中小民营出版机构组织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下各书店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重庆和成都分别设立了第一联营书店和第二联营书店，在西安开设特约分店，联合销售图书，联合刊登广告，编印联合书目等。联营书店当时也提出了"出版分工，发行统一"的方针，给参加的中小出版社的发行增加了活力。1949年9月，联营书店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重申了这一出版方针，会后又扩大股东出版社55家，这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发行专业机构。联营书店于1951年与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3]。

【1】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大公报》1945年12月27日。

【2】《申报》，1935年10月13日广告。

【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54~355页。

第六节　书业广告

出版只要是商业性存在，广告宣传便不可免。我国古代的出版商在没有大众传媒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曾设法利用书中的牌

记、题识、刻书目录等手段招徕读者。这些手段可视为我国出版业早期的书业广告。近代以来，随着铅排技术的引进，教育活动的普及，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及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出版行业从过去作坊式经营的狭小胡同，逐渐走向了大市场销售的宽广坦途。大市场带来了大流通。作为发布、沟通书业信息重要工具的书业广告，开始借助于一些新型的大众传媒，成为近现代书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叶，带有浓厚商业特征的民营出版社登上了书业活动的中心舞台，并逐渐取代原来的官书局和教会出版机构，而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主体。民营出版业"在商言商"的性质，加速了我国这一时期书业广告的近代化进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营出版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华书局的迅速崛起与壮大，使得书业界的商业竞争更形激烈。书业广告在一些锐意经营的书局经营者眼中，已不啻是推广营销本版书刊的有力工具，更被看作是提高自身竞争力、挫败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20年代，新的书局书店借助新文化运动的东风，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民智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创造社出版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大江书铺、新生命书局等，都在这一时期先后挂牌营业；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机构虽然不是这个年代成立的新社，但均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广为世人所知晓；尤其是世界书局，因编写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成功，而一举成为与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第三大出版机构。这种出版格局的新变化，在《申报》的书刊广告栏里有清楚的反映。如果说《申报》书业广告栏的第一个十年，商务印书馆几乎独擅胜场，第二个十年商务与中华两雄相向、并肩而立的话，那么到了第三个十年，广告栏里已不再是少数几家出版社的天下。虽然商务、中华、世界依然霸占着广告栏里不小的地盘，但广告栏里不时冒出来的新面孔，告示了这一时期书业界春秋战国局面的正式形成。20世纪前一个十年中的《申报》广

告栏里，虽然偶或也能见到一些中小出版社的名字，但大多不显山不露水，充当着陪衬的角色，而到了20年代，情况则大为改观，中小书局如北新、开明、大东、光华、现代、新月、亚东、泰东、群益等已大踏步地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广告栏目里常来常往的熟客，表明此时的中小书局已发展成为书业界一支不容小觑的出版力量。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30年代，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最为鼎盛的黄金时期。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继续获得发展。虽然20年代或更早时期成立的一些中小型书局，如新月书店、创造社出版部、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等，或因经营不善，或因出书遭禁先后倒闭歇业，但与此同时却又有一些新的出版机构补充进来，儿童书局、黎明书局、生活书店、正中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都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出版社。这些新出版机构高知名度的获得，一方面固然是通过其出版发行的书刊被读者所阅读接受，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身的大力宣传活动使读者所了解与知晓。就这一时期的《申报》图书广告栏来看，作为教科书五大出版机构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继续占据着广告版面的要津位置，但神州国光、北新、儿童、黎明、正中、生活等书局书店，也常常出没其中，身手不凡。尤其是作为当时书业界新秀的生活书店，自1933年4月起，将多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刊社的广告，化零为整地集中在一起，以联合广告的形式，每月一期地集束推出，显示了独到的广告创意，收到了很好的商业效果。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后，我国的出版业遭遇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在其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出版界新局开张者少，老局关闭者多，而那些继续苟延下来的，则大多在残喘着，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报刊媒体上虽然还可不时地见到出版部门所做的书业广告，但规模和气势上已大不如从前。《申报》书业广告栏面积的大幅缩小，有力地说明了战争状态下，我国书业界的巨大没

落与萧条。

从我国出版史的整体来看，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确立和快速发展时期，也是书业广告蓬勃兴起和最为活跃精彩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几乎做到了有新书出，必然广而告之的地步，中小型的书局书店也大多在结合自身的出版实力和书刊品种规模的基础上，设法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广告宣传。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铸就了出版经营者浓厚的书刊商品意识，推动了书业广告的兴盛与繁荣。当时的出版部门不仅充分重视利用报纸、期刊等新兴起的大众传媒进行宣传，也注意广泛开发诸如本版书封面与附页、图书目录、图书样本、包装纸、信封袋、广告牌、招贴画等载体进行推销；不仅为出版流程中的编、印、发诸业务环节频频广而告之，还在媒体报端刊载有诸如人事招聘、招股集股、股东会议、新局开幕、旧址搬迁、支店开张、联合营业、周年纪念、版权声明、商标征集、旧货拍卖、多种经营等其他一些业务内容的广告；广告中既不乏有大量的产品导入期的图书预约广告和新书出版预告，更多的还是产品生长期和成熟期的在版销售广告，同时也包括不少产品衰竭期的廉价销售广告。

在过去，一些较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为了确保广告效果的优质高效，先后在各自的机构组织中，设立有专门的推广部门。广告机构的设置，为广告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人员保障。事实上，我们从民国时期一些大出版机构所做的诸多有特色、有个性的书业广告中，确也不难体会出组织者在广告运作过程中的匠心。从广告媒体的选择到主次书刊的区分，从读者对象的把握到广告说辞的诉求，从广告版式的设计到时间进度的安排，从广告名目的巧立到名人号召力的借用，从自我形象的定位到广告风格的确立，均能找到一些可圈可点的广告范例。

以上对民国时期的书业广告，进行了粗轮廓的描述。着墨的重点，主要在介绍当时广告活动中成功的、好的做法，而对一些

负面的、不好的一面鲜有论及。其实，正如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有良莠之分一样，民国时期的书业广告也是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大书局的书业广告做得较好，有固定的机构组织，有明确的战略部署，有一贯的严肃作风；而一些小书局的广告，大多零星不成系统，其中不乏有浮夸虚假、粗俗恶劣者。还有一些不诚实的书商，甚至利用广告，诈取读者钱财。如1934年登报发售《二十六史》预约的书报合作社，收取读者预约金数万元，两三年时间过去了，既不出书，又不还款，书店后来转盘给他人，也不给预约读者以任何交代，社会影响很不好[1]。当然，这可能是个别的少数现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的书业广告主流是好的，发展是迅速的，对促进我国现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舒新城日记》,《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第七节　书评活动

在我国古代的写作传统中，文论和史评素称发达，序跋和题记的历史也源远流长，这些文体都与近代意义上的书评，有很多相似之处。书评作为一种文体在我国的出现，是伴随着近代报刊的产生而产生的。甲午战争前的中文报刊处于初发期，少见有影响的书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推动了书报刊出版的繁荣，也有力地促进了书评活动的发展。梁启超和章太炎是这两个时期的领军人物，他们曾以其如椽之笔歆动时代的潮流，他们所写的书评文章同样影响深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人们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巨大需求，有力地奠定了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在随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书评与出版共生共长。一方面，书评在揭示图书特点、沟通书业信息、指导读者购阅、引导文化趋向、推动学术研究、弘扬出版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书评在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同时反哺自身，书评媒体增多、书评队伍扩大、书评理论研究和书评实践活动交互式发展。

民国时期的书评媒体相当宽泛，既有相当数量的专门书评期刊，亦有不少大众的或专业的报刊开辟了书评栏，还有一些书评

文章结集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949年前创办的书评期刊合计82种，其中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了6种，1930年代创办了41种，1940年代创办了35种[1]（见表一）。《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一些大报，都分别在不同时期设立过书评栏目。如天津的《大公报》，1933年9月邀约袁同礼等人开设了《图书周刊》副刊，主要评介中外新旧图书，同时报道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消息。撰稿者多系名家、专家，主要评价教育、史学、经济、政治等学科的大部头著作。《图书周刊》共出78期，于1948年12月31日停刊。再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1946年6月4日起，增设了"书报评介"栏目，评介了诸如《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上饶集中营》、《王贵与李香香》等革命书籍。民国时期期刊上刊登书评的也不少见，各大学学报上的学术书评，各专业门类杂志上的专业书评，不尽枚举。书评作品结集的有：刘西渭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常风的《弃余集》，冯亦代的《书人书事》，唐湜的《意度集》等。由于书评文章的增多，为了方便人们查找，30年代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书评索引。1934年7月由广州大学图书馆出版的、郑慧英所编的《书评索引初编》，可能是中国较早的单行书评索引。一些综合性的报刊篇目索引中，也常收录有书评条目。

[1] 孟昭晋：《中国近代书评源流初探》，《书评的学问》，2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表一　民国时期主要的书评相关期刊[2]

刊物名称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编辑出版单位	备　注
《图书汇报》	1910.7	1939.7	商务印书馆	
《图书月刊》	1915.2	1915.5	中华书局	每期均以较大篇幅列出"中华书局出版图书一览表"，并按类排列介绍
《读书杂志》（月刊）	1922.9	1924.2		

[2] 根据赵晓梅著《中国书评史初探》（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有关资料整理。

续 表

刊物名称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编辑出版单位	备 注
《书报介绍》（周刊）	1925	1925		共出21期，是《清华周刊》的副刊，主要登载古籍评介、中文新书、定期刊物及英文书籍介绍
《读书月刊》（月刊）	1930.11	1933.10	读书月刊社编辑，光华书局发行	以发表书评、国内出版界消息为主
《中国新书月报》	1930.12	1933.3	华通书局	共出3卷
《书报评论》	1931.1	1931.7		共出6期。介绍新书、评论书报、发表中外出版消息。主要评介社会科学著作
《读书周刊》	1931.3	1931.6	广州读书周刊社	以评介文学作品为主
《读书俱乐部》（半月刊）	1931.4	1931.12	现代读书会编，现代书局出版发行	以文学书评和文艺作品为主
《读书界》（月刊）	1931.5		上海读书界社	仅见1期
《读者》（月刊）	1931.7		上海读书月刊社	仅见1期，书评文章多采用论文的形式
《读书月刊》（月刊）	1931.10	1933.9	北平图书馆	主要刊载历史学论著，评介国内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类书籍
《读书周刊》	1932	1933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学会	
《图书周刊》	1932.7	1933.3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学会	
《图书评论》	1932.9	1934.8	刘英士编，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	是当时一本较有分量的官方书评期刊
《中国出版月刊》	1932.10	1936.9	浙江流通图书馆主办	共出6卷
《读书与出版》（月刊）	1933.3	1933.5	徐翔穆编，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	读书指导和书评刊物。共出3期
《图书季刊》（月刊）	1934.3 （中间曾因抗战休刊）	1948.12	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上海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出版	评介专著、中国古籍、世界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书籍，新书介绍等

续　表

刊物名称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编辑出版单位	备　注
《读书顾问》（季刊）	1934.4	1935.1	南京读书顾问社编，南京正中书局出版发行	是一本读书指导性刊物
《图书周报》	1934.9	1935.3	镇江江苏流通图书馆	
《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4.11	1936.11	上海杂志公司	提倡大众读书，鼓励大众写作
《读书与出版》	1935.5	1948.9	生活书店出版	内容以书刊评介和读书知识为主
	（中间曾因抗战休刊）			
《读书季刊》	1935.6	1936.3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编辑，出版至第二卷时迁南京，改由读书季刊社编辑出版	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指导青年读书及报告本分会会务
《图书展望》	1935.10	1949.1	浙江省立图书馆	该刊书评量较大
	（中间曾因抗战休刊）			
《书报展望》（月刊）	1935.11	1936.7	杨志粹编，上海书报展望社出版	主要以介绍新书刊为主。共出8期
《读书月报》	1936		读书生活出版社	
《读书向导》	1936	1936.9	上海东方书局	
《读书之友》（月刊）	1936.12	1937.7	陈忠豪编，上海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出版发行	以介绍中外名家名作、图书杂志为主，还刊载世界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生平介绍等。共出6期
《书人月刊》（月刊）	1937.1	1937.3	上海书人月刊编辑部编辑出版	共出3期
《读书半月刊》	1937.2	1937.2	陈子展编，上海读书半月刊社出版	以读书心得、图书评论、时事论述、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等为主。共出2期

续　表

刊物名称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编辑出版单位	备　注
《书林》（月刊）	1937.3	1937.8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刊载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图书评介、读书随笔与作家介绍等
《读书青年》（半月刊）	1936.7	1937.7	上海读书青年社	
《读书》（月刊）	1937.5	1937.7	上海杂志公司	共出3期
《书人月刊》	1937.1	1937.3		共出3期
《读书通讯》（半月刊）	1940.5	1948.10	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社读书会	
《书报》	1945.11		中国书报社	仅出1期
《图书月刊》	1946.8	1947.12	台湾省图书馆	1946年第1卷共出5期，1947年第2卷共出12期
《读书月刊》	1946.10	1947.1	上海名山书局读书会	指导会员读书和学习文化，共出3期
《新书月刊》	1948.7	1948.12	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	共出5期
《出版月报》	1943.9	1944.10	南京月报出版社	
《读书青年》（半月刊）	1944.10	1945.4	北平读书青年社	辅导青年读书自学的刊物。有“专题讲座”、“书评”、“文评”等栏目
《读书杂志》（月刊）	1945.2	1945.8	南京读书出版社	共出8期
《读书月报》	1939.2	1941.2	生活书店	以帮助青年自学、推进战时的学术为宗旨
《读书知识》	1940.4	1940.9	湖南长沙公益印刷公司	
《图书月刊》	1941.1	1945.12	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设“书评辑目”栏，专门编制有书评索引
《出版界》	1943.12	1945.3	重庆《出版界》月刊社	以论著、书评为主

民国时期，许多书评作者治学严谨，学养深厚，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文艺大家。举其大者，如胡适，撰文评述过的书籍多至百余种，“他的书评很多是评论当时重要学术著作的。如《读〈中古文学概论〉》、《评王国维的〈曲录〉》、《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等，在当时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他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考证和评论，则是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结果。他的书评形式多样，或书信、或序跋、或随笔、或论说，既有泛评也有专论。他特别善于围绕一本书把话题展开，运用大量的考证资料，旁征博引，议论风生，自成一家之言”[1]。如鲁迅，书评创作产量同样丰富，“根据统计，鲁迅翻译作品和古籍整理的序跋以及为他人的集子写的序跋，就有160多篇，占鲁迅全部杂文的1/10”[2]。鲁迅的书评，风格激烈冷峻，语言干练犀利，爱憎分明。

其他如闻一多，所评之书偏重于文艺，尤其以诗歌作品居多，其思维之新颖，见解之独到，激情之张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叶圣陶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和出版大家，多写有关教育书籍的书评和书业书评，文字短小而精悍，阐述细致而入微，善于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精髓，注重图书的导读和对读者的启发引导，“想尽种种方法，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茅盾在评论某一图书时，往往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和作者本人的其他作品以及别人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由远及近，由彼及此，具有知识性和普及性，有助于读者了解作品。少若（吴小如）的书评，形式不拘一格，文笔清新流畅，思辩周密，文采斐然。钱钟书的书评，论评精辟，说理透彻，旁征博引，公正客观，特别是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为欧美专家所写的英文书评，常被后人称赞。冯亦代的书评选题精粹，文字简洁生动，雅俗共赏。

而在民国时期的书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我们尤其要谈到萧乾（图38）。萧乾以作家、记者、翻译家身份名世，但他平生写的第一本书，却是一本叫《书评研究》的专著。这是他在燕京大

[1] 黄保定、季维龙：《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2] 吴道弘：《书评例话》，16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



图 38
萧乾

学的毕业论文，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也是我国书评史上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七万余言，系统阐述了书评的任务、性质和作用。萧乾极力主张书评的大众服务性。因为要服务大众，他大声疾呼："我们需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因为要服务大众，他要求书评的文字表达尽量通俗易懂，但这并不等于要取消书评的艺术性，相反，"如果书评想为读者所注目，它本身必须是生动的"，"文字间若毫无光泽，说起好话就肉麻，纵有高见也不为人所接受的"，因为要服务，书评应当勇于承担起对新书作出及时评价的责任，书评"没有文学批评那么全面、高深，但它比文学批评要及时而且扼要"，这不但对于读者，就是对出版者，也是很好的信息反馈。萧乾十分强调书评的公正评判性，认为书评应当独立于出版发行之外，不应为出版商所左右，为此，"书评家的基本态度应是诚恳"，"不马虎可也不拘守固定标准，不诋毁也不胡捧，对自己有信心，而又永不视自己的批语为终审判决，随时抱着探索尝试的精神"，只有这样，书评才不致沦为帮派的党员，书商的义务宣传员，它才能起到"面向着读者：替他选择，诠释，替他评价"的作用[1]。

萧乾不仅是书评理论的积极探索者，也是书评创作的热心写作者和书评实践活动的大力组织者。萧乾本人的书评写作，有系统理论作指导，入手早，起点高，说理透彻，文字流畅，不含任何违反书评原则的杂质，是真正纯粹的书评。在书评组织活动中，从1935年至1949年，萧乾在他五度主持《大公报》副刊期间，广泛团结书评家，不辞劳苦地培养和组织了我国第一批职业书评队伍，常风、李影心、刘西渭（李健吾）、杨刚、黄照、宗珏、刘荣恩、陈蓝等，是这支队伍中的主要骨干。他们在《大公报》发表书评的数量和质量，堪称中国现代书评史上的一个高峰。萧乾在编辑书评时确立的"持论客观，不捧不骂"的原则，保证了评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也是其书评实践和书评理论相一

[1] 以上引文均出自萧乾：《书评研究》,《书评面面观》,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9年。

致的表现。他通过编书评特辑、专辑，组织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关于书评的讨论，深入了书评的理论性研究，加强了作家、书评家、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书评大造了声势，对于促进社会对书评的关心和重视，导之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所创造性地采用的“集体评论”和“评者与作者对话式”书评方法，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朋友间肝胆相照、坦诚无私的谈心氛围，给文坛留下了深刻印象，给被评作家更是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1]。所有这些，都在民国书评史上留下了至可宝贵的一页。

【1】王波：《作为书评家的萧乾》，《萧乾书评理论与实践》，24~2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八节　多种经营

民国时期出版竞争十分激烈，出版业高风险。旧时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世界等，除致力于书刊的编辑、印刷、发行一条龙建设外，还在出版主业之外搞一些多种经营，以转移书业风险。此歉彼收，堤内损失堤外补，确是很明智的经营之道，也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特征要求。过去书业企业多种经营的类型，主要包括：书与刊的协调与互动、印刷机械和教育用具的制造与贩卖、附属学校和函授学校的开办等，真正与出版完全不搭界的如电影拍摄、房地产投资等，也有一些，但为数不多。

书刊协调与互动。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出版社出书之外，兼顾杂志的出版，是件十分平常的事。一般规模小的书店往往都要发行一两种杂志，大的出版机构更毋论焉。法国学者戴仁曾在他的专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一书中，对商务印书馆历年编订和发行的期刊，列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目录。其中，商务自己编订的期刊种数为35种，代为发行的期刊种数为46种，总数达81种之多[2]。事实上，戴仁先生的目录中还漏列了一些刊期短的杂志，比如1923年6月14日的《申报》上，刊出了商务的《好孩子》创刊号广告，该杂志就不见载戴仁先生的目录中，因此，商务实际出版的杂志数量肯定要比81种多。中华书局前后出版发行的杂志数量虽不及商务印书馆多，但粗略地统计一下，也

【2】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113~114页。

有40种左右。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发行杂志的总数也都分别达十几种之多。

出版社经营期刊，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期刊连续性出版，比一般图书更易为读者所了解和熟知，有利于扩大书局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二，刊物一旦办出影响，本身即可成为书局新的利润增长点；其三，不少出版社将出书优势和办刊类型结合起来，借助于刊物的媒体性质，与读者、作者之间有效进行沟通。过去大书局出版教科书，之所以相应地发行教育期刊，如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中华书局创办《中华教育界》，都有借重这块教育阵地，了解各地教育信息，开展有关教育调查，发现和培养高水平的作者，开发新的图书选题等意图在其中。其四，出版社自办期刊，可以充分利用期刊上的版面位置，做自身的书业宣传——书刊广告刊登于自家发行的杂志，既可在广告的安排上享有近水楼台之便利，又可在宣传费用上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印刷机械和教育用具的制造与贩卖。商务印书馆曾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上刊登过一篇“专售各种印书机器”的广告，这则广告说明，商务于建馆十年后已能生产多种印刷机械供应市场。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信誉好，产品供不应求，随着业务的日益发展，于1922年成立了铁工部，1926年在铁工部基础上扩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公司，独立经营，是为商务印书馆的子公司[1]。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75~76页。

在书局门市的店堂里，卖书之外，兼顾教育文化用品的销售，是过去书局经营活动中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图书和教具虽非同类产品，但所面对的消费对象却有重合之处。尤其是教科书，基本上和教具一样，都是直接为各级学校教学服务。在书店的店堂里连带经营文化用品和教育用具，既活跃店堂，又方便顾客，既能彼此促进，增加销售，又无需另增人员，多出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等都曾在报刊媒体上，做过与此有关的业

务广告。其中以中华书局在这方面的成绩最为卓著。

中华书局于开业后的第三年，便专门添设文具仪器部[1]（图39）。1929年1月，中华书局与胡庭梅等合资，在上海昆明路创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生产供各级学校使用的各种教学用具。到1937年初，该厂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十分可观的大企业，有理化器械工场二，标本工场一，模型工场一，制钟工场二；此外，还有显微镜标本制作室、微生物培养室，以及其他一些研究实验室等[2]。这些研究实验室，聘请专家从事审查、实验与研究。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从建厂到抗战前夕计八年多的时间里，生产出来的或仿制或自行研制的教育用具，如理化生物教具、理化普及仪器、畏氏经济仪器、立体几何模型、各种地球仪、显微镜玻片标本、人体生理病理模型、月日星期时辰钟、三用复印器、两用蜡纸、无线电收音机、高压杀菌器、陈氏皮簧算盘等，无论数量、种类还是质量，在国内都堪称首屈一指。其先后发明的“三用复印器”、中西文打字机打稿复印用的“两用蜡纸”、改正复印蜡纸原稿上错误用的“蜡纸改正药水”，以及每开一次可走二十三天的“月日星期时辰钟”等，均经政府特准专利，并颁发奖状[3]。而仿制的各种教具，也力求在价格上廉于舶来品，在应用上适合本国国情，既节省了外汇开支，又裨益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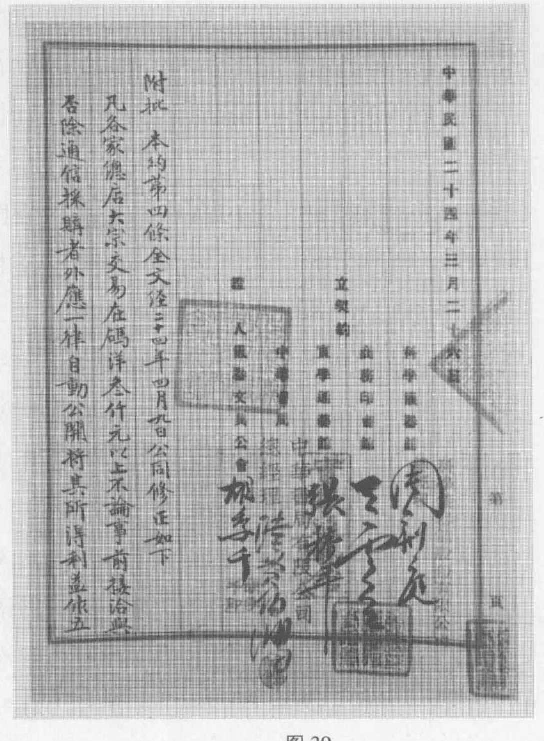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立契約 科學儀器館 商務印書館 實學通藝館 中華書局
證人儀器文具公會
附批 本約第四條全文經二十四年四月九日公同修正如下
凡各家總店大宗交易在碼洋叁仟元以上不論事前接洽與否除通信採購者外應一律自動公開將其所得利益依五

图39
中华书局与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实学通艺馆就销售仪器文具所订之契约

【1】《申报》，1914年2月15日。

【2】《申报》，1937年2月17日。

【3】中华书局股份公司概况（1936年）。

附属学校和函授学校的开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先后附设函授学校招收学员，两家招生的人数前后总计各不下万人，规模相当庞大。每次招生中，有关招生的科目、学费的收缴、办学的措施等情况，都会在报上张榜公布。从《申报》的广告栏里，我们知见的由其他书局办的函授学校还有，

【1】《申报》,1923年11月19日。

【2】《申报》,1931年4月18。

【3】《申报》,1921年3月13日。

【4】《申报》,1923年12月26日。

【5】《申报》,1921年3月17日。

新中国印书馆附设的英文函授学社[1]，大东书局创立的法律函授学社等[2]。20年代初，正当国语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商务和中华还创办了旨在推动国语教育的国语学校。从它们各自在《申报》上的招生宣传上，我们得知，商务印书馆的国语学校，创立于1921年，起初名为国语讲习所[3]，后改名为上海国语师范学校[4]；中华书局的国语学校，首批学员开班时间为1921年4月，校名为上海国语专修学校[5]。另外，商务和中华还开办了一些类似出版职业教育的商业补习学校，两家都面向社会招生，通过广告的方式，招收学员进校就读，以便毕业后择优录用。

这些，都可看成是有眼光的体现。书局兴办国语学校，除了书局主持人热心于国语教育这一主观上的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从书业经营的整体去考虑的。我们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国语教科图书、儿童书刊、民众读物、录制的国语留声机片等，若没有一个浓厚的社会国语教育氛围，没有一个广泛的信服国语热爱国语的小学教师队伍作基础，其销售市场必然狭小，书业利润也就无从谈起。而大书局出资兴办国语学校，正可看成是为自己培育市场的长远举措。另外，兴办这样一所服务性质的学校，还可以博取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的竞争力；学校附设小学，还可以实验书局编写的教科书，在实验中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教员来此培训，书局还可借此机会，加强与他们的感情联络，对推销本版教科书也不无用处。

而出版社办函授，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出版机构长期编写教科书，形成了强大的人才优势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办函授，正可以对这笔无形资产进行有效开发和综合利用。由行家里手办学，自然可以举重若轻，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而函授这种办学形式，无需固定资产投入，成本风险都很小。出版部门选择这一领域开疆拓土，可谓明智之举。从最终的效果来说，商务、中华等创办的函授学校，规模宏大，出版社无疑从中赚到了钱，宣传了自己，提高了与同业的竞争力，可以说是获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而函授教育的举办，又为众多青年业余补习提供了再学习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人才，又可以说是兼具了长远的社会效益。因此，这是一件于企业于社会两得其利的好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

第七章　出版家群体

第一节　张元济与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昌等七人合资创办。1902年张元济进馆以后，吹箫引凤，广泛吸纳人才，使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也是长期以来国内编辑出版人才最多且精的地方。在商务早期，曾经做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和留日学生监督的高梦旦，经张元济邀约进馆做编译所中文部的主任，后来更成为张元济的左右手；由蔡元培推荐的蒋维乔和庄俞，也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加上请杜亚泉这位中国最早受到西学教育的科学家担任理化部主任。以上诸人组成了商务最早的编辑核心。继有编辑教科书的夏曾佑，主编《绣像小说》的李伯元，主编《东方杂志》的徐珂、孟森，英文学者邝富灼，辞典专家陆尔奎，主编《少年杂志》的孙毓修，主编《小说月报》的恽铁樵，相继进入了商务这个出版文化圈。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路径和文化个性，但这个阵势不凡的编辑阵容，充分显示出商务人才群体的实力。到王云五主持时期，商务印书馆更依据新学科知识门类进行了新的人才组合，更大规模地引入新的人才，先聘朱经农、唐钺、竺可桢、段育华为编辑主任，继聘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为各部编辑主任[1]。商务印书馆的这一种人才群体，曾有商务自

【1】王建辉:《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江汉论坛》1999年第4期。

家人说：商务编译所“集中了专家学者近百人，俨然是一所包括大中小学教育的学术机构……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1]。商务印书馆还是近代出版人才的母体，分蘖了诸多的出版人才，民国时期几大出版机构的创办人，如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大东书局的吕子泉、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等，都是从商务印书馆捂离出来的。

[1] 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346页。

纵观商务印书馆前50年的发展，它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夏瑞芳、张元济和王云五先后主政的三个阶段。商务的发展是和这三个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商务发展全过程中三个不同的链条。这三个阶段首尾衔接并各有交叉。夏瑞芳卒于1914年，主要出版活动在晚清一段时期，《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对其已有详论，本卷从略。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张元济和王云五。

一、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奠定张元济一生事业理想的，是晚清以来国人普遍关注的国家富强这一中心问题。国家富强的目标别无争议，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的思考，晚清以来各种思想取向纠葛斗争，其是非成败难有定论。(图40)

图40 张元济



在时代大前提下，每个人思考的解决之道，因个人的因缘而有区别，并发为主张，实行于个人事业。张元济为前清翰林，思想趋新，参与戊戌变法，期冀以变法革新来挽回衰落孱弱之国势，而变法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仕途挫折没有改变其最初的志向，反促使他反省而转向“出版救国”的道路。早年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艰难的或缓慢的，决非急骤、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可以短期奏功。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富强”和现代化终是不切实际的口号。

而教育并非培养少数高等人才，要旨在于“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不在教育之列”[1]。

【1】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171页。

上述学理性的表达时间为1902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以高薪邀其加入。张元济以为，“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2]。因此接受了邀请，并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成为张元济投身出版业的动力，也是他一生事业的目标。

【2】张元济：《致蔡元培》，《张元济书札》（下），12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张元济首先是一个传统的学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幼年诵读儒家经典，稍后循科举之正途，26岁得中壬辰（1892年）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可谓少年得志。甲午失败，国人大受震撼，张元济也不例外。他开始留意西学，读英文，读法律书籍，致力搜求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而有“沉溺西学”的名声，在同僚中“久已见摒清议”。对中西文化，张元济提出了调和的主张，“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智、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针对当时办教育的人以洋人为师，认为“各国各有其独立之道”，“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张元济对中西文化建设的主张，以后来的实践看，颇有见地。

【3】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171页。

张元济的教育背景、社会阅历及朴实坚毅的性格，使其在投身出版业时，就能站在调和中西文化的时代制高点上，来为商务印书馆擘画未来的出版方针，那就是“知新温故，二者并重”。介绍新知，而不偏废旧学，汲汲于融会中西、有容乃大的新文化建设这一出版方向，不仅是商务一家的经营特色，也代表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特色；不仅在当时开辟了新书业的道路，对当代出版业也有借鉴的价值。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做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编印“最新教科书”。为了编印教科书，张元济四处网罗人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无到有，编译人员到1921年，多达168人[4]，蒋维乔、庄俞、高梦旦等一批优秀的编辑人才，正是应张

【4】据胡适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察的记录，当时在编译所工作的学生未计入。《胡适的日记》（上），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元济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在编写“最新教科书”期间，张元济亲自参与，与其他编辑共同讨论，编辑作风十分精审，所以1904年出版后大获成功。“最新教科书”的成功，从经济和人才上为编译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编印新式教科书以外，张元济还十分重视译介西学名著，影印出版古籍，以及出版工具书。张元济虽然是个旧学根基深厚的传统学人，但是他生在时局动荡、西学东渐的时代，作为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在思想上是趋新的，他主张积极汲取西方学术中有益的成分。在出版方针的设计上，重视汉译名著的出版，这是他早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的出版方向。在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一出版方向，出版了一系列严复翻译的名著，如《群己权界论》(1903年)、《社会通诠》(1904年)、《法意》(1904年）等，翻译外国学术名著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大出版特色，保持至今。除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以外，小说的翻译出版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也是有一定地位的，如1903年开始出版的《说部丛书》共4集，322种，包括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此外，他任编译所所长期间，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了杂志出版、工具书出版的新天地，杂志包括《东方杂志》（1904—1949年）、《教育杂志》(1909—1948年)、《小说月报》（1910—1931年）等，工具书有《辞源》等，这些都显示了张元济作为出版家的远见卓识。

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但在20世纪初始之时，一是社会上对古书的需求不足，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典籍被目为“野蛮书”；二是张元济虽见到“古籍散亡，印术日新”，“恒思择要影印以饷学者，然必须先得善本”[1]。商务若从事古书影印，藏书的丰富是必备条件之一。1904年，张元济就创立了涵芬楼（最初没有得名），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考查阅的内部藏书楼，但“所需者犹未备也”，仍不具备从事大规模影印古书的条件。为保存文献、抢救文化遗产和营业上影印古书计，张元济

[1]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张元济诗文》，282页。

大量搜罗典籍，丰富涵芬楼的馆藏。1907年，商务上海闸北宝山路总厂落成，积累的书搬进编译所三楼，就成为一个图书馆。1909年，图书馆命名为“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1924年5月，在宝山路总厂的对面，专门建造了占地2 600平方米的五层大楼，将涵芬楼的藏书全部迁入。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东方图书馆，并对外开放。善本书藏于三楼，仍名涵芬楼，聘请孙毓修主持[1]。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曾藏有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288种，超过了号称“百宋一廛”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2]。涵芬楼搜罗的丰富，为商务印书馆大规模影印古书提供了善本的保障。涵芬楼藏书可说是商务影印古书的基石。

【1】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3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11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虽然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中西学养兼备，但是相比较而言，张元济的中学修养好过西学，而王云五的西学修养好过中学。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是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出版方向，他不仅参与选题规划，而且亲自参与整理古籍。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大出版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整理古籍方面显示出卓越的版本学家素质。他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在文化界、读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后，张元济更以全副精力辑印古籍，其中最著名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学术界对张氏搜罗善本、校勘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道藏》等书的过程、价值研究颇详，此处不再赘述。1948年8月，张元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3]。对张元济的这一评价可谓名至实归。

【3】王建辉:《文化的商务》,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原载《大公报》1948年9月24日。

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为基地，把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为此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在人才管理方面有远虑，思想趋新，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在这方面他的理念和努力值

得探讨。商务印书馆由一小规模的印刷企业，发展壮大成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作为管理者的张元济看到的不是满足，而是危机。他在1917—1926年的书札中多次表达了他的忧虑，主要是对人才和管理制度上的忧虑。因此，他竭力主张引进年富力强、具有新知识的人才：旧有人才如果才能平庸、敷衍了事、成绩下劣，应该予以裁汰；对于老迈的旧人也应该退休，使新人有发展的机会[1]。他还主张健全管理制度，革除陈旧不利于公司发展的旧制度，他勇敢地指出："本馆成立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狭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日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其必终遭失败，可以断言。"还说："从前习惯足以为今日之障碍者，必当扫除，另行规定，俾昭整饬，庶治法治人同时可以并进，而公司亦可渐臻于光大巩固之域。否则冗员日多，人人趋避，徒保禄位，不负责任，弊病丛生，莫能防范。壅塞愈甚，驯至于不可收拾，而当局尚未可知。"[2]他还竭力反对公司高级职员的子弟在公司任职，并且自己身体力行，不让自己的儿子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发生员工亏空公司事件之后，他主张要送交法庭，必须予以惩罚，并进而要求健全会计制度。他的这些人才管理思想是先进的，但是与商务印书馆另一主持者——商务印书馆的原始创业者之一的高凤池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张元济提出辞职[3]，并于1926年正式辞去监理职务。他在《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书》中，再次恳切地提到自己的用人思想，认为"此为公司存亡成败所关，元济在公司二十余年，今临别赠言，不辞苦口"[4]。他辞去监理工作之后，被推为董事长，可以说他只不过从台前退到幕后，继续关心着商务印书馆，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后来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王云五的很多改革策略和出版计划，能得以顺利推行，都离不开张元济的支持。

【1】致高凤池信，1917年（六年三月九日），《张元济书札》（下册），931页。

【2】致高凤池信，1917年（六年三月九日）。

【3】张元济与高凤池在人才管理上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张元济在1918年已经为此提出过辞职。详见《致高凤池信》，《张元济书札》（下册），943页。

【4】张元济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

二、王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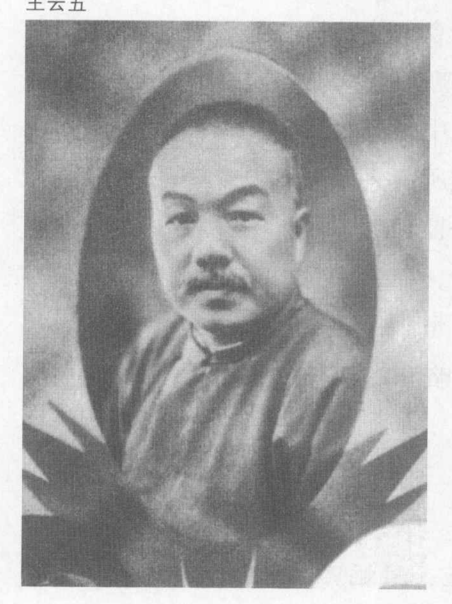
王云五（1888—1979），原名日祥，后改名云五，号岫庐，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王云五之进入商务印书馆，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之下，商务当局锐意改革，试图引进新人，适应文化潮流的结果。当初张元济、高梦旦数次北上京城，意欲招请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职掌商务编译所帅印。1921年夏，胡适应邀南下考察商务，最后向商务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同年9月，王云五便走马上任，先为商务编译所副所长，旋即任所长，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直到1946年4月他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这25年时间里，王云五位居商务印书馆要津位置，凭借商务印书馆这个社会舞台，在继承前人事业的基础上，以对商务机构的重新改革和对商务生产力出版资源的重新布局，以《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一系列重大出版计划，以从国外引进科学管理为内容的先进出版方式，以更平民化的图书出版，以更为商业化的经营，丰富了近代中国出版的内容。他以大企业家的姿态和极大的毅力艰苦工作，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国难之后商务濒于危殆之时，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复兴口号，以临危不惧的勇气，挽大厦之将倾，以“日出一书”开创了商务印书馆的鼎盛时期，使商务出版的图书占到全国出版物的52%，成为当时亚洲最大乃至世界最大的出版企业之一[2]。（图41）

【1】1929年9月，王云五一度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短时期地脱离过商务印书馆。

【2】王建辉：《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与近代文明》，347~34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图41
王云五



回望王云五的出版生涯，其成功固然得益于夏瑞芳、张元济等前辈为他在商务打下的雄厚出版基础，亦受惠于社会潮流和时代大前提的及时给予，但不可否认的是，王云五个人的出版家素质，亦是大有说头的因素之一。

王云五自称为杂家，这是就他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言。王云五靠自学成才，学习的对象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强烈渴求，使他读书十分博杂，既涉及各门各类，又体现为中外兼备。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从蔡元培到胡适，这样

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教育背景，是历史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1]。王云五虽然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他成长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亦深受其熏染。

有时，王云五以自己读书博而不精，不能成为某一专门学者，自嘲谓"四不像的学者"，然而，他在谈读书方法，尤其是在谈及出版家素质时，依然十分强调博杂的重要性。在内心里，他明白自己受惠于此，也推崇这种知识结构。他在一次采访时说到，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2]。当代人著作《出版学概说》中，在谈到出版者的素质时，也还是强调出版者的知识要杂，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德索尔在这本书中指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3]，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

王云五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极大的探求兴趣，即使到晚年时，"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4]。他钻研检字法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图书分类法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外如出版领域中的化学翻印法、航空纸型、中文排字改革等其他发明和改革，都与他对新知识的敏锐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有很大关系。而他为商务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以能"激动潮流"而自豪，若非对新知识的关注和敏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学而能用，善于借鉴和移植，也是王云五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他从邻居新造房子钉门牌而找到灵感，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加入三个符号，使中外文图书能够实现统一分类，进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研究新检字法时，从一部电报号码本找到创立号码检字法的灵感。他的选题计划也有不少是移植来的，从外国的百科全书到创编中国的百科全书、从《牛津大字

【1】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18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2】王云五：《岫庐最后十年自述》，30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3】德索尔，J.P.著；姜乐英，杨杰译：《出版学概说》，21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

【4】王云五：《漫谈读书》，《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17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典》到《中山大辞典》等，这样的例子颇不鲜见。

王云五在强调出版家的知识面要广博的同时，特别强调两门学问：数学和图书馆学。王云五12岁回广东老家，经常与一位堂房伯父去赶集。王云五随这位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藉为判断的标准”[1]。王云五成名后，他以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他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这个幻想的意思是指勇于创新和联想，但是光有幻想还不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还要借助于数学，“要使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末，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2]。重视数学的王云五在出版业经营中十分重视财务的管理。他虽因胡适的推荐，得以进入商务印书馆领导高层，但是能长期站立脚跟并在这个大书局中树立威望的，则是他主政期间，商务印书馆各项出版业绩的大幅度提升。王云五十分乐于将企业中视为机密的各种营业数字公之于众，通过数字显示商务的出版实力，展现自己的管理成绩。

王云五喜欢出版大型丛书，而大型出版计划往往机会风险并存，它既可以使一个出版社因之而兴，也可能使一个出版社因此而亡。而在商务史上，王云五推出的大型出版计划，往往成功，这与他在事前的认真计算和权衡分不开。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

> 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3]。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王云五：《怎样读书》，《读书法入门》，上海，开华书局，1930年。

【3】《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训辞》(1934年11月)，《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48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王云五对数学，主要是应用而非研究，而他与图书馆学的关系就不一样了。王云五不仅擅用图书馆学，而且在图书馆界担任要职，为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极呼吁，称得上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在王云五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其企业内部图书馆涵芬楼公之于众，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王云五兼任馆长。王云五曾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委员。1926年被上海图书馆协会选举为委员长。1929年3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又在1935年4月该馆临时董事会成立时，任副董事长，这一工作持续到1936年上海市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更使王云五跻身图书馆学家的地位。自学成才的王云五在读书和治学方面都受惠于图书馆学。例如，1930年，王云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用11天时间查阅九百多册书籍期刊，如果没有图书分类法知识及书末所附完备索引，是难以想象的。1934年，王云五向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建议他们要多读书，并讲到，“没有读书法的读书，很容易糟蹋时间和精神。那末读书的方法从什么下手呢？我以为首先要对于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读书时才可获得指导”[1]。在这次职业培训中，他对学员强调出版业从业人员了解图书馆学的重要性：“我们的事业与图书馆学很有联带的关系，我们对于学术的分类法等必须能知其大意，然后对于出版事业才能了解。”[2]

王云五作为一个出版大企业的主持人，事情之多之杂，可以想见，而其本人又素喜读书和著述。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措手，如何应付？王云五做到了两点：一是勤奋，二是效率。20世纪30年代，王云五在一次对商务印书馆同人的讲话中谈到，他从十五六岁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时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上班，他每天准时到，准时退，绝没有无故迟到或早退过，在馆中办不完的事拿回家做。每天拿出两三小时，作为规定的读书时间，从不间断。王云五每天早上三点即起床读书著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而对效率的追求，使王云五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

[1]《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训辞》(1934年11月)，《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486页。

[2]《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训辞》(1934年11月)，《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485页。

商务印书馆倡导科学管理，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1930年王云五出国考察，从国外聘请留学生多人回国成立科学管理研究所，自任所长，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出版效率。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商务印书馆力主成立百科全书委员会，自任主任，下设六个系，最多时曾集合馆内外一百多人同时进行，按字计酬，希望能尽快编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为国争光，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基础还不足以完成这样具有总结性的浩大工程。部分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太急功近利，过于追求效率，而欲速则不达。但是作为一个出版家，作为一个决策人员，如果不曾有任何决策失误，恐怕也不会是真的吧。

第二节　陆费逵与舒新城

长期与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的全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同样是一个出版人才云集之地，总经理陆费逵，编辑所所长舒新城，都堪称一代出版大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廉也一度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为中华书局初期的迅猛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在这里，有戴克敦、顾树森、缪文功、姚汉章、潘武、李廷翰、赵秉良、庄泽定、杨锦森、沈步洲、沈颐、张相、金兆梓、朱文叔等一大批教科书编辑高手，有李登辉、沈彬、钱歌川、桂绍盱等名重一时的英语编辑，有陈启天、余家菊、左舜生、田汉、徐志摩等思想新锐的人物，也有如黎锦晖、王人路、吕伯攸、陆衣言、乐嗣炳、周宪文、倪文宙、姚绍华等同时驰骋多个编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还有像俞复、唐驼、沈鲁玉、李墨飞、薛季安等印刷、发行方面的业务骨干。中华书局长期稳坐出版界第二把交椅，正是有这样一大批学问高、能力强、有影响的人才做坚强后盾的结果。下面，我们重点介绍陆费逵、舒新城这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一、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陆费逵幼年受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12岁以后独立自修，自谓“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1]。同王云五一样，他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出版家。1904年，陆费逵在武昌与友人集资1 500元开办新学界书店，担任经理，这是他踏入书业界的开始，一年后辞职。（图42）与此同时，陆费逵在武汉与革命党人刘静庵等发起成立日知会，并起草了日知会章程。1905年秋，陆费逵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冯特民等接办《楚报》，因为揭露和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得罪当局，三个月后报馆被封，陆费逵逃亡上海。他本欲赴日本留学，恰武汉的一家出版社昌明公司邀其担任上海支店的经理，经过一番分析和研究，陆费逵认为“吾人投身其间，不惟可改良书业，且易出人头地”[2]，从此投身书业，再也没有离开。

【1】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见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4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陆费逵：《我国书业之大概》，见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463页。

陆费逵到上海后不久，上海书业商会成立，陆费逵成为发起人之一，担任评议员兼书记，负责起草章程。1906年陆费逵离开昌明公司，转入文明书局工作。在这里，他编著了《修身》、《国文》、《算术》教科书，编、印、发“件件都管”，还兼任了文明小学校长，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陆费逵的这段经历，增长了他的办事能力，历练了他的出版才干，因而得到上海书业商会商务印书馆馆方代表高梦旦的力荐，得以在1908年被商务印书馆以重金延聘入馆，初任编辑员，半年后即出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社主任等职，受到馆方的极大重任。1912年民国甫成立，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和陈寅等人创办了中华书局。

图42
陆费逵



中华书局自1912年1月创立至1941年7月陆费逵病逝，近30年，书局业务一直由陆费逵总揽，未曾

易主。这期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中华书局也是几度风雨，几经磨难，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并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这不能不说与主持人陆费逵的性行才学、胆识气魄有极大关系。

出版是以书刊为传播手段，对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记录与反映；反过来，出版本身也必然要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社会的各种变革于出版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书海沉浮，唯有不断把握住各种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机遇的把握则主要取决于出版者个人的预见眼光。说是时势造英雄，对中国近现代出版界而言，确是十分贴切的。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成功，就是他在判断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预计政体变更，教科书内容必将随之变革，而最终心想事成的结果。这一点，许多文章中多有备述，兹不具论。

在平、凹版印刷技术的引进和人才的培育上，也很能体现陆费逵敏锐独到的判断力。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原来的印刷所人不满百，规模既小，设备也简陋。1916年静安寺路厂建立后，陆费逵就开始着意于平、凹版设备的筹设和技术的引进。当时平、凹版在国内尚凤毛麟角，若单从印刷中华书局本版书刊考虑，实无大规模引进的必要，因为除了少数插页和幼儿读物外，用彩色平版印的出版物很少，用凹版印的根本没有；若从眼前的经济效益考虑，引进也不合算，因为凹版印刷复杂，损耗大，印价高，除了国家发行的钞券、公债票和大企业的股票外，其他印件少，业务时断时续。但陆费逵认定平、凹版印刷业务将大有作为。他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后一次还特意把印刷所的副所长王瑾士带去。他重金聘请了留日学生、科班出身的丁乃刚和沈逢吉为技师，并由沈逢吉负责培训了一批雕刻人才；另外中华书局还延揽了三名外国专家以充实这方面的技术力量。在设备的引进上也大力投资，设备之新之多，号称远东第一。果然，苍天不负有心人，中华书局对此项业务的重视，最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先是20世纪

20年代初期印烟壳发家，为帮助中华书局迅速渡过“民六危机”立下汗马功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又借助印刷钞券暴发[1]。据吴铁声说，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时期，印制钞票业务畸形发展，中华书局的业务收入，以印刷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才是教科书和一般图书[2]。

1932年“一·二八”之役，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炮火下毁于一旦。有人鼓动陆费逵乘机扩大经营。陆费逵预料日本侵华，战事必将扩大，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对中华书局的业务发展重新作了安排[3]。比如放弃了已购置的上海平凉路地皮，改在澳门路建造新厂。1935年华北时局发生变动，陆费逵则敦促编辑所长舒新城加快大部头工具书《辞海》的编写进度，限期完工，以应不测。1936年5月，《辞海》登报发售预约，随后上册出版发行，赶在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从而为书局避免了巨额经济损失。正因为陆费逵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才使中华书局在经营过程中减少了盲目性，趋利而避害，既能适时而起，又可防患于未然。

站高望远的确体现出一个人的眼光，但见识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更多的还是以一个人的知识素养乃至学术水平作依托。以此来看陆费逵，大抵不差。陆费逵既以出版家著称，也以教育家名世。舒新城这样评价陆费逵：“先生素性好学深思，于学无所不窥，而于教育研究尤精深。”[4] 此乃平允之论。当初《教育杂志》为国内第一种专门性质的期刊，商务请陆费逵主持笔政，可见其一斑。陆费逵主编《教育杂志》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崇论宏议，言谈倾动一时，如改革学制、呼吁修正小学堂章程、简化汉字、统一国语、统一国音、提倡白话文等。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费逵为该会起草章程，主张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陆费逵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是好友，过从甚密。蔡任教育总长时，陆费逵多次著文献策，被蔡元培和教育部采纳而得以实施。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便是蔡元培委托陆费逵与蒋维乔协商后代为拟定并

【1】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回忆中华书局》（上册），195~197页。

【2】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回忆中华书局》（上册），77页。

【3】钱歌川：《追忆伯鸿先生》，《钱歌川散文》（上册），3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4】舒新城：《陆费伯鸿先生生平述略》，见郑子展《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内部资料），16页，1946年。

通电全国的。暂行办法规定了缩短学制，减少课时，小学男女同校，废读经科等内容，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1]。陆费逵在当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实非一般人所及。

【1】陆费铭琇：《我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业的开拓者：回忆我父亲陆费伯鸿》，《编辑学刊》1993年第1期。

陆费逵以教育家的身份从事出版业，出版教材则力求切合教学规律，出版图书则立足高品位与文化底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惠嘉学林、沾溉后世的好书，是与陆费逵的学人素养分不开的。特别是一些大部头著作如《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大字典》、《辞海》等，更倾注了陆费逵大量心血，他在擘画组织之余，还亲自为各书撰写了《编印缘起》，叙述各书的成书经过、内容特点及文化价值，文字洗练耐读，号召性强，可作后世编书者学习的范文。陆费逵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教育文存》、《世界之教育》、《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国民修养杂谈》及中小学教科书五十余种。陆费逵的学术功底由此可见。

出版业并不单纯是一种文化行业，它还是一种企业，有商业风险，也有同业竞争。既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则至关重要，甚至可谓一个出版社生存命脉之所系。中华书局能称雄书业界，则是陆费逵长于书业谋划的结果。在陆费逵身上，既体现了读书人匡时济世的抱负情怀，也不乏生意人持筹握算的精明能干；既有文化追求，又不失商业旨趣。亦儒亦贾构成了陆费逵真正的出版家品质。

中华书局成立伊始，就注定了要与商务印书馆一争高低。在竞争中，陆费逵很注意吸收商务的经验，特别是在选题思路上多所借鉴；商务一旦有新的好的策划，中华马上跟进，不让商务专美于前，以致商务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目录中找到其相对应的书刊。中华的这种移花接木，借风行船，正是商业行为中所谓的"搭便车"；然而中华的借鉴决不是粗劣的模仿，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所提高。商业竞争是残酷的，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商务，陆费逵喊出了"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利用当时国人高涨的反日情绪，在商务的日本股东一事上面大做文章，引导

大众舆论导向，使其有利于自己，这又是商业上攻心术之一种。

出版业高风险，为了转移书业风险，中华书局同其他一些大书局一样，除致力于书刊的出版、印刷、发行一条龙建设外，还大搞多种经营，此歉彼收，堤内损失堤外补，这确是很明智的经商之道，也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特征要求。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是旧时国内顶尖级的出版企业，但两家在企业运营的管理模式上，颇有些不同。商务依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分工严格，责任明确；而中华则给人一个“大家庭”的印象，陆费逵充当一家之主，局内许多事情都是他“一言堂”。然而几十年来，这个“大家庭”却是和睦共处，团结一致，运作有效的，因私人利益发生龃龉的事很少发生。舒新城日记中对此有专门记载：

一九三六年 一月十三日

现在中国系过渡时代，本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形态并存。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习惯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也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种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1]。

中华、商务均是书业成功的佼佼者，可见管理好一个企业，模式决非只有一种，但各有各的窍门是肯定的。陆费逵的家庭式管理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陆费逵的个人魅力和无私奉献精神。细说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舒新城：《舒新城日记》，《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第一，待人处事爽直和蔼。吴铁声在文章中曾忆及这样一件事，说到张相主管教科书部时，因教育部新课程标准屡屡更新，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多次随之改动。为了抢占市场，时间至关紧要，编辑人员往往夜以继日赶编课本，陆费逵也不时打电话向张先生询问，知道某书尚未完成，陆费逵就哈哈大笑，挂上电话[1]。这则小事很好地反映了陆费逵在待人接物上的通达爽朗。中华书局初创时，陆费逵常与同事共起居共操作，打成一片。三十多年他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致人均称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对学生)，自称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称伯鸿先生而不称总经理[2]。陆费逵的平实和易作风，使他赢得了公司同人的爱戴和拥护，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核心凝聚力。

【1】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回忆中华书局》（上册），28页。

【2】舒新城：《陆费伯鸿先生生平述略》，见郑子展《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内部资料），16页。

第二，遇事明，处事敏。陆费逵身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并没有做甩手大掌柜；虽然不是事无巨细，身必躬亲，但在大事上心中自有一本明细账：什么事如何去做，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事，什么事做得是否得当，什么人留用可否，与下属谈起，往往可以说出一二三四，语必中的，深得手下佩服[3]。陆费逵任总经理职30年，文书案牍均由本人亲自草拟，不喜他人代劳，所以他身边从来没有专职秘书。几千人的大企业，能如此这般调度自如，没有明敏的办事魄力是绝对办不到的。

【3】金兆梓：《追忆陆费伯鸿先生》，见郑子展《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内部资料），27页。

第三，用人信人，敢担责任。陆费逵对下属一旦委以重任则深信不疑，如果下级有了错误，他则勇于承担责任。舒新城、张相、金兆梓、沈颐、高时显、丁辅之、俞复、唐驼等人先后入局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他们在社会上均有一定的影响，能长时间追随陆费逵左右，当与此很有关系。

第四，无私奉献，一心为公。陆费逵身居要职，却从来不以权谋私。他生活俭朴，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居室也很简陋。据舒新城日记记载，1936年陆费逵的月薪也不过300元，与书局一般中层干部相当。中华书局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如此一个大企业，作为30年总经理的陆费逵身后所遗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其清风亮节，令人感叹。

在同人眼中，陆费逵这个家长不妨说是开明的、朴实的、睿智的、可亲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代表着崇高的事业心和奋发的凝聚力。今天我们既颂扬中华书局于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也仰慕前辈出版家为人处事的风范；不仅学其成功经营的经验，也应效法其人格的卓绝崇高。

陆费逵自1904年入围书业以后，毕其一生，兀兀终年，服务书业达38年之久，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陆费逵对书业情有独钟，以身相许，是基于他对书业与国家文化前途关系的深刻理解。他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1] 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陆费逵不畏挫折，知难而进。说到"知难"，我们可以引用陆费逵自己的文章作注脚。该文见1932年《申报月刊》创刊号《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他在说到撰稿人收入不丰之后接着写道：

【1】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进德季刊》第3卷2期，1924年。

> 或以为薄待著作者，一定肥了发行者（出版者——笔者按）。但是发行者得利之书很少，蚀本者很多。每一书坊开若干年，只剩些不销之书籍和无着落之欠账，便不得不关门了。前清末年的许多书坊，至今存在的差不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广益书局几家，其余不是关门，便是出盘。即民元开办的中华书局，艰险备尝，慎重紧缩，股东在近十七年中，或无利或得利一二，最多一年只四厘。办事人待遇也很薄。苦了二三年，总算勉强站住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确需一种勇气和韧劲。

陆费逵以其在书业界的影响与威望，长期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他多次为书业共同利益向政府交涉，其他如调解同业间的矛盾，处理版权纠纷等等也当做自己份内之事，不辞劳苦。而这些工作完全是一种服务性质，陆费逵热心于此，

凭借的正是一个出版家对出版事业的执着之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家，陆费逵还多次撰文，呼吁作者与出版者要以社会责任为重，他说：

> 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1]。

【1】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中华书局月报》1923年第7期。

拿陆费逵的话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进行比照，所言所行应是问心无愧的。在当时书业混乱、竞争激烈的年代，能坚持这样一种道德操守和文化使命感，确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守，中华书局才得以长盛不衰。

二、舒新城

舒新城（1893—1960），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湖南溆浦人。以教育家、出版家称誉于世。纵览其一生，大致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他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国外道尔顿制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整理等方面，成绩斐然。仅1924年至1928年秋，前后五年多时间，他共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405余万言[2]，堪称一位多产的教育家，为当时教育界所推重。可以这么说，舒新城个人的这种影响和经历，是他后来进身出版

【2】谈宗英：《从教育家到出版家》，《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50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界，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条件与基础。舒新城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从相识，到相知，到共事，虽缘于两人在改革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志趣相投，但亦不排除以教科书为大宗业务的中华书局，有借重舒新城在教育界的地位作号召这层考虑。舒新城最终舍教育而事出版，陆费逵没少费周折。

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从那时候起，陆费逵便有意约他入中华书局任职，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重申前请，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事务为由婉辞。1925年6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这在他人看来，对舒的清誉有损，而陆费逵却对他更加钦佩[1]。该月，舒新城来访，陆费逵再次邀请舒入局任职。舒新城坦诚相告自己私人办立学院的理想，以及打算编纂词典售稿筹款的计划，陆费逵不便相强，仍尽全力相助；陆费逵以他在出版界20年的经验，建议舒新城首先编辑百科性质的辞典，至于出版，答应代刊，于必要时可购稿或预支版税，在资料查找上，中华书局图书馆也将尽可能给予便利[2]。在时局不靖、售稿不易的情况下，舒新城若没有陆费逵的承诺，是不敢贸然组织班子编写数百万言的百科辞典的。1927年4月，舒新城编辞典经济不支，向陆费逵提出，陆费逵当即答应从6月份起，每月垫付300元[3]。这部辞典因之得以顺利完稿，并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书名出版。陆费逵的恳挚情谊，舒新城是不可能不心知的。1928年3月，陆费逵得知舒新城不打算去河南任教，立即给他写封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启动多年而搁置已久的大型辞书——《辞海》的编纂工作。舒新城虽不愿放弃理想，亦不愿受到约束，但终究情谊难却，应承了下来。4月23日，舒新城赴沪与中华书局签订主编《辞海》契约[4]。事后，陆费逵再一次旧话重提，邀请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职务，舒新城仍不肯爽快答应，推以将来再说。舒新城接手《辞海》以后，先设编辑室于南京，后迁至杭州。1928年10月，陆费逵为了解《辞海》编纂情况和筹备西湖博

【1】王震：《舒新城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王震：《陆费逵年谱》(上)，《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

【3】王震：《陆费逵年谱》(上)，《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

【4】王震：《舒新城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5页。

[1] 王震:《陆费逵年谱》(下),《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2] 王震:《陆费逵年谱》(下),《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3] 舒新城:《舒新城日记》,《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览会，去杭州数次，每次必老调重弹，可谓锲而不舍[1]。他之所以如此，细究其中原委，应该包括两层因素：其一，中华书局自1925年戴克敦去世以后，编辑所长职一直由陆费逵临时兼任，陆费逵身为总经理，事多任重，不胜劳苦可想而知；其二，编辑所长是个要职，非有能力有影响的人不可为，舒新城的资历和条件各方面都合乎要求。经过多次的说服工作之后，舒新城最终答应下来。1929年11月10日，双方正式签约。1930年1月1日，舒新城走马上任[2]，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编辑出版家的生涯。

中华书局编辑所是一个家大人多的“大摊子”，主持这项工作确非易事。随着舒新城本人的迁沪，杭州的《辞海》编辑室也随之撤销，合并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另立较完整的辞典部，舒新城兼任了一年的辞典部部长，后因所内事务繁重，无暇顾及，转交他人。另外，舒新城还长期兼任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中华函授学校校长等职务，事情之多之杂可想而知，好在此后的舒新城，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出版事业中，把出版工作视为自己未来事业的重心和人生的园地，虽苦虽累，亦不太以为念。

舒新城办事谨慎稳重，跟陆费逵果断决行的作风形成互补，两人相得益彰。陆费逵曾评价舒新城，说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3]。这既是对他为人品格的大力褒扬，也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作为一个教育家，舒新城怀抱着匡时济世的雄心，确有其理想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又能清醒地认识现实处境，同时兼具务实的一面。作为一个民营大出版企业头脑中枢的编辑所所长，作为书局大计方针和出版计划的制定与决策者，舒新城很好地理解了社会文化发展与企业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力求将两者协调起来而不至于顾此失彼。1932年，因《图书评论》主编刘英士的约稿，舒新城曾写过一篇介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具体阐明了中华书局编辑图书的一般原则：

> 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

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较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1]。

正是有这样一个务实原则的指导，才有20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营业的蒸蒸日上，同时又不失一个大出版机构的良好声誉和社会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陆费逵选择舒新城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可谓得人，而从双方的彼此评价中，也可看出中华书局将相之间的协调与一致。1935年，舒新城编辑所长五年约满后，陆费逵坚决要求舒续签。1937年，中华书局的业务因“八一三”事变大受影响，组织上拟进行改革，总经理下设出版、印刷两经理，陆费逵拟请舒任出版经理，当舒表示不愿干时，陆费逵又想于总经理下设秘书、稽核两处，由舒任秘书长。10月，陆费逵又主张请舒任协理或经理兼总办事处长，舒以责任重大未敢应允。尽管如此，陆费逵仍在遗嘱上写明：万一本人不幸，将公司职务及个人股权委托舒执行，且令其子听从舒之命令[2]。陆费逵对舒新城之器重，由此可见。

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不能不特别地提到《辞海》。一方面，《辞海》是中华书局局史上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另一方面，舒新城对《辞海》所作的贡献格外突出，令人追忆感怀。1928年4月，自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的一纸契约，《辞海》的编纂工作便真正地步入了正轨。南京、杭州两地，舒新城招募人员，日夜编辑，虽然不克有成，却也积累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和不少有益的经验。1930年舒新城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后，《辞海》后来

[1] 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卷1期，1932年。

[2] 王震：《舒新城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9页。

的实际工作虽由沈颐先生主持，舒新城作为直接的领导确也没少费心血。1936年《辞海》对外发售预约，舒的日记中记下了大量出版前的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事务性活动，均亲自予以过问，倾注了很多精力。特别是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站在爱国立场，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1944年，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可节省纸张，降低定价，适合当时普通读者收入微薄的购买力。1947年合订本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起了《辞海》普及版的作用[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是舒新城大力主张修订《辞海》，该建议得到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赞同。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从中华书局退休后的舒新城被任命为主任，继续为《辞海》的编辑工作努力[2]。《辞海》老树新枝，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适应了新的要求。舒新城生前虽未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由于他建国前后两度主持《辞海》工作，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这正是一名出版工作者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

【1】钱子惠：《〈辞海〉的前前后后》，《回忆中华书局》（上册），165~166页。

【2】王震：《舒新城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92~395页。

第三节　章锡琛、夏丏尊与叶圣陶

同为五大书店之一的开明书店，论历史、论规模、论实力，都位居大书局行列之末座，但若比影响、比作风、比人气，开明却不输于任何一家大书局。当人们习惯于用“开明人”与“开明风”来标识这家书店的做人精神和做事风格的时候，这是其他任何一家大书局都不曾享有过的殊荣。叶至善曾将“开明风”概括为八个字：开明、进步、认真、正派。而这样一种备受时人和后人称赏的出版作风，是学识渊博、朴质笃实、一丝不苟的“开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开明人”的出版队伍包括：章锡琛、章

锡珊、夏丏尊、叶圣陶、杜海生、钱经宇、周建人、孙伏园、谢六逸、赵景深、刘权琴、刘薰宇、方光焘、丰子恺、夏衍、王伯祥、周予同、顾均正、徐调孚、宋云彬、傅彬然、贾祖璋、唐锡光、周振甫、范洗人等。这里，我们选择创办人章锡琛和前后总编辑夏丏尊、叶圣陶作重点介绍。

一、章锡琛

章锡琛 (1889—1969)，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会稽 (今绍兴) 人。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十五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的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1]。《妇女杂志》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当《妇女杂志》1925年的“新性道德号”刊出后遭人攻击与论战，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其他一般编辑时，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创办《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义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

[1] 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宋应离《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2)》，46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也是他行家里手的出版领域。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隐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

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从事出版心态务实的反映。

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在商言商，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1]，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分店多选择委托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

【1】曹聚仁：《从夏丏尊先生说起》，《我与我的世界》（上），16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商人做得十足、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骄傲和自豪，每每愿意向他人说起。当舞文弄墨的文人学士们最终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

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1] 像这样一个尽心尽力为作者打算的人，怎么可能被列为“市侩”一类呢！市侩者，计较于一时一地的短浅利益，鼠目寸光，一锤子买卖，结果因小失大者多有，无形中断绝了自家后路；而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则不同，着眼于利人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

【1】章士敭：《章锡琛与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

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下家，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高达30万元之巨[2]。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十余年，不能出版[3]，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 000元的稿费。当时，6 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

【2】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

【3】吴文祺：《〈辞通〉与开明书店》，《我与开明》，211~21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1】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

【2】吴文祺：《〈辞通〉与开明书店》，《我与开明》，215页。

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1]只有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2]。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两段佳话。

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论能力，论身份，章锡琛任何时候担任经理都可能不会有异议。但在他，似乎并不以之为重，他把自己看成是开明的一员，但并非最重要的一员。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起来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位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延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我们说，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二、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号闷庵，浙江上虞人（图43）。1927年以前的夏丏尊，以教师为业，在20年的教育生涯中，做过中学、师范、大学的教师，充满教育理想，富于教

育主张。享誉一时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他是主要参与创办者。这20年，他桃李满天下[1]，可谓是一个教育家的20年。1927年，他被章锡琛请进开明，出任编辑所所长，一直至1946年谢世，主持着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参与着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历时也是近二十年。这二十年，开明书店崛起成了大书店，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书刊享誉于海内外，可谓是一个编辑出版家的20年。1927年的夏丏尊，四十有一，刚过不惑之年，从教育界到出版界，是一个新的人生起点。1927年的开明书店，创办甫及一载，基础未稳，方向未明，夏的加盟，规划了新的出版领域路径，开明的气象格局为之一变。这种变化与夏丏尊个人直接相关的，大致说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夏的具有号召力的身份地位影响，二是夏的寓教育理想于出版的目标方向选择，三是夏的稳重平实的为人处事作风。



图43
夏丏尊

对于夏丏尊入主开明编辑部所产生的出版号召力，叶至善曾有精当的分析。他说，在文学界，夏先生被大家看做忠厚长者[2]；在教育界，夏先生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这样一种身份优势，使得夏先生对外，能团结一大批志趣相同又乐意合作的作者；对内，则可以组织起一个跟自己的出版方针相适应的精干编辑队伍[3]。有了优质的作者资源，有了精干的编辑队伍，开明书店能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夏丏尊入主开明编辑部的第二年，开明书店即招募股本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夏丏尊为带头发起人[4]。5万元资本的招募计划，不仅顺利完成，溢额的部分还另办了一个印刷厂[5]。这其中，应该有夏丏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起的作用。

由于教育和出版天然的因缘关系，在民国出版史上教育家而事出版的，不乏其人；但能把教育与出版进行深入的、有机的、成功的结合，甚至于在出版中拓展出新的教育思想的，夏丏尊是

[1] 出于夏丏尊门下的著名人士有：丰子恺、傅彬然、魏金枝、赵平复(柔石)、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周伯棣、曹聚仁、贾祖璋等。

[2]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到会作家七八十人，夏丏尊最年长，被推为主席，他和茅盾、王统照、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沈起予等九人当选为理事。

[3] 叶至善：《从事编辑工作的教育家——记夏丏尊先生》，《出版史料》1987年第1期。

[4] 另外几名发起人为：刘叔琴、杜海生、吴季候、丰子恺、夏贷均、胡仲持、吴仲盐。

[5] 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见宋应离《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2)》，464页。

较为独特的“这一个”。不妨拿与夏丏尊最有相似经历的舒新城，进行一个比较。夏和舒在涉身出版前，同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同样都怀抱着教育理想，同样有教育主张四处碰壁的现实郁闷，后来都同样做了书局编辑所的一号人物，同样对各自服务的出版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同的是，舒新城接任的是一个已经在出版领域基本定型的中华书局，他的教育经历和教育家身份对中华书局的教育出版，依然大有帮助，但他的教育思想却难以在出版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教育理想和出版行为的不尽吻合，以及编辑所所长事务的繁琐零碎，使得骨子里更是一个教育家的舒新城在日记中，流露出了合同期满则专心著述的念头[1]，只是因为陆费逵的再三挽留和感于陆费逵的情谊，舒新城才最后坚持留了下来。夏丏尊则不同。他所就任的开明书店，出版事业将成未成，蓝图待定，正有大片空间，供他施展身手。经过股份制改组成功和两年的出版实践摸索，夏丏尊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学生们，正是昔日身为教师的夏丏尊，过去多少年来几乎每天都要相处的对象，讲坛之上，授课之余，夏丏尊关心着他们的成长，感受着他们的困惑，熟知着他们的需求。而今，他从事出版，为他们出书出刊，提供课内课外的精神食粮，正可看成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延续，也是一个教育家在出版活动中可发挥其特长和优势之所在。在开明，夏丏尊心无旁骛，在兹爱兹，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其学生曹聚仁论定的名山事业[2]。

【1】《舒新城日记》，《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2】曹聚仁：《从夏丏尊先生说起》，《我与我的世界》（上），160页。

在从事教育出版活动的过程中，夏丏尊教育家的本色不改。他在出版之位，谋教育之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出版，襄助教育，扶持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同时也希望在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同时，获得所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学生》的创刊，便贯注着他的如上教育理想和出版努力。《发刊辞》中，他这样写道：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于含混的

"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

十几年的《中学生》，遵照当初的目标使命，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不曾懈怠。主编夏丏尊和编辑叶圣陶等人，且编且写。讲知识，强调趣味，注重启发，照顾对象的理解能力；谈人生，态度平等，坦诚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好懂、好看"，当时的中学生读者评价杂志说，"读了这期等下期"，"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地走进这第二课堂"[1]。这正是夏丏尊、叶圣陶他们创办杂志所致力追求的教育效果。而每期上万份，到抗战前夕累计印数近百万，如此大的发行量[2]，证明杂志同样获得了很好的出版经济效益。

《中学生》可看成是开明书店出版物特点的一个缩影。举凡语文、史地、科学、文艺等各种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他们今后生活能力提高的知识内容，都是《中学生》乐于刊载的。而这些，也正是开明书店的主要出书范围。夏丏尊从事出版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他认为，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各种教材——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只是培养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这些材料而忘记了提高能力这个目的，就跟"买椟还珠"同样愚蠢。他希望青年学生要自觉从各种课程中摄取身心上的能力，而且普遍学习所有的科目而不要有所偏

【1】欧阳文彬：《叶老和〈中学生〉》，《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

【2】欧阳文彬：《叶老和〈中学生〉》，《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

【1】夏丏尊：《受教育与受教材》，《中学生》1932年第4期。

颇[1]。在这一观点统率下，开明出版物呈现出既围绕着教育中心主题，同时又学科门类丰富多彩，既专门又综合的特点。

出版是主观色彩很强的文化生产活动。夏丏尊之于开明的影响，除了他的教育思想在出版物中直接投射外，还有他的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同样形成张力，在开明凝聚成一种集体作风。夏丏尊做事平实稳重，这与章锡琛的精明果敢形成互补。但在出版认真，不肯马虎苟且方面，章夏二人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夏丏尊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把自己笃实而诚敬的德行融入到教育出版活动中，不事浮夸，点点滴滴做着文化的胜业。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因而也就特别有凝聚力——在社内则氤氲为风气，形成一种被时人和后人称之为"开明风"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在社外则常被作者和读者提及和怀念。这样的教育出版家，谈不上有多么轰轰烈烈，但他和他事业的影响力，却持久而绵长。

【2】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

【3】叶圣陶：《谈谈开明书店》，《叶圣陶出版文集》，56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三、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叶圣陶和章锡琛一样，都是从商务出来的人。叶圣陶进商务的时间是1923年，比章锡琛进商务的时间要晚好几年。叶在商务做了八年的国文部编辑，编辑小学国语课本、中学国文课本，还有学生国学丛书，其间一度顶替因故出国的郑振铎主编了两年共24期的《小说月报》。郑回来后，叶圣陶又主编过一段时间的《妇女杂志》，这已是在章锡琛离开商务以后的事了。（图44）1930年底，叶圣陶从商务跳槽到开明，据他本人说，他之离开商务，是因为章锡琛和夏丏尊"要他去帮忙"[2]，看到开明"干得不错"，"才参加进去"[3]，并非与商务当局交恶。这跟章锡琛离开商务不太一样。章是因自办出版不容于商务馆规被辞退，叶圣陶则是主动辞职。他后来写过一篇《我和

图44
叶圣陶



商务印书馆》的文章，对商务在出版文化上的贡献多有褒扬，对他八年的商务编辑生活也心存感谢，以为这八年，既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所助益，也学到了“有关编辑工作的责任感以及若干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1]。

若从个人收入的角度来说，叶圣陶在开明的薪俸反而不及商务[2]。叶圣陶宁可减薪接受开明的招邀，一方面，章锡琛、夏丏尊和他都是相互熟知、气味相投的朋友，当初开明成立时，他还是热心的赞助人之一，如今朋友们开辟的事业“干得不错”，需要他相助，以他的性情，焉能有坐视不顾之理。更为重要的，夏丏尊他们在开明书店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呈现出来的出版个性，表露出来的出版品格，以及投射出来的教育理想，与他内心的价值观念更为相投。对于一个怀抱理想、心系事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虽然薪水少一些，似乎也就不太在意了。

20世纪30年代初的叶圣陶，已是一个誉满海内的知名作家，又是一个素有经验的资深编辑。他的加盟开明，对开明的出版力量无疑是一个很大提升。对于叶圣陶本人来说，因为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教育出版事业，在开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感到身心愉快，干劲十足，编辑成绩骄人。抗战之前，他主要编《中学生》杂志，也参与其他书刊的编辑。他和朋友们编了好几部国文读本，还独自编写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他是《新少年》半月刊的创办人；《月报》创刊，他担任文艺栏的主编。他还在业余，编了一部《十三经索引》。抗日战争爆发后，开明和在上海的许多出版业一样，受到很大损失，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他离开了开明，携家进入四川。《中学生》在桂林复刊，他挂上了主编的名义，可是人在乐山，无法参加实际工作，那时他感到很寂寞，因为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也由于放下了编辑工作[3]。1942年，开明书店在成都设立编辑部办事处。他回到开明，主持办事处的工作，除继续担任《中学生》主编外，还在1945年创办了《开明少年》，并担任主编。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开明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规模。1946年夏丏尊故去以后，叶圣陶接任开明编

【1】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

【2】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出版发行研究》1994年第5期。

【3】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辑所所长，负责终审《中学生》、《开明少年》、《国文月刊》的稿件，书稿也大多归他最后审读。另外，他还和朋友们一同编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好几套国文课本[1]。

叶圣陶一生做编辑的时间超过60年，对于编辑这样一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他感到由衷的自豪。尽管世人知晓他多因他的作家名声，但他却多次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2] 只有对编辑工作十分热爱，对出版价值有深刻体认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叶圣陶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情感寄托，也是开明人共同的、集体性的信念和精神。如果说，开明风的形成，夏丏尊是基调的奠定者，叶圣陶则通过他实践中的彻底贯彻和理论上的准确概括，堪称为开明风的代表人物。在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开明编辑所所长的叶圣陶曾赋诗一首，第一次对“开明风”和“开明人”作了文字阐发。诗云：“书林张一军，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缕金联同辈。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媿。”[3] 全诗精神昂扬，砥砺正气，目标明确，道出了开明同仁共同的心声，因而得到全体同仁的签名，并立铸于铜牌之上。40年后的1986年，在开明书店60周年纪念会上，叶圣陶的讲话再一次阐发了开明书店的精神内涵，概括为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开明人做的出版工作，其实就是教师的工作，在待人接物上跟老师一样以身作则，以诚恳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开明的编辑出版工作，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在兼顾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如何有益于读者；所谓有所不为，就是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即便有经济效益也一定不出。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决不肯辜负读者[4]。叶圣陶所概括的这

[1] 田小琳：《叶圣陶语文教材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3期。

[2] 彭加瑾：《叶圣陶与编辑工作》，《编创之友》1982年第4期。

[3] 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

[4] 叶圣陶：《谈谈开明书店》，《叶圣陶出版文集》，57页。

两条掷地有声的出版原则，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出版界应该弘扬的主旋律。

第四节 邹韬奋、徐伯昕与胡愈之

上个世纪30年代，当左翼文化风起云涌的时候，承担左翼书刊出版的，多是些中小书局，如华兴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春野书店、乐群书局、南强书局、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乐华图书公司、大江书铺、无产阶级书店、湖风书局、水沫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左翼书刊由于不容于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出版而遭查禁者，所在多有。大书局意欲求稳，书目单中自少见这一类型的书刊。中小书局"船小好掉头"，小有小的便利。中小书局中甘冒风险，热衷于左翼书刊出版的，大致不外两种情形：一种纯粹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与个人信仰无关；另一种则出于思想观念认同下的有意为之，同时也不避经济上的谋划与筹算。1932年创建起来的生活书店，就是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风格上激进、经营上有方的生活书店，在1930年代发展十分迅速，被称为书业界的后起之秀。其出版的书刊，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作为生活书店的最初创办者，也是带领生活书店最终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个核心人物——邹韬奋、徐伯昕与胡愈之，是本节叙述的对象。

一、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江西余江人。生活书店成立前的邹韬奋，已是一个有长达六年多编龄的资深杂志编辑，也是一个广大读者熟知和喜爱的知名刊物主编。他所主编的《生活》杂志，立足时代精神的前沿阵地，坚持彻头彻尾的大众立场，吸附着广大民众的热切目光，读者遍及全国及海外华侨足迹所到的地方，1932年初的销数达到十五万五六千份，开我国杂志销数的空前纪录[1]。（图45）

【1】徐伯昕：《韬奋先生的一生》，《出版史料》2004年第3期。



图45
邹韬奋

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份曾经影响一时的老杂志，在仿佛进入那个时空语境，触摸到那个时代话语兴奋点的同时，我们也能鲜明感受到主持其事者的真诚与果毅，奋斗与追求。他就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文化战士，凭藉一腔爱国热情，“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1]，“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只求真实，不说空话，闲话”。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崇敬韬奋，研究韬奋，理解韬奋，因为从他身上，显现着一个正直编辑人的高尚品格，一个后世可以学习的精神榜样。

[1] 所引邹韬奋言论，皆出自徐诚、王一方编：《韬奋：我的出版主张》，后不一一注出。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所体现的职业境界和高超编技，同样可以作为鲜活的案例，编写进出版专业的教科书中。他“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的全身心编辑投入，“取稿凭质不凭名”的严格质量标准，“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的文稿加工态度，都贯穿于“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的编辑方针和指导思想之中。如此编辑，苦则苦矣，累则累矣，但他却“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体味着编辑职业的真乐。他同时又是一个编技超群的行家里手，在“且学且用”、“且用且学”中掌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编辑经验。他认识到了缩短编读距离、沟通读者的重要性，周刊上的《小言论》、《信箱》栏目因此设焉，并期期与读者见面，一次未曾“脱班”；他把握到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需求，刊物内容追求“有趣味有价值”，“软”、“硬”适中，“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坚持“寓修养于娱乐之中”；他体会出“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对于那些内容上“人云亦云”，格式上“亦步亦趋”的“尾巴主义”和“肉麻的模仿”，深不以为然，而每每

在编刊过程中“独出心裁”，“不愿意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有如此纯粹的编辑境界，如此高明的编辑心得，《生活》周刊能成功，便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一个培养人民公正言论，敢于直面现实政治的刊物，容易触犯当局，而最终被强行封杀，是一个专制时代难以逃脱的结局。《生活》周刊终于在1933年以“言论偏激”的理由而遭密令封闭。邹韬奋事先预计到了这一结局，并因身为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上了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从言论的不自由预感到身体不自由的可能，于1933年7月14日《生活》周刊尚未封闭之前，不得不出走海外。好在生活书店已于此一年前成立，待他两年多的海外萍踪回国以后，生活书店成为他出版活动的主体，一直到1944年去世为止。在此期间，邹韬奋除了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外，还致力于书店的领导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也是在此期间，在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邹韬奋的思想一步步由对国民党失望，而最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

邹韬奋在出版工作上，不仅善于编，同样还善于写。他一生勤于著述，在他短暂的50年生命中，留下了600万字的文稿、著作，生前亲手编定的单行本计39种。这当中有一本专论出版的书，名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是他在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上相关文字的结集出版，可视为邹韬奋出版主张、观点的集中表达。在民国出版史上，从未有人像邹韬奋这样，对出版活动作过如此深入的文字思考。虽然立论的出发点，是结合生活书店的工作和生活，但书中对集体与个人、民主与集中、商业性与事业性、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基本原则的阐述，于今依然有启发意义。

从这本书的阅读中，我们不难理解邹韬奋一手扶育出来的生活书店，何以能在“进步文化事业”的旗帜下，凝聚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这当中，除了主持人的人格魅力、精神感召和自我垂范外，书店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干部同人的培养与思想教育等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都是生活书店不同于出版史上其他任何一家书店、独具一格且见出了管理成效的地方。邹韬奋在出国前，特地和同人研究确定的“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的经营原则，拟定的“一、服务社会；二、盈利归全体；三、以共同努力增进全体同人福利；四、店务管理民主化”的经营方针[1]，使得生活书店的同人明晰了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培育出了一种主动、创造、负责、合作、苦干的主人翁意识，从而使生活书店的业务，能够无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性。

【1】徐伯昕：《韬奋先生的一生》。

在实践上——不是在口头上——“发展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和一贯传统，邹韬奋把它列为生活书店的三个重要目标之一，并努力将其融入干部职工做人做事的基本修养之中。他要求每一位职工要心存读者，把读者当作朋友，而且还是一种超越商业关系、彼此间可以沟通与信任的好朋友，因而，对于读者的服务“不是仅求一次的周到，是要求继续不断的周到”；对于读者的服务，也不限于门市、邮购、复信答疑，而是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全过程，表现为“一点不肯马虎，一点不肯延搁，一点不怕麻烦”。当我们一次次从书中看到这样的自我警策文字，在合起书本面对现实的时候，除了感动，也不期然地生发出了许多感慨。

身为一个有文化理想的职业出版人，邹韬奋很好地协调了出版活动中“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出版应该是事业性和商业性的有机结合，要两者的兼顾而不是彼此的对立，可谓得出版认识的真谛。因为重视“事业性”，所以他要求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讲究内容与方向，讲究创新与质量，讲究文字的平民化与趣味性，讲究对读者的竭诚服务精神；因为重视“商业性”，所以他强调出版的计划性和办事效率，强调出版物的个性特色与品位形象，强调人才的物色和业务培训，强调管理体制的创新与民主，通过民主办社和合作社形式[2]，以激发每一位员工的活力。凡此种种，在书中都有详细阐述。韬奋的出版观，是一脉出版思

【2】生活书店的“生产合作社”组织，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1/10投入书店作为资金。分配股息时，有股份2000元以上者，其超过2000元之数不分股息。这个计划由胡愈之起草，经全体职工讨论修改通过。由于当时法律规定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登记注册，所以对外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参见胡愈之：《关于生活书店》，《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81页。

想的富矿，我们今天的出版人，从中可采掘之处，依然多多。

二、徐伯昕

徐伯昕（1905—1984），原名徐亮，笔名徐吟秋，赵锡庆，江苏武进人。从进入《生活》杂志的时间上说，徐伯昕比邹韬奋还要早一些。当时的《生活》杂志由王志莘首任主编，徐伯昕刚从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毕业，以练习生的身份兼管发行。王志莘离开杂志到银行工作后，邹韬奋接任了主编的工作。说是主编，其实是“光杆编辑”一个，因为包括邹韬奋在内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半”人，会计孙梦旦有一部分时间还兼职职教社的事，所以只能算作半个，另外一个人就是徐伯昕。当邹韬奋不得已在编辑上唱“独角戏”的时候，编辑和会计之外的其他一切营业事务，亦同样只能由徐伯昕一人唱“独角戏”。这是两个人一起艰苦创业的开始，直到1944年邹韬奋去世的18年中，两个人分工协作，相互为援，彼此欣赏，从办刊物到办书店，共同擎举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出版事业。这是一对绝配的黄金搭档。（图46）

徐伯昕的年龄小邹韬奋10岁，平日徐伯昕对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总是以“邹师母”相称呼[1]，可见在徐伯昕的心目中，邹韬奋不仅是一个一起共事的同事，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友。邹韬奋的学识才华和人格魅力，充溢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令接近他的人为之感染。当三四十年代邹韬奋的思想在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中发生变化，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时候，徐伯昕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同调，使得邹韬奋在规划生活书店的出版方向，指导生活书店的出版方针时，就显得得心应手，无须担心企业内部的窒碍；另一方面，也使得作为书店经理的徐伯昕，在贯彻邹韬奋的种种出版主张时，有足够的信赖度和强大的执行力。

说他们是黄金搭档，除了思想行动上的协同

[1] 沈粹缜：《追念伯昕同志》，《怀念出版家徐伯昕》，48页，太原，书海出版社，1988年。



图46 徐伯昕

外，更主要的表现在他们各自能力优势的互补上。邹韬奋长于编辑工作和全局性的规划，是生活书店的灵魂；而徐伯昕善于经营筹划和具体落实，可谓是生活书店的支柱。胡绳评价徐伯昕说有"'生意人'的精明"[1]，而这个特点，在茅盾看来"政治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的邹韬奋身上[2]，恰成鲜明的对比。徐伯昕长期担任生活书店经理，人称"徐老板"，他的经营才干，很好地弥补了邹韬奋的不足。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人渡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人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那次选举，徐伯昕和邹韬奋均以最高票数当选[3]。这是对徐伯昕多年经营成绩的充分肯定。邹韬奋对他的这位合作者也十分钦佩，从不吝啬在各种场合给予赞语，说他有"苏张之舌"，有"出将入相"之才，说他对"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4]。诚如邹韬奋所言，在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能迅速崛起，成为进步力量所办的出版机构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家，与徐伯昕的运筹帷幄、经营有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

从《生活》周刊而来的生活书店，当初几乎是白手起家。主管经营的徐伯昕，既稳扎稳打，又开拓创新。他对出版资金的筹措和运用，从来都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从不冒险。他利用邮购户的结存余款，利用刊物的预收订费，将之变为书店不必付息的流动资金。他讲求出书效率，尽可能地缩短出版周期；他研究图书印数，采用少印勤印的办法，使有限的资金加速运转，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都是他稳扎稳打、精打细算的表现。而生活书店编印《全国总书目》，创办联合广告[5]，委托十大银行免费汇款等便利读者的创举[6]，都是他细心考察、精心设计和积极交涉之下举办起来的。这些可视为他善动脑筋、积极创新的表现。

在整体的经营思路上，徐伯昕亦表现出开阔的出版视野。生

【1】胡绳：《怀念出版家徐伯昕·序》。

【2】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我走过的道路》（下），4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沈粹缜：《追念伯昕同志》，《怀念出版家徐伯昕》，47页。

【4】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1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5】所谓联合广告，是由生活书店将《申报》第一版全包下来，切分版面，邀集中小书店参加，广告费用按所占面积，照报馆收费标准各家分担。书刊广告都是经过遴选的，读者信任生活书店，书店对读者负责。联合广告每月一次，后来容纳不了，发展刊登到《大公报》。

【6】20世纪30年代中期，生活书店大力发展书刊邮购业务，曾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等十大银行签订协议，免费为读者汇款购书。这些银行同时备有生活书店提供的图书目录，供前来邮购的读者索取。

活书店建立之初，他大力发展期刊经营，走书刊互动的路线，经营上卓然有成效。除了《生活》系列杂志之外[1]，抗战之前生活书店相继编辑和发行的期刊还有《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妇女杂志》、《光明》、《生活教育》、《中华公论》、《生活知识》、《新知识》等十几种，涉及到时政、文艺、教育、学术、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杂志群落。杂志联系着方方面面的作者，为生活书店后来出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者资源，同时杂志的遐迩传播，也极大地提高了书店在读者中的知名度，特别是《文学》月刊和《世界知识》半月刊，加上原来的《生活》周刊，“使年轻的生活书店崛起，社会为之瞩目，声誉鹊起”[2]，对其以后的图书发行大有帮衬，很多杂志的订户后来亦成为生活图书的读者。按说，刊与书的协同互动，在民国时期的书业经营活动中，并不稀见，但是，能像生活书店这样，一开始就在期刊出版上如此大手笔的，几乎是绝无仅有。这是生活书店经营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徐伯昕谋划经营格局宏大的表现。

邹韬奋曾言：“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成效。”[3]徐伯昕带着生活书店这艘航船在商海中乘风破浪，成就出一番载入史册的文化大业，是其既“愿干”又“能干”的结果。邹韬奋明言“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4]，这是徐伯昕愿干的反应。而生活书店在暗礁丛生的政治险恶环境中，各项工作能开展得井井有条，以实实在在的竭诚服务，赢得了遍布海内外的读者，则是其工作出色的明证。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楷模”。当我们回顾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度量邹、徐两巨头间的合作成就时，我们同样有理由认定，徐伯昕也是一位值得后人学习的出版楷模。出版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像邹韬奋这样的编辑大家，也需要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专家。两种类型出版人的并肩携手，方能结出“事业性和商业性统一”的文化硕果。

【1】所说的《生活》系列杂志，是指：《生活》遭禁以后，《新生》续之；《新生》遭禁，《大众生活》续之；《大众生活》遭禁，《永生》续之；《永生》遭禁，《生活星期刊》续之；《生活星期刊》遭禁，《国民》续之。这些前接后续的刊物，只是名称变化而已，内容与《生活》保持一致。

【2】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50~51页。

【3】转引自雷群明：《编辑修养十日谈》，53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4】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147页。



图47
胡愈之

三、胡愈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笔名伏生、化鲁，浙江上虞人。1945年抗战最后一年，有消息传到内地，说胡愈之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觉异常的怅惘”[1]。于是大家纷纷拿起笔，一面著文怀念，一面又希冀“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国内知名的《中学生》杂志，还刊出专辑，叶圣陶、茅盾、傅彬然、宋云彬、伯寒、胡子婴等人撰文纪念。不久，郑振铎也在上海《周报》上，写了追忆文章。死讯最终果然是“误传”，但朋友们当时“噩耗”之下，流露出对“亡者”的深切怀念，确乎“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叶圣陶说，与胡愈之做朋友，很少有泛泛之交的。这组怀人文章，很能说明这一点。（图47）

【1】叶圣陶：《胡愈之先生的长处》，原载《中学生》杂志，1945年5月，转引自《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471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

写纪念文章的人，都或长或短地，与胡愈之一起共过事，不仅私交好而已。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而胡愈之人生工作的第一站，便是商务印书馆。1914年胡愈之18岁时，以练习生的身份，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杜亚泉主管的理化部和《东方杂志》编辑部，做各种与编辑出版有关的杂事，为动植物词典编索引，为《东方杂志》翻译背景资料，跑工厂，管印刷，做校对，在尽职尽责中，很快熟知了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第二年，他就正式参与了《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仅胜任，而且愉快。有人统计，到1919年底，胡愈之以各种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译文就达210篇之多[2]，说明他胜任。而他的愉快，则来自于商务印书馆为他提供了读书学习和成才的好环境，有杜亚泉、钱智修等忠厚长者可供随时请益，有涵芬楼丰富的藏书可供长期利用，有六小时工作制之外的闲余时间可供业余自修，有《东方杂志》各科信息交汇的工作平台可供纵横驰骋，使一个仅读了中学二年级的他，迅速成长为一个能编、能译、能写的专家学者，在有关文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

【2】戴文葆：《〈胡愈之译文集〉编后记》，《胡愈之译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和哲学思想等方面，时见文章发表。

与胡愈之相比，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的时间要晚两年，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才从北京聘入商务与胡愈之同事，叶圣陶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间是在1923年，那就更要晚些了。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均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胡愈之同样是该会的会员，入会号数为48[1]。对文学事业的共同志趣，使他们"由相识而相熟"，进而产生友谊。那时候的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理想远大，又气味相投，既懂得出版的媒介力量，也善于利用自身编辑的位置优势，组织团体，发表主张，探讨问题，酝酿风气。胡愈之不仅在他负责的《东方杂志》上，着力介绍西方文学艺术的作品和人物，从而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声应气求，而且还是后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会刊《文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支持这份刊物的印行，直到1928年他出国留法。

温和敦厚，是胡愈之给朋友们的普遍印象，这大概也是胡愈之人缘特别好的主要原因之一。郑振铎说，他和胡愈之同事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从来没见过胡愈之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永远是那么的心平气和，永远是那么的和蔼明朗[2]。传统儒家说："君子和而不同"，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外圆内方的性格气质，在胡愈之身上得到有机统一。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胡愈之积极与新闻界联系，把别家不敢刊登的稿件，拿到商务职工专此出版的《公理日报》上发表，以报道真相，冲破压迫，指导舆论。与此同时，在他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上，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撰写了《五卅事件纪实》一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进程。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的次日，他路过宝山路，见到惨不忍睹的屠杀情景，他被深深地刺激了，"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这是相处多年的郑振铎唯一一次看到胡愈之一反平日温和常态——"他气促息急地跑到了商报馆，立即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抗议信中写道："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

[1] 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6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2] 郑振铎：《忆愈之》，原载上海的《周报》，转引自《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499页。

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伤毙至百余人。”抗议信联合了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签名，并在《商报》上公开发表。这封后来被周恩来称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壮举”的公开信，遭人忌恨了。多少受到传闻的“黑名单”威胁，郑振铎不久避走于英国，半年之后，胡愈之也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郑振铎说，这是胡愈之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1]。

【1】郑振铎：《忆愈之》。

这样的转变，是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不满、寻找出路的结果。胡愈之在法国的三年时间里，除了以《东方杂志》“巴黎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为《东方杂志》撰写评论和通讯外，还非常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法国的一片萧条景象，胡愈之是亲眼目睹了的，而1930年冬，他从法国回国途中，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虽只有7天时间走马观花的参观，但印象非常之好。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时正反比较，加上对马克思理论的膺服，坚定了胡愈之“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他随即把他的好印象撰写成流畅的文字，先是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连载，后结集为单行本，名为《莫斯科印象记》。青年们十分爱读，一年再版了五次[2]。

【2】盛永年、王健编：《胡愈之画传》，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从巴黎回国后的胡愈之，确实是一个实际行动者。他参与和组织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他曾是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分子；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曾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一起，策动了隆重的鲁迅葬礼；当“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负责过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曾陪同宋庆龄赴苏州自请“救国入狱”活动。他有一支如椽大笔，对国内国际敏感问题，不断发表见解，深刻而犀利。他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团结了一大批知名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积

极奔走而见实际成效。而他活动的主要阵地，还是新闻、编辑与出版，这不仅因为从“编辑室”出来的他对此十分内行，更因为他深知新闻出版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可以为其政治活动聚揽丰厚的人脉资源，可以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有力的舆论导向。胡愈之在这块阵地上做得是那样的有声有色，朋友们每每谈起，总是津津乐道。郑振铎在《忆愈之》一文中，如数家珍地写道：

>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灿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
>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
>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
>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一手造成的。
>
>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郑振铎在文中所列举的事实，大致时间止于1938年5月，即胡愈之离开上海孤岛前；另外，此前不久，同样是由胡愈之一手策划，并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文中也漏列了。而在抗战爆发后的漫长岁月中，胡愈之的新闻出版活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也一如既往地做得可

圈可点。1938年底1939年初，他在重庆，受邹韬奋之邀，共同商讨抗战时期生活书店今后的发展方针大计。在他的建议下，生活书店调整了总管理处机构，成立了编审委员会，扩展了全国范围的分支店；1939至1940年6月，他在香港和桂林，组织了香港国际新闻社和桂林国际新闻社的合并，使该社一时阵容强大，稿源充足，稿件被国内多家报纸广为采用。他还联络"广西建设研究会"，组建了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了系列性的《文化室图书》数百册。据当时也在文化供应社工作的傅彬然说，该社是"抗战发动以后西南规模最大出版机关，有一个时期，在推进全国文化运动上，曾尽过相当的力量"[1]。1940年底至1948年3月，他在南洋，先是帮助陈嘉庚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不到一年时间，该报就一跃而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2]；而到日本投降后，他又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出版《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与此同时，他还协助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日报》，反映侨民心声，保护侨民利益，产生了深远影响。

【1】傅彬然：《记胡愈之先生》，原载《中学生》杂志1945年5月，转引自《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478页。

【2】张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173页。

胡愈之1933年9月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此时此地的共产党组织，正处于最低迷时期，知难而进，反映了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人生信念。胡愈之能说会写，但他更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包括出版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始终是围绕着他的信念主轴开展的，他三四十年代颠簸各地，亦是受命于党组织的安排。叶圣陶说胡愈之"栖栖皇皇，计划这个，讨论那个"，其目的，"无非实做'有所为'而已"，而内在的动力，则可能是他受世界语影响种下的博爱思想的驱使，"只觉非做不可"[3]。这样的判断，可谓知人之论。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往深处细想，胡愈之加入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奔波党的文化宣传事业，焉又不是这种博爱思想的一脉相传和自然延伸呢！

【3】叶圣陶：《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因为要"有所为"，致力的又是大事业，胡愈之不仅自己切身去做，还乐于创造条件，成就他人一起做。叶圣陶说胡愈之"善于认识朋友的长处，加以运用和鼓励，使朋友人人尽其所长，把团体弄得很好，把杂志书刊办得很好"[4]；茅盾也说胡愈之虽然

【4】叶圣陶：《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并不自办出版社，也不自编刊物，可是出版家或刊物的主持人如果认真想把工作做好，做得有意义，那他一定很热心地给以帮助。他贡献他的经验和智慧，代人设计，代人拉稿，甚至还代人调解人事纠纷。他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白赔上精神和时间，以此为乐”[1]。当初章锡琛创办开明书店，胡愈之是积极推动者；当初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从职教社独立出来并进而成立生活书店，胡愈之是热心的规划者；当初桂林文化供应社发起成立，胡愈之是总设计者，但成立后却推陈劭先为社长；当初国际新闻社的组建，胡愈之是出大主意者，但国新社的社长却是范长江[2]。胡愈之组织能力强，创新点子多，人际关系好，这是他的长项。他也有意识地注意发挥自己的长项，“不断创造文化新据点。一个新据点成功了，他就把它交给朋友们，自己再去创造一个”。这样的能力固然极令朋友们钦佩，但朋友们更敬重他的，还是他那平易踏实、淡泊为怀、甘居幕后的作风，“从来没有过‘功成在我’的那种想头”，“在他的谈话里，文章里，从来看不到一点矜夸之气”[3]。这既是他的性格使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大事业家的智慧所致。

[1] 茅盾：《悼念胡愈之兄》，《中学生》1945年5月，转引自《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475页。

[2] 千家驹：《半个世纪的畏友》，《胡愈之印象记（增补本）》，31页。

[3] 傅彬然：《记胡愈之先生》。

第五节 沈知方与张静庐

一、沈知方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其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到沈知方父亲一代，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沈父以摆书摊为生。沈知方少年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沈知方到上海进广益书局，1900年由夏瑞芳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营业职务，很得夏瑞芳的赏识。据说，沈知方豪放不羁，常常不能按时上班，同事们有闲言碎语，股东也多对他不满，而夏瑞芳却依然对他多加袒护，并认为他“才气宏阔”，是个书业奇才，假使一旦让他离去，将来必定成为商务劲

敌[1]。

1913年初，沈知方受聘进中华书局任副局长，主要负责营业和进货。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了不俗的书业才干。据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的股东会议记载，局长陆费逵报告聘请重要人员时说："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沈知方投机纸张生意，为中华书局托美商茂生洋行从国外定购了大量纸张，他自己也定了许多，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纸张价格大跌，致使中华书局蒙受了数万元的损失。中华书局后来发生"民六危机"，沈知方此次投机失败，亦为其中原因之一。他本人也因无力付款，被洋行起诉。为避免讼累，沈知方于1917年脱离中华书局，逃往苏州。据说他在苏州为逃避吃官司，甚至对外发出讣告，谎称自己病逝[3]。

不久沈知方又返回上海，依然从事书业，用世界书局、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出版图书。比较严肃的图书用广文书局的名称，通俗的图书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名称出版。因自己没有营业门市，沈知方将出版的图书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营业实践的结果是，用世界书局名义出版的图书销路最好，而且世界这个名称含有全球之意，至少从地理范围上比中华书局以一国为名要大许多，于是沈知方便重点发展世界书局了。

沈知方个人创办世界书局的时间是在1917年[4]。由于营业逐年增加，资金不够运用，1921年夏，沈知方在朋友的帮助下将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既是董事也是总经理，这时公司资本为2.5万元。1931年世界书局庆祝成立十周年，便是以1921年股份公司成立为始计算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世界书局的资金由2.5万元陆续增加到抗战前的73万元。陆续在各省大城市开设分局三十多处，在苏州、杭州都设过编辑分所，职工人数最多时在一千以上[5]。后来因经济周转不灵，由书局董事辗转引入李石曾集团资本。1934年，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继任总经理，但在出版物方面，沈知方仍起指导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

【1】见前引映芝《文化事业中的一段掌故：忆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

【2】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见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299页。

【3】王震：《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

【4】《十年来的世界书局》，《世界杂志十年增刊》，1931。

【5】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李石曾强行加入资本半数，控股了世界书局，不过这已经是沈知方去世以后的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开始，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沦陷期间，日伪曾威胁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反对以后，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病中的沈知方预立遗嘱，提到"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1]，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1939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

【1】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沈知方是一位特立独行、锐意开拓、恃才狂放的出版家，在迎合新兴小市民阅读需求、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过人的眼力和胆识。早在世界书局创立之初，沈知方便大量出版社会纪实报道、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算命发财书、名人传记等，这些为资金薄弱的世界书局早期的发展，并且使它能在1924年出版教科书，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在出版教科书以后，世界书局的出书范围进一步扩大，品味也有所提高。不过，畅销书依然是它关注的重点。在畅销书之外，沈知方还重视发展通俗杂志，他创办的《侦探世界》对于促进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份杂志连载过一系列畅销的侦探小说，在当时的大众读者中很受欢迎。

在寻找作者方面，学徒出身的沈知方不可能与名教授、名作家攀上诸如同学的过硬交情，但他也自有他的高招，他善于运用商业方法。因沈知方的儿子沈志明在复旦实验中学读书的关系，沈知方得聘该校教员徐蔚南到世界书局工作，每月发给月薪500元，还派汽车接送，真可以算得上礼遇有加。后来徐为世界书局主编《ABC丛书》等大型丛书，风行一时，这也是沈知方的"慧眼"和胆识所致。

1922年春，沈知方通过著名小说家包天笑的介绍，约请向恺然（笔名不肖生）撰写武侠小说的书稿，于是不肖生"左右开弓"，同时构思《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二书，前者多写江湖异闻，后者是结合史实而作有关霍元甲等人物的故

事。第二年便分别连载于世界书局办的杂志《红杂志》与《侦探世界》上，一时洛阳纸贵，十分畅销。1930年秋，张恨水从北京来到上海。经过《红玫瑰》主编赵苕狂的介绍，沈知方认识了张恨水。沈知方与张恨水谈定，张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两部小说交由世界书局出版，并言明，《春明外史》可以一次付清稿费，条件是要把北京的纸型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1 000元。当时正急需钱用的张恨水答应了这笔交易，还承诺专门为世界书局另写四部小说，每三个月交出一部，每部字数在10–20万之间，每千字8元。后来张恨水实际完成三部，这就是《满江红》、《落霞孤鹜》与《美人恩》。张恨水这些图书的畅销，再一次印证了沈知方作为出版家的眼光和才能。

沈知方是一个为成功不计较手段的出版家。著名的伪书《石达开日记》实为常州人许指严伪作。相传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狱中著有四册日记，后来不知下落。许指严擅长写掌故小说，但嗜酒成癖，为了偿还酒账，就想出这个选题，与沈知方一商量，沈知方立即闻到了畅销书的味道，慨然预付稿酬200元给许，许于是伪造日记，交世界书局印成单行本出版，世界书局同时还大登广告进行宣传："在四川藩库中，觅得石氏真迹日记数卷，特托友人，借以录抄，间有残蚀不全者，则参酌各家记载，略为润色，详加第次，汇辑成书。"果然销路很好[1]。

【1】郑逸梅：《三种伪书》，《书报话旧》，61~6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除文学书以外，沈知方还敢于出版一些有政治风险的图书。如在北伐军北上之前，商务、中华都还不敢出版革命图书的时候，沈知方大量出版宣传三民主义的小册子，并且在各分馆销售，以致后来济南分局经理被逮捕，直到北伐军攻破济南才被恢复自由[2]。

【2】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沈知方很重视图书推销。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先在北京出版过，不过印几千本。沈知方买断版权后，世界书局在《申报》、《新闻报》上大做广告，一印至少上万部，全书分12册，定价10.8元，不久便再版，世界书局又出版缩版，缩版改用五号字，印成

两册，定价两块多，这样一来便尽可能多地挖掘出一种畅销书的附加价值。世界书局为争夺市场，除给贩卖同业优厚的回佣及降低折扣外，还用摸奖大赠品来吸引读者[1]。强效的广告宣传以及赠品、跌价甚至摸奖券等营销手段的运用，是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和畅销书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大力的宣传也扶持了张恨水、不肖生、程小青等一批畅销书作家。这些作家长期与世界书局合作，为世界书局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们与世界书局形成了互相倚仗的关系。

【1】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见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312~313页。

沈知方善于募集资金。与沈知方打过交道的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提到，沈知方“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2]。世界书局的大股东大多是商界、司法界人物，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都是世界书局早期的董事。沈知方还有一种募集资金的方法，那就是用书局股票代替稿费付给作者。这其实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对于作者来说，有利可图；对于书局，可暂时省下一笔稿费的支出，并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入股的关系在作者与书局之间建立一种更亲密的关系，使作者更愿意为书局出力。

【2】程小青：《我和世界书局的关系》，《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资金不足常常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沈知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1930年左右发起组织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吸取社会游资贷给书局，他还以这些存款购买房地产，以期在必要时可以出售获利或押款周转。但后来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反而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这实在是有胆识和魄力的企业家在动荡不安的国运面前的一种无奈。沈知方办事大刀阔斧，有魄力，善于在市场中钻营寻找商机。然而战争等非市场因素和不可预测因素，打断了他更美妙更完美的大出版家的梦想。沈知方的经营作风也许不算稳健，但是他身上那创业者的勇气与果敢、胆识与魄力，在民国出版家中罕有匹敌。1931年世界书局庆祝成立十周年时，在《世界杂志十年增刊》上刊登了《十年来的世界书局》一文。此文提到：每到年终，世界书局同人与总经理沈知方谈话时，总是听到沈知方简洁而有力地说：“明年从头再做起！”[3]充分体现出他开疆拓土的出版家气魄。

【3】《十年来的世界书局》，载《世界杂志十年增刊》，1931年。

民国时期的优秀出版家有很多是编辑作者出身，然而沈知方是个例外。虽然他创办的世界书局在29年里出版了五千多种图书，他自己却很少写下什么著述，阐发什么宏论留给后人。他自谓"生平别无嗜癖，惟雅好藏书"[1]，《粹芳阁珍藏善本书目》是他留给我们的一部藏书目录，书首有一篇简短的《自序》，述及家世及他对书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爱书，使他与出版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1] 见前引粹芳阁主人(粹芳阁是沈知方斋名)藏并编《粹芳阁珍藏善本书目·自序》。

二、张静庐

我国出版工作者写自传的向来少有其人，付印成书的仅见于张静庐1938年出版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这一年，张静庐刚及不惑之年，而已然是栖身出版界20年的老兵。该书即记录他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初期20年的出版行状，虽然是个人叙事，却映射着一个时代的出版轨迹和历史风貌，值得后人细读。

张静庐（1898—1969），浙江慈溪人。他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从家乡赴上海谋生当学徒，先是在酒行，后转到洋纸行，白天学徒做工，晚上则熬夜苦读，凭借对书的迷恋和对文学的执著，打下了他今后出版人生的坚实基础。张静庐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第一个启示：大凡一个好的出版人，首先必然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因为爱屋而及乌，因为爱读书而从事出版，两者之间正有某种天然而又必然的联系，至于学历之高低，倒还在其次。近代出版大家中的陆费逵、王云五、沈知方等人，都和张静庐一样学历不高，自学成才，一生间读书藏书不辍。

张静庐做出版的第一站是在泰东图书局，先做编辑，后主管出版和营业。郭沫若到泰东后不久，大约是1921年10月，张静庐脱离了泰东图书局，到联合通讯社做外勤记者。1925年春，张静庐重返出版界，与沈松泉、卢芳等三人共同合资创办了光华书局。1927年，他与洪雪帆合资创办了现代书局。1929年，他独资创办了上海联合书店。1934年，他又独资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从1925年到1934年不到十年的时间，先后有四家书局在他的筹划

下面世。过去出版界进入门槛较低，办书局书店不难，难得的是张静庐经手的每一家书局，几乎个个都有影响。这就体现了他的出版才干，也显示了他的出版韧性。读张静庐的自传，在跟随他体验出版道路上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不难深刻地感受到他对出版事业的一往情深和不甘平庸——“除掉业务上，我现在简直可以说与人无争。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弯弯曲曲朝着这目标而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信念而工作。并不因为环境险恶而逃避；也不受生活艰难而动摇”。[1] 正是这样一种在兹爱兹的出版情怀，铸就了他不同流俗的出版人生。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写在后面》,3页。

张静庐办的诸多书局中，以上海杂志公司的名气最响，影响也最大。作为全国第一家专门贩卖杂志的公司，它的创办，最能说明张静庐富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胆识与气魄。当初上海杂志公司开办时，经费区区不过20元，居然大获成功。这样一种结局，固然得益于时代因素的赐予，但同时也是张静庐精于经营的结果。考察他经营杂志时“快”、“齐”、“廉”的经营思路，“代订代办代理发行”的业务内容和“退定改定绝对自由”的服务承诺，其实无不贯穿着一种他利与自利相结合的经营理念。据说，张静庐之精明，在当时出版界是有名有数的。然而他之精，有品、有节、有理，所以也就特别有力、有利、有效。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张静庐自我期许甚高。他在自传中坦言，他虽无缚鸡的腕力却有举鼎的雄心，甚至公开表白说，在当时上海的同业中，值得他钦仰，让他感到可爱的出版家，寥寥无几。在他这种貌似桀骜的语句背后，其实自有一杆大秤横在心中，秤砣下面，分别站着两排出版人——有一排，张静庐敬称为出版商，可爱，却少；另一排，则只能呼名为书商，市侩，却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两排人都同样地做着关于书的生意，都同样地关心着出版后的利润，“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

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1] 张静庐之骄傲，是因为二十年里在出版界摸爬滚打的他，信心十足，不惧怕任何人任何有关他出版动机的追问。他敢于高声宣布：“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2] 张静庐的文化自觉，兼之他的出版才干，使他在文化史和出版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阿英早年曾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新文化运动史，不应该忘掉张静庐。这样的评价，对于终日为他人做嫁衣的出版人来说，也就是一座无形的丰碑了。这是张静庐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也是最为重要的启示。

【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写在后面》，4页。

【2】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写在后面》，3~4页。

如今，斯人早已驾鹤西去，而其一番所作所为之后的所存所留，包括出版物和出版物衍生的影响，包括出版观和出版观统领的精神，已在历史文化的某一记录中定格，也会在现实和未来的某一时空中形成呼应。甚至包括张静庐1938年写的这本自传，1984年上海书店曾将其影印出版，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将其重印刊行。

第六节　鲁迅与巴金

一、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和前文所叙述的诸多出版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算不上一个职业出版人。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编辑出版是其余事。然而，在后世人们的观点中，多倾向于把他同时作为编辑家看待。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身前的所

作所为，包括编辑出版，容易被后人关注，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根本的，鲁迅一生著述不断，既与编辑出版机构打交道，又在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中亲历亲为，是一个真正的出色的高明编辑。(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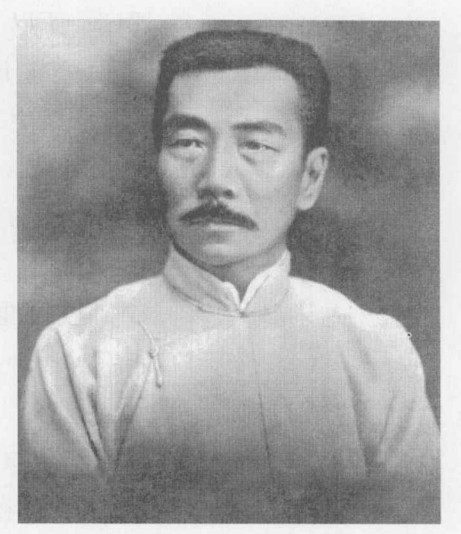


图48
鲁迅

鲁迅一生办过七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1]，先后编过九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2]，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为“相识与不相识者”的书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合共约2 000多万字[3]。

从以上列举的数字可知，鲁迅一生所编书刊的数量，不可谓之少，但这还不是鲁迅作为编辑家的权重所在，因为在近现代时期，像鲁迅那样，非职业性的兼事编辑出版的文人学者不乏其人。鲁迅在出版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编辑人类型，那种一心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个人的信念目标，为出版物的优良品质，坚持不懈，自甘奉献，不羼杂商业意图，可谓“纯粹”的编辑出版者。这样的编辑出版人，在任何时代恐怕都不会是大多数，然而却是出版界的精英和脊梁，值得人们景仰。

鲁迅早年学医，后来弃医从文，源于他思想认识的转变。他认为，要使祖国富强，“第一要著”，要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为了提倡文艺运动，“第一步当然是办杂志”，于是有1907年《新生》杂志在东京的筹办。《新生》筹办虽然不克成功，但出版可以辅助文艺，可以“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可以“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的观念，在他内心里扎下根来，并贯穿于他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之中。他后来创办《莽原》周刊，则是因为看到“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

【1】这七个出版社中，未名社和朝华社，是鲁迅和几个青年合资创办的。未名社成立于1924年12月，结束于1933年，主要业务由韦素园和李霁野前后经营，鲁迅为未名社主编了《未名丛刊》、《未名新集》两套丛书。朝华社成立于1928年底，先后出版了《朝华周刊》和《朝华旬刊》，以及《接吻》等三种图书，经营不到一年，因赔完了老本而夭折。其余的五家出版社，都是鲁迅自费印书的一个名义罢了，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

【2】倪墨炎：《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见宋应离《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2)》，60~69页。

【3】陈早春、王锡荣：《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出版工作》1981年第9期。

【4】凡鲁迅言论，皆出自《鲁迅全集》，后不一一注出。

评’”，所以“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他主持《语丝》期间，“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主编《文艺研究》时则一再表示，“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意在“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鲁迅一腔爱国热忱的表现，也是他出版精神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当国民政府文化统制愈紧，文网愈密，当“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这些政治上的威胁和商业上的遮蔽，均不能让鲁迅屈服。他的自费印书，他的资助青年开办书店，则是对当时不如意出版环境的坚决反击。他自费出版《毁灭》、《铁流》等苏联、俄国小说，是因为政治风险大，私商不敢出，还因为“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他出钱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木刻纪程》、《十竹斋笺谱》等木刻版画，是因为美术画册成本高，销路差，容易赔本，私商不愿出，还因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自掏腰包编印瞿秋白的遗文，是因为同志间珍贵的革命友谊，还因为要高擎“爱的丰碑与憎的大纛”。鲁迅曾明确地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又说：“倘我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文艺写作和编辑出版，在鲁迅身上合二为一，统一为共同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大众工作”。

因为受历史使命感的驱使，鲁迅无论出书还是编刊，态度都非常严肃认真。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反复强调，出书一定要“于读者有益”，“使读者有所得”。那种“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时兴就挂什么”的出版行为，鲁迅不会做也做不出。虽然，他那些

自费出版的图书，因受制于发行力量的不足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销量多不大，经营上甚至很多都“赔完了老本”，但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有价值的好书。正是有这样的出版人，这样的出版物，拾遗补缺，弥补了商业出版之不足，凸现了多元出版的文化价值。

因为要“于读者有益”，所以鲁迅十分重视编校质量，凡经他编印的书刊，都要通过“前言”、“后记”、“例言”、“小引”、“谨启”、“附白”、“按语”、“小信”等辅助性的文字，把有关书刊的作者、背景材料、编辑出版情况，以及编者的想法等等告诉读者，使读者对书刊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得到更大的帮助，获得更多的益处[1]。“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这是他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中说的话。凡他编的书刊，一定亲自校对、批版式、找插图，请人画封面，亲自写广告，跑印刷厂，跑制版所，连字体的规定，也一定自己标明，毫不含糊[2]。这样的认真劲，使鲁迅成为一个精通出版流程，真正的编校老手。其高超的编校水平，连赵家璧这样的职业编辑都不由得生出佩服之心。而他对书籍装帧的考究，及表现出来的美学品位，甚至不少书的封面竟由他亲自设计，更是很多职业出版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晚年出资出版画册，又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插图本，不遗余力地提倡木刻版画。这些经验和成绩，都值得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者认真借鉴和学习。

【1】李荣生:《鲁迅的编辑道德》,《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

【2】陈早春、王锡荣:《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

二、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同叶圣陶、鲁迅一样，既以杰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同时又是一个出手不凡的编辑出版家。集作家与编辑于一身，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的特点。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基本上是业余进行；而叶圣陶，则以之为主业，编辑出版是他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巴金，虽也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多年，但他做的工作，却纯粹是义务性劳动，不领一文钱的报酬。三个人，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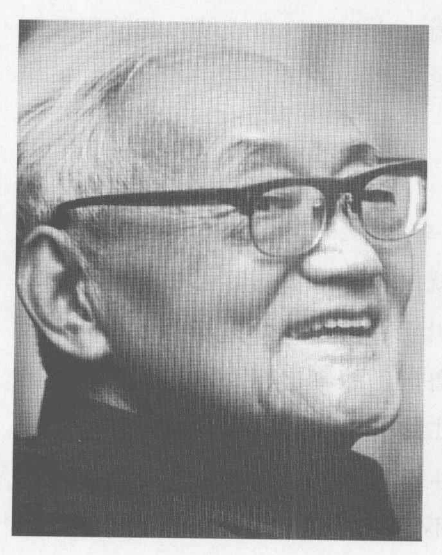
【1】1921年5月巴金参加了《半月》刊物的编辑工作。《半月》创刊于1920年8月1日，是成都青年学生办的一个综合性小刊。1921年7月，由于发表了两篇痛斥四川封建势力、宗法思想对女子束缚的专文，《半月》被警察厅查封。1921年9月，《警群》创刊。这是《半月》被警察厅查封之后，巴金筹备出版的另一个刊物。该刊第一期，刊有巴金的短论《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但由于《警群》的发起人之间就办刊宗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巴金等人登报声明脱离，《警群》第一期也就成了最后一期。1922年春，巴金又和吴先忧等人创办《平民之声》周刊，并主持编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该刊物送审后，警察厅认为"对于国家安宁恐怕妨害"，不允许发行。巴金等编者只得半公开地在外面零卖。1927年，巴金在巴黎遥控编辑了一家在旧金山出版的刊物《平等月刊》，发表了大量对当时国内局势的看法和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对策。1929年1月，巴金担任上海自由书店编辑，与乐夫、毕修勺、梅子等人共同经营了一家名为自由书店的书店，筹备出版了自由小丛书、时代丛书，发行了"半文艺半广告"的两本杂志——《自由月刊》和《时代前》。1934年，巴金参与了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这是巴金的编辑工作与文学事业第一次挂钩。此前他所编辑的书刊，都是作为一个"安拉其主义者"，投身于无政府主义运动，宣扬其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是其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与他的文学事业基本上没有关系。

不同的参与出版方式，但都无一例外地，对当时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巴金编辑活动的重大成就，是在1935年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取得的。此前他虽也或参编、或主编过《半月》、《警群》、《平民之声》、《平等月刊》、《自由月刊》、《时代前》、《文学季刊》等刊物[1]，但影响都不大。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新时代小说丛刊》等大型丛书，以作者阵容强大、内容殷实、售价低廉，为当时衰敝不振的现代文学界注入了一道清冽的甘泉，在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辑事务之际，已是一个蜚声中外的知名作家。按说，他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才华，驰骋在自由的文学领地，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流传于后世，但他却选择了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为职业，而且是义务性的白劳。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促成了一代文学大家，对编辑出版事业如此钟情呢？(图49)

当初巴金还未成名之时，写了长篇处女作小说《灭亡》，因缺乏自信，不敢投稿，让朋友帮他自印几百册。当时为《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慧眼识珠，从巴金朋友那里，发现了该小说的原稿，将之连载于《小说月报》上，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这件事对巴金触动很大，五六十年后他还不能忘怀。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叶圣陶不曾发表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


图49 巴金

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1] 巴金后来自做编辑，未尝不是推己而及人，因个人曾经受益而有意反哺社会的结果，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一贯信奉安拉其主义的人来说，更有可能是如此。

【1】巴金：《致〈十月〉》，《十月》1981年第6期。

安拉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正义、互助、奉献自己，是安拉其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做义务编辑，从伦理上，给巴金提供了一个奉献自我的工作岗位。巴金后来这样总结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2]

【2】巴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5页。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巴金虽在思想上接受安拉其主义，但在编辑上却采取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广泛出版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显示了一个优秀编辑家所具备的开放和包容的编辑态度。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介绍《文学丛刊》时，特别指出：“破除门户之见，编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系的作家：其中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的作品，尤见巴金的气量和风度。”[3]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料》（中卷），香港，昭明图书公司，1980年。

曾经因叶圣陶编辑上的提携而顺利走上文学道路的巴金，在自己当上编辑后，有心效法前贤，同样把发现和培养新作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巴金深刻认识到：“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和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并强调：“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4] 巴金不光有认识上的坐而言，更有实践中的起而行。曹禺的剧本《雷雨》存放了两三年，是巴金从靳以那里看到后，将其发表于《文学季刊》，后来又以单行

【4】巴金：《致〈十月〉》。

本的形式收录于《文学丛刊》第一集，接着又在第三集中出版了曹禺的另一剧本《日出》。正是这两部话剧的出版，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巴金的编辑发现之功，寓其中矣。类似的例子还有：何其芳的第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都是被巴金采用的。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丽尼等人的处女作，都是在巴金手下出版，从而使这些文学新人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在鼓吹"个个是名家，篇篇是名作"作为惯常营利手段的出版商业环境中，巴金坚持以文学的而非商业的标准，履行编辑人的文稿选择职能，显示出了他真挚的编辑良知和卓尔不群的编辑胆识。

一个在编辑岗位上乐于奉献自己精力的人，其编辑作风必然也是严谨认真，尽责尽力的。虽说巴金身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但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总编除了组稿、审稿外，还做着校对、跑印刷所，乃至于装帧设计、广告宣传等烦琐的具体工作。《文学丛刊》的书装就是由巴金自己设计的[1]，自然、朴素、大方，独具风格。文生社所出图书的内容介绍及广告词，亦大多出自巴金、丽尼等人之手，语言精炼，文笔优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巴金比别人更认真"[2]，这是编辑作风同样严格认真的鲁迅，在与巴金的编辑工作交往中，给予巴金的评价。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之久，其中一大半时间是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抗战年代。在敌人的炮火下，在敌机的轰炸中，巴金一边编稿子，一边冒着生命危险跑印刷厂发排稿件、取校样，书刊出版后，又亲自打包、邮寄外地。在他编的《生人妻》后记中，他这样写道："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广州失陷前一天，巴金丢弃了大部分行李，带着《文丛》第2卷第4期的全部纸型转移到桂林，将刊物出版，并创办了文生

【1】姜德明：《书籍装帧的艺术魅力》，《新文学版本》，24页。

【2】华水：《他心中想的总是别人：记巴金的编辑生涯》，《他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社桂林分社。他在《文丛》第2卷第5、6期合刊的卷头语中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巴金先后转移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无论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他都忠于职守，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巴金在文生社的14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大好年华，他将之付给了编辑出版事业，写作反倒成了业余。然而，巴金依然凭借他的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而成为多产的作家——他的文集长至26卷；这原本是可以更长的。萧乾就曾说过："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民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四十卷。"[1] 然而，巴金却从未于此作过得失的计较，也不曾流露丝毫的悔意；相反，在他的内心深处，只体验着欣慰和快乐——一个编辑者的欣慰，一个奉献者的快乐。在这个精神境界上，鲁迅、叶圣陶、巴金这三大文豪，又有了相同之处。

[1] 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月刊》，1982年。

第七节　其他较有影响的编辑出版人

以上各节，我们选择了在民国出版史上有重点影响的，也是后人论述与研究较多的一些出版人物，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冠以出版家或编辑家之名，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出版活动中，对出版文化事业作出了较为杰出的贡献。像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沈知方、邹韬奋、章锡琛、张静庐等人，都堪称那个时代出版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编辑出版实践，是那个时代出版水平的代表；像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人，虽主要不以编辑出版活动名世，但他们在编辑出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追求，是那个时代出版境界的高点。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的出版追求，他们的大家风范，留

给后继者以感悟，以借鉴，以效法，所谓知过去，正今人，诫未来。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出版人物史林中，值得我们驻足观看的编辑出版者，远不止我们前面所写的那么多。部分因为某人某事史迹难寻，部分因为本书篇幅所限，我们无法逐一详加细说。这里，根据现有史料，再选择120余位人物出来，用表格的方式作基本的介绍[1]。这当中，有职业的出版人，如汪孟邹、李小峰等，更多的是一些作家、学者、教授、社会活动家兼做编辑出版人，甚至只是某个人生阶段曾经客串出版，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茅盾、顾颉刚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现代出版制度为他们在编辑出版领域的进退出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出版现象，值得认真关注。具体到表中的不同个人，参与出版的方式可能各有不同，贯注在出版行为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许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共同构筑了民国时期多姿多彩的出版风景。

【1】本节共列出九个表格，大致按人物所供职的出版机构类型，分别归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人才众多，单独予以列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民国时期编辑出版人员流动频繁，一个人可能曾在数个出版单位出入，所以归类难以周全，只能就其某一时期的主要出版活动情况，大致划分。同一表格中的人物，在兼顾到人物相关性的基础上，基本上按出生年月先后排列。

【2】主要资料来源：(1)《上海出版志》第十篇：人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1—8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3) 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以下各表资料来源，均同此。

表一　曾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编辑出版人[2]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高梦旦（1870—1936）原名凤谦，字梦旦，福建长乐人。	1903年，任浙江大学堂留日学生监督，乘便考察日本。同年冬，回国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部长，后任编译所所长。任上，高梦旦多方延揽人才，扩展业务。商务的重大决策，他均参与。他前辅张元济，成为张的有力臂膀，被人喻为商务的参谋长；后辅王云五，是一位"能断大事，虑无不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1928年，梦旦辞去出版部长职，只任董事会董事，仍一如既往关心馆务。卒葬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
孙毓修（1871—1923）江苏无锡人。	商务印书馆高级编辑，主编六年《少年杂志》，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儿童丛书《童话丛书》。另外，还编有《少年丛书》、《演义丛书》、《常识丛书》等。在张元济指导下，负责编印《涵芬楼秘笈》10集，收书51种，后协助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初稿、续编。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杜亚泉（1873—1933）　原名炜孙，字秋帷，浙江绍兴人。	其编辑的《亚泉杂志》半月刊，为国人最早创办的科学杂志。又编辑《文学初阶》，为我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历时28年。其在商务印书馆的功绩有两个，一是编辑理科教科书，中国第一代自然科学教科书，大多出自他手；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是我国该学科的第一部大辞典。第二大功绩，就是主编了九年的《东方杂志》，坚持科学的立场，强调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科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杜亚泉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恽铁樵（1878—1935）　名树，江苏武进人。	1911年，应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聘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次年，开始主编《小说月报》。他主张著译小说是为了“变国故”，讲求文章章法，对当时流行的“大抵饾饤堆砌号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切摈之”，而以“雅洁者是取”。他注意新人新作，提出“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他喜欢对文中佳处圈点，并加评语。他任主编时，发表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还发现失业的小学教员徐悲鸿绘画的才华，竭力向馆方推荐为教科书绘制插图，可惜未被录用。主编期间，他没有助手，凡选稿、复信、批稿费……都由他一人做，一丝不苟，办事勤快。鲁迅小说被决定采用六天后，就收到复信；未成名的张恨水《旧新娘》、《桃花劫》两篇小说，“四五天后就收到回信”。1915年，他又兼编《小说海》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兼并的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出版。
周建人（1888—1984）　字松寿，又字乔峰，浙江绍兴人。	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编辑中学动植物教科书及《自然科学研究丛书》等。曾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编辑。主编《自然界》。
傅东华（1893—1971）　笔名伍实等，浙江金华人。	1913年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员，开始翻译文学作品。1924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1934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还为生活书店主编一套包括老舍、巴金、沈从文等名家作品在内的《创作文库》二十多种。抗战前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编委。1942年9月，为汪伪编《东南》月刊。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顾颉刚（1893—1980）原名涌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	1922年12月—1923年12月，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史地部编辑，与王伯祥合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1923年，与郑振铎等在上海集资创办朴社，不久解体。次年在京重新组成，任总干事。1934年，在北平创办通俗读物社。1945年，任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长。1946年，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先后编辑的刊物有《禹贡》半月刊、《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古史辨》等。
黄警顽（1894—1965）别号心村，上海人。	14岁参加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由张元济主考并面试。和黄一起应试的人员中，还有廖陈云（陈云）。黄被录用，后来调到发行所专做服务工作，有"交际博士"之称。他自称："我在店里从1913年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三十三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笔名李浩吾、李膺扬、柳岛生等，浙江余姚人。	1921年初，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学生杂志》编辑，每期有他写的社评或文章，他的文章思想新颖，观点鲜明，通俗易懂。辟有通讯和答问栏，亲自解答问题。六年中，发表的社评和文章180篇，通讯100篇，答问1500则。善于对青年进行人生的指导，凡青年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世、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都给予关心和教育，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1926年4月，秘密赴武汉，任江浙沪国民党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委员，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开始编辑生涯，并参加文学活动和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初同郑振铎、叶绍钧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接办主编《小说月报》，对其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1927年，在汉口主编《民国日报》。1930年回国后，参加"左联"。1936年编辑了关心祖国命运、激动人心的《中国一日》。1937年创办《文学》期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文化救亡工作，主办《文艺阵地》。他还在香港主持报纸《立报》副刊《言林》，重编综合性文艺刊物《笔谈》。抗战结束后主编过《文联》、《小说》等刊物。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谢六逸（1898—1945）名光燊，字麓逸，贵州贵阳人。	1922年4月回国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实用字典部任编辑。1935年起，兼任上海《立报》副刊《言林》的主编。提倡短文，被称为言林体。1937年，应胡愈之的邀请，为生活书店主编《国民周刊》。7月，上海成立编辑人协会，当选为主席。1938年8月，去贵阳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主编《抗建》半月刊。1941年，受贵阳文通书局总经理华问渠之聘，任编译所副所长、所长。组织120人的编委会，主编《大学丛书》、《新闻学丛书》、《语文学丛书》等。创办《文讯》月刊。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福建长乐人。	五四时期参加学生运动，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1921年应张东荪之聘，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创办《文学周报》，提倡"血和泪的文学"。7月，进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和《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创办并主编《儿童世界》周刊。他还编辑出版《文学周报丛书》，共28种。1923年，继茅盾之后，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编辑《小说月报丛书》60种。与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等在上海创立"朴社"。1925年，五卅运动中，与胡愈之、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暴行。1927年与胡愈之、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8年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1931年，与靳以主编特大型的《文学季刊》。1933年，与沈雁冰、傅东华在上海创办大型《文学》月刊；与鲁迅合作编辑出版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成为传统木刻水印的精品。1935年组织一百多位著译者主编《世界文库》月刊，兼收中外文学的精华，一年间出版中国文学名著66种，外国文学名著61种。第二年又出版15种单行本。抗战爆发后，1939年，与徐调孚编辑《文学集林》。1940—1941年，在"孤岛"上，与张咏霓等为国家图书馆成功地抢救、收购大批散失在民间的珍贵图书。个人藏书也达到7 000册。编纂影印《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还编辑出版《中国版画史图录》等。以一己之力编纂出版规模如此宏伟的艺术画集、丛刊、图谱、图录近十种。凡目录的订定，三易其稿，精心设计，与出版者、摄影者、制版者亲密合作，精益求精，完成一部又一部空前的艺术精品。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民主》周刊、《文艺复兴》月刊，创办中国出版公司。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糜文溶（1898—1968）江苏无锡人。	1915年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照相制版部，跟郁厚培学习铜锌版制版技术，1921年跟美国技师海林格学习彩色照相制版技术，任彩印部部长。1931年，研究传真版的晒版工艺。曾赴日本考察。“一·二八”淞沪战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所及东方图书馆全部焚毁。他参加筹建新厂，被任命为平版厂厂长助理兼彩印股股长，主管全厂技术工作。1933年，与柳溥庆发起成立中国印刷协会。1937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厂副厂长兼特种印件股股长。1941年12月，到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任襄理，创办重庆印刷厂并任厂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印刷厂北平厂厂长。1947年，任上海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协理，该厂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印钞厂。
张明养（1906—1991）浙江宁海人。	1930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东方杂志》任编辑。1932年，《东方杂志》复刊，胡愈之邀他合作，实际上由他主持业务工作。1933年6月，胡愈之离开后，他仍任编辑。1934年，胡愈之创刊《世界知识》，他是编委，几乎每期都发表文章。1937年，他与谢六逸编辑《国民周刊》。1938年去香港，除编辑《东方杂志》外，兼编《学生杂志》。同时任《华商报》编委，为该报写专论。194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同时任《文摘》编委。1949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进步青年》创刊，聘他兼主任编辑。

表二　曾在中华书局供职的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张相（1877—1946）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杭州人。	1914年应中华书局之聘，编审文史地教科书，主持教科图书部，后任编辑所副所长，先后三十年，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畅销，得张相之力实多。他是1936年版《辞海》主编者之一。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芚庵，浙江金华人。	1922年入中华书局编辑所任文史编辑，编辑《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教科书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等。一年后离职。1929年，再进中华书局，任教科图书部主任、编辑所副所长。编辑中小学、普通师范及南洋中小学的课本，在抗日战争前，逐步全部出齐。1942年，在重庆中华书局，任《新中华》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钱亦石（1889—1938）字介磐，笔名啸秋、谷荪等，湖北咸宁人。	1925 年创办了《武汉评论》周刊。20 世纪 30 年代，曾任《新中华》、《世界知识》的编辑。1936 年上半年起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半天在书局工作。1937 年任《中华公论》的主编。
沈逢吉（1891—1935）字迪人，江苏常州人。	1909 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学凹版雕刻。两年后中国图书公司遴选优秀人才，受李平书、唐驼的赏识，1912 年被派赴日本凹版印刷株式会社学习雕刻技术。1918 年学成回国。在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做雕刻部部长。1922 年，中华书局创设雕刻课，高薪聘请其任课主任。十年内，为中华书局培训了四十多名雕刻人才。1931 年，与王兆年等创设中国凹版公司，发起组织“中国印刷协会”。生前有凹版雕刻宗师之称。
郑午昌（1894—1952）名昶，号弱龛、丝鬓山人，浙江嵊县人。	1922 年进中华书局，任美术部主任。曾编辑史地教科书。编印《当代名人画海》、《当代名人书林》、《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欧洲名画大观》、《世界名画集》等。1927 年脱离中华书局，与李祖韩等集资开始制造汉文正楷铅字，1932 年设立汉文正楷印书局，自任总经理，请中华书局编辑、书法家高云腾书写正楷字，创制的头号至五号、新五号汉字正楷活字，于 1933 年 9 月全部完成，行销全国。蔡元培赞誉此举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以后有汉云、华文等正楷字。
李叔明（1900—1973）江苏吴县人。	13 岁毕业，考入中华书局做练习生，两年后调编译所，勤奋进修，通英、法等语。1918 年，辞去中华书局职务。1941 年 7 月，中华书局创办人兼总经理陆费逵病笃，遗言托以重任；同年 7 月 9 日，陆费逵逝世后，李叔明应中华书局董事会之聘兼任总经理，在重庆主持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重庆开设印刷厂。1948 年，当选为中华书局董事，并兼任总经理。
陈伯吹（1906—199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	1930 年起，在北新书局任编辑，主编《小学生》半月刊。1934 年起，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小小画报》杂志。自 1930 年起至抗战，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多种儿童小说、童话、理论著作及翻译作品。1943 年，在重庆任中华书局编审；1945 年 4 月 1 日，《小朋友》杂志在重庆复刊，任主编。中华书局迁回上海后，继续任该书局编审。1946 年 5 月，与教育家李楚材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1948 年，在大公报兼任儿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表三　曾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供职的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胡山源（1897—1988）江苏江阴人。	1923年到上海组织弥洒社，创办并主编《弥洒》月刊，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同时在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任翻译。1931—1937年在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1938年11月1日起至次年12月31日止，继王任叔后，主编《自由谈》。1938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刊《红茶》半月刊。
陆高谊（1899—1984）浙江绍兴人。	1933年到上海，进世界书局，任总管理处秘书、经理。1934年任总经理，致力于经营管理，颇多建树。出书以切合实用为社会称道。在他主持下，世界书局成为20世纪30年代四大出版企业之一。抗战爆发后，先后出版郑振铎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陈鹤琴、林迭肯（林汉达）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图画课本》、《拉丁化新文字丛书》等。
徐蔚南（1900—1952）江苏吴江人。	1924年，由柳亚子推荐，参加新南社。自1928年起任世界书局编辑，主编《ABC丛书》，共出版152种。抗日战争胜利后，主持《民国日报》的复刊工作，任《大晚报·上海通》的主编以及上海通志馆的副馆长，并兼任大东书局编纂主任。
朱联保（1904—1988）浙江桐乡人。	13岁入杭州中华书局当练习生。17岁入上海世界书局任函购部主任，1923年任该书局批发部主任，1926年任分局科主任，1929年任推广科主任，1931年任该局总务处秘书，1936年任出版部秘书，1946年任出版部主任。1949年6月任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部副主任。
杨家骆（1912—1991）江苏南京人。	少年时代即随祖父杨星桥编纂《国史通纂》。1930年春，正式从事出版工作，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并任馆长。因南京馆舍资料不足，又在上海、北平设立中国辞典馆分馆。抗日战争期间迁移至重庆北碚继续编辑工作。1940年把中国辞典馆和中国百科全书编辑馆已经出版的25种著作和48种定稿本以及有目录学的57种稿本，先改编为《世界学典》史文版各分册。1941年冬，除战前编辑出版的书籍约4 000万字外，又积稿达8 000万字。1945年秋，中国辞典馆易名为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迁往上海。因业务关系，继续保留了重庆北碚馆舍，取名北泉分馆。1948年去台湾，先后在世界书局和鼎文书局任职。主编出版有《四库大辞典》、《世界学典》、《古今图书集成学典》、《四库全书学典》、《续四库全书学典》、《先秦著述学典》、《汉代著作学典》、《魏晋南北朝著述学典》、《清代著述学典》、《民国著述学典》、《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提要》、《中华大辞典》、《中国文学百科全书》、《丛书大辞典》、《群经大辞典》、《历代经籍志》等大型工具书。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陈乃乾（1896—1971）名乾，字乃乾，浙江海宁人。	1917年在古书流通处，佐理店主陈琰购销古旧书籍。编印大部头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章太炎的《章氏丛书》、《百一庐金石丛书》等。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金诵清在上海合办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业，编印《清代学术丛书》、《经典堂集林》、《周秦诸子注十种》、重订《曲苑》等稀见古书。20世纪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辑印《清名家词》、《元人小令集》等，参与编辑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巨著。
宋云彬（1898—1979）笔名佩韦，浙江海宁人。	1922年在杭州《浙江日报》任编辑，1926年去广州在黄埔军校编辑《黄埔日报》。1927年去武汉，在武汉《民国日报》任编辑，后回上海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1932年起，进开明书店任编辑，负责整理和校勘朱起凤的《辞通》，分24卷，300万字。还主编《开明国文讲义》、《开明历史讲义》。1939年10月，参加胡愈之在桂林创办的文化供应社，任出版部主任。1946年1月，主编民盟中央机关刊物《民主生活》。在香港主持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工作，为香港《文汇报》编辑《青年周刊》。
徐调孚（1901—1982）原名名骥，字调孚，笔名蒲梢，浙江平湖人。	1921年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附设的英文函授学校部工作，然后在编译所任编辑。自1922年起，协助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成为得力助手。馆外参加文学研究会活动，参与编辑《文学周报》。郑振铎流亡国外，协助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郑出国期间，受郑的委托，将郑著《文学大纲》未定稿编纂成书，四大册，配以精美插图，装帧印刷十分精美。1932年商务印书馆停业后，进开明书店，任出版部主任，兼推广部主任。同赵景深、顾均正编译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巴金的著名小说不少是他组织来的，被称为作者的知音。生前整理编辑文史古籍多种，其中《六十种曲》经他修订、考证，集中前人的评价，成为开明书店的一部扛鼎之作。校注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最完备的本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在上海，贫病交加，还帮助开明书店编辑《文学集刊》等书刊。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	1924年春，在上海入商务印书馆，任生物标本模型检定员，自1929年起在编译所当编辑。1932年夏，入开明书店当编辑。1937年后，先后在桂林、温州等地任教。1945年夏，去福建崇安开明书店办事处主持编辑工作。不久，回上海开明书店继续任职。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编著多种中小学动植物、生物、自然课本。编辑过《开明青年丛书》、《少年丛书》等，并主编《进步青年》期刊。
顾均正（1902—1980）浙江嘉兴人。	1923年春至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先在理化部，后在《少年杂志》任编辑，兼《学生杂志》编辑。业余开始创作科学小品和从事科普作品翻译工作。1928年进开明书店任编校部主任，主管少年儿童读物和自然科学读物的编辑工作，编过《中学生》和《新少年》。1932年编辑《我的画报》，出12期。抗战初期，与索非编辑《科学趣味》半月刊。
金仲华（1907—1968）浙江桐乡人。	1928年春，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编辑。1932年后，商务印书馆停业，在上海苏联塔斯社工作。1933年应叶圣陶之聘，帮他编辑《中学生》，新辟了“国际政治讲话”专栏，业余时间仍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复刊的《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直到1934年7月。1934年9月，《世界知识》创刊后，他是特约撰稿人。1935年底，离开开明书店到生活书店任编辑部主任，以后又担任《世界知识》的主编，直到1947年。其间，创刊并主编《永生》，1936年7月被查封。后随韬奋到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主编国际版。日本侵占香港后，去桂林任开明书店特约编辑。1944年，到重庆入美国新闻处任译报部主任。1948年去香港文汇报馆工作，同时编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英文杂志《远东通讯》。1949年5月，《新闻报》改组为《新闻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调任上海文汇报馆社长。

表四　曾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供职的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杜重远（1897—1943）辽宁（今吉林）怀德人。	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他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任主编，保留《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他在每期卷首"老实话"专栏撰稿。1935年5月4日，《新生》刊载《闲话皇帝》的文章，以所谓"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艾寒松（1905—1975）笔名易水，江西高安人。	1931年入上海生活书店，协助韬奋编辑《生活》周刊。1933年7月，韬奋被迫流亡国外，由胡愈之和他编辑。1934年2月，创办《新生》周刊，由杜重远主编，他任编辑。1935年5月，《读书与生活》创刊，由平心和他主编。6月，以易水为笔名写《闲话皇帝》一文在《新生》周刊发表，日本以"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由驻沪领事提出抗议。国民政府立即逮捕主编和作者，查禁《新生》周刊。他在书店保护下于9月出国。去巴黎，然后去莫斯科，在《救国时报》任编辑。1938年2月回国，先后在汉口、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任总务部主任；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改任编审委员会秘书，兼编校科主任，并与史枚主编《读书月报》。9月，被派至上海，主持上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参加《集纳》的编辑工作。1942年春，去苏北解放区，先后任盐阜行政公署文教科科长、中共阜东县委宣传部部长，《盐阜报》副总编辑等职。
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	1934年底，与李公朴、艾思奇一起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1936年，随邹韬奋去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任编辑，并主编该报的《生活星期刊》，后迁回上海。1937年，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在汉口参与沈钧儒创办的《全民周刊》，任主编。撤到重庆后，《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周刊，与邹韬奋共同主编。1941年赴延安，先后任华北书店总经理、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兼编审室主任等职。

续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张仲实（1903—1987）陕西陇县人。	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湖北青年》。1931年9月，考进神州国光社，任校对。1933年，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时事类编》旬刊从事编译工作。1935年初进生活书店，主编《世界知识》期刊。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团结许多进步著译者，编辑出版《青年自学丛书》、《黑白丛书》、《救亡丛书》、《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等，很受读者欢迎。1943—194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副科长，主管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万国钧（1906—1974）浙江嘉兴人。	1936年冬，进入刚创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八一三”事变后奉派去汉口建店，1938年2月奉命去广州建立广州办事处。同年夏，黄洛峰特派他到上海负责筹划郭大力、王亚南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工作，几个月内和郑效洵等出色地完成了《资本论》三大册的出版任务。1938年底，抢在广州失陷前，完成将广州读书出版社的所有存书紧急运往梧州、柳州和重庆的艰巨使命。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读书出版社总管理处迁往香港，负责料理结束各地分店的工作。1944年8月，奉派去成都任联营书店经理。1945年4月，又被调回重庆读书出版社，同时兼任联营书店总管理处协理。抗战胜利后，被派先行赴沪负责上海分店的筹建工作。在读书出版社，他长期主持财务，精明能干，是位好管家。1948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总管理处，他被任命为协理。
孙明心（1906—1986）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1932年1月在上海参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工作。同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先后从事书店的发行、进货、秘书工作。1936年，调广州任广州分店经理。抗战后去重庆，任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营业部主任。皖南事变后被派去香港，创立星群书店，任经理。日军侵占香港后，赴桂林，创立乐群书店。回重庆后，被黄洛峰派赴成都，任联营书店成都分店经理。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联营书店总管理处经理。不久回上海，受徐伯昕之托，出面创立二线的致用书店。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俞鸿模（1908—1968）福建福清人。	1935 年与张香山等在日本创办《东流》文艺期刊。1938 年创办海燕书店，后迁桂林，去香港。1939 年受徐雪寒、华应申的委托，筹建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翻印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向香港和海外发行。同年 12 月到上海，任新知书店分店经理。在王任叔鼓励下，1940 年，海燕书店复业，出版文艺译著。海燕出版发行工作由新知的职工兼做。抗战胜利后，海燕书店复业，所出文艺书籍，版式讲究，装帧美观，很受读者欢迎。1946 年，与群益、云海三家小出版社合办群海联合发行所，分别出版，联合发行。1949 年回上海，出资恢复海燕书店。
黄洛峰（1909—1980）云南鹤庆人。	1936 年，任读书出版社总经理。有关读书出版社的情况，请参见本书有关章节。1948 年，三联书店成立后，黄洛峰任管理委员会主任。1949 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	1934 年 11 月，《读书生活》杂志创办，李公朴主编，他和柳湜编辑。他写的《哲学讲话》在刊物上发表，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单行本发行，风行一时。193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郑易里翻译《新哲学大纲》。和郑易里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邀请黄洛峰任总经理。他提议创办大型理论刊物《认识》月刊，任主编，出两期后，奉调去延安。1940 年 2 月，创办《中国文化》，任主编。1943 年初，调延安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1945 年 8 月，任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
华应申（1911—1981）江苏无锡人。	1934 年考入生活书店，同年 12 月离开。1935 年秋在上海参与创立新知书店，任副经理。抗日战争期间赴汉口、桂林主持新知书店总店的工作。1941 年 3 月奉命秘密回上海，创办泰风公司。又以远东书店名义，出版《苏联文艺丛书》，其中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进啊！时间》等书。1942 年春进入苏北根据地，任《盐阜报》采访部主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科科长、《苏北报》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华中新华书店总经理、山东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华东新华书店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	1934年与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参加《中国经济情报周刊》的编辑工作。1935年参加创办新知书店；任《申报》周刊编辑。1937年，在武汉筹建《新华日报》，在该报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采访部主任、编委和社委。在重庆期间，1944—1945年兼任新知书店设计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副总编辑。1949年随军南下，到南京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馆，创办《新华日报》。先后担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54年2月，去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表五 其他中小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	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他在亚东图书馆的情况，请参见本书有关章节。
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	13岁进叔父汪孟邹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17岁到上海在汪孟邹办的亚东图书馆工作，业余时间进夜校读英语，后任编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1927年春在汉口主办《民国日报》，先后任编辑、营业部主任；不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同年9月回上海仍任亚东图书馆编辑。在胡适、陈独秀支持下，他用新式标点整理《水浒》等十几种古典小说。胡适、陈独秀为之写序或考证，取得很大的成功。他还编写了《〈诗经〉今译》，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伊所伯（即伊索）寓言》等20多种文学作品。生前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回忆录，学林出版社节录其中20万字以《回忆亚东图书馆》的书名予以出版。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李小峰（1897—1971）字荣弟，笔名林兰，江苏江阴人。	关于李小峰的情况，本书《新潮社与北新书局》一节有较详细之叙述，可参见。
赵景深（1902—1985）四川宜宾人。	1922年，毕业后任《新民意报》文学副刊编辑。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5年至上海，主编《文学周报》。1927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1930年在北新书局任编辑，1942年离去。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	从学校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美术编辑，编辑《儿童教育画》，并为《儿童世界》首创美术图案字，为商务印书馆图书设计商标等。因不能发挥其所长，三年后离开商务印书馆。自行创办《少年良友》（四开单张的小报），因未能打开销路而失败。1925年，他和同学余汉生在上海先办良友印刷所，再办出版事业。关于伍联德的情况，本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杂志公司》一节有叙述，可参见。
赵家璧（1908—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早在中学时代，即主编《晨曦》月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1932年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1937年，他在上海《大美晚报》社担任《大美画报》的主编，并复刊《良友画报》。1947年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版包括《四世同堂》、《围城》等名著在内的《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卢芳（1901—1991）浙江宁波人。	1925年9月，与沈松泉、张静庐合办光华书局，出版创造社同人的著作。沈管出版，张任经理，卢管发行。1927年7月，在南京创立中央书局，任经理，由其父兄主持，他在上海组织货源、发货；遂离开光华书店（1933年中央书局曾与生活书店定约，作为生活书店南京特约书店）。1928年1月，应洪雪帆之邀，进现代书局，任出版部主任，负责收稿、排印和发行工作。1930年，由阿英介绍参加"左联"，离开现代书局。1933年，重新进现代书局，任印刷部主任，兼新光印刷所经理。1936年5月，入上海杂志公司，任监理。抗战爆发，去南京将中央书局的部分存书抢运到华中、华南销售。1938年，在汉口创立大众出版社，出版一些抗日小册子。经长沙、广州、香港，逃回上海。1940—1942年创立国民书店，出版《李香君》、《郑成功》、《葛嫩娘》、《洪宣娇》等书。1945年12月沈松泉、姚蓬子出资在上海创立联合书报社开业，请他当经理。
沈松泉（1904—1990）江苏吴县人。	17岁由同学介绍，进上海泰东图书局任助理编辑，结识郭沫若、郁达夫、张静庐等人。1925年，与张静庐、卢芳创办光华书局，出版创造社成员及左联作家的文艺作品，先后出版20种文艺期刊。1928年，曾与张静庐联络亚东、开明、北新、现代、群众等书局发起组织上海新书业同业公会，未获批准。1945年10月，在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社任秘书，几个月后离职。
李白英（1903—1981）又名李澄，江苏无锡人。	1927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革命军日报》任发行处主任。1928年在浙江和方士人合办过《大水》杂志，后到上海参加创办《山雨》半月刊。1930年入光华书局任编辑。1933年自办童年书店，出版《新儿童报》，任主编。1938年赴香港开书店。1939年赴四川任国立编译馆编译。1944年在沪自办街灯出版社。曾任湖州日报社社长，无锡《大锡报》编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张光宇（1900—1964）江苏无锡人。	19 岁进上海生生美术公司，任《世界画报》助理编辑。21 岁至 25 岁，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绘图员。26 岁与其弟张正宇等在沪创办《三日画刊》，并在该刊发表漫画。1927—1933 年任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绘图员。还参与组织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创办《上海漫画》周刊、《装饰》杂志。1924 年与邵洵美在沪合作成立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公司，由邵洵美任董事长，他任经理。1935 年在沪创办《独立漫画》，任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许多爱国漫画家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漫画宣传活动。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	1928 年在上海创办金屋书店，创办并主编《金屋月刊》。1930 年停办。又投资上海新月书店，1931 年 4 月任新月书店经理。徐志摩去世后，新月书店歇业，盘让给商务印书馆。1932 年，他投资创办《大英夜报》，宣传抗日。在张光宇的劝说下，1934 年创办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公司，花大力气办印刷厂、买厂房，采购新式彩色影写版印刷设备和高速印刷机。除出版张光宇主编的《时代画报》外，还创刊《时代漫画》、《时代电影》、《论语》半月刊，还创办《十日谈》、《人言》周刊，并任主编。创办第一出版社。该公司以印刷快速、精美著称。抗战前后，所出期刊大多停刊。他又创办《自由谭》，《公正评论》英文刊物，曾译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张一渠（1895—1958）浙江余姚人。	1928 年到上海，在上海总商会主编《商情月报》。1929 年，受泰东图书局赵南公之聘，任经理，自此在上海出版界工作二十年。1930 年初，集资创办儿童书局。次年，辞去泰东图书局经理职务，专营儿童书局，任经理，一再招股增资，潘公展出任董事长。出版陈鹤琴、陶行知、董纯才、俞子夷等教育家的论著以及儿童、教育图书 1 000 种，还出版《儿童杂志》等 6 种期刊。抗战爆发，书局陷入困境。1944 年，再次招股增资，黄仲明任董事长，张一渠任总经理，聘庞来青为经理。抗战胜利后，重振儿童书局，潘公展复任董事长。应正中书局经理蒋志澄之聘，兼任该局协理，同时应申报社之聘，主编该报教育栏。
黄一德（1900—1968）浙江余姚人。	1931—1934 年任儿童书局编辑，1935 年任上海《儿童日报》主编。上海沦为“孤岛”，该报以美商名义出版，继续任主编。抗战期间曾为新四军浙东三五支队采购、运送印刷器械。1946 年任《儿童良友画报》主编。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黄嘉德（1908—1992）福建晋江人。	1936—1949 年，与弟弟黄嘉音在上海创办西风社，任主编兼发行人，聘林语堂为顾问，出版《西风月刊》、《西风副刊》（月刊）、《西书精华》（季刊）等，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平论》半月刊发行人、《侨声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兼副刊《南风》主编等。
黄嘉音（1913—1961）福建晋江人。	1936 年与林语堂及哥哥黄嘉德成立西风社，担任主编兼发行人。出版《西风月刊》、《西风副刊》（月刊）、《西书精华》（季刊）等，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化。1946 年又创办家出版社，任《家》月刊主编兼发行人，同时兼任《大美晚报》副刊编辑、《申报·自由谈》编辑。
余上沅（1897—1970）湖北沙市人。	1927 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对书店经营颇有建树。
徐志摩（1897—1931）号幼申，笔名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	1922 年 10 月从英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文学研究会，主编《京报》副刊。在北京与胡适等成立新月社。1925 年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编。1926 年，与闻一多、朱湘创办《晨报》副刊《诗镌》周刊，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1926 年 9 月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胡适为董事长，先后聘余上沅、张禹九、邵洵美为经理，余上沅任编辑部主任。1928 年 3 月，与胡适、梁实秋等创办《新月》月刊。1929 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1931 年初，与陈梦家等创办并主编《诗刊》。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	1910 年，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中西医学报》，是晚清介绍西医最突出的代表。先后自撰医书 83 种，翻译日文医书 68 种，于 1912 年汇成《丁氏医学丛书》，并由他创办的医学书局出版发行。医学书局共出版书籍三百余种。 丁福保原有国学基础，热心收集整理古籍。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编印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续编、《清诗话》等书。编辑时，“误者正之，伪者删之，阙者补之”。另有《文选类话》，历时 20 年始成。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1916年起，信奉佛教，宣扬佛学，编写了《佛学指南》、《佛学初阶》等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等10余种佛教典籍，并参考日本出版的几种佛教辞典，编成《佛学大辞典》，于1921年出版。早年在日本购得国内已经散佚的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100卷）和辽释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两书，据此编为《一切经音义汇编》，石刻重印后广为流传。又选辑道教经籍100种，编成《道藏精华录》，于1922年出版。后又撰写《老子道德经笺注》，于1927年印行。 丁福保还钻研《说文解字》，历时30年，汇集182种、1036卷注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以许慎的原书次序为纲，编辑成《说文解字诂林》，具有查阅一字而各家论说齐备的功用，于1928年出版。后继续汇集有关《说文解字》的其他46种论述，于1931年编印《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并编写了《六书正义》、《说文钥》等数种文字学著作。丁福保还喜爱收藏和研究古钱币，于1938年编印《古钱大辞典》，同时出版《古泉学纲要》等著作。他整理古籍20余年，印行多种大型图书，其名声在学术文化界比医药界更为人所知晓。
刘世珩（1875—1926）安徽贵池人。字聚卿，又字葱石，号继庵，别号楚园。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官江苏特用道，江宁商会总理、度支部右参议、湖北造币厂总办、天津造币厂监督。	辛亥革命后，刘世珩迁居上海，筑楚园，藏书十余万卷，收购金石、古器物，其中以南唐乐器大、小忽雷最为著名，全力校刊古籍。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七石经》、《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贵池刘氏所刻书》、《赐书台汇刻曲谱》、《暖红室汇刻传奇》、《贵池先哲遗书》等10种丛书，子目超过250种，加上丛书中的小丛书、单行本，总卷数超过2 000卷。其中以《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三种，聘请陶子麟等高手刻板，字大悦目，纸白如玉，精美绝伦。时人冯煦认为所刻丛书搜罗全备，校雠精审，刻印精美，超过毛晋、黄丕烈，为近代大出版家。他刻《临川四梦》，用十多个本子参校。著作有《吴应箕年谱》、《刘伯宗先生（城）年谱》、《贵池县沿革表》、《银价驳议》、《圜法刍议》、《聚学轩词集》、《南朝寺考》等。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魏炳荣（1879—1960）浙江余姚人	年轻时在上海鸿宝斋书局做学徒。未满师就派赴科举考场销售书籍，走遍江、浙、赣、皖、湘、鄂等地。后任该店汉口分店经理。1904年，协助其兄魏天生与人合开的广益书室整顿店务，不到两年，扭亏为盈。1906年将其正式改组为广益书局。他入股，被推为经理，聘周菊亭为副经理，胡寄尘、陆保璿为编辑主任。出版古籍、法学、尺牍、字典、通俗小说等。1910年、1912年，先后创办文华书局、世新印刷所及大生书局三爿石印印刷厂，三个厂石印机总台数超过上海的大型印刷厂。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世新印刷所的厂房、设备、存纸、仓库全部焚毁。战后重建中新印刷厂。1937年再次被焚毁。抗战胜利后重建了一部分。又在新昌路设立大上海铅印印刷厂，还保留了少量石印设备。热心帮助屠思聪创办世界舆地社，任社长。他是上海书业公所常务董事，还担任中一信托公司、景福衬袜厂、振源地产公司、伊文思书局董事长、董事、监察等职。1944年，广益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聘刘季康为总经理、曹冰严为常务董事，自任董事长。
张资平（1893—1959）原名张星仪，又名张声，广东梅县人。	他在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冲积期化石》，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1927年任新宇宙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不久自办乐群书店，主编《乐群月刊》，1932年创刊《絜茜》月刊。
屠思聪（1894—1969）又名哲生，浙江上虞人。	1920年到上海自建“世界舆地学社”，专事地图编绘出版工作，是当时上海民间编绘出版、公开发行中小比例尺地图的专业机构的第一家。开始时仅他一人工作。后来陆续聘请编辑、业务人员共达20多人，地图品种也逐步增加。20世纪30年代末，他又创立“学友图书社”，编绘出版各类学校适用的科学教育挂图和字典、书籍等。他先后主编出版的地图有《中华最新形势图（表解说明）》、《简要中华地理图说》、《简要世界地理图说》、《世界现势大挂图》、《现代本国地图》、《新世界地图》等中外地图。

续表

姓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樊仲云（1899—?）浙江绍兴人。	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生命书局总编辑及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1929年曾参加上海著作人公会。1935年具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编过《社会与教育》周刊、《文化建设》月刊（国民党CC派控制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1937年初与潘公展、顾凤城、朱应鹏等赞助《寒友》季刊创刊。抗战后参加中国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后去香港，任国民党《国民日报》主笔。不久叛国投敌，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	1927年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1928年到上海，和蒋光慈等发起成立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立春野书店，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太阳月刊》停刊后，创办《时代文艺》，和郁达夫编辑《白华》。1929年，又和蒋光慈创办《海风周报》。编辑出版《现代文学读本》、《文学原理简论》、《文学家名人辞典》等书。编辑《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晚清戏曲小说目》、《弹词小说评考》、《中国连环画史话》、《晚明文学笔谈》、《小说闲谈》、《晚清小说史》，还编辑《鸦片战争文学集》等几百万字的文学史料集。抗战前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工作。“孤岛”时期，在上海创办风雨书屋，创刊《文献》杂志。创作《碧血花》、《海国英雄》等10多个历史剧。1941年，全家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主编《新知识》等杂志。
高尔松（1900—1986）号继郇，笔名高希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1925年任《民族日报》编辑。同年被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监察委员。1927年任《中南晚报》主笔。1929年8月和高尔柏创立平凡书局，出版《马克思学说体系》、《社会科学大系丛书》、华汉（阳翰笙）的《新兴文学大纲》、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等。1930年8月6日被查抄，改名开华书局，出版《曼殊全集》、《南社诗集》、《南社词集》、《南社纪略》、《日本字典》等。1931年，又以中学生书局名义出书。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刘呐鸥（1900—1939）原名刘灿波，笔名伐扬等，台湾台南人。	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后赴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之命筹办《文汇报》，任社长，报未出而于是年秋被暗杀。
王礼锡（1901—1939）字庶三，笔名王抟今，江西安福人。	1928年初到上海，任《中央日报》副刊《摩登》的编辑。1930年陈铭枢出巨资接办神州国光社。1931年他受聘为该社总编辑。主编《读书杂志》，发起“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出版不少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与丁玲、冯雪峰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宣言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1933年初，上海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被捣毁，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被迫流亡欧洲。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国际反侵略援华运动，担任全英援华会副主席和重庆《新华日报》驻英特约通讯员。
谭正璧（1901—1991）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1934年任北新书局编辑，编辑活页文选。其间，个人编辑书籍颇多，如《古今尺牍选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国学概论新编》、《文人传记选》等。抗战期间，任新中国艺术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在中国书报编译所任职，主编《书报》杂志及《新中国文库》。又为大东书局、中华书局等编语文教材和古文读本。
蒋光慈（1901—1931）笔名蒋光赤，安徽霍邱人。	1928年，在上海与阿英、孟超等发起成立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立春野书店，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太阳月刊》停刊后，又主编《时代文艺》，出一期停刊。又与阿英编辑《海风周报》，同时主编《新流月报》（后改名《拓荒者》）。还主编《太阳小丛书》4种，《拓荒丛书》3种，《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3种。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永祥，江苏武进人。	1934 年 11 月，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任主编，艾思奇、柳湜任副主编。他提倡在做人、做事、求进步上结合实际，读活书，做到学以致用。他主张图书馆办成学校化，杂志办成讲义化。1942 年底，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他在昆明创立北门书屋，经销进步书刊。一年后发展为北门出版社，聘张光年为主编。1946 年 1 月，主编《民主教育》。
周全平（1902—1983）江苏宜兴人。	1924 年 8 月 20 日，创办《洪水》周刊，只出一期。1925 年复刊，改半月刊，任主编。在读者中募股，创立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创造社被查封后，和谢旦如等创立西门书店。1930 年参加“左联”，被选为候补常委。
谢澹如（1904—1962）上海人。	1929—1930 年，与周全平、徐耘阡等在上海南市老西门中华路 1420 号合办西门书店，编辑《出版月刊》，兼办新书推荐社、书报邮售社，销售社会科学和新文艺书刊。1930 年夏，西门书店改由谢澹如个人续办，改名公道书店，初迁西门书店旧址附近，后迁虹口老靶子路北四川路，经营西文旧书，成为“左联”联络点之一。1938 年起，谢澹如创办金星书店，以霞社名义编印瞿秋白遗稿《乱弹及其他》和《街头集》、《清贫》，重印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译稿《新哲学——唯物论》等十多种书。并资助出版发行进步文艺刊物《鲁迅风》。1942 年，日本侵略军全部侵占上海租界，谢澹如又受郑超麟委托，将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托郑保存的《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论文集》代为保管，直到 1945 年秋日本投降不久谢交还与郑，由郑再归还亚东图书馆保存。
储祎（1904—1988）江苏宜兴人。	无锡第三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后到上海进北新书局任编辑。发愤编辑学生小字典。1930 年，与友人合办东方书店，任经理，创办《时事课本》周刊，不少中小学校用作政治时事教材，最高印数达 10 万份。出版之前在刊物上介绍《学生小辞汇》，征求预订，收到预订款 2 万多元，为书店打下基础，陆续出版中小学辞典、儿童读物、实用书等。抗战胜利后，热心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结识倪海曙等人，主动承担出版《新文字月刊》。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吴朗西（1904—1992）四川开县人。	1934 年，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创办的大型《美术生活》月刊担任文学编辑。9 月该公司又创办《漫画·生活》月刊，由他和黄士英等编辑，负责文学部分和外国漫画介绍。该刊有一半篇幅刊登杂文和小品文，因此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黎烈文、丽尼等作家有交往。1935 年 5 月，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社长，聘请巴金任总编辑，推出《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学小丛书》等，其中不少是中外名著，由名家翻译，装帧讲究，封面庄重大方，得到社会好评。他和早期创办人在十几年内均不取报酬。抗战爆发后，除上海外，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设办事处。曾去福建永安帮助黎烈文创办改进出版社，后去重庆。
叶灵凤（1905—1975）江苏南京人。	1926 年 10 月，与潘汉年在上海创办《幻洲》半月刊，并出版《幻洲丛书》。《幻洲》停刊后，为光华书局编辑《戈壁》半月刊，同时是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之一。从事小说创作；推崇英国比亚兹莱的装饰画，为《洪水》、创造社的期刊设计封面和报头装饰画。1929 年在现代书局任编辑部主任，主编《现代小说》，1931 年与潘汉年编辑《现代文艺》。与周全平创立新兴书店，与潘汉年、周全平合办小开本的《小物件》期刊。1934 年为上海杂志公司编辑《文艺画报》。1935 年在时代图书公司任编辑，参加编辑《时代画报》。1937 年 4 月，中国文协上海分会创办《中国文艺》，任编辑。1938 年到香港定居，参加《立报》副刊《言林》、《国民日报》副刊的编辑工作。《救亡日报》迁广州出版，他参加新闻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长期主编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
何公超（1905—1986）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1922 年，进商务印书馆，在总务处文书股任书记。1924 年，在《民国日报》主编“平民之友”周刊；同年，与张太雷等加入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负责编辑《杭育》副刊。后又与瞿秋白一起编《热血日报》。1930—1931 年，在上海春潮书局任营业部主任，1933—1934 年在上海学友图书美术社任编辑主任，1935—1937 年在上海《儿童日报》任总编辑，1938 年在汉口新亚书店任编辑，1942—1943 年在重庆大江印务局任营业部主任，1943—1944 年在重庆晨光书局任编辑，1944—1949 年在重庆上海儿童世界社任主编。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姚蓬子（1905—1969）浙江诸暨人。	1932年任“左联”的《文学月报》主编，后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4年5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编辑工作。1940年9月，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2年在重庆创立作家书屋，出版郭沫若、茅盾、老舍、冯雪峰、胡风等人的著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作家书屋迁上海，出版《北方文丛》等。
刘哲民（1908—1992）江苏丹阳人。	1936年9月，参与《华美晚报》的经营管理，后兼任《华美周报》经理。抗战期间，资助《大美晚报》，宣传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与柯灵、唐弢、郑振铎、李健吾、周煦良、施蛰存等人先后创办了《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三个期刊。其中《周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性刊物。创建上海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常委董事、董事长、编委主任等职。在他任职期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些重要书稿，如郑振铎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鲁迅日记》手稿，以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梦溪笔谈校证》等。
陶亢德（1908—1983）浙江绍兴人。	先后任《生活》周刊、《论语》编辑。1934年4月，与林语堂、徐讦合编《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9月，与林语堂创办并编辑《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立人间书屋。抗战爆发后，1938年去香港，与简又文等编辑《大风》周刊。日军侵占香港后，去日本。1942年，为上海古今社编辑《东西》月刊。1943年，任上海太平书局总经理。

表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永州人。	1920年夏从日本回国，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一人承担写稿、审稿、校对和发行的工作。1921年，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宣传主任，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政治理论读物。1923年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1928年与熊得山等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1932年又独自创办笔耕堂书店。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等，浙江义乌人。	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中国最早的全译本。1920年5月，到上海任《新青年》编辑。1928年下半年，和汪馥泉等创立大江书铺，五年间出版进步书刊多种。1934年9月，创办《太白》杂志，任主编。七七事变后，辞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到上海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
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湖南湘潭人。	1925年底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创立并主管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印行公开出版物和党的秘密文件。1926年，到韶山物色中共党员来上海印刷厂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在汉口创立长江书店，将上海书店的书刊秘密运往汉口，改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27年底，奉命到上海，主持党的秘密印刷厂工作。1929年初，迁往天津，创立华新印刷厂，改名周韵华，任经理。承印发票、表格等，同时秘密印刷《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书刊，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	1919年，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停刊后又创办《人道》。1920年9月，被《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赴苏俄采访。1923年筹备并主编《新青年》季刊，同时主编《前锋》。1925年6月，创办《热血日报》。1934年1月赴瑞金，任中央苏区教育部部长，同时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
叶以群（1911—1966）安徽歙县人。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左联”，任“左联”组织部部长，编辑《北斗》。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文艺》编委。1941年去香港创办中国文艺通讯社。后去重庆与茅盾合编《文艺阵地》丛刊，并主编《青年文艺》、《文哨》月刊。1945年到上海，创立新群出版社。参与编辑《文联》半月刊。创办中外文艺联络社。1946年出面联合六家出版社成立利群书报发行所。1947年去香港主持文通社。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祝志澄（1906—1968）上海人。	1932年3月，赴瑞金在中央印刷厂任工务科科长、副厂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1936年12月筹建中央印刷厂，任厂长。多次冒险去敌伪和国民党统治的上海、西安、重庆等城市招聘工人，购置印刷器材。1939年，兼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印刷处处长。1941年任解放日报社经理。1942年回中央印刷厂任厂长。1946年1月被派去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任经理。1947年后撤回延安，担任新华通讯社副秘书长。1949年2月，调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官僚资本书店、印刷厂的接管工作。
戴伯韬（1907—1987）江苏丹阳人。	1931年到上海，编辑《儿童》、《师范》杂志，参与陶行知创办的自然科学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董纯才合编小学自然科学课本、农民常识课本。1932年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6年参加救国会，和陶行知等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主编《生活教育》。抗战后，在武汉、重庆主编《战时教育》期刊。在重庆为生活书店编辑妇女教材、儿童教材、民众识字教材、保育院教材等。1941年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解放区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主持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表七　知名报刊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1903年8月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颖、泼辣、生动，开风气之先。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科学和民主，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倡导文学革命，掀起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培育了一代青年。1918年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有《独秀文存》、《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等。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1908年在上海公学读书时，就主编过《竞业旬报》。在美国留学期间，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还被选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1918年1月，《新青年》在北京成立了新的编委会，胡适为七个编委会成员之一，轮流编辑《新青年》。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办，胡适被聘为该杂志的顾问。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接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担任“世界丛书委员”。1921年7月，胡适到商务考察了一个多月，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任编译所所长。1922年5月创办《努力周报》，一年半以后停刊，又改办《努力月刊》，不久夭折。1922年秋季，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胡适被推为编辑委员会主任。1924年，胡适创办《现代评论》。1927年新月书店开办，胡适被推为董事长。1932年，胡适和丁文江等人发起创办《独立评论》，前后共出版244期。
俞颂华（1893—1947）幼名庆尧，后改名垚，号颂华，笔名澹庐，祖籍江苏太仓。	1919年4月，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9月，任《解放与改造》半月刊主编。1928—1932年，任《东方杂志》编辑，兼任多所大学教授。三年半时间内，改革内容，宣传团结抗日，成为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932—1937年，任大型《申报月刊》、《申报周刊》的主编，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其间曾兼任《申报》总编辑三个月。1940年夏，去香港任《星报》（晚报）总主笔，旋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主笔。1941年8月，回香港，应梁漱溟之邀，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兼编《国讯》香港版。1942年，香港沦陷后，转至桂林，任《广西日报》总主笔。1943年6月，在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1944年9月，在重庆任《国讯》半月刊主编。1945年，在四川璧山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兼任《国讯》主编。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玉堂，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	1932年起在上海创办并主编《论语》小品文半月刊，一年后改由别人主编。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又创办《宇宙风》，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同时，在英文《天下》月刊任编辑，英译《浮生六记》在该刊发表。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陆丹林（1896—1972）字自在，号非素，广东三水人。	主编有《人之初》、《国画月刊》、《蜜蜂画刊》、《道路月刊》、《逸经》等期刊。尤其是《道路月刊》，出版16年，每期封面刊登书家及名人墨迹，计有200人左右。还编有《中国美术年鉴》。抗战爆发后，赴香港，编辑《大风》期刊。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笔名息庐、容庐，山东诸城人。	1919年与郑振铎等在北京创办《曙光》半月刊。1921年初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晨光》杂志，并任编辑部主任。1923年6月—1925年9月在北京主编《文学旬刊》。1929年在青岛创办《青湘月刊》。1936年在上海主编《文学》月刊。抗战爆发后，为《大英夜报》编辑副刊《七月》。1941年任开明书店编辑。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人。	1932年为申报馆主持《妇女园地》，不同凡响。1935年，创刊《妇女生活》。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使她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女主编，少有的女秀才。培养了子冈、罗琼等一批优秀的名记者和编辑。1941年去新加坡，主编妇女副刊。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人共同创办新南洋出版社。胡愈之主编《南侨日报》与《风下》周刊时，她主编《新妇女》。
胡仲持（1900—1968）字学志，笔名宜闲，浙江上虞人。	1923年考进上海《新闻报》当练习生、记者。一年后，入商报馆编辑电讯，撰写评论。1928年，应史量才之邀，进申报馆工作，开始担任夜班电讯编辑；以后任申报馆国际版主笔，并撰写社论。1937年12月5日《申报》停刊。次年10月复刊，任总务委员，负责社论、副刊。同年12月9日参加中共创办的《每日译报》。1938年1月21日，以英商名义的《译报》复刊，胡仲持负责国际版。1937年12月11日创办《集纳》杂志，任主编。1938年10月还参加创办《译报周刊》。1938年，与胡愈之等创立“复社”，翻译出版斯诺夫妇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接着，又参与《鲁迅全集》20册的出版工作。1938年下半年，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出狱后与冯宾符等集资，出250块银元，创办珠林书店。1940年夏，去香港主编《华商报》。日军侵占香港后，去昭平主编《广西日报》昭平版。1947年，新加坡《南侨日报》创刊，任该报驻港特派记者。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浙江浦江（今兰溪）人。	1931年创办《涛声》周刊。1935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半月刊。担任《太白》半月刊编委、《申报·自由谈》撰稿人。和陈望道等人提倡大众语运动。抗战爆发后，以中央通讯社特派记者身份到战地采访。1941年，在赣南，主持《正气日报》，任主笔、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前线日报》主笔。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轩，号端先。浙江杭州人。	1927年，主编《艺术》。筹建“左联”，当选执行委员。组织左翼剧联，大道剧社。参加《文艺新闻》编辑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国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任总编辑，后迁广州、桂林。1940年去香港，与范长江创办《华商报》。1945年9月回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并改名《建国日报》，不久被封。1946年8月，被派去香港、新加坡，任《南侨日报》主笔。
王任叔（1901—1972）号愚庵，笔名巴人等，浙江奉化人。	1937年，创刊《人间十日》旬刊，任主编。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秘书长。1938年，参加上海《译报》工作，主编《爝火》、《大家谈》副刊；为《译报》图书部主编《公论丛书》，每月一辑，共出10辑；全力投入《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10月受复刊的申报馆之聘，任《自由谈》主编，旋辞职。1939年，与许广平等集资创刊《鲁迅风》。与郑振铎、孔另境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1941年主编《前进周报》和印尼文《民主日报》。1947年回香港，与茅盾、周而复创办《小说》月刊。
梁实秋（1902—1987）祖籍浙江余杭人。	1927年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年6月，与徐志摩等合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刊《新月》月刊，参加编辑工作。1930年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在重庆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同时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	1928年12月间，协助鲁迅创办朝花社，编辑出版《艺苑朝华》、《朝华周刊》等书刊。1929年1月，接编《语丝》。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参加《萌芽》的编辑工作。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	1935年，编辑《木屑文丛》。1936年，编辑《海燕》。帮助翻译日文《大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创刊《七月》（小周刊），后迁武汉。1938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任研究股主任，先后编辑出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七月新丛》。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创刊《希望》杂志。
鲁少飞（1903—1995）上海人。	1934年起担任上海《时代漫画》月刊主编，成为有影响的漫画刊物。同时为萨空了在上海主办的《立报》创作政治漫画。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负责人及《救亡漫画》三日刊主编。1938年去广州担任《国家总动员画报》主编。后赴新疆从事抗日漫画宣传活动。
聂绀弩（1904—1986）湖北京山人。	1923年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任编辑。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兼任南京《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1934年3月，应上海《中华日报》之聘，主编《动向》副刊，刊出240多期。1936年1月，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海燕》月刊。抗战爆发，在皖南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抗敌》杂志文艺栏。1939年，到金华，任《文化战士》主编，同时为《浙江妇女》、《改进》、《现代文艺》等刊物撰稿。1940年4月，到桂林，应聘任《力报》副刊《新垦地》编辑，同时与人合办《野草》刊物。1945年1月，与朱希合办《艺文志》，两期后去《真报》编辑《桥》。抗战胜利后，到《客观》主编副页；又在重庆《商务日报》编辑《茶座》；再到重庆《新民报》主编《呼吸》副刊。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	1922年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2年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辑。同年12月，任申报馆《自由谈》副刊主编，约请鲁迅、茅盾、陈望道等进步作家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使《自由谈》焕然一新，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报纸副刊，1934年5月被迫离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创办《译文》月刊，1936年主编《中流》半月刊。1938年，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聘，在福建永安创办改进出版社，任社长兼发行人，邀请杜俊东、陈范予、陈占元、许天虹等加盟该社。1939年3月起，除主编《改进》综合半月刊外，还出版《现代文艺》等6种期刊，组织大后方作家出版《改进丛书》等。1946年初，任台北新生报社副社长。

续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孔另境（1904—1972）浙江桐乡人。	1938年协助姐夫沈雁冰编辑《中国的一日》。同年，茅盾在香港为生活书店主编的《文艺阵地》改在上海排版，请他在上海校印。1939年，参加创办《鲁迅风》，任经理。与王任叔、郑振铎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共11册。1943年后为世界书局主编《剧本丛刊》5辑，共50册。
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	1928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参加太阳社活动。任《现实周报》、《自修大学》期刊主编。1935年创造性地编辑《生活书店·全国总书目》，影响很大。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文汇报》任《青年周刊》主编。
叶浅予（1907—1995）浙江桐庐人。	1928年，与张光宇等创办中国美术刊行社，创刊《上海漫画》周报，任编辑。开始创作长篇连环漫画《王先生》在《上海漫画》、《晨报》上发表，长达七年之久，影响很大，成为有名的漫画家。三年后，张光宇、邵洵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叶浅予为《时代画报》主编，同时为《图画晨报》创作《王先生别传》。1936年，去南京，为《朝报》创作另一连环漫画《小陈留京外史》。1939年，筹办《今日中国》。
关露（1907—1982）笔名芳君、梦茵等，河北宣化人。	1933年5月继丁玲之后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参与中国诗歌会工作，编辑《新诗歌》。1936年编辑《生活知识》，并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王亚平编辑诗歌刊物《高射炮》。抗战之前，关露在上海参加编辑多种文艺刊物，编发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新诗，培养和扩大了新诗的作者队伍，提倡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新诗歌。但关露编辑这些刊物的时间都不长。她的主要编辑活动为1942—1945年间利用自己与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的关系，负责编辑《女声》月刊，佐藤逝世后由关露主持。该刊历时三年多，编印38期。《女声》是上海沦陷期间一份有影响的妇女刊物。
杭苇（1908—1988）江苏无锡人。	1932年10月与李伯敏创办儿童刊物《小宝宝》、1933年与潘一尘等创办《儿童新闻》。1934年去南宁，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创办《广西儿童》（周刊），并发起成立广西新文字研究会。1936年在沪创办《少年知识》（半月刊），该刊被查封后，又办《中国少年》，至“八一三”事变后停刊。抗战期间，主编《云和快报》、《云和教育》、《浙江妇女》、《南东儿童》等刊物。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	1933 年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5 年 11 月，为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编辑《文学时代》月刊。1938 年在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1940 年曾任桂林《力报》主笔和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与张稚琴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1946 年，到上海创办《观察》半月刊，使之成为政论性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自任社长和主编，在知识界影响很大。1948 年又编了一套《观察丛书》，共出 16 种。
章靳以（1909—1959）天津市人。	1933 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共同主编《文学季刊》，1934 年又编《水星》月刊。1936 年到上海，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与巴金共同主编《文季月刊》。同时主编《现代散文新集》一套新型袖珍本。1937 年初离开良友，又与巴金创办《文丛》月刊，日军进占广州时停刊。“八一三”事变后，他又与巴金编辑《呐喊》。1938 年 10 月，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进入教育界后二十余年间，陆续编辑十种以上大型期刊和文艺副刊。1939 年，为《国民公报》编辑《文群》文艺副刊。1941 年底，在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主编《现代文艺》。1943 年，在南平创刊《文艺丛刊》。1946—1948 年编辑大公报馆的《星期文艺》。1947—1948 年与叶圣陶、楼适夷、梅林合编《中国作家》季刊。1948—1949 年还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特约编辑。
姜椿芳（1912—1987）江苏常州人。	1932 年先后主编《满洲青年》、《满洲红旗》。1936 年因参与创办《大北画刊》被捕。1941 年在上海沦陷的困难条件下，与塔斯社合作创办中文《时代》周刊，任主编。创办《苏联文艺》，建立时代书报出版社。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办《时代日报》，任总编辑。

表八 通俗文学报刊编辑出版人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 14 年，1935 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 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1936 年，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陈蝶仙（1879—1940）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1895年任杭州《大观报》编辑。1901年在杭州开设销售书籍文具纸张的萃利公司，翌年开设石印局。1906年底创立著作林社。1908年迁上海，年底并入《国闻日报》，创刊并主编《著作林》文艺杂志。1913年在上海主编《游戏杂志》，翌年主编《女子世界》。1916年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入南社。1930年创办并主编《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会刊》，提倡国货。著有《泪珠缘》、《井底鸳鸯》等言情小说百多种，诗词编有《栩园丛稿》。
孙雪泥（1888—1965）原名鸿，字述生，又字翠章，号枕流居士。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1917年创办上海生生美术公司，早期聘徐卓呆为编辑主任，后自任编辑主任。1928年，采用新制版工艺印刷《良友画报》，十分精美，很有声誉。1931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又创办图画书局，出版儿童读物。抗战前，在漕溪北路置地自建新厂房，引进半自动胶印机，1948年又引进哈立斯自动胶印机。曾主编《世界画报》、《笑画》、《滑稽》、《俱乐部杂志》等画刊。
严独鹤（1889—1968）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浙江桐乡人。	自1914年起进上海新闻报馆，任编辑、副总编辑。曾主编文艺副刊《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一度兼任世界书局杂志部总编辑。30年代主持《红》、《红玫瑰》，并参加《上海生活》、《侦察世界》、《月亮》等刊物的编辑工作。
徐枕亚（1889—1937）名觉，笔名志枕、眉子等，江苏常熟人。	早年在虞南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在乡间小学执教。不久，到上海，入民权报馆，任编辑，所著《玉梨魂》在附刊连载，风行一时。参加南社。民权报被查封后，入中华书局编辑《高等学生尺牍》。被上海《小说丛报》聘为主编。出资创立清华书局，创刊《小说季报》，后营业不振，出盘给大众书局，著有《玉梨魂》等二十多种小说。
周瘦鹃（1895—1968）笔名周国贤，江苏苏州人。	1912年上海老西门民立中学毕业后留校教课，开始著译小说，结识编辑包天笑，得以成名。1915年加入南社，此后进中华书局，译《欧美短篇小说丛刊》，是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译者，曾得到鲁迅赞赏。1920年，进申报馆编辑《自由谈》、《春秋》副刊，又为中华图书馆编辑《礼拜六》杂志，为大东书局编辑《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等杂志。

续 表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平襟亚（1895—1980）名衡，笔名秋翁、襟霞阁主、网蛀生，江苏常熟人。	中央书店创办者，出版《人海潮》、《人海新潮》、《名家书简》、《书法大成》等，向世界书局沈知方借来《江湖奇侠传》的纸型重印，列入一折八扣书，很畅销。又印《袁中郎集》作为《国学珍本文库》装箱发行，薄利多销，颇受欢迎。敌伪时期，创办《万象》杂志，先后请陈蝶衣、高秀琳（柯灵）主编，发表《秋翁笔谈》。又出《万象十月刊》，风行一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因中央书店有反日作品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几十天，又被罚款，从此书店一蹶不振。建国后，中央书店参加通联书店，后来公私合营。
郑逸梅（1895—1992）原名鞠愿宗，号逸梅，安徽歙县人。	1913年，编辑《华光半月刊》、《金刚钻报》。1934年，辞《金刚钻报》编辑职务，任中孚书局编辑。以“报刊补白大王”闻名。

表九 知名书刊装帧设计家

姓 名	主要编辑出版活动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	1924年去北京，结识鲁迅，建立深厚的友谊。先后为鲁迅的《苦闷的象征》、《坟》、《彷徨》、《工人绥惠列夫》、《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书创作封面画，为许钦文的8本书创作封面画。鲁迅对他的绘画评价很高，认为他的绘画“和时代潮流合流，而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笔名丁一、寿明斋，浙江绍兴人。	1925年在北京协助其兄孙伏园编辑《京报》副刊，为鲁迅的《野草》、《小约翰》及北新书局、新月书店制作封面和插图，独具特色，是中国现代早期书籍装帧艺术家。1931年主编《艺风月刊》、《文艺茶话》等期刊。抗战时期，主编《旅行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曾编辑《侨务通讯》。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润，浙江桐乡人。	1922年开始发表漫画，是中国漫画创始人之一。1929—1930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为开明书店的书刊插图、装帧设计。他的漫画独树一帜，以简练的笔法，勾勒出含有深意的画面，是“诗词和画的结合”（叶圣陶语）。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	20岁进上海开明书店任美术编辑，从事书籍装帧，业余开始音乐创作。26岁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去长沙参与大众日报编辑。次年回上海，创立万叶书店，任总编辑，并创刊《文艺新潮》月刊。

第八章　出版与社会文化

第一节　出版与文化社团

甲午战争前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社会学理论。它所宣扬的“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以及“群与会”的言论主张，成为维新人士广泛组建各种学会社团的理论先导，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团实践活动，亦由此开始起步。民国创立后，“集会、结社之自由”，成了国民依法享有的正当权利，建立社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兴社团的组建，更是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嗣后的民国二十多年间，社团的发展虽说受到时局影响而起伏不定，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社团活动相当活跃频繁。社团数量既大，活动领域亦广，遍及经济、政治、文学、教育、新闻出版、图书文博、宗教、法律、语言、民族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各个行业与学科。

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化社团，或以改造社会、探索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为宗旨，或以文化交流为嚆矢，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虽说各社团活动的宗旨和目标有所分别，但在活动的方式与途径上，却不难找到相通之处。比如

说，多数社团都热衷于书报刊的出版，通过出版活动，宣传主张，传播思想，交流知识，从而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标著的出版者项，我们常会发现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文化学术团体的名字。这些文化团体，出版非其专项职责，但它们的出版活动，却构成了民国出版业多姿多彩的重要方面。《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标著的出版者多达万家，其中专门的书局书店，估计不会超过两千家，绝大多数都是这些学术机构和文化社团，兼事出版。在期刊出版方面，文化团体更是不让专门书店，成为期刊编辑出版的主力军。期刊的时效性、连续性和学术性强的特点，更适合于文化团体用来联络同志、发布信息、探讨问题和砥砺学术。《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中所著录的大部分期刊，便是由各种学术机构和文化团体编辑出版的。

在各种文化社团中，活动频繁也较易引人注目的一类社团，大概属于那些文学团体了。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所述，从1922年至1925年四年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就“不下一百余”，再加上1925年以后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团体总共在700个以上。这些文学团体成员遍及全国各地，有的是报刊先行，社团后立，如《晨报副刊》与语丝社；有的是社团甫在酝酿，刊物即已未雨绸缪，列入计划，如创造社与《创造季刊》；有的则是社团筑巢在先，报刊引凤在后，如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等，不一而足。要之，文学团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的发展。许多现代文学团体以报刊为园地，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培养了大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见下表)

追寻过去社团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社团与其所办刊物之间，在名称上的重合现象。以五四时期的一些著名社团为例，如互助社与《互助》月刊、少年中国学会与《少年中国》月刊、新潮社与《新潮》月刊、觉悟社与《觉悟》不定期月刊、工学会与《工学》月刊、平民教育社与《平民教育》月刊、少年学会与

民国时期主要文学团体及其出版活动

团体名称	创办时间	代表作家	主要刊物	说明
文学研究会	1921年	茅盾 叶圣陶 周作人 王统照 许地山 冰心 朱自清 俞平伯	《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月刊、《文学周报》等	文学研究会是建立最早、实力也最雄厚的一个文学社团，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方法。除北平、上海外，在广州、宁波、上海等地都设有分会，这些分会也在当地出版刊物。文学研究会成立有丛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等6类丛书，共250余种，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郑振铎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创造社	1921年	郭沫若 郁达夫 成仿吾 张资平	《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A.11》、《新消息》、《幻洲》、《文化批判》、《流沙》、《畸形》、《文艺生活》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提倡“为艺术”的文学主张，歌颂自然，崇尚理想。1927年后，创造社的文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甚至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创造社的活动可分前后两期，从创造社于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到《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9日停刊，前期创造社的近三年的活动历程是与泰东图书局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期间，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的创造社书刊主要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10余种，创造社丛书数十种；《世界名家小说丛书》6种；《世界儿童文学选集丛书》6种；《辛夷小丛书》5种；《名曲丛刊》1种。1926年4月，创造社在上海成立出版部，并在北平、武昌、广州等地设有分部。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后，从光华书局收回了《洪水》半月刊，自办出版发行，又印行了以前在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此外，由出版部出版的丛书还有：《世界名著选》17种，《落叶丛书》，《明日小丛书》，《创造社小说选》，《白鸥丛书》，《科学丛书》，《新智丛书》等。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但以江南书店的名义继续活动，创造社的书籍和全部纸型移归江南书店继续发行。
民众戏剧社	1921年	沈雁冰 郑振铎 欧阳予倩 熊佛西	《戏剧》月刊	

续表

团体名称	创办时间	代表作家	主要刊物	说明
湖畔诗社	1922年	冯雪峰 潘漠华 汪静之 应修人	《支那二月》月刊	湖畔诗社因出版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四人诗集《湖畔》而得名，之后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合集《春的歌集》，谢旦如的诗集《苜蓿花》。
学衡社	1922年	梅光迪 吴宓 胡先骕	《学衡》月刊	
浅草－沉钟社	1922年	陈炜谟 陈翔鹤 冯至 杨晦	《浅草》季刊、《文艺旬刊》（后改名《文艺周刊》）、《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	沉钟社对创作和翻译并重，以质朴而悲凉的文学创作和对外国文学的广泛译介为特色。创作倾向与浅草社相近，但趋向成熟。除《沉钟》上发表的作品外，沉钟社编辑出版的《沉钟丛书》7种集中体现了沉钟社作家的创作成就，丛书包括陈炜谟的短篇小说集《炉边》，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冯至的新诗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杨晦的译著《贝多芬传》、戏剧集《除夕及其他》，郝荫潭的长篇小说《逸路》。
新月社	1923年	徐志摩 闻一多 胡适 陈西滢 梁实秋	《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新月》月刊，《诗镌》、《剧本》周刊、《新诗》月刊	新月诗社以其系统地倡导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和鲜明的诗歌风格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成立于北京，1928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1925年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次年又在这个副刊上办了《诗镌》、《剧本》两个周刊，以《晨报副刊》为主要阵地展开新文学运动。新月社主要代表人物当推闻一多和徐志摩。闻一多的诗集《红烛》（1923年）、《死水》（1928年），集中体现了其典丽、凝重的诗风；徐志摩留下了4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体现了浪漫主义诗风和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其他著名诗人中，朱湘出版了诗集《夏天》、《草莽》、《石门集》、《永言集》等，陈梦家的主要作品收入《梦家诗集》。1927年春新月社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1931年8月，新月书店出版了《新月诗选》（陈梦家编选），汇集了"新月诗派"18位诗人的主要作品，并附长篇序言，较完整地展现了新月诗人的成就。

续表

团体名称	创办时间	代表作家	主要刊物	说明
弥洒社	1923年	胡山源 赵祖康 钱江春 陈德征 唐鸣时	《弥洒》月刊	弥洒社被认为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团体，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杂志《弥洒》和丛书。该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三种丛书：《弥洒社创作集（第一）》（1924年10月出版）、《弥洒社创作集（第二）》（1925年10月出版）、《风尘三侠》（胡山源著，1927年10月出版）。在创作集第一、二集中，每集又分编成戏剧、小说、散文三辑。
语丝社	1924年	鲁　迅 周作人 钱玄同 刘半农 林语堂	《语丝》周刊	语丝社是因出版《语丝》杂志而闻名的文学社团，以散文创作为主。鲁迅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杂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鲁迅在《语丝》上发表的一些散文、杂文，后集结为散文诗集《野草》，由北新书局于1926年出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的小品文主要辑入散文集《剪拂集》中。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达400余篇，1923年到1928年间，先后出版了24本专集，主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等。《语丝》曾于1927年10月被张作霖封闭，后来，北新书局由北京迁到上海，《语丝》也随之迁沪，于1927年12月复刊，1930年3月停刊，共出了5卷，计260期。
莽原社	1925年	高长虹 向培良 尚　钺	《莽原》、《狂飙》	
未名社	1925年	韦素园 曹靖华 李霁野 台静农 韦丛芜	《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	未名社是鲁迅参与并指导的现代文学社团，编辑出版的刊物有《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未名社主要的目的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其突出成绩是出版了一套《未名丛刊》（共24种图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译介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外国文学理论的介绍。未名社还出版了由鲁迅主编的专收创作的一套《未名新集》（共6种）：包括韦丛芜的诗集《尹山》、《冰块》，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影》，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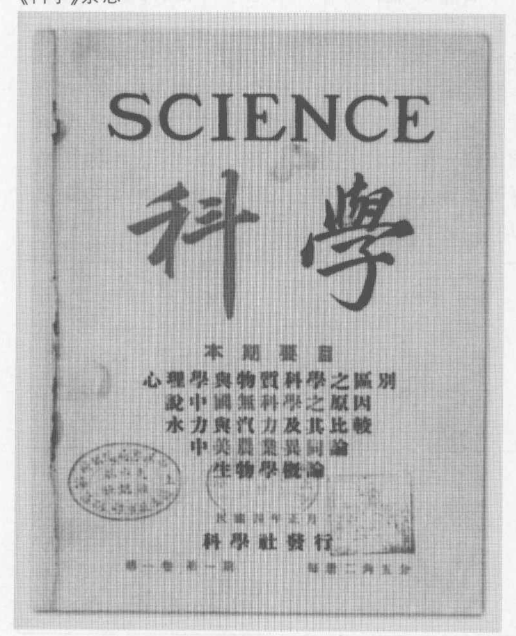
团体名称	创办时间	代表作家	主要刊物	说明
太阳社	1928 年	蒋光慈 洪灵菲 殷 夫 戴平万 祝秀侠 王艺钟	《太阳》月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 年	鲁 迅 田 汉 茅 盾 周 扬 冯雪峰 沙 汀 张天翼 夏 衍 柔 石 冯乃超 潘汉年 洪灵菲	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并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为《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 年 3 月 2 日成立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广泛团结和组织进步文艺界人士，统一领导革命文艺工作，反文化围剿和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它的理论纲领是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艺，号召作家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文艺工作方面，加强了报刊出版工作，它编辑出版的期刊有《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在“左联”成立前创刊，“左联”成立后继续出版的有《大众文艺》、《拓荒者》，均由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左联”出版的内部秘密刊物，有《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1932 年 3 月编印《工农大众》小周刊，1933 年后出版过《罢工日报》。“左联”日本分盟，办了《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为《质文》）三个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左联”还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众多作品，如鲁迅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和短篇小说集，田汉、洪森的剧作，叶紫、殷夫等青年作家的小说诗歌作品等等，显示了左翼文艺的丰硕成果和强大创造力。
现代社	1932 年	施蛰存 戴望舒 杜 衡 刘呐欧 穆时英	《现代》月刊、《无轨列车》半月刊	
中国诗歌会	1932 年	穆木天 杨 骚 任 均 蒲 风	《新诗歌》	

续 表

团体名称	创办时间	代表作家	主要刊物	说　明
七月社	1937 年	胡风、艾青、萧军、萧红、田间、端木蕻良	《七月》周刊、《希望》杂志	七月派创作、编辑和出版的丛书共 40 册。作品以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的成绩最突出，影响最大。《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七月新丛》等丛书，收入了优秀作家的大量作品。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8 年	老舍、楼适夷、郁达夫、胡风、成仿吾、茅盾、冯乃超、阳翰笙、夏衍、田汉、郑伯奇	会刊《抗战文艺》	

《少年》半月刊、青年学会与《青年》半月刊、觉社与《觉社新刊》半月刊、浙江新潮社与《浙江新潮》周刊、批评社与《批评》半月刊、共进社与《共进》半月刊等。这样一种把出版活动与社团活动合二为一的取名策略，体现了社团组织者有意借重出版，进行自我宣传的传播意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出版在社团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图 50
《科学》杂志



一个社团类似于一个“圈子”，而一个没有刊物的社团，则只能是一个空头“圈子”，几乎难以产生什么影响力。今天提到学术文化史上的某个“圈子”，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的刊物。提起中国科学社，必然要说到《科学》(图50）和《科学画报》；提起中国地质学会，必然要说到《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评论》。《科学》杂志在1919—1938年间，刊行了20卷。按该刊发起人任鸿隽推算，若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即有1 400余

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8篇计算，就有论文2 000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论文3篇，则有六百余人的研究成果，是通过《科学》杂志与世人见面的。《中国地质学会志》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日起，就对外发行的会刊，至1940年共刊行了20卷，共计8 000页，插图1 000余幅。刊物内容充实，质量较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到1936年以前，国外重要学术机关与之交换刊物的就达到了220处[1]。这些刊物对推动中国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无庸多论，而对团体自身发展而言，刊物同样是人们指认和确定其贡献的主要依据。可以说，刊物是社团的主要标志之一。

[1]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46)，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刊物还是社团凝聚力之所在。社团有了自己的期刊作为阵地，就可以交流信息，互通声气，各成员间的精神纽带由此而得以联接；更为主要的是，园地的共同建设，有利于形成合力，使各成员在共同的主张和目标下，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从而产生社会影响。新潮社因为有了《新潮》的传播，少年中国学会因为有了《少年中国》的流布，才得以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掀起波澜。当《新潮》停刊时，新潮社便树倒猢狲散，就像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不复存在一样。这种情形，在过去社团活动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特征。

为了办好出版，不少社团在机构组织上，设有专门的部门，分管书刊的编辑与出版。从《新潮社组织章程》第五到第九条条款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有意识的精心安排：

> （五）本社组织分下列两部：（甲）编辑部、（乙）干事部。
>
> （六）编辑部置主任一人，由社员公举，担任配置杂志材料，审定稿件去取及其他关于编辑等事务。
>
> （七）编辑部置编辑一人，协助主任编辑，由主任编辑推定，请社员承认，与主任编辑负连带责任。

（八）编辑部设书记一人，推定手续与编辑同，担任编辑部事务之记载，又外函件之往还及其他与编辑部相关之文件。

（九）干事部置主任干事一人，由社员公举，总理本社编辑以外诸事务，如本社对外交际及杂志之出版发行等。

其他可查到的资料：如《少年中国学会公约》中的第二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和第五十二条，《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中的第八条，改造社《本社的章程》中的第五条，《共进社章程》中的第十二条，民钟社《本社暂行社约》中的第三条等，均涉及到编辑出版上的事务[1]。

【1】以上材料均见之于《五四时期的社团》(1–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社团出版，既然专人专管，因而大多能做出一些成绩。不少文化社团不仅出版了自己的社刊，甚至还出版了本社社员著译的丛书。且以1933年国内出版的丛书为例，《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上这一年著录的丛书中，明显可看出由社团编辑或出版的有：《人地学会丛书》、《上海机联会丛书》、《大众文艺社丛书》、《山东大学化学社丛书》、《日本研究会小丛书》、《中华农学会丛书》、《中华学艺社丛书》、《中兴学会丛书》、《中国计政学会丛书》、《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中国地政学会丛书》、《中国劳工学术研究社丛书》、《中国诗社丛书》、《文艺春秋社丛书》、《文友社丛书》、《外交评论社丛书》、《立达小丛书》、《民治协会丛书》、《戏剧研究会剧本小丛书》、《启明学社丛书》、《线路社丛书》、《致知学社丛书》、《绿叶社丛书》等23种。考察其他年份，像这样由学会或社团编辑出版的丛书，在《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上，所在多有，很多社团在时过境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其编辑出版的书刊中，大略判断它们的历史存在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团出版的活跃。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社团，因先前涉猎于出版，而最终发展成为专门书局书店，如民国出版史上著名的北新书局和生活书店，

起初都与社团有密切关系。前者由新潮社间接演变而来，后者则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周刊》基础上逐渐形成气候。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作为中国科学社后一时期的专门出版机构，从事科学仪器制造，并兼顾书刊的编印出版。公司最初资本额为3万元，后来逐步增加到20万元。这样一个规模，在过去出版界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出版公司了。公司股份中，中国科学社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则限于社员购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在出版业绩上，光是各种大小丛书就有：《中国科学社丛书》、《中国科学社科学画报丛书》、《中国科学社科学画报小丛书》、《中国科学社梁绍桐纪念基金出版丛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丛刊》、《中国科学社通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丛书》、《中国电信学会丛书》等多种；在书刊印刷上，更是讲究质量，精益求精，特别是在排印复杂算式及科学公式上，出品精良，为出版界所称道[1]。

也有不少社团因限于自身出版能力的薄弱，而借助于当时现有书局书店的出版发行力量的。少年中国学会编辑的《少年中国》月刊，前四期自行经营，从第五期起则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少年世界》第一期的印刷发行事务，就全部托付给了亚东图书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和《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则交给了全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它的图书目录中便刊有多种以社团名义编辑的丛书。诸如：《上海图书馆协会丛书》、《中华学艺社论文集》、《中华学艺社学艺丛书》、《中华学艺社学艺汇刊》、《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广西建设研究会丛书》、《日本研究会丛书》、《民铎丛书》、《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丛书》、《内政研究会边政丛书》、《外交研究会外交丛书》、《银行学会实务丛书》、《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中华学艺社自然科学丛书》、《中华农学会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华学艺社文艺丛书》、《弥洒社丛书》、《禹贡学会丛

[1]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742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书》等，共24种。文化社团与书局书店的联手，是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社团拥有智力和知识资源，引领着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方向，正是出版部门图书选题和作者资源的含金富矿；而书局拥有资金和经营优势，在书刊出版发行与传播上的独擅胜场，正是社团所远难企及，同时又可资利用的。两者的互补与共济，一同铸就了文化学术创作与出版的繁荣。

第二节 出版与国语运动

1912年，民国建元，作为新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开始构拟民族共同语的框架。这一会议也可看作持续整整20年的晚清拼音化运动的大检阅，最后选定了章太炎所拟的"纽文"、"韵文"，略作改动后成了"注音字母"。同时，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不过，随后几年的袁世凯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骤然恶化，兼之主持这项工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辞职，标准读音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读音统一会的工作，除了"统一会"在京会员王璞自己设法于1915年成立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宣传并讲授"国音"外，基本上被束之高阁。

1916年，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被推翻。同年秋天，在京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随后几年，国语研究会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两大中心口号。所谓"言文一致"，是指书面语舍弃那种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而改用普通老百姓能理解的白话文；所谓"国语统一"，是指动员方言不一、言语不通的各地民众，学习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京话，定北京话为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国语。由于国语研究会在主张方面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潮流相合拍，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呼应，发展十分迅速，1918年有会员1 500多人，1919年增至9 800多人，到1920年则达到12 000余人。1921年就设分会于上海了。在国语研究会的大力促进下，教育部于1918年11

月23日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年1月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并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推行注音字母。1928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为“国音字母第二式”。1930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第88次会议根据吴稚晖的提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公布了以北平地方国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取代了行之有年的《国音字典》。历史上把这场肇始于清朝末期，兴盛于1920年前后，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语文变革运动，称之为国语运动[1]。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运动，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应该说是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一方面政府有关政策和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国语运动的开展，获得了一种行政上的有力支持和制度上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活跃于民间的有关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所做的制定、组织和宣传工作，也起到了切实有效的推波助澜的效果。譬如说，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在这场语文变革运动中，就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

[1]“国语运动”有广狭两种界定。狭义的国语运动，从国语研究会开始，下限到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前，由当时教育部中人士发动并组织广泛的同盟。广义的国语运动可以从晚清拼音化运动算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国语罗马字、30年代大众语和拉丁化，甚至于更晚。黎锦熙著的《国语运动史纲》中，便是作如此界定的。

一、出版部门及时地出版了与国语运动相配合的国语教科书

国语教育要想成功，须从低年级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抓起。这一点，早就被国语运动的先行者们敏锐地认识到了。早在1913年5月13日的“读音统一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改初等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议案。到了国语研究会成立后的1917年，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这一议案又旧话重提，并最终形成了决议。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训令“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国文改成了国语，科目名称既已变更，相关的教科书也必然要求作

相应的改变。而教科书的编写与供应，是由学校教育之外的出版部门来完成的。出版部门的态度和效率如何，自然会影响到国语教育的进程。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8册，竟然赶在这个教育部通告之前出版了。1920年7月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一种《新法国语教科书》，该套教材在第一册前，按照教育部“先教注音字母”的规定，另编一首册，专门传授注音字母方面的知识。同年的12月间，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也出版了，第一册上半本也是遵照部章“先教注音字母”的[1]。

商务印书馆等出版部门在国语教材编写上反应之快速，赢得了当时国语运动中坚人物黎锦熙的高度赞赏，称誉为“出版界是真能得风气之先的”[2]。在小学国语教科书出版之后，“总是能得风气之先”的商务印书馆又赶在1920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4册。《白话文范》纯采语体文，全用新式标点符号和提行分段。随后不久，中华书局编写的《国语文类选》等中学国语教科书也相继出版了。这样，作为国语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国语教育，从初小到高中都有了与之成龙配套的国语教材。

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成果，同时也是确立白话文地位最关键的一环。白话文的进入教材，等于承认了它的正式书写语言的资格。据历届“统一会”审查工作报告的统计数字，1920年审定的国语教科书凡173册，1921年凡118册，1922年约100册[3]。这些纷涌出版的教材，对国语形成了最好的宣传。

二、出版部门大量地印行了普及国音国语知识的国语书刊

黎锦熙在《何谓国语教育》一文中，将国语的范围定为三个

【1】黎锦熙：《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26~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2】黎锦熙：《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32页。

【3】黎锦熙：《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35页。

大的部分："国音"、"词类"和"语法"[1]。考之《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语文学"大类，对国语的这三大部分内容，都有相应的图书著录。尤其是国音方面的书籍，所占比例最大。大概国音不易被方言复杂的各地民众掌握，同时又与人们的日常交流紧密相关，因而特别需要普及与推广。1919年，经读音统一会会员商定编写出来的总共字数达13 000余字的《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另外，作为工具书性质的，既可以统一语言，又有"正名辨物"效用的各种"国语词典"，也出版了十几种之多。另一家大出版社——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国语图书数量，亦不在商务印书馆之下，前后一共出版了93种国语图书。（见下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民智书局等其他书局书店，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潮流中出版了相关的国语书刊。

[1] 黎锦熙：《何谓国语运动》，《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10页。

中华书局各年度出版的国语图书数量统计表[2]

年代	出版种数	年代	出版种数	年代	出版种数
1920	7	1927	1	1935	5
1921	18	1928	1	1936	4
1922	11	1929	4	1940	1
1923	14	1930	8	1944	1
1924	4	1931	1	年代不详者	1
1925	3	1932	1	总计	93
1926	7	1933	1		

[2] 资料来源：（一）《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二）《申报》广告。

三、出版部门大量制作了各种传习国音国语用的教学用具

在国语运动高歌猛进的当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出版机构，除了大量出版国语教科书和相关国语书籍外，还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制作了各种国音国语教具，如国音积木、国音色版、国音拼音牌、国语拼音盘、国音字母发音挂

图、国语游戏手语法等。这些教具用之于实际的国语教学，因其具有形态、体积、大小、色彩和运动等直观上的特性，可以弥补教师单靠语言难以描述的不足，使知识的传授更加生动、丰富。对学生来说，它可以化抽象为具体，获得感性经验，激发学习兴趣，保持长久记忆。其优点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出版部门制作的各种各样国语教具中，又以国语留声机片的灌制，成本最高，影响也最大。

早在1920年那一年，中华书局就委托法国著名的留声机片制造厂家——百代公司，专门灌制了一套为人们学习国音用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该留声机片的发音者和审校者分别为王璞和黎锦熙[1]，两人一个是语言专家，一个是音韵专家，都是国语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核心人物，从而保证了该留声机片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共6片，计12面，分成12课，全套定价为60元。第一批造货1 000套，1921年1月底从巴黎运到上海，1921年2月3日正式对外发售[2]。第二批造货也是1 000套，1922年7月开始照五折对外发售特价[3]，到1923年6月全部售完。第三批新货定价大为降低，从原来的60元减为40元，并以特价20元的价格发售[4]。累计销了几千套，说明这套留声机片在当时是受到教育部门欢迎的。教育部对它的审定批语云：“合查所制各片，发音清正，编次整齐，于国语国音之传习，殊有裨益，应准审定公布为各学校学习国语之教科用品。”[5]亦从预期效果和刻录质量两方面，对这套留声机片予以较高的评价。继中华书局之后，商务印书馆也于1922年请赵元任博士灌制了一套国语留声机片[6]。

1932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完全以北京语音为基准的《国音常用字汇》。这样一来，中华书局原先灌制的那套发“老国音”的留声机片，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33年，中华书局又请当时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且在北平各大学教授国语的白涤洲发音，灌制了一套新的国语留声机片，名为“标准国音国语留声机片”[7]。该留声机片一共16片、32面，分

【1】陆费逵：《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中华教育界》10卷4期，1920。

【2】《申报》，1921年1月30日。

【3】《申报》，1922年7月23日。

【4】《申报》，1923年6月29日。

【5】《申报》，1920年10月30日。

【6】《申报》，1922年11月24日。

【7】《申报》，1934年1月10日。

为三组，每组分别定价，同时又编有《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课本》，与留声机片配套而行，使自学者可在相互对照中进行自学。据1947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书局图书馆基本教育图书教具展览目录》称，这套留声机片及课本在当时，“销行国内外极广”[1]。

出版部门利用当时先进的录音技术，约请专家灌制留声机片，传习国语，其作用是明显的。人们常说，学习语言，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而留声机以其相对准确的发音和强大的重复播放功能，对广大国语学习者来说，不啻是身边有了一个可以随时请益的好老师，其在教育上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四、出版部门积极开办了以培养国语教员为目的的国语学校

以1920年1月《国民学校令》的修改及《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的正式颁行为标志，表明国语教育已从深化认识阶段，逐渐转入了大力推广阶段。如何去推广？除了通过行政的手段，将小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外，“国语统一筹备会”还特别设计了三项措施，其中有一项是，在北平、上海、广州、汉口（或武昌）等四个地方率先设立国语专修学校，作为其他各省国语师资培训和推广国语的示范教育机关[2]。上海的“国语专修学校”，委托给了对此既热心又有实力的中华书局具体承办[3]。在资金上，中华书局每年向该校贴费1 200元[4]；在招生上，国语专修学校的招生广告和中华书局的图书广告并置于报端；在教学上，很大一部分教员由中华书局国语部的编辑充任，黎锦晖、陆衣言、马国英、郭后觉、黎明、乐嗣炳、蒋镜芙等人忝列于教员名单之中[5]。

1921年4月，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首批学员正式开班上课，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6]，开设的国语学习班涵盖了多种类型层次：有平时上课的专修科和讲习科，有利用星期日上课的星期补习科，有利用寒暑假上课的寒暑假讲习科，有为中等学校毕业生或是由国语专修学校高等科与专修科毕业学员开办的师范研究

【1】《中华书局图书馆基本教育图书教具展览目录》，256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

【2】另外两项是：一、提倡各地方组设研究与推行国语的团体；二、提倡并改良国语的出版物。《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50~5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3】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文化史料》（第3集），9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4】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52页。

【5】《申报》，1922年5月20日。

【6】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兴起于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的年头，并随着国语运动的式微而走向衰弱。1925年7月，中华书局董事会会议决定将国语专修学校停办。中华书局编辑蒋镜芙愿意接手续办，中华书局还每月补助50元，并将校具奉送，直到1930年2月才最后取消津贴，不复过问。

科，有特为各地小学校长及教员开办的新小学教育讲习科等。仅头两年，从国语专修学校毕业的学员人数，就已达七百余人之多[1]。

商务印书馆同样于1921年4月附设了一所国语学校，名之为国语讲习所，先设师范班，后设暑期讲习班。前者学员60人，3个月毕业；后者学员502人，6个星期毕业[2]。1924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上海国语师范学校，聘吴稚晖为校长，方叔远为主任，李梦明、吴研因、沈雁冰、郑振铎、周越然等为讲师[3]，普通科第一期学员50人，第二期54人，第三期89人，补习科52人，暑期讲习科102人[4]。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一拨又一拨学员，当他们毕业后分赴于各地任教时，也同时把国语知识的种子带到了全国的四面八方。

1931年《世界杂志》十年增刊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十年来的国语运动》的文章。该文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语运动情况，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文章作者乐嗣炳，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作为一个知情者，他特别提到了出版部门在国语运动中所作的努力。他说：

> 以国语运动为发财事业的书店方面的努力，其功也不可埋没。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当国语运动发生之初，早知国语教育势必实现，所以参加国音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制造国音留声机片，出版大宗国语用书，赶造国语教科书，不遗余力。商务印书馆表面上稍稍落后，而追踪的结果，成绩至少不下于中华。一九二五年世界书局发行国语教科书，意外地卷起了一个推销国语用书底大波澜。当时三个书商互相竞争，只求把国语书销出去，蚀本奉送不算，有时奉送了还要倒贴。结果三家书店因此亏损百余万元，而促进国语运动底力量，事实上比哪项国语运动都浩大。

【1】胡国光：《参观了国语专修学校之后》，《国语月刊》1卷7期，1923。

【2】《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689页。

【3】《申报》，1924年2月20日。

【4】《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693页。

正如乐先生所说的，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出版界，不管是出版国语教科书刊也好，还是灌制留声机片以及开办国语学校也好，之所以那么热心，一方面固然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比如说，中华书局里的很多编辑，包括总经理陆费逵本人，都是"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或"上海国音推行会"的会员，黎锦晖、陆衣言、马国英、郭后觉、乐嗣炳、蒋镜芙等，还是其中的领导骨干。他们写文章，编书刊，正是鼓吹国语运动的最好手段；另一方面，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是为了"发财事业"。当初商务印书馆赶在教育部正式行文之前推出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和《白话文范》，便有相当多抢市场的成分在里面，尤其是《白话文范》，因急于出版，内容欠精，最后只被教育有关部门审定作参考书[1]。中华书局那些年出版的那些国语图书，同样是与市场风云紧密挂钩。1920年至1923年四年间，是国语运动最为红红火火的四年，也是中华书局出版国语图书最多的四年，四年出书50种，占中华书局国语图书出版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后，国语运动的走势趋弱，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国语书数量也跟着逐渐减少，只在1926年和1930年出现了两个小小的高峰。那也是事出有因。1926年由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发起，联合各学校各团体，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语宣传运动，名之为"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中华书局这一年新出的7种国语书，正是借了这场运动的东风。1930年4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8次常务会议议决，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同年7月23日，教育部制定了《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2]。名称的改易和有关政策的制定，给出版者带来了新的商机。中华书局这一年出版的书名上全部冠以"注音符号"字样的5种国语书，就是这一市场形势下的产物。

正因为有了"发财事业"的利益驱动，才促成了出版部门在国语运动初见端倪和方兴未艾之时，做出"赶造"与"追踪"的举动，从而推动了国语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三家大书局相互间国语书的价格拼杀，也是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降价销售，损失

【1】黎锦熙：《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33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2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自在出版者本人，受益却属于整个国家和社会。

第三节 出版与图书馆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虽然发轫于20世纪初，但真正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中大批量生产的那些反映现代政治、学术、文学、科学技术的书刊资料，使得中国原有的图书管理方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另一方面，受当时社会潮流所激，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图书馆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机关，在发挥输进知识、广博见闻、学习研究、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功能。1917年以后，沈祖荣、戴志骞等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家学成归国，在他们的大力倡议下，以仿效欧美图书馆精神来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而把西方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图书馆建设，则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

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将美国退还庚款的1/3建设图书馆8所，分布中国要地，为各该区域的图书馆模范。同时，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来我国考察图书馆状况，提倡推广通俗图书馆等。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请当时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通令各学校设置图书馆，并且每年从全校经费中提取5%以上作为购书费。有了这些经费作为保障，新图书馆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3年，图书馆学专家沈祖荣在调查10多个城市30所图书馆后，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欣慰地指出，全国各高等教育机关不仅馆藏丰富，馆舍建筑也“美丽完备”；政府和当地富绅亦多热心于本地图书馆之建设[1]。十多年蓬勃开展的图书馆运动实绩，最能从全国迅速增加的图书馆数量上反映出来。据《教育公报》1916年统计数字表明，时年全国图书馆仅260所；至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全国图书馆数，已增至502所；1928年时，全国除甘肃等7省区、汉口及东三省行政区外，有图书馆557所[2]；

【1】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81页,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年。

【2】邹华亭:《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6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29年全国有图书馆1 131所[1]，1930年为1 428所，1935年增至2 520所[2]，1936年为5 196所[3]。

新图书馆运动规模浩大，持续时间长达20年之久。它直接导致了传统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巨大转变，从此，近代公共藏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西结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亦由此奠定基础。新图书馆运动在促进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繁荣近代学术文化、普及民众教育作出了独有的贡献，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当我们回过头来，试图对新图书馆运动发展中的诸多历史因素，作分析性的考察时，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在社会文化功能上与图书馆既有重合又有衔接的出版部门，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国故和新知并举，丰富图书馆馆藏

出版业影响于图书馆，主要通过出版物这一间接途径。虽说，图书馆藏书可通过赠送、交换等方式获得，但主要来源还是有赖于出版机构的现时供应。新图书馆运动所强调的保存文化、建设文化的主旨，体现在文献的馆藏上，一方面是古籍的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新知识出版物的流通。而国故和新知并举，正是民国时期出版物内容的两翼，从而为图书馆的文献收藏提供了绵绵不绝的源头活水。

就古籍文献出版而言，民国时期是我国系统出版古籍的高峰时期，1917—1937年间出版的《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初编》、《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国学名著丛刊》、《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都堪称为出版史上的大型工程。出版部门利用现代的出版技术，或是影印，或是铅排。特别是那些越来越稀见的孤本秘笈，通过影印的出版方式，化身为千百之后，既便利了公私藏书机构对古籍的搜求，又因传真不失原刻面貌，而使馆中收藏兼具文献和研究两方面的价值。再说，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印古籍”，在价格上自然要比原版旧书低得多，这

[1] 邹华亭:《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64页。

[2] 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上海,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转引自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87页。

[3] 上海申报年鉴社统计数字为5183所,5196所的统计数字是根据《第二次教育年鉴》。

对于当时许多受经费困扰的图书馆来说，又无形中替它们减少了书费上的开支。

就新书新刊出版而言，民国时期新旧知识体系的交替，承继着晚清的余绪，开展得更加普遍和深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激荡之后，各种新学科内容的出版物应和着时代的需要，雨后春笋般大量生产出来。各类稽考查找性的工具图书，各类欣赏性的文艺作品，各类趣味性的儿童读物，各类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各类致用性的科技书刊，各类普及性的民众读本，以及其他各种用途各种类型的出版物，或是通过翻译的手段，或是采用著述的方式，被出版部门生产出来，然后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图书馆的采购渠道，使得新图书馆运动中“建设文化”的诉求，不至于蹈虚为空谈的口号。在出版部门发行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新书刊中，有不少采用了丛书的出版形式。这些丛书往往装帧一律，便于图书馆进行插架和管理，同时提供的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的知识又相对系统和全面，因而倍受一般图书馆的欢迎。商务印书馆1929年开始出版的大型现代知识丛书《万有文库》，在每本书上加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号码，并附送书名著者卡片，这种在版编目的做法，更是为图书馆服务得十分周到。

二、开放自家馆藏，化私藏为公有

将私家藏书楼向社会开放，早期有徐树兰于1904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嗣后，相继诞生了一批从私人藏书和企业藏书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私立图书馆，其中藏书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旧时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出于本馆人员编译图书时参考的需要，很早就开始了图书资料的收集工作。起先，商务印书馆藏书之所名为涵芬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准备将馆藏对外开放，将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斥资11万元建成的东方图书馆大楼正式落成。大楼共五层，全部建筑面积2 600平方米。1926年5月，商务印书馆发布公告，东方图书馆正

式向社会开放[1]。

商务印书馆创办并向外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同时也是我国上个世纪30年代初馆藏图书最多的一家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前，也就是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纵火的前夕，其馆藏数量为463 083册，而其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371 752册。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深思：在那个政局动荡的时代，政府无暇顾及公益文化事业，却由一个民营出版部门充当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领头羊，衬托了商务在保存文化上的时代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化私藏为公有，主动地向社会开放的行为，尤能显示出一个出版企业着眼于全国整体文化建设的长远眼光和雄心大略。

【1】吴永贵:《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典范》,《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8期。

三、推行分类法和检字法，热心于图书馆教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的各种文献分类法约有90余种[2]，在图书馆界较为通行和影响较大的有四五种，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主持人王云五于1928年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3]。据庄亚文1934年编写的《全国文化机关一览》一书所载，采用王云五分类法的全国各图书馆中，较具规模的有二十余所，这当中包括湖北、湖南、江苏、陕西等省立图书馆。又据何多源统计，1936年国内图书馆所用分类法，以《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为最多。《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原本是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而编制，之所以后来广延到全国流行，一方面固然以分类法自身融合中西的突出优点作基础，另一方面也与商务印书馆的竭力推广大有关系。大型丛书《万有文库》书脊上所印的，便是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分类号。《万有文库》第一集8 000余套，第二集6 000余套的销量，事实上无形中给分类法作了极好的宣传与广告。因《万有文库》而新建的千余所中小图书馆，想必用的

【2】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1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另外有影响的其他几种是:杜定友编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刘国钧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编的《中国十进分类法索引》。见尹恺德、宋传山《中国图书分类学史》,123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也是书脊上印好的现成分类法。

同编制分类法的活跃情形相类似，民国时期同样是我国各种检字法争相出台的时期。民国时期实验编制的百余种检字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源出于出版机构的大力推动，甚至是直接参与的结果。当时作为全国最大的两家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主持人的王云五和陆费逵，都曾投身于检字法的编制实践活动。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陆衣言、马国音等编的《新国音学生字典》，采用的是“头尾号码检字法”；万国鼎编的《新桥字典》，采用的是“母笔检字法”；陈立夫编的《五笔检字学生字典》，采用的是“五笔检字法”。出版部门推出的这些新检字法，固然是出于编纂工具书的出版需要，但同时也便利了图书馆部门在图书编目工作中的实际应用，给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的传统笔画和部首排列方法之外，增加了新的检索途径。尤其是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因其快捷准确的突出优点，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图书馆机关大规模的使用。《万有文库》出售给各大小图书馆所附送的著者卡片和书名卡片，便是依“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排列的。

在图书馆教育方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国昔日的图书馆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接受图书馆学正规教育者仅为其中的少数，远不能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对图书馆业务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便显得十分必要。从我国现代图书馆教育史来看，在职培训收效显著，接受培训的人数达1 000多人，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的一大份功劳。商务前后共举办两期图书馆暑期讲习班，培训学员共计达350余人[1]，几占全国培训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31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四、出版图书馆学书籍，推动图书馆理论的繁荣

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始于新文化运动期间。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兴起以后，图书馆学研究也借助这场东风，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版了大量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方面

的书刊。这样一种可贵的成绩，固然是图书馆学家勤于著述的结果，同时也与出版界的密切配合有很大关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全国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是图书馆学书刊出版的主力军。从1917年至1949年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一共出版图书馆学著作66种，代办发行3种[1]。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馆著作，据《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12—1949）》所刊载的，数量也达20种之多。出版部门之所以热心于图书馆著作的出版，一方面是因为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图书馆学堪称为一时显学，受到社会知识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列的会员名单中，诸多社会名人列名其中，便可证实这一点。图书馆学既为显学，就有相应的市场需求，而有了市场拉动，出版部门自然也就乐于配合。另一方面，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出版机构的主持人，本身也热心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他们或者是全国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或者是上海图书馆协会的领导骨干[2]。由他们来出版图书馆学著作，既可认为是个人兴趣使然，同时也具有某种职务和职业上的便利。很显然，图书馆学书刊的大量出版，对推动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的繁荣，具有积极的深远影响。

当然，在强调出版业对近代图书馆事业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同时看到，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样反哺了近代出版业的进步。两种在功能上既有重合又有衔接的文化部门，彼此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兴衰与共的。近代的新图书馆运动，同样为出版业开辟了广阔的图书市场。新图书馆运动中新生的一大批图书馆，因为急需购买图书，充实馆藏，从而成为出版业图书销售中的购买大户。据统计，1927年，全国图书馆藏书总数为3 192 250册，而至1933年，全国仅高校图书馆藏书就达4 493 616册[3]。图书馆旺盛的图书需求，极大地拉动了出版业赖以依存的图书市场，成为近代出版业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版部门受到新图书馆运动展现出来的商机吸引，在选题开发和组织出版方面，自觉地适应市场形势，如二三十年代的古籍出版热、大型丛书出版热，都可视为出版部门对图书馆巨大需求的一

【1】吴永贵：《着眼全国图书馆发展大局——论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9期。

【2】王云五曾担任上海市图书馆协会主席，陆费逵也在1929年3月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上海特别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

【3】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转引自赵长林《论民国时期出版业发展中图书馆的作用》，《出版发行研究》1995年第4期。

种主动应对。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形中为近代出版业培养了广泛的读者群。新图书馆运动在实现图书馆藏书为社会所共享的同时，尤其强调公共藏书机构的教育性特征。援引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的说法，"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以启发民智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图书馆，发展非常迅猛。1918年，全国通俗图书馆为286所，1931年达到1 052所[2]，而且通俗图书馆不论在馆址设置、藏书内容还是在开放时间、借阅方式上，均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出发点，对阅览者免费开放，使图书馆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无疑，通俗图书馆在扩大社会的读书人口、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普及社会读书风气方面均作出了默默无闻的巨大贡献。而这，也正是图书馆于无形中贡献给出版业最为得力的地方。社会上读书的种子愈多，阅读的水平愈高，学习的风气愈浓，买书藏书的数量也就愈大，出版业就随之愈加繁荣。近代图书馆在服务读者的同时，其实也在为出版业开发未来的图书顾客，培育新的图书市场。难怪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李泽彰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一文中，明确地把图书馆运动作为推动近代图书出版业繁荣的三大因素之一[3]。考之史实，可谓的论。

[1] 刘国钧:《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新教育》第7卷第1期,1923年。

[2] 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151页。

[3] 李泽彰总结的另外两大因素是革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见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1页。

第四节　畅销书出版

从历史上看，畅销书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久远。作为一种被读者广为接受的阅读现象，畅销书自有其存在的前提。它与出版业大生产大流通紧密相连，是图书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我国传统出版方式下的手工雕刻，作坊式经营，就很难出现那种万人争诵一本书的阅读文化景观。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西方铅印排版技术在我国的引入与广泛应用，畅销书所要求的短时期内大印数印刷才成为可能。若把现代印刷技术的采用作

为我国近代出版业形成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那么，畅销书的历史进程便与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同步，其出现也不过百来年的时间。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为畅销书的产生提供了运行的出版机制。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畅销书能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中脱颖而出，在高标的销售数字背后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心态，综合体现着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时尚、趣味等方面的变化。民国时期正是一个社会潮流变革不居的动荡历史时期，为畅销书的递次演进，提供着滋长的文化土壤。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民国时期的主要畅销书种类，分成旧派小说、新文学图书、翻译书籍及其他等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介绍。

一、旧派小说的畅销

20世纪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其中涌现了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诸多种类。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在晚清一度风行，到民国时期逐渐退隐出潮流之外。言情小说是民国时期出产畅销书的高频领域。言情本就是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话题，民初自由恋爱的提倡、商业对文学的入侵更是助长了这种卿卿我我文风的盛行。曾开创畅销书新纪录的《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等都属此列。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虽以言情小说著称于世，但他们写得最多的还是社会小说。虽然范烟桥认为民国时代的社会小说是谴责小说的堕落[1]，但这一类小说暴露丑恶，负载大量社会秘闻，满足了市民的好奇心，且对怀着避免上当受骗心理的民众有一定的警示和安慰作用，从而拥有大量的读者群，销行也就极为广泛。其中《广陵潮》、《歇浦潮》都曾轰动一时。20年代，随着包办婚姻逐渐解体，言情小说的日益粗制滥造，市民开始对言情小说倒胃口了。鸳鸯蝴蝶派为重新获得读者的欢心，遂推出新的小说品种，再加上世界书局20年代的提倡，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在社会上掀起广泛的热潮。武侠小

[1]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2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说历来以出神入化的武技、酣畅淋漓的侠义、善恶有报的痛快吸引大批的读者。民国时期，《江湖奇侠传》引起的武侠小说热潮一直没有停息过。侦探小说是鸳蝴派作家刺激读者的一个亮点，《福尔摩斯探案》也曾风靡一时。下文按照这个线索，大致依照时间顺序来分述其中涌现出的畅销书。

言情小说

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出现过浮面的清明气象。政治上，人们信奉卢梭的人权说，拥护投票的普选制；精神生活上，人们提倡自由恋爱。以控诉传统的恋爱不自由，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为标识的言情小说受到了广大青年人的热烈欢迎。民初第一大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以一种自夸为“有词皆艳，无字不香”的骈体文笔，写成一部“蜂愁蝶怨”的“千秋恨史”，赢得了当时彷徨无助、多愁善感的青年学子和有闲市民的争相购阅。

《玉梨魂》写的是一个年青美貌的寡妇白梨影与青年才子何梦霞如醉如痴的恋爱经历，最终却以悲剧告终的爱情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最初在《民权报》上连载，尚未完稿，即引起轰动。小说刊完后，《民权报》的总主任忽然动了发财的念头，办了个“民权出版社”，将《玉梨魂》印成单行本，马上就被读者抢购一空。不到两年，就再版了10次，大赚其钱，却昧着良心，分文不给作者。徐枕亚当时沿袭旧时文人不言利的传统，亦不与之计较。后来《民权报》部分同人集资创办《小说丛报》，请徐当主编，徐无钱入股，才想到收回《玉梨魂》版权，却遭到民权出版部的拒绝。最后，徐诉诸法庭才将版权收回，仅过10年，《玉梨魂》就已印了23版。10年之中，广州、昆明、香港以至南洋新加坡各地，均发现翻版伪本，徐再一次诉诸法院，然法院亦无可奈何[1]。这成为一段出版史话。有人估计，这部书前后销量达几十万册，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大数字。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中也说：“我们如果替民国以来的小说销数做统计，谁都不

【1】袁进：《鸳鸯蝴蝶派》，46~4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会否认这部《玉梨魂》是最近二十年销行最多的一部。"[1]

徐枕亚当上《小说丛报》主编后，为了打开该报的销路，他假托找到何梦霞的日记，将《玉梨魂》的故事用"日记体"的形式重写一遍，命名为《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日记体小说。我们知道，《玉梨魂》是民初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它的读者以百万计，《雪鸿泪史》以日记体重写《玉梨魂》，"就其事而易其文"，无疑大大促进了该书的销售。《雪鸿泪史》出版后，虽不及《玉梨魂》畅销，但在当时也屡屡再版，为徐枕亚带来很大的经济收入。徐后来创办"清华书局"，就是以他的稿费版税为本钱的。

以骈文写小说，与徐枕亚同时被人称为"此中巨擘"的，是吴双热。吴双热的代表作是《孽冤镜》，《孽冤镜》最早和《玉梨魂》一起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1914年2月出单行本，和《玉梨魂》一样，它也曾风靡文坛，激动了大批读者的心，一时为《孽冤镜》题词题字的文字出现在各种报刊上："情场祸福两无门，缘去缘来泪影痕，名士笔花双管热，美人暮草一丛婚。不堪卒听啼更鸟，强自孤吟折翅鸳，举世更悲同调伙，无边孽海孰为援。"[2] 还有什么小说比"举世更悲"的影响力更大呢？不久《孽冤镜》被排成新剧，其影响力就更大了。与徐枕亚、吴双热同时用骈文写言情小说的畅销书作家还有李定夷，他也被时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健将"。他的代表作是长篇言情小说《霣玉怨》。李定夷靠此书一举成名，跻身畅销书作家行列，随后约稿不断，连篇累牍地炮制作品，以应市场的需要。他创作生涯不到十年，却创作了长篇小说四十多种。

民初，以遣情、游戏、消闲为主要特征的鸳鸯蝴蝶派把持着文坛，在畅销书领域也几乎一统天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读者方面来说，上海繁荣的商业社会造就了一大批市民阶层，以娱乐为主要特征的遣情小说投合了一般读者的需要；其次从小说自身发展趋势来说，晚清小说家提倡的那种以小说救亡的理想观念在社会实践中一再遭到否定，作者与读者失望之余，向传统的以小

【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37页。

【2】汤哲生：《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8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说消闲的固有观念转移，是其必然的结果；另外，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政治的压制也助长了出版界出版图书的遣情倾向。

在鸳鸯蝴蝶派泛滥于小说界之时曾被视若“大师”，但小说的格调情致与之殊异的是民国初年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苏曼殊(1884—1918)。苏曼殊曾是南社成员，他一生身世飘零，情思多变，曾作诗自咏：“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苏曼殊是文艺史上的一个“奇才”。他以35岁的漂泊生涯而通晓日文、英文、梵文，长于诗、文、小说、翻译和绘画，并且都达到相当的造诣。其作品以身世之感应和家国之思，落笔颇有诗人风度，明洁隽逸，情致尤深。读者能于凄切之处感受到一种青春气息，有别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断鸿零雁记》（1912年）是苏曼殊的第一篇创作小说，也是民初独标一格、最富诗情的小说，曾广为翻印，轰动一时，并被译为三种外文及改编为剧本。他的文品与人品交相辉映。他的入世、耽情、嗜食以及行踪恍惚的身影，浑然不落俗态，始终于风流倜傥中给人以传奇感和神秘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欣赏其“哀感顽艳”的作品，同情他“落叶哀蝉”的身世。苏曼殊以其人与文的超凡性激起一阵阵的“曼殊热”，实在是民国初年文坛的奇迹。

社会小说与历史小说

鸳鸯蝴蝶派虽以言情小说著称于世，但这派作者写得最多的还是社会小说。在承袭晚清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民初的社会小说取材范围更为扩大。李涵秋的《广陵潮》就是一幅清末民初社会大变迁的历史长卷。该书1909年写作，1919年才全部完成。甫一问世[1]，立即受到文坛的高度重视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前后重印数十次。其影响所及，甚至形成了一股仿效之风。“自《广陵潮》出，一时章回体小说，以‘潮’名者，不下数十种”[2]。这其中，要数朱瘦菊的《歇浦潮》最为著名。王钝根序云：“海上说梦人风度潇洒，爱交游，多闻上海社会诙秘之事，

【1】1915年震亚书局陆续出版。

【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3册），17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闲辄笔之于书，作长篇小说体，名曰《歇浦潮》。”[1] 该书先在上海《新申报》连载五年之久，至1921年5月出版全书。在当初许多写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形形色色众生相的社会暴露小说中，它是最出色最畅销的一部作品，销数在万数以上[2]。陈辟邪的《海外缤纷录》也较为成功，销至两万余册。其余影响较大的有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平襟亚的《人海潮》销行甚广，凡7版，印3万几千部。平襟亚颇有生意人的精明与滑头，善于迎合潮流。他看见市面上出现一部《三十六女侠》的销路很好，就建议出版一部《七十二女侠》。然后很快找熟识的中学语文教师，要他们给学生出作文题目：“记一个女侠”，从中选出72篇，重新抄过，即行付印，并且大做广告，这书果然畅销一时。

1916年，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袁氏窃国一时成为畅销书的热门题材。袁世凯称帝之事，最早见于小说的是杨尘因著的《新华春梦记》。该书1916年1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当时十分畅销。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靠这部书赚了一大笔钱。同一题材的畅销书还有1916年文艺编译社出版的《袁世凯全传轶事》，据1916年11月22日的《申报》上的广告称，该书未及两月已五版。另一本《袁氏盗国记》也是不及一月，就已再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还我青岛”的浪潮中，小说家周瘦鹃将《亡国奴日记》从《瘦鹃短篇小说》中析出，陈请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别刊单行本行世，每册售值五分，以中国纸印，叠版数次，凡销去四万册”[3]。这是图书因契合社会热点而畅销的又一实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清宫秘史的讲述就应运而生。其中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是较为成功的一部，“曾搬演红氍，播诸弦管，给社会影响很大”[4]。经过一二十年，再版了若干次，后他被汽车辗死，消息在报上传播，书贾又大量再版，在报上广告宣传，又卖出数万部，赚了很多的钱。

民初还有描写留学生的“社会小说”，一度十分盛行。它最

【1】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284页。

【2】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544页。

【3】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341页。

【4】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577页。

早始于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据说，向恺然最初出售《留东外史》书稿时，没有人要，只好低价卖给民权出版部，不料出版后却大为畅销。当时的读者看到描写异国留学生的生活，十分新鲜；再说，当时中国老是受日本欺侮，看看留学生玩弄日本女性，聊以泄愤，出版后受欢迎便在情理之中。因畅销，便有了《留东外史续集》、《留东新史》、《留东艳史》之类的后续之作。

社会小说的末流是"黑幕小说"。这类类似中国传统野史笔记的纪实文学，之所以在旧时能够延续它的生命，是因为"黑幕"骗局确实到处存在，读者不是从文学需要出发，而是从避免受骗上当出发，也确实需要这类小说。其中，最著名的当推1918年5月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据该书1921年的再版广告称："是书系描写龌龊社会，揭发奸恶人心，至详至确，故发行未满三载，印行业已六版，足见全国欢迎。"[1] 据说该书发行时，在广告目录上登出一些官吏、巨贾、土豪、劣绅的姓名，这些人怕自己的隐私被揭，或被人无中生有地捏造，竟有以花钱预订二百部作代价更换自己姓名者。用这种方式推销图书，亦可算黑幕中的黑幕了。

【1】袁进:《鸳鸯蝴蝶派》,82页。

社会言情小说

1921年沈知方凑集了少数资本，办起世界书局，就想多出畅销书，加速发展。他也确有眼光，世界书局所出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江湖奇侠传》、《霍桑探案》都是盛销一时的畅销书。《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为张恨水名噪一时的力作。《春明外史》自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全书约百万字。写的是20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很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为的就是要知道这版外新闻是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北京有好几家晚报社，很多家昙花一现就关门，只有成舍我办的这份《世界晚报》依靠《春明外史》一直坚持了下来。《金粉世家》1926年在北京

《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它的发表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们听。该书受欢迎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世界日报》也是因它才得以复兴。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可是这十几年的统计，《金粉世家》的销路，却远在《春明》以上。这并不是比《春明外史》写得好到那里去，而是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亲近有味。"[1]

【1】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4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世纪30年代，"社会言情小说"已蔚为大观，在与新文学、武侠、侦探、历史等类小说的竞争中，已牢牢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这表明先前的"社会小说"历经十余年的跋涉，终于从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同时标志着这派"言情小说"业已摆脱"哀情小说"的纠缠。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合流，以张恨水《啼笑因缘》的产生为标志。《啼笑因缘》自1930年3月中旬起，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同年底出版了单行本。问世后，引起罕见的轰动及读者狂热的迷恋，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其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商人看到这部小说如此引人注目，在《新闻报》登广告时要求登在连载《啼笑因缘》的版面上。《新闻报》的销数很快上升。严独鹤一看它如此吸引读者，赶紧成立一家"三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生前就印行了20多版，达几十万册。因为有利可图，各种续集迭出，以至作者不得不向畅销市场让步，违背初衷续写了十回，将主要人物写死，使别人无法再续。电影制片商为争夺拍摄权打起了"啼笑官司"，使得这部小说更被炒得沸沸扬扬。《啼笑因缘》曾被数次拍成电影，第一次有声电影由胡蝶、郑小秋主演，亲至北京拍摄外景，上演时甚为轰动，时为1932年。1940年又由李丽华、孙敏主演拍摄了一次，最后两次是电懋、邵氏同时开拍，改名《故都春梦》，分别由李丽华、葛兰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评弹、大鼓、说书、

地方戏曲。这种轰动局面在五四以来的我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即令平实谦虚如张恨水，在写成《啼笑因缘》后也踌躇志满地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1]《啼笑因缘》创造了小说界的新纪录，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止，甚至还讨论过《啼》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得如此广泛。张恨水是一位紧扣时代的小说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创作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其中以1939—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的《八十一梦》影响最大。这部小说以散体化的形式，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国民党统治下重庆腐败的现实和社会上种种丑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在大后方，《八十一梦》是销数最多的一部，延安也翻过版。

【1】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344~345页。

在北方通俗文坛上，以社会言情小说著称、堪与张恨水同领风骚的，是天津的刘云若（1903—1950），人称"天津张恨水"。刘云若本名兆雄，少年时就喜赋诗填词，投寄报刊发表。1930年任《天风报》副刊主编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大受读者欢迎。此后20年间，所著言情长篇逾40部，其中《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旧苍夕阳》、《粉墨筝琶》等，堪称通俗小说的上乘之作，出版后风靡一时。在这些作品中又以40年代出版的《红杏出墙记》影响最著。

20世纪40年代言情小说创下畅销书最新纪录的，是"孤岛"上海时期秦瘦鸥的《秋海棠》。该书1941年连载于《申报》之后，当时的畅销程度和被连续改编成电影、戏剧的轰动情景，一如十一年前的《啼笑因缘》。它的成功在于它所表达的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与沦陷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憎恨产生了共鸣，从而获得空前的轰动。1942年12月《秋海棠》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历演150多场而不衰。

武侠小说

民国以后，武侠小说风起云涌，因为这类小说以情节曲折紧张，描写人物的奇事异能而引人入胜，并且内容也总是彰侠义、惩顽恶，投合人心，故能拥有大量读者。20年代武侠小说领域有“南向北赵”之称。“向”即向恺然，他的《江湖奇侠传》当时极风行，据说在东方图书馆中，因为借的人太多，不久就被翻得破烂不堪，只好再买一部，不久又看得破烂不堪，于是再买一部……如此屡买屡破，屡破屡买，一共买了14次，《江湖奇侠传》的热潮方才过去，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这本小说已经“热”到了何种程度。由《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放映时，场场爆满，电影院里叫好、鼓掌，从头到尾，现场笼罩着一片狂热的气氛。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向恺然另外一部以大刀王五和霍元甲为主角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也是销行海内外，达数十万册。“北赵”指赵焕亭，20年代初北方冒出的一位武侠小说家，代表作《奇侠精忠传》在当时影响极大，出版后即与《江湖奇侠传》抗衡。还有一位作者名叫顾明道，本是写哀情小说的，在武侠狂潮中也改写武侠小说，其开言情武侠小说之端绪的大作是《荒江女侠》，最初登载于《新闻报·快活林》，1931年初集出单行本，1940年出至6集，曾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京剧，同样家喻户晓。

三四十年代是武侠小说的鼎盛时代，在当时所谓的“北派五大家”中，李寿民以“奇幻仙侠”取胜，白羽以“社会世态”见长，王度庐、郑证因和朱贞木则分别以“悲剧侠情”、“武功技击”、“诡异奇情”凸现自己的风格。而武侠小说中最荒诞怪异的一流，当以还珠楼主为代表。1940年他的成名代表作《蜀山剑侠传》由正气书局出版，大受读者欢迎。据当时书局主人说：“在每一集出版的三四天内，一万册之数，一抢而空。早晨开门来，就有顾客望门而候了。”[1] 当年《江湖奇侠传》的风行，与书局的着力宣传大有关系；而《蜀山剑侠传》的畅销则纯粹是读者互传流布开来的，书局方面没有什么动作。还珠楼主的另一部《青城

[1] 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宇宙》，1948年第3期。

十九侠》，与《蜀山剑侠传》齐名，同样令读者着魔。

侦探小说

在清末民初的外国小说翻译热中，侦探小说占有绝对的数量，当时翻译最多的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有人作过统计，1902年至1918年，柯南道尔的作品一下子就译进了311部之多[1]。第一个按全集出版柯南道尔作品的出版社是中华书局，它于1916年5月出版了《福尔摩斯侦探全集》。该书至抗战前已出20版[2]，足见其畅销程度。

【1】汤哲生：《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208页。

【2】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329页。

国内作家从翻译到自己创作侦探小说，并出现了几位名噪一时的侦探小说作家。正宗的侦探小说作家中，最著名的是程小青，他曾被誉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程小青由翻译《福尔摩斯探案》进而模仿柯南道尔，设计了私家侦探霍桑与包朗。他的"霍桑探案"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霍桑"也几乎成为他的别名。另一侦探小说大家是孙了红，他由翻译勒白朗的《亚森罗苹案》进而模仿勒白朗，创作《侠盗鲁平奇案》，成为当时侦探小说中别出心裁的一家。或许因为侦探小说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中国的民族心理对侦探小说的喜好远不如武侠小说。此后它一直作为通俗小说的旁支，数量不多，远不能同武侠小说相比。

二、新文学畅销书

民国初年，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迫切希望掀去笼罩周身的陈腐气息，迎接一个新社会的到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科学的种子撒入民间，也呼唤着反映新思想、新观念的文艺作品的出现。新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17年，一些具有远见卓识之士揭开了新文学革命的帷幕，自此，新文学作品作为一股时代潮流，取得了蓬勃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新旧文学急剧抗争、相持不下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旧文学群体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在作品中输入时代内容，采用新的写作技巧，并以其固有的通俗倾向和追求畅销的特质，维

持着一个较为庞大的读者数量。从图书的绝对销售数字上看，旧文学作品的畅销程度，确要远胜于新文学作品。但新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与世界文学相趋近的文化潮流，以其观念的开放、形式的异变，依然在旧文学作品占据市场的环境下，取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地扩大着读者群。30年代是民国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候新文学作品已趋成熟，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巨著都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在反映爱国和抗敌这一点上，新旧文学显现出共同的趋向。

20年代的文坛，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文学作品纷陈迭出，因为新形式、新思想而致书籍畅销的，首推1920年3月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所著的《尝试集》。《尝试集》是白话体新诗集的首开先河之作，到1953年亚东结束为止，《尝试集》总印数达47 000册[1]。虽然胡适缺乏诗人的禀赋，《尝试集》的艺术价值也远远低于它的文学史价值，但作为新诗的开山之作，《尝试集》依然风行一时，胡适也无疑成为"第一白话诗人"。他的另一部著作《胡适文存》也很畅销，1921年12月15日初版，到1922年就印行了三版，总印数达12 000部[2]。

新文学作家阵营中影响最大的奠基人，则非文化巨子鲁迅莫属。在他的时代及在后来的时代里，鲁迅忧愤深广的《呐喊》总是那么深入人心、振聋发聩。《呐喊》也确以它深广久远的销售业绩，印证着鲁迅国民精魂的不朽形象。《呐喊》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列入《文艺丛书》出版，收入了他从1918年写的《狂人日记》到1922年写的《不周山》等15篇小说。1926年10月它又列为作者所编"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30年第13次印刷时，作者抽出其中的《不周山》，存作品14篇，成为定本，大量印行。收在《呐喊》中的《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是《呐喊》中篇幅最长、最有分量的小说，也是鲁迅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主人公阿Q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里具有独特光彩的"这一个"。

1921年7月，在后来文坛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创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

【2】吉少甫：《亚东图书馆的盛衰》，《出版史料》，1993年第2期。

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的流派特色比较显著，它们一出现，就以迥异世人眼目的姿态撼动着人们的心灵、观念和思想，促成其书籍的畅销。创造社大将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1年8月出版，初版后曾多次重印，1928年又修改再版。《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诗人一反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探究星空、拥抱地球、讴歌大海、赞美太阳，以狂放的大手笔、狂幻的境界及自由诗的形式，表现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及雄奇风格。诗中充满了“生的颤动”和“灵的喊叫”，使一时的诗风为之一变，堪称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作为泰东图书局“创造社丛书第三种”的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的第一本小说集。它于1921年10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它那率真得惊人的描写，依然令当时自以为已经经过一度启蒙的文坛瞠目结舌，毁誉不一。郁达夫注意人的情欲在表达人的内在世界中的重要性，试图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因此《沉沦》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很快一纸风行，在最初的两三年中，销量就达两万余册[1]。1921年11月10日，在距初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沉沦》就印行了三版[2]。郁达夫在本质上属于五四，他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感伤的风流。他的小说富于情绪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源于作者的忧郁，他的文人式的不乏夸张情绪的激愤，包括留洋在外感受屈辱结成的忧愤，回国经受贫病煎熬积存的忧愤，为替无数妇女、下层人民鸣不平而欲抒的忧愤。他的民族自尊、性苦闷和沉沦般的心底波澜，化为激愤控诉、大胆暴露，以及无顾忌的自虐自伤自悼的文字，激起广大青年心理的和审美的巨大共鸣，并引出了一个抒情小说流派。

在艺术观上与创造社同人大异其趣的，是颇受世人非议的张资平。他是创造社中一颗行踪无定、若即若离、并最终脱离轨道的流星。他早期的恋爱小说曾经表现了某些个性解放的思想，但不久就被三角、四角的陈套淹没。张资平生于广东梅县一个没落

【1】成仿吾：《〈沉沦〉的评论》，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30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2】陈子善：《研究〈沉沦〉的珍贵史料》，《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

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就五四一代小说家而言，他是最多产也是最复杂的一个，被人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家”。他写了24部中长篇小说，出了五本不重复的短篇小说集。虽然他的创作莠多于良，可在当时他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张资平著的、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2月初版的《冲积期化石》为现代文学最早的长篇，曾风行一时。该书对辛亥革命前后教育界、政治界和家庭制度的弊端有所针砭，对贫苦学生的求学生活深表同情，带有一定的民主倾向。1925年他写成长篇《飞絮》，转移创作重点，成为恋爱小说重要作家；到了30年代他成为新文学最早下“海”的作家。他的文学道路以脱离轨道作为起点，以媚世逐利作为转折点，以叛国附逆作为归宿点，所以尽管他的作品曾经很畅销，但人们对他依然是毁多于誉。

冰心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有名气的第一代女作家，也是极受欢迎的一位女作家。她散文笔致清婉雅丽，享誉极高，时人称为“冰心体”，很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与模仿。她的《笑》在《小说月报》上刊载后，学校竞相选入课本，语法学家把它作通篇句式读解，可见影响广大。《寄小读者》是冰心1923—1926年赴美留学期间为《晨报·副镌》“儿童世界”专栏写的29篇通讯的结集，1926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到1941年已发行至36版。阿英说：“特别是《往事》（二篇）《山中杂记》（寄小读者）以及《寄小读者》全书，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1]

朱自清是以诗人写叙事抒情小品，从而成为品位极高的散文名家的。他擅长写一种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无论是朴素动人如《背影》，或者明净淡雅如《荷塘月色》，从中都能感到他的诚挚和正直。他的散文意境细密、幽远、浑圆，气氛温柔敦厚，在20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的典范，销行极广。《背影》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初版后印行了10余版[2]。该文只是质朴地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但那不可言说的典型细节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多人著：《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中注入的是一股对劳碌奔波的老父的至亲深情，表现了小资产者一生颠簸挣扎的可悲命运。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无数身受飘零之苦的人，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此篇能那样长久地打动读者了。

历经20年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及过渡，到30年代随着国难当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深化，人们渐渐能够比较清醒而冷静地思索国家、社会及个人的许多重大问题。冷静思索之后是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各种社团纷纷成立，一些影响巨大的流派形成。30年代是民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也十分明显。上一个时期的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者市场的“海派”所分割。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巨著，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几乎都在这一时期产生。这些作品具备思想内容深刻、表现技巧高超、社会影响巨大且销售业绩优良的特点，形成畅销性、艺术性、思想性交相辉映的璀璨局面。

此前不久，也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坛曾兴起一股“革命罗曼蒂克”风，由于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情绪，颇激动了一大批正在苦闷彷徨的青年的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文学冲击波。蒋光慈、胡也频、洪灵菲的小说都是30年代初的畅销书。据统计，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曾印了6版；洪灵菲的小说当时虽经政府查禁，但都非常畅销，像《转变》就印了7版，《流亡》6版，《归家》3版，《前线》再版[1]，就当时来说，这样的销量已经是很难得了。1933年左联对左翼文艺中普遍存在的幼稚的罗曼蒂克倾向，尤其是“光赤式的陷井”——“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进行了反省和批判。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否定，早期的左翼文艺创作逐渐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由此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茅盾是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艺术风格以“都市生活世界”著称。《子夜》是他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时代性的巨著，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三个月内重版4次，

【1】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647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初版3 000部，此后各次重版都是5 000部，这在当时，实属少见。除了爱好新文学的广大青年学生争读《子夜》外，据当年主持大江书铺的陈望道说，读者中间还很有一些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她们从来都不大爱看新文学作品，现在却争着看《子夜》了[1]。《子夜》引起的社会轰动及其在社会上的畅销，由此可见一斑。瞿秋白曾称誉它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2]。说到《子夜》成功的原因，诗人萧三认为它"正确回答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进步分子所感兴趣的问题"[3]。

老舍的家族在清朝八旗制度中系属"正红旗"，老舍的作品则以"北京小市民世界"独具一格。《骆驼祥子》是老舍30年代最出色的作品，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9年3月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后又多次重印。因为读者甚众，三四十年代，《骆驼祥子》的盗版书已相当多，特别是沦陷区的东北，更有不少公开的盗版书出版[4]。

在30年代的艺术画廊中，巴金小说所创造的"热情忧郁的青年世界"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他是写中长篇小说"三部曲"的专家。在他的三部曲中，《激流三部曲》规模最大，影响最著；而《激流三部曲》中又以《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家》于1931年4月18日在上海《时报》开始连载，时名《激流》，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单行本时始名为《家》。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后数十年，人们阅读这部小说的热情长盛不衰，评论它的文章数以百计，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畅销书"[5]。王易庵对于其受欢迎的程度曾有这样的记述："《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借以号召观众了。"[6]

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具有混合气质的城市，从旧时代的繁荣直接触接上现代的西方文明。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

[1]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1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2]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2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1604页。

[4] 朱金顺：《〈骆驼祥子〉版本初探》，《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

[5] 司马长风：《新文学丛谈》，117页，香港，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

[6] 王易庵：《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杂志》1942年第6期。

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就是因刻意表现现代社会的光怪陆离而名声雀起的。这新感觉派小说之“新”，在于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新感觉派小说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联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重要的一个阶段。从这时起的海派小说，一直是畅销书文学。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和“鬼才”的穆时英，为一时风行的海派作家。他的影响当时就十分显著，所谓“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一时风靡上海滩，从先锋型的大牌刊物，到商业性的画报、小报，都可见模仿他的文字。穆时英连同他的文字，都带有传奇性质。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洋场小说家。他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式，来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众声喧哗。他的作品所渲染的带有潜在哀婉抒情气息的现代都市文明，使读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认同感，于是《公墓》、《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畅销一时。

抗战爆发后的十余年时间里，读者的喜好发生着奇异的嬗变：虽然他们依然欢迎旧派小说，但他们更为富有刺激性的新派表现手法所吸引。徐訏和无名氏是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与先锋两栖作家，他们的小说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中，并受图书市场的影响，投合东南沿海一带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习惯。徐訏的《鬼恋》1936年写出，在后方及上海都大为风行，7年内印行了19版。到1943年发表长篇小说《风萧萧》，一纸风行，当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该年被称为“徐訏年”[1]。无名氏继徐訏之后，一度成为浪漫爱情小说的畅销书作家。抗战时期他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大获成功：前者名列当年畅销书榜首；两书一两年内在全国各地翻版达23种，三四年内各种合计印行100版以上[2]。

张爱玲则以一部《传奇》，成为上海孤岛沦陷后的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传奇》初版于1944年8月15日，由上海杂志社发

【1】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18页。

【2】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20页。

行，共收小说10篇，初版本一经出版便很快被抢购一空，9月25日即再版。张爱玲在文坛的出现，即如久已尘蒙的疲乏视线中忽然闪现一座异地的庭园，所有的眼光都被她吸引。当时专搞文艺批评的傅雷按捺不住对此文学景观的惊叹，称之谓“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1] 她的作品既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褒扬，又赢得普通读者层的青睐——“张迷”现象，可见一斑。张爱玲的崛起，既与她华美绚丽的极富现代气息的表现技巧有关，也与她独辟蹊径的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有关；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她所表现的现代化的华美包装下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她的小说和散文都在40年代的文坛产生过轰动效应。

在“雅俗共赏”这一点上与张爱玲小说具有些共性的，在沦陷的上海有苏青，在北方的沦陷区有“南玲北梅”的梅娘。苏青因大量直言不讳大谈男人、女人和性的杂谈，以及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而名噪一时，成为少有的畅销书作家。抗战胜利后，因为某些报刊痛骂她为“性贩子”，她的作品反而愈发流行开来。到1948年底为止，《结婚十年》竟印行了18版、《续结婚十年》4版、《浣锦集》10版、《逝水集》3版[2]。她的趣味是务实不避实利，俗气但不失真诚。她的世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喜欢，但俗中又带了点无意的隽逸，不至混同于一个老百姓，这也是她与富于幻想的市民容易取得共同语言的地方。

与海派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截然不同的是当时中国另一种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一穷二白，受尽人世凌辱与苦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依然朴实真挚、乐观而勤劳地生生不息——他们是“下里巴人”。但每个人心底都清楚：他们是社会生力军中最稳健、最纯朴、最伟大的一群。因为有这样的劳苦大众，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李家庄的变迁》的畅销就不难理解了。赵树理的语言最农民化了，土得掉渣，却句句都有打油诗逗乐子的效果。农民的质朴、农民的开朗、农民的苦中作乐、农民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就是那样琅琅上口又表露无遗。因为赵树理讲述的内容及他没有经过“文明化”的语言，最初书店并不敢发

【1】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50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2】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519页。

行它；但由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笔题字出版后，也正是他这样接近农民生活的语言和内容，让农民了解、看得懂且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内容，促成了赵树理的成功。赵树理的作品是最纯正的农民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家：愚昧、苦涩、封闭得令人讨厌，却又热络、喜笑颜开得令你忍俊不禁。因为那就是农民，那就是生活。1943年9月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不胫而走，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售了三四万册，创下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纪录。直接翻译这部作品的有约三十个国家。美国人西里尔·贝契这样谈到它："《小二黑结婚》发表了，人们高兴地读着它：这就是回答，这就是令人满意的文学。他们大声地读给农民听，农民欢迎它的那种激动情绪，就像一个女人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一样。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他们自己的儿女和熟悉的人，他们被带进对他们来说全都很熟悉的情节中……由它改编的民族歌剧的演出，遍及解放区各地。"[1]

40年代在上面论及的两极之外，当然还有一批贵族式的名士依然雍容自若。1949年正中书局出版的《雅舍小品》，收梁实秋于1940—1947年写的小品34篇，"自它问世以来，风行于世，已发行50余版，创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发行之最高纪录"[2]。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这样的业绩，在东方欲晓夜色犹酣的解放战争期间，实在是给出版家提供了一个足以令人欣慰的成功出版案例。

[1] 陈荒煤等著：《赵树理研究文集》，1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2] 黄修已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40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三、译著的畅销

自从中国门户洞开，意识到自身的封闭与落后之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很注意翻译引进传播西方文明的外文书籍，以促进中国向世界化的转变。这些翻译书籍中有许多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深深触动着中国人的心灵。

民国时期的翻译作品中，亚米契斯所著的《爱的教育》，前后两个译本都很畅销。此书最早译名为《馨儿就学记》，译者包天

笑。包的翻译是意译加创作，塑造人物细致生动，文字流利，从容描绘，有“纾徐为妍”之致。包译本销路颇好，1926年7月已出至第8版，这在当时的教育小说中是破纪录的。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仍在重印，前后达18版之多。译名为《爱的教育》的是夏丏尊译本，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0个月后就再版，两年半的时间里重印5版，1935年11月编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时已达20版之多。1938年经夏丏尊修订，至1949年3月共发行修订版19次，外加1942年8月的成都一版，王知伊称此书当时“各地小学都采用为课外辅助读物，十余年中，印行达一百版左右”[1]。《爱的教育》谱写了中国翻译出版史上一页灿烂的篇章。堪与开明书店《爱的教育》并步比肩的，是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推出的林雪清、章衣萍合译的《苦儿努力记》。这是一部孩子们喜爱的读物，印销历年不衰，一年余就连出4版，至1948年6月共出23版之多。

【1】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100页。

1922年4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立即产生巨大的轰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中国青年，在洋溢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找到了知音。一年余就连出4版，1924年8月出第8版，到1930年8月，泰东等书局先后印行达23版。据1932年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本就由不同书店重印达30次之多。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马立安·高立克认为，此书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2]。

【2】马立安·高立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20年8月，北京晨报社出版了《杜威五大讲演》，这是影响最大的杜威讲演集译本。同年9月即再版，1921年在杜威尚未离开中国之前，就已出至10版以上，中文译本在两年内再版过13次，每版印数高达一万本[3]。另外，1922年商务推出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毫无疑问应置于畅销书之列。它初版后几乎年年再版，1926年已出4版，1933年国难后再版，至1939年5月又出4版之多。

【3】周策纵：《五四运动史》，32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年。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部轰动世界的书。作者根据自己已有的七年记者经历，1936年6月

至10月，不畏艰险，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谈，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并以迷人的明快笔触，报道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和在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听到的一切，成为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性读物之一。1937年出版后的几周内，就销出十几万册，三个月内英国就印了5版，打破了有关远东时局畅销书的最高纪录。该书在中国也同样畅销，1938年初版即告罄，以后接连数版，仅在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本；各种印本总计有20多种[1]。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的政治学力作《天下一家》抗战时期曾经轰动一时。它的复译本之多在中国是惊人的，仅沈炼之和郑庭椿的合译本，两年时间内在福建一地就销出5 000册[2]，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1】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的一百种译作》，40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2】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的一百种译作》，416页。

四、其他领域的畅销书

革命书籍的畅销。20世纪20年代，有些革命书刊，由于内容进步、印刷讲究，并结合当前形势和思想实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如恽代英、蔡和森编，上海书店出版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工具的事实。该书1924年初版，1925年再版，此后不到半年就印了6版，同年9月印行第8版。又如《向导丛书》和《不平等条约》，直接配合了当时的五卅运动，一印就是10万册，对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浅说》，薄薄42页，简明地介绍了什么叫资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四个问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25年3月印第一版，同年12月印第8版[3]。

【3】曹予庭：《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史料》1982年第1辑。

“一折八扣书”的畅销。上海在抗日战争以前，约1930年至1937年间，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翻印我国传统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之类，亦有古典文学的单行本，名目多至三四百种，极廉价地大量供应给读者，在书业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一折八扣书”浪潮。1935年广益书局与新文化书社的出版

物，由于价廉，贩卖者有厚利可获，以二折批去，五折六折卖给读者，利润在二倍以上，惊为奇迹。因此营业发展，无远弗届。各省各埠，同业汇款来批书的日益增加，每天盈千上万，日夜装箱打包，总是如办喜庆，忙个不停，且因来不及印造，销货常常断档，这是书业界空前未有的盛况，也是书业中不正常的繁荣。

知识性读物的畅销。20世纪20年代中叶，世界书局出版、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曾风行一时。张仲实主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为青年提供各科辅导读物，约请专家学者撰稿，深入浅出，每册三到五万字，每辑十部，先后出了三辑，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风行全国，总印数在100万册以上[1]。艾思奇在1934年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大众哲学》，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这本书很流行，初版五个月内就印了四次；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发行了2万册；到1948年12月已印行了32版[2]。另一本可与《大众哲学》相媲美的，是薛暮桥著的《经济学》。《经济学》原是著者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编写的教材，后来在新四军中曾广泛流传。由于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经新知书店公开出版后，同样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因之不断重版，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印了多少次。生活书店出版的苏联里昂吉叶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为了适应读者需要，同时也为了竞争，采取翻译一章发排一章的做法，很快出版，成为畅销书[3]。

与政界要人有关的图书的畅销。1933年成立的民国以来最大的官办书局正中书局，在其成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出版了许多小读物。其中蒋介石与宋美龄合著的《西安半月记》传遍全国，销量达百万册[4]。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客为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将其崇拜的清代曾国藩著作汇编《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印行此书，销路也不少。其他如古今社出版的周佛海回忆录《往事矣》，销售极快，再版10次[5]。

[1] 赵晓恩：《抗战前的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史料》1993年第1期。

[2] 艾思奇：《大众哲学》，3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3] 赵晓恩：《抗战前的上海生活书店》。

[4]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62页，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

[5] 张煜明编著：《中国出版史》，433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

第五节　丛书的出版

丛书是一个古老的图书出版门类，在我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民国以后，人们对丛书的认识日益加深，丛书的地位日益提高，对社会、读者、出版者的影响不断扩大。以汇集群书为归旨的丛书，具有“部头大”、“品种多”、“价格廉”的特点。这样一种特点，便于读者系统性地获取某方面知识，收藏某方面文献，且价格往往比单行本经济实惠，因而受到读者欢迎；对出版者而言，丛书集束性推出，更易建立声势，扩大影响，创立品牌，赢得声誉；若经营得法，往往就是一笔大收入，因而亦被出版者所看重。民国时期丛书出版数量远迈前代，有学者根据《中国丛书综录》及其《补正》和《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作过不完全的统计，民国时期丛书总数当在6 400种左右，超过了历代出版丛书数目的总和。（见下表）

【1】贾鸿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6期。

民国时期各年度出版丛书统计表[1]

年份	丛书数量	年份	丛书数量	年份	丛书数量	年份	丛书数量
1912	13	1922	64	1932	172	1942	197
1913	20	1923	71	1933	288	1943	207
1914	23	1924	74	1934	233	1944	217
1915	41	1925	122	1935	261	1945	180
1916	28	1926	106	1936	320	1946	269
1917	29	1927	118	1937	236	1947	313
1918	30	1928	168	1938	221	1948	292
1919	31	1929	233	1939	234	1949	185
1920	37	1930	213	1940	269	年份不详	427
1921	54	1931	192	1941	260	总计	6 35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37年前的丛书出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抗战前的十年，正是我国出版业的黄金年代，如日中天的

丛书出版，亦是其重要表征之一。1936年出版丛书多达320种，为民国出版史上的最高峰。许多大部头的有影响的丛书都出版于这一时期。抗战以后，出版业受损，丛书种类虽还维持着一定数量，但大部头的丛书已大为减少。

从丛书发展历史来看，清代的丛书已表现出综合化和专门化两个方向，民国时期的丛书在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基础上，继续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形成综合性丛书与专科性丛书齐头并进的局面。综合性丛书大多具有卷帙大、收书多的特点，在出版上，需要投入较高的先期成本。大书局经济实力雄厚，出版大书正是其优势所在，扬已所长地出版了不少综合性的大丛书。如商务印书馆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一、二集，1932年开始出版的《大学丛书》；中华书局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1934年开始出版《新中华丛书》和《中华百科丛书》；世界书局1928开始出版的《ABC丛书》；新生命书局1933年开始出版的《新生命大众文库》；生活书店1936年开始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等等，都是综合性丛书的代表。

当然，民国时期出版得更多的还是各类专科丛书。各大小书局、各文化团体、各党派组织、各学校机关所出版的形形色色、名称各异的专科性丛书，涵盖到各种学科，涉及到多种领域。著名者如：哲学类的如世界书局1934年开始出版的《哲学丛书》；宗教类的如佛学书局1931年开始出版的《佛学小丛书》；心理学类的如世界书局1935年开始出版的《心理学丛书》；政治类的如中华书局1937年开始出版的《现代政治丛书》；法律类的如大东书局1931年开始出版的《暨南大学丛书》；文化类的如商务印书馆1936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图51)；文艺创作类的如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开始出版的《文学丛刊》；文学资料类的如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各专科丛书，有的内容通俗，有的学理艰深，满足不同读者对象和不同编辑意图的需要。民国时期专科性丛书出版的繁荣，反映着当时文化学术向纵深化、专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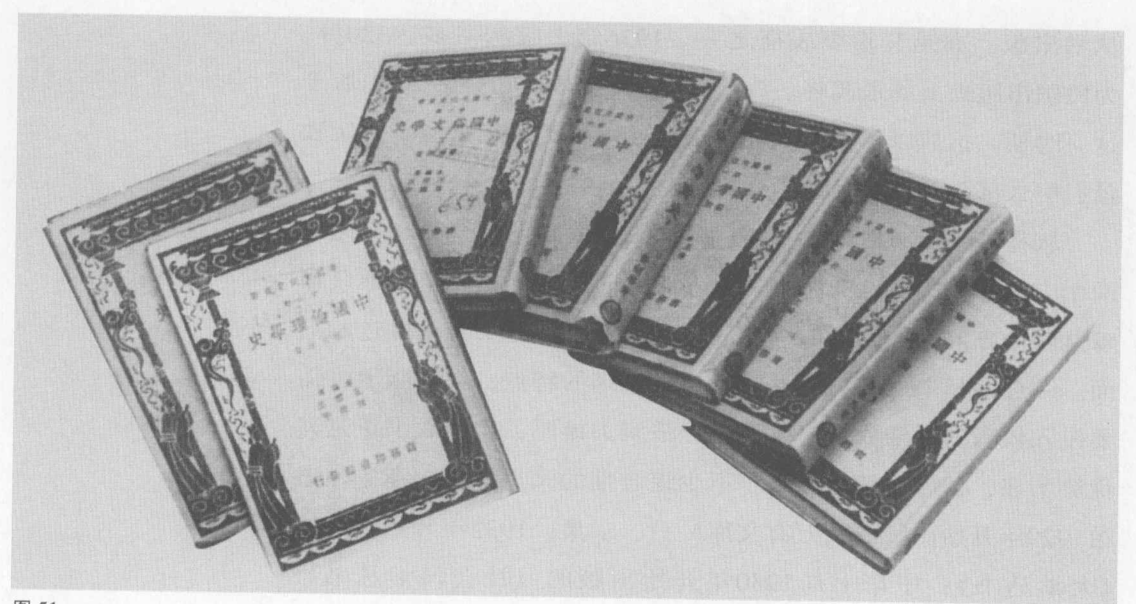


图 51
《中国文化史丛书》

同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结构相一致，丛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也很不平衡。总体来讲，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丛书比重，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而人文社会科学中，又以文学、教育类丛书的出版为多。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丛书，比较而言，医学和农学显得较为突出。丛书出版学科分布的不平衡，是学术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我国古代人文科学即独擅胜场，此时是绍其余绪；自然科学研究虽然也有较大进步，但由于起点低，仍无法和人文科学抗衡。文学和教育类丛书的丰富，则是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及大批课本、读物、教学参考书等的出现相一致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正站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以整理审视国故为前提的古籍丛书出版和以吸纳融合新知为意图的翻译类丛书出版，可谓双峰对峙，蔚为大观。有关古籍丛书出版，我们后文有关章节中将有专门叙述，此不赘。而翻译类丛书，特别是外国名著的译介，是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重要特色之一。有人曾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冠以"世界名著"之名的丛书作了普查，资料如下：商务印书馆1928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上海新文化学会1928年的《世界名著提要丛刊》，世界书局1929年的

《世界名著丛书》，上海春潮书店1929年的《世界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29年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神州国光社1930年的《世界历史名著丛刊》，启明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上海春光书局1934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的《世界名著丛书》，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启明书店1937年的《世界短篇名著丛刊》等[1]。这些名著丛书，翻译的质量固然有好有坏，但若从所被选介的外国作品本身来看，很多称之为“名著”是名至实归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翻译出版的内容质量。而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潮流中，最有系统、最有计划的出版活动，要算生活书店1935年开始出版的《世界文库》了。《世界文库》由郑振铎任主编，在他的号召下，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当时许多著名翻译家的有力支持，参加该文库编译委员会的作家、翻译家多达百余人，被认为是“全国作家的总动员”、“1935年的伟大工作”、“文学家技巧上修养的宝库”、“大众的文粮”[2]。第一集刊出的62种外国文学名著，囊括了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波兰、希腊、挪威、比利时、罗马等十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库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名著的经典范本。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愈之、茅盾、谢六逸、朱光潜等，都对该丛书的编纂，表示了由衷的赞叹。

【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174页。

【2】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176页。

丛书的出版，作为一种出版运作方式，往往是出版者对时代感应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亦不难从各个历史时期丛书出版的选题走向上，感受到时代脉搏跳动的文化信息。比如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科学研究获得较大发展、取得较大成绩的年代，所以这一时期有代表学术成果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一批丛书的问世。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一场反法西斯大战，中国是世界战场的一部分，整个中国，不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都笼罩于全民族的抗战之中，战争成为一个时代各阶层人士的中心话题。世界的局势、战争的前途、政府的政

策、各战场与大后方的情况、中国的与日本的情况，乃至作战的基本常识等等，都是人们所关心和渴望了解的，这时急需提供这些知识和宣传抗战、激励民族精神的书籍。1938年出版的关于时事和抗战救国的丛书便应时而生，多至百余种，占到年度丛书出版总数的一半以上[1]，印证了丛书选题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1】贾鸿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特点试析》，《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6期。

第六节　《万有文库》的出版

《万有文库》（图52）是民国出版史上最大的一套现代普及性综合丛书，也是商务主持人王云五出版生涯中引以为骄傲的编辑规划之作。1921年王云五在胡适的引荐之下，进入商务印书馆，并主持编译所工作，在随后的七八年时间里，陆续编印了《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农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以及《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涵盖多种学科的、具有入门性质的新知识小丛书，从而改变了商务以往所存在的"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的状况[2]，适应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对新学的巨大需求。而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以这些已出版的丛书为基础，再增补一些新编的内容，汇集而成。

【2】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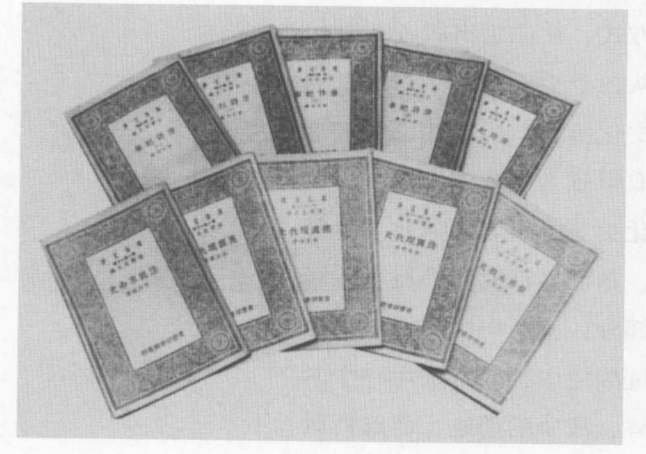


图52
《万有文库》

一、《万有文库》的编印缘起

若从编辑的角度来说，《万有文库》因为前有基础，凭借商务的编辑力量，汇编起来倒也不算是什么难事。问题在于，作这种积沙成塔式的大型出版策划，预期的收益固然可观，但由于编印成本高昂，风险也同样十分巨大。作为出版者，

不能不从市场和商业的角度考虑，谁将会是这套特大丛书的现实购买者？王云五在《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中这样写道：

> 图书馆之有裨文化，夫人而知，比年国内图书馆运动盛起，而成绩不多遘。究其故，一由于经费支绌，一由于人才缺乏，而相当图书之难致，亦其一端也。……
>
> 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之。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故由本文库而成立之小图书馆，只须以认识号码之一人管理之，已觉措置裕如，其节省管理之费不下十之七八。前述三种之障碍，或可由是解决乎？

可见，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的目标所向，是针对各地蓬勃兴起的图书馆。从近代图书馆史来看，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虽然发轫于20世纪初，但真正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1/3用来建设图书馆，图书馆运动由此而起。192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又通过了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每年从全校经费中提出5%以上的数额作为购书经费的议案。该议案的提交者正是当时作为专家身份参加会议的王云五。会议甫结束，商务印书馆就设宴招待全国教育会议的会员，一方面是感情联络，加强与教育界的联谊，另一方面也是通报出版消息，加强信息的彼此交流与沟通。就在这次宴会上，王云五发布了出版《千种丛书》以供应图书馆的消息[1]。这个计划中的《千种丛书》就是后来出版的《万有文库》的初拟名，“即并合各科丛书一千种，为一部综合的大丛书”，后来考虑到预先限定千种之数，会使今后出书受到限制，便改定为

【1】《申报》，1928年6月2日，《教育消息》栏目。

[1]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万有文库"，寓含"包罗万有"之意[1]。

我们说，图书馆建设是国家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王云五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所提交的有关建设全国图书馆的议案，对促进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这是作为图书馆家的王云五，对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之一；而一身二任同时又作为出版家的王云五，能敏锐地从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中，及时地找到新的出版商机，有意识地把出版活动和图书馆发展中的现实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系统的图书供应、方便的图书管理、优惠的图书价格等措施，实实在在地为图书馆服务，并在服务中获得合理的出版经济利益，则体现了王云五在商业上精明的一面。

二、《万有文库》的出版概况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万有文库》第一集于1929年问世。该集总编纂人为王云五，分编纂人为何炳松、刘秉麟、段育华、程瀛章、顾寿自、李泽彰、庄适、冯雄、高卓、黄绍绪、华超等。各科丛书共1 010种，共1.15亿字，其中包括正编内容约1亿字，计书1 000种，2 000册，约12万页；大本图书10巨册，内容约1 500万字。其内容构成如下表：

	丛书名	种数	册数
正编	国学基本丛书初集	100	900
	汉译世界名著初集	100	300
	学生国学丛书	60	60
	国学小丛书	60	60
	新时代史地丛书	80	80
	百科小丛书	300	300
	农学小丛书	50	50
	工学小丛书	65	65
	商学小丛书	50	50
	师范小丛书	60	60
	算学小丛书	30	30
	医学小丛书	30	30
	体育小丛书	15	15

续 表

重要图谱	《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国民政府法令大全》、《国际条约大全》、《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历史名人卒年表》、《中国形势一览图附说》、《世界形势一览图附说》	各1册

《万有文库》第一集于1929年5—8月发售预约，全书按计划分五期出齐。第一期书出版于1929年11月初，第二期书出版于1930年9月底，第三期书出版于1931年7月中旬，第四期书出版于1931年12月底[1]，当第五期书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商务印书馆遭遇了毁灭性的“一·二八”之劫，许多正在编辑和排印的书稿化成纸灰，第五期书的出版被迫延期。商务复业后，一边整理余烬，一边再次征稿，到1934年12月底，终于将剩余的部分全部出齐。

《万有文库》第一集初版即印5 000套，王云五以为“如此大规模而有系统之丛书，售价如此低廉，确系空前之举”[2]，销路上不应存在问题，而当《万有文库》正式向社会发售预约后，没想到犹豫观望者居多，实际购买者较少。这一现实不幸被商务机要科副科长盛桐荪所言中。当初在商务最高层会议——总务处会议上决定该书印数时，“列席之盛桐荪君认为似属过多”[3]。王云五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悉浙江省财政厅动用一笔公款，一次性地向商务印书馆订购了80余套《万有文库》。这事启发了他，于是动员商务印书馆各分馆，向所在地的省教育厅或其他主管机关直接推销。这一营销策略果然十分对路。各省划拨公款订购的，少则50套，多则近200套。而那些私人藏书家亦闻风而起，纷纷订购，到预约期满时，《万有文库》已订出6 000余套，超出预定初版数1 000多套。商务临时增加印数，到最后，《万有文库》第一集总共销出了8 000套。有了第一集的成功作基础，第二集便顺理成章地跟着推了出来。

【1】分别见《申报》1929年11月2日，1930年9月24日，1931年7月15日，1931年12月31日，1933年12月31日的广告。

【2】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2页。

【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2页。

第二集的总编纂人还是王云五，分编纂人则为何炳松、傅纬平、周昌寿、丁瞉音、苏继庼、张天泽等。第二集正编700种，分装2 000册，规模与第一集相当，合计页码也是大约12万页。大本参考书2部，分装26巨册，附索引2巨册，共约1.4万页。从内容上看，《万有文库》第二集是第一集的继承与发展，"相同者原以竟未竟之功，相异者自以弥以往之阙"[1]。在第二集中，加大了《国学基本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的分量，分别由100种增至300种和由100种增至150种。此外，以《自然科学小丛书》和《现代问题丛书》取代第一集的农、商、医等11种小丛书。其内容构成如下表：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3页。

	丛书名	种数	册数
正编	国学基本丛书二集	300	1 200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二集	150	450
	自然科学小丛书初级	200	300
	现代问题丛书初级	50	50
参考书	《十通》	21 巨册	
	《佩文韵府》	7 巨册	

《万有文库》第二集于1934年10月1日起发售预约，正编同样分五次出齐，分别为：第一期书于1935年3月底出版，第二期书于1935年10月初出版，第三期书于1936年4月初出版，第四期书于1936年10月中旬出版，第五期书于1937年5月上旬出版[2]。

【2】分别见《申报》1935年10月1日，1936年4月2日，1936年10月13日，1937年5月9日的广告。

按照王云五的想法，《万有文库》有了第一集、第二集，随后还会有第三、第四、第五集的相继刊行。然而，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彻底粉碎了他当初的计划。战争中，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之严重，编辑力量之分散，以及全国读者购买力之下降，都不允许有像《万有文库》这样大规模丛书的编辑与印行了。不过，在抗战初期，善于利用原有出版资源的王云五，曾从《万有文库》两集中，精选图书500种，计1 200册，编辑了《万有文库简编》，并出版和发行。《万有文库简编》算得上是《万有文库》的副产品，只是在战时环境下销量并不十分理想[3]。

【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5页。

三、《万有文库》的特点、评价及影响

商务印书馆曾在书业广告中以“中外两大丛书”之名，将《万有文库》和《大英百科全书》相提并论[1]，又“以人类全部的知识为范围，以系统的编次为标准”，向公私藏书机构和广大读者作号召。诚如商务在宣传中所言，内容百科齐备，系统性强，确是《万有文库》这套大型丛书的一大特点。若用现代图书馆分类法来划分，《万有文库》所涵盖的学科有哲学、社会科学总论、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国家与法律、军事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综合性图书等16个大类。每一类书一般按照方法论、中国相关著作、国外相关著作、该类别中各领域重要著作等次序来选择和组织书稿，既有较完整的学科系统性，又有较严格的逻辑层次性。

[1]《申报》，1929年8月4日广告。

《万有文库》除了第一集中的“重要图谱”和第二集中的“参考书”，属于装帧精美豪华的煌煌巨著外，正编中的4 000册均为既轻且薄的短小书。两集的页码总数均为12万页，平均计算下来，每册的厚度在60页左右。字数少的书在万字上下，字数多的也很少超出10万字的范围。如此轻薄短小的书，当然不会是什么高深的专著。文字通俗，内容浅显，是《万有文库》这套大型丛书的又一大特点。丛书主旨“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因而其指向的读者对象也就是一般的普通读者。丛书从人类已有知识中挑选出适合出版要求的题材，以单本书为单位，或是以一门学科，或是以一个领域，或是以一个专题为题目，用通俗的文字，浅显的表达方式，传播普及性的文化知识。丛书出版后受到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的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32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内政和教育两部专门为《万有文库》一书，颁布了第8322号令，训令各省市民政教育当局转饬所属县市政府务须购备一部，以充实地方馆藏。这一训令的颁行，

固然是商务印书馆业务公关的结果，但也与《万有文库》本身适合馆藏，尤其适合普通图书馆馆藏大有关系。那种“非以一地方一图书馆为对象，乃以全国全体之图书馆为对象，非以一学科为范围，乃以全智识为范围”的出版方针[1]，那种2 000余册总售价不及300元的低廉价格[2]，那种全套版式一律便于插架的图书装帧[3]，那种在每本书上加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号并附送分类书名著者卡片的服务措施，无不体现了《万有文库》对图书馆收藏和使用要求的周到考虑。服务于图书馆，正是《万有文库》的第三大显著特点。

【1】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88页。

【2】《万有文库》第一集预约定价为360元，而由各省教育厅等机构代为集体订购的，又在原价基础上打折，实际全套书的价格不到300元。

【3】两集正编的开本尺寸均为，长6寸又8分之7，宽4寸又8分之5，两集的封面除了颜色略加区分外，其余的图案等一律相同。正文用纸两集也一样，均用60磅道林纸印刷。

《万有文库》问世以后，社会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批评激烈者如鲁迅，便认为《万有文库》的出版，不过是出版者耍弄的一种花样翻新，是“书的还魂与赶造”。他曾以此为题著文批评道：“……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知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有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花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凡留心于文化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4] 鲁迅希望出版者多向社会提供文化精品，这种要求无疑是十分正确合理的。但平心而论，鲁迅对《万有文库》的批评也是一家之言，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颇之处。《万有文库》数千册的一套大型丛书，其中确实不乏“克日速成”，甚至是粗制滥造的书稿，但总的来说，《万有文库》的编辑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为了编好这套大型丛书，商务印书馆专门在编译所内成立了“万有文库组”，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予以高度的重视。《万有文库》出版速度确实称得上快，但出版速度快也可理解为出版效率高，不见得就是“赶造”。《万有文库》所做的编辑工作，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原来成品的重新整理与汇编，但称其为“还魂”，似乎也是贬责过多。从实际情况来看，《万有文库》的整理与汇

【4】鲁迅：《书的还魂与赶造》，《且介亭杂文二集》，180~181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

编，并非仅仅将历年出版的各种小丛书照单全收，而是“存精去芜，并严定系统，尚缺各题，迅予补编”[1]。《万有文库》第二集的选辑更显得慎重与讲究方法。《国学基本丛书》以十三种国学入门书目为客观标准，斟酌损益，三易其稿，结果“三百种中未见于各家入门书目者只有十四种”。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遴选也不容易，除了参考各国书评外，还结合中国读者的特殊需要，“取舍之间，亦实经长期间之探讨也”[2]。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1~112页。

【2】《申报》，1935年3月31日广告。

《万有文库》虽然是治学门径性质的丛书，但为其著译者，颇有不少是国内外各科专家，如胡适、何炳松、叶绍钧、沈德鸿、竺可桢、刘秉麟、范寿康、郁达夫、冯承钧、冯友兰、周建人、陶希圣、傅东华、周佛海、陶孟和、梁启超、姚明达、周鲠生、胡愈之、樊仲云等等。另外，蔡元培、胡适、何炳松、王世杰、吴敬恒、刘秉麟、马寅初、邵元冲、杨杏佛、朱经农、张乃燕、张亦农、吴泽霖等人还为《万有文库》的某些图书担任了具体的校对工作[3]。这里的“校对”类似于今天的审稿，具有质量把关的性质，这些都保证了《万有文库》书稿的质量。《万有文库》继第一集发行了8 000套之后，第二集也发行了约6 000套[4]，如此大的发行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对丛书质量的认可。国民政府内政和教育两部专门颁布的第8322号令，多少也暗含了官方对丛书质量的肯定。

【3】《万有文库》相关图书封面或封底上著录的信息。

【4】王建辉：《文化的商务》，110页。

以“植普通图书馆之基”为预期出版目标的《万有文库》，其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充分体现在图书馆建设方面。它凭借其庞大的出版规模，有效地充实了各地图书馆的馆藏。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的介入和推动之下，因为购买《万有文库》而在全国建立起来的新图书馆数量，竟然达到千所以上[5]。一套书的出版如此巨大地推动了一种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新建立的图书馆所分布的地区，大多又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现代文化知识“春风不度”的地区，而《万有文库》的进入公藏，对于“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文化影响力深入于民间产生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很

【5】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432页。

难用具体的数字来进行统计的。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万有文库》准确的市场定位，化零为整、贯串成珠的编辑方法，高效率、大手笔的运作方式，强有力、有针对性的图书宣传等，都堪称近代出版的杰作，成为后世效法和试图超越的高标。20世纪60年代，王云五从政坛退出后重掌台湾商务印书馆，为扭转该馆经营不善的局面，再次辑选了《万有文库荟要》。《万有文库荟要》是对《万有文库》的增删并补，共计1 200册，推出不到一年即售出大半，令台湾商务重振声威，士林为之刮目相看[1]。台湾版的《万有文库荟要》，可看成是《万有文库》的直接延续。而在大陆，20世纪60年代初，胡愈之牵头规划的《知识丛书》；70年代末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从“文革”中恢复业务后提出搞“保留书目”的出版计划；90年代末，辽宁教育出版社编纂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或是以《万有文库》为蓝本，或是以《万有文库》为超越目标，或是干脆以《万有文库》为直接效法对象[2]。这些后世的出版行为，都是《万有文库》这部大书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影响绵绵不绝的表现。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1~112页。

【2】王建辉：《文化的商务》，112~113页。

第九章　教科书出版

第一节　现代教育的发展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教育近代化是19世纪下半叶拉开序幕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不是源于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归因于亡国灭种这一外界压力的强力推动。20世纪初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制度因之被确立，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学堂的大规模兴起，标志着新式教育的飞跃式发展。根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 888所，学生1 024 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47 795所，学生数达1 300 739人，1909年学堂数59 177所，学生数达到1 639 641人[1]。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1912年1月5日，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在政体变更、百业待兴的相对紊乱时期，蔡元培与教育界的志士仁人一起，致力于肃清封建专制教育的流毒，废除了清廷学部颁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代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德、智、体、美兼顾的教

[1] 转引自王余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育宗旨[1]；改革了旧日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壬寅、癸卯学制，代之以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壬子、癸丑学制；废除了旧时各级各类学堂的读经讲经课和忠君尊孔的教学内容，代之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需要的自然科学和实用课程。另外，在学校名称、修业年限等方面都做了大的变动。

民国初年全国上下“揖欧追美，旧邦新造”的方新之气[2]，兼之蔡元培在教育上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民初迎来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二次兴学高潮。1912年全国各类学校87 272所，学生2 933 387人；1914年学校数即增至122 286所，学生数增至4 075 338人[3]。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后因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的需要在教育上掀起了复古主义的逆流，加上随后“二次革命”及军阀割据混战等战争因素的巨大影响，而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辛亥革命终究宣布了封建教育的覆灭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奠定。

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这一时期，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制度大量引进中国，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从酝酿到实施，历时7年，在全国范围内反复讨论、修改，集中了当时教育界的智慧，是力图与国际教育和现代化潮流接轨的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壬戌学制仿美国“六三三制”，规定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修业年限分别为六年、三年和三年。它结合中国地方差异大的国情，富有弹性，兼顾学生的升学与就业，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壬戌学制是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现代学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胡适等倡导的，用通俗的白话文取代难学的文言文，它代表了普及教育、发展科学的时代需要。经过知识界、教育界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决定“提倡国语教育”[4]，通令各省先从国民学校做起，“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还宣布国民学校文言体教科书分期作废。从此白话文的法律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它在教科书出版领

【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3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36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4】《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

域引起了连锁的反应。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逐年增加，教育管理渐次完善，各级各类教育日益进步，这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的十年。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发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留学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目标及课程、训育、设备等，都做出了详细的实施规定。至1933年，各种教育立法大体完备，并颁行各种课程标准，对各科课程的目标、教材大纲、教学时数、实施办法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至抗战前的1936年，无论学校数、招生数、毕业人数，还是教育经费投入数、教育质量与学科程度，都达到了民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派教育家积极进行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实验，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他们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实践推进了中国新式教育本土化的进程。

然而，1937年的日寇入侵，给中国教育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战前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因战争被迫西迁的有77所，停办的有17所。战前全国大学与专科学校有学生4万余人，教职员有7 000余人，到1938年底，学生数降之一半，教师数减少30%。战前中国中等学校的数量为3 264所，在校就读人数为627 246人，到1937年年底，全国已有1 386所中等学校被迫关闭，学生减少至38万人。战前初等学校已达32万所，在校学生已达1 836万人，到1937年底，已有10余万所初等学校毁于战火或被迫关闭。到1938年10月，初等学校已有25.7万名教师、650万名学生被迫离开学校[1]。数字上显示出来的有形损失已是触目惊心，而那些无形的损失则是无法统计。最为主要的是，这场侵略战争打断了我国发展势头良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在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下，我国的教育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下苦苦维持。到抗战后期，各级教育才逐步得到恢复。1945年抗战胜利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41所，在校学生数83 498人，中等教育学校数

[1] 宋恩荣：《抗战时期的教育西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 727所，中学生人数1 262 199人。据1946年统计，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237 000所，已接受教育的儿童29 160 803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8 173 765人的76%强[1]。

【1】见《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刊行，1972年。《民国教育史》认为这个统计“容有不实之处”，但国民教育的推行对于基础教育的发展的确有很大成绩。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64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基础教育的逐渐展开，为我国的教科书出版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昔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均因教科书而崛起，亦以教科书为今后营业之大宗。近代各大书局书店按出版实力排定出来的座次，也与它们在全国占有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大小顺序一致。教育的普及在扩大教科书市场的同时，还带动了其他教育类图书的销售。只要翻开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图书目录，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大出版巨头的图书出版结构中，与教育有关的书刊如教育理论及教学参考书籍、儿童读物、成教读物、国语书刊、英语读物等，都在图书目录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

近代教育的发展在雄厚出版业实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出版部门的经营运作方式。190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写小学“最新教科书”，也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在汉口设立了第一个分支机构。随着“最新教科书”销量的激增，商务印书馆便在随后的几年里，把分支机构的牌子挂到了全国各大重要城镇。其原因也好推测：为了推销本版教科书。1912年，中华书局以“中华教科书”崛起，在成立后不久，就筹建起自家的印刷所，到了1916年，中华书局更是扩大印刷规模，在上海静安寺路筹建起一个厂屋宏大、光线充足的新印刷厂。其道理也不难明白：为了方便地印刷自己编写出来的教科书。过去大出版机构这种因教科书而来的编、印、发一体化出版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作坊式经营，代之以分工细密的大企业管理方式运作。

第二节　中小学教科书

1912年9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用图

书规程》，开篇第一条便规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1]这条规程，是对清政府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直接继承，也是民国时期较长时间内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一纲多本"的政策依据。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一些著名学校、各省县教育学术团体以及出版单位，都曾在统一的审定大纲下，编写了形形色色的各个不同学科、各个不同年级段的中小学教科书。其中以出版机构编印的教科书，所占比例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410页。

通过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我们知道，在民国38年时间里，共有90余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各种类型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活动。其中的原因，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曾说过："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其他各小出版家，如果没有教科书或其他销数较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灭，不能维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谈不上什么发展"[2]。可见出不出版教科书，对书局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已有的大书局长期把教科书作为出版业务的重中之重，就是那些新兴的书局也常常动起涉足教科书出版的念头。时局的变化和学制课程的变更，往往给那些后来者提供了同台竞技的新机会。1912年中华书局教科书出版的成功，是抓住了新旧政体交替的时代机遇，随后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则是在学制课程变革、教科书审定标准发生变更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出版手段而赢得了教科书市场的一席之地。

【2】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43辑，9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

一、有影响的民营教科书出版机构及其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早中华书局15年成立。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组织同志编写《最新教科书》。这套在编写体例上独步一时的教科书，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式学堂广为采用。商务印书馆由此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和供应中心，出版

界霸主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据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说，在清末，有名有姓的教科书出版社前后有10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但最终都没有太大的发展。到民元前，商务印书馆占有教科书市场份额的90%[1]，几成垄断之势。1912年元月1日，与中华民国同一天成立的中华书局，彻底地改变了这一教科书出版格局。

【1】汪家熔：《陆费逵：教育"减负"第一人》，《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4月5日。

中华民国创建伊始，南京临时政府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强调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明确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早些时候陆费逵等人秘密编写，专为新政体量身打造的"中华教科书"，在春季开学前的2月份正式推出。虽然这套教科书在体例和编写方法上并无太多改进，甚至因编写仓促而难免显得粗糙，但因其政治色彩与新政权契合而受到普遍欢迎。陆费逵用"函电纷驰"，"顾客坐索"形容当时开业之际的销售盛况[2]。相比较中华书局教科书内容上的标新，商务印书馆的旧教科书便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尽管商务印书馆当时积极地亡羊补牢，但无论是挖改修补，还是另编重排，都不是短时间所能奏功。在这段无可奈何的时间差中，中华书局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商业上的先机，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匹敌的全国第二大教科书出版机构。两家亦从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出版竞争。(图53)

【2】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2年第1期。



图53
中华书局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毕竟是一个人员班底强、办事效率高的大书局，在突如其来的中华书局事件面前，商务印书馆采取的最有力反击措施，就是重新编写一套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新教科书，从其发布的编辑缘起说明中，不难看出它的目标指向，和对对手的批评：“今际此教育大革新之机会，同人应时势之需要，本其年来编辑上之经验及教授上之心得，别编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注意实际上之革新，非仅仅更张面目，以求适合于政体而已。”[1]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赶在秋季开学前出版，编写体例和内容质量，确也超出中华书局为“适合于政体”赶出来的“中华教科书”，这就迫使中华书局不得不重起炉灶，重新编写新的教科书。1913年范源濂加入中华书局任编辑长，“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陆续地编印出来。1916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实用教科书”；教育部通令小学校改用国语教学后，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法”、“新学制”两种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新教育”、“新中（小）学”教科书；因为有些学校仍使用文体授课，商务印书馆又出版“新撰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新小学国文及高小各科文体教科书。据统计，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共出版小学教科书10套，中学教科书8套。（图54）中华书局从1912年至1938年，30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共编写了10套小学教科书、8套中学教科书。

【1】《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教育杂志》,1912年4卷1期。

世界书局

1921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世界书局，是在先期出版通俗文学畅销书积攒了一定资本后，才开始进军教科书市场的。世界书局没有像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那样，小学中学教科书同时编印，而是先编小学教科书，而后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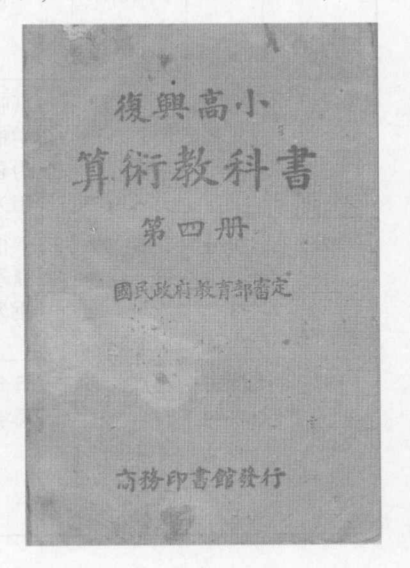


图54
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表一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小学教科书粗略表

	教科书名称	初版时间
小学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	1912 年
	实用教科书	1916 年
	新法教科书	1920 年
	新学制教科书	1923 年
	新撰教科书	1924 年
	新时代教科书	1928 年
	基本教科书	1931 年
	复兴教科书	1933 年
小计（套）	8	
中学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	1912 年
	新体教科书	1919 年
	新学制教科书	1923 年
	基本教科书	1931 年
	复兴教科书	1933 年
	职业学校教科书	1937 年
小计（套）	6	

表二　中华书局各年度出版的教科书粗略表

初版年份	书名	种数	编印原因	编校人姓名
1912	中华教科书	小学 44 种，中学师范共 27 种	封建清王朝结束，共和制新国家诞生，一个新的政治时代需要新的教科书	何振武、秦镐、缪文功、姚汉章、潘武、李廷翰、赵秉良、庄泽定、李登辉、杨锦森、沈步洲
1913	新制教科书	小学 38 种，中学师范共 43 种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新学制，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一学年为三学期	陆费逵、沈颐、戴克敦、顾树森、屠元礼、赵秉良、李登辉、杨锦森、李步青
1915	新编教科书	小学 19 种	由于很多学校仍习惯春季始业，该套书便为此而编	范源濂、沈颐、戴克敦、陆费逵、刘传厚、顾树森、潘武、董文、丁锡华、徐增、史礼绶
1917	新式教科书	小学 37 种，中学 2 种	1915 年改小学校为国民学校	范源濂、沈颐、戴克敦、陆费逵、李登辉、李步青、沈恩孚、王宠惠、陶履恭、欧阳瀚存、谢蒙、吴景濂

续 表

初版年份	书名	种数	编印原因	编校人姓名
1920	新教材教科书	小学2种	教育部令1920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科改用语体文	陆衣言、王璞、黎均荃、陆费逵
1922	新师范教科书	12种	刘伯明、杜定友、王炽昌	王引明、朱文叔、钱基博、陈怀书
1922	新教育教科书	小学26种，中学师范5种	教育部采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规定国民学校国文科改国语科，高等小学言文互用	黎锦熙、沈恩孚、王璞、黎锦晖、李廷翰、张相、陆衣言、戴克敦、陆费逵、沈彬
1924	新小学教科书	49种		黎锦熙、黎锦晖、俞复、陆费逵、戴克敦、张相、董文、吕伯攸、陆衣言、沈彬、金兆梓、朱文叔、钟衡臧、郭后觉、蒋镜芙、张鹏飞、杨干青、吴启瑞、乐嗣炳、陈醉云、易作霖
1924	新中学教科书	44种		王宠惠、王烈、沈步洲、沈颐、宋崇义、秦汾、吴在渊、胡敦复、金兆梓、舒新城、黎锦熙、黎锦晖、廖世承、张相、谢恩增、刘伯明、陆费执、钟衡臧、胡仁源
1927（1930年修正）	新中华教科书	小学41种，中学55种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基础，大学院公布小学暂行条例，小学前四年为初级，后二年为高级	吴稚晖、叶楚伧、何鲁、陈布雷、黎锦晖、王祖廉、黎明、陆绍昌、朱文叔、郑昶、张相

续 表

初版年份	书名	种数	编印原因	编校人姓名
1933（1936年修正）	新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	小学40种、中学49种、师范学校用19种、简易师范用4种、乡村师范用16种、简易乡村师范用2种	1932年教育部颁布正式审定的《课程标准》	
1937	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	小学30种、中学57种		

展到中学教科书的。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24年，世界书局编成了它的第一套小学教科书——"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为了易于通过审定，提高发行推销上的号召力，这套教科书请出了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为教科书审订人，并获得当时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马邻翼、黎锦熙等人的支持，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审时，得到许多方便。

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以后，打破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垄断局面，成三足鼎立之势。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个昔日的竞争对手，为了抑制这个新来的竞争者，竟然暂时摈弃前嫌，联起手来。据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两家先是用收买的计策，愿赠送沈知方个人10万元，条件是沈知方让世界书局停止出版教科书，遭到沈知方的拒绝后，又于1925年秋，由商务出资三分之二，中华出资三分之一，合设国民书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各学校倾销，希望从经济上拖垮财力尚薄的世界书局[1]。世界书局在教科书发行上独辟蹊径，采取量力设分局，主要发展"特约经销处"的办法。这些特约经销处，多设在中小城市，既多且广，容易在县乡直接切割商务、中华的教科书份额，因而十分奏效。兼之商务与中华原本权宜合作，国民书局教科书

【1】据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回忆，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全国所用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供应约占三分之二，中华书局占三分之一。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4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

编得本子不算好，推销上又各打算盘，先自家本版教科书为主，对国民书局的教科书销售并不卖力。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世界书局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成为第三大教科书出版商，而国民书局的二三十万资本，则最后全部赔光。

世界书局在编“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之后，于1925年开始编辑“新主义小学教科书”，突出三民主义的中心内容，以迎合革命。1927年北伐军抵达上海后，世界书局马上公开发行“新主义小学教科书”，所以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十周年《纪念特刊》时，对该书局敢于最先出版三民主义的教科书表示出自豪之情：“本局的《新主义小学教科书》实于十四年（1925年）开始编辑，迨国民革命军抵沪，本局最先公开发行，不像旁的书坊，不敢用自己店名出版党义书籍，恐怕有什么危险似的。”[1] 世界书局“新主义小学教科书”请到了当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担任审订。

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又编辑出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的特点是，分别编写出乡村用、中小城市用、大都市用和春季始业用、秋季始业用等多套不同版本，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时令的需要，灵活多变。仅国语一科就有四种版本同时发行：朱翊新编的，称世界第一种国语，多销行于小城市和农村；魏冰心编的，称世界第二种国语，多销行于中小城市；吴研因编的称世界第三种国语，多销于大中城市和海外；另有朱翊新、杨镇华编的春季始业国语，多销行于农村[2]。这种多版本的教科书考虑更周全，针对性也更强。

世界书局正式开始出版中学教科书，是在1929年。其实早在1924年，世界书局即已聘请人员编辑中学教科书，但还未来得及发行，即因北伐战争革命形势的风云突变，而只能弃之不用，改弦更张新编一套突出三民主义主导思想的教科书[3]，这套教科书分自然科学、算学、党义、国文、历史、地理、英文等科。

【1】世界书局所指的情况，是针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言的。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遭遇到了与商务当年大致相似的两难抉择。中华未雨绸缪，虽然编写了三民主义宗旨的“新中华”教科书，却不敢用中华书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声张，而是采用了一个虚拟的“新国民图书社”名义出版，对外则称中华书局代为发行，以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商务印书馆这次也吸取了教训，使用了与中华书局相同的精明招数，虚拟了一个“新时代教育出版社”。

【2】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3】《十年来的世界书局》，载《世界杂志十年增刊》，1931年8月。

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是从1927年编辑《开明活页文

选》开始的。《开明活页文选》以活页的形式、低廉的价格、精选的篇目和优良的服务，赢得了中学生语文教师的欢迎。继活页文选出版成功之后，开明书店接着请立达学园的数学教师刘薰宇、周为群、章克标、仲光然编写了一套数学教科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四种，出版后也很成功。林语堂为开明书店编纂的《开明英文读本》，多取材文学故事，语文与文法结合密切，并配以丰子恺的插图，版式清新活泼，让人感觉面目一新，创下了惊人的发行业绩，成为开明最畅销的书，甚至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越然编《模范英文读本》大受冲击。

开明书店出版教科书一开始并不追求各科具备，而是采取先编重点课程，然后渐次拓展的出版计划。《开明活页文选》、《开明英文读本》与《开明算学读本》出版成功之后，开明书店继续组织力量编写其他课程的教科书，约请周建人、戴运轨、赵廷炳、顾寿白等编写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生理卫生等教科书。开明书店最初出版的教科书是供初中用的，然后逐渐扩大到高中、师范和小学的范围。1932年，开明书店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小学国语课本初年级8册，高年级4册，由叶圣陶编写，内容紧贴儿童生活，文体多样，词句切近儿童口语。初年级课本中文字的手写体与插图，均由丰子恺书写绘画。另外，还有傅彬然编小学低年级用《常识课本》8册和高年级用《社会课本》4册，顾均正、贾祖璋合编小学高年级用《自然课本》4册，刘薰宇编小学《算术课本》，初年级8册，高年级4册[1]。

【1】唐锡光：《开明的历程》，《我与开明：1926—1985》，294~296页。

大东书局

20世纪30年代初，大东书局开始涉及教科书出版领域，先行编写的是一套初中教材，1931年开始出版高中教材，1932年又出版一套《新生活小学教科书》，到1933年8月学生暑期开学前，大东已在报上公开宣称“小学中学大学各科用书全部出齐”[2]。

【2】《申报》，1933年8月21日广告。

正中书局

20世纪30年代才成立的正中书局，之所以很快跻身于教科书出版大户行列，主要依靠其作为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据1937年《国立编译馆工作计划成绩报告》，当年1—9月，正中书局便有192种教科书呈送审查，这说明正中书局已经成为重要的教科书出版社。

北新书局

1929年10月，北新书局对外发布扩充招股启示时，已把教科书出版列入未来计划[1]。1930年，正式涉足教科书领域，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北新书局涉及到包括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美术、音乐、英语、化学、物理、生理卫生、动物学、植物学等多个教科书门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1930年赵景深编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它的特点是，在编写上突破传统的文选型国语教科书的编辑方法，以系统的文法、作文法和修辞的知识，将文选和语言基础知识有机地“混合”起来，这种新颖的方法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并成为后来一些同类教科书效法的对象[2]。另外，北新书局于1931年开始出版的，由赵景深、姜亮夫编选的《北新活页文选》，也是一套比较成功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补充材料。

【1】《申报》1929年10月15日载《北新书局扩充招股》的广告中提到，北新书局计划要“聘请各有名专门学者，编辑各种教科书”。

【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40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

儿童书局

儿童书局是张一渠于1930年初创办的。这是一家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等。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儿童书局自1932年1月—1946年10月间，共出版小学教材12种，中学教材1种。其中比较重要的小学教科书是1935—1936年间出版的《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陈鹤琴、梁士杰主编）。这套教科书根据我国北部、中部、南部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之不同，分别将地方教材融合于统一的语文教学中，这种编写方式，曾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的高度评价[1]。

【1】楼炜春:《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

二、由“审定制”到“部编制”

在抗战以前，我国教育部门没有专门机构编写通用的教材，采用的是民间编写，政府部门审查，出版后由学校自行选用的办法。这种教科书的编写制度就是“审定制”。在采用“审定制”的时候，虽然政府当局通过课程标准的施行，也对学校教科书作程度上的统一和思想上的控制，但毕竟还允许各出版机构自由编辑课本。因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教科书编制与出版上各树一帜、竞新立异的局面。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中，提到我国清末以来教科书编写上的十大进步，即：（一）白话文崛起；（二）儿童文学抬头；（三）教育目的逐渐正确；（四）教材分量逐渐增加；（五）写作渐多艺术；（六）编制渐趋手脑并用；（七）国语读本从单字起进而为从整段的故事起；（八）国语教材的编排由无组织进而为有组织；（九）插图从单色进而为复色或彩色，数量增加，形式也生动了；（十）课文之外的粗边线、书名页等一切足以妨碍儿童视线或有损书的美观东西都取消了[2]。这种进步，是在“审定制”下编辑出版自由竞争、优存劣汰的结果。竞争，促进了教科书质量上的改善、编写上的创新、价格上的下降、印装上的进步和服务上的提高。

【2】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208~218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东南各省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各地居民纷纷内迁，西南和西北的中小学和在校学生数量骤增，而过去承编承印各科教科用书的各大书局，受战局的影响，教科书的印刷和运输都发生了极大困难，一度造成了严重的“书荒”。这种情况，正好给国民党政府强令取消教科书的“审定制”，实行教科书的“部编制”提供了机会。从“审定制”到“部编制”，实质上是国民党借“非常时期”加强思想控制的表现。

1942年1月，教育部扩大了国立编译馆的组织，把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为教科用书组，积极进行工作。据不

完全统计，在重庆出版和陆续编印的课本数量为94种230册[1]。随着编成的中小学课本增多，对连带发生的印刷运销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3年4月，国民政府指定商务等七家出版机构，在重庆组织国定本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承担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定教科书的印刷发行任务。这七家分配的比例是：正中书局22%、商务印书馆22%、中华书局22%、世界书局12%、大东书局10%、开明书店8%、文通书局4%[2]。在国民政府意欲推行国定本教科书制度的政策背景下，过去的一些教科书大书局除了重印部分原来的本版书外，也少量地编印了一些教材，零零星星，谈不上系统完整，但对战时的供应急需，也不无裨益。

[1] 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27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2] 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抗战胜利后，“七联处”移至上海。1946年，又有中国文化服务社、胜利出版公司、独立出版社、儿童书局等四家加入进来分享国定本教科书市场，组成“十一联”，各家承印比例如下：正中书局23%、商务印书馆20.5%、中华书局20.5%、世界书局10%、大东书局7%、开明书店6%、文通书局4%、儿童书局3%、中国文化服务社2%、胜利出版公司2%、独立出版社2%[3]。1947年7月，国定本教科书开放版权，各公私机构均可申请印行国定本教科书。

[3] 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

在国定本教科书占据着国统区市场主流的同时，社会上不少人对“部编制”制度本身和国定本教科书编写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要求恢复抗战前“审定制”的呼声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营出版机构也编印了少量教科书。如开明书店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陆续编辑出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在当时颇受一些学校的欢迎[4]。

[4] 覃必陶：《〈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出版追忆》，《我与开明》，202~205页。

三、敌占区的奴化教育与教科书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在查禁、焚烧大量书籍的同时，日伪当局强行输入大量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并且迫不及待地组织编

写奴化教育教材。1932年，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任命“编审官”，建立编写机构。1933年3月起着手编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所用全套“国定教科书”。1935年12月，“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全部编完出版[1]，由东北伪满的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和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发行。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广大华北、华中地区。同东北地区一样，故伎重演，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在“分而治之”的政治险恶居心之下，利用各地的傀儡政权，编印奴化目的的教科书。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民印书馆，华中伪国民政府的华中印书局和三通书局等[2]，均属于官办的御用出版机构，掌管着各自区域内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印和发行。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谬论，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1】《东北教育通史》，54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2】汪伪以前的维新政府教科书，由华中印书株氏会社编印，汪伪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伪教科书改由华中印书局印刷，三通书局发行。1944年成立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接收了三通书局的教科书发行权。

四、苏维埃政权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教科书

1927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政权，不论是苏维埃政府，还是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一直以相对独立的政权而存在。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苏区政府明文规定，摒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教材，使用苏区自编的教材。苏区初期的教材，是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或教育部）编辑，由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或教育部）审定印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内设立编审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苏区通用教材及审查地方苏区的自编教材。1933年下半年，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编写的列宁小学通用国语教材《共产儿童读本》先后出版，共有6册。第二年又根据形势发展及教材使用情况，重编出版第二部列宁小学国语通用教材《国语教科书》。

苏区的学校教材，是按照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以及为

培养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的要求而编写的。教材的内容除了一般的知识传授外，重视突出革命斗争的实际，启发儿童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强调与当前斗争、群众实际生活及地区实际情形相联系。这是苏区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战场，先后在全国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多个抗日根据地。在火热的抗战岁月里，各个边区的各类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编写或采用了适合的教材，适应了抗战教育的需要。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教材建设的范围十分广泛，是其他抗日根据地教材建设的楷模。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审的第一套小学课本陆续出版发行。这套课本包括：初小国语6册，初小算术6册，初小政治常识1册，高小历史2册，高小地理1册。另有图画1册，劳作1册，唱歌1册。1941年，又完成了该套教科书的改编工作，1942年陆续发行[1]。

[1] 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340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针对战时条件艰苦、印刷力量薄弱的现状，各边区政府在教材编印和发行上采取了多种方法，以适应战争环境。如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厅行政部门编写的教科书，只印样本分发到各县，再由各县自行翻印。铅印、石印、油印、木板印，甚至是手抄，因陋就简，解决教科书严重不足的问题。不少地方、学校、教师还自编了一些教材或补充读本。

抗战胜利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各解放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学校教育的目的、任务，重新拟定学校教学计划，调整课程体系，编写或修订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实际，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着鲜明的革命特点。不少解放区教材在共和国建立初期还在使用。

第三节　大学教科书

初创于清末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早期的大学多采用外国原版教材，或者由教师自编讲义执教。随着高

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现代学术的进步，中国产生了学术自立的要求，要求编写出自己的大学教科书，与此同时，各个学科门类的专门人才逐渐出现，中国人编写出自己的大学教科书也就成为可能。

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1]，他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后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因为国情和学制不同，外国教科书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学生，而且原版外文图书价格昂贵，也不是一般大学生所能负担。因此，蔡元培提倡大学教科书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大学教科书。蔡元培的呼吁代表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要求。在出版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出版社都予以积极响应。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十分激烈，可供出版者开拓的空间已不是很大，加上政府早就有意向编印统编教材，因而需要发展新的出版领域；另一方面，大学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产生了学术自立的要求，出版国人自己编写的大学教科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申报》，1931年4月27日。

早在192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就已出版过以大学名义命名的《大学丛书》，如《北京大学丛书》(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1921年)。但是数量少，没有整体计划。从1923年起，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持下，广泛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立丛书出版合约，书稿的稿源、审查工作都由对方负责，实质上是依赖馆外高等教育界的力量编辑图书。先后出版的大学丛书有：《东南大学丛书》(1923年)、《燕京大学丛书》(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丛书》(1924年)、《大同大学丛书》(1925年)、《清华大学丛书》(1929年)、《中央大学丛书》(1930年)、《武汉大学丛书》(1930年)等等。这些大学丛书局限于某一所大学，因为缺乏协调和公认的标准，广泛流通存在障碍。王云五理想的大学丛书是有全国统一规划、经过教育行政机关审查、可以广泛通行的本子。商务印书馆先前出版的各自独立的大学丛书，事实上为后来的通行本作了稿源上的准备："为推行此计划之初步，惟有鼓励大学教授的写

作尽量由商务书馆代为印行，将来积有数量，再行严加审查，扩充为大学教本。”[1]

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各方面的条件基本趋于成熟，王云五正式开始了他的统一的大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1931年9月，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成立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撰导言，指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是“教育普及、学术独立”。在“学术独立”方面，他强调了大学用书的出版，打算集合国内研究有专长的学者，共同编译一套统一的大学丛书[2]。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劫难，所有出版活动一度停摆。8月复业后，大学丛书的出版优先提上议事日程。10月，王云五即致函大学丛书委员会各委员：“敝馆遭难以后，益觉学术救国实为要图；大学丛书之出版，不容再缓”，“敝馆以为吾国专门学术之不能长足进步，原因虽多，而缺乏本国文之专门著作，实为主因之一”[3]。并把大学丛书的出版提高到“学术救国”的高度，作为“学术救国”的当务之急。

为了这项出版工程，商务印书馆组织了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拟定目录、征稿、审查等。委员会共聘用了55位委员，从委员们的名单看，的确是汇合了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可谓集一时之选，蔚为大观：

丁燮林　王世杰　王云五　任鸿隽　朱经农　朱家骅
李四光　李建勋　李书华　李书田　李圣五　李权时
余青松　何炳松　辛树帜　吴经熊　吴泽霖　周　仁
周昌寿　秉　志　竺可桢　胡　适　胡庶华　姜立夫
翁之龙　翁文灏　马君武　马寅初　孙贵定　徐诵明
唐　钺　郭任远　陶孟和　陈裕光　曹惠群　张伯苓
梅贻琦　程天放　程演生　冯友兰　傅斯年　傅运森
邹　鲁　郑贞文　郑振铎　刘秉麟　刘湛恩　黎照寰
蔡元培　蒋梦麟　欧光怀　颜任光　颜福庆　罗家伦
顾颉刚[4]

[1]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84页。

[2] 王云五在《创编大学丛书致大学丛书委员会各委员函》中写道：“当‘一·二八’以前敝馆举行三十五周年纪念时，云五曾拟集合国内专门学者，编译大学用书及各种专门名著，期为提高吾国学术促进革新运动之一助。不意计画未成，而国难突作。”，该函载王云五《岫庐论学》，38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增订三版。

[3] 王云五：《创编大学丛书致大学丛书委员会各委员函》，《岫庐论学》，383页。

[4] 这个名单采自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1册，291~292页。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与《岫庐八十自述》都说，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共有55名，但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的名单只有54人。这两个名单的不同之处，在于《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漏”掉了“李圣五”一人。李圣五曾担任过汪精卫伪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1】王云五:《创编大学丛书致大学丛书委员会各委员函》后包括附件: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载王云五《岫庐论学》,384页。

【2】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吴永贵辑录的中华书局"大学用书"目录,见吴永贵《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1912—1949》,185~186页。

据1932年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章程》[1],大学丛书计划第一集出版300种,分五年出版。在运作上,一方面,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专门著作,经审查合适,则可列入大学丛书;另一方面,自1933年起,计划每年新出40种。事实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一共出版了317种(见表一)。丛书涵盖了多个学科门类,其中,教育、工程学、经济学、算学四类出书最多,体现了当时高校研究的热点。这套丛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学术研究的水准,也减轻了大学生购买昂贵的原版西文教材的经济负担。

表一　大学丛书分类种数[2]

类别	种数
总类	3
哲学	18
社会	2
统计学	5
政治学	6
经济学	29
法律	21
行政	14
保险	1
教育	35
商业、交通	8
语文学	4
科学	1
算学	29
天文学	3
物理学	9
化学	13
生物学	8
医学	15
工程学	33
农业	12
商业实践	7
化学及制造工业	15
艺术	3
文学	4
史地	19
总计	317

出版"大学用书"的还有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学用书"数量,据统计,前后达91种[3],影响不如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1931年世界书局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刊载的"世界书局图书目录分类索引"中,有"专科大学教本及参考书"一类,列明已出版文学系、理学系、法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工学系、商学系等系各科教科书及参考书。1938年9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的广告上,世界书局详列了哲学系与教育系的大学用书,并且说明"各系均备,不及备载;陈列门市,欢迎参阅"。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各高校及出版社生存状况都非常艰难,难以按原计划将各科大学教科书出版齐全,于是,教育部决定以政府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在1939年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1942年该委员会改隶国立编译馆),聘请在某一科目

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委员。1940年9月，该委员会在重庆北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到会者有朱光潜、童冠贤、吴景超、张奚若、史尚宽、孙光远、钱崇树、顾毓琇、刘仙洲、邹树文、沈宗瀚、汪元臣、谢循初、常导之、吴俊升、陈东原、章益、许心武、陈可忠、郑鹤声、瞿桓、孙国华、张道藩、魏建功、叶之龙、刘英士、李炳焕、梁实秋等29人，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主持，通过编辑体例及审查办法等案，并推定各科目撰稿人选与审校人选[1]。大会决定：先编各学院共同科目用书，次及各系必修科目用书，再次及于各学系选修科目用书。编辑方法主要有三种：一为采选成书。就是把各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大学用书加以甄选，凡审查合格并征得原书著译人同意后，酌加修订，作为部定大学用书；在出版时，封面上加印“部定大学用书”字样，在封面里页注明该书采某书局大学丛书等字样。二为公开征稿。三为特约编著。各种书稿都要经过初审、复审和核订手续，然后提交该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最终由教育部核定付印。部定大学用书由正中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分担印行。正中书局主要负责法、农、工、师四学院用书，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文、理、医、商四学院用书。

当时大学科目约有1 007种。出书计划如下：

（1）各院共同必修用书——计有国文、英文、三民主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7种，1944年秋出齐；

（2）分院必修用书——计有中国通史、高等数学、民法概要、教育概论、农业概论、应用力学、商业史、解剖学等8院41系之科目，约70种，1945年秋出齐；

（3）分系必修用书——计有中国文学史等约400种，1946年秋出齐。

（4）分系选修用书——计有训诂学等530种左右，1947年秋出齐。

据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度止，经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审查核定，由商务

[1] 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281页。

印书馆、正中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的“部定大学用书”共35种、41册。只完成了原计划1945年应完成70种的一半，只占当时1 007种大学科目的3.47%。因此它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其有限的”[1]。

【1】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282~283页。

除“部定大学用书”以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文通书局都曾再版重印或新出版自己的大学丛书或大学用书。

第四节　社会教育与教科书

一、社会教育的发展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之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现代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民国成立之初，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中国社会由封建时代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一般民众亟需进行扫盲教育和新的社会思想观念的教育，因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于教育部中特设“社会教育司”，同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还在全国各地广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

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撰《今日之教育方针》，倡导以教育“救国新民”。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年会通过《注意贫民教育案》。此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相继发出劳工神圣、劳动教育、平民教育的呼声。五四以后，全国各地学校的大中学生，纷纷设立义务夜校和平民夜校。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推动下，平民教育于1920年初步形成社会热潮，前期的公众补习学校，基本上被平民学校所取代。

就在这时，晏阳初于1920年从欧洲回国，他以创办旅欧华工补习教育的经验，在国内极力推动平民教育。他先在上海青年协会设立平民教育科，从调查研究出发，组织平民学校，教学白话千字文，每日2小时，4个月为一期。1922年3月，晏阳初到湖南

长沙，联合各界举行全城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平民学校60余所，招收学生1 320余名，4个月后，900多人顺利结业。1923年，他又到烟台、嘉兴、杭州等地推行平民教育，建立平民学校。同年8月，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在清华学校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公推朱其慧为董事长，聘任晏阳初为总干事。其后，全国20多个省区相继建立了50余处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等，平民教育运动盛况空前，直到1924–1925年，由于受到军阀混战影响，平民教育高潮才逐渐冷寂下来。

1917年，黄炎培联络教育界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在推动业余职业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使公众在接受社会教育性质的业余补习时，增多了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社会教育予以了相当的重视。1929年，教育部重申1928年10月大学院对社会教育经费的有关法令，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0%~20%。因为孙中山遗嘱中有“唤起民众”的号召，国民政府决定将前期平民教育改称民众教育。1929年1月，教育部公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宣布民众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授予年长失学者以简易之知识技能，使适应社会生活。”入学对象为12~50岁的失学男女。民众学校修业期至少三个月，每周授课至少12小时，时间安排在夜间或休息日。《大纲》规定，民众学校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供给，学校教授内容为识字、三民主义、常识、珠算或笔算、乐歌，此外得兼授史、地、自然、卫生，依地方需要加授农业、工业和商业科目。民众学校教材由教育部统编，但实验类民众学校可自行编辑教材[1]。

1912年，中国人口大约是4.3亿，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2]。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到，“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民众”，所以社会教育的压力非常艰巨。因此，许多省市从1935年起，开始大规模推行定期强迫教育。1936年，行

【1】《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二社会教育概况”，604页。转引自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698页。

【2】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政院通过教育部订立的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方案，规定强迫教育实施期限，预备在6年时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由中国社会教育社编辑出版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及经教育部审定的民众教育辅助书目三类：民众常识文库、连环画、民众文艺，共计350余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时的需要，教育部规定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大量中小学相继开办民众学校、民众识字处、民众阅报处、函授学校、职业补习学校等，推动了战时社会教育的发展。其中，以扫盲为中心的识字运动，成绩可观。(见表一)

表一　1937—1945 年历年扫盲人数统计表[1]

年份	人数
1936	3 121 820
1938	3 937 271
1939	2 815 608
1940	8 109 498
1941	8 603 558
1942	9 021 851
1943	10 407 612
1944	9 608 378
1945	8 862 492

【1】资料来源：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708页。

二、社会教育教材的出版

鉴于社会教育涉及面太广，我们仅从平民教育方面来观察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教材的出版情况。

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晏初阳，1920年回国后曾花一年半时间到各省区调查平民教育教材情况，感到“平校运动工具刻不容缓，尤以课本为先决问题”[2]，于是留在上海从事编辑，他从字典上选择平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约一千字，编成千字课，分上、下两册，于1922年出版。其后经过长沙、南京、武昌、烟台、杭州各处的试验，千字课教材的内容及册数，都不断加以改良。以课本册数而言，最初为两册，后增至3册。经长沙试验之后，定为4册，每册24课，每日授课1小时，每小时授毕1课，4月即可卒业。千字课首先发行者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此后，中华平民促进会委托陶行知、朱经农改编新的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国采用[3]。随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等出版社接踵而起，自行编辑出版新的平民教育教材，但名称内容略有不同。(见表二)

【2】晏阳初：《平民学校教材问题》，《晏阳初教育论著选》，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3】晏阳初：《平民学校教材问题》。

表二　平民教育教材编辑出版情况[1]

名称	册数	编辑者	发行者	出版日期	出版次数	每册定价	备注
平民千字课	4	晏阳初、傅若愚、黄沧渔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1922年2月	1924年7月3版	每册7分，百册8折，500册7折	
平民千字课	4	朱经农、陶行知	商务印书馆	1923年9月	1924年3月41版	每册3分	附有第一册教学法
千字课本	4	魏冰心、董文、戴渭清、曹芝清	世界书局	1925年4月		每册3分	附有教学法全
青年平民读本	4	卓恺泽	上海书局	1925年7月		每册3分	
平民课本	4	黎锦晖、刘传厚、陆费逵、戴克敦	中华书局	1924年3月	1924年11月3版	每册3分	附有教授法全
平民读本	4	李六如	长沙广文书局	1922年10月	1924年3月4版	每册8分4厘	
成人读本	4	曹典琦	长沙文化书局	1921年10月	1925年5月4版	每册4分	
新千字课	4	曹典琦	长沙贡院西街野村印刷局	1924年6月	1924年10月再版	每册3分5厘	
平民识字读本	1	张思明、戴联荫、高元泽	奉天教科书编审处	未详	未详	未详	

上表中，有三种平民千字课教材是长沙的书局或印刷局发行的，这是因为长沙是晏阳初进行平民教育试验的主要城市。发行业绩最显著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平民千字课》，这种教材因为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委托朱经农、陶行知编辑，得到全国平民学校广泛采用的结果，出版仅半年就印到41版。在商务印书馆

[1] 资料来源：原载《世界日报副刊·平教特刊》第7、8期，1927年3月27日。转引自晏阳初著《平民学校教材问题》。

出版《平民千字课》以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等也参与进来，自行组织编辑平民学校教材，为了竞争，一般都以低廉的售价发行，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发行的平民学校教材定价均为每册3分，普遍低于其他版本的平民学校教材。这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激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出版社大都发行能力强、实力雄厚，能够从廉价的大量销售中获利。各出版社积极主动编辑平民学校教材，并且廉价发售，对平民教育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函授教材和讲义

函授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中国人正式以“函授”之名办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1915年3月12日，《申报》上刊登了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的预告。四个月后，函授学社英文科正式招生。在随后三十多年的出版岁月中，商务印书馆一直很重视函授教育的发展，先后增设了算学科、商业科、国语科、国文科等，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1]。据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宣传说，从1915年至1931年4月17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共招收学员3.6万人，其中毕业者6 300余人[2]。学员人数如此之多，说明这种通信方式的函授教育，在当时是受到自学者普遍欢迎的。民国时期的函授教育有机构办的，也有个人办的。各大书局办的函授教育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华书局兴办函授学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实力与规模，虽说不及商务印书馆，但在给社会成员提供自修辅导方面，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从1926年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之日起，至1937年4月止，社会上共有1.5万余人接受了中华书局函授学校的自学辅导[3]。开明书店1933年办的函授学校，全名为“上海市私立开明函授学校”，夏丏尊任社长，函授初中各科课程，但仅办了一期。第四大出版社大东书局，它开办的法律函授学社颇为有名，汪翰章任社长，董康任教务主干。

函授教育以自学为主，所以必须向学生提供函授教材。这些

【1】唐锦泉：《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函授学校》，《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657~659页。

【2】《申报》，1931年4月25日。

【3】《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

教材在当时称之为讲义。从中华书局在《申报》上所做的函授教育相关广告中，明确声称学校为每级学员编写的讲义，多则50册，少则30册[1]，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开明书店还将那些讲义冠名公开出版，公开发售。《开明中学讲义》先后出了13种[2]，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图画、音乐各科俱备，专供有志自学的青年选用。

[1]《申报》，1936年2月23日。

[2] 章克标：《开明函授学校简述》，《我与开明：1926－1985》，251页。

第五节　儿童读物

我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强调"蒙以养正"，那些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故事、儿歌之类的作品，因不登大雅之堂，只能在民间口耳相传，很少得到出版的机会。而古代文人专为年幼一代编写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的书面读物，大都作为读书识字的启蒙教材，思想格调又充满着"圣贤大道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儿童读物。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改良运动的先行者们致力于开发民智，开始注意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作为教育儿童工具之一的儿童读物，或翻译，或改编，或创作。儿童读物作为一种书刊出版类型，开始在我国出版物结构类型中占据一席之地。五四时期儿童的重新"发现"，促进了儿童读物内容的大革新和数量的大发展。20世纪30年代至抗战前夕，是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年代，也是民国儿童读物出版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抗战以后，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儿童读物也表现出相应的内容特点。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儿童读物出版，跟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阶段特征。

一、儿童读物出版的发生期：晚清到五四时期

晚清到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萌芽期，也是中国现代儿童读物的发生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晚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

历史进化观影响下，开始把目光投注到年轻一代身上。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之下，有关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活动，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

晚清时期人们对儿童重要性的认识，是把儿童看成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这与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分不开的。这种期望和视角之下的儿童读物，大多寓含着爱国与图强的使命感。为了使儿童长大后能更好地完成历史重任，儿童的教育格外受到关注。在晚清的教育改革思潮中，除了教科书的革新外，人们已注意到课外读物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孙毓修编辑并主撰的《童话》丛书，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孙毓修在阐述编辑意图时说："顾教科书之体，宜作庄语，谐语则不典；宜作文言，俚语则不雅。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在于"爱听故事，喜自天然而然"[1]。商务印书馆在《童话》丛书的广告上，也突出了该套书作为儿童课外读物的意义。广告语写道："然则欲教育进步，民德高尚，不能不有待于校外读物"，而《童话》集则为"我国校外读物之嚆矢"[2]。《童话》丛书第一集69册，每册约五千字，供七八岁儿童阅读；第二集8册，每册约一万字，为十、十一岁儿童编写。因为丛书读者对象明确，兼之文字浅明，故事性强，又辅之以图画，通俗而易懂，受到小读者的热烈欢迎。赵景深说孙毓修编的这77册童话，"差不多好几万小孩读过"[3]，可见其影响之大。

《童话》丛书作为我国出版史上第一套专门的大型儿童读物丛书，是我国儿童读物发生期最重要的收获。它开辟了儿童书刊出版的新领域，凸显了儿童读物在整个出版物构成中的新趋势。中华书局1913年开始出版的《中华童话》丛书和《世界童话》丛书，1917年开始出版的《小小说》丛书，便是继其之后的仿效产品。中华书局这三套丛书，到五四运动以后还在陆续出版。《小小说》总计100种，到1921年3月前约出版了50余种[4]。《中华童话》总计30种，到1923年6月已出22种，《世界童话》总计50种，到1923年6月出全[5]。这三套丛书或是改编古书上的故事、寓言，

[1] 孙毓修：《〈童话〉序》，《教育杂志》1卷2期，1909年。

[2]《教育杂志》1卷1期"绍介批评栏"，1909年。

[3] 赵景深：《孙毓修的童话来源》，转引自孙永丽《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期研究——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4]《申报》，1923年3月15日。

[5]《申报》，1923年6月19日。

或是截取说部中滑稽、神怪、义侠的材料，或是译述世界各国的童话，几乎没有一本是作家独创之作，这些都和孙毓修编的《童话》丛书相类似。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全国两家最大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商，在编写教科书之余，重视儿童课外读物的出版，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了大型的《童话》丛书外，还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儿童读物单行本，如包天笑译介的《馨儿就学记》(1909年出版)、《弃石埋石记》(1912年出版)、《孤雏感遇记》(1913年出版）等。其中《馨儿就学记》影响最大，“销行数十万册”。另外，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少年杂志》(1911年创刊)、《学生月刊》(1914年创刊，1920年以后改名为《学生杂志》)，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童子界》(1914年创刊)、《中华儿童画报》(1914年创刊)、《中华学生界》(1914年创刊）等期刊，都是当时少年儿童课余校外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二、儿童读物出版的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出版的儿童读物，由于所取的角度，大多是为“国家”而非为“儿童”，其强烈的功利色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书刊传播的广度。从我国教育史和出版史来看，真正为儿童服务的儿童读物，应该说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观念方面，源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儿童本位论”的教育思想，被我国文化界和小学教育界所广泛认同。这一理论一反传统教育视教师、教科书为中心的做法，提出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命题，认为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1]；其次，从语言文字方面，五四先驱者们所大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清除了文言文对儿童阅读障碍的同时，也把那些儿童日常生活语言所构筑的生活和心灵世界重新归还给儿童。在“儿童本位论”这一新儿童观统帅之下编写出来的白话儿童读

【1】转引自王泉根《五四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图55
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杂志

物，因注意到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备受广大儿童的欢迎，从而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少儿图书市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虽说都有一些儿童读物断断续续地问世，但总的来说，数量不多，基础还十分薄弱，小百花园地还有大片的荒芜急待垦辟。五四以后，少儿书刊市场显露出来的勃勃生机，使得这两家大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出版重点向儿童读物上倾斜，在期刊和图书两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建树。

在期刊出版方面，两家都于1922年分别创刊了专门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图55）和《小朋友》（图56）。《儿童世界》坚持“儿童的”和“文学的”办刊原则，《小朋友》本着“陶冶儿童性情，增进儿童智慧”的发刊宗旨[1]，读者对象定位明确，编辑方式注意儿童心理，文字内容讲究通俗有趣，并为孩子们提供难得的习作园地。过去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正是在《儿童世界》和《小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童年时光的。他们从中得到了文学的熏陶，知识的营养和阅读的快乐。在我国儿童教育发展史上，《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以刊行时间长、发行范围广著称于世。在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杂志的诞生，也标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图56
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

这一时期创刊的主要儿童刊物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儿童画报》（1922年创刊），中华书局的《小弟弟》（1922年创刊）、《小妹妹》（1922年创刊）、《儿童文学》（1924年创刊）和《小朋友画报》

【1】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104~10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26年创刊）等。另外，商务印书馆前一时期创办的《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还在继续刊行着，只是栏目内容在新的教育形势下，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在图书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出版的大部头少儿类读物有：《儿童文学丛书》（1921年开始出版）、《少年史地丛书》（1923年开始出版）、《少年百科全书》（1924年开始出版）、《儿童工艺丛书》（1924年开始出版）、《儿童世界丛刊》（1925年开始出版）、《少年自然科学丛书》（1925年开始出版）、《学生国学丛书》（1925年开始出版）、《儿童史地丛书》（1926年开始出版）等。中华书局从五四运动以后至1929年，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出版的少儿类大小丛书，共计有12套300余种。它们是：《儿童丛书》、《儿童文学丛书》、《儿童常识丛书》、《我的书》、《儿童艺术丛书》、《儿童报社丛书》、《儿童百科丛书》、《科学小丛书》、《儿童歌舞剧》、《儿童课余服务丛书》、《歌舞表演曲》、《学生文学丛书》等。与前一时期相比，20世纪20年代儿童图书的出版，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有长足的发展。儿童读物的类型，更有大的拓宽，除了各种样式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童话、故事、小说、游记、儿歌、新诗、歌剧、话剧等屡有出版外，其他如笑话、谜语、儿童工艺、生活读物、百科读物、科普读物等也有涉及。其中有些儿童读物类型，还是五四以后新产生的，如歌舞表演曲、歌舞剧、话剧、儿童小说、科学文艺等，都是崭新的出版品种。

从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出版选题来看，一方面是翻译，除了将以前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重译外，还从儿童的需要和情趣出发，将西方那些讲述“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有意思无意思的作品，大量地新译过来，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贝洛尔、爱罗先珂等世界著名儿童作家的名字，被广大中国孩子们所熟悉。安徒生的童话，《阿丽丝漫游奇境记》、《鹅妈妈的故事》、《木偶奇遇记》等作品，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另一方面是采集和改编，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如童话、神话、童谣、儿歌、故事、传说等，被出版者和一些民间组织广泛地征集和挖掘

出来，在刊物上发表或以图书的形式出版，成为小读者们喜闻乐见的“乡土读物”。不过，从原创的角度来说，纯粹由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多，有影响的当推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叶圣陶的《稻草人》，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黎锦晖的歌舞剧等。

从出版儿童读物的机构来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这一时期最为主要的出版主力军。其他零星的出版机构还有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虽然说，五四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儿童读物的市场需求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相对贫乏的稿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熟悉中国近代儿童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相当少，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则几乎没有。由于稿源的不足，那个时期丛书的出版很少能做到一次性的集中推出。中华书局那些年出版的儿童读物丛书，几乎都是把丛书名称先开列出来，打出旗号后再慢慢地边编写边出版。一套丛书拖个四五年是常有的事，《我的书》丛书更是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由于外稿的不足，出版部门只能是编辑兼作家，郑振铎、黎锦晖、吕伯攸、林兰、王人路等这些书局的编辑们，都是这样“被迫”兼出来的儿童读物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就不仅仅是儿童读物领域出版的领头羊，同时还是儿童读物编创的主力军。

三、儿童读物出版的兴盛期：1930年至1937年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对儿童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从少数人初期倡导到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历史性跨越。以儿童图书馆的建设为例，1917年我国天津诞生了全国第一家儿童图书馆，到了1930年，全国儿童图书馆的数量已达113所，涵盖了吉林、云南、陕西等边远地区在内的21个省市[1]。儿童图书馆数量的猛增，既是社会上儿童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重要佐证，同时也是儿童读物需求量大为增加的明

【1】孟绂、沈岩：《儿童图书馆学》，7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显标志。当时的书刊出版界，自觉地适应了这一社会需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儿童读物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是儿童书刊出版机构的增加。1935年生活书店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上，专门附录了一份《全国少年儿童书目》。该附录在书名之后列出了价格、出版者等著录事项。通过统计出版者项得知，当时参与儿童书刊出版的出版机构数量至少在50家以上。除了以前老牌子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出版社外，更多的是一些新起的中小型出版机构，如现代书局、乐华书店、亚细亚书局、正午书局、新月书店、华通书局、新中国书局、大华书局、南京书店、拔提书店、新生命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新亚书店、文华书局、景山书局、求益书局、大夏书局、生活书店、黎明书局、汉文正楷印书局、勤奋书局等。这些新起的中小出版机构之所以纷纷从事少儿书刊的出版，一方面是被儿童书刊市场的广阔前景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儿童读物出版的相对"政治安全"有一定关系。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文网日密，文祸日深，一些原来从事左翼书刊出版的机构迫于高压而转变了出版方向。如20年代被人称为"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北新书局，到了30年代主动地放弃了原来的主要出版优势，致力于儿童读物和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便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其次是专门儿童出版机构的出现。1930年初，在上海浙江路同春坊住宅楼下有一家名为"儿童书局"的出版社开张。作为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儿童出版机构，儿童书局的成立，是我国儿童读物出版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历史标志。儿童书局从创办时起至1937年止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创办人张一渠的带领下，发展十分迅速，书店从原来的合资经营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两次扩充到10万元，职工人数增加到40余人，初设分店于本市四川北路，继设分店于广州、汕头、汉口、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六年时间里出版各类儿童读物和教育书籍达一千种左右，其中丛书20余种，期刊6种[1]。作为专门的儿童读物出版机构，儿童书局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从《全国少年儿童书目》上列出的出版

[1] 楼炜春：《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

者名单来看，社名上带有明显的少儿出版社特征的还有少年、小朋友、中学生、儿童报馆、少年社等出版机构[1]。当然，这些出版机构就规模和影响而言，都不能和儿童书局相媲美。

[1]《全国少年儿童书目》上未列出版社全名，笔者一时也难以考证，故一仍其旧。

随着这一时期儿童领域出版力量的加强，儿童读物的数量和品种跟前一个时期相比，又有一个大幅度的跃升。《全国少年儿童书目》上著录的儿童读物数量达到了3 000种，其中，尚不包括那些编者认为"内容太陈腐或不易为儿童少年理解"而不愿收录的书籍[2]，比如说在目录中，我们就很少见到那些一向口碑不好而流传却甚为广泛的"小人书"——连环画。另外，《全国少年儿童书目》作为一家出版机构编制的书业书目，限于其编辑力量，肯定也会有不少书无可避免地被编者所漏收[3]。《生活总书目》总计收录图书两万种，三千种儿童读物便占据了其中的七分之一，说明30年代的儿童读物业已成为整个出版物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图书出版门类。

[2]《全国少年儿童书目·编例》，《生活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

[3]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少年儿童书目》是一份销售书目，其所著录的图书并不一定都是初版于30年代，其中亦有不少是20年代甚至之前的图书。不过，这些书不少在30年代还在重印。

《全国少年儿童书目》厚达106页，编者将之分为10大类132小类。类目多，说明图书的品种多。也正因为出版种类多，才需要进行详细的图书分类，从而便于读者购买。在大类中，以"文艺"类所占篇幅最大，为47页，其次为"史地"、"自然"、"技术劳作"等类别，各占10页左右。另外，"语文"、"公民"、"普通读物"、"体育；童子军"、"生理卫生"、"社会"也各占一定的篇幅。这种图书出版结构，一方面承接了20年代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优势，另一方面则说明儿童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力度得到了加强。《全国少年儿童书目》除了进行详细的图书分类外，还按读者对象知识的深浅程度，对各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层次分级，采用了书名前加注阿拉伯数字的方式，如"1"表示可供幼稚生或刚刚识字的儿童阅读的；"2"表示可供小学初年级生或勉强能够读懂粗浅读物的读者阅读的；"3"表示可供小学中年级生或略具普通文字知识的读者阅读的；"4"是表示可供小学高年级生或初中一二年级生以及对各科有粗浅知识的读者阅读的[4]。编者如此不厌其烦地对各书进行分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出版的儿童

[4]《全国少年儿童书目·编例》，《生活全国总书目》。

图书，已经充分注意到儿童的年龄段特征及其相应的阅读需求。

在儿童读物的出版方式上，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者依然喜欢丛书的出版形式。这点与20年代并无二致。小出版机构出版的儿童丛书，多是规模既小，出版的时间也不集中；而在20年代就已有出版基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这时开始改变了以往零零散散的作风，加大了儿童读物出版的整体计划。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500册、《幼童文库》200册、《小学生分年补充读本》600册；中华书局的《小学生丛书》60册、《小学各科副课本》300册、《小朋友文库》450册、《初中学生文库》300册等，都是先广告预约而后相继出版的。既为预约，就得明确告知读者具体的书名、种册数、出版日期、价格等信息，若没有预先统一的安排，断然不能采用这种出版方式。大书局在儿童读物出版上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从商业竞争角度上说，是想采取以大取胜的策略。不过，既然能"大"得成功，说明30年代儿童读物的编写能力，较之20年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

与儿童图书出版情况相类似，30年代抗战前儿童期刊的出版也颇为繁荣。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杂志月报》第一号上，列出了12种当时正在刊行的儿童刊物，其中有老牌的《小朋友》、《儿童世界》，也有新出不久的《童年月刊》和《儿童科学杂志》等。专门为儿童阅读的报纸《儿童晨报》也出现了。支撑儿童书刊出版繁荣的深层原因，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主要是社会上对儿童教育的普遍重视。报刊上有关儿童读物的热烈讨论可谓是不绝如缕。30年代初有"鸟言兽语"的争端。继193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审查儿童文学课外读物标准》之后，1933年10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又呈准上海市政府定1934年为儿童年；1935年3月，国民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1935年8月1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这样，在与"儿童年"相关的1934、1935、1936年间，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儿童文学运动"。儿童读物出版的繁荣便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潮水般向儿童涌来的读物中，格调高尚、有益于儿童身心者有之，而夹杂着陈腐说

教、粗制滥造者也颇为不少，鲁迅、茅盾等人在当时都曾对那些“哄”（茅盾语）的、“毒害小儿的药饵”（鲁迅语）的有害读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

【1】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315页。

四、儿童读物出版的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大本营的上海，也随后不久沦陷于敌手，中国出版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战前儿童读物出版的繁盛一度为沉滞萧条所取代。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儿童读物的出版逐渐地出现了转机。由于战争的四处星散，原先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大都市的儿童读物创作队伍及报刊出版机构，日渐分割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孤岛”上海和延安根据地（解放区）等三块不同的出版区域。

大后方儿童读物的出版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动范围包括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贵阳以及香港等地。战时大后方先后创办了《少年先锋》、《少年战线》、《西南儿童》、《抗战儿童画报》、《抗战儿童》、《少年之友》、《新儿童》、《儿童生活》、《儿童漫画》、《儿童世界》、《开明少年》、《儿童月刊》、《儿童工作》、《抗战儿童旬刊》等刊物。1945年4月，被战火中断七年之久的著名儿童刊物《小朋友》也在重庆复刊。这一时期大后方出版机构印行的儿童图书亦复不少，重要者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少年读物丛刊》，文化供应社的《少年文库》，建国书店的《少年文艺丛书》，作家书屋的《儿童文库》等。

沦陷区的少儿出版活动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顽强地开展着。特别是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从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沦陷直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少年出版社与《少年读物》为两个主要出版阵地，采用或是公开或是秘密的方式，坚持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抗日爱国宣传和儿童文学活动。少年出版社系由苏苏主编的《儿童读物》发展而成，成立于1939年，在两年多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了25种儿童文学集子。苏苏在《少年出版社

缘起》中宣布的“为着维护我们祖国的幼芽”，“写一些切实的儿童读物”，告诉炮火中的孩子们“血淋淋的现实”的出版方针[1]，是该社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少年读物》的主编是曾写过《囚绿记》、《海星》等以风格清丽著称的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份大32开本的半月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创办于1938年。巴金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靳以、萧乾、李健吾、芦焚、苏苏、贺宜、仇重等著名作家也常有文字在该刊上发表。

【1】转引自王泉根：《抗战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救亡主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根据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其内容显现出与同时期的大后方、沦陷区不同的特色：注重描写新的人、新的事、新的儿童精神，充满明朗向上的色调。各根据地创办的儿童刊物可考的有《边区儿童》、《西北儿童》、《青年与儿童》、《华北少年与儿童》、《儿童生活》、《儿童文艺》、《儿童画报》、《新儿童》、《儿童之友》、《江淮儿童》、《华中少年》、《少年画报》、《儿童文娱》、《儿童戏剧》、《新世纪的孩子们》、《新少年》等近20种之多。这些儿童刊物在战火纷飞、物质技术条件又很匮乏的根据地地区，尽管大多刊行时间不长，印刷也谈不上好，但积小溪而成大河，对革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出版社陆续迁回上海，上海再度成为儿童读物的出版中心。笔者根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附录《丛书出版年表（1902—1949）》，将带有明显儿童图书标志的丛书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见下表。表中显示，抗战以后儿童丛书的出版情况，要远远好于抗战时期。

出版年	丛书数量	出版年	丛书数量	出版年	丛书数量
1938 年	3 套	1942 年	1 套	1946 年	13 套
1939 年	8 套	1943 年	3 套	1947 年	14 套
1940 年	1 套	1944 年	5 套	1948 年	14 套
1941 年	6 套	1945 年	2 套	1949 年	4 套

然而，倘若仔细对照《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每一套丛书的细目，我们就会发现，抗战以后尽管丛书出版总的种类不算

少，总计达45套之多，但每一套丛书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出版的一些儿童丛书，多是将战前出版物进行重编重印，新编新写的比较少。这些都表明，抗战以后儿童读物的出版，较之战前的繁荣，还有不小的距离。外战结束，内战接踵而至，战争给整个出版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儿童领域的出版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民国各历史时期儿童读物的出版情况，大致如上所述。民国时期究竟出版了多少种儿童书刊，由于资料查找困难，现在已很难搞得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儿童读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书刊出版类型，作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一种重要教育方式，是在民国时期得以孕育成形并得到迅速发展的。过去很多青少年正是借助出版界提供的课外读物，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培养了情操，体验了美感，学习了技能，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第十章　工具书、学术著作和古籍出版

第一节　工具书出版

我国工具书编纂历史悠久，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一本字书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史籀》15篇。从工具书类型看，我国历代字典、词典续作很多，但其他类型的工具书却不够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从两汉到明清，我国工具书的总数为597种。到了民国时期，工具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物类型，受到出版界和学术文化界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内容还是编纂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版数量明显增多。在民国时期38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工具书1 450种[1]，包括百科全书、字典、词典、年鉴、书目、索引等各个类型。

[1] 何华连：《我国中文工具书编纂出版分期概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在百科全书出版方面。近代以来，我国出版了几部小规模的百科全书，如《日用百科全书》、《中华百科辞典》、《少年百科全书》等数种。《中华百科辞典》由舒新城主编，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该辞典约200万字，在体式上虽为辞典，性质上则兼顾各科各系统的知识，每条释文之下，依其性质照学科分为各类，内容包括政治、社会、哲学、教育、经济、文学、艺术、数学、理化、博物等各科，可以说是一部中型百科全书。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想编译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并在编译所内设“百科

全书委员会”，由编译所所长王云五自兼，下设六个系科，打算以《大英百科全书》为蓝本，综合美日等国的百科全书加以编译，后因译稿质量不够理想，未能出版。近代中国没有编出一部大型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百科全书要求能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而当时我国现代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许多门类尚无担当此任的专家学者；其二，编纂大型百科全书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由于近代百年间政局动荡，政府无暇顾及此事，而私人出版机构又缺少足够的财力和号召力。

在辞书出版方面。汉语字典辞典的编纂出版，成绩最为突出。由于字典辞典是知识分子、普通读者和一般学生的案头必备书，有十分广阔的市场，所以各出版机构竞相为之。商务印书馆1912年由陆尔奎、蔡文森等费时五年，编纂出版了《新字典》，这是我国自《康熙字典》后第一部新型语言工具书。该书“凡字典所有之字无一不备；其通俗之字（如炸、礁等）、新制之字（如钙、镍等）……无不补入”。蔡元培赞扬该书“于吾前举《康熙字典》诸缺点，既皆矫正”[1]。

【1】蔡元培：《新字典·序》，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1912年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华书局成立伊始，就由欧阳溥存等人着手编写《中华大字典》，1915年初版，收字48 000个，总字数400余万言，各字按部首编排，用反切和直音注音，分条解释字义，引例注明出处，对籀、古俗、讹和近代翻译新字，均作辨明。同时校正了《康熙字典》的错误4 000余条。次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中华中字典》。1918年，又出版杨誉龙、潘延贵等编的《实用大字典》，这是以《中华大字典》为蓝本，加以增删、补遗、正误而成，流传较广。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由陆尔奎等人编纂，收单字1万多个，词目10万余条。这部辞典对旧学新知都有所反映，正如刘叶秋所说：“既是一部革新的词典，又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因此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起了不小的作用。从初版以来，至解放初期，历年重印的累积印数，多至四百余万部。直到今天，它还是我们常用的一部工具书。”[2]《辞源》问

【2】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238~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世后，1931年出版续编，1939年出版正续编合订本，1949年又出版简编本。

中华书局在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后，即筹划编纂另一部大型词典——《辞海》，以与商务的《辞源》相抗衡。《辞海》先期由徐元诰、范源廉主其事，后由舒新城、张相、沈颐等续其成，前后历经20年。1936年底，《辞海》出版，收字约13 000个，复词10万余条，内容包括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成语典故、农工商用语、古今地名、人名、名著、文艺及科学术语等。该辞典出版后颇受欢迎，一版再版，分印甲种（16开圣书纸本）、乙种（16开道林纸本）、丙种（32开圣书纸本）、丁种（32开道林纸本）、戊种（32开报纸本），抗战期间还有重庆版的南平毛边纸本，1947年出版32开精装合订本。各种版本行销在100万部以上。

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1913年由"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注音字母"。次年，由吴稚晖按"注音字母"标准编撰的《国音字典》，规定注音字母共40个，并将《国音字典》作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1930年，国民政府通令将"注音字母"改为"注音符号"。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由钱玄同主持编定的《国音常用字汇》，经教育部公布定为汉字发音标准的全国通用根据。《国音常用字汇》是以北京音系为读音标准，书中用注音符号所拼注的字音，均按此标准加标了四声符号。该书共收12 000余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在读音上具有法定地位，因此这两部字典在几十年间发行了几十版。中华书局亦不甘落后，依据上述读音标准，同样编印了一系列字典如《国音普通字典》等，以争夺市场。

除了上述字词典外，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字词典还有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词典》、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杨树达的《词诠》、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

专科辞典的出版，在民国时期也很兴盛。商务出版的专科辞典比较重要的有：《中国植物学大辞典》（1917年初版）、《植物

学大辞典》(1918年初版)、《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初版)、《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年初版)、《动物学大辞典》(1923年初版)、《哲学辞典》(1925年初版)、《教育大辞书》(1928年初版)、《地质矿物学大辞典》(1930年初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初版)(图57);中华书局出版的专科辞典重要的有:《外交大辞典》(1937年初版)、《经济学辞典》(1937年初版)、《中外地名辞典》(1924年初版)、《地学辞典》(1930年初版)、《中外人名辞典》(1940年初版)。此外有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图58),1920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丁氏还编有《说文解字诂林》、《古钱大辞典》等。文献学家杨家骆编有《四库大辞典》、《丛书大辞典》,由中国图书大辞典馆分别于1931年和1936年出版;此后杨氏在《四库大辞典》的基础上又编有《四库全书学典》,194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彭作桢编《古今同姓名大辞典》,1936年北平好望书局发行。潘念之等编《世界人名大辞典》,193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4年由光明书局出版。孙重沓公编《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1934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还有谢规等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汪仁寿的《金石大辞典》等。这些辞典均影响一时,有些至今仍重印再版,供人们

图 57(左)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科辞典

图 58(右)
佛学大辞典





参考使用。

双语词典的编译以语文词典数量最多，涉及到世界上的各主要语种。英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16年伍光建编的《〈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18年李玉汶编、伍光建校订的《汉英新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年陆费执、瞿桐岗译定的《英华正音词典》，商务印书馆1923年张世鎏、陆学焕编的《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商务印书馆1928年黄士复、江铁主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法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20年谢寿昌等编的《模范法华字典》；日本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30年葛祖兰编译的《日本现代语辞典》；俄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30年路大华编的《新中俄大字典》；德语的有中华书局1920年马君武编的《德华字典》；西班牙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43年O. P. Ibakez编的《班华字典》；世界语的有商务印书馆1922年孙国璋编的《世界语高等文典》（新读本）和上海曙光出版社1935年周庄萍等编的《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等。

在年鉴出版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鉴逐步丰富，并基本形成规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1909年到1949年，共编纂出版了99种、约150回次的年鉴[1]。大略归纳当时出版的年鉴，可分综合性的、地方性的、专科性的三类。综合性的年鉴，如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申报馆编印的《申报年鉴》，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年鉴》，1923年上海新亚书店编印的《新国民年鉴》等；地方性年鉴，如1930年无锡县政府编的《无锡年鉴》，1931年东北文化社编印的《东北年鉴》，1935年广州市政府编的《广东年鉴》，1947年华东通讯社编的《上海年鉴》，1937年湖北省政府编的《湖北省年鉴》等；专科性年鉴，如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1933年实业部编的《中国劳动年鉴》，1935年财政部编的《财政年鉴》，1936年内政部编的《内政年鉴》。

在书目索引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目录可分为两类：

【1】王世伟：《中文工具书使用指南》，13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一是重印的古典目录，如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集成》初编中，收录各种史志目录、官私藏书目录等古典目录44种（其中2种未出）；一是当代人编制的目录，主要有：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35年）、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1947年）、王梦曾《真文学史参考书》（1935年）、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1922年）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索引中，重要的有：庄鼎彝《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1935年）、邓元鼎、王默君《宋元学案人名索引》附异名索引（1936年）、《十通索引》（1937年）、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1941年）、钱亚新《太平御览索引》（1934年）、《佩文韵府索引》（1937年）等。

开明书店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书目与索引。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二十五史补编》，其中收录清代至民国间学者为正史艺文志所作的补辑目录达28种之多。这些目录大多首次刊行，为研究我国历代典籍，提供了极为完备的目录资料。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索引，主要有：金步瀛《丛书子目索引》（1935年）、叶绍钧《十三经索引》（1934年）、陈乃乾、陶毓英《室名索引》（1934年）、陈乃乾《别号索引》（1934年）、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人名索引》（1935年）、汪宏声《中国历代年号索引》（1936年）。

除了上述两家出版的目录索引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很重要的目录索引：平心《〈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年生活书店版；杨家骆《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1936年中国图书大辞典馆印行；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1933年北平图书馆印；孙殿起《贩书偶记》，1936年印；《中国近代史书目初稿》，1937年上海鸿英图书馆编印；陈乃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启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另外，在三四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和中法汉学研究所各自出版了一批中国古籍的索引，在近代出版界和学术界极具地位。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影响下，1942年，中法汉学研究所（1948年后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成立通检

组，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纂，并出版通检丛刊，其中主要有：《论衡通检》（1942年）、《吕氏春秋通检》（1943年）、《淮南子通检》（1944年）、《战国策通检》（1948年）、《山海经通检》（1948年）、《大金国志通检》（1948年）、《契丹国志通检》（1949年）。

民国时期工具书之发达，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对西方文化知识的需求。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这样说道："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新旧扞格，文化弗进，友人有久居欧美，周知四国者，尝与言教育事，因纵论及于辞书，谓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吾国博物院图书馆，未能遍设，所以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1] 工具书汇集新知，释义准确，解答问题迅速，翻检便利，不失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捷径，因而大行于世。其二，教育普及。戊戌变法以后，传统的教育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新式学堂逐步诞生。到20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新式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新式学校发展很快。民国建立以后，到抗战爆发，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处于持续发展阶段[2]。学校和学生的增加，就需要更多的教科书和其他学生用书如工具书等，这就刺激了出版业在这方面的竞争和发展。同时，教育的普及，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出版界提供了更多的潜在读者，对工具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生活相对静止，信息更新缓慢。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信息增长、更新迅速。工具书能够把浩瀚的信息浓缩，供人们利用。"现代人类生活日趋繁复，社会变化日益剧烈，行政范围日益广大，万机丛脞，纷然杂呈，处此时代之人群，无论为政为学为工为商为军，欲冀于最短之时间，费最少之精神，得足以应付此时代环境之资料，非有此种年鉴以供按索，其道莫由"[3]。新型工具书如年鉴、手册、文摘等，由于能够满足人们及时获取信息的需要，因而在民国时

[1] 陆尔奎：《辞源说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61页。

[2]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71~78页统计资料，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3]《江西年鉴》刘治乾"牟言"，见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出版，1936年。

期得到长足发展。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出版

一、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现代学术的确立

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学术摩擦激荡，使中国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机制处于转变之中。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一时期于称为转型时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1]

中国现代学术在民国时期的确立，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学术研究的体制化。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大学和研究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近代学术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新式学堂所采用的分科教育形态，又与学科体制的建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清末新式学堂分科设学的方式，一方面重构了晚清学人的知识分类概念，在另一方面，制度化的形式也逐渐确立了近代学术发展的方向。”[2]

民国时期大学学科设置略有变动，与清末新式学堂相比，和西方知识体系的衔接更为紧密。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22条，规定大学本科有7科。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4门专业，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9门专业，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3门专业，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6门专业，

【1】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10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2】刘龙心：《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44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医科分为医学、药学2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11门[1]。1926年公私立大学共51所，1925年大学及专科在校学生36 321人，1926年大学专科毕业人数为2 841人[2]。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1929年，民国时期最大的地方性科学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创立。两者共拥有20个研究所，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现代学术依赖大学和研究所的机制生存、发展、传播，大学和研究所的普遍设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确立的重要标志。

二是现代学术精神的形成与认同。民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各家交锋激烈，起伏跌宕，主要有激进、保守、自由主义三种潮流。虽然各家见解不同，但是标榜的学术思想规则无所区分，即为学术自由和学术理性。陈寅恪表彰王国维学术之真谛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3]陈独秀对科学的解释是：“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4]胡适评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意义时，曾这样说道：“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的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将五四新思潮概括为四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5]

学术自由与学术理性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在五四时期及稍后，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学术理论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多彩。除戊戌时期所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之外，西方的实用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种种理论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学术遗产也开始了更加深入的重

[1]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177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2]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146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

[3]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1919年4月4日。

[4]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卷一），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

【1】张岂之、方光华：《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的中西兼融》，《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

新评介和整理[1]。

学术自由和学术理性思想在民国时期的确立并成为各家的共识，为中国现代学术挣脱政治的羁绊，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广阔空间和评判标准，使得独立的学术研究得以在这一标准下展开。这一范式的确立，是中国现代学术成熟的标志，它也为中国当代学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国时期学术出版统计与学术出版概貌

【2】杨堃：《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七，1943年。

出版关乎教化，滋长文明，出版界、学术界中人对此皆有深切的认识。"吾国近三十年一般学术，显有进步，虽与出版界之发达未必悉成平行线，而从出版界之情况以窥测学术之趋向，要为至有兴味之事。"[2] 民国时期现代学术的成长在出版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对民国时期出版成就总结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出版物，虽然略有遗漏，但大致反映了民国时期学术出版的面貌。下面是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统计的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出版图书种数绘制的表格。

【3】社会学含人口学。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出版图书统计表

学科	政治	经济	法律	文学理论	语言文字	历史学	地理学	考古学	文化理论	教育学
著作种数	14 697	16 034	4 368	2 033	3 861	4 685	2 641	300	248	9 324
学科	哲学	逻辑学	美学	伦理学	心理学	社会学[3]	新闻出版	图书馆学	统计学	
著作种数	1 909	113	25	937	365	2 854	423	499	326	

【4】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综合性图书》编后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了1911—1949年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124 042种，其中上表统计的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著作总计65 642种，而1911年以前中国古代约4000年出版的古籍总数才10万种左右[4]。中国现代学术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在这一时期的发达。

民国时期学术出版的成就还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自著的

现代学术著作大量涌现。民国以前，中国翻译了众多的西方近代学术著作，但是自著的很少。徐维则1899年出版有《东西学书录》，收录鸦片战争以来西书567种（不包括纯宗教书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其他45种，包括游记、杂著、议论等。晚清“中国人言外事、讲西学者书亦日出，择其切实者掇拾数十种概附于后”[1]。中国人的自著比重很小。到了民国时期，各学术领域虽然仍延续了大量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风气，但是中国学者自著的著作有了大幅度的进步。民国时期政治的相对松动，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以及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等，都促成了学术发展的一派盎然之机。下面以中国固有的史学和新兴的社会学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历史学著作共4 685种，其中除了民国时期伪政权出版的178种外，中国学者编著3 686种，翻译（包括编译）821种，其中自著的比例为78.7%[2]。社会学（不包括人口学）2 660种，自著2 262种，翻译398种，自著的比例为85%[3]。虽然《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包含了一些机构的报告或者统计等学术性较低的书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自著的著作数量增长迅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成熟。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各学术领域学术经典著作的大量出现，也展示了民国时期学术的风采。像史学有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卷1–4）(1934年)，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顾颉刚等的《古史辨》(1–6，1926–1938)等；文学、文字学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26年)、《宋元戏曲史》，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等；哲学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1939—1946年)，金岳霖的《论道》（1940年）等；社会学有费孝通的《生育制度》(1947年)、《乡土社会》(1948年)、《江村经济》(1925年）等。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水平，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延续。其中很多著作至今还在重印，嘉惠当代学人。

【1】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自序,1899年。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3】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1995年。

中国现代学术出版成就显著，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受制于当时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社会环境不稳定，现代学术积累薄弱等，学术环境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影响了学术的发展。时人曾对中国现代法学有过评价："中国近代法学已有十年历史，就其内容与实质言，纵谓中国尚无法律文化，似亦无过当之论。盖中国法学文化大半为翻译文化、移植文化。……中国法学之现实一面为讲义文化、教科书文化及解释法学文化。"[1] 法学研究论著质低量微，作者用"中国法学的贫困"来结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法学。这一批评应当不局限于法学领域，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尤其是新兴学科的处境和发展水平。

【1】蔡枢衡：《抗战建国与法的现实》，见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277~27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三节 自然科学图书出版

传统中国不太重视科技，到了晚清及民国时期，科学的地位受到了尊崇。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写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 科学不仅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价值观和世界观，20世纪初始被广泛传播，形成一种潮流。科学化潮流得到两方面的推动力，即新文化运动人士在思想文化层面对科学价值的推崇，以及科学工作者对实际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的传播。这股潮流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开始体制化，表现为：科技教育制度化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协会的成立和研究机构的设立；基础学科的建立；工业布局与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传统科学被融入了世界化的近代科学之中。

【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2~3页，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20世纪前期科学化运动的结果，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世界和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与集传统文化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中得到反映。两者都是大型回溯性国家书目，代表了当时的知识体系，从两者的比较中

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状况和知识构成。

《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世界，被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著录的图书，凡3 470部，79 018卷；《四库全书存目》（以下简称《存目》）6 819部，94 034卷。两者都有少量图书无卷数。《总目》著录科技图书255种，《存目》也著录255种[1]。《总目》著录的科技图书类别为：

部别	类别	属别
子	兵家	
	农家	
	医家	
	天文算法	推步、算书
	术数	数学
	谱录	器物、饮馔、草木禽鱼

《民国时期总书目》“采取有书即录的方针”，系统收录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收录的1911—1949年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124 042种，约占民国时期出版图书的90%，基本反映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的面貌。其中科技类图书13 663种，约占11%[2]。科技图书的分类为：

1级类目	2级类目
自然科学	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晶体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生物科学
医药卫生	医学总论，预防医学、卫生学，中国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肿瘤学，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皮肤病学与性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口腔科

[1]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04~1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2]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综合性图书》编后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学，特种医学，药学
农业科学	农业科学总论，农业基础科学，农学（农艺学），植物保护，农作物，园艺，林业，畜牧、兽医、狩猎、蚕、蜂，水产、渔业
工业技术	工业技术总论，一般工业技术，矿业工程，石油、天然气工业，冶金工业，金属学、金属工艺，武器工业，动力工程，电子技术，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化学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建筑科学，水利工程
交通运输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附航天）

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与《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的科技图书的比较，不难看出，首先在出版数量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近40年出版了科技图书13 663种，而前者囊括了清乾隆以前的历代科技典籍，仅510部，足见民国时期科技知识增长之快速。其次在出版图书类别上后者更细密。以医学和农学为例，两者同样都著录了医学和农学类别，《四库全书》在医家和农家类别下，不见属别，著录简略。而《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的医学和农学，则分类详细，自成体系。要知道，医学和农学在我国古代还算是显学，其他类别就更毋论矣。《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的许多新兴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等，均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未见，表明民国时期传统学科体系已不可逆转地向西方现代科技体系转化。

在民国时期科技书刊的出版中，大书局和科研机构组织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商务印书馆是书业的佼佼者，在科技图书的出版上，也执业内之牛耳[1]。商务在从事出版业之初，就致力科技书籍的翻译、编印。早在189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翻印英文图书时，就曾编印过一套名为《科学入门》的用汉文注释的英文教材[2]。五四以后，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出版科技丛书，如《自然

【1】1935年前，各家出版自然科学图书1 275种，商务印书馆出版463种，占总数的39%；技术知识各家出版2 808种，商务印书馆出版605种，占总数21%。

【2】徐式谷、陈应年：《商务印书馆对我国科技翻译出版事业的历史贡献》，《商务印书馆一百年》，618页。

科学小丛书》、《工学小丛书》、《农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等。其中《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除6种外，均为译作，在我国翻译的科技图书中，是最为完整齐备的一种[1]。其后，出版科技图书的范围有所扩大，又出版了《科学丛书》、《算学丛书》、《医学丛书》、《农学丛书》、《工程丛书》以及《大学丛书》中的理工农医各学院用书等。据统计，商务1950年前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1 299种，应用技术图书1 351种，共2 650种[2]，门类涉及到科学总论、天文气象、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动物及人类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及地理学、科学名人传及其他，基本包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内容。而且在读者对象上，考虑到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既有适合一般读者科普性质阅读需要的，如《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也有供中等学生研究的，如《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25种，同时也有供科学家研究参考的，如《科学丛书》等20多种。1929年商务开始编纂的《大学丛书》，任鸿隽、李四光、周昌寿、秉志、竺可桢、翁文灏等自然科学方面的顶级专家，被聘进55人编辑委员会之中，保证了这套丛书的质量水平。《大学丛书》二十多年共出版了317种，自然科学占148种，包括译作和自著[3]。其中，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不仅在国内评价很高，还被翻译为英文。

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紧随商务之后，亦出版科技图书844种，分别为自然科学263种，技术科学134种，医药、卫生112种，农学、畜牧、林业120种，地理215种[4]。民营出版机构之外，民国时期科技出版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为各科技学会和研究机构。清末民初，由于政府威信下降，对社会的控制减弱，社会的力量有所增强。各类社会团体纷纷成立，科技学会也应时而起。自1912年至1937年间，各种学会组织达到110多个，不包括医学部分，涉及到近代科学技术的广大领域[5]。民国时期的科技学会多把出版书籍、发行杂志、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作为主要的工作。1915年成立的最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其章程规定业务有9项，第二项即为著译科学书籍。192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

【1】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76~79页。

【2】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统计》，《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附录。

【3】《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总目录》，《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目次，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4】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何艾生、梁成瑞：《中华民国科技史》，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其四为编译图书。学会刊行的科技著作，重要的有中国科学社的《中西星名考》、《科学的南京》（赵元任），《显微镜理论》（吴伟士），《中国木本植物目录》（钟心煊），《植棉学》（章之汶），《地质学》（谢家荣），《地文学》（竺可桢），《动物学》（秉志）等[1]。中国科学社下属的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0年至1947年出版有《实用土木工程丛书》12种，科学普及丛书则有《中国科学社科学画报小丛书》10种、《中国科学社科学画报丛书》12种、《中国科学社通俗科学丛书》3种[2]。中国天文学会编写的天文书籍有《应用天文学》（秦汾），《普通天文学》（胡文耀），《中西对照恒星表》、《中星仪说》（常福之），《相对性原理》、《图解天文学》（高鲁）[3]。中国工程师学会则出版有《机车概要》等工程书籍2种。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至1937年出版有《中国水利珍本丛书》2辑11种[4]。中华医学会1948年至1949年，出版有《近代医学丛书》11种[5]。各科学学会还和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书籍，共同推动民国时期科技出版的发展。

【1】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382页，1979年。

【2】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244页。

【3】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385页。

【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216页。

【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204页。

随着中国近代科技研究体系的建立和研究水平的进步，晚清时期科技书籍几乎全部为翻译引进的现状，到民国时期得到了很大改变，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近代科技图书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然而，在科学本土化获得可喜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时科技水平还相当落后，科学社会化还相当不普及，这些都影响了科技书籍的出版。在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结构中，自然科学书籍比例偏低的事实，正是对当时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现实反映。

第四节　古籍的出版

中华文化"特点之特点，即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为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其所以然之故，不可不深考焉"[6]。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连续，历代对文献的整理、编纂、抄写和刊刻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撰有国家藏书目录

【6】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10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别录》、《七略》以后，历代政府援为成例，至清政府编纂的《四库全书》，为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民国时期，受西学的冲击和国内政局动荡，国家政府无力于文化建设，对前代文献整理与出版的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立的藏书单位、民间的个人藏书家和民营的出版机构成为古籍出版的主要力量。

一、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数量统计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善本古籍影印目录（1911—1984)》、《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编》、《中国丛书广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6种大型书目中著录的民国时期出版古籍统计，并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等目录进行校正，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图书馆等机构刻书、藏书家刻书三大系统共出版古籍26 859种，以及《说郛》100卷、《续藏经》7 140卷（见表一）。

表一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年代种数表(单位:种)[1]

年代	种数	年代	种数
1912	294	1932	210
1913	156	1933	425
1914	964	1934	906
1915	854	1935	2 982
1916	461	1936	4 062
1917	670	1937	2 051
1918	391	1938	366
1919	265	1939	149
1920	1 062	1940	560
1921	879	1941	362
1922	1 738	1942	51
1923	757	1943	73
1924	939	1944	115
1925	1 341	1945	41
1926	1 188	1946	55
1927	367	1947	213
1928	233	1948	68

【1】统计上述书目时，依据下列原则：1.统计的单位为出版种数；2.统计的出版物为影印本、排印本、木刻本，不包括手抄本和稿本；3.丛书分开按子目计算；4. 出版物的不同版次，按一种计算；5.不同出版机构的同一出版物，分别计算；6.统计时，书目中著录的跨年代出版的丛书，有年代的，按出版年代统计；没有注明年代的，按每年平均数统计。7.出版年代不清的，单独计算。

续　表

年代	种数	年代	种数
1929	272	1949	7
1930	151	不详	1 133
1931	398	总计	26 859

表一显示出，1920年至1926年，是民国古籍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时期；1934年至1937年，为古籍出版的第二个高峰，也是古籍出版最为鼎盛的时期。最高的1936年，种数超过4 000种。4年总数超过1万种，约占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总数的38.9%。

二、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主体

图书馆。晚清以来，传统的三大刻书系统官刻、坊刻、私刻逐步演化，新式图书出版业逐渐走向成熟。晚清的官书局在民国时期多被裁撤或并入省立图书馆或省立通志局。其中浙江省立图书馆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民国时期公立机构刊刻古籍之翘楚。浙江省立图书馆继承浙江官书局旧刻，自设印行所。据1934年编刊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木印书目》统计，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的古籍有：经部45种，史部75种（4种非古籍），子部39种（2种非古籍），集部48种，丛书14种（包括章太炎著《章氏丛书》）[1]。出版古籍种数之多和种类之丰富，不逊中华书局等大书店[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承江楚编译局及淮南书局之木刻铅石印书，由印行部负责刊刻书籍，“计存38种。近七年来新印书计63种，总为101种，51 866部，129 518册。最近新出版之二书尚不在内”[3]。其他图书馆如北平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等皆有刻书之举。

旧书业。民国时期的旧书业延续了坊刻的出书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在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上未能超出传统坊刻。扫叶山房、文瑞楼、校经山房、博古斋、会文堂书局、古书流通处、千顷堂书局、中国书店、著易堂等古旧书店，皆是其中的代表，其中扫叶山房尤具典型性。作为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出版和贩

【1】丛书14种分别为《玉海》200卷，《玉海十三种》20册，《蓬莱轩地理丛书》初集17种，二集13种，《二十二子》22种，《邵武徐氏丛书》初集13种，二集8种，《金华丛书》67种，《续金华丛书》59种，《半庵丛书初编》10种，《啸园丛书》58种，《富阳夏氏丛刻》7种，《武林掌故丛书》26集193种，《武林往哲遗著》60种附刻2种，《当归草堂丛书》8种，《当归草堂医学丛书》10种，《章氏丛书》12种。按丛书子目作单种计算，共766种。按主题来分，有1.有关杭州西湖的书籍；2.国医参考书；3. 文学书籍；4. 浙江文献；5. 国学基本书；6. 章氏丛书；7.二十二子；8.九通；9.快阁师石山房丛书。

【2】浙江省立图书馆编：《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木印书目》，1934年。

【3】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概况》，1935年。

卖书店，扫叶山房有三四百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直到1955年出版业公私合营结束。其出书内容限于古籍，开设的分号有5家，分别为扫叶山房北号（上海棋盘街），南号（上海彩衣街），扫叶山房汉号（汉口四官殿），苏号（苏州阊门内），松号（松江马路桥）[1]。但是其资本一直有限，到1930年资本额仅为12 000元，而同期的商务资本额为500万元。二者不可同日而语[2]。传统坊刻为什么不能演化为现代出版企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藏书家。民国时期的不少藏书家刻书，质量精良。时人以为："家刻书在中国为最精。以其经营此事者，第一为专门积学之士，或重刻古籍以广流传，或刊行先著以资显扬，或校印孤稿以防佚失，或印辑自作以备馈赠。第二为显官富商，嗜尚所及，下逮附庸风雅之辈，铺张门面之流，皆能聘请名儒，招致良匠，不惜工本，以事剞劂。其嘉惠士林之功，亦不可使其泯没。"[3] 这一时期的藏书家，如罗振玉、张钧衡、刘承干、陶湘、董康、傅增湘、徐乃昌、丁祖荫、刘世珩、李盛铎、张寿镛以及卢靖、卢弼兄弟等，以刊布古籍为己任，并因各自收藏的不同，刻书各有特色。

新出版机构。民国时期的新出版业在大力介绍西方学说的同时，亦致力于固有文化的流布与普及。中华书局创立宗旨中的第四条写得明白："融和国粹欧化"[4]，世界书局"以科学化经济化而从事国学书籍之整理"[5]，大东书局"以发扬中国文化为职志"[6]，从事古籍出版的理念相当清晰。与此同时，由于二三十年代整理国故思潮的推动，公私藏书机构对古籍需求的刺激，古籍出版本身也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利之所在，各大出版机构趋之若骛，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的成绩最为突出。商务印书馆资本雄厚，印刷技术精湛，更有热衷古籍收藏、精通古籍学问的张元济作主持，古籍出版蔚为大观。民国时期总共出版古籍约27 000种，商务一家占1/3强。仅以丛书计，就有53种，包含子目8 992种，以及《说郛》100卷、《续藏经》7 140卷。(见表二)。而且

【1】扫叶山房主人编刊:《扫叶山房图书汇报》,1915年。

【2】原放:《记上海市书业公会》,《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3】王汉章:《刊印总述》,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361页。

【4】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陆费逵与中华书局》,430页。

【5】《优待第一期国学名著定户办法》,《景印十三经注疏》附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6】《编印中国医学大成缘起》,《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上海，大东书局印行，1936年。

【1】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善本古籍影印目录(1911—1984)》、《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中国丛书广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统计。

表二　商务出版及代印古籍丛书目录[1]

书　名	类别	刊刻时间	种数	卷数
痛史	史	1911—1917	21	
明季稗史续编	史	1912	6	
御纂医宗金鉴	子	1912	15	
唐人四集	集	1914	4	
唐六名家集	集	1914	6	
唐人八家诗	集	1914	8	
五唐人集	集	1914	5	
十三经	经	1914	13	
旧小说	集	1935	392	
涵芬楼秘笈	丛书	1916—1921	50	
影印殿本二十四史	史	1916	24	
元曲选	集	1918	100	
续古逸丛书	丛书	1919—1938	46	
学海类编四百三十三种	丛书	1920	433	
四部丛刊	丛书	1920—1922	323	
学津讨原二十集	丛书	1922	172	
别下斋丛书	丛书	1923	27	
道藏附续道藏	子	1923—1926	1476	
正统道臧医书十种	子	1923	10	
佚存丛书	丛书	1924	17	
涉闻梓旧	丛书	1924	25	
汉魏丛书	丛书	1925	38	
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	集	1925	40	
学生国学丛书	丛书	1925—1940	93	
果报类编	集	1926	4	
元人十种诗	集	1926	10	
宋人小说	集	1926	29	
道藏举要	子	1926 年后	176	
说郛一百卷	集	1927		100
论画辑要	子	1928	8	
奢摩他室曲丛	集	1928	35	
百衲本二十四史	史	1930—1936	24	
国学基本丛书第一集	丛书	1929—1931	100	
国学基本丛书第二集	丛书	1934—1937	188	
四部丛刊续编	丛书	1934	75	
四部丛刊三编	丛书	1935—1936	70	
十通	史	1935—1937	10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丛书	1935	232	
影印四库全书四种	丛书	1935	4	

续 表

书　　名	类别	刊刻时间	种数	卷数
选印委苑别藏	丛书	1935	40	
丛书集成	丛书	1935—1937	3467	
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丛书	1935—1947	50	
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丛书	1937—1940	620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	丛书	1937	12	
子汇二十四种	子	1937	24	
两京遗编十二种	丛书	1937	12	
古今逸史五十五种	史	1937	55	
评注诸子菁华录	子	1939	18	
百家词	集	1940	87	
孤本元明杂剧	集	1941	144	
广东丛书	丛书	1946	19	
续藏经	子	不详		7140
五种遗规	子	不详	5	
全相平话四种	集	不详	4	
净土津梁十三种	子	不详	13	

整理出版的范围是全方位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国学基本丛书》皆包容经史子集四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则汇集存世乙部善本（图59），经校勘审订，补缀而成，实为清代学者未能做到之大工程，在正史的校勘整理上超越了清代学者的成就，为辑印正史承前启后之巨帙。佛教则有《续藏经》，道教则有《道藏附续道藏》。此外，还对清人著作加以整理出版，同时注意满足不同层次读者之需要——保存古籍原貌，影印善本秘籍之《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续佚存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提供真实可靠、极具版本价值之文献，以经济条件较为优越之图书馆、学者、藏书家为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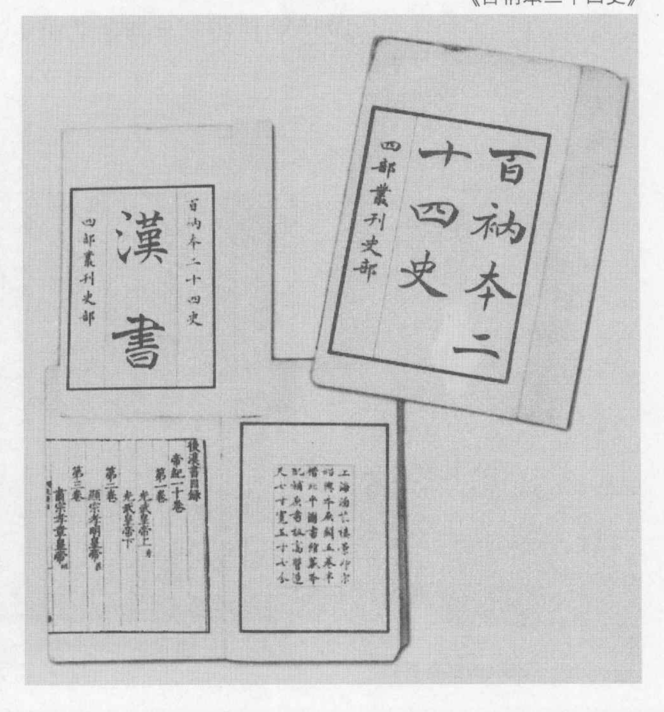


图59
《百衲本二十四史》

者对象；排印国学要籍，价廉质优之《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基本丛书》，着眼于文化普及，以购买能力有限之学生和普通大众以及经费支绌之小图书馆为对象。两类古籍均以流通为目的，而互为辅助，并行不悖。

三、民国时期出版重要古籍介绍

《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图60)。《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四部丛刊》开始发售预约，1922年全部刊成。收古籍323种，8 548卷（4种无卷数），分订成32开线装2 100册。《四部丛刊》所收，皆为善本，其中有宋本39种，金本2种，元本18种，影宋写本16种，影元写本5种，校本18种，明活字本8种，高丽旧刻本4种，释道藏本2种，其余皆出明清精刻。192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初编，并对原本作了一些更动：一是抽换了21种版本；二是将原编中残缺的部分补足；三是对许多书都作了校勘记。1936年又将初编印成16开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适合图书馆开架阅览之用。1934年刊印《续编》81种，1935年至1936年刊印《三编》73种。正续三编总计收书477种，11 92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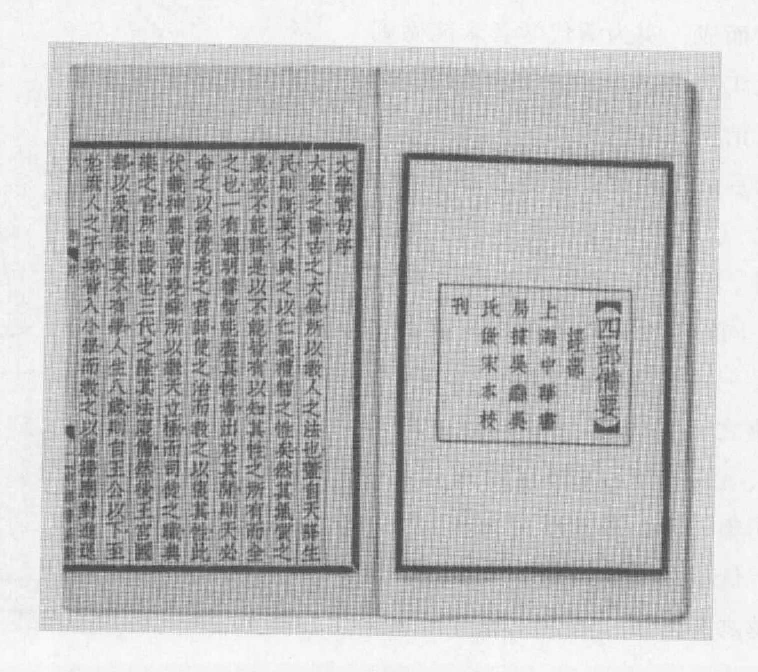


图60
《四部备要》

关于《四部丛刊》的价值，张元济曾在刊印缘起中概括为“七善”[1]，考之事实，大抵与之相符，因而问世后，受到学术界重视，“先后两版，销数达五千部之钜”[2]。文献学家郑鹤声、郑鹤春将其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并列，称之为“现代编纂国学书中惟一之伟业焉，较之《永乐大典》、《图书集成》等俱为迅速，主旨一贯，无前后易手错出之弊”[3]。

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成功后，中华书局起而效仿，于是有《四部备要》的出版。《四部备要》1922年开始发售预约，1927年出齐，收古籍351种，11 305卷，初以连史纸和赛宋纸两种纸张印刷，线装12开，分订2 500册，1934年又有线装5开本印行，1936年出洋装缩印本。《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择取中国传统的四部要籍刊行于世，宗旨是借此反映传统文化学术的主要面目。由于两书在选目和出版手段上的差别，各自显示的学术意义和收藏价值也很不一样。《四部丛刊》讲究版本，非宋元旧注，概不轻用；而《四部备要》则注重实用，充分选收清代学者如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注疏本。在出版手段上，《四部丛刊》使用影印技术，使宋元旧椠保持本来面目，在版式、字画等方面不失古书风貌；而《四部备要》则利用聚珍仿版活字排印，该套活字是杭县丁辅之兄弟费十余年心力，取宋版书字体仿写制作而成，字体款式古雅，精整优美，1921年归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便利用它排印《四部备要》，印出来的效果古色古香。《四部丛刊》虽比《四部备要》早出两年，但由于两书在内容上的互有侧重和形式上的各有千秋，后者的市场销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经济效益上，两书都可谓各得其所。在社会效益上，可以这么说，以商务《四部丛刊》开其先，中华《四部备要》继其后的两大文化工程，代表了中国古籍出版的一个新纪元，实是继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之后数百年来中国古典文献整理的最大盛事。

《丛书集成》与《古今图书集成》。继《四部丛刊》后，1935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又有《丛书集成》之辑。《丛书集成》

【1】张元济总结的“七善”为：汇刻群书，昉于南宋，后世踵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浏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矣。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矣。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矣。雕板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其善五矣。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大小不齐，缥缃异色，以之插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精雅，其善六矣。夫书贵流通，流通之机在于价廉，此书搜罗宏富，计卷逾万，而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籍廉至倍蓰，即较市上新版亦减之再三，复行预约之法，分期交付，既可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便分年纳价，使购者举重若轻，其善七矣。

【2】《〈四部丛刊续编〉预约》，《申报》1934年3月1日。

【3】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1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难后第一版。作者注：由于《四部丛刊》为宏编巨制，工程浩大，不可能尽善尽美。刊成后，时人亦指出其疏漏之处，“约有五端：(一)所选各书未云足备也。(二)所选诸书版本之可议也。(三)校勘记及佚文补辑之不可废也。(四)版本之谬误亟宜更正也。(五)印刷时多描改致失原本面目也。”蠡舟：《论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四部丛刊〉》，《图书馆学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29年。

[1] 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326页，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

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被称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三部大型综合性丛书[1]。《丛书集成》辑印宋、元、明、清名贵丛书100部，综计子目约6 000种，去其重复，还有4 107种，实际出书3 467种，多数以铅字排印，并加以断句，少数用影印。该书在编排上依照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先分为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文学、史地等十大类，再区分为541小类，分装4 000册。各类包括的子目种数为总类 368种，哲学451种，社会科学322种，宗教34种，自然科学158种，应用科学225种，语文学145种，艺术285种，文学1 216种，史地883种。本书收编了我国古代自汉魏以来直到明清四部以外的笔记、丛钞、杂说等单本、孤本书籍，可补四部书之不足。

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古籍的另一大工程。《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正文(附图记）收古书6 000余部，计1万卷，16 000万言，在国际上有“康熙大百科全书”的美誉。《古今图书集成》最早有清雍正六年（1728年）内府的铜活字本，共印64部。1884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采用扁宋体铅活字排印，共印1 500部，惜讹误不可胜数。1890年，同文书局照原书大小影印100部，分存京沪。沪本不久即遭火灾。到20世纪20年代，市面上已经流传甚少。1933年，出版界翻印古书之风盛行，中华书局亦开始筹划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和《各省通志》，商务印书馆其时也有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之计划，两家遂起冲突。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主动退让，以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商务影印《各省通志》而使冲突圆满解决。1933年冬，广东中山旅沪富商陈炳谦将所藏康有为旧藏殿版铜活字本，赠与中华书局做底本之用。其中62册抄本和同文版所附石印本考证24卷，皆从浙江省立图书馆借印。该书1934年10月开始第一批出书，到1940年2月全部出齐，共影印1 500部，每部16开808册。其中博物汇编、艺术典等，因需求较多，影印了2 500部。在传承文化及书局营业两端，影印

《古今图书集成》于中华书局可谓皆有斩获。

《嘉业堂丛书》。《嘉业堂丛书》由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刘承干辑刻，以收书罕见、内容丰富著称于世，可谓民国私家刻书典范之一。刘承干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得以跻身民国最大的藏书家之列。其藏书楼“嘉业堂”，为民国时期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他利用藏书资源的优势刊刻了大量古籍。据1935年重订的《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乙亥重订）统计，主要有《嘉业堂丛书》56种（附录5种），《吴兴丛书》64种，《求恕斋丛书》30种，《留余草堂丛书》10种，《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等，而以《嘉业堂丛书》最为有名。《嘉业堂丛书》刊刻于1913年至1918年，分经史子集四部，“取古近人著述之有益于斯世而不易得者，精刊而广布之”。《嘉业堂丛书》所收之书，特色有二。一为罕见，如《周易正义》，《四库全书》未收，为杨守敬从日本抄出，堪称海内秘籍。二为辑刻禁毁之书，如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等为清季禁书，其中《翁山文外》沉晦三百年而复出。故缪荃孙称该丛书有“三善”：“一曰遵经训，一曰重孤本，一曰补佚。”[1] 因此，该丛书得到学者的重视也是理所当然。

【1】转引自刘尚恒《古籍丛书概说》，1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四、古籍出版对现代学术进展的贡献——以国学研究为例证

近代国学在辛亥革命时期国粹主义思潮推动下，日渐高涨。从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开展到30年代，形成国学研究的鼎盛期，国内各种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国学的兴起，有西风东渐后国人藉国学以抗欧化的背景。倡导者意图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整理研究中国旧有的典籍和历史文化。1925年，顾颉刚在评论当时国学研究的状况时，认为“现在中国能够有一点科学规模的研究，还是算国学”，原因是，国学研究材料“非常的多，采取甚便，故亦容易兴起”，“国学既有此丰富的材料，又能承受西洋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提倡，又有成绩贡献，故觉得非常热

【1】顾颉刚:《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1925年3月1日。

【2】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30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8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闹”[1]。而供给材料，则有赖出版界的参与。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高峰从1920年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延续到1937年抗战，与国学研究的兴盛时间几乎成两条平行线。这一阶段，仅以国学命名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就有《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国学小丛书》，另有大东书局的《国学门径丛书》，文殿阁书庄的《国学文库》，中央书店的《国学基本文库》，国学研究社的《国学珍本丛书》。大至商务、中华辑印的丛书，小到各书局零星翻印的旧籍，无不以国学为广告词。各书局翻印旧书，推动了国学研究的进展，自身也获利丰厚。诚如陈以爱所说："20年代以后，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国，学术机构与出版机构之互相配合，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近代学术文化发展与出版事业之间，确实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2]

古籍出版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可从许多国学研究者的具体研究实例中得到验证。如梁启超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一节，即引用了当时新出的《四部丛刊》本《亭林文集》[3]。潘光旦写作《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在叙述"本篇的资料由来与作法"中有商务影印《涵芬楼秘笈》中彭孙贻的《彭氏旧闻录》和《太仆行略》，并称"也很有几分用处"[4]。书后"参看作品"列有《成都氏族谱》，为张钧衡《适园丛书》本。胡适从事学术研究，翻刻古籍是他常用的资料。下面从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胡适文集》中摘录出胡适引用的新刻古籍，兹列表如下：

胡适引用新印古籍表

文章名	引用书名	版本	文集卷数	页码
《水浒传考证》	《宣和遗事》	商务印书馆本	2	410
	《元曲选》	商务印书馆本	2	410
	《杂剧十段锦》	董康影印本	2	410
记李觏的学说	《直讲李先生集》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	25
费经虞与费密	《弘道书》	成都唐氏怡兰堂1920年《费氏遗书》本	3	41

续 表

文章名	引用书名	版本	文集卷数	页码
梁任公《墨经校释》序	《墨经》	《四部丛刊》翻印嘉靖癸丑本	3	124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颜李遗书》	《畿辅丛书》本	4	70
	《颜李全书》	四存学会本	4	70
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	《白氏文集》	《四部丛刊》本	4	267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淮南王书》	《四部丛刊》本	6	512
章实斋先生年谱	《章氏遗书》	浙江省立图书馆本 刘承干刻本	7	23
读曲小记(二)	《皇元风雅》	《四部丛刊》本	10	74
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	《金圣叹批刻本〈水浒传〉》	1934 年中华书局影印	10	86

新刊古籍的大量出版，直接推动了国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著作方面，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载，这一时期汉语类著作有2 495种（《语言文字》分册），中国医学类著作有901种（《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分册），中国哲学著作有1 138种（《哲学心理学》分册），中国古代兵法类著作有94种（《军事》分册），中国经济思想历史有35种（《经济》分册），中国文学15 687种（《中国文学》分册），丛书、类书2 543种（《综合性图书》分册），中国史（辛亥革命前）1 267种，中国人物传记2 513种，中国地理1 701种，中国文物考古273种（《历史地理》分册）。在论文方面，由于杂志和报章上属国学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致使国立北平图书馆从1929年到1936年，先后编辑了《国学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续编》、《国学论文三编》和《国学论文四编》。所有这些，亦从总体上说明了古籍出版对学术研究的贡献。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国内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各民族在受到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压迫与统治的同时，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在对外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对内争取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与团结。民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央集权统治时代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这一时期民族迁移力度加大，民族融合进程加快，以满族的汉化最为显著。尽管中国的民族关系较前有了新的发展，但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依然存在。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插手和干涉，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民族关系出现了紧张现象。

[1] 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3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宣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并在此后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付诸实践。抗日战争开始后，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主要矛盾，各民族团结一致，谱写了抗战救亡的历史新篇章。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字仍在继续使用，文献仍在延续，但由于各民族交往更加紧密，政治、经济、

文化交流力度加大，而汉民族的文化辐射力增强，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除一些人口较多、居住较集中、地域较边远的民族外，其他民族的文字的使用出现明显弱化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前流传使用的民族文字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乌兹别克文、俄罗斯文、朝鲜文、满文、锡伯文、彝文、藏文、傣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水书、景颇文、苗族的伯格理文、老傈僳文、拉祜文共21个民族28种文字。这期间，民族文化虽有发展，但由于长时间战乱，也受到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学者集中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和整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文献出版

自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对教育一向很重视，主要分为寺庙教育和私塾教育两类，许多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蒙古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同时又有许多官学、书院、私塾和义学遍布各旗。自20世纪开始，又出现了“蒙旗兴学”的热潮，在“废科举、兴学校”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许多新式的学堂在各旗兴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满蒙文高等学堂在北京成立。不久又创设殖边学堂，分蒙部、卫藏两科，三年制，专门培养蒙藏专门人才。

一、民国早期的蒙文出版物

民国时期，蒙旗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北京筹边高等学堂，民国二年北京蒙藏学校成立。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内蒙古各盟旗都建立了小学和中学。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也促进了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

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是喀拉沁右旗的《婴报》，创刊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主办人是喀拉沁多罗都棱郡

王、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该报为石印，四开，社址在喀拉沁右旗崇正学堂内。该报宗旨是启发民智、宣扬新政，内容包括国内外要闻、时事短评、科学知识、盟旗动态等。停刊时间不详，有出刊七八年之说。[1]

【1】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叙录》，154页。内蒙古图书馆，1987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便有了蒙汉对照的《蒙话报》月刊，16开，石印，由官书刷印局承印。郭旗一直受吉林将军节制，清末建省后属吉林省，该刊最初由吉林调查局主办，后由蒙务处主办。该刊"以开通蒙民智识，宣传朝廷德意为宗旨"，内容有圣谕、历史、论丛、奏牍、时事要闻、浅近学说、杂组、市价等，启蒙性很强，是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最早的蒙文刊物，约在辛亥革命时停刊。[2] 这两种在清末维新风潮影响下创办的报刊开启了近代蒙文报刊的先河。进入民国时期，蒙文的报刊便愈加多了。

【2】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叙录》，183页。

民国初年的北京是蒙文出版物的重要基地，1912年11月1日，在北京出版了蒙文半月刊《大同报》，这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份蒙文刊物。《大同报》为石印，大32开，由正蒙书局印刷。该刊社址在前门外北火扇胡同，发起人为巴达尔呼，编辑为特克新加布。刊物内容有命令、法规、评论、专载、蒙古要闻、中央新闻、外省要闻、国际要闻等。内容大多译自汉文。[3]

【3】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叙录》，81页。

辛亥革命后，废除清政府理藩部，改设蒙藏事务处，后改为蒙藏院，出版《蒙文白话报》。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蒙藏学校，成为培养蒙古族和藏族先进知识分子的摇篮。1928年底成立蒙古留平学生会，出版名为《蒙古》的蒙汉合璧不定期刊。当时北平还有一些蒙族人士组织，如"蒙古文化改进会"，由当时旅平的蒙族青年和热心蒙古的人士组成。"蒙古青年励志会"，主要由学生组成，这些组织出版了蒙汉合璧的刊物《蒙古月刊》、《励志月刊》等。

蒙文书社是第一个用蒙古文铅字印刷的出版机构。1923年由特木格图（1887—1939）在北平创办。特木格图是蒙族杰出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他出生于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汉名汪睿昌，字印

侯，1903年在北京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学习，1906年留学日本，六年后回国供职于蒙藏院并在北京蒙藏学校任教。他在北京建立漠南景新社，石印蒙汉对照教科书，并为蒙藏人士摄影。他刻苦钻研，于1922年创制成蒙满文铅字，1923年创办蒙文书社，自任总经理、编译。他所创蒙文铅字印刷效果醒目美观，不久传入蒙古及西欧等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特木格图通晓蒙、满、汉、藏和俄、日等语文，编译出版了很多蒙、汉、藏书籍和教科书，如《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蒙古黄金史》、《译注蒙古源流》、《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西汉演义》、《聊斋志异》，以及蒙文教科书、工具书等，为蒙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蒙文书社1930年迁至南京，专门承印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和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的蒙藏汉文书刊、公文和教科书，1934年停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蒙文书社共出版各类图书60多种，10万余册，在近代蒙古文化出版事业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1]（图61）

【1】《蒙古族通史》下卷，48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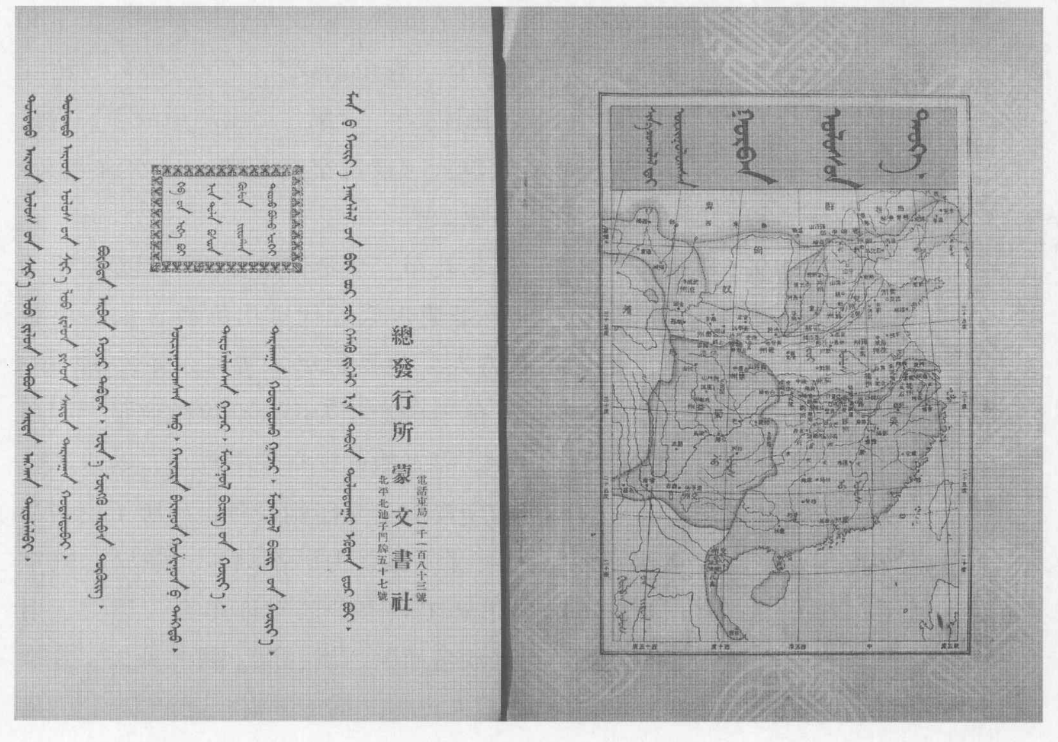


图61
新译带批蒙文《三国演义》

蒙文学会于1926在北京成立，创办人布和克什克（1902—1943）是蒙族现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和文化活动家。他是哲里木盟奈曼旗人，1923—1926年在北京上大学，1929年在蒙藏学校任教，1933年在伪满洲国任文教科长，并陆续创办了几个学校。

蒙文学会是布和克什克1926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创立的，其宗旨是“以认真研究蒙古文字，用蒙古文字推广所有的知识，更新观念，开启蒙古民族的智慧，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艺术为主要目的”。[1] 学会还于当年出版了蒙文刊物《丙寅》，初为石印，后改为铅印，16开。“丙寅”之名是为了纪念成吉思汗在1206年（丙寅年）即大汗位，建立蒙古国。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主要有历史、地理、卫生、科学、常识等内容。该刊出至第三卷时中断，1931年布和克什克在伪满洲国时复刊，1938年初得到东蒙书局的印刷设备后改为铅印，1944年出至第十卷后停刊。[2]

《丙寅》杂志团结了一批蒙古族文人学者，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为蒙古族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蒙文学会还整理出版了40余种民族文化典籍，著名的有《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蒙古族源史》（《蒙古源流》）、《蒙古秘密历史故事》（《蒙古秘史》）、《古今蒙文故事》、《蒙古字新辞典》、《水浒演义》等，在蒙文出版史上独树一帜。[3]

1926年克兴额和儒勒格尔扎布、热希僧格在沈阳创办东蒙书局。克兴额（1889—1950）是蒙古族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他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人，汉名包存智，字明远。他于1922年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因反对曹锟贿选，愤然退出国会。克兴额创立东蒙书局后，购入原哲盟出版《蒙话报》的官书刷印局的全套印刷设备，出版了《初学国语》、《蒙文小学教科书》、《详解蒙古语字典》、《蒙汉合璧字典》、《三合便览》等教科书和工具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典籍。克兴额精通蒙、满、汉、藏多种文字，亲自翻译的《聊斋志异》，被后人评为“词汇丰富、翻译准确”，是

[1]《蒙文学会章程》，载《丙寅》第四期，1936年11月。

[2] 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80页，内蒙古图书馆，1987年。

[3]《蒙古族文学史》，第四卷，66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翻译作品的典范。”

东蒙书局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满蒙文旧籍和民间文学作品并列入出版计划，还拟编译出版一批中外进步书籍，但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受到军阀当局的压力而未能如愿。1941年克兴额又集资创办蒙文编译馆，自任馆长，先后出版了《蒙文辅助读本》、《公尼召活佛之箴言》等蒙文图书和大量蒙族作家的文学作品。[1]

[1]《蒙古族文学史》，第四卷，3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沦陷期间的蒙文出版物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早已虎视眈眈，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成立伪满洲国，开始了在内蒙古东部的殖民统治。1939年日本又策动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联合政府”，内蒙古东部地区全面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在蒙古族地区大力灌输奴化思想，在文化教育方面严加控制，学校里只准学习日文、蒙文，不准学习汉语文。

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蒙族人民，加强了舆论控制，兴办了多种报刊，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这一时期蒙文报刊约有十五六种之多。主要的如《蒙古新报》，创刊于1937年4月，是当时伪满洲国唯一的蒙古族报纸。主办单位是伪满洲国御用机构蒙古会馆，该报为周五刊，铅印，对开四版。1940年随着蒙古会馆撤销而停刊。《大青旗》1943年在长春创刊，社长和总编都是日本人，由伪满洲国有关部门出资。该刊至1945年6月停刊。

蒙古会馆还编印出版过一些图书，如（伪）康德六年（1939年）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作《麦田和军人》、（伪）康德七年（1940年）出版的《分类尺牍》等。伪满洲国的出版物一般都用“康德”等伪年号作纪年。

伪满洲国还出版过一些蒙文刊物，如《兴安总署汇刊》、《蒙政部汇刊》等。

张家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塞上名城，北依内蒙古草原，南临

华北平原，是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重要通道，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张家口在内蒙古近现代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蒙古族文化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918年，张家口出现了一个出版机构——汉蒙翻译国华书局，这是内蒙古近代史上的最早的出版机构，由察哈尔牛羊群总管策愣栋鲁普主持创办，这个书局先后翻译出版了汉蒙合璧的《幼学须知》、《国文教科书》（1919年），《二十四孝》（1918年）等启蒙教材。[1] 这些出版物都是石印的。（图62）

【1】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80页，内蒙古图书馆，1987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还有一个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翻译出版过一些图书，如《蒙汉大学读本》、《蒙文文法》、《大蒙古元朝史》等。

1939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首府从厚和（呼和浩特）迁往张家口，张家口成为当时一个重要城市，出版了许多书报杂志。1938年伪"蒙疆政府"成立了蒙古文化馆，这是在原绥远省民众教育馆、通志馆、图书馆合并后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馆创办了月刊《文化专栏》（蒙汉合璧），出版了蒙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成纪734年阴阳合历时宪法》、《圣谕广训》



图62
石印本汉蒙合璧《二十四孝》

等图书。1941年蒙古文化馆迁至张家口，改名为“蒙古文化研究所”，继续编印出版了一批蒙文书刊，如《蒙文教科书》、《蒙古小儿书》、《元朝秘史》等。1940年一批蒙古族知识分子在张家口成立蒙古文化会，创办了蒙文月刊《复兴蒙古之声》，在当时蒙古族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蒙古文化会的参加者多为蒙疆新闻社蒙文部的蒙古族职员。《复兴蒙古之声》初为油印，1941年2月改为铅印，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主要内容有学术、科学、文艺等。[1]

伪蒙疆时期张家口有一个蒙疆资料社，1941年7月25日成立，这个机构以收集资料对蒙疆进行综合研究为目的，主办《蒙古画报》，有蒙汉两种版本，可能是内蒙古地区最早的画报。[2]

伪蒙疆时期，还出版一些报纸，其中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机关报《蒙疆日报》创刊于1937年10月，最初社址在厚和(呼和浩特)，这份报纸由日本人在原《绥远日报》、《绥远西北日报》的基础上创刊，原名《蒙古日报》，1938年3月改名《蒙疆日报》，成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关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该报恢复《蒙古日报》旧名，不再成为政府机关报。这份报纸以宣传日蒙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的重要宣传工具[3]。

【1】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后简称《报刊考录》),75页,内蒙古图书馆,1987年。

【2】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后简称《报刊考录》),76页。

【3】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后简称《报刊考录》),159页。

三、教会的蒙文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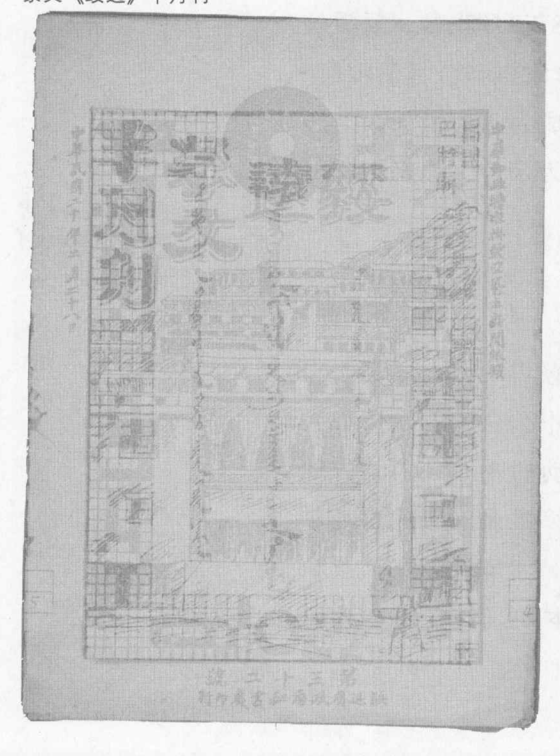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耶稣教会的传教活动深入内蒙古地区，用蒙文出版了一些书刊。在20世纪初，上海的英美圣书公会就开始用蒙文铅字印刷《马太福音》，随着耶稣教传教活动的开展，内蒙古地区也出版蒙文的基督教的一些书籍，现存较多的是20年代察哈尔商都温泉耶稣教区的出版物，如《天路历程》、《旧约要义》、《新约要义》等，这个教区也出版一些学生读本如《初学启蒙教科书》等。

四、国民党的蒙文出版物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设有蒙藏委员会，内设蒙事处、藏事处等处室，还辖管驻北平办事处、北平蒙藏学校等机构，蒙藏委员会是沿袭北洋政府的蒙藏院而设的。蒙藏院在设立之初，出版《蒙文白话报》(1913—1914年)。南京的蒙藏委员会也出版《蒙藏半月刊》、《蒙藏月报》等刊物。蒙藏委员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还出版一些蒙文或蒙汉合璧的宣传品，如《实行训政宣传大纲》、《中国今后政治设施之标准及趋向》、《蒙藏同胞对于司法应了解的几个要点》等等。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也出版过一些蒙文的《三民主义》及一些政治宣传品。

1928年冬，蒙古代表团获准在南京设立联合驻京办事处，出版《蒙文报告》，为周刊，后改为《蒙古周刊》，蒙汉合璧，1930年10月10日创刊，16开铅印，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主要栏目有本处启事、文牍、蒙事纪要、时事要闻、党义、法令、常识、蒙文研究、蒙事商榷、专载等。这份刊物当时在蒙古族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

图63
蒙文《绥远》半月刊



另有《蒙古前途》，为南京蒙藏学校刊物，蒙汉合璧月刊，后改为《现代蒙古》。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内蒙古地区主办的报刊约有20余种。如蒙文《绥远》半月刊由绥远省政府秘书处主办，1929年冬创刊，蒙汉对照，石印，16开，以传达政令、沟通蒙汉情形为宗旨，内容有新闻、省闻、公牍、党义、讲演等栏目。此刊实为政府公报，每期印数400份，分发乌盟、伊盟十三旗，并赠送有关人士及机关团体。[1]（图63）创刊于1933年6月的《蒙文

【1】《报刊考录》，31页。

周报》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办的蒙汉对照刊物，汉文铅印，蒙文石印。该刊附设于《绥远民国日报》社内，主要刊登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和政治、实业、教育等方面的消息。[1]

《奋斗日报》是傅作义部队第35军办的报纸，前身为油印的《新闻简报》，1939年8月改为铅印。1946年春出版蒙文石印版的《奋斗日报》。蒙文版的《奋斗日报》实际由绥境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出资并领导，约于1946年底停刊。[2]

在包头还有一份《民众日报》，1929年7月创刊，1948年停刊。该刊为石印，四开二版，蒙汉文各一版，由国民党绥蒙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主办。[3]

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察哈尔省盟旗文化福利委员会在张家口出版了《蒙声半月刊》，蒙汉合璧，汉文铅印，蒙文石印。

呼和浩特出版有蒙汉合璧的《蒙古青年》刊物，是蒙古青年励志社的机关刊物，有傅作义部队为背景。该刊宣传反共和“戡乱建国”，虽为月刊，但出版不及时。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文出版物[4]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直接培养教育下，内蒙古出现了第一批蒙族共产党员。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蒙族共产党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创办了蒙文刊物《内蒙国民旬刊》，其办刊宗旨为“一要保护和发展蒙古人民的生计权益；二要忠实报道真实情况，以消除广大人民的糊涂认识；三要以广大人民的自由和提高文化知识等为主”[5]。抗日战争时期，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奋起反抗日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1946年4月，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统一。1947年5月1日，在王爷庙（后改为乌兰浩特）正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至此，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解放战争和

[1]《报刊考录》，40页。

[2]《报刊考录》，138页。

[3]《报刊考录》，139页。

[4] 本节主要参照忒莫勒编著的《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写成，有关部分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5]《蒙古族通史》下卷，48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民主改革，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很多，大多为报纸，从形式上看，不少是油印的小报，这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影响所致。如《伊盟报》，创刊于1944年，初名《蒙古报》，为4开油印，后改为石印，由中共三边地委在定边创刊，后为中共伊克昭盟委的机关报，有蒙汉两种文版，共出版53期，发行12 000多份，后并入《绥远日报》。

《内蒙古自治报》，这是一份历史较长、经历曲折的报纸，最早为《人民之路》，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总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45年10月18日，蒙文，油印，8开，初为两张，第8期起改为一张，不定期刊物。1946年1月26日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由政府宣传处主办，每期印数为百份。该报宗旨为号召内蒙古人民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和繁荣。内容包括时事、内蒙古现状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评论等。

与《人民之路》同时的还有不定期刊物《黎明》，这是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东蒙本部主办的。1945年12月18日创刊，油印，8开一版。初为隔日刊，第13期起改为不定期刊，有蒙汉两种文版。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成立于1945年10月5日，1949年3月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黎明》是青年团的机关报，主要刊载国际时事、国内要闻、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知识、社会发展史、领袖人物介绍、革命常识、新蒙文学习、评论和诗歌等。1946年5月3日改名为《群众》，至6月停刊，负责人调去改组《东蒙新报》。

《东蒙新报》是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机关报，三日刊，每期印刷1 000份，共出版41期。1946年7月1日改名为《群众报》。因为因袭原《群众》报的办报方针，故改此名。该报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的机关报，分蒙汉文两种文版，铅印，汉文版为三日刊，共出59期，蒙文版刊期不定，最初为4开一版，第19期起增为二版，共出30多期。

1947年1月1日《东蒙新报》改为《内蒙自治报》，双日刊，1947年11月15日改为日刊。1948年1月1日改名为《内蒙古日报》，

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机关报。

当时内蒙古日报社蒙文编辑部除出版报纸外，还担负着翻译出版蒙文图书的任务，这些图书包括政治理论、文史和科学知识等门类，如《共产党宣言》、《论人民民主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常识》、《蒙古秘史》、《刚毅英雄陶克陶胡传》、《汉蒙辞典》、《蒙古语语法》、《卫生常识》、《自然现象》、《识字课本》、《儿童读物》、《蒙古民歌选》、《农历》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百余种图书，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为历史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内蒙古图书出版机构正式成立，才结束了这一历史使命。[1]

[1]《蒙古族通史》，下卷，48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第二节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

新疆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设省，20世纪初开始推行"新政"，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至1949年的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杨增新统治时期、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等几个阶段。

一、民国早期民族出版物情况

辛亥革命前夕，已有一批同盟会的成员在新疆活动，当时伊犁是新疆的政治中心，以同盟会伊犁负责人冯特民为主笔的《伊犁白话报》于1910年3月25日创刊。这张报纸以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发行，其中汉文为铅印。《伊犁白话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塔城、宁远（今伊宁）、绥定（今玛纳斯）、霍尔果斯及内地的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处均设有代表处。《白话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到同年10月27日被新上任的伊犁将军志锐下令停办。此报尽管历时不长，但影响很大，当时被评为具有"振聩起聋，开通民智"的作用。这也是新疆第一张以近代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

民国元年（1912年）1月7日晚，革命党人举行伊犁起义，成

立新伊大都督府，将《伊犁白话报》改为《新报》，用汉、维两种文字恢复出版。[1]

杨增新统治时期实行愚民政策，对内地出版物严加封锁。1915年出版《新疆公报》，这是用上一年从内地买的一套旧印刷机印的，共出了147期。1918年改印书局为官报局，出版不定期的《天山报》，所载内地天津、上海等地新闻报道都是半年之前的事，而分发到各县时，已成一年之久的历史了。

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自《白话报》停刊后，再无接续。少数民族只有靠每年朝觐的机会秘密携带书报回来互相传阅。苏联在塔什干出版《解放》报（《库吐施报》），这份报纸由赴中亚采棉的维族人带回新疆，由于乌兹别克语与维吾尔语相近，颇受新疆维吾尔人欢迎。连杨增新都很注意这份报纸，他曾将刊载的劣迹官员报道译出抄给有关的几个道尹和县知事看，以示警戒。[2] 1922年，包尔汗与其好友米尔扎江秘密出版了一种刊物名《新生活》，每期100份，每份10余页。估计是油印本，只出版了两期旋即停刊。[3]

1928年南疆宗教领袖萨比提毛拉自撰一本穆圣小传，想在伊犁出版，受到拒绝，后经维族头人多人联名担保，才获准印行。当时连《古兰经》都在禁止出版之列。[4]

1928年1月7日杨增新被暗杀，新疆开始了金树仁统治时期，这时的出版事业并无什么进展。1930年《天山报》改为《天山日报》，但其落后面貌依旧。1932年1月7日的《天山日报》还将内地前一年12月20日的报道作为最新新闻。[5] 这时期的学校有所增加，但许多民族学校使用的课本为土耳其、印度、苏联或其他国家出版的教科书，没有新疆自己编印的课本。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包尔汗向金树仁提出改进报告，并建议从德国采购印刷机器设备，成立民族语文印刷厂。金树仁采取了敷衍态度。最后直到金树仁被推翻也未办成。[6]

【1】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39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2】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3】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02页。

【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2322页。

【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2322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6】包尔汗：《新疆五十年》，122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二、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情况

1933年乌鲁木齐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被推翻，盛世才成为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最高领导。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提倡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成立了维、哈、索伦、锡伯、柯、蒙、满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促进会，创设民族学校或民族班，发展民族教育。

《新疆日报》社是民国时期新疆的最大宣传机构，也是当时的出版中心。《新疆日报》社最早是清末的印书院，民国三年(1914年) 从内地买了一套旧的印刷机，出版《新疆公报》，民国七年改为官报局，出版不定期的《天山报》，1930年改名《天山日报》，用四号字印刷，每日出刊一小张。1935年3月21日改为一大张，一版为社论和广告，二版为国内外新闻，用4号字，三四两版为地方新闻和文艺版，用旧5号字。

1934年8月1日，新疆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油印出版了第一份维吾尔文《新疆日报》。翌年，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与省政府合办了《新疆维吾尔报》(铅印)。1936年4月《天山日报》改为《新疆日报》,《新疆维吾尔报》与其合并出版《新疆日报》维文版。

1939年经萨空了介绍，新疆日报社购进了整套印刷机器设备，又从苏联买了一部分印刷机器，并在乌鲁木齐西大桥建立报社新舍，还附有电台和俱乐部，不但成为全新疆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先进的印刷出版基地，也是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报社之一。

1936年4月新疆日报社成立后，在迪化设立了总社，在伊犁、塔城、阿山、喀什、和田等地成立分社，1939年6月在阿克苏也设立了分社。

迪化总社出版的《新疆日报》除汉文版外，还有维文版、哈文版和俄文版。1940年《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版全年共印997 357份，塔城维吾尔文报纸印450 067份，喀什维吾尔文报纸印43 352份，和田印刷的维文报纸为11 950份。[1] 据1942年的统计，维文

【1】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7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版为二日刊，发行量为5 000份，哈文版为周刊，发行量为3 152份，俄文版为周二刊，发行量为1 000份。

《新疆日报》伊犁分社除汉文版外还出版维文版，为日刊，哈文版为周刊。塔城分社有汉文、维文版，阿山《新疆日报》分社的汉文版为油印，维文版为铅印。南疆的阿克苏、和田、喀什的汉文版《新疆日报》都是油印，维文版为铅印，刊期为二日刊、周刊不等。[1]

【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4766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迪化《新疆日报》总社从1945年9月1日开始，维文版由隔日刊改为日刊，篇幅为对开，与汉文版同。11月14日起每星期日还出版十六开本的星期刊，内容侧重于时事和学术方面的论文，哈萨克文版改为三日刊，篇幅也是对开。[2]

【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6739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在盛世才执政之初，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新疆日报社社长由共产党人赵实（王宝乾）担任。1939年初萨空了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在这种背景下，《新疆日报》大量报道了延安等根据地的消息，还刊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章，从1939至1940年间，《新疆日报》维文版连续刊登了乌依谷尔·沙依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系列译文。[3]《新疆日报》印刷厂还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批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3】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7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42年盛世才逐渐暴露出“反共反苏”真实面貌，正式投靠国民党。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首先控制了《新疆日报》，派出大员李尚友为总编辑，《新疆日报》过去收录新华社新闻和社论，则改为收录国民党中央社新闻和社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还利用《新疆日报》社先进的印刷条件，大量翻印《三民主义》和《中国之命运》，据统计，1943年维文《三民主义》印刷8 000部，蒙文《三民主义》民族、民权部分各印1 000册，维文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文告印3 000册。1944年拨出预算30万元计划译印蒙文《三民主义》民生部分1 000册，蒙文《三民主义问答》2 000部，蒙文《中国之命运问答》1 000册，维文《三民主义》1、2、3分册各再版5 000册，俄文《三民主义》3 000册，俄文《中国之命

运问答》3 000册，维文《中国之命运问答》1万册。维文国民党党员守则与伊斯兰教义3 000册，《总理遗教浅说》维文2万册，哈文5 000册，蒙文1 000册，《主任委员讲演集》维文2万册，哈文5 000册，蒙文1 000册，俄文1 000册[1]。

还有一些政治性的小册子被译成民族文字出版。如盛世才于1935年在第二次全疆民众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有维吾尔文译本，汉文版在1935年5月出版，维文版第二年出版，由包尔汉翻译。[2]

1940年春，被关在狱中的包尔汉受命翻译孙中山的名著《三民主义》为维吾尔文，分成三册，印发至全疆各部队、机关、学校，定为必读书籍。当时用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国民党宣传品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这时的新疆日报社已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宣传工具。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建立了西北文化建设委员会，并在迪化成立编译馆，出版维文、汉文版的《天山画报》和《文摘》、《少年知识》、《天山文艺小丛书》等书刊。[3]

盛世才上台之初，伪装进步、标榜"反帝"，1934年8月1日在迪化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1935年出版机关刊物《反帝战线》，1942年停刊。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刊物，共出版汉文版55期，维吾尔文版8期。[4]

《新新疆》是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创办的维文周刊，1934年底创刊出版。编辑部有23人，规模在当时全疆是较大的，主要由夏吾东·祖农尼、卡德尔阿吉、海达尔等人负责编辑。

《新新疆》月刊自1943年4月成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机关刊物，除汉文版外还有维文版。不过这个刊物到1944年1月至3月因纸张缺乏便停刊了，维文版因纸张困难、翻译人才缺乏而未付印。[5] 直至1944年11月方出版维文版第一期，1945年1月出版第二期。[6]

1946年7月1日联合省政府成立后，建立了西北文化建设委员会，在迪化设编译馆，用汉、维两种文字出版《天山画报》和针对维族青年的《文摘》、《少年知识》、《天山文艺小丛书》等。[7]

【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5866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2】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24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3】《新疆史纲》，46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280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5876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6743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7】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44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939年4月成立的新疆文化协会还编辑了汉、维、哈、蒙4种文字的教科书。

三、南北疆地方报纸的出版

在喀什噶尔，1918年由库德卢克创办了维吾尔现代史上第一份报纸《觉醒报》。库德卢克生于1876年，1908年随父亲去麦加朝觐，后在开罗爱资哈尔经学院学习，成为当时学历最高的维族知识分子。《觉醒报》问世不久便受到当地守旧势力的攻击，不得已停刊。1933年7月，库德卢克又创办《自由生活报》。1934年8月1日盛世才执政后，该报更名为《新生活报》。这份报纸受到当地进步的维族知识分子的欢迎，更受到当时喀什驻军第六师师长马木提的支持和资助。《新生活报》除报道国际国内新闻外，还经常刊登维吾尔历史常识、伊斯兰教教义、阿拉伯文学等。刊登在该报上的其他文章和作品也是以介绍和宣传各国进步发展为内容的。[1] 1935年《新生活报》被盛世才接管。

【1】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6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最初，《觉醒报》使用瑞典驻喀什领事馆的印刷设备进行印刷，1934年领事馆被关闭后，这套印刷设备也归《新生活报》了，由于印刷设备先进，从《觉醒报》到《新生活报》，其印刷质量一直是全新疆最好的。

塔城原有维文报纸《塔城之声》，由维族人尼雅孜沙克主办，共四版。所用的石印设备1910年从俄国进口，本来是用于印刷课本的。报纸发行于塔城和阿尔泰地区，1934年该报被当地政府接管，改为《新疆日报塔城版》。后来还更换了机器，代之以从美国购置的全新印刷设备。

《伊犁日报》创建于1934年，由政府购置了全套美国印刷机装订机和铜模设备，铸造的维文、哈文字形整洁，印刷清晰。《伊犁日报》用维、哈两种文字出版。

四、新疆民族文字教科书的出版

在杨增新、金树仁执政时代，新疆教育极为落后，至1931年

只有高等学院、初中和师范学校各一所。59个县共有小学153所，学生总共7 400多人。盛世才执政初期，教育有所改进，到1942年，全省学校增至2 463所，学生增至271 000人，并在原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学院。[1]

少数民族教育得到发展，各族学生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课本，塔城早在1910年便从俄国进口石印设备印刷课本。1935年起在省立师范中增设维、哈、蒙等专班，该年冬在迪化设立编译委员会，编译各民族语文课本，同时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购买民族语的自然科学教科书[2]。民族学校的课本需求量很大，据1944年估计，各民族小学课本需要量约为200万册。1945年库尔勒县有学校29所，维文课本不敷使用，为解决这一困难，特向迪化购买石印机自行印刷课本[3]。

[1]《新疆史纲》，262、26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3523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3]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6694页，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五、三区革命时期的民族出版物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新疆和平解放，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区革命的领导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很注意思想宣传工作。伊、塔、阿三区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社会原因，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塔城报社当时有汉文、维文两个编辑室，编辑出版两种文版的报纸。当时还有一种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人都能看懂的所谓“通用语”，用这种“通用语”出版发行过不少报刊和书籍。[4]

三区革命的民族军中出版有10多种报纸，军内外还有各种政治理论书籍和杂志，在民族军内部共开设了109个图书阅览室，藏有各类书刊3万余册。[5] 一些重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被译出广为散发，如《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

1948年以后，民族军更是进一步侧重宣传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著作，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重要文献都被译为维吾尔

[4]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27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5]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445~44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文，在民族军中广为流传。[1]

[1]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8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45年11月在伊宁成立了“新疆革命青年军”组织，后扩大到阿勒泰、塔城，并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由赛甫拉也夫任主席，这个青年组织出版了《战斗》杂志，摘要刊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1948年8月，该青年组织转入“新盟”，《战斗》杂志与《同盟》杂志也合并了[2]。

[2]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8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48年8月1日在伊宁市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与民主同盟，简称“新盟”。“新盟”主办了《前进报》、《团结》杂志，用以讲解党的政策，报道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新疆少数民族同胞[3]。

[3]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448~44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这时期，除《新疆日报》继续有维文版外，阿勒泰还出版《自由阿勒泰报》、《真理之路报》，民族军出版《觉醒报》(由赛福鼎·艾则孜为主编)。[4] 塔城出版了《民主报》、《塔城革命报》。伊犁出版了《民主报》，印刷精良。

[4]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856~8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新盟”机关报后改名为《同盟》，从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其维文版共发行350期，888 780份；哈文版共发行265期，539 400份。“新盟”的汉文机关报名《民主报》，发行78期，49 600份；蒙文机关报名《自由报》，发行69期共49 600份。锡伯文机关报名《自由之声》，共发行74期，38 690份，俄文机关报名《民主报》，共发行39期，17 000份。[5]

[5] 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4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新盟”还出版大型月刊《同盟》，这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综合性大型杂志，有一个强有力的编委会，由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任编委会主任，由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赛福鼎·艾则孜、阿巴索夫、维依古尔·沙依然、祖农·卡德尔、李泰玉、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库尔曼·阿里、艾尼瓦尔汗巴巴等人组成。《同盟》月刊有维文、哈文两种版，到1950年各出版发行17期，各3万份。

在1949年还有一种名《前进》的维文刊物出版。[6]

[6]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48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三区革命十分注意教育事业，仅从1948—1949年看，伊犁有

中小学270所，1 100多个班，学生34 700人，塔城有小学210所，490个班，学生4 511人，阿勒泰有小学65所，234个班，学生7 590人。这些在校学生，都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学习。三区革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各民族文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这些教材包括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柯尔克孜文、汉文和锡伯文等，内容包括小学语言、算术、常识；中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自然等科及一些宗教课本，仅伊犁一地就印发了37 900套各类教科书[1]。

[1] 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47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第三节　藏文文献的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藏文出版的大宗还是藏文《大藏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于1919年决定新建布达拉宫印经院，1921年在止贡活佛的提议下，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倡导、主持下，于1926年至1936年在罗布林卡刻拉萨版《甘珠尔》，它以纳塘写本为底本。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建门孜康促进医学、历算的发展。他还著有《诗镜三章举例》、《修复大小昭寺志》及《经师楚臣嘉措传》等。

另一重要的藏文著作的出版是《仓央嘉措情歌》的正式印行。《仓央嘉措情歌》是17世纪藏族情歌集，第六世达赖喇嘛门巴人仓央嘉措被达赖喇嘛五世摄政第悉·桑结嘉措选为六世达赖灵童后，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藏历九月从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受戒，同年十月于布达拉宫行坐床礼。蒙古和硕特部贵族首领拉藏汗灭桑结嘉措后，仓央嘉措旋遭废黜。仓央嘉措的情歌大部分内容是反映自由爱情与宗教法规间的矛盾，在表达坚贞爱情观的同时，抨击了反动的宗教黑暗势力和森严的佛法僧规。如："求求大德喇嘛，把我的心儿收去；心儿才收回去，又跑到姑娘那里。""背后的四神恶魔，无所谓怕不怕；前面的香甜苹果，我一定要摘到它。"作为西藏佛教领袖的仓央嘉措撰写的情歌，突破了当时当地法规，为西藏其他统治者所不容，但他的情歌表

达了纯真的爱情，采用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受到百姓的欢迎，百姓到处传唱，风靡全藏。《仓央嘉措情歌》还对后来藏族谐体诗的定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仓央嘉措情歌》藏文手抄本早就不胫而走，后又有拉萨版梵夹装木刻本，收录57首。由于情歌是后人集录成册的，究竟有多少首，说法不一，有的版本有诗62首，有的收69首。另有民间流传的六世达赖喇嘛情歌，达到300多首。于道泉教授于1930年首次发表的藏、汉、英对照本收62首。一般认为60首左右比较准确。[1]

【1】于道泉：《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

这一时期，校勘、出版藏文名著也取得了进展。喜饶嘉措（1883—1968）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喜饶嘉措是著名高僧和学者，16岁成为拉卜楞寺僧人。他勤奋学习，后到拉萨哲蚌寺。为了学经，他不得不经常到乡下化缘和念经度日。先后依止却珠贡布等30余人为师，研习大小五明和显密经论，从事讲经、辩论和著述事业。由于他天资慧敏，博闻强记，艰苦修持，加之积累了大量西藏历史、文化等诸方面的知识，使他在藏族学者中以博学雄辩见长。尤其他辩经的方法之妙，技巧之高，效果之好，使同辈学者望尘莫及。1915年，喜饶嘉措32岁时，荣获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称号，在罗布林卡的辩经考试中名列第一，名声大震。1917年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校勘新刻布顿·仁钦朱（1290—1364）文集。后又奉命主持校勘拉萨新版《甘珠尔》。达赖喇嘛亲自委任喜饶嘉措在罗布林卡夏宫主持校勘《大藏经》总纂工作，历时长达14年（1917—1931年）之久，他对《大藏经》中的《甘珠尔》经卷全部进行了重新校订，纠正了某些错误和疏漏之处，对原稿的目次重新作了编排，并为之写了序言。新版《甘珠尔》印刷后，第一部献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赐给他“嘉华坚贝罗追·喜饶嘉措”的尊号。同时，还完成了《第悉·桑结嘉措全集》的校对工作。他将自己所著《颂尊圣的香池》（尊圣，指宗喀巴）呈寄十三世达赖喇嘛，获得了赞扬。次年，他还校勘了新刻的二十六函《布顿·仁钦朱文集》等。其后，喜饶嘉措退居哲蚌寺专事教授、著述生涯。其弟子众多，在三大寺学者及前藏地方政府

高级官员中，著名的有拉然巴格西·格桑嘉措、雄巴格西·楚臣嘉措、阿沛·阿旺晋美、根敦群培、赤江活佛、索康·阿旺格勒、察绒等人。为培养人材，大力发展藏族文化事业，他还给许多求知者亲授声明、诗学和文法。此外，喜饶嘉措还有著作30余种。其中歌颂宗喀巴的占近半数，如《宗喀巴大师赞》、《颂尊圣的香池》等。其他有《济咙活佛传记》、《驳旧派的反驳》、《劫火阵》、《西藏各寺院法规》、《喜饶嘉措大师佛学论文集》等等。[1]

[1] 喜饶嘉措:《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喜饶嘉措文集》一、二、三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4年。

过去的藏族历史书的编撰，往往夹杂神话和宗教的传说。民国期间藏族学术大师根敦群培（1903—1951）把传统和现代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研究，写出了《白史》等藏学名著，开藏族学术研究的一代新风，对现代藏学方法论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敦群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分析事物，写出了藏族史学上少有的、没有神话色彩的《白史》。

根敦群培是一位兼学者、画家、诗人、翻译家于一身的博学大师。他四岁时被认定为多吉扎活佛吉美索朗多杰的转世灵童，后拜白登喇嘛为师，学习修辞学，习作诗文。25岁时由青海往西藏朝佛学经，修法习经达七年之久，声名日渐远扬。32岁时毅然放弃已经获得的众僧梦寐以求的参加拉萨传昭大法会、考取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资格，受印度学者的邀请前往印度，并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南亚诸国游学考察12年，始终坚持勤奋闻、思、修，著有众多作品。44岁时以世俗的方法论、人文主义史观写下他的史学代表作《白史》。他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钩沉索隐，辨伪发覆，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表现出他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勇于跳出寺庙和藏族的圈子，睁开眼睛看世界，以理性来观察、衡量宗教与历史，以关注人、解放人、提高人的地位为己任，最终成为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师。

根敦群培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又是一名政治鼓动家和西藏民主思想的先驱。他的身份和个性充满着矛盾，他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同时代的藏族高僧和学者形成鲜明对照，他对传统文化和

藏传佛教的态度与闭塞、落后、禁欲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成强烈的反差。他那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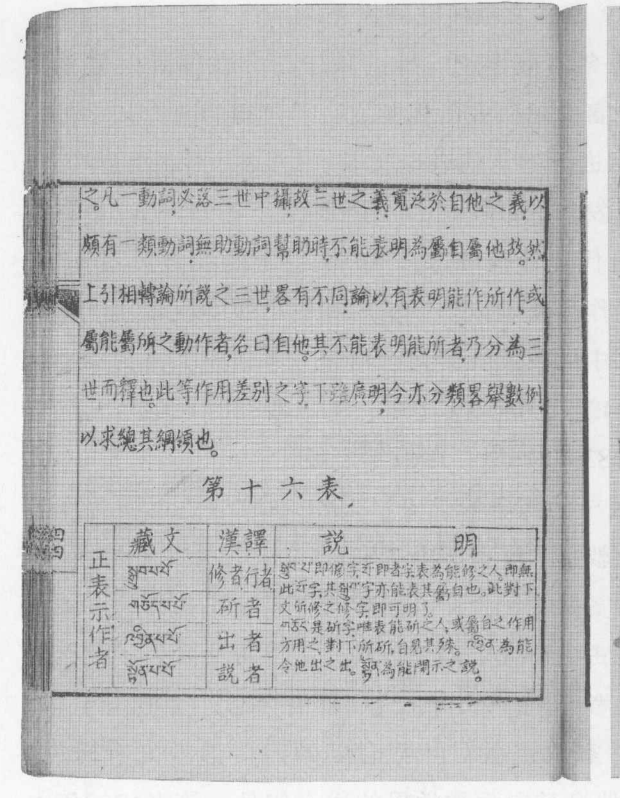
根敦群培自幼聪颖好学，才智过人，经长期潜心修习佛法，博览群书，广采众说，成为一位学通藏、英、梵、汉的学者，对藏族历史、哲学、因明、美术、语言学、地理学均有高深的造诣。《智游列国漫记》是一部细致入微的考察记录，又是富于哲理议论的著作。他还著有《印度诸圣地旅游纪实》、《论喜马拉雅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故乡、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腔赤诚之情。其治学精神难能可贵。他用科学的精神和事实，拨开传统的迷雾，揭穿了所谓一印度王子被弃河中，冲到吐蕃成为第一代赞普的王子虚构历史，否定了传统藏文图书封面并列印度兰扎、乌尔都和藏文三种文字对照书写的陋习。他痛陈迷信印度的媚外思想，驳斥了吐蕃王源自印度释迦族的错误说法。[1]

【1】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根敦群培文集精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民国时期有内地高僧学习藏传佛教，著作丰厚，成为翻译、撰著藏文文献的大师。法尊法师（1920—1980），原为河北省深县人，青年时在五台山出家，1924年开始学习藏文，后入藏学习藏文、佛法，又曾到印度，长期在汉藏教理院任教，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戒品释》和《现观庄严论》，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课本》，著有《西藏民族政史》，完成了将汉文《大毗婆沙论》200卷翻译成藏文的工作。解放以后，法师又作了大量翻译和著述，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图64）

【2】《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271~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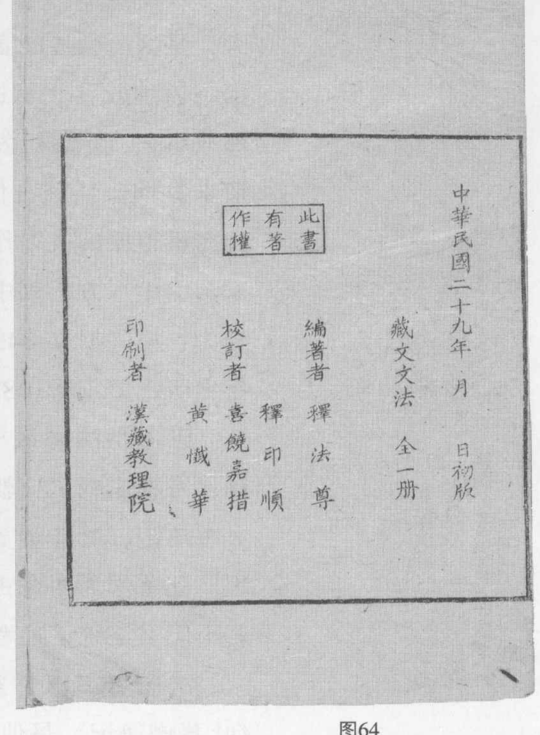
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大量古代文献，称为敦煌遗书。在这些文献中有大量吐蕃文（古藏文）文献，目前已知编号文献有5 000卷。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吐蕃文献流散于西方诸国，分别收藏于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的博物馆或研究机构，其中以法国所藏吐蕃文献最为丰富。也有不少敦煌出土藏文文献藏于国内。这些文献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包括宗教、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法律、经济、医学、地理等内容。这些文献很



之。凡一動詞必落三世中攝故三世之義寬泛於自他之義以頗有一類動詞無助動詞幫助時不能表明為屬自屬他故然上引相轉論所說之三世畧有不同論以有表明能作所作或屬能屬所之動作者名曰自他其不能表明能所者乃分為三世而釋也此等作用差别之字下雖廣明今亦分類畧舉數例以求總其綱領也。

第十六表

	藏文	漢譯	說明
正表示作者	[illegible]	修者行者	[illegible]即修字[illegible]即者字表為能修之人，即無此[illegible]字其[illegible]字亦能表其屬自他。此對下文所修之修字即可明了。
	[illegible]	研者	[illegible]是研字唯表能研之人或屬自之作用方用之。對下所研，自見其殊。
	[illegible]	出者	[illegible]為能令他出之出。
	[illegible]	說者	[illegible]為能開示之說。



此書有著作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月　日初版

藏文文法　全一冊

編著者　釋法尊

校訂者　釋印順　喜饒嘉措　黃懺華

印刷者　漢藏教理院

图64
释法尊著《藏文文法》

快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整理、研究著述不断出版。

在国外从事敦煌吐蕃文献研究最早的是那些有机会接触写卷原本的西方藏学家，如法国的巴考（1877—1969）、伯希和（1878—1945）、英国的托玛斯（1867—1956）、威利布散（1869—1937）、旅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劳弗尔（1874—1934）等人。斯坦因与伯希和盗取的敦煌藏文写本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日本大谷光瑞所盗藏文写本，一部分存在京都的龙谷大学。

1935年英国藏学家托玛斯首先公布了他所编辑的新疆地区发现的吐蕃文献共有三册，取名为《关于新疆地区的吐蕃历史文献》，分别于1935、1951、1955年出版。1963年有人收此三册的语词汇编了一册文献索引。托玛斯个人的论著很多，其中《吐蕃军队》（1933年）、《南语》（1948年）、《东北藏区古代民间文学》

（1956年）是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代表作品。

拉露是法国著名的藏学家，她的藏学研究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是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露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敦煌吐蕃文献进行的。代表论文有：《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吐蕃文书》、《八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表》、《古代吐蕃疆域志》、《7–9世纪的汉藏关系》等。拉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她以毕生精力编辑出版的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中的敦煌吐蕃文书写卷三本目录，其目录的序号为：第一册 1–849号，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2216号，1961年出版。

巴考是法国最早的藏学家之一，1940年他与托玛斯合作翻译、考释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全书分为三大部分：1. 大事年记，2. 吐蕃赞普传记，3. 吐蕃赞普世系及小邦邦伯、家臣表。此著作为西藏古史研究上的里程碑。后巴考又发表了《北方若干国君王统记述考释》（1951年），《吐蕃史导论》（1962年）等。

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对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颇有研究。《吐蕃僧诤记》是他享誉国际藏学界的代表作品。该书1952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是关于八世纪末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花戒在吐蕃王宫进行的一场有关禅宗的大辩论。此书一出版便激起了巨大反响[1]。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利用5种敦煌千佛洞所藏藏文佛经写本和识字课本（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注音本《开蒙要训》）以及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拓本，深入研究唐、五代时期汉语西北方音，1933年出版《唐五代西北方音》，取得重要成果。（图65）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出版了两种最早的藏文报纸。第一种是在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其创办人是清廷驻藏大臣联豫。该报10天1期，每期发行三四百份。报纸由查办大臣张荫棠带到西藏的一部石印机印刷出版。目

[1]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尧“前言”。

前在西藏博物馆仅存清宣统二年（1910年）8月印制的一份篇幅7页的残报，正文皆为藏文。第二种是《藏文白话报》，系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在北京创办，由当时政府专门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创办，全权负责《藏文白话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内容以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排列，汉文在先，藏文在后，分设图书、法令、论说、要闻、文牍、小说、遗补等七个栏目，后附广告。栏目名称以汉文楷体横书，下印藏文，红色印刷。正文无论汉、藏文皆墨色印刷。1913年元月正式创刊，每月1册，每年12册。幅面为23.7×16.5厘米。每期报纸有多页，装订成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存有《藏文白话报》第1号（1913年）到第14号（1915年）共35册，西藏档案馆存有民国二年（1913年）7月第7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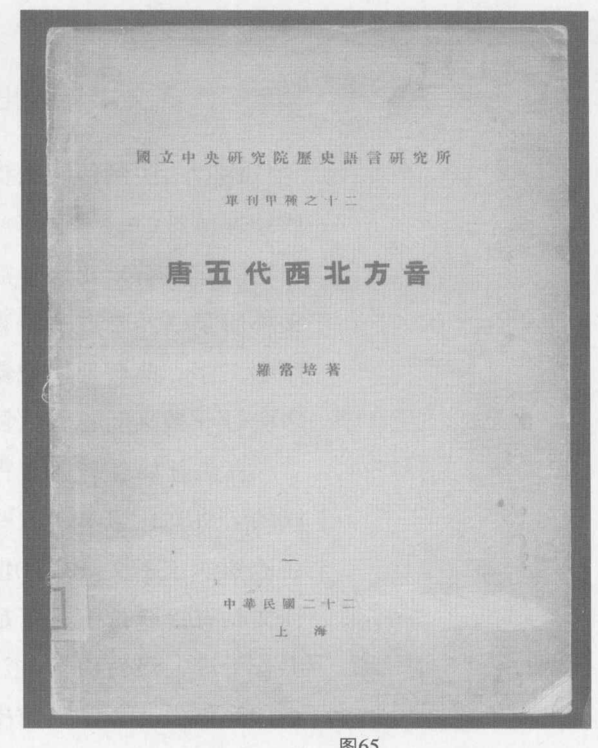


图65
罗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

[1] 周德仓：《〈藏文白话报〉的在藏发现及新闻史学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

第四节　彝文、傣文、纳西文书籍的整理出版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但有文字的民族屈指可数，民国时期这些民族仍使用自己的文字传承文化。

民国时期一些专家由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认识加深，加之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入，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调查、研究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学者来到大后方的西南地区，这些地区接近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学者抱着发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决心，不畏艰险，长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搜寻民族古籍，向当地懂得民族文献的人学习文字，释读文献，陆续出版了很多相关著作，推动了西南民族文化研究，取

得了突出成就。

一、彝文书籍的出版

1887年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邓明德）在云南省石林县彝族地区传教时，学会了当地彝语和彝文，曾编纂过《法倮字典》，于1909年在香港出版。后来他又翻译过一些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彝文小册子，并带着彝族青年毕映斗前往香港制作彝文铜模和学习印刷工序。此后他们把彝文铜模和印刷设备带回石林县，用彝文印刷过《教义问答》、《领圣经前后书》。

真正开始整理民族古籍多从民国时期起。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些古籍都有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于20世纪30年代到贵州考察地质，发现彝文及其文献有重要价值，于是约请贵州彝族知识分子罗文笔翻译整理出若干篇，最后由丁文江把译稿汇编在一起，题为《爨文丛刻》，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1] 该书共收《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经（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玄通大书》、《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经典。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十余万字。该书的出版使学术界认识到彝族地区有大量珍贵文献存在，逐渐引起重视，同时这种汇编黔、川、滇文献和四行译体的方法对后来的彝文古籍编译、整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图66)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有限，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很多人难以看懂。后来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又约请罗文笔之子罗国义等对《爨文丛刻》作了增订，改注音字母为国际音标，改正书中错译，补译未译部分，并增补近年发现的彝文金石碑铭，较原书增加了三倍。[2]

马学良于1938年到云南彝族地区向彝族毕摩学习彝语和彝文，并收集到二千多册彝文古籍由国家收藏，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对其中一些文献进行译释研究，和禄劝彝族毕摩张文元一起翻

【1】丁文江编：《爨文丛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马学良：《彝文访古录追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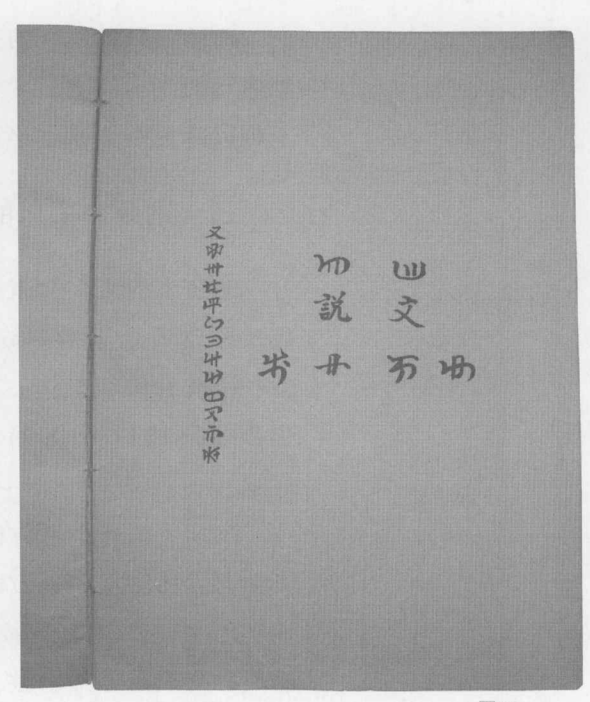


图66
《爨文丛刻》

译彝文《作斋经译注》和《作祭献药供牲经》，分别于1945年和1947年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这两种文献的出版，对彝语翻译成汉语提供了范例，也把彝文古籍介绍给了国内外学者。

二、傣文书籍印刷出版的筹划

傣族地区一直使用傣文，其文献用传统的方法书写流传，到民国时期也开始酝酿使用印刷术出版图书。

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傣族民众领袖刀安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下，为筹备在滇西举行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决定与日本的东亚公司协商合资开发干崖(今云南德宏盈江)，开发的主要项目之一就是要在干崖创办一个印刷厂。当时，已将在日本东京购买的机器运回干崖，同时还聘请了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印刷厂成立后，已经开工用傣文印刷了一些学生课本和文艺作品，并替同盟会创办的“新成银庄”印了一些银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其他人为因素，还来不及编辑印刷出版更多的书籍，便倒闭了。

此外，景谷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为发展傣族文化，也曾引进内地的刻本印刷技术，想用雕版印刷的方法来印刷傣文，但由于难以筹足资金，也半途而废。

三、纳西文书籍的出版

纳西族的文字文献一直是用抄写的方法使用、传承。直到近代一些学者走进纳西族地区，才开始了纳西东巴文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其中国内著名学者方国瑜（1903—1983）、李霖灿（1913—1999）、傅懋勣（1911—1988）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纳西族学者方国瑜教授是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东巴教最有成绩者。1933年秋，方国瑜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受命回云南丽江调查东巴文化，立志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他虚心向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后来他又向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编成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此书受到章太炎的赞赏，并欣然为之作序。倾注了方国瑜多年心血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直至1981年才公开问世。[1] 此外，他撰写的《么些（即纳西）民族考》被誉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该著作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有关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著作，内容有东巴经义的解释，为中外学术界所推崇。

抗日战争时期，李霖灿也来到西南地区，他为了调查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于1939年到云南丽江，在玉龙山下花费四年时间考察、搜集、研究纳西族东巴经，1946年完成译注《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内容有《么些族洪水故事》（即创世纪）、《占卜起源的故事》（即白蝙蝠取经记）、《多巴神罗（东巴什罗）的身世》、《都萨峨突的故事》、《哥来秋超魂的故事》、《某莉庆孜的故事》等，由著名语言学家张琨记注语音，由纳西族东巴和才录写文

[1] 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字，此书体例完善，每页皆有形、声、义、注四项对照。形，即东巴经原文；声，即以国际音标记音；义，即按汉文意译；注，即对一些假借字字源的解释说明。同时，在每册经书前面，对这册翻译经过和特点都有简要的说明。后此书在1957年于台湾出版。

李霖灿为便于释读、整理东巴文古籍，还编辑《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此字典也由纳西族东巴和才读音，张琨记音。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1945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石印出版。正文分为天文、地理、人文、文体、鸟、兽、植物、用具、饮食、衣饰、武器、建筑、数目、动作等以及"若喀"字（即"阮可"字）、"古宗"字、宗教、鬼怪、多（东）巴龙王、神等类，共2 000多个字，其中还包括个别地区或个别支系中的"土字"，以供比较研究。书后附有国际音标和汉字（词）笔画索引，把标音字分为黑点、弯钩、斜道、竖道、圆圈、不规则弯曲线、横平、卷扭、两点、人字形、十字、三点、三角形、方框和其他十五类。每个象形字解释详尽，并附注其异体字或简写法，以及假错字。[1] 该书大大方便了后学，是研究纳西族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至今人们仍然把李霖灿视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中从事东巴文化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2]

另一位对纳西东巴文研究、出版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著名语言学家傅懋勣。傅懋勣于1945至1946年到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纳西文书籍，后作整理研究，对东巴经的研究成绩突出，其力作《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于1948年出版。[3] 该书主要叙述万物及人类的起源：洪水滔天后，唯一幸存的崇忍利恩与天女衬恒褒白一见钟情，两人来到天上，经受天父孜劳阿普的多次考验后，终于结合成一家，从天上迁徙到人间繁衍生息。因鬼怪作祟，故请祭司作祭风仪式而平安无恙。本书首列调查语音系统、文法要点、文字特色、写本内容及本书体例，然后在正文即经文研究中摹写原文、录其读音、直译字义、意译全文，最后对字形进行具体的语言学、文字学解说。本经书由丽江县中和村东巴和

【1】李霖灿编著：《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2】杨福泉：《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傅懋勣：《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发行，武昌天戌印书馆印刷，1948年。

芳释读，特别是经傅懋勣用语言学、文字学方法进行研究，成为解读东巴文经书的科学成果。

傅懋勣又作《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白蝙蝠取经记》是除秽仪式经书，内容主要是叙述白蝙蝠为拯救人类，到十八层天上的女神处取祭祀占卜经书的故事。傅懋勣在书中不仅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直译意译，而且对经书中的每一个单体字形和复合字形都作了认真研究和解读，释读者也是丽江县中和村和芳东巴。1981年作者到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教授时，又进行了深入研究，回国后又继续研究完成，分节按原文读音、直译、意译、解说顺序诠释[1]。

[1] 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1~1983年。

第五节　南方少数民族方块字和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

由于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民族表现出对书面交际工具文字的渴求。

一、苗族文字

过去苗族除个别地区使用改造汉字而成的方块苗文外，没有本民族系统的文字。民国时期方块苗文的使用有了新的发展。清末民初湘西苗族秀才石板塘（1863—1928）为了编创苗歌而借鉴汉字的结构特点创制方块苗文（“板塘苗文”），并创作苗歌。当地民间把他称为“歌圣”。他的创作有的取材于苗族生活和传说，有的来自汉语文经典和小说，如提倡民族平等的《平等歌》、歌颂苗族人的《苗族名人歌》、提高苗族自信心的《祖先歌》等，以及《劝歌》（12套）、《男耕女织歌》、《太阳山》、《青冈树》，取材于古代小说的《开辟演义歌》、《三国演义歌》等。此外，石板塘还编写了一部《苗文字典》。由于苗语方言的差异和时代的局限，石板塘的苗文创制和苗语新歌编唱实践，只影响到苗族部分地区。[2]

[2] 赵丽明、刘自齐：《湘西方块苗文》，《民族语文》1989年4期。李炳泽：《板塘苗歌：现代苗语书面文学奇葩》，四川《民族》1996年第6期。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和苗族人士杨雅各、汉族人士李斯提文等设计了一套拼写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威宁、赫章一带）的字母。这种文字每个字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表示声母，也是字的主体，小字母表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方，兼以位置的高低表示声调的高低。当时用这种拼音文字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和传教用的小册子。这种苗文曾经记录了不少的苗族语言、文学和风俗习惯资料，但是适用范围狭小，而且也不够完善，不能为整个苗族使用。[1]

1911年英籍澳大利亚牧师张尔昌在云南省禄劝县传教时，借用柏格理苗语拼音方案，经过两次大的修改，用48个声母和25个韵母来拼写彝语，并用这套拼音和禄劝彝语翻译了《颂主圣歌》和《新约全书》，分别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

二、傈僳族文字

傈僳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创制民族文字的要求。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造。傈僳音节字是由当代云南怒江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乡米俄巴村的农民汪忍波（1900—1964）创造的。汪忍波出身贫寒，年轻时典掉自家田地，与债主约定以后用三两银子赎回田地，刻木三转三道为凭，等他拿银子去赎田时，债主不认账，债主说木刻上的三转三道表示每年要给他三块银元作利息。汪忍波非常生气，他想如订立文字契约，债主就难以赖账，于是他决心创造文字。从1925年他每天用竹签在石板上造几个字，三个月就创造出了三百多个字，后来造出1 426个字，并编成书，以所造字教人。至1928年已经流传到乡间，后来土司衙门也认可了。这种文字类似汉字，大多数独体字是汪忍波新造的，小部分是汉字的变形。笔画有点、竖、撇、捺、折、钩、曲线、弧线、圆圈等。汪忍波用自己创造的文字，记录了许多“祭天古歌”和传说，并编写了识字课

[1] 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14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本《傈僳语文》。傈僳音节字的出现使傈僳族第一次有了本民族创造的文字和文献。[1]

【1】木玉章:《傈僳族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简介》,《民族语文》1994年4期。

傈僳文另有两种文字为外国传教士所拟制。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大写字母的颠倒正反形式表示傈僳语的声母和韵母。这种文字主要通行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地区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一部分傈僳族基督教徒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用这种文字出版了读物、报纸等，主要用于《圣经》、《赞美诗》的传播和书信的传递。这种文字虽表达傈僳族语音很不准确，但它在不同的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和使用。此外还有武定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流传的仿苗文的"格匡式"傈僳族拼音文字。

以上三种文字虽然在傈僳族聚居地区进行了传播，但识字人数少，使用范围小，直到解放前，图书出版没有形成规模。

三、瑶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文字

方块瑶文与方块壮文相类似，它由汉字和仿汉瑶字构成，用粤语等汉语南方方言和瑶语混读，以汉语为主导。方块瑶文中的"汉字"可分三类，第一类可叫音训字，即取汉字字音和字义的字；第二类可叫音读字，即取汉字字音来表达瑶语词义的字；第三类可叫训读字，即取汉字字义而读瑶语语音的字，即"汉字瑶读"字。方块瑶文中的仿汉瑶字，指的是瑶族用汉字笔划和造字方法新造的自创字。方块瑶文主要用于抄写宗教典籍和民歌创作，也用于写契约等。[2]

【2】黄贵权:《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民族学》1990年2期。

布依族过去也没有文字，但它有与方块壮字相类似的记录语言的方块字。一种是借汉字字形，一种是借汉字字音，一种是借用汉字形声结合的办法。这种方法在记事和记录民间歌谣方面，曾起到一些作用，往往人写人异，因而难以通行。[3]

【3】喻翠容:《布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79页。

此外，与此类似的还有方块侗字。新中国成立前，侗族也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一些侗族知识分子曾经使用汉字记录侗歌。使用的方法是有时用与侗语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记录

侗语，或是用汉字记录侗语词义，或用类似汉字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侗语[1]。

哈尼族也有方块哈尼字，是一些通汉语、懂汉文的知识分子，用汉字或改造了的汉字记录哈尼语。这些字分两种，一是用与哈尼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直接记录哈尼语，二是用再造字来记录哈尼语。这种方法虽然在保存哈尼族口传历史和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难以准确地表达哈尼语，不便于交际，未能成为哈尼族通用的文字[2]。

[1] 梁敏编著：《侗语简志》，89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赵丽明：《汉字侗文与方块侗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李永燧、王尔松编著：《哈尼语简志》，15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四、景颇族、佤族文字

中国景颇族原无文字。但有一种记录景颇语的拼音文字通行于缅甸的景颇人中。1895年，美国传教士约翰逊夫妇在缅甸创造了一套以景颇语为基础，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景颇文。后这种文字传入云南省的景颇族地区。这种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共有23个字母。多数音位用单字母和双字母表示，少数用3个字母表示。这种文字基本上能反映景颇语的语音特点，学习、使用比较方便，但有的语音特点在文字上没有表示，如未能表示喉塞韵尾，不能区别鼻音、边音后的松紧元音对立，双字母和3个字母过多等[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工作者在这套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同时也为说载瓦支语言的景颇族人民创制了一套拼音文字。现在两套文字均推广使用[4]。

过去佤族也没有文字，在解放前部分地区曾使用过一种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

[3] 刘璐编著：《景颇族语言简志》，9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

[4]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第六节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出版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民族文字印刷可分为北方和南方两种不同的情形。

北方的蒙古文和新疆以维吾尔文为主的出版还在延续发展。民国时期以推翻清朝为起点，作为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失去了

过去的统治地位，本来就日渐式微的满文出版，更加一蹶不振。除个别地方偶有满文印刷外，从全国范围内几乎销声匿迹。

满文逐渐停止了使用，成为死文字，而过去与满族操差不多同一语言的锡伯族与满族一样使用满文。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这些锡伯族在新疆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一直使用满文，传承民族文化。1947年，锡伯族有关人士在伊宁市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简称锡索协会。他们认为，随着清王朝的结束，满族人已经放弃使用满文而改用汉文了，满文只有锡伯族在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对满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继续称为满文不很恰当。因此在语文工作者的努力下，根据实际情况对满文做了改进，改进后的满文被称为“锡伯文”。锡伯文一直使用至今[1]。曾经强势的满文，没有在满族中继续传承，而是以其变体的形式保存在仅有万人左右的锡伯族中，这是耐人寻味的。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傣族、纳西族仍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传承文化。南方少数民族印刷出版历来基础薄弱，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交往的增加，很多民族逐渐产生了对民族文字的渴求，于是出现了利用现成的汉字、改造汉字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现象，形成了多种使用范围或宽或窄的方块文字。另外西方传教士因传教的需要，在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用拼音文字记录当地的语言。

民国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陆续出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当时的几位著名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都参与了死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的整理、释读和研究。著名西夏文专家王静如于1932—1933年撰著《西夏研究》三辑，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出版。[2] 1932年北平图书馆出版《西夏文专号》，由中、俄、日三国专家撰稿。[3] 194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吐火罗文本福力太子本生故事》，引起学界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古文字的研究成

【1】李淑兰、仲谦编著：《锡伯语简志》，137~1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2】王静如：《西夏研究》(1、2、3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单刊甲种之八、十一、十三，1932—1933年。

【3】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

果的出版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后来民族古文字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无论大小都有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书籍的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与出版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同其他西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早也是通过英美传教士所办的报刊，零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辛亥革命以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编的《民报》等报刊，都曾陆续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国内出版的单行本图书中，如《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均译自日本作者的著作。进入民国以后，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称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孙中山是在1896年避难英国伦敦，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的。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

青年》。《新青年》不仅提倡民主与科学，也宣传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国际参照和思想舆论基础。李大钊、李达、杨匏安等先驱，以他们饱满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推动了马克思学说在中国星火燎原式的发展。

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为了弥补《新青年》每期多刊长文之不足，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特地创办《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着重时评。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1919年5月，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译文；《晨报》副刊“名人小史”栏目，也曾刊登《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生涯》等文章。1919年5月，李大钊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人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达。1919年下半年，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当时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觉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园地。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还翻译了三本日文著作，即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高富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这是较早的专

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著。

还有一些留日学生积极译介马克思学说，如李汉俊、杨匏安、陈溥贤、沈玄庐等，其中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

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及马列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和发行。该书由上海又新印刷所印刷，新青年社发行。版权页上的印刷及出版者皆署名“社会主义研究社”。译本32开，56页，竖排平装本，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坐像。书名《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排在马克思坐像上面，印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名上并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上述文字皆从右到左横排。该书未印目次，版权页印在封底，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的字样。所译内容包括原著正文部分四章，未译著者序言。全译本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反响热烈。初版印刷的1 000本很快赠送和销售一空。1920年9—10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重印了这本书，开本、页数照旧。这本书后来又有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春江书店、新文化书房等各种排印本，书名亦有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宣言》及《宣言》等。

该书译者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9年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教国文。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他毅然辞去教职，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他所依据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分别由《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供。3—4月间，陈望道将书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发

表。但到沪第二天，《星期评论》便停刊了。陈独秀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决计设法出版《共产党宣言》，但遇到困难。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和俄籍华人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建党问题。当他们知道此事后，立即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此间问世[1]。

【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521~524页。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深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学说的极大关注。北京的《今日》、上海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以及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创办的《少年》杂志等，都纷纷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与此同时，列宁及其学说同样被介绍及翻译进来。北京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和《新中国》杂志上，先后刊载了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它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

这一段时间，在图书的出版上，值得一提的还有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的《新青年丛书》。这套丛书由陈独秀担任主编，大多在1920年9月至1921年1月间出版。估计该丛书只出过8种[2]，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经济等领域，其中的《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讨论集》，是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书籍。

【2】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33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报刊出版

1920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加强马克思学说和建党思想的传播，决定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将它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随之，各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纷纷问世。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创刊于上海，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理论刊物。李达主编。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

除首页外，双栏直排。曾公开发行，但编辑部是秘密的。最高发行量5 000份。1921年7月7日出版第6期后停刊。该刊是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创办的。它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著作。发表了一些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道路和共产党纲领、策略等问题的文章，批驳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报道了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该刊为统一中国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建党思想，加强这些组织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6开，初每期8页，从第142期起增至12页，后又曾增至16页，逢周三出版，活字排版，白报纸铅印。内容主要是政论性文章和时事评论，此外还设有专登短小精悍战斗性杂文的"寸铁"栏目，并先后增设"什么话"、"肉麻世界"、"通讯"、"读者之声"和"余录"等栏目。《向导》积极地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新兴的苏维埃政权，鼓吹劳工运动并支持工人阶级斗争。它为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工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刊物初时印数约一万份，赠送，不收费。发行量最多时近三万份。从当时的环境考虑，该刊不注明刊物发行人和编辑人，编辑部活动场所和社址均不公开。《向导》于1927年7月18日出第201期后停刊。

《前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性机关刊物。1923年7月1日创刊。封面注明在广州出版，实际在上海秘密编印、发行，16开本。创刊号80页，第2、3期增至102页、106页。原定为月刊，未能按期出版。主要编撰人陈独秀、瞿秋白。以刊登论述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诸问题的长篇专论为主，另辟有发表短文的"寸铁"栏。曾运用调查研究材料和统计数据，剖析美、英、日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揭露军阀政府的专制，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陈独秀执笔的《前锋露布》和专论《中国国民

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表露了忽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错误观点。1924年2月出至第3期后停刊。

《劳动周刊》。中国共产党早期主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纸，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1921年8月在上海创刊。4开4版，铅印。编辑主任张国焘。以宣传劳动组合主义、促进解放全人类事业的实现为宗旨。设有“评论”、“劳动界消息”、“世界要闻”、“特载”、“来件”、“小说”、“随感录”等栏目，着重报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各地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教育工人应认识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产业联合结成团体，消除工人中的帮派思想。发行量最多时达5 000份。1922年6月9日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共出41期。

《热血日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张日报。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刊。8开4版。主编瞿秋白，编委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机关报——《热血日报》，以指导这场斗争。报纸以工人和市民群众为读者对象，主要刊载政治新闻，文字通俗易懂。它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指导五卅运动的政治主张。从第2期起，连续7期在第1版显著位置开辟“外人铁蹄下之上海”专栏，揭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在“舆论之裁判”专栏里，以大量事实戳穿帝国主义新闻工具对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诬蔑，抨击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谴责国内个别资产阶级报刊和上海总商会消极、妥协、退让的言行，报道了国内各地民众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声援和苏联等国人民的支持。副刊《呼声》也配合新闻和评论刊载了许多尖锐泼辣的文艺作品，表现了无产阶级报纸高度的党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受到读者欢迎。此报出版仅10期销量即达3万份，投稿、来信及来访者日以百计。该报于1925 年6月27日自行停刊，共出24期。

《先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刊，由北京的青年团组织出版。因被北洋政府

查禁，从第4期起迁上海，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主办。第8期以后，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施存统、蔡和森等先后任主编。半月刊（常不能按期出版）。着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译载少年共产国际和各国青年运动的材料，反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情况，并就青年团的工作方针、青年运动的方向、青年团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此刊在引导青年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团结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

《中国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创刊于上海，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合青年思想、工作、学习的实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国家主义等思潮进行斗争；文风新鲜活泼，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先后改名《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继续出版。

《妇女声》（半月刊）。1921年12月13日创办于上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该刊"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宗旨"，并从讨论妇女的切身问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妇女声》还讨论了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相结合的问题，妇女参政、节育问题以及废娼问题等，并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状况。

第二节　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

一、人民出版社

1921年7月，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推派代表来上海参加

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曾作出决定，宣传工作首选要恢复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并且继续编印《新青年》作为公开的宣传刊物，《新青年丛书》将继续出版，并且要成立党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同年9月1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由共产党的宣传部主任李达负责，社址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七弄30号），这里既是李达的寓所，也是他办公的地方。李达在这里主编过《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书刊的编审、校对、发行都由他担任。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出版物的地址印成“广州兴昌马路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和其他理论书籍。它在《新青年》上有一篇《通告》[1]，说明出版社的宗旨和任务：

>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
>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人民出版社曾经有过一套相当完整的出书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2]丛书》11种和其他理论书籍9种[3]。然而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书未能出齐。据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物简目》，所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仅16种，分别为：《马克思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1】李达：《通告》，《新青年》第9卷第5号。

【2】“共产主义”之音译。

【3】《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有人民出版社的书目预告。

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4种——《列宁传》、《共产党礼拜六》、《讨论进行计划书》、《劳农会之建设》；《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以及《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俄国革命纪实》等4种临时性宣传小册子。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定价低廉，大多在一二角之间，印刷的质量很高，封面上套红印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倾向性十分明显[1]。

【1】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344页。

1921年冬，陈独秀被捕，后来虽经孙中山、马林等人营救被保释。但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上海活动困难重重，人民出版社被迫结束。1923年初，人民出版社并入广州新青年社。另外又在广州设立平民书社，专门做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所出书籍的发行工作。人民出版社历史不长，但是它通过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为中国读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和研究马列主义创造了宝贵的条件，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上海书店

1923年10月，广州的新青年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后不久即宣告结束。同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上海书店正式营业，店址设在南市小北门民国路（今人民路）振业里11号，新青年社的所有存书、账务和善后工作都归上海书店接管。当时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由毛泽民负责，具体负责上海书店业务的是徐白民。

上海书店成立时，在《前锋》、《新青年》、《新建设》等杂志上刊登了开幕启事，阐述了上海书店开办的宗旨和任务：

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份责任，所以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

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已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竣后，再正式开幕。

实际上，上海书店在11月1日正式营业以前，就开始了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如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第44期《向导》周报上，就刊印有“分销处：上海书店”的字样。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号，也在10月20日就出版了。上海书店成立后，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刊物都归它出版发行。一般是秘密发行，如《向导》就是另租房子秘密发行。公开方面是代售上海各出版社的书刊，其中包括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出版物。

1923年，上海书店只重印了《共产党宣言》。1924年下半年开始，书店的经济开始稳定下来，除了承继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业务外，还出版了一些新书，有瞿秋白著的《社会科学讲义》（系上海大学用讲义）、《国外游记汇刊》，恽代英著《反对基督教运动》等书。

1925年6月，由于革命形势好转，读者范围扩大，营业日增，于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又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印刷机构，这就是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的崇文堂印务局，所印为《向导》、《中国青年》和上海总工会的宣传小册子、传单等。这一年，上海书店也积极出书，出版了卓恺泽编、恽代英改正的《青年平民读本》4册，供各地兴办的平民夜校青年工友学习之用；还出版了《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张秋人译《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一峰、辟世合编《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钟恭著《青年工人问题》，萧楚女著《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向导丛书》4种：《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以及李求实编《革命歌声》、《世界名人（马克思、孙中山、李卜克内西等六人）照相明信片》、沈泽民译《恋爱与道德》、蒋光赤著《新梦》（诗集）等。

上海书店自成立到结束的三年时间里，共出书30多种。其中自行编写的有22种，改变了以往翻译为主的出版状况。所出图书，有许多是配合当前运动的宣传品和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材和讲义，反映了一个政党出版物的政治诉求。有些作品文字浅显生动，观点旗帜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薄薄42页，简明地介绍了什么叫资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四个问题，在1925年3月至12月这段时间里印到了第8版。

为了使读者购书方便，上海书店考虑到店址在南市较偏僻，另行设立沪西、沪东、沪北等分销处。如当时设在上海大学内的书报流通处，实际上就是沪北分销处。

1926年2月4日，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上海书店。上海书店被封后，出版发行工作转入地下，另设宝山书店于宝山路，处理上海书店未了的事务[1]。

【1】曹予庭：《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史料》(上海版)第1辑。

三、长江书店及党的其他出版发行机构

上海书店关闭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再建立一个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那时，长江流域的形势日趋好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蓬勃开展，武汉的革命气氛尤其热烈。于是，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11月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由瞿秋白负责，苏新甫主持具体工作。

长江书店设在汉口后城马路济生马路口，书店负责出版和发行，印刷则由长江印刷所承担。长江书店除了主要销售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的书刊外，还代售从上海、广州运输过来的其他书店的出版物。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读者对革命书刊需求激增，长江书店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无货营业的局面。面对如此大好形势，长江书店决定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的一部分书刊，并编辑出版了许多新书。长江书店建立后，新青年社并入该店，《新青年社丛书》也改由该店编

辑出版。长江书店的分店有武昌长江书店特约店、广州国光书店、成都国民书店、重庆民星书店、长沙真理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安庆江淮书店、万县书店、九江书店等。长江书店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共出版新书和重印图书计47种。其中既有普及读物，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主义浅说》等，也有理论专著，如《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社会科学讲义》等；同时还有文艺读物，如《革命歌曲》、《哀中国》等[1]。

[1]《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下),4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927年2月，当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一带，直逼南京、上海时，中国共产党鉴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决定在上海恢复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考虑到《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个刊物在上海的影响，就暂时先用其名义成立三个刊物的总发行所，发行所地址设在宝山路。北伐军占领上海后不久，宝山路的总发行所，正式易名为上海长江书店。1927年3月31日的《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上海长江书店正式开幕廉价启事》。启事宣布了上海书店于4月10日正式营业，并在广告中开列了几十种书目[2]。然而，随之而来的“四一二”政变，使这个书店很快夭折。时隔三个月后，上海书店的命运同样降临到了汉口长江书店。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半个月，也就是7月30日晚，汉口长江书店被查抄，并被禁止出售一切出版物。8月4日，长江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停业启事。

[2] 曹予庭:《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史料》第1辑,1982年。

1928年，中共党组织又在上海成立了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不久又被查封；1929年又成立华兴书局。1931年华兴书局被国民党破坏，又转办启阳书店，后又更名为春阳书店，继续发行《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31年，为了扩大理论宣传，又在保定成立了党的又一地下出版物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该社的编辑、校对、出版和发行工作均由王禹夫一人担任。在党组织和上海华兴书局的帮助下，王禹夫工作极为努力，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出版发行了两套丛书：《人民文化丛书》（又叫《大众文化丛书》）和《左翼文化丛书》。在这里，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被出版。为避敌人查扣，该社

出版的书籍多为伪装本，书名常常是假名，出版社名字也常署人民书店、新生书店、新光书店等。

第三节　苏区出版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南方各省先后建立了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闽浙赣、湘赣、赣东北等几十个地方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亦称“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在苏区红色政权的保护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直接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工农兵大众的需要，在“围剿”和反“围剿”的艰难环境中曲折前行，构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一页。

闽西是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发祥地。这里创办了中央苏区的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其前身为长汀县“毛铭新印刷所”。1928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军入闽并占领长汀县城，指示当地中共党组织将该印刷所完整保存并予以财政、物资支持，利用地下党员和该厂工人进行出版印刷工作，起初主要出版介绍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以及各种布告、传单、宣言、文件、各种文化教育图书等，后出版革命报纸如《红旗报》、《战线报》等，再后则出版过《闽西红旗》、《红色福建》、《红色闽赣》等报刊。列宁书局的创办，因陋就简，注重效益，管理有章，为后来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创建的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中央发行部，以及工农红军书局等出版发行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红色政权的宣传出版工作。规定各军及各纵队均应办壁报，主要内容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及红军工作情况，一般是每周编写张贴一次，并将之统一命

名为《时事简报》。在这一时期，现有实物证据的出版物有：[1]《中国工农红军告国民党士兵书》(1929 年10月)、《为反对军阀混战告工农兵群众书》(1929年10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1929年)、《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4月6日)、《红军第十二军布告》(1930年5月)、《阶级斗争》(1930年6月18日)、《训练材料》第1期、《宣传员工作大纲》(1930年) 等几十种，比较早的报刊有《工农兵》(1929年9月20日创刊)，《红军报》、《战士报》、《前进》、《福建红旗》等均在1930年创刊。由此可见，红军建军与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出版宣传工作[2]。

【1】苏区出版物因为限于条件，纸张印刷等多很粗糙，不易保存；兼之红军撤出苏区后，国民政府禁止和焚毁了不少苏区的出版物，因而当时苏区出版物的详细情况，现在已很难确知了。

【2】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求是》2001年第12期。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31年底，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军委机关报《红星》等报刊相继创刊发行，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中央印刷厂、中央总发行部等出版发行机构相继建立。中央出版局管理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负责军事、政治和理论书籍的出版，以及翻译出版苏联等国家的军事论著；中央政府总务厅下也设有出版处。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少共中央局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和发行网。除中央一级的出版发行机构外，各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军事院校等均创办了报刊，建立了各种新闻、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和其他配套设施，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完整的出版发行系统和网络。

从时间段上看，1932—1934年是苏区出版活动中成绩最大的三年；1935年起，由于长征途中紧张的战斗生活，正常的出版活动受到影响，出版物大为减少。据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出版物通览（1927—1937）》中明确出版年份的出版物种数统计：1932年出版书、报、刊196种，为上一年出版种数的222.73%,增加了一倍多；1933年出版种数高达199种。1934年出版种数也不少，但由于受该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出版物品种降至148种。三年出版种数计543种，占十年间全部苏区出版物755种的72%，其中图书出版408种，占全部图书出版524种中的

77.86%；而1935—1937三年才出版22种，仅占3%，其中图书出版16种，仅占3.05%[1]。

[1] 叶再生：《略论十年内战时期苏维埃区出版物及其特点》，《出版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苏区出版物类型多样，涵盖到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报纸、期刊等多种出版物形式。其中报刊的影响最大。这是由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和艰苦条件决定的。苏区一直处于紧张的反围剿斗争环境中，不具备集会传达等传播形式的条件，且当时苏区尚未掌握无线电通讯技术，因此，苏区各级组织那时就主要依靠报刊这种传播媒介，来传达方针政策，传播新闻言论，宣传革命，联系群众，教育干部战士，传授斗争经验。苏区各级党组织对报刊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历来将机关报作为党报，组织专门的党报委员会，由领导人直接主编和掌握；在多次大会决议中，都明确指出和强调报刊的出版和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意义，并且还对报刊出版工作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在苏区出版物中，报刊的出版占了很大比例。

据目前保存的史料统计，1927—1937年苏区创办的报刊近300种[2]。影响较大的有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最早的机关报——《战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斗争》，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苏区工人》等中央一级报刊，以及《省委通讯》、《红色闽赣》、《晨光》、《火炉》等各级报刊。还有各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军日报》、《右江日报》、《红旗日报》、《工农日报》、《湘赣红旗》、《鄂豫皖苏维埃报》、《红色东北》等等。这些报刊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活泼的内容、灵活多变的出版形式，适应了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进行革命宣传，深受广大工农群众和战士的欢迎。据报道，1933—1934年《红色中华》发行量从3 000份增长到四五万份，超过了当时国统区的《大公报》。《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也达到了2.7万多份。《红星报》尽管仅限于军队发行，发行量也达到1.7万多份[3]。

[2] 叶再生：《略论十年内战时期苏维埃区出版物及其特点》。

[3] 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1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苏区的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党的纲领相一致，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出版物的内容往往结合当时中心任务进行宣传，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图书出版为例，1930—1931年是苏区初创时期，主要出版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为主的图书、小册子，如《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等。1932年是暂时稳定时期，主要出版培养教育军政干部的高等学校教材，如《阶级斗争讲义》、《政治问题》、《武装拥护苏联》等。1933—1934年是反"围剿"斗争剧烈阶段，为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主要出版政策宣传的小册子和鼓动性的革命歌曲，如《劳动问题讲授提纲》、《财政问题讲授提纲》、《土地问题讲授提纲》、《革命歌舞》、《苏区新调》、《苏区新歌舞》等。

苏区出版物有着广泛的群众性。通俗化是苏区出版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出版物品种多样，专栏生动活泼、图文并茂、语言生动，表达口语化，没有半文不白的调头，亦区别于左翼报刊的知识分子文风，工农参与写作，重民间色彩，倡工农之风，富山歌艺术品味等。这些做法，使得苏区出版物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这就保证了宣传效果，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起到了巩固红色政权的作用[1]。

[1] 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

苏区出版业是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进行的，出版条件十分艰苦。印刷上以油印为主，石印、铅印为辅，个别还有木刻和手抄的。瑞金就曾用木版印刷了《共产党宣言》。1930年前的早期出版物，由于条件限制，主要是油印，有些劳动券或重要著作才采用石印，后来印刷条件有所改善，铅印、石印逐步增加。但铅印一般还限于印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区中央政府法规、条例、章程，重要的政纲、文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重要而且印数较大的著作，以及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办的机关报等。在人手少，条件差，还要突破敌人封锁的情况下，苏区出版人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印刷、发行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保证了党的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这种艰苦奋斗的出版作风，是

一笔宝贵的出版精神财富，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第四节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出版事业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翌年12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由于战争初期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华北、华东、华中等大片国土很快陷于敌手。经国共双方协商，中国工农红军及其在南方各省留下的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此后这两支军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山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出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出版事业，首先在延安进而在其他敌后地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出版宣传事业，把出版当作党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1]。事实表明，共产党中央对新闻出版工作，确也做到了周密的考虑和全盘性的安排。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先后出版了《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在武汉设立中国出版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馆，既出报又出书，对桂林、香港的出版工作亦有精心布置；在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出版事业，更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设立主管机构[2]，创建出版社，重建印刷厂，筹办新华书店，开辟发行路线，编印发共进，书报刊并举，在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中蓬勃发展起来，从而与国统区党领导的出版业形成呼应，在共同促进中构建了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网络，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原本是文化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以后，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和专家学者从四

【1】张闻天：《张闻天选集》，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中央负责管理出版的组织领导机构，几经变化，开始为中央党报委员会，后来成立中央出版发行部，又改制为中央出版局，最后并入中央宣传部。

面八方涌向这里。特别是延安，各种干部学校、培训班林立。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仅1938年1至8月间，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 000名青年在这里学习。延安抗大及其12所分校，先后培养军政干部10万余名[1]。在抗大之外，尚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等各个门类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一时间，延安成为人才济济的文化城。于是，延安的出版事业，便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和文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应运而生。

然而，在艰苦异常的黄土高原上办出版，又是谈何容易。内忧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外患经济封锁、交通不便。这些横亘在出版者面前的困难，都需要一一面对和解决。边区纸张供应存在较大缺口，造纸工人就用马兰草土法生产的纸张来代替，不得已时甚至节制书籍的印数。油墨来源出现断绝，就以松树自烧烟灰，轧制油墨。印刷设备陈旧落后，就因陋就简地以油印、石印，甚至传统木刻的方法印书，同时派人前往西安和上海，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购买铅印及其他现代化印刷器材，一步步向前改进。发行工作在革命书刊常被封锁、根据地又遭分割的情况下，更是显得任重而道远，中共中央于1939年3月22日，为此专门下达《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到各地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并要求建立运输掩护部队，以保证发行工作的安全。自1939年6月，新华书店从《解放》周刊社分离独立建制，于1939年9月1日在延安北门外设立第一个门市部以来（图67），新华书店在各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2]。新华书店会同其他书店一起，以门市、邮购、送书下乡、流动供应、设代销点等多种多样的发行方式[3]，把党报党刊和各类图书、杂志发行到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发行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沦陷区，发行到大后方以及南洋等地，使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

【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68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抗战期间新华书店在各地的建立情况大致如下：1940年3月，晋西北新华书店在山西兴县成立；1940年9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山西黎城设立新华书店门市部；1941年1月，华北新华书店在山西辽县麻田镇建立门市部；1941年5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及其陈庄门市部在河北灵寿县陈庄成立；1941年7月，晋察冀边区冀中行政区成立冀中新华书店；1941年12月，新华书店冀察热支店成立；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在山西辽县岭南村成立；1942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设立关中新华书店；1942年晋察冀边区北岳行政区成立北岳新华书店；1942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并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开设门市部；1944年春，冀鲁豫新华书店在濮县盛辛店成立；1944年5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延安东关设立的门市部开业；1944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分出，单独经营，地址在山东莒南县净埠子村；1945年8月，晋绥新华书店先后派人随军建立了晋中新华书店，晋南新华书店，绥蒙的丰镇、集宁新华书店。参见：《新华书店五十年记事》，见《新华书店五十年》，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3】需要说明的是，边区实行供给制，大部分的出版物由内部分配，供给首长、机关、部队和学校，以及分配到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的组织，只有很少一部分供门市销售和邮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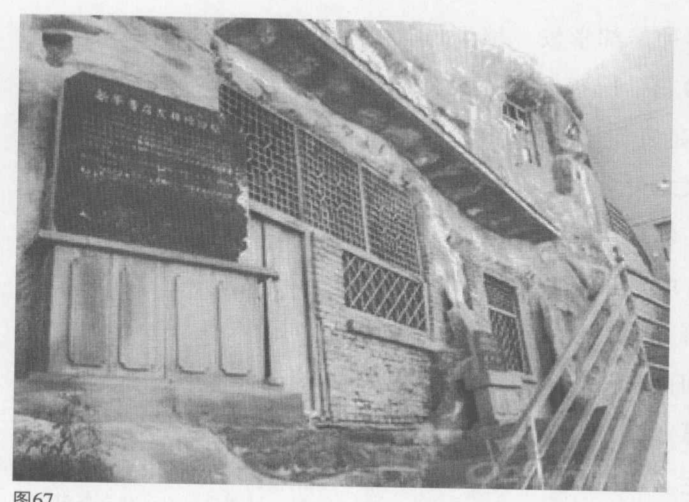


图67
延安新华书店旧址

从1936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最后撤离，一共10年时间里，延安先后出版了约20多种报刊和400多种书籍[1]。品种虽然不能说多，但在那种艰难的出版环境下，确也十分难得。延安主要的出版机构有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另外，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敌情编委会、印工合作社等机关团体，也或多或少地出版了一些书刊、地图、年画等出版物[2]。解放社是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最早的，也是书刊出版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除了编印闻名遐迩的《解放》周刊（图68）外，还承担了由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团体著译作品的出版任务。新华书店独立建制以后，兼事出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整风文献》等著名出版物，均由新华书店总店刊布印行。

【1】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2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685~695页。

图 68
《解放》（周刊）创刊号



在延安从事出版活动，确有许多其它抗日根据地难以比肩的优势：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机构云集，人才济济，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优秀作者队伍，为延安出版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书稿来源。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还组织编书译书，审阅校样，为书刊写序题词等。领导者的正言立言，有力地指导了延安出版工作的方向。在延安，印刷条件也相对优越，这里有抗日根据地中规模最大、印刷质量最好的中央印刷厂，

另外尚有八路军印刷厂、光华印刷厂和机要印刷厂，分担着部分印刷任务，从而为延安的出版活动，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1]。延安在各边区出版中心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1】曹国辉：《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概述》，《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306页。

较之于延安，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起步相对要晚，它是在敌后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敌伪在占领区内强力推行奴化教育，敌我双方在思想政治领域里斗争十分激烈，而延安的出版物又因交通困难，难以有效运输，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各根据地自身的出版能力，一方面下达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另一方面则派出几批出版、印刷、发行等专业的综合工作组，到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予以协同和支援[2]。在此情况下，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各根据地大致相同：大多先在报社里附设出版发行部门，到一定规模后分立出来，单独建制，向出版、印刷、发行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所印行的书刊，多以翻印延安的出版物为主[3]，另外自己也组织编印部分书刊，有些书刊还是专门针对敌占区的宣传而编印的。相比较而言，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山东、东北等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做得较为突出。

【2】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29~30页。

【3】由于受延安印刷和纸张的限制，加上运输不便，延安出版书籍的印数有所节制，一般初版书印2 000册，有的甚至只印几百册，因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只有少量的直接供应。为了扩大宣传，冲破封锁，中共中央鼓励各地就近翻印，延安提供样本，或者打好纸型和清样。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誉为"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1940年11月7日，该根据地的《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这是边区创办的最早的中共中央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社也是当地最有权威的出版社，在1938年至1942年的4年时间里，共发行报纸49.425万份，出版书籍杂志156种，111.3263万册[4]。成仿吾、何干之主编的文化艺术综合刊物《五十年代》、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大型摄影画册《晋察冀画报》、英文《晋察冀杂志》，在晋察冀边区出版物中称誉一时。由邓拓编定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也于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

【4】张山明：《解放区印刷出版工作》，《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

晋冀鲁豫边区是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创建起来

的华北最大的一个抗日根据地。《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创刊，报社在出报的同时，就着手书刊的出版，1941年报社设立了图书编辑部，1942年开始以华北新华书店名义出书，并独立组建编制，出书品种随之增多。据统计，《新华日报》1940年至1944年印行580多万份，印刷发行其他读物160多万册。1945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书籍124种，59.6万册[1]。除了华北新华书店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出版单位还有太岳新华书店、冀南新华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书店等，这些书店最后都统一于华北新华书店。

【1】张山明:《解放区印刷出版工作》。

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乃为延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0年晋绥新华书店（此前是晋西北新华书店）建立起来，随后组织了全区的发行网和7个支店。该边区的吕梁印刷厂，从1940年4月至1942年初，排印书籍小册子21.1万册，印报近54万份，翻印书刊2.8万册，印领袖像、画片、画册、地图4.7万多册[2]。他们油印的六色套版地图《远东战争形势图》和《苏德战争地图》，非常精致，深受读者喜爱。

【2】张山明:《解放区印刷出版工作》。

华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心脏地带，与敌伪占领区和国民党驻地相连，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地区都出版有书报刊。现有资料表明，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一共出版过200多种报刊[3]。各地区先后成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有淮南的教育出版社、通俗文化出版社，淮北的拂晓出版社、淮北出版社、淮北教育出版社，苏南的苏南出版社、江南书店，苏中的苏中出版社、大众书店，苏北的苏北出版社、盐阜书店，淮安的雪枫书店和浙东的浙东书局等（后改韬奋书店）。

【3】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43页。

山东抗日根据地，海岸线长，敌人控制力相对较弱，所需物资的供给较内陆根据地方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39年1月1日创办了机关报《大众日报》，翌年4月，大众日报社附设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抗战教育的各种教材，至12月7日更名为大众印书

馆，开始出版马列著作。1944年7月1日，山东新华书店在报社出版部的基础上独立建制，在翻印出书的同时，自己也组稿出书。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活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因而表现在出版物上，承接了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带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党报与党刊、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党的历史文献、马列主义著作，被当作出版的首要任务，成为根据地出版物的重中之重。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贯穿着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抗战文艺作品，那些为适应整风运动而出版的书刊，那些为人民军队建设而印制的教材，那些为打击分化日寇、汉奸、伪军的宣传品，那些关于解放区政权建设的论述，以及那些为促进生产、保障供给和传播生产经验的通俗性作品，无不体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出版物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正是其蕴藏着强烈的时代政治精神，使之与大后方出版业和敌占区出版业区别开来。以延安为代表的根据地出版事业，凝聚成一种出版传统，对抗战胜利后的各解放区出版事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第五节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其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是1932年到1936年间先后在上海诞生的。较早诞生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1932年7月1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先后成立于1935年和1936年。三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1948年10月，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

一、抗战胜利前的三店简史

生活书店由邹韬奋、徐伯昕等人创办，前身是《生活》周刊


生活

【1】徐伯昕：《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怀念出版家徐伯昕》，131页。

图69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社。《生活》周刊原隶属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5年10月创刊。《生活》创办初期，是一个不起眼的职业教育刊物，每期印数只有二千多份。邹韬奋接任主编后，革新刊物内容，调整刊物栏目，提倡大众化文风，重视文章可读性，使得刊物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最多时达到15.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销量最大的一份刊物[1]（图69）。刊物除了在内容和形式上精益求精外，还十分强调竭诚为读者服务，从而得到读者的大力支持。负责刊物经营的徐伯昕，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兴办各种服务项目。随着委托买书读者人数的不断增加，1930年春，邹韬奋和徐伯昕商量决定，在生活周刊社中设立“书报代办部”，进而于1932年7月成立了生活书店。（图70）



图70
生活书店成立时的店址

在《生活》周刊成功基础上建立的同名书店——生活书店，很快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书业界脱颖而出，备受时人所瞩目。这固然得益于《生活》周刊的先行影响，但最终能迅速崛起，还是依靠书店大胆的出版作风和别具一格的经营特色。从书店成立后所刊印的诸多出版物来看，尽管内容多门，但基本的价值取向，却是与《生活》周刊

一脉相承：或者为救亡而呐喊，或者为启蒙而低吟，或者为民主而搏击，无不关切时代脉搏与痛痒。1933年底，《生活》周刊以"言论反动、思想偏激、诽谤党国"的罪名遭禁[1]。寻绎这一罪名之背后，正可看出生活书店直面黑暗现实，勇于抨击时弊，以及激荡思想潮流的大胆出版作风。

[1] 徐伯昕：《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怀念出版家徐伯昕》，96页。

1935年8月底，从海外流亡回来的邹韬奋，对他出国两年间生活书店的快速发展相当之满意：杂志的种类，本版书的数量，邮购户的数量等，均有大幅度的增加，书店租赁了门市房屋，而且还是开在上海书业繁华集中的四马路上，职工人数亦由他走之前的20人，发展到六七十人。邹韬奋回国后，生活书店继续发展，到1937年抗战前夕，生活书店总共出书400种，期刊10余种，职工人数近100人，大有向大书局奋起直追的势头。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30年代出版界，这是很不容易的。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原本把抗日救亡作为出版主要内容之一的生活书店，在全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形势之下，业务突飞猛进，分支店从抗战前的2处发展到50余处，工作人员更是增加到300多人。图书出版数量明显增长，1937年生活书店出书150种，比1936年增加50%，1938年出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1939年出书240种。这是生活书店出版史上最高峰的三年[2]。抗战初期，像商务、中华、世界这样的一些大书局，出版业务均受战争的打击，而出现不同程度的缩退，而生活书店不减反增，主要原因是，战前生活书店因出版物的左倾，当权者施之以高压，包括《生活》周刊在内的生活书店书刊，屡遭禁止，在此情况下，生活书店不能不小心谨慎从事；而到了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政治形势比较宽松，生活书店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致获飞跃式发展。然而，形势比人强，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生活书店再一次受到当局的摧残，禁书、没收、封店、捕人等手段多管齐下，至1941年2月，一度遍布大后方的56个生活书店分支店，被砍杀得只剩下重庆一个分店。1940年至1944年间，是生活书店遭受全面压迫、最为困难的时期。为了保存余留

[2] 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123页。

的力量和培养更生的力量，生活书店不得不采取守势，以待时机。1941年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从全国出版中心——重庆迁往香港[1]，既是躲避打击的锋芒，也为了便于继续领导内地的业务和筹建新的出版阵地。在香港，生活书店复刊了《大众生活》，发行了茅盾主编的文艺小品《笔谈》，直至香港沦陷时停刊。留在内地的，公开的工作此时已很难保存，只有转入地下，并从集中转为分散，以合作经营、主副业并举等新的经营方式，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苦撑危局[2]。

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是抗战前一两年，先后成立于上海的两家独立的出版机构。从建立之初，它们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出版工作。这与生活书店不同。生活书店原无任何政党背景，因刊布左翼文化，主张抗日救亡，而被国民党政府压制，加上胡愈之等人的影响，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阵营。从当初办出版的历程来看，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倒是十分相似，皆先刊而后书。就像生活书店之先有《生活》周刊一样，读书出版社先有《读书生活》半月刊作基础，新知书店也是先有《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中国农村》月刊打前阵。

《读书生活》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11月，李公朴任主编，柳湜、夏征农、艾思奇任编辑，初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第三卷起由读书生活社自己发行，每期销量一万多份，有时多达两万份。1936年，读书生活社首次将《读书生活》上的文字结集成书，出版时则用“读书生活出版社”名义，读书生活出版社由此正式创建[3]。读书生活出版社刊印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发行不久便被查禁，后经过一些修改，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介绍了人们知之甚少却又很想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同，到1948年12月底，共印行了32版[4]，成为支撑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本重要畅销书。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继《哲学讲话》之后，读书生

【1】生活书店创建于上海，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将总店迁往汉口，上海设为分店，并改名为远东图书杂志公司。1938年7月，生活书店决定正式成立总管理处，同年8月，总管理处从汉口迁往重庆。

【2】1942年留在重庆的生活书店同人，用5家出版社名义出书。分别是生活出版社、文林出版社、峨嵋出版社、国讯书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桂林建立自营或合营机构8个，挂了10个牌子。计：三户图书社、三户印刷厂、建华印刷厂、学艺出版社、文学出版社、自学书店和新少年出版社（属学艺出版社的副牌）、光华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桂林分社、裕中行衡阳办事处。

【3】读书生活出版社迁到重庆以后，改名为读书出版社。

【4】徐丽芳、吴永贵：《中国百年畅销书》，22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活出版社又陆续将《读书生活》上的文章辑录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一套《角半小丛书》，一套儿童读物《少年的书》，翻译出版了苏联的一些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其他一些单行本杂书。至抗战前，读书生活出版社出书数量，大约在四五十种左右，算不上多，但若把它先后发行的《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学校》、《战线》、《大家看》、《认识月刊》等六种刊物算在内，其出版量，也不能说是少，特别是在编辑无多，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其中如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辩证唯物论》[1]，李公朴选、周巍峙编的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

【1】该书中译本用的是《新哲学大纲》做书名。

【2】范用：《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17~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936年11月，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李公朴被捕，《读书生活》也被查禁。读书生活出版社（简称读社）原本少有本钱，一两千元的开办经费，还是靠艾思奇等人向朋友、熟人筹借的，好在纸行和印刷厂可以欠款，书卖出了收回钱再还账。这时，书发不出去，账收不回来，突然周转不灵，难以维持。艾思奇找郑易里商量，郑易里找他二哥郑一斋，出资3 000元，帮助读社度过了难关。为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今后发展计，艾思奇、郑易里请来了黄洛峰出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留学日本，参加留日支部，积极从事反日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工作时，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1937年起参加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成为主要的负责人[3]。当时在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总编辑艾思奇、柳湜，董事长郑易里，营业部主任万国钧等人。

【3】范用：《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史料》（上海版）第1辑。

黄洛峰上任后，克服困难，重振社务，成立了新的董事会，进行了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和会计制度，向读者公开征求入股等等，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面貌为之一新。在出版方面，明确了出版方针，商定了长远出版规划，把分期逐步出版马恩全集，作为规划当中的重要部分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郭大力、王亚南开始合译《资本论》，几度与几个大书局接洽出版不果后，被读书生活出版社欣然应允。对于《资本论》的出

版，读书生活出版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译者签订约稿合同，按月支付译者版税，额度为每人每月80元，以支持译者顺利完成翻译工作。为了确保译者的稿费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的影响，读社还特意提出2 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这在当时读书生活出版社资金困难，政治形势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胆略的，但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出版者的高度政治觉悟。

读书生活出版社新出版规划实施未久，"七七"卢沟桥战争就打响了。随着"八一三"沪战的展开，在上海从事出版，已变得困难重重，黄洛峰毅然作出把出版社迁往汉口的决定。1937年10月下旬，黄洛峰率领几个同事带了一批书籍和纸型，坐民船由内河到镇江，再改乘去武汉的轮船。大约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到达汉口的一个月以后，新知书店也从上海迁到了武汉。时为1937年12月。

新知书店的历史，比读书生活出版社略长半年，成立于1935年秋。1935年夏天，发生了"新生事件"，《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情报》面临被迫停刊的危险。摆在刊物同人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任其停刊，要么逆风而上。经过反复讨论与分析，他们选择了后者，集资合作办起了新知书店。钱俊瑞任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负责业务，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钱俊瑞，江苏无锡人，1933年发起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宣传委员。徐雪寒，浙江慈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应申，江苏无锡人，1934年初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知书店迁到武汉后，被任命为汉口书业界党支部书记。姜君辰，江苏江阴人，1926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青团，1935年主持新知书店编辑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

新知书店从创立到"八一三"抗战，一共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均为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以系统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有关现实经济问题的书籍为显著特色。书店虽然资金短缺，时有捉襟见肘之感，但由于所出之书多数受到读者欢

【1】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徐雪寒、华应申先后撤到上海"孤岛"，由沈静芷担任大后方新知书店的总经理。沈静芷，浙江杭州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迎而一再重版，倒也在上海书业界站稳了脚跟。期刊方面，除出版《中国农村》月刊外，还刊发了《语文》、《新世纪》、《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上海弃守以后，书店根据共产党组织的决定，西迁战时政治中心的武汉，1937年底在武汉恢复出版发行业务[1]。

差不多同时从上海迁到武汉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以后的战争出版岁月中，有着许多共同的经历与磨难，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逐渐地走向了团结与合作。抗战初期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弥漫全国的抗战情绪，促成了三家书店在这一时期的共同飞跃：一方面，各家的书刊出版数量明显增加[2]；另一方面，各家的分支店在大后方纷纷增设[3]。汉口撤退后，生活和读书的总店西移重庆，新知的总店则南迁桂林，三家的业务依然有所发展。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再度紧张，共产党领导的读书和新知两家书店，便无可避免地落下与生活书店同样的厄运，在国民党的蓄意打击和破坏下，几近奄奄一息。一时兴起的众多分支店，或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最后三家书店都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还是忌惮舆论的压力，才没有被斩尽杀绝。风雨飘摇之中的三家书店，在共产党中央及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下，一面妥善疏散安排人员，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一面将"书店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4] 分布在大后方各处的三家书店及分支店，或更改名称，化名自营；或变化方式，实行投资合营；或从事副业，以丰补歉，策略性地做着化整为零的工作。而在雾都重庆，书店一日不封，营业照常进行，同时还积极开展出版界的统战工作。1943年12月，以三家书店为核心力量，在重庆组织了二十余家中小书店，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进而又有联营书店重庆总店及成都、西安分店的设立。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任联营书店总店董事长。

二、抗战胜利后三家走向联合

抗战八年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政治上保持一

【1】徐雪寒：《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出版史料》（上海版）第1辑。

【2】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武汉时期出版新书二十多种，先后发行了《群众》、《抗战文艺》、《战时青年》、《战时文化》、《新演剧》等5种期刊，西撤重庆初期，又出版了《学习生活》、《文学月报》、《新音乐月刊》等三种刊物。新知书店在武汉时期，除了以新知书店名字出书外，全权办理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图书。中国出版社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以民间面貌出现的出版机构，印行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

【3】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武汉时期建立了广州支店，西迁重庆后，建立了门市，结束了以往上海、武汉时期没有门市的历史，又先后在桂林、贵阳、昆明、成都开设了几个分社，同时在上海仍保持一个点，香港也设了一个点。新知书店在上海时期同样没有门市，到了武汉后，开设了门市，设立的分店有丽水、金华、襄阳、南阳、衡阳、长沙、常德，桂林时期增设的分店有桃源、辰溪、宜山、柳州、昆明、贵阳等。

【4】范用：《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73页。

致，在业务上有分有合。政治上，他们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党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保持联络，执行党组织交付的任务。有些任务是党组织要求他们共同完成的。1940年夏，周恩来两次在重庆约请三家书店领导谈话，指示可以以民间企业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出版发行工作。1940年8月，三家各派人携资从重庆出发，前往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地，共同办起了华北书店[1]。同年10月，第二批人再次从重庆赴往延安，开办了同名的华北书店[2]。在苏北根据地，早在1939年秋天，三家已合作在新四军根据地天长县，成立了大众书店，销售上海出版物。大众书店之名，取的就是"三人为众"之义。到第二年10月，当新四军渡江东进，上海生活、读书、新知又各派代表，公推新知书店的王益为经理，联合在苏北盐城开设大众书店，秘密将书刊通过敌占区运到盐城、黄桥一带根据地出售。1939至1941年，是三家书店在大后方同受惨重打击之阶段，也是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新的出版工作基地、实行部分联合之开始。

到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三家书店也开始在中共党组织指示下，分步骤地走向全面联合。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部首先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1945年11月，三家书店在重庆的各门市部，均改挂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招牌。三家在重庆新收到的书稿，统一由联合出版部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总店总管理处，则跟随书店复员大潮，迁返到上海。

在上海，遵照重庆时既定的方案，依然各开门市[3]，各挂各牌，分别经营，目的是为了多占领发行阵地，多出、快出书刊以飨读者。战后的上海，出版的政治、经济环境，恶劣依旧，但各家在上海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出版成绩。生活书店在出版众多单行本图书之外，还新编和重印了《青年自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生活丛书》、《百科小丛书》等丛书，发行了《理论与现实》、《读书与出版》、《民主》等刊物。读书出版社的重头戏是重

【1】晋东南华北书店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先采用油印方式刻印了二十多种文艺小册子，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鹰之歌》等。继又以手工刷印铅版方式出版了《人怎样变成巨人》等书，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太行版)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中型印刷厂，出版了《理水》、《日月星辰》等书。1943年与当地华北新华书店合署办公，印书时根据内容用两块牌子出版。邹韬奋逝世后，改名韬奋书店。

【2】延安华北书店先后出版了《铁流》、《毁灭》、《中国史话》、《从猿到人》等各种书刊。后来还负责边区的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发行。1942年与边区新华书店合并统一经营，又出版了大量通俗读物如《兄妹开荒》、《血泪仇》、《白毛女》等。1944年改名为韬奋书店。

【3】复员到上海后的生活书店门市，设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新知书店的门市开在四川路。读书出版社也有在四川北路开设门市的准备，后因形势的变化而作罢。

印了抗战时期出版的《资本论》[1]。新知书店将抗战初期、中期的出版物，以《新知丛书》重新再版，又遵奉党的指示，出版了《国际现势丛书》和《新认识丛书》等。三家除了用自身的名字出书外，各家在上海还有一些副牌店，如华夏书店、骆驼书店、峨嵋出版社、致用书店、士林书店、新生图书服务社、自由出版社等。这些“副牌”出版社一袭重庆时期的做法，各以所出书刊的性质，分成一、二、三线。第一线的如华夏书店，专门出版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党的政策文件，以及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政治上冲锋陷阵，随时准备被查封。第二线的如峨嵋出版社，出版物内容比较缓和，偏重于理论性的，与现实接触较少。第三线如致用书店，最为隐蔽，绝不涉及敏感书刊，出版一些应用参考书、工具书和学校的补充读本，以及少年儿童读物之类[2]。这样划分，既能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又可避免遭到更严重的损失。在出版这一正业之外，三家还积极开展贸易运输等副业，对增加经济收入，渡过难关，积累资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之外，继重庆三家合并成“三联书店”之后，又陆续在国统区的一些大城市，开设了“三联书店”分店，只不过为了避免遭到打击，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店名而已：北平的分店，名为朝华书店；广州、长沙的分店，名为兄弟图书公司；武汉的分店，名为联营书店。在解放区，随着战事的推演，新的分支店也在不断创设。先是在胶东和东北地区的烟台、大连、安东、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地，设立了光华书店，后又在华北地区的石家庄、天津、北平等地，成立了新中国书局。

1946年底，蒋介石召开“国大”，宣告国共谈判破裂。为保存力量，防患于未然，1947年秋季，三店领导人先后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上海方面，在得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三家书店的密令后，于1948年10月公开宣告歇业，自己停止了门市。几天之后，三家在香港彻底进行了合并。1949年4—5月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京，原来在东北的光华书店和在华北的

【1】《资本论》第一卷译竣后，上海已沦为“孤岛”。读书出版社利用上海当时印刷成本低廉的有利条件，采用译排校印流水作业的方式，加速《资本论》的出版。三卷本全译本，于1938年9月在上海正式问世。《资本论》初印3 000部，1 000部留沪分发，另2 000部轮船发往广州转内地，广州沦陷时在兵荒马乱中，不幸全部沉入海底。痛惜之余，又加速赶印2 000部。抗战胜利后，读社将《资本论》在上海修订再版，并把发售预定广告刊登在1947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头版头条，成了著名的“广告事件”。该广告由范用精心设计。

【2】徐伯昕：《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怀念出版家徐伯昕》，108~109页。

新中国书局，都统一改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9年7月18日，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中共中央对三联书店今后的工作方针专门作出指示。党中央称赞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指示中明确规定："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但新华书店是完全公营的书店，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该书店即将成为国家书店；三联书店是公私合营的进步书店，将来亦应仍旧保持此种性质，即国家与私人合营的性质。因此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成为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并具体要求"保存三联书店在全国的统一组织名称，建立各种必需的企业制度，统一经济和干部的管理，并统一名称"。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三联书店日后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从最初的和谈走向了最终的破裂，内战终于全面爆发。随着战场上双方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随着中共解放区范围的日趋扩大，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版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地的新华书店，充当了解放区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

一、东北书店及东北地区的其他书店

东北是最先获得解放的地区，也是诸多解放区中出版成绩最大的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派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开辟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通过与苏联政府签订执行《雅尔塔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面对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宣传组织，大力通过出版物对广大群众进行"打倒蒋介

石，解放全中国”的宣传教育，积极配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东北书店、光华书店、兆麟书店、鲁迅文化出版社等。

东北书店1945年11月16日在沈阳成立，属于《东北日报》社领导。东北书店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发行《东北日报》，同时出版图书。成立后10天即11月26日，东北书店随《东北日报》社后撤，1946年4月进入吉林长春后，专门从事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并采用“东北书店总店”这一名称。1946年5月24日，东北书店总店迁到黑龙江，先到哈尔滨，随即就与《东北日报》社印刷厂一起撤到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基地、中共中央东北局后方机关所在地佳木斯。1947年7月，东北书店总店再次迁到哈尔滨，并正式成立了编辑部。到这一年年底，东北书店已经拥有松江、西满、合江、牡丹江、黑龙江及吉林、辽北等7个直属分店、73个支店和百余个分销处，并在佳木斯、东安、哈尔滨建立了3个印刷厂[1]，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至1949年6月，东北书店总店的干部职工人数达975人[2]。

东北书店的出版工作，除了翻印部分延安解放社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物外，还结合当时的东北地区形势，编辑出版了许多新书。首先，中央文件、领袖论著、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以及有关论著大量出版，既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教育了群众，又配合了干部理论学习的需要。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与之相关的政策文献、手册、歌曲、小说、剧本等先后问世，如《中国土地法大纲》、《受苦人翻身大联唱》、《白毛女》、《农民泪》、《地主血腥发家史》等。周立波的以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更是其中的著名者。翻身后的农民政治上、文化上的素质水平亟待提高，书店便编辑出版了以农村基层干部和翻身农民为对象的杂志《翻身乐》，以青年为对象的杂志《知识》和层次较高的《东北文学》、《东北教育》和《东北画报》等。另外，东北解放区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亦由东北书

【1】《黑龙江省志·出版志》，6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李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工作》，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418页。

店承担。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扩大，教科书的发行量越来越大，1948年课本总印数为600余万册，占书籍出版用纸的一半。对东北书店各年度出版书刊数量，李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工作》一文中有一个统计。(见下表)

【1】李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工作》,《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415~417页。

东北书店各年度书刊出版数量统计表[1]

年代	图书	课本	期刊
1946	138 种,881 000 册	17 种,595 000 册	1 种,41 000 册
1947	254 种,2 158 000 册	48 种,2 220 000 册	4 种,172 000 册
1948	232 种,4 388 000 册	56 种,6 060 000 册	5 种,514 000 册
1949(1—5 月)	141 种,1 273 500 册	44 种,8 160 800 册	4 种,179 000 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5月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可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1 000余页，6卷合订本，1947年10月开始准备，历时半年多，终于付印，选入了毛泽东从1927年3月至1946年12月的文章49篇，另加一篇新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放在6卷之前另立页码。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收入篇章最全、印刷装帧最好的精装本，也是当时东北书店版图书中最突出的大型巨著。这部《毛泽东选集》共印行了2万部。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陆续发往长春、沈阳、天津、北平、南京和上海等地，对于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光华书店是解放战争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共同投资在东北各地建立的，以民间面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发行机构。1947年10月，书店设编辑部，主要重印三家出版机构的版权书，特别是一些理论名著，所印尤多。《资本论》和《鲁迅全集》这两部大著的再版，是光华书店重印的大作。另外，哈尔滨光华书店还创办了5日刊的《生活报》，每期发行5万份，成为东北解放区印数较多的报纸之一[2]。

【2】《黑龙江省志·出版志》,73页。

兆麟书店开办于1946年5月31日，是为纪念被国民党特务密

谋杀害的共产党员李兆麟而成立的一家书店。兆麟书店从成立到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民歌选》、《列宁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等图书约十种。

鲁迅文化出版社创设于1946年11月，是重返哈尔滨的现代作家萧军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资助下自行筹建的，宗旨是宣传鲁迅的文化思想。该社于1948年8月停办。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鲁迅研究丛刊》、鲁迅的部分杂文、萧军自己的著作，及一些军事教材和传单、宣传小册子等。

二、华东、华中新华书店及山东地区的其他书店

华东新华书店是由山东新华书店和华中新华书店合并而成。山东新华书店建于抗战末期。成立初，与大众日报社出版部为一套机构。1946年1月正式脱离报社，归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领导。同年2月华中新华书店北撤山东，并入山东新华书店总店。1947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改称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9年2月，华东新华书店总店进入省会济南，一部分人员南下，建立华东新华书店，一部分人员留在山东，仍称山东新华书店[1]。

同东北书店一样，山东新华书店也是编、印、发三种业务合一的出版发行机构。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成立于1946年1月。这个编辑部在随后不很稳定的三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共编辑出版《新华文摘》和《文化翻身》（后期改称为《群众文化》）2种期刊，484种图书。其中，翻印的和自己组稿的各占一半[2]。山东（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物品种丰富，有中小学教科书，有通俗的文艺作品，有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读物，有解放军指战员编写的作品，能适应当时干部群众的需要，同时装帧比较考究，纸张印刷质量较好。

北撤山东之前的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创建于1945年12月底的淮阴，是华中分局为了加强和推动苏北解放区的图书出版工作而成立的。原苏北解放区的各书店，成为其支店和分店。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从成立到1946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局

【1】《山东省志·出版志》，42~4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王益：《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新华书店》，《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395页。

势艰难，但出版成绩仍然不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书167种，共648 500册。内战爆发后，总管理处合并于山东新华书店。但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1947年12月，为统一和加强华中出版事业，华中工委会宣传部特决定将苏中韬奋书店和苏北新华书店合并，重新成立华中新华书店总店。全华中各分区所有书店，在业务上受华中总店的指导，并规定了书刊出版的总体结构——40%的力量出版区以上干部读物，60%的力量出版大众读物，各分店如有印刷条件，则以出版大众读物为主，各县支店及某些分店，则应以营业发行为主[1]。

【1】《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437~438页。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地区的书店还有冀鲁豫书店，成立于1944年的河南省信阳县，是由冀鲁豫日报社发行部与冀鲁豫行署所办的文化出版社合并而成，为编、印、发综合机构。1945年和1949年曾两次迁入山东菏泽城内。1949年改称冀鲁豫新华书店。该店出版的图书已查到的有187种。

渤海新华书店，成立于1945年1月的垦利县八大组，初属渤海日报社，1946年10月，脱离渤海日报社，成为由中共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独立的出版发行单位。渤海新华书店的图书出版工作，主要是翻印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图书。著名者有：1947年翻印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翻印了《新党员读本》，印刷8次，发行21万册。该店自已组编出版的图书，除各类学校教材外，主要是通俗政治读物，如《王佃农识破美人计》等。该店出版的图书，已查到的有338种。

胶东新华书店，成立于1945年10月的莱阳沐浴店村，属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设编辑科、出版科、发行科和会计室。编辑部除编辑出版图书外，还编辑出版《胶东大众》，该店出版的图书总计337种。1949年冬，该店停止图书出版业务[2]。

【2】《山东省志·出版志》，43~45页。

三、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与中原新华书店

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于1948年6月，根据上级的决定，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和晋冀鲁豫新华书店合并而成，直属华北局领导。合

并前的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战时期继延安之后较早成立新华书店并开展出版发行活动的地区，出版基础较好。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建立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1945年9月，晋察冀新华书店随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迁往华北重镇张家口市，在冀晋、冀中、冀东、察哈尔、热河等省区建立支店，专区设办事处，县设总销处，区设分销处。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晋察冀新华书店共计出版新书96种，57万册，其中自编的占36%；1947年出版图书、课本105种，杂志7种，总印数达60万册。另外，冀晋、冀中、冀东等分店也出版了一大批图书，尚未统计在内[1]。成立于1942年的晋冀鲁豫边区华北新华书店，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邢台的敌伪新民书局，扩大了印刷力量。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在邯郸出版了《北方杂志》、《大众科学》，在邢台出版了彩色套版印刷的《儿童杂志》。1947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开始出版《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创作小丛书》，共计25册。同年，华北新华书店还以“民主出版社”的名义编绘出版《晋冀鲁豫详解地图》。另外，分属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署区，亦各有名称不同的书店，在随军转移的过程中，在作战的间隙，也出版了不少书刊。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的《平原文艺》、《演唱杂志》，冀南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工农兵》、《文丛》等刊物，太岳新华书店重印的《毛泽东选集》等，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三晋烽火创新业——山西省新华书店简史》，《新华书店五十春秋》，62页，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中原新华书店1948年9月1日诞生于中原解放区的河南省宝丰县大韩庄，是在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后随分支机构的建立发展，改称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同年12月，中原总店进入郑州，1949年7月迁往武汉，并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党政领导机构的变化，易名为新华书店华中区管理处。中原新华书店诞生后，为开展全区的书刊发行工作，即提请中原局宣传部通告各地党委在已解放的地区建立新华书店。1949年底，全区有店169个。

中原新华书店成立后，立即筹划编审、出版工作，成立了编辑部和出版科。起初，主要是翻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以及党的建设、方针、政策、时事等方面的书籍，后来则发展到自己组稿出书。至1948年底，共出书27种，9.3万册。1949年出版书刊384种，384.1万册[1]。

【1】《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34~3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四、全国新华书店的从分散到统一

1949年初，随着天津、南京、太原、武汉、西安、上海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纷纷解放，全国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以往各大区新华书店出版工作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的状况，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4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着手研究全国新华书店的集中统一问题。1949年7月，东北全区203个东北书店，统一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同月，华北新华书店在北平召开华北区新华书店分店经理会议，统一华北区各地新华书店，省成立分店，县成立支店，统称新华书店。至建国前夕，全国已建立新华书店分支店735处，职工8 100余人。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由出版总署领导[2]。

【2】《新华书店五十年纪事》，《新华书店五十年》，6页（附录），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五、新华书店革命传统的既往与开来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在敌人枪林弹雨的洗礼下，在解放军捷报频传的战果中，从偏僻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围，最终发展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人民军队接收城市的过程，也是新华书店没收敌方书刊资财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民出版机构纷纷新建的过程。物质条件的改善，大大提高了解放区出版物的印刷质量，原先的油印、石印和土造纸，被替代成铅印、彩印和新闻纸与道林纸。旧貌换新颜，改变的只是出版物的形式；不变的是出版物所蕴含的精神——服务于战争，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沿承着苏维埃政权时期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出版道路，也引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方向。

附录一　民国出版大事记[1]

[1] 大事记主要在宋原放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大事年表》(见《出版纵横》229~505页)基础上，增删而成。其它参考文献有：《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记：1912—1954》；张定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

1912年（民国元年）

1月1日　陆费逵、陈寅、戴克敦、沈颐创立中华书局。

1月1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初小男女可同校，要求教科书合乎民国宗旨，小学读经科和清学部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民间课本删除帝制内容后可继续印行。

1月30日　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1937年8月停刊。1947年1月复刊。1950年12月停刊。

2月1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批准上海书业商会请将旧教科书修正应用。

3月2日　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详定暂行报律》。次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天铎报》等11家报社致电孙中山表示反对。孙中山立饬内务部取消。

3月　罗迦陵出资，聘黄宗仰在频伽精舍主持校勘《大藏经》，委托中国图书公司印行，历时4年印成。共440册，1 916部，8 416卷。

6月　邓实和缪荃孙在上海合编《古学汇刊》。到1914年8月为止，出12编，每编分上下册，计24册。

9月22日　《独立周报》创刊，章士钊主编，发行人王无生。

1913年6月终刊。共出40期。

9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全文14条。其中规定：各书局之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出版前，须将印本或稿本及定价，呈请教育部审定；已经审定者在《政府公报》上宣布，并可在书面载明“某年某月经教育部审定”字样。民国3年（1914年）公布《修正规程》，主要增改为：送审的印本或稿本统一为样本；已审定图书，有效期为5年。

10月　有正书局发行《佛学丛报》，月刊，主编濮一乘。翌年改出丛刊，1914年6月终刊。共出12期。

11月　在北京出版了蒙文半月刊《大同报》。

12月　天津出版《庸言》半月刊，梁启超主编。1914年初黄远庸主持，改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30期。

是年　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公布，史称壬子学制。

设立北京筹边高等学堂，民国2年北京蒙藏学校成立。

商务印书馆编印《共和国教科书》，出版《中国秘密社会史》、《新字典》。

中华书局编印《中华教科书》。

自由社出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法令》12册；《革命党小传》，共160篇，附有肖像，8册。

有正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天笑生编，4册。

神州国光社开始出版邓实、黄宾虹编印《美术丛刊》，4集，收历代美术论著257种。

申报馆用平台双轮转印刷机。

商务印书馆增设博物部，制作标本模型；设铁工制造部，制造印刷机器和理化仪器；始用电镀铜版。

1913年（民国2年）

1月　汪孟邹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1953年歇业。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新学制教科书”，依照上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分初等小学3种、高等小学6种。这是民国成立后最早出版

的新制教科书。

3月22日 上海广智书局印刷发行《不忍》月刊，康有为主编，发表康有为著《大同书》的部分内容。翌年出第8期后停刊。1917年12月复刊，又出9—10期合刊一册。

4月15日 长沙创刊《实业丛报》半月刊，后改月刊。商务印书馆印刷、发售。1915年出版第26期后停刊。

6月4日 司法部通饬严办翻版案件。

6月 上海书业商会分别呈请教育部、外交部、工商部，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

12月 时事新报馆编辑出版《时事汇报》月刊，共出6期。

是年 教育部逐步修改完善壬子学制，确立壬子—癸丑学制。

商务印书馆出版陆尔奎等编《新字典》，蔡元培作序。

中华书局迁至东百老汇路AB29号，资本增为60万元。陆费逵赴日考察，聘范源廉为编辑所所长，沈知方任副局长。《新制教科书》开始出版。

商务印书馆始用汤姆生自动铸字炉。开始经营西书。

中华图书馆发行王钝根编辑的《游戏杂志》。出19期。

蒙藏院出版《蒙文白话报》。

在北京创办《藏文白话报》。

1914年（民国3年）

1月1日 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由沈瓶庵编辑。1916年6月停刊。

1月6日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签订日方退股的协议。10日登报公告本公司“为完全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在各地设分支馆30处。

1月10日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被暗杀身亡。由印有模（锡璋）继任总经理。

1月 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各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国民党）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并饬学校及各书坊，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及教授要目编纂会。

5月25日 国华书局创刊《小说丛刊》月刊。吴双热、徐枕亚编辑，后由徐枕亚编辑。共出44期。

5月 秋桐（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自任主编，后约陈仲甫、杨永泰、易培基协办。月刊。翌年第5期起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15年10月10日停刊。

6月6日 中华图书馆创刊《礼拜六》文艺周刊，钝根（王晦）、剑秋（孙炯）编辑。1916年4月出版第100期后停刊。1921年3月19日复刊，周瘦鹃、钝根编辑。1923年2月停刊，共出200期。

7月20日 商务印书馆创刊《学生杂志》，后改名《学生月刊》，朱元善编辑。1921—1926年由杨贤江编辑。1947年8月停刊。

10月1日 《世界杂志》创刊，月刊，“以增进人民世界知识，灌输世界文明为宗旨”。于天声编辑。

10月 经世文社编辑的《民国经世文编》出版。共40期，石印。上海文明书局创办《博物学杂志》，季刊，编者吴家煦，由中华博物学会研究会编辑。1928年第2卷第4期后停刊。

12月5日 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共23条。其中规定：凡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出版物发行时，应事先禀报和送交警察官署，并向内务部备案；出版物不得扰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煽动曲庇罪人，揭载军事、外交等机密，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等。民国15年（1926）1月29日经北京报界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段祺瑞下令废止此法。

12月10日 中华图书馆发行、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创刊，月刊，共出6期。

是年 上海总商会议董印有模，向全国商会联合会提议，请求呈转司法部通令各省严办翻版，得到了司法部的批转。

《留美学生季报》创刊，中华书局发行。1928年6月停刊。

新闻报馆始用美制巴德双层轮转印刷机。

商务印书馆创制教学幻灯片。

1915年（民国4年）

1月1日 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创刊《小说海》月刊，黄山民编辑。出36期。

1月20日 中华书局创刊《大中华》月刊，梁启超主撰并作发刊词。1916年12月停刊。

1月24日 留美学生任鸿隽等创刊《科学》月刊。杨铨（杨杏佛）、刘咸、卢于道、张孟闻先后主编。自第28卷第2期起，由中国科学仪器公司印行，改为双月刊、月刊。1950年12月停刊。

1月25日 中华书局创刊《中华妇女界》，月刊。1916年6月终刊。

1月 中华书局创刊《中华学生界》，月刊。1916年6月停刊。该局至此共创办《大中华》、《中华教育界》等八种期刊。除《中华教育界》外，大多在1916年前后停刊。1919年以后，先后创刊《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等期刊。

3月 国学昌明社发行《国学杂志》月刊，主编倪羲抱。发表《论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等文。共出8期。

国华书局创刊《小说新报》月刊，李定夷编辑。

时新医学广告社创刊《中西名医医学汇刊》。

广益书局创刊《女子杂志》月刊。出1卷1期。

5月5日 商务印书馆创刊《妇女杂志》，月刊，王莼农主编。1931年12月停刊。

5月22日 中国白话报社编辑并发行《中国白话报》，旬刊，与1903年创刊的半月刊同名。

6月8日 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

8月1日 文明书局创刊《小说大观》季刊，包天笑主编。1921年

6月停刊。

9月15日 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月刊，陈独秀主编。创刊号《敬告青年》文中提出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0月1日 《新中华》创刊，月刊。该刊反对帝制复辟，力主联邦自治，呼唤新道德文明。共出6期。

10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陆尔奎、高凤谦、方毅等主编，收词6万条，10余人历时8年完成，为中国有新式辞书之始。

11月7日 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

11月 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半月刊，后改月刊，中英文合刊。

12月 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徐元浩（鹤仙）、欧阳溥存、汪长禄主编，收字4.8万余字，400万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詹天佑编译的《华英工程字汇》、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创刊《英文杂志》，1929年停刊。又创刊《英语周刊》，1937年停刊。

是年 赵南公创立泰东图书局。

徐枕亚、徐啸天创立清华书局，出版《玉梨魂》等书。

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为100万元。文明书局及所属进步书局并入。

中华书局出版《新编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聘陶子麟创制仿古活字，几年后刻成1号、3号各一副；始用彩色胶印机，聘美国技师指导。

新疆出版《新疆公报》。

1916年（民国5年）

1月22日 邵力子、叶楚伧创办《民国日报》。

1月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新式教科书》，新制、新编两套小学教科书订正发行。

3月　北京政府内务部共查禁中外报纸杂志印刷物目录清单共60种（自1913年11月起至1916年3月止）。

4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查教科书规程》。

6月15日　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在日本东京创刊《民铎》季刊，自第5号起（1918年12月1日）迁上海出版。改月刊，1919年由李石岑主编。"以阐扬平民精神，介绍现代思潮为宗旨。"1929年11月出版第10卷第5号后停刊。

6月　中华书局静安寺路哈同路总厂建成，占地40余亩，设总办事处及编辑所。采用新铅版机、橡皮机等新的印刷技术。

7月16日　黎元洪令，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9月　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手定的《饮冰室全集》，共48册。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孙毓修辑印的《涵芬楼秘笈》第一集，共10集，51种，80册。1921年4月出齐。

12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共300万字，3 500多条。

是年　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等四人集资在上海创办大东书局。

商务印书馆编印《小学实用教科书》，印行通俗教育画。

医学书局出版丁福保编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700余人，54卷，共4函，20册。

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蔡东藩撰《清史演义》。后陆续写成历代演义。1926年9月改名《历代通俗演义》印行。

《嘉业堂丛书目》在上海印行。

文明书局创刊《小说画报》，月刊，包天笑主编，有光纸石印。

1917年（民国6年）

1月1日　《新青年》迁北京出版。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作《文学改革刍议》；第2卷第6号发表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

1月28日　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6月19日停刊。共出150号。

3月1日　《太平洋》月刊在上海创刊，后改双月刊。李剑农、杨端六先后主编，泰东图书局发行。第2卷起改由杂志社发行。1924年3月编辑所迁北京，1925年6月停刊。共出4卷42号。

4月　丙辰学社编辑的《丙辰》季刊在日本东京创刊，后改名《学艺》。

6月9日　美国人密勒（Thomas F. Millard）在上海创办英文《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周刊。后改名*The Weekly Review*。两年后由鲍维尔（John Bejaman Powell）接办。1923年6月起改名*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1月15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教育与职业》，双月刊。

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植物大辞典》，杜亚泉主编，蔡元培作序。为中国现代第一部专科辞典。

版本学家叶德辉编刻《书林清话》，次年出铅印本。

中华书局由于投资固定资产过多，资金周转失灵。陆费逵辞局长职，由史量才继任。同年，陆费逵复职。

沈知方创立世界书局。

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附设小印刷所，排印该校讲义及《北京大学日刊》等。

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创制聚珍仿宋活字，有方体、长体、扁体3种。

喜饶嘉措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校勘新刻布顿·仁钦朱文集，后又奉命主持校勘拉萨新版《甘珠尔》。

1918年（民国7年）

1月　《新青年》自第4卷第1号起，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同时，编辑部改组扩大，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轮流编辑。

3月4日　《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宗白华、俞颂华、李石岑、郑振铎等十人先后主编。

3月20日　梁冰弦创办大同书局。

8月1日 清华书局创刊《小说季刊》，徐枕亚主编。共出4期。

8月中旬 生生美术公司出版《世界画报》，编辑兼发行人孙雪泥，自第10期起，丁悚编辑。1927年出版第53期后停刊。

8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徐宝璜编著的《新闻学》，蔡元培作序，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

11月23日 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这是近代以来官方颁布的第一个文字改革方案，并于稍后公布重新审定的教科书。北京孔德学校始用注音字母编印国语课本。

11月25日 张聿先、刘海粟创刊《美术》杂志。

11月 郑正秋创办《图画剧报》，沈伯诚编辑。

12月22日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在北京创刊《每周评论》周刊，陈独秀主编，自第27期起由胡适主编，上海亚东图书馆经售。1919年8月30日被禁。共出37期。

是年 教育部设科学名词审查会。

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译卢梭的《民约论》（全译本）。

商务印书馆聘高凤谦（梦旦）任编译所所长。开始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尚志学会丛书》。

商务印书馆设活动影戏部。1918—1926年拍摄戏曲片、教育片、新闻片数十部。开始制造教具、玩具。

柳蓉春开设博古斋。精印《士礼居丛书》、《守山阁丛书》、《拜经楼丛书》、《墨海金壶》等书，达数千册。

陈琰（立炎）开设古书流通处。收购艺风堂等家藏书。影印《知不足斋丛书》、《章氏丛书》、《古书丛刊》等。九年后歇业，存书售予中国书店。

汉蒙翻译国华书局在张家口创办，翻译出版汉蒙合璧的《幼学须知》、《国文教科书》、《二十四孝》等教材。

1919年（民国8年）

1月1日 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发售。1922年3月终刊。

新潮社出版《新潮丛书》，还出版《文艺丛书》等。

1月 《国故月刊》创刊，刘师培、黄侃主编。

3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5月 北洋政府通令查禁《进化》、《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

五四运动，各地学生会创刊学生联合会报。

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

中华书局译印《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与商务印书馆涉讼于法庭。这是民国初年上海两大书局之间的出版纠纷。

6月8日 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主编的《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创刊，玄庐作发刊词。1920年6月停刊。

7月14日 《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7月15日 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创刊《少年中国》月刊，王光祈、李大钊、康白情、苏滨存、左舜生、黄仲苏先后编辑。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24年5月停刊。该会还编印《少年中国学会丛书》32种。

7月20日 《每周评论》发表胡适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8月3日发表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8月17日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由此开始"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8月1日 孙中山在上海创刊《建设杂志》，月刊，亚东图书馆印行，孙文撰发刊词，胡汉民、朱执信等编辑。1920年7月停刊。

9月1日 梁启超组织的新学会在北京创刊《解放与改造》周刊，后改半月刊，张东荪、俞颂华主编，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9月第3卷起改名《改造》，增加梁启超、蒋方震为主编。1922年9月停刊。

12月 黄兰孙创办医药学杂志社，创刊《医药学》月刊。1952年停刊。

是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令国民学校教科书改用国语文。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初编，1922年出齐。收书

323种，8548卷。出版《续古逸丛书》第1种，共出47种。出版《国音字典》、《日用百科全书》等书。

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

法国驻上海领事公布《印刷律》。

商务印书馆舒震东创制华文打字机；创制汉字与注音符号结合的铜模；始用米力印刷机；开始用机器雕刻字模。

1920年（民国9年）

1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创刊《少年世界》，由南京会员负责编辑。共出12期。

2月2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通告国民学校文体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为语体文。

3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尝试集》。

4月30日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望道译。

6月9日 《上海时报》始用铜锌版编印《图画周刊》，随报附送，戈公振编辑，后改名《图画时报》，为中国有现代画报之始。

8月15日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刊《劳动界》，周刊，汉俊（即李汉俊）作《为什么要印这个报》，陈独秀作《两个工人的疑问》等文。共出23期。

8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典名著《水浒》。此后相继出版了同一形式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十多种古典名著，开风气之先。时称“亚东版”。

9月1日 《新青年》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新青年社在上海成立。

9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共学社丛书》，包括《马克思研究》在内。至1935年7月共出书近90种。

长沙文化书社成立。这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图书发行机构。

10月　新青年社出版《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作序，作为《新青年丛书》之一。该丛书共出8种。

11月7日　上海马克思主义学会创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发表《俄罗斯的新青年问题》（即《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震瀛译。共出6期。

12月8日　上海书业商会呈请拒绝参加国际版权同盟。

12月24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规定“嗣后教授字音，均以该书为准绳”。此书1919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新法教科书》，采用语体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生字加注注音字母。

中华书局编印《新教材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采用语体文，加注音字母。灌制“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出版《新文化丛书》、《哲学丛书》、《中华民国大地图》及分省地图、《世界改造大地图》及分国地图。

商务印书馆始用彩色石印机。

上海《时报》始用铜锌版编印《图书时报》。

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1 200人，创刊《友世画报》。

1921年（民国10年）

2月11日　新青年社被查封。该社及《新青年》第九卷起迁移广州。

5月10日　文学研究会创办会刊《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刊》，先后由郑振铎等主编，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后独立，由开明书店发行。1929年12月停刊。

6月25日　大东书局出版《游戏世界》，月刊，周瘦鹃、赵苕狂编辑。共出24期。

6月下旬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成立创造社。

8月5日　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的《女神》诗集。

9月1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立人民出版社，李达任社长。

10月12日　北京《晨报》社创刊《晨报副刊》，1924年冬由孙伏

园主编。题名《副镌》，曾连载鲁迅的《阿Q正传》。1928年6月停刊。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三大副刊。

10月 泰东图书局出版郁达夫的《沉沦》。

秋 国民党在上海设立民智书局，林焕廷主持。

11月 王云五受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12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初集。

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医学大辞典》，谢观利等编辑。

中华书局购进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创立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始用聚珍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

1922年（民国11年）

1月7日 商务印书馆创刊《儿童世界》，周刊，是中国第一本儿童期刊，郑振铎主编。1937年8月停刊。同时创刊《儿童画报》。

1月 南京吴宓、胡先骕创刊《学衡》月刊，总编辑兼干事吴宓。1928年1月改双月刊，中华书局印行。1933年7月终刊。共出79期。

世界书局出版《快活》，旬刊，李涵秋主编。同年12月停刊。

2月 中华书局创刊《国语月刊》，国语研究会主编。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刊行晏阳初主编的《平民千字课》，分4册。

4月 中华书局创刊《小朋友》，周刊，黎锦晖主编。接着又出版了旬刊《小妹妹》和《小弟弟》。

5月1日 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社的《创造》季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主编。1924年2月停刊。

5月7日 胡适、丁文江等在北京创刊《努力周刊》，创刊号以胡适的《努力歌》作发刊词。12月10日胡适病，由高一涵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23年10月停刊。

5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泰东图书局出版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

民智书局出版《世界语课本》、《世界语汉文字典》等。

6月　《绿光》创刊，世界语月刊。

世界书局出版严独鹤、施济群编辑的《红杂志》，周刊。

9月13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刊《向导》周刊，蔡和森等编辑。1927年8月停刊。

12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

是年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改组编译所，按学科设部。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20卷刊行。

瞿启甲辑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8卷。

商务印书馆灌制国语留声机片8张，由赵元任主持。

中国地质学会编辑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创刊，季刊，英文。1951年出第31卷后停刊。

上海书业公所成立“书业正心团”，销毁淫书版片36副，淫书463 000余册。

屠思聪创立世界舆地学社。出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中华分省袖珍地图》等。

1923年（民国12年）

1月10日　《小说月报》自第14卷第1期起由郑振铎接编，1927年郑出国期间由叶圣陶代编。1932年1月停刊，共出22卷。

1月15日　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世界》，月刊，叶劲风主编，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928年第17卷第1期起改季刊，胡怀琛主编。1929年12月停刊。

2月　申报馆出版《最近之五十年》，抱一（黄炎培）主编，蔡元培、孙文、梁启超、李守常、胡适、李协、任鸿隽等撰述。

商务印书馆出版汤姆生主编的《科学大纲》中译本。

3月25日　泰东图书局创办浅草社编辑的《浅草》季刊，林如稷、陈炜谟编辑。1925年2月停刊。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在上海创刊《国学丛刊》，顾实编辑。

3月　郑振铎与周予同、胡愈之、沈雁冰、王伯祥、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等十人集资创立朴社。出版俞平伯主编的《霜枫丛

书》；《妇女问题十讲》，章锡琛译；《结婚的爱》，胡仲持译。

5月13日 泰东图书馆出版创造社的《创造周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主编。1924年5月终刊。

5月 商务印书馆杜就田编辑的《动物大辞典》出版。

应修人、谢旦如、许元启、戚焕埙、楼适夷、应彦重、张友舜在上海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会员有二三百人，出版《通图月刊》。1928年5月被封。

6月 世界书局创刊《侦探世界》半月刊，严独鹤、陆澹庵、程小青编辑。共出24期。

8月 北京新潮社出版鲁迅小说集《呐喊》。

10月14日 柳亚子、邵力子、胡朴安、叶楚伧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新南社，曾编印《新南社社刊》，1924年10月10日停止活动。

10月2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周刊，恽代英主编。

11月1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徐白民主持。

11月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儿童文学丛书》。

12月16日 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上册，陈独秀等作序。

是年 樊春林在上海创立新文化书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教育促进会主编的《平民千字课》、《千字课挂图》；影印《正统道藏》，全书约十万页。

商务印书馆设影写版部，改进雕刻铜版技术，先后聘德、美技师指导。

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曾被美米林公司控告侵犯版权，经判决驳回，该书照常发售。

特木格图在北平创办蒙文书社。

1924年 (民国13年)

1月 上海书店出版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义》。

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批《文学研究会丛书》。译印《少年百科全

书》，共9卷，20册。

3月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新建筑落成，编译所迁入办公。

《词学季刊》创刊，龙沐勋（龙榆生）编辑，民智书店发行。自第2卷起改由开明书店发行。1936年9月停刊。

7月　世界书局出版《红玫瑰》周刊，后改旬刊，严独鹤、赵苕狂编辑。

10月10日　《醒狮周报》创办，发表出版宣言，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编辑。

10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创办《中国工人》月刊。1927年7月停刊。1928年12月在上海复刊。

11月17日　孙伏园在鲁迅支持下，在北京创办《语丝》周刊，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1927年10月被查禁。1928年在上海复刊，由鲁迅、柔石、李小峰先后主编。1930年3月停刊。

11月19日　高长虹、向培良在北京创刊《狂飙》周刊，附《国风日报》发行，出17期停刊。1926年10月10日复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次年1月停刊。并编印《狂飙丛书》，由开明等书店出版，共出23种。

12月10日　中国青年社编辑出版《反对基督教运动》。

12月23日　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7月迁上海，1928年12月停刊。

12月　民智书局出版孙文著《三民主义》。

1925年（民国14年）

1月　《妇女杂志》出版"新性道德专号"。

2月17日　教育部裁撤图书审定处，改设编审处。

3月　李小峰在北京创办北新书局。出版《苦闷的象征》。

4月4日　上海书业公所、书业商会、日报公会、书报联合会集会，决定电呈北洋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

4月8日　上海总商会电北洋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

4月13日　上海书业公所、书业商会、日报公会、书报联合会等

四团体发表抗议公共租界制订的《印刷品附律》的宣言。

4月25日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第一任董事部部长梁启超，书记袁同礼。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图书馆学。

6月3日 《公理日报》在上海创刊，报道五卅惨案真相和反帝运动消息，署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实际编辑者是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6月24日停刊。

6月 伍联德创办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8月21日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成立职工会，廖陈云（陈云）任委员长。

9月1日 张静庐、沈松泉、卢芳创立光华书局。1935年停业。

《东方杂志》因6月出版《"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被租界工部局起诉，罚款200元。

10月2日 北京沉钟社主编的《沉钟》周刊出版，北新书局代售。该社还出版《沉钟丛书》7种。

10月11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王志莘主编，翌年10月自第2卷起改由邹韬奋主编，徐伯昕任发行。

11月1日 大东书局出版周瘦鹃编辑的《紫罗兰》半月刊。1936年停刊。

11月 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著《热风》。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学生国学丛书》，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共出版90余种。

中华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创刊《中国学生》周刊。

中华书局藏书楼改为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拥有中外文报刊图书近60万册。

上海英商英美烟公司印刷厂始用彩色影写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创办了蒙文刊物《内蒙国民旬刊》。

1926年 (民国15年)

1月1日 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主办的《新女性》月刊创刊，章锡琛主编，发行人吴觉农，新女性社发行。该社还出版《妇女问题

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等书。

2月4日 上海警察厅查封上海书店。

2月15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刊《良友》大型画报，伍联德主编。1945年10月停刊。

4月1日 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闸北三德里成立。出版《洪水》半月刊，创办《创造月刊》；还出版《创造社丛书》、《世界名家小说》、《世界名著选》30种。

5月3日 东方图书馆正式向社会开放。王云五兼馆长。

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一书出版，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中试用。

7月 上海北新书局创办《北新》周刊，后改半月刊，孙福熙、潘梓年、石民先后编辑。1930年12月停刊。共出124期。

8月 章锡琛创立开明书店。

中华书局创刊《小朋友画报》，由王人路、吴启瑞、许达年、沈子丞先后编辑。

10月 光华书局出版叶灵凤、潘汉年编辑的《幻洲》半月刊。46开本。1928年1月停刊，共出20多期。还出版《幻洲丛书》多种。

11月 中共中央在汉口创立长江书店。1927年1月，倪忧天在汉口开设长江印刷厂。1927年8月4日长江书店及长江印刷厂被迫停业。

12月 戴望舒创刊《璎珞》旬刊。

冬 郑佩刚创办出版合作社。

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著《阿Q正传》英译本。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先后出版《打倒帝国主义》、《北伐宣传大纲》等小册子50余种。

中华书局创办函授学校，校长由舒新城兼任。

商务印书馆铁工制造部改组为华东机器制造厂，独立经营；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独立经营。

布和克什克在北京创办蒙文学会。

克兴额和儒勒格尔扎布、热希僧格在沈阳创办东蒙书局。

1926年至1936年在罗布林卡以纳塘写本为底本刻拉萨版《甘珠

尔》。

1927年（民国16年）

1月 中国旅行社在上海创刊《旅行杂志》，唐渭滨主持，孙思霖主编。该社还出版《旅行丛书》等。

2月16日 李石岑、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丁晓先、周予同、丰子恺等发起组成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发表宣言。

3月27日《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家杂志社上海总发行所成立，所址在宝山路宝昌路口。3月31日，改名上海长江书店，4月13日被迫停业。

5月 梁实秋、徐志摩等开设新月书店。

朱永邦创办自由书店，出版《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国家论》及《克（鲁泡特金）氏学说概要》等书。

8月 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

10月 王子澄在福州路296号创立光明书局。

11月1日 曾朴、曾虚白父子在上海望平街创立真美善书店。创刊《真美善》半月刊，后改月刊、季刊。1931年7月停刊。共出47期。1935年，书店转由他人经营。

11月 孙伏园、孙福熙创立嘤嘤书屋。12月，出版《贡献》文学旬刊（后改月刊），孙福熙主编。1929年3月停刊。

12月17日 《语丝》周刊自第四卷起在上海复刊，鲁迅主编，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30年3月停刊。

12月31日 王敦庆、黄文农、叶浅予创刊《上海漫画》三日刊。

12月 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开设春野书店。经理周灵均。

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废止前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有关规程。接着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

是年 中华书局在香港设立分局，出版《新中华教科书》。

陈邦桢在上海河南中路159号创立新亚书店。

平襟亚在上海福州路328弄6号创立中央书店。

1928年（民国17年）

1月1日 春野书店出版太阳社创办的《太阳月刊》，蒋光慈主编。共出7期。

《新生命》月刊创刊，主编周佛海，编辑萨孟武等，新生命月刊社发行。该刊标榜以“阐扬三民主义，研究建设方案，并介绍批评各国社会思想学说及政治经济制度”为宗旨。1933年12月1日出版第3卷第12期后停刊。

1月 李达、邓初民、熊得山等在上海重庆路马安里264号创立昆仑书店。

2月1日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霈任总编辑。3个月后迁南京。

2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大辞典》，唐钺、朱经农、高觉敷先后主持，范寿康等编辑。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王云五为主任委员。

3月10日 新月书店创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等主编。1933年6月停刊。

4月7日 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出版《电影月报》，沈浩主编。

4月21日 《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张光宇主编。1930年6月7日停刊。

4月23日 大学院通令切实查禁淫书贩卖。

5月1日 现代书局创办《洪荒半月刊》综合性刊物，潘梓年编辑。共出3期。

光华书局创刊《戈壁》半月刊，叶灵凤编辑。共出4期。

5月14日 国民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5月20日 晓山书店创办《我们》月刊，洪灵菲主编。同年8月30日被查禁，晓山书店被封闭。

6月20日 北新书局发行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1929年12月停刊。

新月书店出版胡适著《白话文学史》。

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共有百余种。

7月　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月刊，索非主编。后期由徐调孚主编。1932年停刊。1947年复刊，改双月刊，赠阅。共出45期。

9月20日　现代书局出版《大众文艺》月刊，郁达夫主编。1930年6月被查禁。

9月　陈望道、施复亮、汪馥泉等创立大江书铺。

施蛰存等在上海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创立第一线书店。创刊刘呐鸥编辑的《无轨列车》半月刊，出8期，被禁。不久停业。

10月15日　大江书铺创刊《大江月刊》，陈望道主编。发表鲁迅、沈端先 (夏衍) 等人文章。共出3期。

张资平创立乐群书店。创刊《乐群》半月刊，张资平、陈勺水编辑。出4期后，次年1月改出月刊。1930年3月停刊。共出12期。

11月　春潮书店开业。张友松主持。创办《春潮》月刊，张友松、夏康农编辑。1929年9月停刊。共出9期。

泰东图书局出版蒋光慈的《短裤党》。

12月1日　国民政府训令内政部、行政院、交通部取缔匿名出版物。

12月5日　赵南公（泰东）、李志云（北新）、张静庐（光华）、张秉之（太平洋）、洪雪帆（现代）、章锡琛（开明）、曾虚白（真美善）、陆友白（卿云）、汪孟邹（亚东）发起成立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群众图书公司、新月、金屋、嘤嘤、春潮、远东图书公司等。未获当局批准。

12月6日　鲁迅与柔石等成立朝花社。创办《朝花》文艺周刊，该社还编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选》、《艺苑朝花》等书。

12月30日　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90余人。郑振铎、郑伯奇、沈端先、李初黎、彭康、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1月发表《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

12月　邵洵美创立金屋书店，出版《狮峰》半月刊。共出2期。

是年 南强书局开业。

周佛海等创立新生命书局，地址在上海福州路山西路，樊仲云主持，陈宝骅任经理。1937年歇业。

许杰、王育和等创立明日书局。

独立出版社在南京成立。后又设于上海。

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军用图书社在南京开业。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清代通史》（上册）、《中国报学史》等书。

是年底，成立蒙古留平学生会，出版名为《蒙古》的蒙汉合璧不定期刊。

1929年（民国18年）

金屋书店创办《金屋月刊》，邵洵美、章克标编辑。1930年9月停刊，共出12期。

1月1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议决《宣传品审查条例》。

1月20日 人间书店发行沈从文、胡也频编辑的《人间》月刊。共出3期。

中国美术刊行社创刊《时代漫画》（月刊）。鲁少飞主编。1936年10月起，《上海漫画》并入，改月刊。1937年5月停刊。

2月7日 创造社出版部被封。以江南书店名义出版《江南文库》及马列著作数种。

4月1日 商务印书馆刊行《万有文库》初集，共1 010种，2 000册。并附10种参考书。

6月4日 国民政府发布“查禁‘反动’刊物令”。

6月15日 创造社出版部创刊《小物件》半月刊，叶灵凤、周全平、潘汉年主编。开本很小，1寸多宽，2寸多长。

6月22日 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

6月 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创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期刊《科学》、《科学画报》及科技图书多种。

8月　高尔松（高希圣）、高尔柏（郭真）在上海创办平凡书局。次年8月平凡书局被查抄。1931年改名开华书局，出版《苏曼殊全集》、《西线无战事》、《南社诗集》、《南社词集》等。另以中学生书局名义出版《中学生丛书》、《中学生创作丛书》等。

9月15日　施蛰存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公益坊创立水沫书店。1932年初歇业。创办《新文艺》月刊，次年4月停刊。

10月10日　上海新书推荐社成立，出版《书目年刊》。社友可优惠购书。社址在中华路1420号。

乐华图书公司开始出版《创作丛书》。共20多种。

12月5日　创刊《出版月刊》，署旦如（谢旦如）、通如、全平（周全平）编辑。

12月　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理事长。

是年　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华兴书局。出版《中外研究学会丛书》、《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丛书》等数十种。还曾用启阳书店、春阳书店、浦江书店、中华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名义出书。1931年被查封。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

民智书局出版梁启超著《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中华书局开设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油印机、华文打字机、日历钟及理化仪器等。

1930年（民国19年）

1月1日　光华书局发行《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同年5月第5期被禁，第6期改名为《新地月刊》。

1月10日　现代书局出版《拓荒者》月刊，蒋光慈编辑。同年5月被禁，最后一期改名为《海燕》。

1月18—19日　淞沪警备司令部两天内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书店，没收各书店代售华兴书店出版的书籍。华通书店经理余祥森当场被捕，同年11月获释。

开明书店创刊《中学生》月刊，夏丏尊主编。1937年7月停刊。1939年5月5日在桂林复刊，改名《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叶圣陶主编。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吴絅之、狄平子、黄涵之、李经纬等在上海发起创立佛学书局。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新文艺丛书》，初为徐志摩主编。共出书30多种。

2月5日　上海人文社创刊《人文》月刊，每年10册。1933年第4卷第1期改名为《人文月刊》。1937年12月停刊。1947年4月30日在上海复刊，改季刊。1949年5月停刊。

2月13日　鲁迅、郁达夫、邓初民、赵南公、潘汉年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7月10日创办《自由运动》，仅出2期。

2月19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

2月　民智书局出版孙中山的《总理全集》，胡汉民编，共4集。儿童书局开业。张一渠、石芝坤创办。

3月2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出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演说。1935年自行解散。

3月　昆仑书店出版《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 (即第1卷第1篇)，陈启修 (陈豹隐) 译。

商务印书馆复聘王云五为总经理。王就职旬日后出国考察外国出版事业。

4月1日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出版《乐艺》季刊，青主（廖尚果）主编。共出6期。

4月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中国大观》大型摄影画册。

5月20日　何思敬、邓初民、朱镜我、李一氓、吴黎平、熊得山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6月16日　北新书局出版《现代文学》月刊，赵景深编辑。共出6

期。

6月　教育部编印《注音符号传习》，制定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

华兴书局出版《列宁与托洛茨基》、《反托洛茨基论文集》、《反布哈林论文集》等书。

严幼慈、严仲华在上海创立龙门联合书局。经营影印西书业务。

7月20日　上海书业公所、上海书业商民协会、上海新书业公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组成上海市书业商业同业公会，陆费逵当选为主席。会员单位40余家。

8月5日　上海社联、左联联合创办《文化斗争》，潘汉年等主编。共出2期。

8月12日　平凡书局被封。不久，上海书业公会发表宣言，抗议当局压迫文化运动。

8月　张静庐创立联合书店，出版社会科学书籍30余种。

9月　北平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成立，先后出版30多种中国古籍的索引工具书。

10月10日　现代书局出版《前锋月刊》，朱应鹏等编辑。创刊号重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翌年4月停刊，共出7期。

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

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工作者联盟、世界语联盟等组织先后参加。1936年自行停止活动。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世界儿童文学丛书》，至1950年1月，共出12种。

11月1日　《读书月刊》在上海创刊，顾凤城主编，光华书局发行。共出18期。

12月15日　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

《中国新书月报》创刊，余甦生编辑，华通书局发行。1933年1月

停刊，共出18期。

大东书局出版《新文学丛书》，初为徐志摩主编。至1934年4月，共出19种。

三友书社出版《啼笑因缘》，张恨水著，严独鹤校订。此前在《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连载。

年底 侯厚培在上海福州路254号创立黎明书局，董事长王世颖，编辑负责人孙寒冰，经理徐毓源。1940年4月27日孙寒冰在重庆被日机炸死后停业。

是年 现代书局出版《现代世界文艺丛书》。至1932年11月，共出4种。

世界书局出版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著《江湖奇侠传》。

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华书局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百科辞典》；出版《武昌革命真史》，旋被查禁。

商务印书馆设研究所，王云五兼所长。

1931年（民国20年）

1月15日 上海社联的《书报评论》创刊，柯柏年主编，不久被查禁。共出6期。

1月20日 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邵洵美编辑的《诗刊》季刊。共出4期。

3月1日 中国语言文字学会在上海成立。

3月4日 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出售反动书籍”为由，查封北新、群众、乐群、江南等书局。

4月1日 神州国光社创办《读书杂志》月刊，王礼锡主编。1933年11月终刊。现代书局出版叶灵凤主编的《现代文艺》月刊，共出2期。

4月18日 《时报》开始连载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改名《家》（激流三部曲之一）。

4月25日 “左联”创刊《前哨》，鲁迅、茅盾、冯雪峰编辑。由

于贴印“左联”五烈士的照片，7月才正式发行。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由湖风书局出版。1931年11月15日停刊。

5月 开明书店出版茅盾的《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叶绍钧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6月15日 上海市出版业工会商务印书馆事务所编译所办事处创办《编辑者》(非卖品)，郑振铎、周予同主编。共出5期。

8月10日 中华书局创刊《图书月刊》，发表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9月20日 宣侠父在上海七浦路734号创立湖风书店。周濂卿任经理。出版《文艺创作丛书》17种，《世界文学译丛》12种。1933年3月被查封。

“左联”创刊《北斗》月刊，丁玲主编。1932年7月出至上卷3—4期合刊被禁。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书史》，陈彬龢、查猛济编著。

《汉译古兰经》出版，线装。总纂者姬觉弥，总发行广仓学窘。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开始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

10月7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

世界书局出版《世界少年文库》，至1937年3月共出译作47种。

启智书店出版蔡尚思著《中国学术大纲》。

是年 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严复译世界名著8种、《辞源》续编等。

中华书局出版《当代名人画海》，郑午昌主编。

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创设传真版。

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文艺丛书》。至1934年7月，共出18种。

1932年（民国21年）

1月13日 《中国论坛》(*China Forum*)英文周刊在上海创刊。美籍犹太人伊罗生创办、编辑。出第24期后休刊。1933年2月11日复刊，改为中英文合刊，不定期。1934年1月停刊。

1月17日 大江书铺出版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分上下册。

1月29日 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4个印刷所、各栈

房及尚公小学。

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成立，领导红军中的出版工作。

2月1日 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50万册藏书大部分化为灰烬。总损失达1 600万元。

2月8日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总馆、各印刷厂停业，所有职工一律解雇。准总经理及经理辞职。组织特别委员会，推定丁斐章等9人为委员，王云五、夏筱芳、鲍庆林为常务委员，举张菊生(张元济)为委员长，王云五为主任常务委员。

上海女子书店创立，办事处在圆明园路29号。

3月 《生活》周刊为十九路军抗战捐款。

上海儿童书局开始出版丁桂中、陈鹤琴主编的《儿童科学丛书》6册，1933年4月出齐。

4月 商务、中华、湖风、昆仑、南强、开明、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的请愿书。

中华书局出版蒋维乔编《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5月1日 现代书局创刊《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1935年5月，因现代书局歇业而停刊。

5月7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根据《国音字典》修订。

6月10日 光华书局出版“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出第5、6期合刊后被禁。

7月1日 生活书店在上海陶尔斐斯路 (今南昌路) 42号开业。

7月12日 商务印书馆召开新选举的董事会，定于8月1日复业。王云五仍为总经理，李拔可、夏筱芳为经理。

7月15日 申报馆创刊《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申报馆特种发行部发行。1936年1月改名《申报周刊》，随报附送。1937年12月停刊。

儿童书局《儿童杂志》第1期出版，主编胡叔异。

7月　上海书业公会照章改选半数，王云五、沈骏声等7人当选，陆费逵仍为主席。又增选张叔良等5人为监察委员。

北平成立了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查获了双义书店、卿云书店、宝仁堂书局等翻版书大本营。

8月1日　商务印书馆复业。组织编审委员会实行日出一书。

9月16日　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后由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主编，1937年出至117期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1949年5月停刊。

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出版复刊号（第29卷第4号），胡愈之主编，月刊。半年后，胡愈之辞职。

9月27日　国民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李达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怀德里11号创立笔耕堂书店。

陈兆椿在上海山西路10弄3号创立春明书店，后迁四马路公和里。

10月2日　商务印书馆组织大学丛书编委会，由丁燮林、王世杰、任鸿隽等54人组成。开始编印《大学丛书》300种，抗日战争爆发前完成十之七八。

北新书局出版民间故事《小猪八戒》，有侮辱伊斯兰教词句，引起上海回教徒不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北新书局停售此书，并一度停业。

秋　韩振业、郭澄在上海江西路368号创立天马书店，韩振业任经理。1941年歇业。

11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修正通过《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宣传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均为“反动的宣传”，一律禁止。

12月1日　申报馆史量才聘黎烈文为《自由谈》副刊主编，革新内容。1934年5月改由张梓生接编。

申报馆在南京路大陆商场创设流通图书馆开幕，馆长李公朴。馆内设读者指导部，在《申报》辟读者问答栏。

12月3日　商务印书馆创刊《出版周报》新刊第一号。编辑兼发行人李伯嘉。1937年7月24日停刊，共出新刊243号。

12月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创刊《世界》，世界语月刊，叶籁士、胡绳先后主编。1935年3月停刊。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创刊《出版消息》半月刊，顾瑞民编辑。共出18期。

是年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华百科丛书》，共100册。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正中书局，在上海设有分局。

国民党复兴社控制的出版机构拔提书店，在南京国府路成立。

王静如著《西夏研究》三辑出版。北平图书馆编辑部出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

1933年（民国22年）

1月10日　中华书局创办《新中华》半月刊，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编辑。1937年8月停刊。后复刊，1951年12月16日终刊。

1月　申报月刊社出版翁照垣著《淞沪血战回忆录》。

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书，出版《冰心全集》、《小朋友丛书》30种。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开始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至1937年6月共出40种。

2月初　开明书店出版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

2月4日　《自由言论》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王造时主编。

大江书铺出版刘大白著《中国文学史》。

3月8日　女子书店创刊《女子月刊》。

4月22日　申报馆开始出版《申报年鉴》，张梓生主编。1936年第4期后停刊（1944年汪伪时期的申报馆出1期）。不久，又出版《申报丛书》。

儿童书局出版莫奈德著《苦儿努力记》，章衣萍、林雪清合译。

5月28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电影画报》半月刊，郑君平（郑伯奇）主编。共出16期。

糜文溶、沈逢吉、柳溥庆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印刷学会。1934年正式成立，举郁厚培任主席。创刊《美术生活》，三一印刷公司

出版。共出2期。

7月1日　生活书店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月刊。1937年11月停刊。

7月8日　生活出版合作社正式成立，对外仍称生活书店，选邹韬奋为董事会主席，徐伯昕为经理。

7月10日　潘公展主办、陶百川主编的《汗血》周刊创刊。1937年10月停刊。

8月1日　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创刊《科学画报》半月刊，冯执中编辑。自1939年第6卷第1期起改为月刊，由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编。

10月14日　商务印书馆选印故宫博物院善本《宛委别藏》40部；影印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12种。

10月30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密令查禁普罗文艺。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公布《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学生文库》，王云五、徐应昶主编。第1集共500册，1934年2月出齐。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韩起编译《苏联大观》、老舍著《离婚》、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画故事《一个人的受难》等4种。

11月　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派人破坏、捣毁，并散发恐吓信。

《大众》图画月刊创刊，梁得所主编，大众出版社发行。共出19种。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复兴教科书》。

中华书局出版新课标适用小学、中学教科书、《国防丛书》、《东北小丛书》、《国际丛书》、《世界童话丛书》。

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印行杨家骆主编的《四库大辞典》。

罗常培出版《唐五代西北方音》。

1934年（民国23年）

1月1日　北平立达书店创办以郑振铎、章靳以为主编的大型《文

学季刊》。第4期起由文学季刊社出版，委托生活书店总经销。1935年12月出至第2卷第4期停刊。

《国闻周报》开始连载沈从文的《边城》，同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书。

1月15日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创刊《音乐杂志》季刊，萧友梅主编。共出4期。

1月20日 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时代漫画》月刊，鲁少飞主编。1937年6月20日停刊。

1月 有正书局影印出版清代王概兄弟编绘的《芥子园画谱》，兼用木版、石版、玻璃版并用人工着色。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刊《美术杂志》月刊，方雪鸪、陈秋草编辑。共出3期。

2月10日 《新生》周刊出版，杜重远主编，编辑兼发行人艾寒松，生活书店发行。

《人言》周刊创刊。1936年6月停刊。共出3卷16期。

2月15日 北平荣宝斋套色精印出版《北平笺谱》。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以《版画丛书》名义出版。

2月25日 各书店收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宣部查禁25家书店涉及28位作家的149种书籍的公文。有关书店由开明书店领衔联名请愿"体恤商艰，从轻处置"。3月20日，国民党市执行委员会批复："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二、禁售者39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

2月 教育书店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379弄12号开业。经理贺礼逊。

3月 中华书局出版易君左著《闲话扬州》，作者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此书诋毁扬州市政建设及扬州市民，引起扬州市民公愤，要求严惩作者和出版者。经调解，作者登报道歉，中华书局停售此书。

4月5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陶亢德、徐订编辑。1935年12月停刊。共出42期。

4月17日　商务印书馆登报征求出版计划。

4月　黎明书局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节译本。此后正中书局等五家书店也译印此书。

5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上海设立。

5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第1、2篇，吴半农译，千家驹校）；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

张静庐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324号创立上海杂志公司。

开明书店出版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6月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6月15日　国民党中宣部函上海市党部转知各书店，将图书杂志原稿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

6月　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吕振羽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即《中国社会史纲》第1分册）。

7月17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7月　上海书业公会第二次改选，张叔良等8人为执行委员，陆费逵等5人为监察委员，王云五为主席。

8月1日　新疆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油印出版了第一份维吾尔文《新疆日报》。1934年底创刊出版《新新疆》，是省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创办的维文周刊。

8月16日　《中国分省新图》出版，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绘，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上海申报馆发行。

8月　开明书店出版朱起凤编纂的《辞通》，24卷，2册。

神州国光社出版李衡之著《辩证法之理论的研究》；李季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

9月16日　生活书店创刊《世界知识》半月刊，主编署毕云程，实际上是胡愈之。1949年3月停刊。

生活书店出版鲁迅、茅盾、黎烈文创办的《译文》月刊，鲁迅主编。自第4号起，由黄源接编。1935年9月停刊。1936年3月复刊，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37年6月停刊。

9月20日 生活书店出版《太白》半月刊，陈望道主编。1935年9月停刊。

美术生活杂志社创刊《漫画生活》，吴朗西、黄士英、黄鼎主编。1935年9月停刊。

开明书店由王伯祥主持，周振甫、卢芷芬协助，辑印《二十五史》，合5册，附"人名索引"一册。翌年续刊《二十五史补编》4册，收宋元以来对二十五史的增补、考释245种。

10月1日 生活书店与中国银行等十大银行商定，首倡读者免费汇款邮购图书。

10月3日 上海市教育局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图书须经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

10月10日 黎明书局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孙晓村、冯和法、薛暮桥、千家驹等编辑。自第2卷起由新知书店出版。1943年5月停刊。

11月9日 国民党当局查禁书刊167种。

11月10日 《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李公朴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子美（夏征农）编辑。1936年11月25日被禁。

11月13日 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路途中被暗杀。

12月 桂绍盱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796号创立竞文书局，出版英语学习读物。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幼童文库》。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六省《通志》。编印《四部丛刊》续编。

中华书局出版《中华百科丛书》、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出版《四部备要》点句本、《新中华丛书》。

中华书局设在香港九龙的印刷厂建成。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上海图书学校成立，李石曾创立；分图书科、出版科、印制科、组织科。附设有印刷工场（工读印制社）；1937年有学生54人。

《伊犁日报》创建，用维、哈两种文字出版。

1935年（民国24年）

1月10日 王新民、何炳松、武堉幹、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月5日 《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康嗣群编辑，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935年7月31日终刊，共出6期。

2月 生活书店聘张仲实主编《世界知识》。

商务印书馆受教育部委托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出版。选书231种，分装2 000册。

3月5日 《芒种》半月刊创刊，曹聚仁、徐懋庸主编，群众杂志公司发行，自第9期起，由北新书局发行。同年10月终刊。共出12期。

3月9日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辑印《丛书集成》预约发售，收丛书百部，计划两年出齐。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三编出版。

3月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库》。至次年9月，共出16种。

4月 鲁迅、郑振铎合编的《版画丛刊》之一《十竹斋笺谱》第一册由北平荣宝斋出版。是书借王孝慈藏本，用上等棉料纸精印。全书4册，1941年出齐。

5月18日 生活书店创办《读书与出版》月刊，平心、艾寒松编辑。1948年下半年停刊。

5月20日 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选收中外文学名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每月出版1册。第一集12册出完后改出单行本，共出15种。

5月31日 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上海市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需事先送审。

5月 李尧棠（巴金）、吴朗西、郭安仁（丽尼）、陆圣泉（陆蠡）在昆明路创立文化生活社。

6月7日　因《新生》杂志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口实，提出“严重抗议”。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新生》周刊停刊，主编杜重远判刑1年零2个月。

6月15日　文学社、文学季刊、芒种社、论语社、太白社、读书生活社、新生周刊社、世界知识社等17个文化团体，王鲁彦、方光焘、艾思奇、老舍、周建人、柳亚子等148人发表《我们对开展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读经可以救国”的主张。

7月12日　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因上海等地新闻出版界要求复议，未予公布。

8月21日　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有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民众学校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

8月30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开始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胡适、郑振铎、阿英等编选并作序。汇集1917—1927年10年间的代表作，书前有蔡元培的总序，全书10大册，500万言。1936年2月出齐。

上海市通志馆编印《上海市年鉴》1934年版。

9月2日　上海杂志公司开始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辑共41种。

9月3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规定自民国25年1月起，凡编辑儿童及民众读物者，一律须用注音汉字印刷。

9月16日　宇宙风社出版林语堂、陶亢德编辑的《宇宙风》半月刊，后改旬刊。1947年停刊。

9月　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孙晓村等6人集资在上海创立新知书店。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小朋友文库》第1辑。共85册。

10月12日　商务印书馆即日起发售“星期标准书”。由著名学者、

名流选定该馆新书（包括重版）一种，照定价对折发售。

11月16日　生活书店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柳湜等编辑。次年2月29日被禁。该店还出版《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8大期刊。

11月　生活书店聘张仲实为总编辑，金仲华为编辑部主任。不久，开始出版《世界知识丛书》。还出版李平心主编的《全国总书目》，收录1912年以来全国在版书目2万种。

12月　商务印书馆编印《小学生分年补充读本》600册；译印《化学工业大全》；出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是年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学生文库》，共出314册。

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成立。

中国文化服务社成立，负责人刘百闵。

商务印书馆创制赛铜字模。

方国瑜写成《么西文字汇》。

1936年（民国25年）

1月初　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艾思奇、郑易里创办，聘黄洛峰任总经理。

1月20日　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刊《海燕》月刊，署史青文编。第2期署耳耶（聂绀弩）编辑。出2期，被禁。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著《故事新编》，列入《文学丛刊》。至1949年6月，《文学丛刊》共出10集，160种。

开明书店创刊《新少年》，顾均正编辑。1945年在重庆复刊，改名《开明少年》。

丰子恺、钱君匋等在上海塘山路（今唐山路）36号创立艺术书店。

3月　中山文化教育馆与王云五及商务印书馆订约，资助王云五编纂《中山大辞典》（40册，5 000万字），稿成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张乐平编绘的“三毛”连环漫画。

1月—3月　张季鸾、胡政之创办《大公报》上海版。

4月15日　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作家》月刊，孟十还主编。同年11月15日出版第2卷第2期后停刊。

5月4日　新文字书店成立。

6月1日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编。同年12月停刊。

6月7日　茅盾、傅东华、夏丏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

生活书店开始出版张仲实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

9月15日　生活书店出版《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孔另境协助，蔡元培作序。一个多月内来稿3 000多篇，600万字。

9月　上海杂志公司创刊《中流》半月刊。黎烈文主编。1937年8月停刊。

10月　鲁迅自费编印瞿秋白文集，题名《海上述林》，上、下卷均有鲁迅所作序言。

12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屠格涅夫著《猎人日记》(耿济之译)；《罗亭》(陆蠡译)；《星》，叶紫著；《发的故事》，巴金著；《绿叶的故事》，萧军著；《日出》，曹禺著；《黄沙》，靳以著；《咀华集》，刘西渭著。

是年　中华书局澳门路总厂建成。总管理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均迁于此。

中华书局出版《辞海》。主编者舒新城、徐元诰、沈颐、张相，参加编辑者100余人，历时20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上海出版业、各大报馆会同国民政府实业部集资筹办温溪造纸公司。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经股东会议议决解散。

1937年（民国26年）

1月1日　《印刷月刊》创刊，刘龙光编辑。1937年12月1日停刊。1939年7月1日复刊，1940年7月终刊。

1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先后出版80种。

开明书店创刊《月报》大型文摘期刊。

黎明书店创办复旦大学文摘社主办的《文摘》，孙寒冰主编。1948年11月停刊。

解放社创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抗日战争丛书》和马列丛书均用解放周刊社名义出版。

4月24日　新华书店在延安清凉山创立，对内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解放》周刊从1937年4月24日出版创刊号起，以"新华书局"名义发行。至第1卷第21期改为"发行者 新华书店"。

7月8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7月28日修正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

7月20日　王志莘、杜佐周、张志让、张仲实、郑振铎等编辑的《中华公论》创刊，钱亦石主编，生活书店发行。共出2期。

7月25日　上海编辑人协会成立，谢六逸任主席。

7月　延安中央印刷厂正式成立。

8月16日　开明书店及美成印刷厂被炸毁。

8月19日　生活书店出版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12月13日迁汉口出版。创刊同时，编印《抗战画报》周刊。

8月24日　上海书业公会召开执监联席会议，商讨劝募救国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各认5万元。

8月25日　《呐喊》创刊，是《文学》、《文季》、《中流》、《译文》的战时联合刊物。1938年5月迁广州，改旬刊，署编辑人巴金，发行人茅盾。

8月　生活书店总店迁汉口。在各地先后设立分店55处。

9月1日　上海编辑人协会创刊《文化战线》旬刊，施复亮主持。共出8期。

《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联合出版《战时联合旬刊》。

9月11日　胡风创办《七月》文艺周刊，联华书店印刷、发行。1941年9月停刊。

9月13日　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刊《战线》五日刊，编委章汉夫等，

执行编辑陈楚云。

9月20日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漫画》五日刊，王敦庆编辑，发行人鲁少飞。出12期后停刊。

10月19日 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出版。

10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编的《抗战小丛书》（26种），还编印《战时常识丛书》（15种）等书。

上海杂志公司内迁汉口。在汉口成立上海杂志公司总店，并先后在广州、长沙、重庆、桂林、西安设分支店。在武汉期间，张静庐出版了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

11月 读书生活出版社迁武汉。

上海文摘社出版《毛泽东自传》，斯诺著，汪衡译。

商务印书馆（香港）印行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一”字词条本）。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刊《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主编兼发行人潘梓年，副主编许涤新。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售。1949年10月20日终刊。

12月31日 中华书局宣布编辑所、印刷所停业。编辑所解雇120余人。

12月 新知书店迁汉口。

通俗读物编刊社，从西安迁到武汉。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前身是三户书社，由顾颉刚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创办。1938年10月，编刊社从武汉迁往重庆。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辞典》第1册出版。

是年 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张宗麟、吴耀宗、沈体兰、胡仲持等20人集资成立复社。

俞鸿模在汉口独自创办海燕出版社。1938年9月15日迁往桂林，后改名海燕书店又迁至上海。

商务印书馆恢复至原资本额500万元。将半数存书分发各分馆（南京及津沪杭分馆除外）及香港分厂。总管理处迁长沙，在上海、香港、重庆设办事处，并在长沙筹设印刷厂。

《蒙古新报》创办。

1938年（民国27年）

1月11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1938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新华日报馆不仅编印报纸，同时出版书刊。1947年1月被封。

1月25日 严宝礼创办《文汇报》，徐铸成任主笔。

2月10日 上海复社出版斯诺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 中译本。

2月11日 冯玉祥在武汉创办印刷厂和书店，定名为“三户图书印刷社”，有职工60余人。

3月 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的《春》(激流三部曲之二)。

4月16日 生活书店在广州创刊《文艺阵地》半月刊，茅盾主编。

7月1日 钱君匋在上海鸭绿江路 (今海宁路) 11号创立万叶书店。

7月21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

7月 南方出版社在广州创办，夏衍领导。

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 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出版机构最为云集、出版事业最为繁荣的地方。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共有57家出版社在此地出版书刊，计出新书总数550余种，期刊超过100种，鼎盛时更达180种。

8月23日 上海复社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编印《鲁迅全集》20卷本，600万字。三个月内完成，分精装、半精装、平装三种。

8月31日 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9月15日出版第2卷，9月30日出版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至此《资本论》中译本出齐。

10月 阿英等创立风雨书屋，创刊《文献》月刊。共出8期。还出版《西行漫画》、《文艺文献》等书刊。

中华书局印刷厂改为美商永宁公司，是日复工，印本版图书，1948年4月收回。上海中华书局改为驻沪办事处。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秋 金擎宇、金振宇、金纬宇在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86弄3号创立亚光舆地学社。

11月初 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方行在吕班路西门路（今重庆路自忠路口）成立大众出版社。

11月12日晚 长沙“文夕”大火。这一把火，使来不及撤走的长沙大小书局，绝大部分化为灰烬。

12月25日 国民党创办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在重庆成立。王世杰任董事长，刘百闵任社长。

是年 鲁迅全集出版社在上海成立。

文献出版社在桂林成立。

新民印书馆在北平成立。

1939年（民国28年）

1月 赵家璧聘美国人密尔斯为发行人，在大美晚报馆对面企业大楼五楼创办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经理陈炳洪。2月2日复刊《良友画报》。1946年6月停业。

年初 改进出版社在福建永安成立。黎烈文任社长。

3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中指出：“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

4月5日 在上海的复社出版韦尔斯著《续西行漫记》，梅益、林淡秋等译。

6月 上海少年出版社创立。出版小说、童话等书25种。

9月1日 延安新华书店扩大营业，从清凉山迁至延安北门外新址。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

10月 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创立，社长陈劭先，编辑部主任胡愈之。

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冯友兰著《新理学》、容庚著《金文编》等学术著作，印行《辞源》正续编合订本。

徐启堂、徐柏棠在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创立棠棣出版社。

青年书店在重庆成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后移交三民主义青年团接办。以出版党义书刊为主。

南方出版社在桂林创办，是《救亡日报》社的一个对外出版机构，主要担负出版国际时事小册子和文艺作品的任务。

《新疆日报》社购进整套印刷机器设备，成为全新疆先进的印刷出版基地。

1940年（民国29年）

1月1日 新赣南出版社成立，社长蒋经国。社址在江西赣县新赣南路1号。出版蒋介石文集及政治、军事类图书和《新赣南》杂志。

1月 陆象贤等在上海创立北社，出版《第三国际纲领》等书。

年初 在江西上饶，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主办了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以“抗战丛书”为主。

4月 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著《中国通史》。

5月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开始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4辑16册。抗战胜利后又出第5辑4册。共5辑20册，图版1 000余幅。

6月 群力出版社创办于江西泰和，1941年4月迁赣县。

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的《秋》（激流三部曲之三）。

7月2日 科学书店在桂林创办。总经理宋乃公，发行人陆凤祥，以提倡实用科学，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自办有科学印刷厂。

国民图书出版社在浙江金华创办。出版发行党义及宣传书刊。

9月6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内容包括“领导和组织党报的出版与发行，并编审和出版各种书籍、教材及宣传品”。

10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派王益、袁信之、华青禾赴苏北解放区设立大众书店。

1941年（民国30年）

3月　国讯书店在重庆成立，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生活书店合办。

春　文献出版社在桂林创办，夏雪清任经理。文献出版社以出版文艺书刊为主，也出版了一些儿童读物。

5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共32册。

6月1日　潘序伦与生活书店在重庆合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潘序伦，总经理徐伯昕。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及账簿用品。

6月23日　上海中央书店出版《万象》月刊，陈蝶衣主编。自1943年6月第3卷第1期起，由柯灵主编。1945年7月停刊。

6月　贵阳文通书局扩大改组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编辑所、发行所、印刷所。创办《文讯》月刊，大量出版图书。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取缔书刊一览》，下令查禁961种书刊。

8月20日　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创刊《时代》中文周刊。次年改半月刊，并创刊《苏联文艺》月刊，创立时代书报出版社（时代出版社），社长罗果夫，总编辑姜椿芳。1944年2月，《时代》、《苏联文艺》和英文版《每日战讯》被勒令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代》、《苏联文艺》复刊。并创办《时代日报》和《苏联医学》月刊。1951年8月20日时代社结束。

10月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事业处成立，专司执行国民党出版政策，指导出版工作。

10月10日　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共30册。

12月26日　侵沪日军军部查封商务、中华、开明、兄弟杂志公司、光明、良友、世界和大东等8家书店，以及商务印书馆印刷所、中华书局印刷所等17处，1942年1月18日才启封。

年底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

1942年（民国31年）

1月1日　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在山西辽县岭南村正式成立。

1月　《古今》月刊创刊，朱朴之主办，周黎庵主编。

陆梦生在桂林创立文光书店，出版新文艺、语言文字书籍。

2月　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组织下，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出一半资金，南方局出另一半资金，创办文林出版社。

3月　上海书业公会按日本兴亚院指令进行改组。

春　华华书店在桂林创办。经理孙怀琮，编辑胡仲持。

4月1日　晋察冀边区北岳行政区成立北岳新华书店。1944年1月与晋察冀分店合并。

4月13日　上海租界巡捕房搜查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陆圣泉（陆蠡）被捕，从此失踪。

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图书送审须知》及《杂志送审须知》。

5月　新中国书局在湖南安化蓝田镇创办。

8月13日　郭沫若在重庆创立群益出版社。

10月　正风出版社创建。创办者陈汝言，出版文学译作。

进修出版教育社在昆明成立。在重庆、桂林、贵阳均成立分社。

12月　李公朴在昆明创立北门书屋，后又创立北门出版社。

是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划归国立编译馆。

国民政府为了垄断教科书营业，指派正中书局为首，组织商务、中华、开明等书局在重庆成立教科书联合发行处。

由沈钧儒集资，委托生活书店派员经营，在重庆建立峨嵋出版社。

刘尊棋、孙伏园在重庆创立中外出版社。

莽原出版社在成都成立。

1943年（民国32年）

2月　世界书局总管理处迁重庆。

3月12日　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发表。不久由正中书局出版。

春　延安举办骡马大会，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在会址搭棚售书，

毛泽东亲临书店售书棚视察。

4月15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

6月1日　在日本兴亚院指使下，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成立。是承印、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的联营机构。

7月12日　国讯书店股份公司在重庆创立。

7月　周杰夫在贵阳创办文风书局。出版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书。

山东大众日报社出版科对外用山东新华书店名义出版发行图书，并在各地建立分店、支店、分销处。

9月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赵树理著《小二黑结婚》。

10月　东南出版社在福建永安创办。成立不到二年，共出版中外名著近30种，总印数约7万册。

11月　重庆20家书店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12月　重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19家书店发起，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任董事长，张静庐任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的有54家书店。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中学文库》，共400册。

中华书局出版《社会科学丛书》、《社会行政工作丛书》。

1944年（民国33年）

春　冀鲁豫新华书店在山东濮县盛辛店成立，1945年底迁菏泽。

4月27日　国民政府《修正著作权法》公布。

5月1日　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创办联营书店，经理陆梦生。参加者有上海杂志公司等21家。抗日战争胜利后迁上海，在武汉、广州、北平设分店。

5月　晋察冀日报社初次编印《毛泽东选集》。

7月24日　邹韬奋在上海病逝。9月28日　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家属，接受邹韬奋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9月5日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10月3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设立韬奋出版奖金，基金定1 000万元，专用以奖励对报纸、杂志及出版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之人。

是年　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以及程小青著《霍桑探案》等。

中华书局创刊《中华少年》、《中华英语》，出版《苏联建设小丛书》。

1945年（民国34年）

8月28日　大连大众书店成立。

8月　重庆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的门市部合并，开始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家迁上海，分别出书并设门市部。1948年10月在香港正式合并为三联书店。

9月1日　重庆《国讯》、《东方杂志》等8家杂志要求国民政府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并声明今后不再送审。

9月15日　重庆20家杂志社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参政会自9月份起自动不送审查。

10月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布废止《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10月9日　《文萃》周刊创刊，孟秋江等创办，黎澍主编。1947年3月改为丛刊。

10月13日　《民主》周报创刊，郑振铎主编，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编辑，发行人王丰年，实际为方学武。1946年10月停刊。

11月7日　东北日报社领导的东北书店在沈阳成立。

11月　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在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江苏淮阴市成立。在各分区，相继成立分店。

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宣传部在丹东市建立辽东建国书社（后改由辽东日报社领导），发展支店三十余处。后改称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

12月中旬 天津知识书店开业。

胶东大众报社将出版发行工作分出，建立胶东新华书店。

东方出版社在台北成立。游弥坚任总负责人兼总编辑，林呈禄任社长，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家出版社。

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萧一山著《清代史》、全汉升著《唐宋帝国与运河》等书。

《内蒙古自治报》创刊（最早为《人民之路》）。

1946年（民国35年）

1月1日 韩近庸、许觉民在上海创立华夏书店。

1月5日 永祥印书馆出版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该刊是中外文化联络社的机关刊物。半年后停刊。

1月9日 重庆出版业35家提出要求：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管理办法》，以及取消一切非法的检扣和寄递限制等。

1月28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废止《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

黄嘉音在上海胶州路186号创刊《家》杂志。1949年7月改组为家出版社。

山东新华书店在临沂开业。有分店40处。1947年2月，与华中新华书店合并。

2月初 上海杂志界、出版界37家联合发表《争取自由致全国政协会议意见书》。

春 上海出版公司成立。

3月17日 上海杂志界联谊会成立。

3月25日 上海杂志界联谊会2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的宣言》，全力支持北平出版业联合会提出的要求。

3月 上海书业公会260家出版社和书店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

生活书店、世界知识等杂志社联合创办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经理丁裕、贺尚华。

4月 朝华书店在北平开业。

5月28日 国民政府公布《出版发行注意事项》，实施出版特别许可制。

5月29日 北平当局查封《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同时查禁75家报刊及通讯社。

9月1日 《观察》周刊创刊，储安平主编。并出版《观察丛书》16种。1948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

9月 开明书店出版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选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鲁迅传》，范泉译。

10月31日 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被查禁。共出54期。

10月 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书简》，共收书信800多封。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鲁迅全集补遗》。

11月 老舍、赵家璧创立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老舍著《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偷生》。

12月 人间书屋在香港创立。先后出版"人间文丛"、"人间译丛"、"人间诗丛"等30多种文艺书籍。1949年11月迁广州。

是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移至上海印行，对原有教科书进行了增订，在"七联"基础上增加儿童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公司，成为"十一联"负责印行。

1947年（民国36年）

1月 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画集》。万叶书店出版《子恺漫画选》。

3月15日 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第1册。

3月26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查禁上海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清明》、《经济月刊》，以及重庆、桂林等地多种报刊。

春 萧军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支持下，在哈尔滨创立鲁迅文化出版

社，创办《文化报》。

4月 东北书店总店迁回哈尔滨，设编辑、出版、发行、经理四个部，改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先后建立7个直属分店。

6月《大公报》连载张乐平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

9月19日 富通印刷公司遭搜捕、查封，公司职工及客户6人被捕。

是年 生活书店出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著《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何干之著《中国启蒙运动史》等书。

商务印书馆创刊《新儿童世界》，编印《新中学文库》、《新小学文库》，出版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

中华书局出版《辞海》合订本；《中华文库》100种。

1948年（民国37年）

1月5日 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开业，赵叔诚任经理。

1月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公布《晋冀鲁豫统一出版条例》。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建立边区出版局。4月，东北书店出版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6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5月 东北书店总店出版发行五卷合订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6月5日 开明书店出版钱钟书著《谈艺录》。

7月1日 《小说》月刊在香港创刊，编委会由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蒋牧良、周而复、以群、适夷8人组成，适夷为执行编辑。出版第2卷第12期后停刊。1949年11月迁上海出版，由周而复编辑。

12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指示》。

12月 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重新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字，由驻在西柏坡的中宣部出版组华应申同志派人将题字原稿送到平津前线有关部门。北平解放以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统一用此次题字复制店招。

是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国民教育文库》第1集98种，出版董作宾著《殷墟文字甲编》；潘光旦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邓广铭著《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书。

1948年以后用维吾尔文翻译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重要文献。

新疆保卫和平与民主同盟成立，主办《前进报》，后改名为《同盟》。

1949年（民国38年）

2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华应申、徐伯昕任副主任委员。

3月15日 《人民日报》迁北平出版。

3月中旬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一次推出17种19册。

4月 新华印刷厂在北平举行开工典礼。

5月27日 华东新华书店迁上海。

5月29日 上海市军管会通令，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文件以及解放区的出版物均不得私自翻印或任意编选纂辑。

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

5月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

6月 人民书报供应社在上海福州路331号开业，专管全市320个书报摊的书刊发行工作。经理钟德秋。

上海市总工会创立劳动出版社，以出版工人读物为主。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工作委员会创立青年文化服务社，开始出版青年读物，发行《中国青年》。

原正中书局印刷厂改组成上海新华印刷厂和上海新华印刷厂二厂。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社长章伯钧，总

编辑胡愈之，总经理林仲易，秘书长萨空了。同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总编辑徐铸成。

7月21日 上海联合出版社成立。由62家公私营书店组成，专门出版中小学教材。1950年10月31日结束。

7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6日 上海市军管会对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实行军管。经过清理后，没收其中的官僚资本，私股仍归股东所有，对全部职工作了妥善安置。

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其中第49条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10月3—18日 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议草案。

10月6日 上海市军管会通告：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沪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抑或外国籍，自即日起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包括拍发新闻电讯在内）。

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

附录二　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上杂出版社,1953年。

【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群联出版社,1954年。

【3】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4】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5】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6】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7】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9】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宋原放主编,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新华书店五十年》编辑组:《新华书店五十年》,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12】郑士德主编:《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

【13】《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六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14】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

【15】《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16】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出版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北京出版史料》(第八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18】《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1—4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1990年。
【20】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出版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1】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2】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新闻出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
【26】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27】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书目类

【28】《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4年。
【29】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年。
【30】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
【31】平心编:《(生活)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
【32】重庆市图书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重庆市图书馆,1957—1958年。
【33】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7—1949.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4】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35】《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6】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7】《开明书店图书目录(1926—1952)》。

三、文集类

【38】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

【39】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

【4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41】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1—10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2】《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43】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1—6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1998年。

【44】喜饶嘉措:《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

【45】喜饶嘉措:《喜饶嘉措文集》第一、二、三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4年。

【46】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根敦群培文集精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四、著作类

【47】叶再生著:《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48】郑士德著:《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49】黄镇伟编著:《中国编辑出版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50】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51】高信成著:《中国图书发行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2】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

【53】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54】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

【55】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装订源流和补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

【56】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中华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

【57】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58】王余光、吴永贵、阮阳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59】王余光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60】汪家熔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61】王建辉著:《出版与近代文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62】王建辉著:《老出版人肖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63】郭汾阳、丁东著:《书局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4】徐雁著:《中国旧书业百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65】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66】路英勇著:《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
【67】宋原放著:《出版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68】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
【69】邹振环著:《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70】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71】徐丽芳、吴永贵等编著:《中国百年畅销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2】雷群明著:《编辑修养十日谈》,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73】王建辉著:《王建辉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74】黄林著:《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75】吴永贵著:《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1912—1949)》,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76】熊月之、张敏著:《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7】许敏著:《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第十卷),上海,重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8】张定华等编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79】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
【80】张宪文、穆纬铭主编:《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1】辛广伟著:《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82】赵晓恩著:《延安出版的光辉》,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
【83】陈玉申著:《晚清报业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84】方汉奇编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
【85】李龙牧编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86】郑逸梅著:《书报话旧》,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87】姜德明著:《新文学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88】姜德明编著:《书衣百影》,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89】倪墨炎著:《倪墨炎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90】叶灵凤著:《读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91】唐弢著:《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92】黄保定、季维龙编:《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93】吴道弘著:《书评例话》,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

【94】孟昭晋、王波编:《萧乾书评——理论与实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5】赵晓梅著:《中国书评史初探》,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96】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97】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

【98】倪墨炎著:《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99】《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100】《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101】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102】《张元济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103】《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04】汪家熔著:《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105】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106】李家驹著:《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07】〔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08】汪凌著:《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109】王云五著:《岫庐最后十年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110】王云五著:《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111】王云五著:《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112】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113】蒋复璁等著:《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114】王建辉著:《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15】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6】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7】《回忆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18】郑子展编:《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内部资料),1946年。

【119】徐诚、王一方编:《韬奋:我的出版主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0】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121】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22】范用编:《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23】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怀念出版家徐伯昕》,太原,书海出版社,1988年。

【124】叶圣陶著:《叶圣陶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125】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126】徐登明著:《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127】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128】马国亮著:《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29】赵家璧著:《编辑忆旧》,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130】张静庐著:《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131】刘纳著:《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32】孙晶著:《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33】李济生编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134】何长凤编著:《贵阳文通书局(1909—1952)》,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5】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6】〔美〕费正清、〔美〕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37】〔美〕费正清等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38】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139】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40】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1】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42】王余光、宁浩主编:《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3】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4】陈大康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5】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6】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7】解弢著:《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

【148】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9】《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150】黎锦熙著:《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151】李杏保、顾黄初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2】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53】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154】赵景深著:《我与文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55】郭沫若著:《创造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56】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157】钱歌川著:《钱歌川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158】鲁迅著:《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9】《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160】蔡元培著:《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61】吕思勉著:《吕思勉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2】《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

【163】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64】张闻天著:《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5】丁文江编:《爨文丛刻》,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66】傅懋勣著:《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发行,武昌天戍印书馆印刷,1948年。

【167】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68】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69】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170】梁敏编著:《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

【171】喻翠容著:《布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

【172】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73】傅懋勣著:《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1–1983年。

【174】包尔汗著:《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175】刘璐编著:《景颇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
【176】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177】李永燧、王尔松编著:《哈尼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178】李淑兰、仲谦编著:《锡伯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179】唐景福著:《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
【180】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181】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82】忒莫勒著:《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叙录》,内蒙古图书馆,1987年。
【183】周有光著:《比较文字学初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184】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185】杨福泉撰:《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6】《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187】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8】赵丽明、刘自齐撰:《湘西方块苗文》,《民族语文》1989年4期。
【189】赵丽明撰:《方块侗字与汉字侗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90】李炳泽撰:《板塘苗歌:现代苗语书面文学奇葩》,四川《民族》1996年第6期。
【191】马学良撰:《彝文访古录追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192】曹达诺夫·扎义尔撰:《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3】周德仓撰:《〈藏文白话报〉的在藏发现及新闻史学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

五、报纸

【194】《大公报》
【195】《中央日报》
【196】《申报》
【197】《新闻报》
【198】《解放日报》

六、期刊（含丛刊）

【199】《文史资料选辑》

【200】《中华教育界》

【201】《东方杂志》

【202】《生活周刊》

【203】《出版史研究》

【204】《出版史料》(上海版)

【205】《出版史料》(北京版)

【206】《良友画报》

【207】《教育杂志》

【208】《新文学史料》

【209】《新青年》

后　记

2000年12月底，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酝酿已久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正式启动。《民国卷》是九卷通史中的一卷。民国出版史千头万绪，史料复杂，研究繁难而意义重大，学术界对此卷的写作亦寄予重望。我们领接下撰写任务后，积极组织作者团队，提出指导思想，确立编撰原则，拟订编写体例，安排章节内容。随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通史》编委会召开的20余次《通史》编撰工作会议上，有多次讨论到本卷的内容。观点上的争锋，学术上的辩难，对我们深化历史认识，提高撰写质量，大有裨益。我们原来基本上按专题写作的编撰思路，几经调整，最后变成现在的以时间纵线和专题横线相结合的编写体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从原来分散叙述改为专章模式。当然，很多学术上的己见，我们也坚持了下来。

2003年底，初稿完成。2004年8月，《通史》第十次编撰工作会议讨论了本卷书稿。编委会组织相关专家，认真审读了书稿，并给出了书面意见。我们充分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对书稿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调整和修改，有些章节更换作者，推倒重写。2005年5月和8月，《通史》编委会就本卷书稿写作情况，分别在武汉和北京召开了两次专题会议。我们按照会议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的精神，对书稿作进一步润色加工，多人写作惯

常出现的体例各异和文风不一，章节篇幅参差和内容重复互见等问题，都在统稿的增删并改中力求做到完善。2006年9月，书稿修改完成后，《通史》编委会办公室委托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郑一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红岩先生，分别审读了全部书稿。两位先生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十分宝贵，亦十分可行。在此，向所有给予本书帮助的专家学者，特致谢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刘兰肖女士具体分管本卷的事务工作，她的友好态度和勤快联络，是本书加快写作进度的动力因素之一。出版学术网版主章雪峰先生将平时积累的诸多有价值图片，无偿贡献给本卷使用。这些都是十分可感的事，这里也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写作队伍，主要由王余光和他的博士、硕士生团队组成，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一章，由《通史》编委会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金波先生撰写。除了下面列出的撰著者外，朱静雯教授、韩芸博士、李雅与王静也提供了部分初稿，特此说明。

参加本书写作的成员为：

主笔　王余光、吴永贵

撰著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吴永贵（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副教授、博士）

　　　刘洪权（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博士）

　　　邓咏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博士）

　　　徐丽芳（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副教授、博士）

　　　汪　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博士）

　　　李天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陈幼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

　　　钟智锦（香港城市大学）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具体写作分工：

王余光：提出全书指导思想、写作体系，编写大纲、导论及全书最后统稿。

吴永贵：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章（第一、三、四、五节）、第三章（第一、二、四、五、六节）、第四章、第五章（第三、四、五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五、六节）、第七章（第二、三、四、五、六、七节）、第八章（第一、二、三、五节）、第九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三、四、五、六节）、大事记及全书统稿。

刘洪权：第十章（第二、三、四、五节）。

邓咏秋：第一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一、五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节）。

徐丽芳：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汪　琴：第三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七节）。

李天英：第五章（第一、二节）。

钟智锦：第六章（第八节）。

陈幼华：第八章（第四节）。

史金波：第十一章。

王余光　吴永贵

2007年7月26日


ISBN 978-7-5068-1790-5
9 787506 817905 >
定价：7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8　民国卷
作者=王余光
页数=586
SS号=12211925
出版日期=2008.12